

金陵

李健 编著

4

新傳

这里 重现战火硝烟
海战 空战 炮战 登陆战
这里 首提千古迷案
秘使 谈判 争议 统一方案
咫尺海峡 几多沧桑
同胞何须言思想
两岸民心所向 统一大势所趋
不惜东风唤不回



华文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朋友，你知道蒋介石曾三度密谋“反攻大陆”吗？这些行动计划因何搁浅？你知道海峡两岸曾有过三次和谈秘使来往吗？其密谈的内容是什么？你知道对峙中的两岸曾发生过数次举世瞩目的海战、空战、登陆与反登陆战吗？其起因、经过及胜负如何？你知道中、美、苏等国曾因台湾问题而展开了一幕幕出神入化、精彩绝伦的外交大角逐吗？你知道昔日仓皇离开大陆的一代国民党大员的不同归宿吗？你知道台湾当局的新圈谋吗？《金陵新传》生动地再现了上述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断，全景式地勾勒了一幅变幻莫测、扣人心弦的台海风云图……

海峡两岸关系纪实

金陵新传

卷四

李健编著

华文出版社

(京)新登字 064 号

责任编辑：高剑

封面设计：文等

版式设计：蒋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陵新传 / 李健编著。

—北京：华文出版社，1995.11 ISBN7—5075—0490—5

.金... .李... .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台湾问题—史料 .

125 D61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5)第18349号

金陵新传

李健 编著

华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135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1995年11月第1版 1995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1/32 印张 73.5 字数 1715千字

印数：1—13000册 定价：98.80元(全四册)

金陵新传

第十二章

林彪坠机黄沙，黄埔校长悲怆泪涌。“山姆大叔”不忘“老朋友”，蒋介石不敢贸然“与魔鬼握手”

第一节 “密使”失约罗马

毛泽东对战争的预料

中南海游泳池，澄澈的水波里，一个宽厚的身躯静止般仰浮在水面上。许久，粗壮的胳膊才高高扬起，缓缓地划动了一下……

在水面上仰浮，是毛泽东最喜爱的游泳姿势，也是他思索问题的最佳方式。

此刻，他仰浮在水面上，眼睑紧闭，声息全无，似乎静静地睡着了。

其实，这位共和国的缔造者脑海里正涌动着滔天巨浪。他思索着：怎样操动手中的舵浆才能将 8 亿人的航船避开急流险滩，驶进一个安全的港湾。

中苏边境，苏军 55 个步兵师，12 个战役火箭师，10 个坦克师，4 个空军军团，总兵力足有 100 万，虎视眈眈正欲跃马挥刀，卷地杀来。

百万大军，这算什么？我有 500 万大军与之抗衡。就算他的一万辆坦克突破了我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但在纵深预定战场上，他们会发现陷入了灭顶之灾的重重包围之中。到那时，他们食无粮草，住无居所，车无油料，炮无弹药……

8 亿人民 8 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苏军的千里补给线，会被我处处掐断，先头冲击的部队会在我铜墙铁壁前碰得头破血流。我们的实战机群，会将苏军的大肚子运输机打得尸骨无存。到那时，不仅这百万大军无法做困兽之斗，我们的铁军还将杀过边界，将战火引向苏联的国土。北京不保，莫斯科也将无存……

哼！没有 400 万军队，他别想打我的主意。而苏军的总兵力只有 320 万。

毛泽东挥动了一下手臂，伴随着躯体的漂移思绪仿佛也转到了另一个光点。

核战争，勃列日涅夫真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启动核战争的按钮？

毛泽东陷入了更深层的思索中。

毛泽东当然知道原子弹的厉害。

记得十多年前第二次出访莫斯科的时候，他同当时的苏联领袖赫鲁晓夫发生过一场关于核战争的辩论。针对赫鲁晓夫惊恐核战争的暴发，诺亚方舟将彻底沉没的恐美情绪，毛泽东发表过一个震惊世界的讲话。

“原子弹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看它也是纸老虎。……”

“决定战争胜利的根本因素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原子弹也是

靠人去掌握的……”

“打核战争，肯定要死不少人，即便那样，我们还是能最后赢得战争……”

赫鲁晓夫吃惊地半张着嘴巴，凸起的眼珠几乎从眼眶里蹦出来。

赫鲁晓夫没有听懂毛泽东的话。以至许多年后，在他的回忆录里，他仍然引用这段话，并且认定毛泽东是“疯子”、“战争狂人……”

波兰的哥穆尔卡也曾抱怨地说：“你们中国人多，可我们波兰呢？我们只有 5000 万人口，叫我们怎么个死法？”他也没有听懂毛泽东的话。

但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听懂了，他曾叹息着对白宫办公厅的主任杰里·珀森斯将军说：“原子弹的最大威力是在发射架上，而不是飞出去之后。毛泽东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物，恐吓、威吓对他没有用。”

毛泽东对自己的许多得意之笔，风趣地称之为“我又耍了一个小花招”。

在莫斯科的这番话，算不算花招？没有人研究。此后，毛泽东亲自部署，调集了精兵强将去占领两弹的制高点。

1964 年，有了爆炸成功的原子弹、运载导弹。不久，又有了氢弹。到这个时候为止，中国已经进行了七次成功的核试验，每次试验的成功，都昭示着中国两弹技术的又一次惊人的飞跃。

现在，毛泽东当然不会再谈，准备死多少人的问题了，而是要最大限度的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近几日，毛泽东又读二十四史，其中《明史，朱升传》中的一段话，始终在他脑海里萦回。

元至正十二年（公元 1352 年），四方旱蝗，饥荒严重，又瘟疫流行。是时，元皇朝纲纪不振，政治腐败，内部纷争，天下群雄竞起，遂致大乱。定远（今属安徽省）皇觉寺为乱兵所焚。朱元璋无奈，投至义军郭子兴属下，任亲兵九夫长。后屡次征战、南讨北杀，朱元璋兵多将广，羽翼渐丰。此时朱元璋急于称王，然隐士朱升剖析天下大势，指出为敌者，东有张士诚，西有徐寿辉、陈友谅，南有陈友定，东南有方国珍，早早称王，只能成众矢之的。现在天下大势未定，群雄逐鹿，不如暂时拥借已称宋帝的韩林儿，修好于各方，集中打击陈友谅。此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朱元璋纳之。此后，灭陈友谅、沉小明王于瓜埠江中，障碍即除才于公元 1368 年正月，即皇帝位。

面对一触即发的核战争，毛泽东从明史中又受到诸多启示。

为减少伤亡，人口密集的大中城市，应迅速挖掘修建防空工事。当核弹袭来时，人们可躲至地下。

打仗最忌两面树敌，美国急于撤出越南，我们该送他一颗定心丸吃吃，明确告诉他们中国无意在亚洲追求霸权，也无意去填补美军撤离后的空白。

面对苏联的战争叫嚣，我们不能单纯地组织防御，应该和张爱萍商量一下，可否把即将实施的地下核试验和高爆核试验再提前一段时间。触一触勃

列日涅夫的神经。看他还有没有胆量去动核按钮……

毛泽东虽然躺在水面上未动，却已思贯古今，神游八极，将一场大战的全局廓括胸中。

毛泽东的“小花招”

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就在于他有常人无法望其项背的预见性。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所言：“如果历史能够倒演，80%的人会成为伟人。”

“主席，总理来了，正在客厅等您。”工作人员打断了毛泽东正在太虚中往来飞梭的思绪。

毛泽东手攀扶梯，走上池岸；用毛巾揩干身上的水迹。披上浴袍，走进了客厅。

“恩来，坐下说话。”毛泽东气定神闲地说。

“主席，四老师的紧急报告，您看过了吗？”

由于过度的操劳和过重的焦虑，周恩来的声音急促、暗哑。“哦，看过了，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毛泽东淡然一笑，“勃列日涅夫怕不怕？尼克松怕不怕？我不晓得，我想摸摸他们的底哩！”

毛泽东今天是语声朗朗、谈笑自若。周恩来心中却如悬巨石，神色忧郁得很。

他为毛主席的安全而忧虑。

“恩来，你读过《明史》没有？我看朱升是个有贡献的人。他为明太祖成就帝业立了头功。对了，他有九字国策定江山，‘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我也有九个字能不能对付核大战？听好，这九字就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周恩来略一思忖，陡然眼眸一亮。

毛泽东狡黠地一笑，“有没有剽窃之嫌啊？”

周恩来兴奋地道：“不称霸，好！这下美国就该放心了。”毛泽东摇摇头，“只放心不够，人家是老大，哪能袖手旁观，我想让他们下河趟趟浑水哩！”

周恩来：“真把美国拖进来，这场戏就有热闹看了。”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沉吟着说：“勃列日涅夫是个软耳朵根子，我怕他管不住那个国防部长哩！”

周恩来始终记挂着自己的使命，趁此亮出了底牌。“主席，四老师都认为国庆节苏偷袭的可能性很大。我看，今年的群众集会怎么个搞法，是不是再研究一下？”

周恩来的潜台词是：搞集会主席就要检阅，要检阅就要登天安门。登天安门国家领导人就要全部亮相。这个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哦！不搞集会，我看不太好吧！这是不是告诉人家，我们有点怕？集会还是要搞的，我还要上天安门。我倒想开开眼，看看原子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毛泽东的脾气，周恩来是知道的，说不过黄河，就不过黄河，天王老子也劝不转。

周恩来的浓眉紧紧地锁在了一起。

几十万人聚集在广场上，一旦出现情况，怎样疏散？怎样隐蔽？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和其它领导人，怎样才能安全地进入地下通道？

周恩来反复掂量警报后的五分钟。

如果留有余地，或许只有四分钟、三分钟。

周恩来苦思苦求着万全之策。

毛泽东笑笑，解意地说：“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不可以放两颗原子弹吓唬吓唬他们呀？让他们也紧张两天，等明白过来，我们的节也过完了。”

周恩来心头略松，会意地：“放完后，咱们再来个秘而不宣。”

“对嘛！这就叫‘兵不厌诈’嘛？”

“主席，您看安排在什么时间比较好？”

“我看不能早，也不能晚，28、29两天就可以。这事还要和荣臻、爱萍同志商量一下。”

……

柯西金大失所望

1969年9月2日，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逝世。9月4日，周恩来在叶剑英、韦国清的陪同下，乘专机飞往河内，向胡志明的遗体告别。行前周恩来电告河内：不要求越南方面做任何接待，告别遗体后当天即返回国。

周恩来这样要求是因为他想避开与苏联领导人见面。参加正式吊唁活动，这样的会面是不可避免的。鉴于中苏大战一触即发的严重局势，此时中苏领导人会面对国内的备战和对国际舆论的影响，都是不利的。

作为胡志明的莫逆之交，周恩来为不能参加他的追悼会感到万分遗憾。

9月4日晚上，周恩来在吊唁并瞻仰完胡志明的遗容后，匆匆乘机回国。

9月9日上午，越南在河内巴旁广场为胡志明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前来参加吊唁活动的各国代表中，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

柯西金见吊唁的外国代表中没有周恩来，不免有些失望。他找到前去吊唁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表示希望在参加完葬礼后回国途中在北京停一下，同中国领导人见见面。

中国迟迟没有答复。

柯西金几乎失望了。在专机临起飞前，他亲自打电话给中国驻越大使，将他回国飞行停留的路线详细地告诉了中国大使。

柯西金始终认为，格列奇科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这一想法是丧失理智的疯狂的意念。大量的放射性尘埃会随着高空气流四处飘散，不仅会杀死千百万中国人，也会威胁到远东的苏联公民以及与中国接壤的其他国家的公民，何况要消灭中国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几颗原子弹无疑是做不到的。假如中国实施报复，将所有的核弹都一古脑地扔到苏联头上的话，那么这种灾难也是苏联所无法承受的。

柯西金的种种和平建议虽然在政治局多次会议上均未引起足够重视，但他却甘愿再冒一次风险，向中国领导人晃动起橄榄树枝，准备做一次和平的使者。也许是他的和平意愿感动了上帝，“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转机出现了：9月10日，当他飞到苏联塔吉克共和国首府杜尚别时，忽然得到回音：中国总理欢迎同他会晤。于是他又转经伊尔库茨克于9月11日上午到达北京。

机场贵宾室的一场舌战

上午10时30分，当柯西金乘坐的伊尔62专机降落在首都机场时，周恩来、李先念、谢富治、乔冠华等人前往迎接。握手寒暄后，客人被引到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在那里进行了一次努力扭转中苏关系的长达190分钟坦率而诚恳的会谈。

双方一落座，柯西金就说：“周恩来总理，我们大约有将近5年的时间没有见面了吧？记得上次会见，毛泽东主席表示要与我们争论一万年，我那次可是被你们责骂够了！”说完他故作轻松地笑了笑。

周恩来神色严峻地说：“约5年前，毛泽东同志对你说过，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可以吵一万年。但是对这些争论，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见解，我们可以不要说现在，就是到了一百万年以后，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还会有的。有矛盾，有斗争，即使吵架，也应该是争吵，‘君子动口不动手嘛’！”

“可是你们在边界上驻扎着200多万军队，还让400万青年到边界紧张地区定居，并连续不断地进行核实验，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想与苏联打核战争吗？要知道：我们只消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将你们打回石器时代！”柯西金有些恼怒地说。

周恩来神色越来越冷峻：“部长阁下，你这可是赤裸裸的威胁！边界紧张局势是怎么造成的？我国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去开发。我们没有在欧洲驻军，我们没有派坦克师侵入捷克斯洛伐克。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的核武器达到了什么水平，你们是清楚的！尽管如此，如果你们胆敢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柯西金曾多次领教过周恩来的“三寸不烂之舌”的厉害劲，自思不是周恩来的对手，于是把脸色和口气放缓了些：“我这次来，知道不可能通过

一次会晤，就改变我们的分歧，但避免战争，是我的目的。我想总理阁下也是欢迎的。”

周恩来声音很平静：“我们的立场早已挑明，我想再重复一遍，中苏两国边界有些地段没有划定，有争论的地方应该通过外交途径谈判解决。在未达成协议前，双方应努力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动用武器向对方射击。中国绝不会首先挑起战争，但我们并不害怕战争，不管是小打还是大打，甚至打核大战，只要有人敢欺负我们，我们就奉陪到底。”

柯西金想一想说：“不再动用武器向对方射击，不首先挑起战争，我想我们可以做到。”

最后，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双方达成了谅解：首先签订一个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摆脱接触的临时措施的协议，并进而通过谈判解决中苏边界问题。

这些毕竟仅仅是口头上的东西，有待于通过谈判落实正式协议并付诸实施。双方就谈判的地点、代表团成员和双边贸易等交换了意见。双方相约，就上述协议各自向自己的中央报告后，交换信件予以确认。

一次重要会晤的流产

1969年9月20日，蒋经国来电告诉魏景蒙：“明天下午2时30分赴中山楼听副总统演讲。然后一起见总统。最近，尤特（C.YUTERJ.S.D.）正在推动全球禁止核子试爆，他已与俄国官员谈过，尤其是支持此构想的基德洛夫。他也告诉美国大使李奥纳德等人。在今年8月20日的一封信函中，提到由美国和苏联联手摧毁中共的核子武力，以惩处不受管制之国家。这封信中，他也暗示我们愿执行此项处理。但他仍然在联合国安理会倡议给予中共联合国会员资格。建议向总统报告上次会谈时，提出以下的重点：

1. 我们进一步改善关系的时机已成熟。（包括大陆内外的亲苏共党分子）、（派代表驻莫斯科等）。所有这些关系的改善应可在高层次抵台湾时达成。（交换匪情）
2. 应提供我方海空军的攻击配备，俾便同步配合苏联的倒毛行动。
3. 罗布泊（中共在新疆的核弹基地）对我们双方都是威胁。（建议使用苏联飞机和我们的飞行员）
4. 透过安排，我们愿考虑正式承认外蒙古，并建立外交关系。（将来与西藏的关系）

下午3时30分，蒋经国和魏景蒙赴“荣民总医院”探视蒋介石，蒋的脸颊上仍有一点伤痕。三人谈了很多也谈了很久。蒋介石令魏景蒙不要去象牙

海岸，应在赴罗马后立即回台，以下的文字可视为最后的定稿：

见到路易斯时，先听他如何说法，如果其态度依然友好，或有积极之建议，我方不妨做以下之表示（我：甲方，彼：乙方）：

一、在目前情形之下，中苏两国已经到了应作进一步增进双边友好关系。乙方如派员来台面商进行步骤及提出具体的建议，则双方就可切实合作，积极进行。

二、毛泽东拥有原子武器，甲乙双方皆受其严重的威胁，甲方可与乙方共商如何使其彻底消灭之方法。

三、如不用武力，毛政权是不会自己崩溃的。甲方有足够训练的人力担负其事，惟其海空军的力量还不够，故需要乙方供应适当海空军之攻击武器。（类如米格—23、远程轰炸机、飞弹潜水艇等）、（第三项最好要待对方提出时我方再提，否则始终不提）、（此时可察其反应如何，方清淡提醒重用甲方的精干空军人员驾驶新式米格轰炸机突击其原子设备，未尝不是一个方法）

四、为了造成毛泽东极不利的形势，以及变更今后世界的局势，甲方与乙方应共同磋商在适当的条件下，甲方可以考虑正式承认外蒙古并建立外交关系。

9月20日

中正亲笔于荣民总医院

接着，蒋介石又讲了下次见面的9点提示：

1. 问他对我方所提5点，你们有否意见（答复）。

2. 我们始终遵循孙总理遗嘱，原与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总理教导我们，三民主义即社会主义，民生主义即共产主义，他主张亲苏（容共）政策来实现三民主义的建国理想。但不能容忍害国害民之徒毛共。

3. 反毛之中共党员如其有愿皆可容纳于国民党之内，但其不能另有共党的组织，亦不能跨党。

4. 中共在国内如另有组织，则与国内各政党的组织同在国民党领导之下。

5. 如果问起要什么武器，则可答应此事待他们对我方所提5点有了确实答复再行详商，如无对我方5点有了确答，则待双方正式代表会商时详谈。但我所欠缺者只是海空军新式武器。至于陆军武器现可自给之语。（略答）

问其是否已准备派正式代表来台，或要由我国驻双方友好国家大使先议，但最后仍须在台北举行最后的会谈。

6. 外蒙问题可以略提我承认其独立的可能性，但新疆与东三省的主权与领土必须完整。

7. 对毛具体计划应由双方组织参谋团共同实施。

8. 讨毛行动必须由中华民国政府单独负责实施，不须外国参加。

9. 对毛共核子武器，由他们供给武器，由我方负责实施摧毁。

魏把蒋介石以上 9 点提示译成英文之后，蒋经国交待他另加 3 点：

1. 甲方不愿为了中国讨毛战争而引起世界之纷争，故不需要外国参与其事，只要乙方声明此为中国内政问题，不予干涉。

2. 乙方应当体念到过去支持毛共夺取政权之政策是斯大林的绝对错误。经过毛共 20 年残暴统治，中国大陆人民对其恨之入骨。今后乙方只有支持国民党推翻毛共政权，方能使中国人民对乙方发生好感。即中共党员与军队亦将因此而亲苏，并将与乙方重归旧好，如果乙方仍想扶持中共其一部分人起来讨毛，则无异于以暴易暴，必然是大陆人民不能忍受的。

3. 在甲乙双方合作之下，国民党领导全国从事讨毛战争，在政治上可以容纳一切反毛政治团体（包括反毛共党分子）。

在与蒋氏父子会谈后，魏景蒙感触颇多，当天晚上，写下了如下杂记：

1. 美国与中共勾搭并非新鲜事，20 年来他们一直扬言放弃我们，美国与中共棘手的是台湾问题，美国想把台湾作为基地。

2. 台湾政府和人民此时特别感到不悦，但美国不能占领台湾，台湾也不能自行成为独立国家。

3. 如果废除苏联与中共的友好条约，会对大陆的中国人民带来极大冲击，对我们有利。

4. 不交换情报和代表，如此零星会引起猜疑，对苏联不好。

5. 1949 年以后，加上斯大林支持毛泽东。“是大陆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6. 使美国与中共关系不顺畅的，除了台湾以外，还有金门和马祖问题，我们被要求自这两外岛撤退，但我们断然拒绝。

7.（大使级）会谈，我们同意在日本之外的其他国家，进行大使级的会谈。

8. 我应问他苏联倡议亚洲共同安全联盟意图何在。东南亚的情势非常复杂，受美国影响很大，日本、南韩不会接受此构想。因此，关键问题是毛泽东仍然存在。他对承认外蒙古的行动有何看法。

9 月 22 日，魏景蒙前往阳明山向蒋经国辞行。魏问：“如果反攻大陆，美国的态度如何？”

蒋答：“第一，美国自顾不暇顾我事；第二，反攻大陆不受任何协议约束；第三，美国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把握反攻成功，美国不反对，换句话说，如果苏联以武器支援，美国不反对。”

9月22日，魏景蒙在孟买投邮，信是写给路易斯的，约定10月罗马见。内容如下：

亲爱的路易斯：

我于10月2日至6日一定会在罗马，我没能到伊登旅馆订到房间，改住罗马的ParcoDirPrincipi旅馆，我的电话号码大概是861089、841071，我会在那里等你的电话。

祝好

Tanal in (景蒙)

10月2日，魏景蒙抵罗马。

打电话至伊登旅馆，路易斯不在那儿，也没有预订2日和4日的房间。在打电话之间，魏景蒙做了一个噩梦，梦见间谍在跟踪他，而他又找不到路易斯。晚餐后，魏于10时许走到伊登宾馆，服务人员说，路易斯来电，他可能于4日到，停留一星期，要来访者尽量不打电报或长途电话。据旅馆工作人员说，路易斯自称是美国人。于是魏景蒙在伊登的柜台留言给路易斯，“请回电Principi旅馆227号房”。

中午12时30分。魏景蒙从飞机中收到莫斯科电台再度指控中共是盲目的排他主义和国家主义。

这一天的广播对有关中苏关系问题做如下报道：

1. 边疆撤兵36公里；
2. 恢复谈判与贸易；
3. 苏联将援助河内；

10月4日，正午时分魏景蒙向伊登查证，路易斯仍未住进。下午3时、6时、9时、11时再查，仍未住进。

10月5日8时30分，魏景蒙再次向伊登旅馆查证，询问台人员说，路易斯已取消预订房间。魏赶紧到电信局打电话给他，路的太太接电话。魏告诉她自己的旅馆地址，并说会在罗马等至11月7日。

魏再向伊登宾馆查证，询问台说，“他昨晚打电话给经理，取消预订。”

10时45分再打电话至莫斯科。转告他在Principi等路到10月6日晚为止。10月6日前再打电话告诉他新地址。并商定10月7日回家，不再呆在罗马。

魏景蒙等着看路易斯是不是会打给他。但他知道，事情至为明了，不必等候矣，归去来兮。客气的打电话给他太太，只是告诉她，自己记挂他，但必须回家处理事情，如果路要找他，可以打电话至他家。詹姆斯（魏景蒙）

10月6日10时，魏景蒙再次打电话给路易斯太太。她说：“从未收到自孟买寄来的信。有很多要寄给他的东西都没收到。”

魏说：“请他打电话到我家和我连络。我明早返台。”

10月9日下午4时30分魏景蒙返家。

下午6时30分向蒋经国报告任务失败。蒋经国称许魏的行事并作出如下的反应：“中共和苏联不会联手，幸好你没见到他告诉我们的态度，不必去见总统，好戏就要上场，等着瞧吧！”

10月10日，蒋介石要在“国庆”典礼之后见魏景蒙，但他已离开（张群）办公室前往泰顺街。

取得电话联系后，魏获指示在下午3时偕蒋经国到士林官邸见蒋介石。

魏景蒙向老蒋报告和路易斯连络的所有经过。

蒋介石也认为这次会晤的任务失败是因苏联政策所致的看法。

以下是蒋介石的反应：

1. 我们现在按兵不动（不便采取任何行动）。
2. 他们不会有进展。
3. 应该看看中共第7和第8号广播稿，其中对解决边界冲突方面并无进展。

魏景蒙作了半小时的报告后告退。蒋经国与蒋介石继续谈。

回家后，魏景蒙将《中国邮报》刊出的关于合众国际社9月17日发自英国的一篇报道剪下，附在自己的日记本上。上面引述苏联“新闻记者”路易斯在伦敦晚报撰写的新闻报道，说苏联“很可能”采取像进犯捷克一样的模式，攻击中共的核子设施。全文如下：

合众国际社伦敦17日电

一名经常在国外为苏联传送消息的苏联“记者”周二暗示，苏联可能干预中共，显然会攻击中共的核子设施。

曾预测赫鲁晓夫于1964年垮台的莫斯科记者维克托·路易斯，仍如前次在销路广大的伦敦晚报上提出上述极为不祥的暗示。路易斯指出，苏联可能会发动入侵捷克式的干预行动，他说，中国大陆的反毛力量“非常可能”推出一位领袖，由他来要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手足支援”。

路易斯在文稿中指出：“从过去一年来发生的事情观察，证实苏联采取下述政策，即社会主义国家有权依据自身或那些遭到威胁国家的利益，干预彼此的事务。”

“中国大陆比捷克大好几倍，而且会积极抵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定会施行此种政策。”

谈到苏联攻击中共核子设施的问题，路易斯神秘的又说：“苏联敢不敢攻击中共在罗布泊的核子设施，是个战略上的问题，因此全世界只能在事后才见分晓。”

路易斯说：“莫斯科的消息灵通人士对于西方会因苏联计划空袭罗布泊而兴奋感到意外，此间都很清楚苏联的核子设施目标就是对准中共的核子设施。”

他说，苏联倾向以火箭取代部队的攻击，苏联有“各种火箭可供选择，端视地形和其他情况而定。”

“例如，中共想占领一个岛屿，它会放火烧光地面和很多已经派在该地的军队和装备。”

此话显然是指中苏在珍宝岛的边境冲突，有关该岛曾为焦土一事，以往未曾透露过。

他并提出警告说，“毫无疑问，中共在每次遭到小股势力攻击时，一定会采用焦土政策……在莫斯科看不出准备与中共开战的迹象……全苏联人最近已有毛泽东可能发动攻击的准备。”

路易斯说，以往抨击中共的冗长演说仅在苏共集会时向党员宣读，但现在已被视为人人皆应知晓。

他说：“当然，此间还有许多事是不为外人知的，但这些事都会引起军事上相当严重的关切。”

路易斯在报导中还说，从越南获得的消息，中共已从北越撤回许多顾问，他们汲取了和美国人作战的长足经验，而这些人都会被调派至中苏边界。

第二节 “第一号令”出笼背景

神州大地全面备战

1969年秋。北京西郊玉泉山。

毛泽东的案头放置着一份文件：曾经到过台湾、会晤过蒋经国、经常代表苏联官方透露重大决策的“自由撰稿人”维克托·路易斯在伦敦《新闻晚报》赤裸裸地写道：苏联可能对新疆罗布泊的中国核试验基地进行空袭。阅过之后，毛泽东久久地陷入了沉思。

如果说美国人主动“泄密”别有用意，那么这位苏联“密使”的公开叫嚷又说明了什么。既然在新疆敢扔，那么在北京也有可能。

毛泽东立即向中央发出警告说：“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

毛泽东给他们具体决定了疏散的时间是10月20日，即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之日以前，并为一些老同志指定了地点，大致都在京广铁路线附近。说完，他便率先离开北京，前往武汉。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全部疏散，只留周恩来和一个副总参谋长在西郊玉泉山坐镇指挥。

林彪跑到苏州以后，次日便发出了那个著名的战备“第一号令”。于是，引起了全国一片动荡不安：满载军队的列车彻夜不停地在铁路线上隆隆行驶，边防的士兵们在野外帐篷里枕戈待旦……这是朝鲜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调动。

“第一号令”内容包括：

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武器的生产；
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并迅速报告。

由于“第一号令”是由黄永胜等人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名义迅速下达全军的，所以又称“林彪一号令”。

接着，朱德、李富春到广东从化县；陈毅到石家庄；叶剑英到长沙；聂荣臻到邯郸；刘少奇鼻子上插着鼻饲管躺在担架上被押送到开封；邓小平、陈云、王震被“疏散”到江西；陶铸被押送去合肥。这些被打倒、被夺权的对象，反而要重点“保护”起来了。似乎他们对这些“黑帮”们的人身安全，关心得无微不至。

10月19日，林彪用电话记录的形式向毛泽东报告，企图先斩后奏，以既成事实，迫使毛泽东同意。尽管毛泽东对苏联的核攻击保持高度的警惕，也主张中央领导同志不要集中在北京。但是，也对林彪一伙借战备为名，以

个人名义发号施令十分反感。所以毛泽东听了以后，当即指示：烧掉。意思是根本没有这回事，把这个“号令”烧掉。

林彪和黄永胜慌了手脚，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竟造谣说：“毛主席说很好，烧掉。”他们还扣发和删改了某些军区关于执行这个“号令”的报告，对党中央和毛泽东进行封锁。

“一号令”实质上这是林彪图谋进行政变的一次预演，其目的是看看他这个“副统帅”的“号令”灵不灵。同时，因为军队的老同志们还在，这些老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自然形成的威信，有历史形成的所谓“山头”，许多老部下仍然支持拥护他们，所以，林彪想通过第一个“号令”，以战备疏散为名，把军队的老同志赶出北京，为实现他篡党夺权的阴谋扫除障碍。

汪东兴飞京急传指令

进入70年代后，毛泽东开始考虑恢复党和国家的正常生活，首要议程是召开四届全国人大，要召开人大，先要修改宪法，使之与“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改天换地”相适应。

1970年3月，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收到了周恩来从北京送来的文件，他提出了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人们今天早已熟知庐山会议上那一场关于是否设国家主席的斗争，但很少有人知道，第一次提出设国家主席，是出自周恩来之口，而不是林彪。

周恩来的考虑是合理的。自从1966年8月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在造反狂潮中停止工作以后，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定为“叛徒、内奸、工贼”，1969年11月惨死在开封。国家失去了国家元首，可以代行职务的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也被诬蔑为“军阀”，此刻正疏散在广东。外国元首来访，只能由总理周恩来出面，这毕竟名不正，言不顺，非长久之计。

毛泽东的考虑也是合情的。早在1959年，他便辞去了国家主席的职务。他厌烦那些接受国书、接见大使的繁琐礼仪事务，宁愿在书房中，恬静地翻阅古籍，思索深层次的大计方针。但是，自1962年以后与接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的某些意见分歧，使他错误地得出了“大权旁落”的判断，终于毅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那么，现在再设国家主席，由谁来当？显然，只有第二号人物林彪。这也是他不愿意的。他总感到，在林彪狂热的个人崇拜语言后面，隐藏着一些令人难以琢磨的意味。所以，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的地位如日中天，炙手可热之时，有过几次不同凡响的表示。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致江青的信中，表示了对林彪大讲政变的不安。

1967年7月，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中说：如果林彪的身体不行的话，还是要邓小平出来。

1969年中共“九大”之后，毛泽东当着林彪的面说道，你年纪大了以后，谁来接班？并提到了张春桥的名字。立即引起了刚定为接班人的林彪满腹狐疑。

因此，在是否设立国家主席职务的问题上，毛泽东的考虑是长久的，选择是唯一的。

3月7日，毛泽东召来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对他明确地说：“宪法中不要设国家主席这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要他第二天立即回北京传达。汪东兴乘坐飞机在首都机场降落后，即驱车前往中南海，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点了一下头，毫不犹豫地说：“明天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由你向政治局传达”。

3月9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除林彪未来以外，到会的成员都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会后，周恩来指定叶群把毛泽东的意见和会议讨论的情况报告给林彪。

事情本来到此可以划上一个句号。虽然不设国家主席并非一个圆满的处理，但也别无良策。谁知，一个星期之后，风云突变。

3月17日，中央宪法修改小组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到是否设国家主席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康生、张春桥主张不设，吴法宪、李作鹏主张要设，由毛泽东来当。分歧还反映在宪法中是否写进“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这句话。此言是林彪发明的，写进了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林彪等人一直视此为一大功绩，是“高举”、“紧跟”的“专利”。而康生、张春桥在起草中共“九大”报告时，就知道了毛泽东讨厌这句话、严令删去的内情，所以主张在宪法中不写。但他们故意不说是毛泽东的意见，只一味坚持不要写，却暗中窃喜吴法宪等人越来越陷进圈套。不明就里的吴法宪则拼命抓住康生、张春桥的反对态度，以为既抓住了笔杆子们的一条罪状，又可以维护林彪的地位。

自中共“九大”以后即开始争权夺利的两个集团展开了各怀鬼胎的争斗。

周恩来不露声色地审视着一切。他拿起了红色电话机，拨通武汉东湖，向汪东兴说明了怀仁堂的唇枪舌战，同时又送去了一封信。汪东兴把信呈交毛泽东时，转述了周恩来的电话内容。听说，毛泽东脸上立即显出不快的神色，再次对汪东兴说：“不设国家主席的话，我早就说过了，还派你回京传达。宪法上不要写了，我也不当国家主席。”

缓缓的话语中蕴含着坚决的态度。

然而，林彪竟不为所动。

4月11日晚，林彪在终日不出的密室中踱来踱去，突然叫来秘书，口授了一个电话的意见：

一、关于这次人大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

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毛泽东考虑缓和中美关系

叶群亲自打电话将这个意见告诉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听后笑了。他无调侃地说：“设国家主席谁当主席呢？反正我不能再当了，那么就让董老（董必武）当吧！”收敛笑容后，毛泽东又提笔在中央政治局转来的林彪意见上斩钉截铁地批了一句话：“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毛泽东的态度不容置疑，林彪也并不退让。于是，此后，演出了一场人所共知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风云。但是，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前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还明显地表现在对外方针上，这一点则不曾为人们和后来的研究者注目。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著名声明，即《五·二声明》。这个声明是乔冠华起草的，经毛泽东修改。其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等《孟子》名言的引用，使之增色不少。但毛泽东内心并不以为这个声明特别重要。他脑海深处，正在考虑做一篇缓和中美关系的大文章。

按照中央的安排，5月21日，毛泽东、林彪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于上午9点，来到人民大会堂118室，这是毛泽东接见外宾的主要场所，又称湖南厅。他们会见了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参加会见的还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及宾努首相。

笑容可掬的西哈努克一见面就赶上几步，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倾诉着感谢的话语。此刻，这个落难的王公感受到真正朋友的情谊。

3月19日，西哈努克一行从莫斯科抵达北京，这次国事访问却成了苏联卑劣的出卖。在西哈努克访问苏联期间，柬埔寨发生了政变，朗诺上台。苏联却严密封锁消息，不让亲王一行知道，又若无其事地照常接待他。礼送他出国的那天，才在飞机上告诉柬埔寨国内政变的消息，然后撒手而去。目瞪口呆的亲王顷刻无家可归。这时，中国政府伸出了援救之手，决定照常接待西哈努克亲王。他到达北京机场后，周恩来立即对他说：“我们已发表了亲王作为柬埔寨国家元首抵京的消息。”“只要亲王有决心斗争到底，我们一定支持你。”热泪盈眶的西哈努克于3月23日在北京发起成立了柬埔寨爱国统一战线。

见到毛泽东，西哈努克激动是自然的，而林彪那天的表现则有些反常。

早晨5点多钟，林彪就把秘书叫来。他坐在沙发上，慢吞吞地说：“今天我我要参加天安门大会去。你们给我点点话题，我听听。”所谓话题，就是

有关的国际形势，因为这是发布《五·二 声明》的大会。秘书从柬埔寨起头，又讲到越南、老挝人民的斗争，阿拉伯人民同以色列的斗争，苏联、美国的动向等等。忽然，秘书发现林彪头仰在沙发上，两眼紧闭，嘴巴微张地睡着了。秘书只好悄悄地退出来。

为了应付上午的大会，叶群立即布置给林彪打了一针兴奋剂，引起了林彪的亢进和反常。

林彪对着西哈努克，语无伦次地说着：“全力支持你们的斗争，打倒美帝国主义。……地球是一个大火球。有毛主席的领导，毛主席站得最高，不仅考虑中国，而且还考虑全世界。”毛泽东不冷不热地瞥了林彪一眼，对西哈努克笑着说：“他是讲打的。”林彪一反谦恭不语的常态，急急地争辩似的抢着说：“讲道理讲不清楚，就只有打。”

也许觉察到自己的抢白失态，林彪又赶紧唱起了高调：“全世界人民动员起来，毛泽东思想普及全世界。毛主席将活得很长，毛主席将来会看到打垮美帝国主义、打垮苏联修正主义……”听到这里，毛泽东不耐烦地把手一摆，说：“好了，就吹到这里，开会去。”

林彪反对中美关系缓和

大家一起驱车来到了天安门城楼。广场上红旗似海，万头攒动，汇集着几十万人，将举行首都人民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林彪要在会上宣读《五·二 声明》。西哈努克情绪激动地在城楼上用中国话喊了十几次“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则报以“柬埔寨万岁！西哈努克亲王万岁”。西哈努克双手合拢，向毛泽东频频点头说：“我们有中国做我们的可靠后方，一定会战胜！”毛泽东却笑着回答：“没有中国，你们也行。”他掰开手指历数说：“华盛顿当时反对英国，他只有 300 万人口，战胜了英国，法国大革命时很困难，整个欧洲国家包围法国；列宁在十月革命时，只有 8 万党员……他们都胜利了嘛！”

表现失常的还是林彪。

对着麦克风，他用湖北腔大声说道：“我要发表讲话！……我讲讲关于越南……两个越南……半个越南……”显然，他离开了讲话稿，正在百万人大会上胡言乱语。好一阵子，林彪才开始宣读《声明》。

人们都为林彪的讲话表现吃惊，却没有注意到在谈话中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他是讲打的”及林彪辩白态度的份量。西哈努克更没有弄清这反映了中国头号人物和二号人物的什么不同。何谓“讲道理讲不清楚，就只有打”？

分歧要从 1969 年冬季讲起。苏联日益嚣张的核战争威胁，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使毛泽东迫切地感受到必须改变这种中国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两害取其轻，他考虑采取战国时代秦国远交近攻的战略。就在这时，美国总统尼克松作出了向中国表示缓和的一些姿态。他指派美国驻华沙的大使斯托

塞尔与中国临时代办雷阳进行接触。中国政府立即作出积极反应，双方决定恢复中断了两年多的中、美大使级会谈。1970年3月，由于美国入侵柬埔寨，中、美大使级会谈又暂告停止。但大门的门缝并未关死，双方都在试探、寻找更合适的方式。毛泽东、尼克松这两个东、西半球的顶尖人物，思路的电波已经开始串通。

林彪反对中、美缓和。当然，他没有直接这样做，而是通过他的支持另一种倾向予以表示。

中、美关系能否缓和，一个关键在于越南问题能否解决。尼克松担任总统之后，采用各种战争手段都无法在越南取胜，开始试图从这个没膝的泥潭中拔出脚来。他需要一个契机。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他意识到，通过谈判可以给美国一个台阶下，促使美军早日撤出越南。那么，剩下的南越政权便远不是越南北方的对手。胜利可以提前到来。因此，他为越南领导人提的建议是：多采取一些主力军作战，消灭美军的有生力量，在尼克松的背上击一猛掌，推动他痛下撤军的决心。

他在一次会见越南领导人范文同、武元甲时建议，要在越南最南方金瓯半岛地区发展一些主力军，“从打小胜仗到打较大的胜仗，再到打大的胜仗”。他说：“单是打仗不搞政治活动，我看也不行。”

林彪则不同。写过《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他，在与越南领导人几次会谈中，设计了一个战略方针，简言之，就是一个字——“熬”。用游击战和美国人拖下去，既不进行正面主力作战，也不谈判，10、20年地拖下去。

发展了游击战理论的毛泽东，深知游击战并不是解决战争的手段，只是促使敌我力量发生转变的过渡。“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对越南领导人批判林彪说：“我们过去党内意见也不统一。一派（指林彪）就是劝你们把美国抓住不放，一个字，叫作‘熬’，就是只能打游击战，不要打大仗。而我是劝你们要集中兵力打大仗。你不打败敌人，不打痛他，他是不那么舒服的呀！不是这样，你们谈判桌上得不了这样的结果。”

林彪为什么主张“熬”？因为，主要由军人组成的林彪集团在不胜不和的持续战争状态中，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林彪与毛泽东最后一次见面

1972年7月，毛泽东会见法国外长舒曼时又说到林彪：“谁也没有赶他，谁也没有料到他会跑，坐一架飞机就上天了。他反对我们跟美国接近，跟你们西方接近。”

“九·一三事件”之前，毛泽东最后一次和林彪见面，是在1971年6月3日。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率领代表团访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等在人民大会堂118室与他们举行了会谈。林彪未穿军装，神色呆滞，一言不发。几个月来，他一直顽固地拒绝检查庐山会议上的错误，

放过了毛泽东给他的一次又一次机会。

毛泽东和齐奥塞斯库谈到中国的教育时，慢慢地说：“有些人口里说是听话的，但心里是埋怨的。这就要时间，慢慢来。”他瞟了林彪一眼。林彪仍是一言不发，毫无反应。

毛泽东提高了声调：“赫鲁晓夫叫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我说，把赫鲁晓夫请到北京大学讲学，讲他那‘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柯西金不干，他说不好啊！”

除了外宾，在座的人谁都知道，“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马列主义，是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发明”语言。毛泽东这时把它与赫鲁晓夫联系起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林彪面色苍白，呆坐在那里。

未等接见结束，林彪就离开了118室。他独自一人坐到门外大厅西北角的一张椅子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警卫员都在远处莫名其妙地愣愣望着林彪。他萎缩成一团，帽檐压得低低的，脸上无一丝血色，仿佛一尊蜡人。

118室里，毛泽东身边的座位空着。毛泽东泰然处之，依然谈笑风生。直到会见结束，毛泽东和罗马尼亚贵宾离开了118室，林彪仍然独自一人坐在门外大厅里。

他在想什么？永远是一个谜。

此后不久，林彪去了北戴河。毛泽东开始了他震惊世界的南巡。

秋风再起的时节，林彪在外邦大漠身首异处，毛泽东也生了一场大病。

第三节 “密使”再晤维也纳

尼克松对中美关系的探索

1969年初，尼克松以总统身份所进行的第一次国外旅行，便开始试探和中国改善关系的问题。他在巴黎与戴高乐总统会谈时，戴高乐告诉他：“对你们来说，与其在中国强大起来后而不得不承认它，还不如早点承认。”他认为戴高乐的话是对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能干的7亿人口的巨大潜力无疑将使中国成为经济巨人和军事巨人。他请求戴高乐通过法国驻华大使把一个口信转达给中国人，说他将结束美国卷入越南事务的状态。1969年4月新任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把尼克松的口信带到了北京。

接着，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改善关系的行动。7月2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将从7月23日起放宽对美国到中国旅行的限制，允许议员、记者、教员、学者、科学家和医生、红十字会代表到中国旅行，还允许在国外工作的美国人可以购买一百美元的中国货物。7月23日，尼克松在白宫的草坪对一批学生说：我盼望这一时刻的到来，那里中国人民和俄国人民及全世界的所有人民都能走在一起，一起谈话。

在中苏核大战危机期间，由于中国坚决反击的决心和充分的战争准备，也因为美国的强大压力，苏联终于放弃了进行核战争的愚蠢想法。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不仅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胆略，捍卫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尊严，而且也使美国总统尼克松看到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大国地位，坚定了他打开中美交往关系大门的决心。

11月初，尼克松命令美国海军停止在台湾海峡的巡逻。12月12日，中国驻波兰代办雷阳邀请美国大使斯托塞尔在中国使馆会谈了一小时，这是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两年后双方代表的首次接触，这使美国人感到欢欣鼓舞。同时，美国政府宣布，从12月23日起，允许美国拥有的公司的外国子公司向中国出售非战略的物资。

1970年1月20日和2月20日，举行了两次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与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在华沙中国大使馆内和美国驻波兰大使馆举行了会谈，这使自1968年1月8日第134次会谈以来中断了两年多的中美会谈宣告恢复。在2月20日举行的第135次会谈中，斯托塞尔向中国建议，由美国政府派出一位高级代表到北京进行更深入的会谈。他遵照指示告诉雷阳：“美国在台湾有限的军事力量对贵国政府的安全并不构成威胁，我们希望，随着亚洲日益走向和平和稳定，我们将能够减少我们目前在台湾的军事设施。”雷阳在宣读的声明中，则建议双方继续在华沙举行大使级会谈，或通过双方都能接受的渠道举行更高一级的会谈。中国政府将乐于接受美国总统派出特使深入研究根本性的原则问题。

4月7日，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制公报中根据国外资产管制条例，规定国外子公司和外国公司同中国的贸易中，允许装有美国制造的非战略物资的部件输往中国。

布拉萨大酒店前的枪声

1970年4月24日中午，蒋经国从纽约的皮耶饭店前往布拉萨大酒店，参加远东美国协会为他举行的午宴。这里的气氛很煞风景，有几十个台独联盟分子，手持要求台湾独立的标语向蒋经国示威。12时10分，蒋经国在严密的护送下到来。当他下车走近酒店的正门时，突然从正门两侧闪出两个刺客，其中一个迅速冲过警卫，在蒋经国身后掏出手枪就要射击，此时的蒋经国随着扇形转动门进入门内，正处在有效射程内。就在刺客将勾动扳机的一刹那，美方一名警卫抓住了刺客手腕向上一举，只听“砰”的一声枪响；同时，两名台方警卫挺身相挡，推了蒋经国一把，子弹从蒋经国身边上方飞过，射入墙壁。开枪的刺客挣扎着要冲进去打第二枪，被警卫关在转动门里就擒。另一名刺客也被制服。

经美国警方审讯，刺客叫黄文雄和郑自才，都是台湾青年，系台独联盟的狂热分子。

布拉萨大酒店门前一声枪响，令美国朝野震惊。当夜零时30分，消息传到台北，84岁的蒋介石闻讯惊喜交集。蒋经国遇刺无恙，却留下种种谜团。这次从4月20日至24日的访问，是蒋经国第五次访美，是在当上了“行政院副院长”后的第一次访美。美国在接待礼仪上有过度不寻常的表现，以接待国家元首礼仪，包括动用三军仪仗、十九响礼炮，接待了一位“副首相”。蒋经国此次访美目的之一，是急于想知道美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举行的华沙双边会谈，打算做何种让步。但是尼克松、基辛格和蒋经国会晤，除了惯常的外交辞令，没有透露一点信息。对蒋经国的其它要求，如更新军事装备等，也没有做出实质性的承诺。给予那么高规格的接待，但却不给任何实惠，这对于台湾来说，当时不能不说是一个“未来关系的谜团。”

但令人费解的却是安全的“漏洞”。蒋经国此次访美安全措施，那是非常严密的。在公众场合都是内、中、外三围警卫。以蒋经国为中心的10米半径内为内围，除美国的礼宾人员外，全是台方贴身警卫；10米到20米内为中围，由美方便衣和穿警服警卫混合编组负责；20米到50米外，由美方警局武装人员负责。就是这样的三层警卫，竟使二个刺客混进外围，突进中围，接近内围，在距蒋经国10米多的地方开枪射击。这确实叫台湾警方对赫赫有名的美国警方迷惑不解，不能不说是一个“安全谜团。”

另外还有一个“马康卫谜团”。马康卫当时是美国驻台湾大使，他对蒋经国访美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卖劲。在蒋经国访美动身前，他先行返美去做“妥善安排”，结果却是蒋经国险些殒命。如果与马康卫的过去联系起来，那就更令人深思。马康卫在担任美国驻南朝鲜大使任内，发生了军事政变，90岁高龄的总统李承晚被赶下台，在马康卫“道义”的“保护下脱险”，被秘密

送往美国夏威夷，老死在那里。以后马康卫继任驻越南大使，又发生了军事政变，总统吴庭艳在马康卫“道义”的“通知”下，乘座车逃亡，在离开总统府的半途被叛军乱枪射杀。总之，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马康卫到哪里哪里就有灾星出现？马康卫为蒋经国访美的“妥善安排”与遇刺有没有什么联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马康卫谜团”。

以上种种谜团，随着时光的流逝，有的已经解开。“未来关系的谜团”，以尼克松 1972 年 2 月的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说明，尼克松此次邀请台湾政权核心人物之一的蒋经国访美，是向台湾“道别的一种方式”。“安全谜团”也已理出了头绪，擒凶的美方警卫与行刺阴谋无关，那名及时抓住刺客手腕而使蒋经国无恙的美方警卫，确是尽职尽责，为此蒋经国将自己当时所戴贵重手表相赠，以谢救命之恩。当然台方有功警卫也更亏待不了，在关键时刻挺身救驾的钟湖滨、温哈熊由于一挡一推，表现了特有的“忠诚”，分别被拔擢为中视公司总经理和联勤总司令。至于两个刺客的行刺目的，则是为制造台湾独立服务，行刺是台独政治运动的一项行动。关于“马康卫谜团”至今乃是不解之谜，也许谜底在美联邦调查局的绝密档案里。

当天蒋经国遇刺无恙，照样按原计划进入布拉萨大酒店赴宴。宴会未终，美国捷足记者追踪而至，请他发表“遇刺感想”。美国记者之如此突发新闻采访，令贵宾大为折服。蒋经国说：“这些怀有异见的人，他们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向我陈述，我一定接见。至于这两个被逮捕的无知青年，我希望美国把他们释放。”美国果然成就蒋经国的仁爱之心，释放了刺客，理由是未伤及刺客所要刺之人。

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罗杰斯在闻讯后，都当面向他们请来的贵宾表达了“美国式的歉意”。不过还说因为美国是一个“完全民主开放的国家”，诸如此类事情的发生，绝非特例，譬如肯尼迪总统也一样遇刺啊，而且被刺殒命哩！因此希望勿因“意外事件”而介意，更希望不影响双方长久深厚的感情。蒋经国则答：“昨天事情发生之当时，我并未受惊，事后我第一个关心的事则为有没有人因我的来访，而被这一‘意外事件’受到误伤，在知道没有人受到误伤之后，我就如释重负了。一天之后，如不是总统先生和国务卿先生提起，我几乎都已忘了这一‘意外事件’了。”

路易斯为失约道歉

1970 年 3 月，路易斯给魏景蒙寄来了复活节卡片。8 月 22 日自哥本哈根来电，称会停留至下周中，9 月 15 日至 9 月底会在大阪，希望在博览会上与魏晤面，或可过境台北或马来西亚时，在机场晤面。路称，可随时以他住家为联络点。口气非常认真。

8 月 27 日，魏景蒙自日月潭回台北后，即电路易斯。次日，魏在家中接到路 8 月 6 日自缅甸寄来的信函，希望见面，大约 8 月 20 日在哥本哈根，抵

达后即电魏，最好致电其家说明行程。夜间，魏打电话至哥本哈根，路易斯已离丹麦。9月3日，“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召见魏景蒙，嘱复函路易斯。其内容大意如此：

8月6日来信收到，昨日电话才知“你已走了”。如有此需要，10月底11月初可在罗马见面。

9月12日，罗启持函飞罗马，魏交待：9月17日寄第一封信，18日寄第二封信。

9月15日，“大使馆”来电：“路易斯赴塞浦路斯，希望来台被拒绝。”

9月25日下午5时30分，路易斯自塞浦路斯来电话：“9月29日在曼谷过境，希望来台过境。”

魏答：“不必来台，速电家中读我罗马函。”

路易斯：“何时可见面？”

答：“如有必要，10月底11月初。”10月1日，上午9时45分，路易斯从瑞士苏黎世来电话，称：“信已收到，10月底可能在德黑兰。”

魏：“不能在德黑兰见面。”

路：“能早见否？”

答：“不能。”

路：“最早何时何地。”

答：“11月1日在罗马伊登旅馆，已订房。”

10月17日，蒋经国告诉魏景蒙：“如果谈到他的家务事，要断然拒绝。外蒙古和边界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你可问之‘你们何时及如何帮我们的忙？’告诉罗启，把会面地点改到维也纳，仍在同一天、同一家旅馆。”

魏景蒙通知欧洲的罗启，赶紧打电话给路易斯太太，通知改地点。如果路易斯10月31日不在维也纳，就从维也纳打电话至罗马，并发电报。

10月28日12时30分，路易斯从南斯拉夫来电，称他同意改地点，并会在10月30日住进劳顿旅馆(LandonHotel)大约待到11月1日。并说他有点犹豫，因为须获维也纳签证，他建议在南斯拉夫见面，魏以同样理由回绝。

10月29日上午9时5分，罗启来电。魏告诉他：“已和路易斯接触，在维也纳乡村旅馆见面，时间在10月30日至11月1日之间。”

1970年10月30日，路易斯住进了亚士都旅馆309号房。

下午2时，路易斯来劳顿，在离旅馆5公里的马路与魏会面。他先为去年10月失约，未在罗马晤面道歉，因为莫斯科的鸽派觉得，如果晤面，会破坏北京会谈，将是很困窘的事，鸽派的代表为柯西金。

鹰派需要“弹药”

在这次谈话中，路易斯一再抱怨电话太难接通，导致多次未能和魏联络上。路问：“有无可靠的中间人在维也纳或新加坡，或吉隆坡。能否给我台北的过境签证，以便急需时用。”魏略加思考反问：“此次要求见面的理由安在？”

路答：“明年3月（已延开二次）将召开苏共代表大会，会充分讨论权力问题，这是‘鹰派’表明他们观点的重要时刻。在台北时，蒋经国曾告诉我，毛死后莫斯科和北京的关系可能更恶化，我在多个场合转达了此一观点，效果甚佳。但如今‘鸽派’认为，柯西金已与周恩来晤面，并建立了会谈管道，且双方并无战事，情况已经很好了。‘鹰派’说，‘你不能保证将来没有战争，而且只会给毛泽东更多的时间来准备战争。’如果台湾可以提供情报，证明毛泽东在积极准备发动更大的战争（对抗莫斯科），我就可以充分利用。”

“除了提供匪情外，台湾应再有一份假设的声明，告诉莫斯科台湾希望他们做什么以便消灭毛泽东。”

魏问：“苏联愿意做到什么程度，以及莫斯科能做些什么？”

路说：“上回在维也纳，苏联已经很确定的承诺，如果国共交战，苏联不会帮中共。这一次，更进一步的说，苏联愿和中华民国合作来消灭毛。”

他们约谈了30分钟，因来往的人愈来愈多，便决定离开，到美丽的乡间去转一圈，并且继续会谈。

路易斯在匈牙利租了一辆车，和太太一道开到维也纳来。两人上车后，路问魏：“你们有什么‘弹药’可以给鹰派，好让他们在大会里能提出可信的证据。”

魏说：“这件事一定要在高层会谈中讨论。”

路不同意，说：“认为高层之间要先有桥，我们就是桥。德国与苏联谈判即像我们这样谈成的。”

魏说：“若干至关紧要的事，只能在高阶层说，例如官方承认或者共同发展西北或东北。”路说：“这些事不应在现阶段列入谈判，因为它们还太遥远了。目前我方的兴趣是双方应如何在政治上及军事上进行合作，以消灭毛泽东。因为苏联已开始意识到，和毛泽东已毫无希望复合，而且毛之后也不会有亲苏派，因此毛帮非消灭不可。”

魏问：“双方如果合作，莫斯科能做些什么事。”

答：“莫斯科当然不会派遣大批军队到大陆和毛作战，不过，苏联可以配合台湾的行动，在你们发动反攻时，先以飞弹摧毁中共的海防基地。很明显的，美国不会帮你们打反攻之战，苏联是唯一‘有兴趣’的强权。美国已与北京会谈，台湾日益丧失外交承认，加拿大和一些欧洲国家也不会站在你们这一边，如果你们不能在未来两三年之内反攻，就可能再也没机会消灭毛。”

为了说服“鸽派”

魏回答：“国不在大小，兵不在多寡之论，我们有领袖、有主义，我们有信心，我们不怕，我们会成功。我在和美国人接触中了解，如果中共和苏联发生战争，美国一定是帮助中共的。”

路：“克里姆林宫正在积极准备3月的大会，我希望有材料（不需书面），口头即可，愈快愈好，最好在11月15日至20日之间。此外，中共的和平攻势日益加强，苏联很不高兴，但又不好公开说。”

魏说：“我们要消灭毛泽东，目的在解除人民的苦难；防止核子战争爆发，以免上亿无辜中国人丧生，我们反对在中国或任何地方进行核子战争，因此，必须阻止老毛使用核子武器。毛曾说，如果核战导致3亿中国人死亡，中国还有4亿人活着，他一点也不在乎。我们也知道，苏联之所以对我们的反攻有兴趣，是为了它自己的理由，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政策和原则，即使初始成功，日后必有无穷麻烦。如一旦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起冲突，苏联怎么回应？这个问题在‘鸽派’、‘鹰派’来看，答案是一致的——就是置身事外。”

路说：“克里姆林宫的领袖知道，国民党和蒋介石要比毛泽东的共产党好，因此，如果我们能说服他们，毛的接班人不可能对苏联友好，那么鸽派就不会再对他们抱希望……关于中华民国和苏联在军事或政治上合作的事，并不一定要进入细节，它可以是很简单的——理论上的，或者是假设性的。”

由于台湾没法提供一个在路易斯活动范围内的联络地点，路易斯只好把他岳母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给魏，叫魏把他们下次会面的地点告诉她。

路说：“我会在欧洲游历一阵子，大约到11月下旬，等你的电话。北京会谈很快就会在莫斯科召开，为什么？为了面子。莫斯科新任驻北京大使是个畜牲，所以莫斯科派他赴任。”

路给魏看一份哥本哈根的剪报——“陶普斯号”船员事件（苏联油船船员，在台湾海域被捕）。路说：或许这是他来台北的一个好借口，他要魏替他想办法。他给魏几封信和照片，好让他交给“陶普斯号”船员。

他们谈完后，魏看手表，正好下午6点。

分手时，路约定魏在他的亚士都旅馆309房见面，和他们夫妇共进午餐。席上路说：“克里姆林宫知道苏联的粮食问题很大，最简易的解决之道，是给人民工作，但这不行，因为如果克里姆林宫，这样做，共产主义的根基就没了。”

10月30日，魏景蒙在日记上写了关于“鸽派”和“鹰派”：“柯西金代表鸽派，布里兹涅夫代表鹰派，后者会胜。柯西金那一帮有长期和老毛打交道的经验，但布和国民党并没有很多经历。”10月31日，亚士都旅馆309

房。

这是栋老旧的英国旅馆，魏到那去见路易斯，他太太珍妮佛是个很英国化的精明女子，有3个孩子，都是男的，她还想生个女儿。

他们给魏景蒙看小孩的照片，他们的大房子，还有一间加盖的，充作书房或书室。

他们到餐厅午餐，决定餐后开车到乡下兜风以便谈话。

最后一次谈话

大约两点半吃完，他们沿着17号公路驶往维也纳森林。下午6点时许返回维也纳，第二天，路易斯离此前往苏黎世和罗马。

这段兜风是要做最后一次谈话，看看还有那颗石头没被翻开。

魏先打开话题，这是他昨晚在旅馆就想好的。魏说：“我们昨天谈的两点，由于时间不够，可能很难做到。不过第一点我们比较容易做到，因为北京利用和谈暗中积极准备攻打苏联的策略，是众所周知之事。他们‘赤化亚洲’的计划已定，正积极推动。苏联希望我们提供一些情报——不论是已发表的或未发表的，都欢迎。毛打算动用核子武器，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我们如果加以宣扬，对他和对目标都有帮助。

“第二点，关于莫斯科合作支持我们反攻大陆的计划。这一点台北很难准备，这需要召开高层幕僚会议。做这种计划，非我智慧所及。”

路易斯进一步建议，“台湾可说出需要那些装备，要多少，以及需要何种政治支援。（若有必要可分阶段。”他拟了一个草案，“比方说，台湾可提出，希望在展开登陆前，苏联先以飞弹摧毁台海对岸的海防武器。

“又譬如，台湾可以要求苏联提供轰炸机去摧毁罗布泊等等。让台飞行员使用西伯利亚或其他地方的空军基地。”

他解释，“老美不会帮你们反攻大陆，只想要台湾和老毛保持和平，而苏联却会帮你们光复大陆。这两件事并不冲突，你们可以以概略的方式说。”

魏说：“我们原则同意你们的军事行动。”

路说：“你们能做的，以及你们希望苏联做什么，何时希望苏联协同你们的行动。一旦这些构想被认为可行，我们会‘立刻’与贵方军事将领展开数次会谈。这样做对台湾毫无所失，因为，台湾早已誓言要反攻大陆，而苏联可以帮助。简言之，我们要利用第一点来说服克里姆林宫领袖，和毛泽东是不可能和平的，中国大陆不会有人对苏联友好。如果这一点获认可，下一步就是要消灭毛泽东。

“这里是我们提出的一个草案，上面列出苏联可以如何合作以共襄盛举。一旦同意了，军事和政治领袖会共同磋商如何采取行动。”

魏说：“容我坦白讲，假使我们成功登陆了，而‘鸽派’却扯后腿，危及我们的计划，怎么办？”

路说：“第一步只是试探动作，这个问题可日后再谈。在社会主义世界，是容不下两个领导人的，一旦两人有冲突，其中之一必不择手段干掉另一个。在这种时候，宁可和非社会主义国家合作，也不能容许内部存在一个背叛的社会主义领导人。台北和莫斯科之间太难联系，随时都可能发生紧急状况，但像现在却要花上一星期或 10 天才能联络上，实在荒谬。有些国家根本就和台北没有电话联系，有些国家的电话则遭窃听，台湾应该给我方几个人名，好让苏方能安全传递信息。希望在维也纳、罗马、吉隆坡、新加坡或斐济、蒲隆地都能有一个人。”

魏问：“柏林如何？”

路摇头说：“那个间谍窝一点也不好。”

魏给他朱新民的电话，告诉他：“这只是作为紧急联络管道之用，我会在 10 月 31 日晚上告诉了朱。”

第四节 台湾当局酝酿对策

驻苏“贸易商”来电

1970年11月6日，魏景蒙一回到台北，就收到台湾派往苏联的“贸易商”朱新民的电报：

Party concerned asks your cable stating remittance date sincerely necessary. Journey for establishments registration before Nov12

晚11时30分向蒋经国报告会晤经过。当谈到苏联“陶普斯”号船员之事时，蒋说：“这或许是个好主意。这批船员是1954年7月23日为我海军截获的，共42名。其中大部分已于1955、1957和1958年分三批释放，下次释放“陶普斯号”船员之前，先通知路易斯释放的时间和将去的地点，再通知美国记者。中共释放了美国犯人，我们何不也放人。”

同时，罗启在机场也转来朱新民的电报，内容同上。

11月7日上午8时，魏景蒙陪同蒋经国赴士林官邸，向蒋介石报告，约45分钟。报告内容：

此次在维也纳与路易斯见面，前后两次共8个小时。察其态度堪称积极，惟有时表示作双方之掮客口吻。此次约谈重点为了苏联将于明年3月间召开全代会，对将来共匪之政策有所决定，故要求我方及早（勿迟于11月20日）将两项资料口头上告路易斯，以便运用。

1. 毛匪之生前与死后，大陆情形决无任何希望与苏联友好。相反的，毛匪正利用北平和谈，暗中积极准备大举进攻苏联。（匪美谈判应为此举）。

2. 根据以上事实判断，苏联只有倒毛一条路可走。因此，与我合同，可期成功。况美国之态度是不支持台湾反攻，但选择我政府与毛匪间，美国当愿我政府回主中国。苏联之态度是如果决定倒毛，最合理的途径是与台湾合作，国民党回大陆一定比毛匪好。因此必须要了解台湾是否确实有意合作。如有诚意，则需要苏联何种军事援助，及何种配合军事的行动以期成功。

路易斯以为上次接触已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若我与匪有军事行动时，苏联认为是中国国内问题，不予参与。

此次会谈是进一步谈苏联参加合同倒毛行动上问题。谨将两次谈话内容记录谨陈察看。

魏景蒙记录如下：

10月24日飞德国京城（英国签证未得到）。26——27日在波昂召英、

比、德三处负责人谈话，指示今后国际形势动荡中之中心工作。

10月27日——11月2日在维也纳。

10月28日，电莫斯科，请路易斯改在维也纳同时在旧饭店见面。罗马空气不好，路易斯复电话，10月30日见面。

10月30日晨，路来电约下午两时在旅社外马路上见面，路易斯开车，并在郊外小吃店边吃边谈。然后在郊外驰车谈话。前后共4小时。

10月31日，又在路之旅馆中与其英国妻子3人共进午餐，然后再驰车郊外，又有4个小时之久，前后共8个小时。（并非皆在谈此事）。

所谈内容略之如下：

1. 道歉去年爽约之事，实北京谈判问题。

2. 过去接触得到了一个具体结果：苏不干涉国共内乱。现在是进一步而为合作倒毛了。

3. 明年3月间莫斯科召开人代会，为重要政策之决定，一切政策问题在积极筹备之中。要求我们给他两点参考资料：a、毛共与苏联不共戴天，非打不能倒毛。无亲苏派……中共准备大举攻苏。b、因此之故，台苏之间应可合作倒毛工作。在此点上强调我愿合作倒毛；希望苏方之合作如下：

（譬如，D日登陆，苏方先以火箭摧毁海防武器。利用苏联基地消灭罗布泊及其他重要设施等等。并说明合作及配合的好，大约若干时间可消灭之。不必细数，可分几个时期。

蒋介石关心苏方诚意

蒋介石看完记录后问：“对方的态度，是否诚恳？”

魏答：“是。但有时候摆出做掮客的样子。”

蒋介石又转问蒋经国有关“陶普斯”与船员的事。

蒋经国回答：“美国曾提到此事，并说是受红十字会之请，他们不愿碰这件事，希望我们直接与红十字会打交道。

蒋介石又问：“我们有没有和朱新民通密码？”

魏：“是经过外交部。”

蒋介石：“要早一点做好决定。今晚完成书面报告。”

魏于当晚做好报告，8日上午9时到七海山庄呈交蒋经国。

11月9日，蒋经国指示：

1. 如果朋友要钱，告诉他没问题。10日发电朱新民，请他转告路易斯，汇款不久就到。

2. 13日由罗启从曼谷寄电报给伦敦路易斯的岳母，请她转告路易斯，电文为：

1970年11月13日

亲爱的史泰敦夫人：

请在您方便时，将下列讯息转达令郎路易斯，本人将不胜感激：

“公司已原则同意。

—俟我方研究细节后，即会做决定。”

TANALIN 敬启

由于路易斯要在欧洲停留到11月中旬以等待台方的回音，所以给了魏景蒙他岳母之外另一个在布鲁塞尔的紧急联络人地址和电话：

MR. EUGENESTANOGLOV

20, SOUAUDESSOLDOSCHBRUSELLES 电话：493473 在这个联络点，魏与路取得了联系，路告诉魏：“我的妻子珍妮佛将马上回莫斯科。“陶普斯号”船员的事，让老美介入使他们获释，是很愚蠢的，何不让我来做这件事的宣传工作，至于我该怎么做，悉听台湾的指示，这样做，可使我在苏联人眼中有面子，也可给我借口能够“公开”到台北去。另外，我受够了台湾大使馆不友好的方式，每当有急事想联络大使馆时，总是受到刁难。有关过境签证，希望能在11月10日到20日之间交给我。问候蒋经国和其他人好。”

11月16日，蒋经国告诉魏：“总统明天要见你。”17日，蒋介石再次召见魏景蒙，至于台湾究应透过打电话给路易斯的岳母，答复他“我们对两点都同意”，还是应由魏亲自再跑一趟，当面告诉路台湾对两点的答复，蒋介石也难以作决。

第五节 周恩来的一步好棋

一段优美的小插曲

1971年4月，在日本名古屋，这正是春雨绵绵、樱花怒放的时节，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也正在激烈地进行着。

在紧张比赛中，美国19岁的运动员格伦·科恩和我国著名选手庄则栋合奏出了一段优美的小插曲，这段乐曲将伴随着中美人民的友好不断流传下去。

格伦·科恩，这位美国洛杉矶圣莫尼卡学院19岁的大学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当时是一个“业余乒乓球和完全的嬉皮士”，一头长发，一条紫色的印花喇叭裤，当他带着满不在乎的神情准备乘车去比赛馆时，竟找不着自己乘坐的汽车了。

正在这时，一辆带有乒乓球锦标赛标志的大轿车开了过来，科恩一着急，连连招手。轿车在他身边停住，科恩扶了扶帽子，一步跳上车。

科恩长吁一口气，放下心来。抬头一看，他不禁暗暗吃惊，车上的全是中国人。中国青年们都不约而同地朝站在车门口的科恩礼貌的笑了笑，但是，谁也没有开口说话，车里静静的。

科恩一个人站在车门口，由于没有人同他搭话，科恩感到有点窘迫。

这时，在大轿车最后一排座位上，庄则栋站了起来。

庄则栋跨前几步，来到科恩身边，科恩认出了他，惊喜地叫道：“你是庄先生！”

庄则栋点点头，一边对科恩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来到我们车上，我们都很高兴，我代表同行的中国运动员欢迎你上车，为了表达这种感情，我送给你一件礼物吧……”

说着，庄则栋伸手到包里取礼物。

就是这时，他身后响起一迭声的轻轻呼唤：“小庄，小庄，别，别……”还有人在庄则栋衣服后摆拉了一把。

来名古屋之前，按事先约定，中国人是不宜于主动向美国人打招呼的，更不用说赠送礼物。当时中美关系还是处于一种公开的对立状态，这都是人们不得不考虑的。

庄则栋还是从包里取出了东西。那是一面一尺多长的杭州织锦，织锦上是一幅黄山风景图，奇峰奇树，烟云缭绕。庄则栋把它递给科恩，说：“这个送给你。”

科恩满心欢喜地接过来。他从迷上乒乓球的时候就知道中国的庄则栋了，庄则栋曾蝉联三届世界男子单打冠军。科恩忙着称谢，一边有些慌乱地自己的挎包里搜寻起来。

“天啊！”科恩大叫：“我什么也没带，连把梳子也没有。可是，我一

定要送你一件什么……”

轿车在比赛馆前停住了，庄则栋首先跳下去，接着是科恩。没想到迎面而来的竟是一群手举照像机的记者。“科恩上了中国人的车。”消息闪电般传开，记者们以惊人的速度蜂涌而至。

科恩的双眼被闪光灯照得睁不开了，他索性把那幅漂亮的织锦用双手高高举起，任人拍摄。在众多记者的要求下，科恩拉住了庄则栋，两人靠在一起摆姿势，让记者们拍照，然后握手道别。

科恩回到饭店，认真琢磨开了，应该给庄先生回赠一件什么礼物呢？科恩在名古屋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店前寻觅着，最后他看中了一件红白蓝三色的运动衣，运动衣上印着英文字样：“听其自然”，科恩立刻买了两件，一件留给自己，一件当作礼物。

第二天，科恩刚出现在赛场，电视台的摄像机立刻盯上了他，大群的记者跑过来，问他：

“你和中国的庄先生交上朋友了？”

这个提问却使科恩不知怎样回答才得体，他一扭头，巧的是庄则栋正出现在场的另一头，科恩急忙大叫起来。庄则栋和代表团的一位工作人员一同走来。科恩上前把他拉到电视摄像机前，事情的发生再一次快得不可思议，在短短十余秒里，体育馆内的记者持着照像机都迅速地跑来，把两位新闻人物团团围住。

“你好！”科恩热情地打着招呼。

庄则栋也友好地冲他笑了笑。

记者越来越多，包围圈越来越小，科恩费了好大劲儿才从挎包里取出准备当作礼物的运动衣。

科恩大声说：“我有一件礼物要送给你，庄先生。”他把运动衣递过去，庄则栋点点头，微笑着收下来。然后，科恩双手展开织锦高高举过头顶，庄则栋也以同样的姿势高高举起了运动衣。两个人站在一起，四周响起一片“咔嚓”的照像机快门启动声。

接着，紧紧地，四只手握在了一起。

日本记者还是围住科恩不放，其中一个紧紧追问：“科恩先生，你对中国人如何评价？”

“哦，中国人非常友好，我还和他们练过球。”科恩答道。“那么，你愿意去中国访问吗？”

“当然啦，我特别想去。”科恩的回答十分坦率、干脆。

毛泽东临时改变决定

1971年4月6日深夜。也可以说是4月7日凌晨了。中南海“游泳池”的书房里还亮着灯。毛泽东神色专注地看着今天下午，不，应该说是昨天下

午送来的“大参考”，上面登载着数则我国世界冠军跟美国乒乓球员、嬉皮士科恩交朋友的消息。

一个中国运动员与一个美国运动员的来往，竟然引起西方新闻界如此关注，纷纷花了大篇幅详加报道。连正在莫斯科召开的苏联共产党二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新闻都比不上这两个运动员交往的新闻引人注目……

毛泽东认真地思考着，目光不知不觉地移到了大写字台桌面上。柔和的台灯光下，那台已经用得光滑发亮的镇纸下压着一份请示报告。这是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打来的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

报告上，周恩来已经写了“拟同意”三个字，又在旁边用铅笔添上了一段话：“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阴谋活动。”

报告是4月3日打的。当时，在日本名古屋，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正在紧张进行着。

一天前，毛泽东已经在看完后的报告上圈批了意见。秘书就此对外交部与体委作了传达：主席已经同意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时，名古屋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已经接近了尾声，各个单项的决赛或半决赛正在进行。

4月6日下午4点半，住在藤久观光旅馆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已经接到了国内的指示：“……可以告诉美国队现在访华的时机还不成熟，相信今后会有机会。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活动。”指示还说，由于同样的原因，加拿大队领队沃尔登女士的美国籍女友不宜在此次来华。

接到了国内的明确指示，代表团负责人赵正洪和宋中作了商量，决定立即通知沃尔登和女友纽伯格女士。至于美国队访华的事，他们只是口头表达过愿望而从来没有正式提出过要求，也不必为此专门前去告知，等到在哪儿相遇时打一声招呼即可。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事已经作罢，划句号了。

可是，毛泽东还将这份报告留在他的写字台上，并没有让秘书拿走归档。这件事，还是他思维的焦点。

周恩来在午夜前来过。又谈起过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传来的信息。还谈起了美国国务院3月15日宣布取消对待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并说今后只要有正当目的，均可到中国访问。白宫新闻发言人在情况介绍会上提请大家注意这个决定，说：“我们希望对方会有互惠的行动，但我们不会因为无此行动而裹足不前。”联系到2月底尼克松在对外政策报告中表示“准备与北京对话”，称“美国准备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大家庭中起建设性的作用”，周恩来感到，种种迹象表明，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关头；周恩来并不认为不同意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是正确的。美国人想到中国来，已经是明摆着的事实，这在一年以前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不但是总统说想来，就是乒乓球队也想来，中国将作出

什么反应？

首先该让谁到中国，让尼克松总统？让那个犹太教授基辛格？还是让这伙已经到了门口的球员？

毛泽东面临决策。

周恩来还汇报了外交部和体委的头头讨论邀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分歧。多数同志认为，主席和斯诺讲过，欢迎尼克松到北京，有问题需要跟他解决；现在让美国乒乓球队打头阵未必有利。少数几位同志持相反意见，认为现在未必不是时候，要是邀请美国队访华，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势头。主席也说过，有时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中。周恩来说，打那个报告是老一套，是按老规矩办事，根本看不到当前情况的变化。当然，这是指外交部，体委不能怪它，它不懂外交。外交部应该掌握好这个大局。时机难逢，稍纵即逝。

毛泽东深思着，沉默了。周恩来告辞了。

毛泽东的目光又回到了“大参考”上，他的思绪在活跃着。20天前，周恩来亲笔写来报告，请示派我国乒乓球代表团赴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问题，鉴于西哈努克的柬埔寨王国政府向我提出不承认朗诺集团有权派球队去名古屋参加乒乓球比赛，提议驱逐他们，周恩来写报告提出我国乒乓球队在名古屋比赛的方针。

他批示了，照办。我队应去，要准备死几个人，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比赛快要结束了。看来，尽管有日本右翼反动势力进行捣乱，死人的事并没有发生。想不到却发生了美国乒乓球队表示想来华访问的事。他跟斯诺说过，寄希望于美国人民。

今天已经是4月7日了。这是31届锦标赛的最后一天，所有的冠军都在今天决出来，发奖，闭幕。想来中国访问的美国乒乓球队，已经到了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已经近在咫尺了。让美国乒乓球队打头阵有何不可？它将为尼克松或是他的特使来北京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这是打开中美关系的局面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他丝毫没有睡意，就像烽火岁月的时候沉浸在大战前夕的兴奋之中一样。4月的北京天已经亮得早了。屋外有呼呼的风声。天边已经渗出几抹宣纸一般的白色。他毅然作出决定，要秘书转告周恩来，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基辛格感到面对的是一个外交巨擘

中国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把美国惊呆了。把世界轰动了。成了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

4月7日，上午10点，美国乒乓球队的副领队拉福德·哈里森遇到中国代表团的负责人宋中。宋中向哈里森转达了正式邀请。惊喜的哈里森当即从

下榻的皇宫饭店往东京美国驻日使馆打电话，询问有关护照问题。美国驻日大使阿明·迈那不在，接电话的使馆官员威廉·坎宁听说后当场表示，建议哈里森接受邀请。因为大使馆已经接到通知，国务院已经宣布总统决定取消了对美国护照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坎宁根据自己的理解，美国政府希望和中国改善关系，当然可以建议美国球队接受中国方面的邀请。

坎宁打罢电话迅速找到了迈那大使汇报。迈耶觉得事关重大，应该告诉华盛顿，这样可以给华盛顿一个机会，对建议中的访华旅行可以给予鼓励或者加以阻止。大使馆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份加急电报。

此时，东京正午刚过，华盛顿已是午夜。接到电报的罗杰斯国务卿不敢怠慢，署上了意见当即送往白宫。意见写道：“虽然我们还无法断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邀请的用意起码有一部分是作为回答美国最近采取的主动行动的一种姿态。”

尼克松看了电报，喜出望外，马上批准美国乒乓球队接受邀请。中国人的主动行动以他意想不到的方式进行着。这个行动包含了什么样的信息？美国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尼克松连夜将内阁成员召来，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在开会的人员到来之前，尼克松嘱咐基辛格作一下准备，让基辛格在会上就对华新政策作一个概述。尼克松也没有忘记嘱咐，关于与中国在秘密渠道的信件来往及美国的作法不能透露，只能让必须知道的人知道。

基辛格读了电报，也受到震撼。他的感受更为深沉、复杂。他这个学富五车，以高傲自信著称的人，都不能不惊叹中国人行动的高明。如果说，从1969、1970年中美两国的外交小步舞使他觉得对手也懂外交的话，中国人今天这一着使他觉得对手不凡。他隐隐约约地感到他面对的是一个外交巨擘。他在这一场复杂的外交围棋赛中遇到了一个高手。那些庸俗肤浅之辈导演不出那样的外交杰作来。他不由地产生与之较量一番的兴奋。

等一会，他将奉总统之命阐述美国的对华新政策。要知道，两年多以前，也就是1969年底，他受聘来到白宫以前，并不是一个中国通。关于中国的知识，无论是基本知识还是对细微变化的鉴别能力，他都等于零。他连筷子都不会用。

他读过几本毛泽东的哲学和军事著作。在他1957年出版的成名作《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摘引过毛泽东的一些警句；但是，书中对“中苏战略思想”分析，还是套用了杜勒斯的冷战观点，把中苏当作“铁板一块”的。1964年10月，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把基辛格吓了一跳。他感到中国就要怒气冲冲地对全世界进行侵略了。而1966年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基辛格看来简直是无法无天，不可思议，8亿中国人简直是疯了。中苏分歧公开化以后，他开始同情苏联人，认为中国人更好斗，更富于侵略性。

后来基辛格不但改变观点，而且对新中国有他独到的认识。他向往着飞

往中国。——在乒乓球队访华之后，作为总统特使飞往中国。他顶感到这个日子在迫近。使他感到得意的是，他得到的消息中，中国的官员已经在向外国驻北京的使节打听他基辛格了。据说，他们对这位哈佛大学教授怀有敬意，他们看过他的书，他们放出风来：“愿意意见基辛格，同这位高手较量较量……”

内阁会议室里灯火通亮，该到会的成员都连夜赶来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就要开始。基辛格收拾好了文件，走进了会议室。

他刚刚慢条斯理、胸有成竹地坐下，放下文件夹子，尼克松已经从连接总统椭圆办公室的那个门走进来。总统的气色显得格外好。

周恩来赢得一束深红色的玫瑰

驻北京的绝大多数西方外交官都期望着能够见一见这个久负盛名、魅力迷人的总理。可是，他们来到北京好些年了，都还未能实现这个愿望。只有个别人因为特殊的背景而获得周恩来的接见，例如法国驻华大使艾蒂安·马纳克。4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的全体成员与随团记者。这真使驻京的西方外交官们羡慕死了。为此，连在京的加拿大、英国、哥伦比亚、尼日利亚4国乒乓球代表团成员也一块同时获得接见。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借用中国一句老成语，这叫“陪太子读书”。

这天下午2点半，周恩来面带微笑地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乒乓球代表团。随团采访的美联社驻东京记者罗德里克在周恩来来到美国代表团坐席跟前时，想了一个花招，以一种弯膝半蹲的姿势，有意识引起周恩来注意，罗德里克曾在40年代访问延安时，见过周恩来。

周恩来素以有惊人的记忆力著称，他马上认出了罗德里克，走过去首先跟罗德里克握手：“这不是罗德里克先生么？我们好久没见面了？”

两人紧紧地握手。56岁的罗德里克因为周恩来相隔多年了还认得出自己，十分感动，紧握着周恩来的手直摇。周恩来盯着他：“我记得你在1946年访问延安时，还是个青年。”

“我在富丽辉煌的大会堂见到总理，想起在延安窑洞里、在油灯下跟总理促膝夜谈，感慨万千。你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革命前进了。”

“你是历史的见证人哟。”

周恩来与美国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后，坐在斯廷霍文团长旁边的沙发上，作了讲话：“你们作为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尽管中国和美国目前还没有外交关系，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与支持。”

美国代表团的成员们热烈地鼓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确实是被当作前来打开中美友好关系之门的外交使节而得到特别接待与隆重欢迎的。

有关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所有具体安排，都在周恩来直接掌握之

中。其中比较重要的安排与做法，都由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有关美国代表团在华活动的消息发布，《人民日报》的版面安排，《参考消息》的报道篇幅，都由周恩来掌握。甚至连美国客人下榻的宾馆，用餐的方式，周恩来也亲自过问。

旅游、比赛、看戏，所有的日程也都是周恩来最后决定的。中国的国宝博物馆故宫，在“文化大革命”中关闭了几年。周恩来这次批示：“故宫可在14日开放参观。”重新开放的故宫，首先接待美国客人。周恩来十分关注比赛，再次提到：“我们都胜不好，要让他们赢一点，还要教他们。”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拟好的中美乒乓球友谊比赛的实况转播稿，周恩来也亲自过目，加以修改。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实际上获得的，是打开中美友好之门的外交特使的礼遇。他们这几天的切身感受到的当然是那特别热烈的掌声。

周恩来问大家：“你们住的怎么样？习惯中国菜的口味么？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

科恩倏地站了起来，他穿了件西装，没打领带，仍是长发披肩。科恩略为欠欠身子，大声地说：“总理先生，我想知道您对美国嬉皮士的看法。”

斯廷霍文事前叮嘱过这个格外活跃的科恩，要科恩不要随便拿问题打扰周恩来。这时，斯廷霍文焦急地朝科恩打手势，仍阻挡不住。

大厅里静静的，人们都关心地望着周恩来。

周恩来客气地微笑着打量了科恩一眼，瞄了瞄那蓬松飘垂的长发，说：“看样子，你也是个嬉皮士。”

周恩来继而把眼光转向大家：“世界的青年们对现状不满，正在寻求真理。在思想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在这种变化成型以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物。这些变化也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可以容许的。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为寻求真理尝试过各种各样的途径。”科恩正是大学二年级学生，学的是历史和政治学。他原以为在这个最革命的国家，听它的总理评价嬉皮士，一定会听到那种“资产阶级的”、“颓废的”、“没落的生活方式”之类的训词，结果，出人意料。周恩来并没有用革命的大道理训人，还表示出十分理解当代青年的思想。科恩不由自主地为周恩来所折服，钦佩而信服地听着。

周恩来又将眼光转向科恩：“要是经过自己做了以后，发现这样做不正确，那就应该改变。你说是么？”

科恩耸耸肩，友好而诚恳地笑着点了点头。

周恩来略略停顿，又补充了一句：“这是我的意见。只是一个建议而已。”

周恩来这番话，在第二天，几乎被所有的世界大报与通讯社报道。4月16日，科恩的母亲从美国加州威斯沃德托人通过香港，将一束深红色的玫瑰花送给周恩来总理，感谢周恩来对她的儿子讲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

事后，基辛格评论说：“这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跟中国人的所

有举动一样，它有许多层意义；描画得光彩夺目的表面是最不重要的部分。对这些美国青年的邀请的最明显的意义是：它象征着中国已承担了和美国改善关系的义务；而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保证——比通过任何渠道发出的外交信息都更有份量——现在肯定将被邀请的使节将来踏上的是友好国家的国土。”“由于这些选手不可能代表某一种政治倾向，这做法更加具有吸引力。这样中国就可以在根本不可能刺激美国评论界的情况下表明它的真意。”

被称“乒乓外交”的这段历史，充分展现出了周恩来外交艺术的智慧与才华，被誉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第六节 钓鱼台神秘来客

尼克松派遣基辛格秘密访华

1971年7月9日下午1时许，一队轿车由木挥地向北转驰三里河路，再向西缓缓驶进一个并不十分起眼的园门，车队在一座楼前陆续停下，年轻的服务员，笑容可掬地接待了一位神秘客人。数天之后，当这位客人离开了北京，在世界舆论的一片喧哗声中，他们才知道这位客人叫基辛格。

基辛格，曾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时任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在他受尼克松聘用以前，与尼克松素无瓜葛，甚至反对过尼克松。到白宫以后，他以自己充沛的精力和过人的才华，纵横捭阖，横议朝政，很快成了美国第二号炙手可热的人物。他这次秘密来华，是为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正式访问作准备的。

周恩来派出按应人员

按照事先计划，基辛格这次试探性的访问，要绕道巴基斯坦，乘坐巴航的飞机悄悄进入北京。

1971年7月7日晚，充满伊斯兰风格的巴基斯坦总统府宴会厅金碧辉煌。

叶海亚总统正在这里设宴招待中国客人，执行接待基辛格的秘密任务的我国外交部代表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唐龙彬和执行领航任务的领队徐柏龄、领航员刘志义、随机报务员王今亮和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应邀出席宴会。巴基斯坦出席作陪的有陆军参谋长哈莱德将军、外交秘书舒尔坦，以及国务秘书、安全委员会主席等军政要员。

宴会上，叶海亚总统高度赞扬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为发展中美关系所表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的伟大气魄。叶海亚总统是中国人的朋友，也是美国人的朋友，他为自己能得到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信任，为发展中美两国友好关系而传递信息、安排会晤感到荣耀。

这段时间，在叶海亚的亲自安排下，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被特别允许自由出入总统府。张彤将中国领导人的信件直接转给叶海亚总统。叶海亚亲自记下要点，然后放进总统专用信封，经双层密封后由信使携往美国，交给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希拉里。希拉里无权启封，必须亲自当面交给尼克松或基辛格。

当不久前确定了基辛格将由伊斯兰堡秘密飞往北京后，叶海亚又亲自安排、亲自过问具体计划，指定由外交国务秘书（相当于外交部长）舒尔坦·汗具体负责。计划之中的每一个细节，叶海亚都要过问与推敲。叶海亚不但提供了巴航的波音707专机供秘密飞行使用，还委派他所信任的专用的飞机驾

驶员来驾驶。

7月3日，周恩来派出中国的伊尔18型专机将徐柏龄、刘志义和王令亮三人秘密送到巴基斯坦首都拉瓦尔品第。为了不引起外界猜疑，那架专机立即飞回北京。徐柏龄等三人在戒备森严的军用停机坪下了飞机。巴方已经做好准备，未经任何检查手续，便在恰克拉拉基地司令陪同下，乘坐中国驻巴大使的汽车直接驶往中国大使馆。7月4日，中国领航小组同巴方飞行员在中国大使馆晤面，周密地研究了试航计划。中方人员详细地向巴航飞行员介绍了飞行航线，导航设备和机场情况。7月6日，巴航派出一架波音707专机，由巴航飞行员驾驶试航北京，在中方人员领航下安全地在北京南苑军用飞机场降落。

这时，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安排，外交部的代表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唐龙彬4人已经在南苑机场等候。飞机加油后，立即飞回拉瓦尔品第，顺利地完成了试航任务。

宴会间，当叶海亚总统得知徐柏龄曾经多次为周恩来总理驾过专机时，风趣地说：“倘若周总理访问欧洲途经巴基斯坦，我们一定热情邀请他来巴基斯坦访问。他要是不来，我就命令所有歼击机起飞拦截，将周总理座机迫降在伊斯兰堡。你可以报告周总理，我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巴基斯坦人民想念他。”

这个军人出身的总统，以他特有的方式表达了他对周恩来总理的热爱与倾慕。

当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的消息正式公布以后，不少西方报刊说叶海亚总统通过安排基辛格秘密访华而得到了多少好处，这纯属揣测与编造。叶海亚亲自安排了这次现代外交史上最著名的遁身术，为这个复杂而冒险的计划绞尽了脑汁，却并没有对中国或美国要求任何报答。

博士“病”倒伊斯兰堡

一架波音707飞机在太平洋上空飞行。

机舱里挤满了各种电子设备。一眼就看出，这不是客机，是一架军用战术指挥飞机。座椅并不舒服。基辛格带的随行人员有助手温斯顿·洛德，年纪轻，笔头快，博学多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霍尔德里奇，职业外交官，会讲中国话，曾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和东南亚其他地方工作过；亚洲问题专家理查德·斯迈泽，公认是国务院主要的日本问题专家；还有特工人员约翰·雷迪和加里·麦克劳德。

长得块头很大的霍尔德里奇挤在机舱里很不舒服，不满地抱怨：“窝囊！怎么坐这样的一架破飞机。哪像代表美国去执行使命，倒像是去丛林里空投间谍。”

斯迈泽都啾：“就是这架飞机，还是好不容易从战术空军司令部调来的。”

“国务院的家伙对我们就是看不顺眼，”洛德也在慨叹，“总统要了两架飞机去圣克利门蒂，这无可非议。阿格纽要一架飞机去非洲闲逛。莱尔德不早不晚也在这时要飞机去视察防务基辛格幽默地插话：“这是上帝考验我们，让我们坐很不重要的飞机，去作很重要的旅行。”

在整个行程中，基辛格都与华盛顿保持着机密的电讯往来。为了迷惑人，基辛格化名“首长”，把中国人叫“主人”。

基辛格在巴基斯坦停留与转飞北京的安排，都是通过中央情报局的保密电讯由美驻巴大使法兰跟叶海亚总统精心策划的。

为了使基辛格在巴基斯坦摆脱到处会遇到的高级官员礼节性的拜访，将由叶海亚表面上邀请基辛格到一个山间别墅进行秘密会谈。可是这样做，基辛格在巴基斯坦的停留时间就不得不定为72小时。而按照公布的行程表，基辛格在巴基斯坦只停留48小时，大致相当于他在印度的停留时间。当时，东巴基斯坦正发生战乱，大批孟加拉难民涌入印度。按国际惯例，在巴基斯坦比在印度多逗留一天就会被理解为偏袒巴基斯坦，从而引起新德里，引起美国官方机构、新闻机构，尤其是国会的反应。那样做叶海亚就得两天不露面，这就有从巴基斯坦方面泄露机密的风险。

怎么办呢？

为了避免上述的种种麻烦，基辛格只好自己想办法，准备到达伊斯兰堡后装病称肚痛；还需要装得越痛越厉害。这样，叶海亚总统就在晚宴上出面邀请他到位于穆里北边群山中的纳蒂亚加利总统别墅去休养。以此为借口，基辛格就能在巴基斯坦多停一天，而使他有两天时间，可以实现秘密访问北京的计划。这样做，也还有难题要解决。那就是，基辛格“病”了，怎么能够阻止大使馆的医生尽责赶来给他治病？又怎能限制那些经过多年外交训练的大使馆人员不去看望基辛格而听候指示呢？

精明强干的法兰大使还是想出了办法。法兰准备在基辛格到达之前，将他的几个要员设法打发离开。法兰把自己的计划用密电汇报说：准备让医生出差，不在伊斯兰堡。护士就不难对付了；让副大使去欧洲休假，让美国开发署长回国探亲。让那些敏感的人士尽可能都不在。事后，基辛格回忆道，“在长期卓越的外交史上，一位大使因总统的代表来访而把他的全部要员赶出城去，居然引以为自豪，而且他还因为很有办法而受到华盛顿表扬，这是破天荒第一次。”

可是有趣的是，还没有到要装病的时候，基辛格却真的病了，7月7日晚间，在新德里宾馆，洛德拿着几份材料，兴冲冲走进基辛格的卧房，喊着：“博士，博士。”

洛德没见着基辛格的身影。从盥洗室里传出基辛格懊丧的声音：“温斯顿，我在这儿。明天要装拉肚子，今天就来真格的啦！真糟糕！”传出抽水马桶冲水的声音。

基辛格走出盥洗室，自我解嘲地说：“我这个凡人，如此放肆地讲话，

上帝要惩罚我了。”

洛德也急了：“天报应，弄假成真了。明日你到伊斯兰堡还拉肚子，波罗计划岂不吹了？”

基辛格苦笑一笑：“只好咬咬牙，强顶过去。”

7月8日，星期四，基辛格飞到了巴基斯坦新建的首都伊斯兰堡。巴基斯坦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和美国驻巴大使法兰在机场迎接。水泥的停机坪被炎热的太阳晒得热气缕缕烤人，机场上只有几个记者在转悠。巴基斯坦采取了严格的保安措施，使巴基斯坦和外国记者无法找基辛格谈话。记者们隔着保安人员眼看基辛格朝他们打着无话可说的手势，也就无精打彩地缩进机场大厅躲太阳去了。

基辛格揩着汗，钻进了舒尔坦的“皇冠”轿车。一溜小车驶出拉瓦尔品第机场，开向伊斯兰堡城区。

车内，舒尔坦低声而郑重告诉基辛格：“请放心，一切都按计划准备好了。”

基辛格微微抬起右手挥了挥表示感谢，说：“我既兴奋，又感到茫然，愿伊斯兰的真主保佑我成功。”

舒尔坦真诚地说：“你放心。中国人是讲信用的，讲话算数。我在北京当大使住了好几年，打过不少交道，他们给我的印象很深。”

基辛格的车队招人眼目地穿行在伊斯兰堡街头。基辛格完全按照预定的计划行事。他在法兰大使的官邸与使馆留下来的人员共进午餐。与叶海亚总统会晤。叶海亚总统很高兴。他俩并坐在大沙发上，叶海亚得意地低声说：“我今天亲自检查了一遍准备工作，每一个环节都落实了。嘿嘿，博士先生，我本人就最喜欢冒险，想不到你这个哈佛教授也有这个嗜好。”

“我也不喜欢平淡无奇。”基辛格笑着说，“巨大的成功往往是给承担巨大风险的奋斗者的报酬。”

“我真羡慕你这次秘密之行。要是我俩现在能换一下位置就好了。”叶海亚说。

“我不换。我可不愿接管东巴那些麻烦事。”基辛格又说。

黄昏时分，叶海亚总统在基辛格下榻的政府宾馆举行宴会，并在宴会中开始执行计划。先由舒尔坦十分遗憾地告诉大家，尊贵的客人“偶染不适，肚子疼了”。接着，叶海亚总统便煞有其事地站起来高声宣布：“我原定在现在这个美好的时刻举行盛大国宴，为我们尊敬的客人基辛格博士洗尘。因为博士先生偶感不适，身体欠佳，只好抱歉改期。”

宴席上的宾客及主人们纷纷议论起来。有的说他准是得了“德里痢疾”，有的说来去匆匆的旅行者常常是会得病的。也有的人暗暗揣测基辛格是不是要潜往东巴，去帮助叶海亚排解战乱危机。谁都没有想到他要去中国。

叶海亚表情严肃认真继续说：“伊斯兰堡天气太热，会影响客人复原，我安排他到北边群山里的纳蒂亚加利总统别墅去休养。希望他尽快康复。”

基辛格也按计划演戏，装着神态迟疑地表示不同意：“感谢总统好意。这事太麻烦了。”

叶海亚又马上非常恳切地说：“博士先生，在一个穆斯林国家里，要由主人的意志而不是由客人的意志来决定的。”

基辛格随行的特工人员并不知道这是在演戏，信以为真。他们按照白宫的规定，派了一个同事连夜赶往纳蒂亚加利，先行去了解情况。到半夜 12 点左右，这位先行的特工人员打电话回来，报告他已勘察过纳蒂亚加利的宾馆，认为不宜于居住。基辛格获知后，毫无办法，只好要求巴基斯坦方面把这位倒霉的特工人员扣留在纳蒂亚加利，直到基辛格从北京回来。

基辛格参加叶海亚的宴会以后回到宾馆的住房，已经是夜里 11 点钟。离第二天规定起床的时间还有 4 个半小时。可是，基辛格辗转反侧不能成寐。这个自信心特别强的人，第一次感到前途凶吉难卜。他想像不到明天在北京会遇到什么情况，他跟总统两个人花了多少心血准备的几乎有十个方案明天顶不顶用？到一个他从未去过的首都执行如此重大的任务，而且又与国内完全断绝了联系，他开始感到有些没把握了。这也是他任职以来的第一次。

下午的时候，叶海亚告诉过他。中国不仅派了 3 个人来领航，将共同操作飞机，还派了一个 4 个人的高级代表团作陪。这些人都住在中国大使馆。叶海亚还告诉他，由于美国坚持保密，很伤了中国人的自尊心；中国人可能希望把全部情况公布出来。回想起叶海亚说的这些话，他心里更是空洞洞的没有底。他对中国人尽管作了诸多研究，还是感到那是纸上的材料，他对他们还是不知深浅、莫测高深。

遭错失的世界头号新闻

7 月 9 日凌晨 3 点半，舒尔坦和法兰都按计划来到基辛格下榻的政府宾馆。一夜没睡好的基辛格也起床了。吃罢早餐，4 点钟，基辛格一行在舒尔坦的陪同下乘坐巴基斯坦的军用车前往查克拉拉军用机场。出门前，为了防止偶然过路的行人将基辛格认出来，法兰大使对基辛格说：“不行。你这副模样，大家太熟悉了，得变一下。”

基辛格只好戴上一顶大沿帽和一副墨镜。舒尔坦打量了一下经过化装的基辛格，笑着说：“确实不容易认出你是基辛格了。”基辛格走得太匆忙，连换洗的衬衣都忘了收拾带走。但他没有忘记给总统发电报。

基辛格一行乘坐的车子悄悄地驶出了伊斯兰堡。这正是人们睡意正甜的时候，一路上行人不多。

基辛格和舒尔坦坐在一辆车子里，舒尔坦想对基辛格说几句祝福的话，望见基辛格陷入沉思，默不作声，也就作罢。他们的车子驶到机场，被特许驶入停机坪。基辛格乘来的那架飞机停在机场的民航区。在它的后面，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那架经过试航的飞机停在军用区等候。

这时，伦敦《每日电讯报》驻巴基斯坦的特约记者贝格正好在机场，贝格曾在巴基斯坦外交部任职，多年前已脱离外交界。基辛格一行人从小车里出来，走向舷梯登上飞机时，贝格还是一眼就认出了经过化装的基辛格。

飞机的发动机已经开动，发出了平稳的嗡嗡响声。贝格大吃一惊。确实是基辛格胖胖的身影。贝格凑近在场的机场负责人，问：

“那不是基辛格么？”

“是他。”机场负责人随口而答，无意中泄露了天机。“他去哪儿？”贝格又问。

“中国。”对方答。

贝格大为惊诧，问：“他去那儿干吗？”

“我不知道。”机场负责人走了。

贝格无意中得到这一重大新闻，喜出望外，扭头就走。据说，贝格当即赶去向伦敦的报社发了一条急电——

据本报驻伊斯兰堡特约记者贝格报道：记者在拉瓦尔品第机场获悉，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博士一行人已于7月9日凌晨4时乘坐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波音707飞机飞往中国

据说，这件事后来在伦敦舰队街传为新闻界的美谈。《每日电讯报》的值班编辑拿起那篇稿子，看了一下，放下来，耸人听闻的消息，使他吃惊得不敢置信。他念罢稿子，看了又看，终于摇摇头，骂道：“妈的，贝格这头蠢猪，准是喝醉了。基辛格哪能到中国去，他不要命了？荒唐！”

这个糊涂编辑竟将这篇可以轰动世界的稿子插在废稿签上。

基辛格下榻6号楼

7月9日，星期五，北京时间中午12点15分，巴航的波音707飞机在北京郊区的南苑军用机场降落。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即将出使加拿大的黄华，外交部礼宾司长韩叙，以及读过哈佛大学化学专业的翻译冀朝铸等前来迎接。

叶剑英陪同基辛格乘坐大红旗轿车进城，基辛格被安排住在钓鱼台国宾馆6号楼。

这里屏风古色古香，瓷瓶典雅古朴。楼外假山玲珑，小径曲折，流水潺潺，是一个漂亮的大花园，园林布局基本为乾隆皇帝时的原貌。

基辛格一行下榻住定后，开始盥洗换衣。当他发现将洗换衬衣忘在伊斯兰堡时，不免大为着急。洛德英俊苗条，衬衣不合基辛格穿；他只好向身材高大的霍尔德里奇借几件白衬衣。不过这些衣服既长又宽，还标着“台湾制造”的商标。

“哟，台湾产的。”基辛格只好笑着打趣，“真不吉利！我就是担心台湾问题要使会谈卡壳。”

洛德在一旁说：“头儿，你太紧张了。”

基辛格穿上霍尔德里奇的宽大衬衣，照着镜子，显得好像没有脖子。他只好折短袖子，结上领带。

到北京后的第一顿饭，是叶剑英举行的盛宴。菜式之繁富，制作之精美，数量之丰盛，使基辛格大为吃惊。这个德国犹太移民的后裔，来到美国，中学毕业的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一个会计了，就是成为哈佛教授，乃至进入白宫成为美国第二号权势人物，也没有见过如此丰盛精美的宴席。白宫大厨师亨利·哈勒花了好几天的准备的重要国宴，与现在这个宴席相比也显得逊色。白宫的有名的器皿陈列室里，收藏着历任总统用过的名贵的瓷器，有一个盘子中间的图案是一只小鸡盯着西红柿上的虫子，想要啄而食之；这是海斯总统夫人给客人准备的盘子，这个图案使人看了吃不下东西。据说海斯夫人就是不希望客人吃得很多。可是中国主人频频给美国客人挟菜，客人吃得越多，越高兴，主人才觉得满意。看来，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吃的历史也源远流长，吃的哲学也根深蒂固。主人要表现自己的富有与大方，使客人也可以显示自己的权势与尊贵。

基辛格吃到酣畅之时，大力感慨地开玩笑说：“大约数千年前，有位贵宾吃不饱，饿了肚子，使主人受到指责；自此之后，贵国就决心待客从丰，以免重蹈复辙。”

饭后，基辛格一行借着酒劲，步出6号楼，意欲一览这座皇家行宫的风貌。

从服务员的介绍中，基辛格得知，做为北京著名为园林古迹之一的钓鱼台，迄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了。

沿着曲径小道，美国客人来到庭园的西南隅，这里是清代行宫的遗址。从保存的古建筑和园林布局，可以看出它大体反映了乾隆行宫的原貌。挂有乾隆所书诗、匾的“澄漪亭”、“潇碧轩”、“养源斋”和“钓鱼台”等，即是行宫的主体建筑，以它们各自为中心的4个风景区，依然保留当时的风格。

顺着从玉渊潭引来的曲折回环的清流，他们想返回下榻的院落。但在一座小桥边，被哨兵礼貌地挡住了，基辛格哪里知道，他们一行闯入了江青的“禁地”。“文革”期间，本来就开得不大的国门几乎封闭，国宾馆一片萧条。部分别墅楼变成“四人帮”长住的地方。10号楼被江青占住。当年江青曾在此毁花种麦、种茶、种向日葵，草坪成了江青遛马种菜的地方。

相隔二十九年的握手

获悉周恩来总理将于下午4时半到来。基辛格等人相互招呼着，到客厅

门口迎候。

他们在屏风前相挨着排成一行，垂手站立，表情僵硬，紧张而拘束，连话都不说了。对中国的神秘感使他们在即将会见中国领袖人物时手足失措。

小车驶到小楼门口。周恩来下车走来，潇洒庄重，行动敏捷。基辛格在回忆录里这样描绘的：“他的面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式制服，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他似乎令人觉得轻松自如，但小心观察就知并不尽然。”

基辛格在楼门口迎接他，还没等周恩来走到跟前，就特意地把手伸了出去，动作还是有点僵硬。

周恩来立即会意地微笑了，伸出那只不能扳直而有点弓屈的右手和基辛格握手，友好地说：“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 20 几年来第一次握手。”

基辛格也说：“遗憾的是这还是一次不能马上公开的握手。要不全世界都要震惊。”

是啊，这是一次相隔 29 年的不平常的握手！这是一次划界线的握手！有了这次握手，中美关系才由隔绝到联络，由对峙到缓和，进而实现正常化。

第七节 震惊世界的公告

公报草案的争议

在详尽地回顾了中美关系的重大事件后，我们再把镜头对向钓鱼台五号楼。当周恩来和基辛格完成了历史性的握手后，基辛格便将自己的随员介绍给周恩来。

“约翰·霍尔德里奇。”基辛格指着大高个。

周恩来握着霍尔德里奇的手，说：“我知道，你会讲北京话，还会讲广东话，广东话连我都讲不好。你在香港学的吧？”基辛格介绍斯迈泽：“理查德·斯迈泽。”

周恩来握着斯迈泽的手，说：“我读过你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的论文，希望你也写一篇关于中国的。”洛德没等周恩来开口就自报姓名：“温斯顿·洛德。”周恩来握着洛德的手摇晃：“小伙子。好年轻。我们该是半个亲戚。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国人，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到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

周恩来也跟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开玩笑：“你们可要小心哟，我们的茅台酒会醉人的。你们喝醉了，是不是回去要受处分的？”

基辛格一行紧张、拘束的神态很快就消失了。他们为周恩来的魅力所倾倒。

楼内的会议室里，中美双方随着周恩来的到来开始了会谈。隔着一张铺着绿台布的长桌，周恩来与基辛格相对地坐在大藤椅里。在周恩来两旁的是叶剑英、黄华和章文晋，还有熊向晖、王海容、唐闻生和冀朝铸。在基辛格两旁的是霍尔德里奇、斯迈泽和洛德。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虎视眈眈地站在窗旁，还随身带着两只沉重的装满了机密文件的箱子。他俩特别忠于职守，既不想把总统特使丢给那些不明底细的中国人不管，也不愿意装着美国国家机密的箱子脱离自己的视线。后来，中方有关人员觉得他俩如此守着大累，也不值得，就劝说他俩回到所住房间去休息。他俩也觉得基辛格似乎很安全，只好提着那两只沉甸甸的机密箱子，离开了会议室，回到住房去。

洛德将那本熬了许多心血准备的材料汇编摆在基辛格的前面，周恩来只掏出一张纸放在茶杯边。可以望见纸上写着几行字。大约是讨论的提要。

基辛格首先表示感谢对他们热情招待，说：“如果有机会，我也希望以同样的热情在美国招待周总理。”

周恩来落落大方地说：“我没有去过美国，也没有到过西半球，但我们是在同一时候工作，你们在白天，我则在晚上。”

果然是名不虚传！答得自然得体，既未说去，也未说不去。基辛格神经再度绷紧。周恩来继而说：“按中国的习惯，请客人先讲。”

于是基辛格就呆板地念起了稿子。当念完开场白后，他放开稿子说：“今

天，全球的趋势使我们相遇在这里。现实把我们带到一起，现实也会决定我们的未来。”“我们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到你们美丽而神秘的国家。”

周恩来打断他的话说：“不，不，并不神秘，熟悉了就不神秘了。”

接着，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给了他两个任务：一是商谈尼克松访华日期及准备工作；二是为尼克松进行预备性会谈。然后他谈了七个问题。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他提到：

（一）美国政府拟在印支战争结束后撤走2/3的驻台美军，并准备随着美中关系的改善减少在台余留的军事力量；

（二）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

（三）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

（四）美蒋条约留待历史去解决；

（五）美国不再指责和孤立中国，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

在谈到印支问题时，他保证将通过谈判结束越南战争。他们准备制定一个从越南和印支撤走武装力量的时间表，但希望得到一个维护他们的体面和自尊的解决办法。接着他还谈到日本、苏美关系、南亚次大陆等问题。

基辛格发言告一段落后，已到晚餐时间。这时气氛变得较为缓和，周恩来说：“交谈嘛，何必照着本子念呢？”

基辛格则说：“我在哈佛教了那么多年书，还从未用过讲稿，最多拟个提纲，可这次不同，对周恩来总理我念稿子都跟不上，不念稿子就更跟不上你了。”

晚饭后继续会谈。周恩来针对基辛格提到的问题坦率地说，我们双方有不同的看法，用我们的话来说，世界观点和立场都不同。但这种分歧并不妨碍我们两个在太平洋两岸的国家寻求阁下所说的平等友好相处的途径。首先一个问题是平等，换句话说是对等，一切问题从对等出发。我同意这样的说法，即中美两国人民是愿意友好的，而且过去是友好的，将来也会友好的。我们邀请你们乒乓球队访华就是证明。

然后，周恩来着重谈了我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并阐明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军必须限期撤走，美蒋条约无效。

谈到印支问题时，周恩来特别指出：“美国朋友总是喜欢强调美国的体面、尊严。你们只有把你们的所有军事力量统统撤走，一个下剩，这就是最大的荣誉和光荣。”

当晚谈到11点20分才结束。周恩来随即去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汇报过程中在以下问题上作如下表示：

第一、当周恩来说美国还想在台湾保留点军队时，毛泽东说：猴子变人还没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

第二、听了美国要从印度支那撤军的汇报时，毛泽东说：美国应当重新做人。多米诺骨牌是什么意思？基辛格英文比我们好。让那些骨牌倒了算了。这是进化嘛！当然不打它也不倒，不是我们打，是他们打。美国要从越南撤军，台湾不慌，台湾没打仗，越南在打仗，在死人呀！我们让尼克松来不能就为自己。

第三、汇报到日本问题时，毛泽东说：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不要老谈具体问题。我们准备美国、苏联、日本一起来瓜分中国。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邀请他来的。

第二天上午，基辛格一行由黄华、熊向晖等陪同，参观了故宫三大殿和出土文物，随后到人民大会堂同周恩来继续会谈。基辛格认为这次改在人民大会堂会谈是周恩来对他的礼貌安排，甚感满意。会谈时周恩来略作寒暄之后说：你们要争取中美之间的和平，争取远东的和平，世界的和平，现在和平根本谈不上，战争一直没有停。不说远的，现在东方——中国、朝鲜、印度支那都在打……更不用说中东了。客观世界的发展是大动乱。我们始终积极防御，准备大乱，准备美国、苏联等国瓜分中国。准备苏联占黄河以北，美国占黄河以南，同时向我们进攻。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动员、教育下一代。我们进行人民战争，长期抗战，胜利以后可以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基辛格说：请你们放心，美国要同中国来往，决不会对中国进攻。美国同自己的盟国和对手决不会进行联手针对中国。中国对付美国的军队可以向北开，摆在别的地方。

双方还交谈了其他问题。最后，周恩来建议：尼克松可以在1972年夏天来华访问，并表示尼克松访华前先同苏联领导会晤可能更慎重些。

基辛格说，还是按照已安排好的程序进行，先北京，后莫斯科，如果总统夏天来，离美国大选太近，有争选票之嫌。

周恩来说那就1972年春天来访。基辛格表示同意。然后商定晚上商谈尼克松访华公告。

基辛格圆满完成了秘密使命

当晚，周恩来因要宴请金钟麟为首的朝鲜党政代表团，让叶剑英、黄华、熊向晖等去给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在听汇报时谈了两点意见：

第一、当汇报到基辛格说美国不会进攻中国，中国对付美国的军队可以向北开时，毛泽东说：他们要我们把军队往北开啊！过去我们是北伐，后来是南伐，现在是北来北伐，南来南伐。

第二、当汇报到双方商定以巴黎为联络渠道时，毛泽东说：你基辛格说不经过官僚机构，华沙是官僚机构，那我们驻巴黎使馆是不是官僚机构？你们不想派个常驻的，也不想派个临时的，就靠你基辛格。现在只好听他的，我们怎么能强迫人家呢？那就通过巴黎吧！

汇报最后正谈到公报问题时周恩来赶来了。原来基辛格在来北京途中，以后又在会谈中提出，他此次访问势难长期保密，公告须及时公布。为此，需要商议一个共同措词的公告，并商定同时发表尼克松访华之事。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指定黄华、章文晋参加讨论和拟定公告草案。对公告内容，毛泽东表示，尼克松来访，谁也不主动，双方都主动。公告中也不写我要见他的话，要学诸葛亮留一手。

汇报完后，周恩来还想留一会儿。毛泽东说：“你不是约好10点去吗？还是去吧，不然基辛格会感到奇怪的。于是周恩来同叶剑英、熊向晖等去见基辛格。黄华、章文晋把拟定的公告稿交王海容、唐闻生送毛泽东审阅。

大约晚上10点15分，周恩来见到基辛格说，因为时间太晚，本来不来了，后来听说你们还等着，所以还是来了。这次只谈了三件事：一是黄华、章文晋将同美方商谈公告稿；二是确定明天走的时间；三是通知美方不搞录音。

周恩来谈了约半小时就回到4号楼。王海容说毛泽东已经睡了，公告稿没有审阅。黄华只好拿原稿同基辛格谈，但未获结果。

双方对公告稿的争议有三处：一是尼克松来华访问是惟主动提出的；二是会谈要讨论哪些问题；三是来访的适当时间。

原稿中对第一点是说尼克松要求来访，我们邀请。基辛格不同意，说这样写让人看了像个旅游者。周恩来考虑如说尼克松要求来访，我们才邀请，他们的面子难看，于是改成“获悉”他要来访，我们邀请，就避免了谁是主动的问题。

对会谈要讨论的问题，在“谋求两国正常化”之后加上“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不只是讨论台湾问题。

关于来访时间改为5月以前，不说具体日期，以便灵活安排。

翌日，毛泽东起得很早，看了公告很满意，说“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样写好，不然好像我们只关心我们的问题，关于访华日期，毛泽东说，公告一发表，会引起世界震动，尼克松可能等不到5月就要来，早点来也好嘛。

公告稿经毛泽东同意后，周恩来于9时40分让黄华继续同基辛格商谈。基辛格看后认为，这一稿中方设身处地考虑了美方的意见，同他们的要求异常接近，马上表示同意，但在接受邀请前加上“愉快地”一词。公告的原文是：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

的问题交换意见。

这个公告虽不过 200 字，但从起草到达成协议实在很不容易，花了很大力气。双方商定于 7 月 15 日同时公布。7 月 11 日吃完午饭后，基辛格一行愉快地乘原机飞回巴基斯坦。他对此次密访甚感满意，说他是“带着希望而来带着友谊而去。”访问成果“超过了他原来的期望，圆满地完成了他们的秘密使命”。7 月 15 日当公告一发表，确实震惊了整个世界。

第八节 巴黎：三个人知道的秘密

使馆来“客”

1971年7月19日上午8时20分，一辆车牌照号码为CD6的轿车在乔治五号路附近一个拐弯处悄然停下，车门开处，钻出一位身材高大的美国军官。

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徒步向中国使馆方向走来。

快到目的地时，他自然地放缓了脚步，仔细地打量着这座陌生的官邸：它坐落在花园中央，离街面有一段距离。它的围墙很高，临街铁栏杆高竖，门上还钉了金属板。这大概是以防行人的窥视吧……

见四周没有行人，他机警地向大门靠近。大门虚掩着，一位穿中山装戴一副深度眼镜的中国青年出现在来者的眼前。

他以缓慢的法语说道：“我叫沃尔特斯，我是美国武官，我带来敝国总统致贵国政府的一封信。”

中国青年向他伸出手来，用法语说道：“我叫韦东，是大使的助手，请您跟我来。”

韦东领着沃尔特斯穿过花园，来到官邸大楼的正门口。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一秘曹桂生将沃尔特斯引进会客室。

这是一间中国气味十足的大房间，墙上装饰着红绸。韦东和曹桂生在沃尔特斯面前放上食品和饮料。

不一会儿，黄镇大使从楼上下来，走进客厅，和沃尔特斯握手。

大使也是身材高大，脸上略呈红颜，已有些发白的头发直立向上。相映成趣的是，沃尔特斯面部凹陷的地方如眼窝、嘴巴，黄镇的却稍稍突出。

头发自然弯曲的沃尔特斯比黄镇小八九岁，但资历却浅得多。于是，他在黄镇面前反而显得拘谨。

黄镇拉他并肩坐在矮沙发上，右边坐着韦东，左边坐着曹桂生。黄镇请沃尔特斯喝茶，说道：

“你是军人，我也曾是军人，军人对军人，我们一定很谈得来。”

沃尔特斯耸耸肩膀，双手一摊：“你是长征出来的老将军，我在你的面前只是个小兵。”

黄镇摇摇头，笑了：“我自己也只是毛主席的一个小兵。”

他们开始交谈那些早已准备的话题，或即兴想起的事情，在黄镇的真诚和热情感染下，沃尔特斯也开始放松了。他向黄镇他们介绍，他精通八国语言。

黄镇接过他的话茬儿说：“希望你不久也精通中文。”

两人哈哈大笑。

沃尔特斯侧过脸，神色庄严了些：“我的行动十分注意保密，连美国驻法大使也不知情，只有我的女秘书南希·马莱特小姐知道此事。”

他说，由于法国情报机构和记者是无孔不入，惯于捕风捉影的，他便处处提防着。渠道来往的口信都将绕过国务院和国防部直通白宫。

黄镇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点点头说：“我们也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使馆里除了我们三人和极个别必不可少的工作人员外，无人知情。”

沃尔特斯也理解地点点头，把一封信交给黄镇，说道：“我对中国人的保密本领深信不疑。”

黄镇答应把信件转交北京。

沃尔特斯说：“我来是为了执行白宫的命令，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

黄镇：“我赞赏你的坦率，我们都是为各自国家的利益服务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双方找到共同点。”

“只要有事，我将随叫随到。”沃尔特斯向黄镇告辞时说道，“如果我不在，也要千方百计通过南希小姐找到我。”他写下了南希小姐的电话号码。并商定，今后见面前先电话联系，他的代号为“约翰”，每次由他来黄镇官邸。

“此事关系重大，预祝我们合作成功。”黄镇匆匆说了一句，他懂得，会晤应该到此结束。

信件很快发往北京。此时已是凌晨。黄镇回宿舍时又交待值班员，只要国内有指示来，不论何时，都要立即通知他。走到半路，他又折回，对韦东、曹桂生说：“不管什么情况，决不得拖延与沃尔特斯的联系。”

基辛格扮成了大侦探

黄镇大使在半夜里被告知：基辛格博士要来拜会他。

他把两个睡眼惺松的助手叫到自己屋里，商量接待的具体工作。他的意见是：不卑不亢，热情大方，礼宾规格要高于沃尔特斯。

几天的忙碌，大使在他的两名助手眼看到一层黑雾，他觉得他们连话音也比从前小多了。“趁天还没亮，你们先去睡一会儿。”

“你呢？”

“年纪大的人觉少。你们养足精神，到时候别打瞌，翻译一定要准确，有不清楚的地方一定要问，不厌其烦地问明白。”

他俩默不作声地走了。他蹑手蹑脚在他们门上贴个“昨晚加班，请勿打扰”的纸条。自己回到屋里，冲杯茶提提神，开了台灯，一字一句推敲国内电报，准备与基辛格交谈的要点。

与此同时，美国使馆的沃尔特斯武官也在运思凝想：要将基辛格悄悄带进巴黎，这是一个不小难题。老谋深算的法国情报机构控制着每一个关卡。只要发现基辛格到了巴黎，新闻界就会骚动，秘密渠道也将失败。他只好求助于法国总统蓬皮杜。蓬皮杜帮了忙，只让法国情报机关的最高层知道这件事。

7月25日，沃尔特斯安排基辛格在华盛顿露面，然后乘坐打着飞行训练幌子的“空军一号”总统座机，从法国临国进入了巴黎，当晚在纳伊区沃尔特斯居住的公寓下榻，沃尔特斯瞒着工作人员，把自己的卧室让给基辛格，自己在起居室的沙发上过夜。

第二天早晨，基辛格和两名助手在公寓吃了早餐，就兴冲冲地会见中国大使。因为怕人发现，沃尔特斯特地从车行租了一辆旧私车，由沃尔特斯亲自驾驶。基辛格则戴上一副黑色墨镜，一顶普通的法国帽，把帽檐拉得低低的，遮住了半个脸，颇有点大侦探的味道。

黄镇站在客厅门口迎候基辛格，然后一道进入充满幽香和中国音乐的客厅。当沃尔特斯把上述情景一描述，黄镇哈哈大笑，连连点头：“你想得周到，保密工作做得好。”

沃尔特斯喜形于色。

黄镇请他俩喝中国茉莉花茶，吃荔枝干和杏脯。

黄镇的目光扫过基辛格的高鼻子和大眼镜，顿了一下说：“我们好像在戴高乐将军葬礼上见过面？”

基辛格剥了一颗荔枝，嚼着：“是的，当时就想和中国大使说几句话，但这会引起轩然大波。”

“是的，那时时机还不成熟。”

“但现在不同了，美国决定将中美关系建立在新的基础上。”

黄镇对基辛格的表示感到满足，在与基辛格进行一席微妙的谈话之前，中国大使对于有可能谈谈自己设想的话题和把谈话引上预定的目标，已经获得信心。他表示：“中国政府同样有着在新的基础上发展中美关系的愿望，因为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和平的利益。”

宾主笑谈周恩来

大使斟满了茅台酒，提议为中美关系发展干杯。基辛格拿起一杯酒，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嘴唇挨着酒杯边儿，脑袋一扬，酒杯就见底了。他眼镜后面的眼睛放着迷迷离离的光，咂嘴道：

“又喝到茅台酒了，我酷爱茅台酒和中国烹调。”

他谈起秘密访华时同周恩来共进晚餐的情景，变得异常激动。他简言之，在他生平所遇到的两三个给他印象最深刻的人中，周恩来是其中之一。在他眼里，周恩来敏锐、聪慧而含蓄，是一个目光远大，不斤斤计较于细节的政治家。他欣赏周恩来的风度，特别记得他讲的这句话：“现在天下大乱，我们有机会来结束这种局面。”真怪，他说这些话是为了和黄镇大使交流感情，但是后来却突然忘掉了一切，激动起来了。他甚至瞅着透明的玻璃杯自言自语道：

“不过我不知道周总理用来同我干杯的杯子里，装的是茅台酒还是白水。”

沃尔特斯笑得咧开嘴，黄镇笑时却把嘴噘圆了。

黄镇谈到正题时说：“周总理已同意这么办：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前，基辛格博士在10月下旬先到中国访问。如果基辛格博士要访华，我们建议你先到阿拉斯加，再从那里飞往上海。”

基辛格愉快地颌首，连他那双铬鞣革的新皮鞋也发出一种悦耳的嘎吱声：

“我准备先访华，并建议在巴黎主持越南和平谈判的布鲁斯大使陪我一起去。”

黄镇留神倾听着基辛格所说的意思，感到很不自在。尽管他对同自己谈话的人十分尊重，他还是有反驳他的念头。

“请原谅，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想法难以接受。”

黄镇说着，很气派地把身子缩回，缩回到沙发深处。

基辛格没有马上回话，可还是一个劲儿用眼睛盯着，犹如是那黯夜森林里的狐眼，在荧荧闪光。他还是固执地争取着：“布鲁斯大使得到总统充分信任，”

黄镇点点头，算是回答。

基辛格接着说：“如果我们万一和别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会谈，美国将随时通知你们，请你们将这一点转告周恩来。”

黄镇谛听着，不知是这些话，还是茅台酒的作用，红晕一下泛上脸颊，他的内心，感到满意。

送别的时候，他们的目光充满喜悦。虽然他们在第三国邂逅相遇，可觉得，就在一闪之间，他们都互相选中了。正如一位西方记者所说，当时美国与中国仿佛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人，在互相吸引、相互追求中享受着种种甜蜜和忧虑，对未来既怀着希望又怀着恐惧……

基辛格的满意与敏感

星期日的巴黎要睡到11点钟。路上寂静无声，行人寥寥，街道洁净而空旷，在那紧闭着的百叶窗后面，在阁楼的浅红色窗帘后面，人们还在睡觉，停在人行道旁、梧桐树下的汽车，好像也在睡觉。坐在私家出租车里的基辛格和沃尔特斯兴奋地交谈着。

沃尔特斯说：“比起以前我与他们会晤，这次多少要拘谨一些。”

基辛格没有否认：“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开始阶段，驻巴黎的中国官员无非是传递信息，不参与决策。”

基辛格有一种强烈的占上风的念头，他与沃尔特斯的开场白并没有满足。凭着他的直觉和机警，他终于将话题引到得意之处：“你平时受到的款

待是否和我一模一样？”

沃尔特斯本来就窝陷的嘴巴使劲瘪瘪，棕黄的眉毛摇了摇：“不同，有很大的区别。没有两个人在大门口迎接我，我要在挂着红色帷幔的房间坐定后，大使才进来。此外，我既闻不到香味，也听不到音乐。”

沃尔特斯说完，从反光镜里发现基辛格脸上掠过一丝满意的微笑。

基辛格是很得意。他把压在眼眉上的法国帽朝后推了推，两手插入衣袋里，垂下他下巴的肉高兴得一抖一抖的：“看来，在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也照样承认我们在地位上的等级差别。”

沃尔特斯也很得意。他能绕过国务院和国防部，直接听命于总统，与中国老资格的黄镇大使首开巴黎秘密渠道，这是一个少将军人莫大的荣耀。他把车子开得飞快，并且说道：“我们吃的东西是一样的，杏脯、荔枝干、中国点心、茉莉花茶，有时也喝茅台酒、红葡萄酒，可惜我对它不感兴趣！”8月16日，基辛格又来到巴黎。这一次，他先到法国的一个邻国，然后由沃尔特斯带着绕过入境稽查员，进入法国。再由沃尔特斯驾驶一辆临时租用的挂有私人牌照的小汽车，开进中国大使官邸，车停在院子里。

他们现在正坐在一张铺着白台布的桌子边。扁平陶瓷盘子里的糕饼，正冒着热气。

“基辛格博士，我们又一次见面，这很好。这在目前非常迫切。”黄镇说道，一边挪动着盘子，却一点也没有吃。“关于您要求访华的口信我已转回国内。”他碰了一下餐叉和刀子，不过还是没有吃。

“请说下去，大使先生……”基辛格停止了咀嚼，眼巴巴地望着黄镇，他急切地想听到下文。

黄镇拿起餐巾，准备把它塞进上装的衣襟。他做这一切时。是那么从容不迫，那么认真，这就使人特别注意这个精细的人的每一个动作，并且必然会对他准备说出的话极为关注。

“我荣幸地转告博士，我国政府已同意您于1971年10月下半月来华进行公开的访问，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准备并进行政治会谈。”

基辛格原已准备把餐巾塞进衣襟，现在重又把它放回到桌上。

“我能会见……周恩来先生吗？”

黄镇用叉尖碰了一下糕点。显而易见，他是避开基辛格尖锐的目光，因为基辛格那双眼睛，并没有被厚厚的镜片过滤得温和些。

“周总理将就有关问题亲自同博士先生会谈。”黄镇一板一眼地回答。

基辛格的眼镜片闪了一下，眼角露出笑纹。“我感到十分荣幸。”

黄镇大使笑了笑。

“那么，请您把这种情绪一直带到北京去吧。”黄镇还有一些话想说，但他严格按国内指示：要对基辛格多听多问少说，一般不作具体承诺，涉及台湾、远东等重要问题也只在必要时作原则表态。所以，他常常兴致勃勃聊一些与双方传递信息完全无关的话。

“好的，好的……”基辛格附和着说。现在他的情绪确实很好。

预报日期出现波折

早餐，大使只喝了一碗稀饭。到了约定的时间，他从二楼的窗户守望着使馆的铁门。沃尔特斯晚到了一刻，他进门和韦东握手时，明显地使了使劲，显得精力充沛和坚定不移。黄镇又在思索，他从沃尔特斯放慢的步履所看出的不安该怎样解释。看来美国人改变了以往的精确作风——沃尔特斯的钟表是分秒不差的。是的，8月的这一天的任务对黄大使来说，也不是轻松的。前一次，沃尔特斯提出基辛格访华的新闻预报问题。美提日期为9月22日、23日或者10月5日，并明确提出倾向前者。国内考虑，美将在联合国大会开幕时提出“两个中国”的提案，所以我方坚决不能同意在9月22日或23日公布基辛格访华的预报消息，而同意美提的另一时间，即10月5日。

黄镇顺着走廊来到客厅，皮鞋无情地吱吱响着。美国武官无声无息地迈着步子，不是迈步，而是轻飘飘地走着。

“大使先生，您精神很好，瞧您红光满面！”

“您的脸色也一样，武官先生……”黄镇笑了笑说。“可能是窗帘映的吧。”他对红色帷幔扫了一眼。

沃尔特斯环顾了一下房间，把目光集中在窗帘上。在客厅里见到的东西中，这紫红的窗帘最吸引武官的注意。看到这窗帘，美国武官的眼睛甚至流露出某种好奇的神情。“我象征着什么呢？”他好像在问自己。

黄镇从桌边站起来。他穿着一件淡黄的、榨蚕丝的夏衣，与客人身上穿的深色上装相比，就显得很随便了。

“按我国习惯作法，一般是在基辛格到达中国发布消息，不另发预报。”黄镇开始说正题。“为照顾美方需要，中方同意在10月5日各自发表内容相同的预报。”

“大使先生，既然中方同意发预报，早一些时候更能产生持久效应，为何不提前至9月23日呢？”沃尔特斯抬起眼睛，看着黄镇——谈判一开始显然就没有什么好兆头。这使沃尔特斯感到有点困惑不解。

“请你注意9月23日这个日子。”黄镇对沃尔特斯说。他稍稍欠起身子，以便向对方表示一定的尊敬。“9月23日前后，美国将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提出我国政府坚决反对的制造‘两个中国’的提案，在这个时候发表基辛格访华的消息意味着什么？”

“也许这是一个偶然的巧合……”沃尔特斯故意把说话的声音压得很低。

黄镇听了韦东流利的法语翻译，又让曹桂生叫沃尔特斯再用英语说一遍。通过两种语言的翻译，黄镇抓住沃尔特斯讲话的确切意思，摇摇头：“中方不能同意在这个时候发布中期访华的预报。关于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

立场没有改变。”

黄镇递给沃尔特斯一份书面材料。

沃尔特斯也回交黄镇一份材料。黄镇提起纸页，透过阳光一看，现出法国水印。纸上写着基辛格拟同周恩来会谈的几个问题：第一、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时间、路线、会谈形式等问题；第二、除台湾问题外，还要谈远东和国际问题；第三、双方高级人员互访，包括文化、科技交流等问题。

“很遗憾，我不知贵国为何把第三方面的问题提出来？”黄镇凝视着沃尔特斯回答说。因为1971年7月16日基辛格秘密访华后发表的中美公告中提到“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为什么又扯出个第三个问题呢？这着实令他不安。

“依我之见，在两国关系没有正式建立之前，这是一条扩大联系的途径。”沃尔特斯把眼溜向黄镇，仿佛想在他脸上捉摸出，这个问题成立的可能性有几分。

黄镇以锐利的，简直是森严的目光，唰了武官一眼，说道：“基辛格博士访华不应为枝节问题分散力量，台湾问题不解决，高级人员互访以及种种交流等其它问题都无从谈起。”

坐在两边的翻译曹桂生和韦东，跟着大使，逐字逐句地进行翻译，他们以精细的技巧翻译，不但译得十分准确，而且译出语气，使大使滔滔不断的说话，变得像直接在讲英语一样。

“事情总是有主有次。”黄镇压低了声音说，低得差点听不出。他能够从大声疾呼一下子转入到低声细语是能吓唬人的。

于是桌子周围的人都静下来。

“我可以向基辛格博士转达你们的意思，”沃尔特斯没有争吵，但带点警觉的口气说，“并不需要我们在此决定什么，重要的是传递。”

“是这样，”黄镇指了指房间里准备的茅台酒和小吃，微微一笑，“到我们解决次要问题并可以自我作主的时候了。”

黄镇给沃尔特斯斟了茅台，但沃尔特斯摆摆手：“我还得开车回去，不愿意因醉酒开车而被拘留。”

黄镇让沃尔特斯吃蜜枣，但沃尔特斯拿起一块杏脯。黄镇问道：“你是否陪同基辛格博士一起访华？”

沃尔特斯摇摇头：“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消息。”

“我已向中国政府谈过你的情况，你为打开这关闭了25年之久的中美关系大门出过力。”

“我很希望博士带我一起去中国访问，可是他决定不这样做。”

“我喜欢同基辛格博士交谈，博士谈话很坦率，开门见山，而且很幽默，他是否曾在军队服役？”

“是的。”

“是什么军衔？”

沃尔特斯思索了一下，把基辛格在二次大战时最后的军衔告诉黄镇：“他是上尉。”

“哦，”黄镇说道：“这么说他得向我们两人敬礼，我们都是将军呀。”

“是啊，”沃尔特斯故作遗憾，耸了耸肩膀，“大使先生，或许他仍然会向您敬礼。可惜他不会再向我敬礼了。”“为什么？”黄镇询问着。

“在美国，军人在政治上没有地位，不能竞选公职，而且在参加政治集会时不能穿军服。还有一条法律规定，在最近十几年内曾在军界供职的人不能当国防部长。这是不合理，也是不公平的。”

黄镇又问：“美国陆军军官在什么年龄退休？”

沃尔特斯答道：“作为少将，我将在58岁退休，如果我被提升为中将，就能服役到59岁。”

黄镇摸了一下斑白的头发，仰靠在沙发上，感叹道：“我在你们国家就该退休了。”又问道，“你退休后是否还给配备汽车和司机？”

“不配备了。不过我能领取一笔数额不小的退休金，这样我就能过十分舒适的生活，但不会给我配汽车和司机了。”

黄镇笑了：“可是我们国家就会给我配备。”

沃尔特斯也笑了：“对呀，大使先生，我认为正是贵国绝对平等主义社会的一大好处啊。”

黄镇大笑起来，用手拍拍沃尔特斯的背，“你们美国人真幽默！”

9月22日，沃尔特斯接到一秘曹桂生的电话，说有事商量。他把汽车停在五六个街区以外的地方，然后再向大使官邸走去。他不时用小镜子照照，或回转身来看看后面有没有人跟踪。他会见了黄镇大使，进一步交换了有关基辛格的飞机和上海虹桥机场指挥塔进行通讯联络所用频率的问题。不知怎么谈起有关语言问题，沃尔特斯为不会讲汉语感到遗憾，黄镇也为不会讲英语而懊丧。彼此探询了各自会讲的语言后，终于找到了一种彼此都懂的语言，那就是俄语。于是他们试着用俄语交谈了几句，可不一会儿，两人就对着眨眼，彼此都听不懂各带自己乡音的俄语。

那一晚，黄镇兴致极高，举起茅台酒，硬和沃尔特斯干了一杯。他脸上放光，连说带比划，终于使沃尔特斯听懂了这句俄语。

“永远也不会有人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黎的大使和美国驻法国武官会在一起用俄语交谈！”

沃尔特斯告别时，已是深夜。黄镇亲热地把手臂搭在沃尔特斯肩上，一直送到门口。沃尔特斯则提心吊胆，四处张望，他怕他的访问会被苏联人、甚至中央情报局或联邦调查局嗅出味道，幸好，外界一无所知。

第九节 蒋介石再叹“反攻”无望

蒋介石后悔不敢建立内线

1971年9月13日，林彪仓皇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时年65岁。蛰居台湾而梦想反攻大陆的蒋介石，此时已年届84岁。得知林彪折戟沉沙，禁不住老泪纵横。蒋介石之所以悲枪泪涌，并非留恋自己与林彪的师生情，而是另有隐衷——正当林彪在文革中出尽风头，大红大紫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在国民党一次中常委会议上就直截了当地说：“我不相信林彪这个人会忠于毛泽东。”会后，蒋介石的秘书陶希圣（陶系黄冈人，与林彪是小同乡）问及此事，蒋说：“你查一查1945年的档案就知道了。”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林彪曾受命前往重庆，面见蒋介石，为毛泽东主席与蒋的谈判打前站。林彪见了蒋，显得毕恭毕敬，一口一声地称“校长”。蒋说：“你们共产党还让这样称呼吗？”林彪谨慎地答道：“我尽管在共产党内，将来校长一定晓得我能为国家做什么事。”当着蒋介石的面，林彪不敢长谈，他表示有一些“意见”想通过蒋的心腹详谈，然后转达给蒋。蒋即传唤军统局副局长郑介民（郑也是黄埔生），当着郑的面说：“林彪同学有些事情要与你充分交换意见。”郑介民即与林彪在嘉陵江畔的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饭，作了几个小时的长谈。随后，郑介民向蒋递交了一份很长的报告。60年代陶希圣查阅过的这份郑介民所写的长报告，至今仍保存在台湾阳明书屋（该书屋专门保藏蒋生前的档案文献资料）。

60年代蒋介石断言林彪不会忠于毛泽东，是基于抗战时林彪在他面前的直言不讳，而且蒋手里头也确实掌握了一份有关林彪所述意见的长篇报告。林彪死后，蒋介石很难过，几次对秘书陶希圣提起“可惜当初不相信林彪而不敢建立这条内线”。

此后，国际上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使蒋介石再次感到“反攻”大陆实在是遥不可及了。

激动人心的时刻

1971年10月25日晚，加拿大首都渥太华。

罗马尼亚驻加拿大使馆官邸灯火通明，觥筹交错。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黄华正在这里作客。

晚餐过后，好客的主人留下中国客人边喝咖啡边聊天。此刻正在进行的联合国大会自然成为宾主讨论的中心话题，他们就大会能否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大席位和一切合法权利提案各叙己见。

突然，主人16岁的女儿从二楼匆匆而下，大声喊着：“通过啦！中国的席位得了三分之二还多的票数！”

主人急忙请黄华一行到二楼收看电视。大家迫不及待地来到电视机前，只见荧屏上正播放联大大会厅的场景：大厅里灯火辉煌，会场情绪沸腾，大多数代表激动地站了起来，对刚被通过的联合国大会第 2758（26）号决议报以热烈的掌声。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高喊：“我们胜利了！”“中国万岁！”他们互相祝贺、握手、拥抱，来自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一些代表甚至高兴地舞蹈起来……

随着镜头的转动，荧屏上出现了另一种场面：蒋台代表垂头丧气，结结巴巴用英语争辩了几句后，狼狈而去……

看到这里，黄华大使内心激动不已。中国多年来奋斗的外交目标又有了重大的突破。客人们在接受了主人的祝贺后连忙赶回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大家又围在一起收看电视台重播的这一震动全世界的新闻。在距离伟大祖国万里之遥的使馆，这一夜成了大家难忘的时光。

美国总统尼克松今天极为颓丧、恼怒。联大表决的时候，尼克松坐在白宫书房的沙发上看电视。他神情专注地直盯着电视机，有个不知趣的工作人员要进来请示工作被他挥手示意赶了出去。电视机播出联合国宽敞的、蓝色和金黄色的大厅里挤满了代表和观众。大厅里气氛紧张，十分安静。当电动记数牌上的灯光表明美国的提案被击败，阿尔巴尼亚的提案获得通过时，尼克松气得脑门筋都鼓了起来，下颏扭得更歪。他粗暴地敲了一下沙发扶手，跳起来，跑过去，将电视机关了。刚才被赶出去的那人走了进来。尼克松十分恼火地对他吼道：“太不像话！太失礼了！我感到十分震惊！在一个国际讲坛上的表现如此恶劣，它可能非常严重地损害美国对联合国的支持……”

与此同时，地球的另一端，中国首都北京。

新华社的编辑们认真地收看着一条条外电，跟踪着联大会议的情况。大家在紧张、期待中度过了分分秒秒。奇迹出现了，北京时间上午时分，世界各大通讯社几乎在同一时候发出快讯：联合国 1971 年 10 月 25 日夜以压倒多数的票数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的 23 国提案，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被视作真正代表人民的新生力量正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了……

编辑部沸腾了：人们忘了一夜的劳顿，迅速地把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译成中文，通过电波传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事隔多年，当笔者向一位当时的值班编辑谈起此事时，他无不幸福地说：“读着那些消息，我心情不知有多么激动，多么兴奋。”

是啊，做为一个中国人，做为一名知识分子，做为一名首先获悉这一令炎黄子孙自豪的消息，他怎么能不为之兴奋和欢呼呢！

众所周知，中国原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蒋介石的统治后，新生的、真正代表亿万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要取代蒋介石集团窃取的联合国席位，但是，由于美国等一些国家从中阻挠，使蒋台政权代表仍然霸占联大的席位。人民共和国

为了赢得国际的支持，为了代表中国人民的意志在世界大舞台上发挥应有的作用，作出了外交上的积极努力。

从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到 1971 年获得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整整 22 个寒来春往，新中国走过了一条艰难而又崎岖的外交历程，一段令人回味无穷的风景区。

周恩来和基辛格开了一个玩笑

“博士，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

周恩来的脸上充盈着笑，当他把第二次访华的基辛格一行送至钓鱼台的楼门口，用英语向他告别。

被被誉为世界超级谈判大师的基辛格对于周恩来的谈判方式感到震惊，也十分钦佩。他曾代表美国经历了多次谈判，其中包括苏联人、越南人，但没有碰到过眼前这样的对手。周恩来在确定一种合理解决问题的观点后，一步就跨到那里，然后坚持立场不变。这样做，一开始就接触问题实质，显出了谈判者的真诚。基辛格在日后写的回忆录中透露：

只要有可能，我在后来同别人进行的一些谈判中总是尽量采用这种办法——有人把这种办法斥之为“先发制人的让步”。事实上，尽管开头的让步似乎大一些，但与那种“色拉米”香肠式的办法相比，几乎可以肯定，总的让步还是比较小的。这种一步跨到一个合理立场的战略明确无误地摆出了无可改变的立场；这样做更容易维护自己的立场，而那种旷日持久、零敲碎打的细小步伐所积累起来的效果却是不容易维护的，在那样的过程中总是会掩盖问题的实质。

这一天 4 点多钟，天还没全亮，中美双方又继续在钓鱼台里讨论公报，修饰文字了。这就是以后震惊世界的上海公报。两方在基辛格上机之前又对文本进行讨论。将近 9 点钟的时候，秘书将刚刚得到的联大通过接纳中国的消息，悄悄地告诉了周恩来。

如果说周恩来用英语向基辛格告别是一种喜悦的流露，那么乔冠华与基辛格的这段对话就可具玩味了。

“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我国能恢复席位么？”在由钓鱼台驶往机场的红旗轿车内，乔冠华问，“我得到消息，现在这个时候，联大正在对恢复我国席位进行表决。”

基辛格不假思索地一笑，说：“我估计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大。”

乔冠华狡黠地眨了眨眼：“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去？”

基辛格扶了一下眼镜：“估计明年还差不多。待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你们就能进去了。”

乔冠华仰脸哈哈大笑，笑声十分豪爽：“我看不见得吧？”

就在刚才基辛格快要离开钓鱼台的时候，周恩来瞅空低声告诉乔冠华，联大表决结果已经传来，赞成接纳中国、驱逐台湾的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已经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表决结果是 76 票赞成，35 票反对，17 票弃权。周总理为了不使基辛格难堪，没有将这个�息告诉他。

机场上，我方人员在叶剑英的带领下给基辛格送行，他们从眉宇、神态都露出了异样的喜悦。自信的客人还以为中国人今天特别高兴是因为公报文本的构架已经基本上定了下来，大概中国人因为公报基本上采用了中国提出的方案才显得特别高兴吧！

基辛格的飞机启动了，很快驶向跑道。望着腾空而起的飞机，叶剑英抑制不住兴奋说开了：“基辛格上飞机得知了联大的消息，不知道他作何感想？！”

果不其然，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刚刚从北京起飞，电讯员就给他送来了电讯稿。基辛格一看，大为惊讶，将电讯稿递给助手们传看。

电讯稿上打着：

联大刚才已以 76 票对 35 票通过接纳中国，并驱逐台湾。

基辛格双手捧着头，好一会才抬起头来，表情复杂地说：“我说过，光是中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连我自己对此也认识不足。”

基辛格说罢，苦笑了一下。

洛德望着舷窗外的云海，慨叹着：“周恩来太厉害了！让我们否定了自己的方案，接受了他们的方案，而且高高兴兴，心悦诚服……”

基辛格想不到他担心的事到来得这么快！他的心茫然地往下坠着，显得格外沉重。刚才离开钓鱼台时的欣喜心情已消失殆尽，变得有点苦涩。阿尔巴尼亚提案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美国政府花了很大的力量去制订和提倡的双重代表权和把安理会席位给北京的提案，已经没有得到表决的机会。美国从来没有这么惨重地失败过。这要怪谁呢？一批和美国友好的国家一方面不愿同美国对立，另一方面讨好强大的中国又对他们有利。当美国对北京采取敌对态度的时候，他们害怕投票赞成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受到惩罚。现在我们自己要跟中国和解，他们就不再怕美国的惩罚了。基辛格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在思索着。

电讯员又送来电讯稿，白宫要他在回国途中在阿拉斯加停留，以免在联合国表决的这一天回到华盛顿。基辛格立刻就品味出这份电讯的含义：实际上是说他的北京之行要对美国在联大的失败负责。他回想起上个月即将公布第二次北京之行前夕，罗杰斯和他的争论。毫无疑问，他判断得出，这一定是罗杰斯施加了压力，白宫才叫他在阿拉斯加停留的。

停就停吧。秋末的阿拉斯加已经十分寒冷。基辛格及其助手们心情都十分颓丧。一个个都沉默着。

基辛格一行从阿拉斯加飞回华盛顿，降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一个偏僻的角落。天低云暗，机场上冷冷清清，没有记者，没有摄影师，只有个别工作人员来迎接。跟三个多月之前，基辛格第一次赴北京归来相比，那次总统亲自热烈地在圣克利门蒂西部白宫的机场迎接；这次就显得太冷落了。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飞机抵达以后，这一行人本来还怀有几分英雄载誉归来的情绪，一下飞机，就被一股莫名其妙的冷风刮走了。基辛格还联想到，“七·一五”公告以后，自己名声大震，声望日高，已经有种种迹象表明，总统对此显示出不安，有一家报纸还瞎凑热闹，说基辛格的名望已经超过了总统，这无异于给本来已经不安与恼火的总统火上加油。

走下舷梯后，扑面的冷风使洛德伸手把外衣的领口紧了紧。霍尔德里奇则脸色阴沉地对基辛格说：“看来，他们将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美国的失败归罪于我们去北京的访问。”

基辛格嘴角泛出一丝苦涩的笑。他继而又想，北京取得联合国的席位，这到底是不可逆转的历史的决定，只不过比预料来得早一些罢了。中国的哲学中就说过有所得必有所失的哲理，打开了神秘的中国之门已经是难能可贵的成功了。他想，尽管尼克松可能脾气乖戾、气量狭小，他也不致于拿即将到手的胜利或者他的外交政策的关键因素来冒风险的。

组团去纽约

这次联大表决结果，也是出乎我国领导人意料之外。他们也估计在一年或两年之后才能恢复在联大的席位，所以还没有一点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0月24日，基辛格在会谈中问及周恩来对美国“双重代表权”提案的观点时，周恩来说：“对中国来说，台湾的地位比联合国的资格重要得多。中国不会按照‘双重代表权’的方案进入联合国。中国人有的是耐心，还可以继续等待。”

送走了基辛格，周恩来稍事休息以后，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外交部党组及有关人员讨论联大问题。主要是讨论派不派人出席正在纽约召开的26届联大？国民党的代表已经带着他的三个顾问悄悄地收拾文件包离开了联大会场，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联大的席位已经空出来了，我们去不去？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已经发来电报，请我国派代表团去出席联大，我们去不去？

在当时的特定情景下，“左”的阴影还笼罩在中国土地上。那里，对联合国这个机构的认识也不能不带上“左”的色彩。当时，一般人认为联合国大会是资产阶级讲坛，是受美苏两大国操纵的，认为这不是民主的讲坛，不能真正为受压迫民族与受压迫人民讲话的。当时，外交部党组织经过商量，决定不去，准备回一个电报给吴丹秘书长，感谢他的邀请，我们也很高兴，

并说早就应该恢复我国在联大的合法席位；但是，中国决定目前不派代表团去参加。

当天下午，正在大会堂讨论去不去的时候。毛主席给周总理来电话，询问此事。周恩来汇报了讨论的情况，及外交部党组的意见。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另一个就是恢复联大席位。”

周恩来说：“我们刚才曾经考虑让熊向晖带人去摸一摸情况。”

毛泽东说：“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作团长，熊向晖可以作代表或是副团长。开完了大会还可以回来。”

那时，外交部国际司由最冷清的司于一夜之间变得特别重要了。

“乔老爷”就是乔冠华。经毛泽东明确指示与点将，代表团的组团工作在高度紧张、繁忙中进行。这是中国第一次到联大向全世界亮相，组团工作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代表团人员都报经毛泽东主席亲自审定。还经毛主席同意，委派高梁带领一支由5人组成的先遣队去纽约打前站。当高梁率领先遣队到达美国时，引起的轰动与关注，就好像外星来客一样，西方各大报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加以报道。

乔冠华连续数夜赶写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稿。他一边喝茅台酒，一边凝思挥毫写就，最后送毛泽东、周恩来审定。乔冠华书写这篇发言稿，特别感到扬眉吐气，为之振奋。他在1951年，曾经跟伍修权一块代表中国去纽约参加联大；那是当时美国操纵的联大指责我们侵略，伍修权、乔冠华是代表中国去控诉的。这次，事隔20年，乔冠华又去联大，是以常任理事国代表团团长身分去对全世界发言的。他的声音将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声音。

乔冠华离京前夕，当时还在患病的陈毅设家宴为他饯行，驻法国大使黄镇也来作陪、祝贺。陈老总为乔冠华饯行，表示他对中国外交打开了新局面的热烈祝贺和由衷的高兴。陈老总和乔冠华在外交部共事多年，尤其是“文化革命”这几年患难与共，使他俩感情笃深。

开始“文革”动乱的时候，造反派高喊“打倒陈、姬、乔”。到1971年的时候，姬鹏飞、乔冠华已经恢复了工作。陈毅受到林彪的迫害，处境还十分艰难。但是陈老总尽管身处逆境，仍然关注国际形势的新动向与中国的外交工作。林彪曾经一席剥夺了陈毅看外交部文件及新华社《参考资料》（即“大内参”）的权利，也阻挡不住陈老总对党、国家和人民的一片赤诚之心；1969年在老帅讨论国际形势的座谈会上，陈老总顶着“左”的压力，不顾个人安危，向中央提出过打开中美关系的提议。在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期间，毛泽东听有人还不准陈毅看外交部文件，指示要让陈老总看文件。当时，外交部大楼里盛传陈老总即将重新恢复外交部的工作，这反映大家的心情：盼望陈老总能在我们外交有新起步的时候回来主持工作。

1971年7月，基辛格第一次访华时，患肠癌的陈毅与患肺结核的乔冠华

都住在 301 医院治疗。他俩在医院里推心置腹，不仅畅谈了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也谈论了许多关于林彪的话，那时，林彪还在台上。9 月初，乔冠华病愈出院。“九·一三”那天，周恩来将乔冠华与《人民日报》社崔奇找去准备写关于“九·一三”事件的声明。乔冠华首先想到了为林彪迫害得最苦的陈毅，他特地到 301 医院，面露喜色地悄声告诉陈毅：“老总，你不是讲‘好有报，恶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么？我今天特地来告诉你，报应到了！到了！因为有纪律，我还不能明说。先让你高兴高兴！”

陈毅盯着乔冠华。从乔冠华脸上流露出的从来未有过的喜悦神态，陈老总猜出了五、六成，惊喜地问：“真的么？”

乔冠华只是笑说：“我只能让你高兴，我还不能回答。”

陈毅受到乔冠华情绪感染，也笑得很开心。

过了几天，中央将“九·一三”事件正式通知了陈毅。乔冠华又特地赶到医院，将那首改唐人诗的新“塞上曲”“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吟给陈老总听。陈老总听罢，连声叹绝，两人相对放声大笑。以致使不知内幕的值班护士感到惑然。

在陈毅的家宴上，张茜为即将飞赴纽约的乔冠华开了茅台，当时已遭癌细胞深深地侵蚀肌体的陈毅遵医嘱不能饮酒，为了庆贺进入联大与林彪倒台两大胜利，陈毅还是和乔冠华频频干杯。

中国代表团走进沸腾的联合国会场

11 月 11 日中午中国代表团一行 50 多人在乔冠华团长、黄华副团长的率领下，乘飞机到达纽约。这是众多友好国家的代表、美国友人、爱国华侨翘盼已久的一天。机场上早就等待着欢迎的人群，其中有 23 个提案国和所有友好国家的代表，有联合国秘书处的官员和纽约市长的代表，有华侨、华人代表，还有 400 多名驻纽约的各国记者，他们聚集在专门架设的台架上，摄影机不停地在响着，照着。

下飞机后，代表团正、副团长向前来欢迎的人们一一握手，表示感谢。团长乔冠华在机场发表了讲话。他谈到：我国代表团将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的代表一道，“为维护国际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共同努力”。他也向美国人民表示了良好的祝愿，“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我们愿借此机会，向纽约市各界人民和美国人民表示良好的祝愿。”他的讲话虽简短，却立刻引起了热烈的鼓掌和极好的反响。人们认为，这反映了中国代表团的“积极态度”、“温和调子”，认为中国人“和蔼可亲”。

在代表团从机场到旅馆的途中，有大批记者和群众尾随，也有人驾车跑在前面向代表团欢迎招手。在旅馆，华侨各界送来的大批花篮已摆满走廊。代表团将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交给旅馆经理，请他挂在旅馆大门口。马

路对面马上挤满了观看五星红旗升起的人群。

代表团听说，在更早些时候，也就是当天清晨，就有几百名爱国华侨、华人举着毛泽东主席的像和五星红旗，打着写有“热烈欢迎我们祖国的代表”的横幅标语，聚集到机场欢迎代表团。他们不光来自纽约，有的是特地从其他城市赶来的；其中有老人，也有儿童，也有一些美国友好人士的代表。美方出动 100 多名警察，借口“安全问题”不让他们同代表团接近。先遣小组知道这情况后，即刻来到机场警察指挥处，强烈反对他们的这种措施。经过交涉，才做出了妥当的安排：中国代表团离开机场时在华侨的队伍面前经过。这样，既适当满足了华侨渴望想见祖国亲人的心情，也让代表团有机会向侨胞们招手致谢。

代表团到达后立即开始紧张的工作。正、副团长拜会了正在医院养病的秘书长吴丹，向他递交了出席联大的代表证书；拜会了本届联大主席、印尼代表马利克，以及 23 个提案国的许多代表。乔冠华对马利克坦率地表示：中国代表团对联合国当前的情况还不十分熟悉，因此还不能立即像大家所期望的那样积极活动。这种审慎立场和谦虚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71 年 11 月 15 日，是联合国历史上又一个大有意义的日子。

上午 10 时，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会议大厅。热烈欢迎的气氛顿时弥漫整个会场，形成本届大会的又一高潮。许多代表拥上前来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批代表握手，并且纷纷报名要求在会上致欢迎词。由于发言者十分踊跃，大大超过预定人数，原定半天就结束的大会，在中午稍事休息后，下午继续开下去，一直开到傍晚 6 时 40 分，先后历时 6 小时，破当年联合国大会的纪录。

当天，致欢迎词的共有 57 个国家的代表。有的代表由于时间不允许，还做了书面发言。他们的发言都热情洋溢，气势宏大，深为感人。他们用美好的语言盛赞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指出多年来把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和从百年屈辱中站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是最不公正的行为。他们说，现在联合国终于纠正了这一严重错误，正义的立场终于胜利。一、两个国家随心所欲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各国的霸道行为，终究是行不通的。他们强调，中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使联合国遵循的普遍性原则得到体现，使联合国宪章得以维护，使这个组织“恢复了活力”，“恢复了威信”，增加了它“缔造和平的力量”，也使大家增强了信心。

会上，一些非洲国家的代表还就美国报刊指责他们 10 月 25 日在会场内外快乐欢笑和舞蹈进行了理直气壮的反驳。坦桑尼亚代表萨利姆指出：这些都是非洲国家以“恰当的方法自发地表示出他们的满意心情”，谁也无权限制；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主权国家，“我们绝不会为我们的快活表示什么歉意，因为这是一个早就该取得的胜利，这是联合国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他们的发言向世界宣告，中小国家也在联合国讲坛上敢于扬眉吐气了。

乔冠华团长登上讲台。他发表讲话，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一系列重大

国际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他希望联合国宪章的精神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他再次宣布中国将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共同奋斗，他讲话后，会场上掌声经久不息。许多国家的代表再次来到中国代表团座席前，亲切握手祝贺。这篇讲话，被共同社记者认为是“不折不扣地在联合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演说之一”，其反响波及全世界。

布什代表美国欢迎中国

美国政府多年来一直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已成定局，且是大势所趋，加上中美关系此时开始解冻，尼克松也即将访华，于是，美国人采取了现实的态度，必须和中国代表接触。

但是，这第一次接触怎样开头呢？

在中国代表团出席大会的前一天晚上，联合国礼宾司司长科尔莱向中国代表团透露，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乔治·布什（上届美国总统）很愿同乔冠华团长在会前先见一面。科尔莱同时具体安排了中国代表团第二天早晨进入大会会议厅的路线。中国代表团很快发觉了其中有文章。当11月15日上午中国代表在科尔莱陪同下按既定路线走向大会会议厅时，布什果然也在会议厅门外的走廊上与人“随意聊天”。科尔莱随即将布什介绍给乔冠华。两国代表握了手。这件经过巧妙安排的会见立即在会场内外传为趣闻。就在这次大会上，布什以东道国身份发表了简短讲话，欢迎中国代表。他说，中国代表来到后，“联合国将更能反映世界当前的现实情况”，说包括美国在内，大家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的历史时刻来到了。”

一星期后的11月23日，当中国常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黄华第一次出席安理会会议时，又出现了同联合国大会上一样的极为热烈的欢迎场面。安理会成员国的代表们一个接一个地致欢迎词，热切期望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更加发挥她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

经过22年崎岖的外交历程，中国人民的合法权益终于被恢复和承认，新中国从北京走向纽约，走向世界，以其固有的丰采展现在国际舞台上。

第十节 “老朋友”的保证

周书楷发出“警讯”

在微妙的中美外交“小步舞”刚起步的时候，台湾就十分敏感地察觉到此事对自己的不妙。但真正准确判断出美国在旋转中要与自己拉开距离，是尼克松下令第七舰队停止巡逻台湾海峡，他的借口是美国经济困难。这对台湾当局来说等于是一个晴天霹雳。1970年7月15日，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得悉这条消息后，震惊得几分钟内说不出话来。后来他说：“我简直不相信我的耳朵”。他受台湾当局命令，立即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强烈抗议”。翌日上午，台湾“外交次长”杨西昆匆忙约见美国“大使”马康卫，指责尼克松的举动是“最不友好的行为”。但尼克松并不为之所动摇。

基辛格访华，使台湾当局倍感自己已面临冒险或毁灭情势，唯有以冒险以求生存，决不可坐待毁灭。当务之急，是阻止尼克松访华。于是，“外交部长”周书楷公开叫嚷：“如果魔鬼能救我的国家，我也会与魔鬼握手。”联苏举措，呼之欲出。

对台湾当局发出的这种警讯，华盛顿当权者当然不能等闲视之，台湾毕竟是美国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政府决定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台湾进行安抚。1971年8月14日，美国众议院议长艾伯特赴台北，转告尼克松关于美国不会抛弃“老朋友”的保证。10月，尼克松又派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里根作为私人代表再赴台北，向蒋介石转交美国总统信件，重申美国“完全恪守”同台湾缔结的条约。特别是1972年1月，美国国务院公开宣称美、台“所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无限有效”。这是给台湾当局吃了定心丸。

1972年2月16日，基辛格在尼克松启程访华前约见沈剑虹谈话，基辛格说：“希望台湾不要对尼克松访问发表任何官方评论，华盛顿和台北不要恶言相向，台、美之间关系不会因尼克松踏上中国大陆而有所改变。”

尼克松率先与周恩来握手

2月21日，北京的气候同美国一样阴冷。当尼克松乘坐的“76精神号”专机飞越太平洋出现在人民共和国首都上空时，正巧太阳冲出了厚积的云层照射到大地上。尼克松从舷窗向外眺望，田野是一片灰黄，小村镇就像他看过的图画里中世纪的村镇一样。

上午11时10分，尼克松总统的副机到京，美国人做事相当认真，元月3日，总统国家安全副助理黑格就带了一个庞大的先遣技术小组到北京。他们在首都机场建立起一个电视转播台，并进行其它准备工作。先遣组为总统座机确定将要滑行的路线、停放的位置。机门朝哪个方向打开？总统从哪个点下飞机？舷梯放在哪个角度？这一切，都用皮尺量好，然后划上标志，固

定下来。就连飞机的前轮将停在哪儿块地板上，主轮压在哪个点上，都测量后做上记号。

间隔 20 分钟以后，总统专机平稳地停定在候机楼前。舱门开了，穿大衣的尼克松与其穿红大衣的夫人帕特两人走出舱门。出乎这位美国总统的意料，机场的欢迎是冷调子的，没有欢呼雀跃的群众，没有迎接国家元首的红地毯，没有礼炮。只有一面美国国旗，和一面五星红旗并排在机场上空飘扬。

由于当时中美尚未建交，中国只能以附合这种情况的礼遇接待这位第一次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周恩来站在舷梯脚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盖不住他的瘦弱。紧随他身后的是李先念、叶剑英等领导人和包括各界代表的百余人，没有外国驻华使节。

当尼克松下到舷梯快一半时，周恩来带头开始鼓掌。尼克松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

当尼克松走完梯级，离地面还有三、四级台阶时，便经微笑着伸出他的手，周恩来那只手也伸了出来。俩人紧紧地握着手，轻轻地摇晃着，足足有一分多钟。周恩来说：

“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 年没有交往了呵。”

尼克松日后回忆：“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待尼克松和周恩来的历史性握手圆满结束，随着通讯卫星向全世界实况播出，这时，罗杰斯、基辛格、霍尔德曼等代表团成员，才获准涌出机舱，走下舷梯。

原来，特别重视电视的神奇作用的尼克松已经下令对电视转播作了精心的计划安排。中美两国隔着太平洋遥遥相望，在时差上，中国的北京时间比华盛顿时间早 13 个小时。中国每天上午的活动可以在晚上电视的黄金时间传到美国，晚上的活动又可以在早晨的电视上作实况转播。因而，尼克松特意安排他到达北京的时间是 21 日上午 11 点 30 分，也即是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星期日晚上 10 点 30 分，正是电视观众最多的时刻。

为了突出美国总统到达北京这一历史性镜头，尼克松和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早已决定：当电视摄像机拍摄尼克松走下舷梯第一次和周恩来见面与握手时，镜头里美方应该只有总统单独一个人。他要纠正传闻中 1954 年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的失礼行为；此时，不能有其他美国人在电视镜头中出现而分散观众的注意力。就连罗杰斯和基辛格这样的人物，也被告知要留在飞机上，直到总统与周恩来握手结束。但是，霍尔德曼还是不放心，还特别委派一名强壮高大的副官待总统一走出机舱就挡住飞机的通道。于是，当尼克松走下舷梯时，身后不再有人跟随出来，不像往常国家首脑来访时常见的，代表团成员及随员们会尾随着元首沿舷梯鱼贯而下。长长的舷梯只有尼克松与夫人两人迈步走下来，仿佛偌大的“76 精神号”专机只载着他们俩人。

尼克松被介绍给所有中国官员，然后站在周恩来的左边，这时军乐队演奏两国国歌。

周恩来陪同尼克松检阅仪仗队。仪仗队的士兵一个个身材高大健壮，衣着笔挺，精神抖擞。周恩来和尼克松在长长的威武的队列并踏着节奏鲜明的步伐走过时，每个士兵都神态昂扬地微微转动着头，行着注目礼，使人觉得庄严、肃穆、兴奋。

周恩来和尼克松同乘一辆防弹红旗高级轿车进城。当车队驶至长安大街时，尼克松心里还满以为真正的欢迎仪式可能在天安门广场等待着举行。尼克松在白宫作访华准备时，观看过天安门前人山人海向毛泽东欢呼的纪录片镜头，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他在飞机上曾经想过，要是他受到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的欢迎，那么，盛况将不亚于他在贝尔格莱德和布加勒斯特受到的接待。可是，车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时，广阔的广场空无一人，据说许多行人被挡在横街小巷里。尼克松的希望落了空。他的心情有点黯然。他注意到连大街也是空的。

这时，周恩来一一将天安门广场的主要建筑指给尼克松看：“这是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在这里会见群众。那是人民大会堂，人民代表开会的地方……”

尼克松“哦、哦”应着，看着窗外。他是觉得有点冷淡；但是，外表没有明显地流露出他内心的感觉。

尼克松住入 18 号楼

汽车很快驰入钓鱼台国宾馆。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在尼克松与基辛格及白宫来的工作人员下榻的 18 号楼等候。

18 号楼被人戏称为“元首楼”。它是一座二层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建筑物，建筑面积约 4000 平方米，楼身洁白，飞檐绿瓦，门前悬挂着盏盏大红灯，有一种非凡的气派。

元首楼一楼有一处 328 平方米、布置精美的室内花园，厅内铺着绒毯般的塑料草坪。花园的东南、西北角分布着造型优美又形态各异的山石和水池，水池中喷泉飞花，金鱼攒动。池边围种着四季花木有山茶、棕竹、散尾葵、兰草、杜鹃、梅花、玉兰、芭蕉等。由于这里无论是那个季节都显得妩媚可爱，生气勃勃，所以被称为“四季厅”。

步入宾馆后，大家在会客厅摆成大圆圈的沙发上就坐，周恩来在叶剑英、姬鹏飞、乔冠华等官员的陪同下，一一招呼了美国代表团的每一个成员，他在寒暄中还经常开几个玩笑，显出自信与轻松。让尼克松第一次亲自领略了周恩来的风度。

午宴结束后，尼克松一行人各自回住房去盥洗。

罗杰斯和国务院的人员住在不远处的一幢稍小的 6 号楼，基辛格前两次

来访时在这幢楼里住过。

从住处的安排上能体察出周恩来很熟悉美国的国情，知道美国行政机构内部奇怪的相互制约和平衡。

刚一会儿，周恩来来找基辛格。他俩在会客室刚见面，周恩来不像往常一样先开玩笑，直接说，“毛主席想会见总统，请你也一同去。”

尽管毛泽东要会见尼克松，这是有所准备的；基辛格却没有料到安排得那么快，他内心还是很高兴，却控制住没有明显流露出来。他想到周恩来没有提到请罗杰斯国务卿一块去，他也不打算问，他想到的是自己能干的助手洛德，便问：“我能否带助手洛德去作记录？”

周恩来点头同意了，语气有点急：“主席已经请了总统，主席想很快就和总统见面。”

基辛格知道毛泽东和他所蔑视的历代皇帝一样深居简出，神秘莫测。据说，没有人能事先和他约定见面的时间，他的召见都是突如其来的。因而，基辛格马上去请尼克松。那里，尼克松正想洗一个淋浴，饶有兴趣地欣赏着卫生间。他听说当年赫鲁晓夫做为第一名客人住进了总统套间时，曾抱怨卫生间的浴池太小了。难以容下他自由的想象。细心的周恩来知道之后，马上请人重新设计，着实改造了一番，才成今天这种样式。

毛泽东驾驭整个会晤

打开中美关系的决策是毛泽东主席作出的。他对尼克松的来访很重视。尼克松刚吃完午饭，毛泽东就决定会见尼克松。

高级红旗轿车穿过西长安街，驶进有两个解放军士兵站岗的新华门，绕过红墙，经过安静无人的甬道，驶至“游泳池”。

14时40分尼克松与基辛格在周恩来的陪同下走进这个四合院，穿过一条宽过道，绕过一张乒乓球桌，进入了毛泽东的书房。

基辛格后来对毛泽东的书房作了如下的描述：

……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有一张简易的木床。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一个俭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具太贵、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沙发的后面有两盏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在毛泽东座位的右前方是一个痰盂。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在我最后两次见他时，他需要两个护理人员搀扶，但他总是要站起来欢迎客人的。

毛泽东站起来，微笑着望着尼克松。他虽然大病初愈，但眼光锐利，神态略带嘲讽。他说话已经有点困难，但他并不避讳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

他患了支气管炎与肺气肿，经常喘息，咳嗽，吐痰，所以他的脚边摆着大痰盂。他的病是他长期大量吸烟所致。他曾经遵医嘱努力戒烟，但是戒不掉。

他朝尼克松伸出手，尼克松也朝他伸出手，两人紧紧地握手了。尼克松将左手也搭了上去握着，毛泽东也将左手搭上去握着。俩人都笑了，两个人的四只手相叠在一起握了好一会，大大超过了正常礼节的握手时间。是不是他俩都想将 20 多年由于相互敌视而失去的握手机会都弥补回来呢？

毛泽东也和基辛格握手，上下打量着基辛格，还用下颏点了点头，说：“哦，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博士基辛格。”

基辛格笑着说：“我很高兴见到主席。”

基辛格感觉到，除了戴高乐以外，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这个身旁有一名女护士协助他站稳的高大魁梧的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力量和权力的巨大的作用的见证。

毛泽东很随便地谈起话来。他对尼克松说：

“你认为我是可以同你谈哲学的人么？哲学可是个难题呀。”他开玩笑地摆了摆手，把脸转向基辛格，“对这个难题，我没有什麼有意思的话可讲，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

当尼克松在列举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国家和地区就国际问题谈论具体细节时，毛泽东又摆了摆手，指着周恩来说道：

“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我谈哲学问题。”

毛泽东接着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我们两个国家不存在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所以我们两家怪得很，过去 22 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打乒乓球起不到 10 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算起两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来往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死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

毛泽东说：“你们下午还有事，吹到这里差不多了吧。”尼克松表示，他这次来访是冒很大的风险的，作出这次决定实属不易，他懂得“只争朝夕”。毛泽东说：“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然后握手告别。

半个多月以后，当基辛格在白宫他那安静的办公室里，细心琢磨毛泽东

和尼克松谈话的纪录时，他发现毛泽东谈话中实际上已经勾划出了上海公报的内容。他注意到，公报里的每一个段落，在毛泽东和尼克松的谈话里都有相应的一句话。怪不得在那以后的一个星期的谈判中，所有的中方人员，特别是周恩来总理，都反复地引述毛泽东谈话中的主要内容。

在毛泽东会晤尼克松后的几小时之内，中国就向外国新闻界提供了面带微笑的毛泽东和咧着嘴笑的尼克松会见的新闻照片和电影。这种作法表明，毛泽东本人很快赞扬了尼克松的访问。

周恩来的即席表演

2月21日晚，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宾主云集。尼克松及夫人、基辛格等由周恩来陪同坐在可以容纳20人的主宾席的大圆桌旁。

在中国人的宴会上，无休止的祝酒是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内容。招待尼克松、基辛格这样的贵宾用的茅台酒据说已贮存30年以上。当服务员将那古雅的小口白陶瓷酒罐打开，一股特殊的芳香悠悠溢出，沁向四周。

“这就是驰名中外的茅台酒，酒精含量在50度以上。”周恩来举起面前的一个小酒杯向尼克松介绍。当时的国宴，每个客人面前至少摆上大、中、小三个酒杯，每个酒杯都斟得满满的，其中必有国酒“茅台”，其余的是各种名牌葡萄酒，另外还要上桔子水、矿泉水。

“我听说过您讲的笑话。说一个人喝多了，饭后想吸一支烟，可是点火时，烟还没有吸燃，他自己先爆炸了。”尼克松讲到这里，不等翻译译出，自己先笑了。

周恩来也开怀大笑。他当真拿来火柴，划着之后，认真点燃自己杯中的茅台酒，用愉快的声音说：“尼克松先生，请看，它确实可以燃烧。”

蔚蓝色的火苗闪烁着，周恩来的目光也在闪烁。酒杯里的火苗越燃越小，终于渐渐燃尽。周恩来的目光也出现了瞬间的迷茫，一副怅然若失的淡淡的伤怀鲜明地浮现在脸上，却稍瞬即隐地逝去，眼睛重新一亮，显示出内心的火焰还不曾熄，他带着若有所思的神情望了尼克松一眼，含义无穷地点了点头。

周恩来的表演将尼克松总统迷住了，尼克松回到华盛顿以后，曾得意地向他的女儿特里西娅表演茅台酒的利害，当他把一瓶茅台倒在碗里，点着了火。岂知蓝色的火焰跳跃着，竟不熄灭，他大力骇然；碗炸开了，吐着火苗的茅台酒流满了桌面。基辛格曾经幽默地提到此事，“美国第一家庭的成员奋勇协力，慌忙救火，才把火扑灭，防止了一场国家的悲剧。否则的话，尼克松政府会自作自受地提前收场，比实际发生的会更早些。”

做完茅台酒的表演后，周恩来端起了服务员新换上的酒杯，茅台酒早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已扬名四海了，但是，1972年2月21日，星期一的晚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宴上，电视摄像机拍下了周恩来与尼克松

满脸喜悦地用茅台干杯的镜头，并向全世界播送，更使茅台酒伴随着这个历史性的“干杯”而名震世界。尼克松对于这种干杯的动作不是十分熟练，在举着酒杯与周恩来碰杯的一刹那，举杯的那只胳膊还要往上一耸。

宴会中，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尼克松他使用筷子的熟练技巧。周恩来对尼克松夫人帕特称赞：“总统和你都能熟练地用筷子。”

帕特笑着说：“为了来中国，我们在白宫都学着用筷子呐。”

据说，早在半年前，尼克松就把他餐桌上的刀子、叉子换成了中国的筷子。

双方祝酒后，周恩来举着杯到每一宴席去绕圈子，向美国官方代表人员逐一敬酒。清脆的碰杯声在餐厅里响个不停，像轻风吹拂下的巨大的枝形吊灯上的那些流苏和水晶坠儿的叮咚之声一般悦耳。

可是，只要有人稍一留意便会发现，周恩来祝酒时，说着“干杯”，却一次也不像过去那样痛快豪爽地喝干杯中酒。他只是“舔酒”，用嘴唇轻轻沾一下杯沿，然后礼貌热情地向对方致意，用一个微笑和注目的眼光替代了干杯的动作。

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时，酒杯仍然是满的。

尼克松一次又一次朝周恩来的酒杯投去目光，终于问了一句：“我听说您的酒量很大？”

周恩来笑了笑，带着回忆的神情：“过去能喝。红军长征时，我曾经一次喝过25杯茅台。”周恩来把酒杯捏在手指间，注目着转动酒杯，“比这个杯子大。”

尼克松吃了一惊，继而疑惑地问：“可是今天你没喝？”

周恩来点头：“年龄大了。医生限制我喝酒，不能超过两杯，最多三杯。”尼克松说：“我在书里曾经读过这样一段故事，说红军长征途中攻占生产茅台酒的茅台镇，把镇里的酒全都喝光了。”周恩来眨动双眼，目光里流露出对往昔的眷恋，说：“长征路上，茅台酒是被我们看作包治百病的良药，洗伤、镇痛、解毒、治伤风感冒……”

“让我们用这个‘万应良药’干杯。”尼克松举杯。周恩来举杯。这一次他干了杯，因为客人先干了杯。席间，指着摆放在桌上的熊猫牌香烟盒对帕特说：“我想送给你这个。”

帕特大为吃惊：“你说……烟么？”

周恩来笑了，向帕特解释说：

“不，不是烟，我说的是熊猫。我们要送给你们两只熊猫。”“哦！”帕特惊喜地对尼克松说，“理查特，周恩来总理说送给我们两只熊猫！真的熊猫！”

这个镜头通过通讯卫星传到美国，正好是在早晨的新闻节目中播出。这天，在美国的街头，家庭里，办公楼内，企业里，人们都在议论着周恩来送熊猫。《纽约时报》评论说，“周恩来真是摸透了美国人的心思。”《华盛

顿邮报》评论，“周恩来通过可爱的熊猫一下子就把美国人的心征服了。”
后来，尼克松也决定送两只北部寒冷地区生长的麝香牛给中国。

第十一节 艰难的“基乔会谈”

台湾问题最为棘手

基辛格这次随尼克松访华，没有参加任何参观游览活动。他在上两次访华时已经看过这些名胜了。他曾风趣地开玩笑说，他是被细心的中国人用作试验的豚鼠，来试验时间安排和保卫措施，并看看这些外行的美国人在中国历史古迹面前作一些什么反应。这些时间，他主要是同乔冠华一块，躲在钓鱼台的宾馆里，逐字逐句地研究公报。

尼克松访华的会谈分三个层次进行。罗杰斯国务卿和姬鹏飞外长是一个层次，具体商讨促进双边贸易和人员往来，也就是华沙会谈多年来的问题。尼克松和周恩来之间的会谈又是一个层次，这是两国首脑的总会谈。第三个层次是基辛格与中国副外长乔冠华起草公报的会谈。这第三个层次的会谈是最为艰难的。

而台湾问题又是第三个层次会谈中最棘手的问题。尽管不少有争议的问题的措词大部分在十月份的会谈中已经基本解决，而且公报的构思已经肯定了；但是，关于台湾问题的双方措辞，分歧还是巨大的，针锋相对的。分歧虽然很大，解决台湾问题的基调却是两方同意的，那就是把最终解决留待未来，而这种未来将由公报建立的关系以及公报谈判的方式加以开拓。他们两人的会谈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基乔会谈”。

基乔会谈的第一天，2月22日，两人逐行审查公报现存草案，肯定已经达成协议的部分；然后，两方各自阐述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第二天，主要由基格介绍美国准备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中达成的协议。

第三天，2月24日，基乔之间开始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实质性谈判。两人针锋相对，争吵激烈；俩人都有学者风度，谈判风格又各不相同，基辛格辩辞逻辑性强，富于哲理，一腔带德国口音英语很难翻译；而乔冠华在雄辩之中思路清晰，思辩性强，原则当中豪爽豁达。

乔冠华提出的中国方案，美国观点是“美国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将逐步减少并最终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基辛格拒绝了 this 方案，说：“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的立场，我们把撤军说成是一个目标。即使这样，我们仍然坚持撤军跟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和缓和整个亚洲紧张局势联系起来。”

“但是，这个前提，必须是美国无条件的撤军。”乔冠华坚持说。

“这样做会破坏整个关系，美国公众舆论决不会答应的。”基辛格当然也不相让。

每到这个时刻，双方相持不下，都会把扯紧的弦放松，开一两句玩笑来冲淡紧张气氛，用友好的态度把巨大的决心掩盖起来，不致使个人关系过分紧张。两人的谈判艺术接近炉火纯青。

这时，乔冠华果然松了弦，说：

“博士，你是出生在德国，我是在德国获得的学位。从这点上，我们应该有共同的地方。可是，在哲学上，我喜欢黑格尔，你喜欢康德；这也许是我们不能取得一致的原因吧——”

乔冠华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四十年代跟美国人打过交道，朝鲜战争期间也参加过与美国人交锋的板门店停战谈判，他谙熟谈判艺术，善于掌握节奏；该犀利时，锋锐芒利，寸土不让；该徐缓时，和风细雨，开朗豪爽。数月以前，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二十六届联合国代表大会，风度迷人地坐进刚刚恢复的中国席位时，在各国代表的注目中，敞怀朗声大笑，表现了新中国进入国际讲坛的豪情。纽约某大报为此专门写了篇评论。题为《乔的笑》。基辛格与乔冠华在谈判桌上相互交锋论战，也相互洞察了解，两人竟成了好友，经常往来。

会谈取得突破

第四天，2月25日，这天上午尼克松参观故宫，当他看到两千年前死去的一位王爷穿的金缕玉衣时，说：“穿上这玩意儿就不好到处走动了。”当他看到一个皇帝为避免听到谏言而戴的耳塞时，开玩笑地说：“给我搞一副吧。”

这时基乔谈判，两人还是不着急，随随便便漫谈着交换意见，仍是各执己见。好像谈判根本没有最后时限，好像明天不必飞去杭州，后天也无须在上海发表公报。其实，这都是在用共同的办法向对方施加压力。到了下午，在乔冠华向周恩来汇报、基辛格向尼克松汇报之后。两人再碰头，双方都提出了新方案，作了让步，乔冠华提出，只要提到全部撤出驻台的美军，中国就不再反对美方表示关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基辛格提出，把全部撤军这个最终目标和美方在此期间逐步撤出军队这两个问题分开，以前是两点包括在一个句子里的。

乔冠华表示出了兴趣，提出修改个别词汇。他说，最好提和平解决的“前景”，而不要用“前提”。他说：“用‘前景’，含义更积极些，显示出是双方的意见；而用‘前提’听上去是华盛顿单方面强加的东西。”

基辛格也同意了，开玩笑说：“我看台湾命运不会取决于如此微妙的意思上的差别。”

基乔会谈在这时已经取得了突破，周恩来进来参加了半小时谈判。尼克松了解到中国人不喜欢搞小动作，喜欢诚挚坦率，他就坦率地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摆出了自己的难处。他说：“如果公报在台湾问题上措词过于强硬，势必会在美国国内造成困难。我将受到国内各种各样亲台湾、反尼克松、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外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交叉火力的攻击。整个的对华主动行动就有可能成为两党之间的争议问题。到时候，如果我不论是否由于

这个具体问题而落选，我的继任就可能无法继续发展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

周恩来了解了基乔会谈的突破以后，表示可以考虑美方经过修正的论点。周恩来请示了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尼克松也同意接受中方经过修正的论点。

公报文本最终落实

基乔在当晚尼克松的答谢宴会后，于 10 点半再次会晤。这次谈判十分顺利，只花了 15 分钟就解决台湾问题的措词问题，行文如下——

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决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台一中”、“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午夜，毛泽东批准了关于台湾问题的这一段。尼克松也批准了这一段。

接着，基乔两人继续会晤，把关于贸易和交流的部分加以扩充，把公报重新逐行研究了一遍，至深夜两点，也就是第五天的凌晨两点，公报文本落实了，大功终于告成。这几天以来，基辛格、乔冠华几乎没有睡觉。他俩都觉得如释重负，压力一消失，这才突然意识到疲倦、劳累和瞌睡，可是心情格外轻松和愉快。

第五天，2月26日，在飞往杭州以前，尼克松与周恩来在机场审阅了公报。尼克松是乘坐中国的“伊尔—18”涡轮螺旋桨飞机飞往杭州的。总统自己的“波音七—七”专机也跟着起飞。在起飞之前，公报的打印工作刚结束。

想不到因为公报问题，美国方面又横生波澜，把尼克松都几乎气疯了。

美国方面节外生枝

原来在去杭州的飞机上，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拿到了公报。他们看后，一路上嘀咕这份公报不理想。他们的不满是大有原因的。这次由罗杰斯国务卿带来中国的专家，都是一些职业外交家；在草拟公报的过程中，他们一点

都没有参加，对此难免会有看法。此外，没有参加谈判的人不熟悉谈判所经历的艰难，往往在自己的心中设立了一个理想的公报文本，并拿它同手头的打印文本进行对比；那样一来，意见就多了。到达杭州以后，罗杰斯对尼克松说公报不够圆满而交给总统一份材料，材料中列举了国务院的专家们对公报的一大堆意见，要求进行修改。例如，对“在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这句话提出了异议。说这话太绝对了，或许有一些中国人不这样认为呢。建议将“所有中国人”改为“中国人”。另一条建议是要去掉“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句中的“立场”二字。诸如此类的重要修改处，竟达15处之多。

在刘庄宾馆尼克松套房的客厅，尼克松穿着睡衣，走来走去，气得脸色都变了。他认识到自己在政治上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他要有所作为而采取了对华主动的行动，但那些保守派支持者对访华的反应已经搞得他够紧张的了。他害怕这些右派会攻击公报。他预见到，关于国务院对美国所作的让步不满的传闻，很可能成为导火线。他也知道。在已经通知中国人说他同意公报之后，又要求重新讨论，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中国人将怎么看待他这个总统。他除了气愤之外，感到特别痛苦的是，要解释这些修改建议的重要性简直是不可能的。

晚宴开始之前，他把基辛格叫来商量。基辛格也心情阴郁，坐在沙发上沉着脸说话：“罗杰斯他们提出修改的地方那么多，几乎等于推翻了重搞。他们讲你向中国让了步……”

“我批准了，毛泽东的政治局也批准了，我们又单方面提出修改，我们还有没有脸？！”尼克松近乎在吼叫。“你也知道，全世界都已经等着明天在上海发公报。”基辛格忿忿地说。

“看我不回去把国务院那帮家伙都收拾了！”尼克松火极了，“我哪能带一个分裂的代表团回国？天呐！”

“总统，要紧的是明天发布公报。”基辛格说。

尼克松沉默了好一会，铁青着脸来回走动。突然，他转身对基辛格说：“亨利，宴会之后你再找乔谈一谈。”“真难启齿呵！”基辛格脸有难色，还是应允了。当晚，杭州宴会的南方菜特别精美，嗜好美食的基辛格却没能好好品味，他在心里嘀咕着宴会之后怎么跟乔冠华谈话。晚上10点20分，乔冠华和基辛格举行会晤。乔冠华因为辛苦几天搞完了公报，心情也很好，宴会上喝得很痛快，脸上泛着红光，脸带笑容地坐下来谈话。

基辛格将精心琢磨了好一会的话说了出来：

“乔先生，在正常情况下，总统一拍板，公报就算妥了。但是这一次，如果我们仅仅宣布一些正式的主张，还未达到我们的全部目的；我们需要动员公众舆论来支持我们的方针……”乔冠华用点挖苦的口气开玩笑说：“博士这个‘公众舆论’成了你们的法宝了，动不动都拿出来用。”

基辛格委婉地说：“如果乔先生能够进行合作使我们的国务院觉得自己

也作了贡献，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你拐了一个大弯子，是想说贵国国务院对已经通过的公报文本有意见，要修改，是吗？”乔冠华爽朗地说。

“是的。是这个意思。”基辛格坦率地说。

乔冠华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尖锐地回答说：

“双方已经走得够远了，而且中国为了照顾美国的愿望已经作出了很多让步，听说尼克松总统接受了公报，昨晚，我们政治局已经批准了公报。现在离预定发表公报的时间不到24小时了，怎么来得及重新讨论呢？”

“我们总统确有为难的地方，乔先生，”基辛格知道中国人注重实际，他唯一的希望在于坦率，于是，将尼克松的为难境地简述了一番，诚恳地说，“希望你们能认真考虑。”

乔冠华暂停了晤谈，去找周恩来总理请示。

周恩来正在给上海方面打电话，询问上海方面接待工作的情况。周恩来放下电话后，乔冠华立即作了汇报。

周恩来太累了。尼克松访华期间，最忙的人就是周恩来总理，尼克松访华的一切活动安排，都是周恩来亲自掌管，所有的会谈讨论都由他亲自过问，还每天安排随时向毛泽东请示、汇报。他几乎没有睡过觉。顶多能够合眼皮休息个把钟头。

听着乔冠华的汇报，他瘦削的脸在柔和的灯光下棱角显得更为分明，只是眼睛还很灵，很亮。他很不在行地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就摆在烟灰缸沿。

乔冠华汇报完关切地说：“总理，你太困了。”

“你说说你的看法。”周恩来轻轻地将烟喷吐出嘴唇。

“他们内部不统一，又要我们作让步，我们已经作了很多让步了。他们美国人自己的矛盾，让他们自己消化吧。”乔冠华说。

周恩来的眼睛望了一下窗外，西湖岸边的灯光闪烁。今天晚宴之前，给罗杰斯那一班人当翻译的章含之找他作了汇报，说她了解到国务卿罗杰斯及其手下的专家们对已经达成协议的公报大发牢骚，还听说到上海后他们要闹一番。周恩来一直在考虑这件事。他对美国国情作过研究，对尼克松执政以来白宫与国务院的矛盾是有所了解的；他由此联想到，按职务，罗杰斯该排在基辛格前面，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时，罗杰斯没能去，难怪人家有意见。他还考虑，明天到了上海，要特地去看望罗杰斯，补一下课。

周恩来望着乔冠华，说：

“冠华，公报的意义不仅仅在它的文字，而在于它背后无可估量的含义。你想想，公报把两个曾经极端敌对的国家带到一起来了。两国之间有些问题推迟一个时期解决也无妨。公报将使我们国家，使世界产生多大的变化，是你和我在今天都无法估量的。”

乔冠华顿时领会了周恩来的含义，微笑说：

“总理，我明白了。”

周恩来又说：“我们也不能放弃应该坚持的原则，这件事，要请示主席。”周恩来当即拿起了红色的直通电话。

毛泽东听了汇报，想了片刻，口气十分坚决地回答说：“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它部分可以商量。”毛泽东停顿了一会，又严厉地加上一句话，“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于是，基辛格与乔冠华在刘庄宾馆又开了一次夜车。他们根据毛泽东所定的原则，对美国国务院专家们所提的意见，进行反复的推敲。直至凌晨二时，另一个“最后”草案终于完成了，当然，吸收了罗杰斯的专家们的一部分意见。草案再次提交双方首脑正式批准。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上海公报。

然而，天亮之后公报的命运又将是如何呢？基、乔两人很是担心。

第十二节 蒋介石举棋不定

尼克松乘坐中国专机

尼克松在北京度过5天，经历了紧张的秘密谈判、游览和出席公众活动。第五天，2月26日，按预定日程，到西子湖畔的杭州参观游览。

这次尼克松乘坐的是中国“伊尔——18”型涡轮螺旋桨飞机。

这是周恩来总理为尼克松访华所做的特殊安排。就在尼克松为了这次历史性的北京之行，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桌前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北京的毛泽东、周恩来也没有等闲视之。早在1972年2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周恩来听完各小组汇报准备工作后，专门讲了尼克松访问杭州、上海时要让他坐中国民航的飞机。因为以前尼克松在国外访问，从不乘坐东道国飞机。

“尼克松到了中国的土地上，就要听我们的安排喽。”周恩来的表情和语气都饱含着民族的尊严和自信。

他给民航下了死命令：“马仁辉同志、张瑞霖同志，这次专机任务可不同往常，你们一定要保证搞好呀！”周恩来十分清楚，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依靠周密细致的工作作风保障的。“你们从现在起，就要组织执行专机任务的机组试航。另外，除尼克松去杭州、上海的当天要试飞外，头天下午还要先试飞一次要确保万无一失！”

此外，周恩来又对机务和警卫工作作了具体指示：“要对机务人员讲清楚，专机必须进行全面认真的检查，待试飞后进行铅封。对警卫部队进行教育，告诉他们严加看守飞机，无关人员不得接近……”以后的几次开会，周恩来对接待工作的细节问题，都作了详细的指示，会上，有人提出：接待方针不冷不热，不卑不亢，不好掌握分寸，周恩来扑哧笑了：

“这有什么难呢？人家伸手，你就伸手过去，不要傲慢，也不要嘻嘻哈哈的嘛。”

运载美国总统的中国专机就要起飞了。机场上好不热闹：民航和空军出动了伊尔——18型、子爵号和云雀直升飞机3个机种、12架飞机。组织这样一个多机种、大机群的参观访问团，在中国还是第一次。

伊尔——18总理专机临时定为总统专机。为了保密起见，机号由216改为218。尼克松由周恩来总理陪同，坐中客舱。

总统自己的“76精神号”专机也跟着起飞。

周恩来巧喻“13”

由周恩来专机机长张端霖驾驶的伊尔——18型飞机，26日从北京到杭州。27日从杭州到上海。

当飞机降落在虹桥机场时，尼克松翘着的拇指对周恩来说：“飞得很好。”

周恩来面带自信地微笑，不卑不亢地回答：“这是我们自己培养的飞行员，我很信任他们。”

基辛格接过话头：“总统还是第一次乘外国飞机。因为中国最安全。”基辛格说话的神色，无不自豪，因为这其中也有他的一份功劳。中方当初做出这项安排时，美方曾有异议，基辛格深知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积极斡旋，说服美国方面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

上海是尼克松访华的最后一站。

尼克松总统一行下榻于著名的锦江饭店里。在上海这幢最现代化的宾馆楼里，尼克松夫妇被安排住在15层，基辛格住在14层，罗杰斯、格林和其他国务院官员住在13层。

2月27日，到达上海不久，周恩来总理特地去看望罗杰斯国务卿及其助手们。他走进大厅，走进电梯。电梯迅疾往上升。头顶的电梯标志牌上，“13”处亮着红灯。

周恩来望着标志灯，恍然大悟似地说：“怎么能安排他们住第13层？13呀！西方人最忌讳13……”

标志灯熄灭了，电梯门开了。

周恩来带着翻译走进罗杰斯的套间，听见谈“13”的声音戛然而止。罗杰斯手下的官员们正在房间里说话，大约是在发牢骚生气，一个个面有愠色。见周总理来了，罗杰斯朝他们示意，他们一个个只好客气地装出笑，极不自然。

周恩来伸出手，说：“罗杰斯先生，你好！”

“总理先生，你好。”罗杰斯跟周总理握手。

周恩来逐一地与国务院的官员握手之后，在罗杰斯身旁的沙发上泰然自若地坐了下来，说：“国务卿先生，我受毛泽东主席委托，来看望你和各位先生，这次中美两国打开大门，是得到罗杰斯先生主持的国务院大力支持的。这几年来，国务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尤其记得，当我们邀请贵国乒乓球队访华时，贵国驻日本使馆就英明地开了绿灯，说明你们的外交官很有见地……”

周恩来的话缓和了室内的紧张气氛。

“总理先生也是很英明的。我真佩服你想出邀请我国乒乓球队的招，太漂亮了！一下子就将两国疏远的距离拉近了。”罗杰斯笑着说。

“有个很抱歉的事，我们疏忽了，没有想到西方风俗对‘13’的忌讳。”周恩来转而风趣地说，“我们中国有个寓言，一个人怕鬼的时候，越想越可怕；等他心里不怕鬼了，到处上门找鬼，鬼也就不见了……西方‘13’就像中国的‘鬼’。”

众人哈哈大笑，周恩来也跟着笑。

周恩来走后，罗杰斯手下的官员们的气也消了大半。中国有句俗话，不看僧面看佛面。他们主要是对基辛格有意见，对尼克松的某些做法有意见。

如今周恩来代表毛泽东来看望，他们不但不便发作，而且对周恩来这个人，十分倾倒。后来，罗杰斯成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多次来中国访问。至今还对我国人民抱着友好的感情，这些都是从对周恩来的钦佩开始的。

当天下午，尼克松趁着基辛格为举行一次特别的记者招待会而在作准备的时候，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会。走进展览馆大厅，他的眼睛盯着几位共产主义领袖的大幅画像时，嘴里念道：“这是马克思，这是恩格斯，这是列宁，这是斯大林。”

“对，你都认识。”周恩来说。

“一共四个。”

“对。”

“那个恩格斯，我们在美国不大见到他的照片。”

尼克松在参观各种工业设备，他还伸手去按电钮，新式机床运转起来。他对周恩来说：

“我们按电钮，必须是为了建设，而不是为了毁灭。”

周恩来哈哈大笑。四周的气氛十分热烈。

尼克松兴致来了，又对周恩来说：“1959年夏天，我作为副总统在莫斯科陪同赫鲁晓夫参观美国展览会，在洗衣机前，他同我争吵谁的火箭厉害些，我讲比火箭没有意义，战争爆发谁都当不了赢家。”

周恩来笑得更大声，笑罢说：“我知道，这就是有名的‘厨房辩论’，它使你出了名。”

尼克松笑了，说：“我想不是坏名声。”他想了想，又半开玩笑地说，“总理先生，你不应该全信报纸上说我的坏话，我也不会全信报纸上说你的坏话。”

周恩来收住笑，对尼克松说：“我信奉毛主席说的一句有名的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下午5时，向新闻界公布了中美两国的《联合公报》，因为在上海发布，当时两国还没有外交关系，大家就称它为“上海公报”。

此后，下午5点50分，基辛格和助理国务卿格林在上海展览馆的宴会厅举行记者招待会。为给台湾方面及美国国内的反对派以“安慰”，基辛格煞有介事地在会上申明美国同台湾的防御条约并不变动，以表示“没有抛弃老朋友”。可是，这种形式主义的说明并没有引起记者们的兴趣；上海公报对世界的震动与冲击，使基辛格的解释黯然失色。

台对《联合公报》表示不安

尼克松访华，全球为之注目。在所有的关注者中，蒋介石最为尴尬。尽管与美国有约在先台湾不对访华恶言相加，但“中华民国”的面子总不能不顾。在尼克松一行到达北京的当天台湾当局“国大”会议立即发表声明，称

“戡乱”反共国策绝不改变，不承认中、美间任何协议，大陆中共是“叛乱集团”，无权代表中国。

由于《联合公报》中的措词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一语，尽管是中国方面的立场，但这也预示着美国政府对台湾“正统”地位的否定，台湾当局非常焦急。3月6日，台湾当局指示沈剑虹会见尼克松，要求当面澄清，以消除因《联合公报》引起的不安。尼克松要沈剑虹转告蒋介石：“美国决心遵守对‘中华民国’的承诺”，其中当然也包括共同防御条约继续有效。第二天，沈剑虹飞回台北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要的就是美国总统的保证，但这种保证与以前却是大不相同了。台湾这位“蒋总统”听完汇报后，感慨万千地说了一句：“从此以后，我们要比以前更依靠自己”。

蒋介石不敢贸然行事

蒋介石决定“与俄帝往来”。而苏联，对于台湾的基地，久已垂涎欲滴，也正趁美国调整其亚洲战略部署的机会，大肆扩张，以取美国的地位而代之。因此，蒋苏交易，本来可以一拍就成。但是蒋苏双方当时均有顾虑。特别是台北方面，顾虑尤多。

顾虑之一：当时美国并不是真的要退出亚洲，苏美从东南亚到东北亚的争夺正烈，即使美国中断美蒋关系，美国也不愿看到台湾成为苏联的战略基地。

顾虑之二：中国一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台湾，过去一直要美国撤离台湾和台湾海峡，假若中美一旦建交，美国宣布美蒋条约废弃而蒋介石公开投苏，中华人民共和国岂能放过他？

顾虑之三：大陆人民、台湾百姓、海外侨胞、以至国民党内有识之士，对苏联都无好感，蒋介石如一意孤行，势将引起群情汹涌，火山爆发。

因此，蒋介石左顾右想，还是不敢公然行事。为了替将来公开联苏铺路，蒋介石一方面继续同苏联秘密往来，暗中发展关系；另一方面，为了不激怒美国和平息岛内舆论，蒋介石撤换了曾公开鼓吹联苏的“外交部长”周书楷。

第十三章

南海风云激荡，中国舰艇穿越台控区。草山老人闭目轻叹：“西沙战事急哪！”一代枭雄，灵柩暂厝“慈湖”

第一节 台日断交

尼克松把日本撇一边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27分。尼克松乘坐的美国总统专机终于在北京机场停稳。片刻，尼克松从舷梯上走下来，这时周总理走上前去，紧紧握住尼克松的手。两位要人的握手，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美两国首脑的第一次和解。尼克松访华实况，通过电视卫星向世界各地进行了转播。日本首相佐藤荣坐在自己的官邸观看电视，他要看一看尼克松是怎样对待中国人的。

尼克松从飞机上走下来，和迎接他的周恩来握手，说：“Iamveryhappy。（我非常高兴）”

接下来就是检阅仪仗队……

佐藤站起了身子，失落的狠狠地关掉了电视。他一言不发地靠在沙发上，7个月前那件令人扫兴的事情又呈现在眼前。1971年7月16日上午，首相秘书递给首相一份美国送来的备忘录，上面写着：“尼克松总统将于明年5月以前访华”，发表时间为日本时间11时半。佐藤看看手表，指针已指在11时27分。佐藤首相认为尼克松把日本撇在一边，显然是一种不考虑友好国家立场出卖朋友的行为。佐藤首相心中暗暗叫唤“上当了”。

佐藤的态度自然是恼怒的。

谁知一群记者却紧追不舍，非要他谈谈对尼克松访华的看法。

佐藤一边往外走，一边说：“他自己不是已经说了吗？这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事业。他自己说了，别人还说什么？”

“他”，自然是指尼克松。

尼克松访华的消息使日本全国上下为之哗然。在收到《上海公报》后，外务省开始秘密地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做法律上的准备。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田中角荣竞选自民党总裁的。中日关系就成了自民党总裁能否当选的一个问题。

田中角荣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他当选了，并很快组成了新的日本政府。

“东风着意，先上小桃枝”。日本人接受新事物最灵敏。1972年7月24日，田中角荣宣称，他理解周恩来的“三原则”，即：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三、废止原《日中和约》。

台湾反映极为强烈：先是“行政院长”蒋经国、“外长”沈昌焕对日本提出警告；接着是驻日“大使”彭孟緝对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作专门拜访。还有，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张宝树在访问南朝鲜归途中，也特意绕道日本，想做些劝说工作。最后是蒋经国正式摊牌：

兹警告日本政府：停止一切损害两国邦交与危害亚太地区和平安全之行动，以免造成历史上之重大错误。

这类事先打招呼的话，外交上常见。有时也有效果，但多属大对小、强对弱，通常毫无效果。

台日关系由热到冷

台湾同日本的交往，也有一段由热到冷的过程，蒋介石对此用心尤多。

1950年2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同斯大林等人会谈，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再加上同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国际间两大阵营壁垒分明。严峻的局势，逼迫双方各自寻找各自的朋友。

1951年7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布《对日和约草案》，台湾未被列为签字国；12日台“外交部长”叶公超对美提出抗议；19日，陈诚引咎辞“院长”职，蒋慰留之；20日，叶引咎辞“部长”职，陈慰留之。

9月4日，对日和约会议开幕，台湾无代表参加，叶公超抗议；苏外长提议邀中华人民共和国派代表参加，美代表拒绝。杜勒斯在国会答称：中日和约由台湾或大陆签订，应由联合国决定。

1951年9月8日，在美国旧金山，日本与同盟国中的49个国家签订了《旧金山和约》（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3国拒签）；同日，美日两国也在旧金山签订了《美日安全保障条约》，日本也钻入了美国保护伞。19日，周恩来指责《旧金山和约》为非法。

几经周折，（一则，日本吉田茂内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顾虑；再则英国首相邱吉尔和外交大臣艾登表示反对），1952年2月20日，日本政府终于派出曾任大藏大臣的河田烈为代表与台湾叶公超在台北会谈“中日和约”。

这次双方会谈最大的争论点，是“和约”“适用范围”的问题，大陆已不在蒋的“治下”，又怎样去“贯彻执行和约呢？吉田茂首相很聪明，他的意见是：

应适用于现在中华民国控制之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

台湾当局不同意，要求将“或”改为“及”。

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各作让步：在交换照会中，双方同意在记录中明记

——“或”具有“及”字之意。

中国民间有一句口头禅叫“哄鬼”。

蒋介石原来的政治哲学是“攘外必先安内”。来台湾之后，“安”字用不得了，改称“反共复国”。但在国际间，“曲高和寡”，所以竭力在日本人身上做“合纵”的工作。他说：

本人于日本投降未几，则一再声称：中国对日本不采报复主义，而应采取合理的宽大政策，并谋对日和约的及早完成。

蒋这种“饥不择食”的态度，当然同美国在战后积极扶持日本的政策有血缘关系。前面提到的《旧金山和约》在它的第14条中还规定了战后日本应以“服务补偿”的方式赔偿中国损失。可是在这一次的双方会谈中，连“服务补偿”也“自动放弃”了。

1952年7月9日，河田烈在台北“中日文化协会”演说，赞扬“中日和约充分显示蒋总统宽大精神”。8月2日，蒋介石签署了《中日和平条约》。”旋派张群赴日作友好访问；9月18日，蒋的代表张群晋谒天皇；日皇对缔结和约极表快慰，尤感蒋“总统”之宽宏大度，誉为“亚洲伟大领袖”。蒋旋派董显光为驻日“大使”。

如此慷慨！如此大方！连日本的评论家都感到惊讶。《蒋总统秘录》的执笔人、日本《产经新闻》的编辑古屋奎二，也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在中日和约中未见有一个赔偿的字眼，乃是未见前例的条约。

抗战8年，（如果从“九·一八”算起，则是14年），战火烧遍20多个省市，中国死伤人员以千万计，财产损失无法算出来；而战后，中国不要一文钱的赔偿，这也是实行“民权主义”吗？

在历史上，中国曾三次被日本勒索战争赔款：

第一次是1874年。时日本派兵企图占领台湾，清政府派兵抵御，日本自知无法取胜，转而谈判，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日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偿付日本50万两白银赔款。

第二次是1895年的《马关条约》，清政府付给日本的白银总数相当于日本国财政4年半的收入。

第三次是1901年的《辛丑条约》，仅日本掠去中国的赔偿，就达3400多万两白银。

在第二次偿付日本战争赔款时，清政府财政经济已非常困难，不得不五次大量举借外债。最终偿借款本金和利息共达6.9亿多两白银，而且还为“举借外债”丧失了大量主权。

日本在20多年内就勒索了中国三次大赔款，用这些钱大办教育及建立起

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军工体系，1931年凭借其军事实力又打进了中国的国门。

向这个侵略成性、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害的战败国索取赔款有什么不应该！

东南亚受害国朝野并不同意蒋介石这位“亚洲伟大领袖”的搞法：

台日谈判期间，1952年3月25日，菲律宾参院反对批准对日和约，坚持索赔；

随后，香港也向日本掀起了索债运动；

1966年12月10日，马来西亚中华商会要求半年内解决与日本所结的“血债”；

1991年，南朝鲜为日本征用韩国“慰安妇”，要求日本予以战争赔偿。

蒋介石为了反共，所以就联日；为了联日，所以就牺牲民族利益，买来一个“宽宏大度”的“亚洲伟大领袖”。这种“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政策，不是“似曾相识”吗！

由于日本是一个在原材料供应和成品销售两方面都离不开国外市场、“以贸易立国”的经济大国，同时美国也害怕过多的日本商品流入美国市场，因此日美两国政府都希望日本能与中国大陆做生意。

从日本当局来说，同中国大陆进行贸易最理想的境界是“不谈政治、只管经济”的“政经分离”。可是：

“人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1955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以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为首的“贸易代表团”去日本，同以材田省藏为会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和以池田正之助为首领的“促进日中贸易议员联盟”签订了《第三次中日贸易协定》，其中有如下条文：

一、互相间举办商品展览会，并各取得本国政府同意——对于事务之执行与人员之往来，给予各种方便及安全保障。

二、互相在东京与北京设置通商代表部，对于各该代表部及工作人员给予外交官待遇的权利。

中日双方朝野上下心里都明白，这种往来已大大超出了民间协定的范围；“政经分离”是不好“分”的。

“春色满园关不住”。事物发展有其自身的轨迹，只可诱导，不可抑制。人为的：或视而不见，或掩耳盗铃，或咒它死亡，那都是缘木求鱼。传说，鲧治水，用的办法是封堵、围截，治的结果依然是“洪水滔天”；禹治水，用的办法是顺其自然，予以疏导，引江河入海，于是民安居乐业。

王阳明是这样解释“致知在格物”的，他说：

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所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

格得，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

阳明先生把人们的主观意识、主观努力的作用夸大了。夸大了就要办“鲛治水”那样的事，请看：

1956年4月14日，张道藩率“赶日亲善访问团”将赴日，蒋介石“属转告日本朝野，勿存与匪共存幻想。”蒋介石一“告”便可消灭那个“幻想”吗？何其自作多情！

1956年9月，蒋介石《答法国记者问》：

日本若干方面曾一再主张开放对大陆贸易，但余不信渠等能代表大多数日本人民或日本政府之态度。日本私人贸易商曾与匪帮签订若干贸易协定，但无堪称有何成效。日本经济之未来发展，实在于与自由亚洲国家及我忠实华侨合作，扩充其与东南工地区的贸易。

蒋介石挖空心思阻拦中日贸易的发展。在蒋的心目中，他害怕中共军事力量强大，也害怕大陆中国人民富裕。所以我们说，蒋“怀念大陆灾胞”是假的，提倡“仁爱为接物之本”，也是口是而心非。

如果说，在战后最垂青于蒋介石的，在美国为艾森豪威尔总统，那么，在日本则是岸信介首相了。1956年6月，岸信介亲到台北与蒋会晤，张群以“总统府秘书长”身份亲任翻译。首相此行，意在向蒋表明，他仍在推行“政经分离”政策，“希望予以谅解”。“有朋自远方来”，抚今追昔，蒋当是怀有无限感伤的。面对这位邻国首相，他可以充分为自己说项。蒋介石对岸信介说：

中华民国政府在大陆失败，搬迁到了台湾，地位较弱，固不容许言；而在日本除了有远见、有抱负的大政治家仍能了解台湾今日之重要性外，一般的人或已不堪重视。现在而谈中日合作，若仅就此观点而论，余甚感慨然。

以上是“感伤”。“依旧，依旧，人与绿杨俱瘦！”

不过，我们须得知道：现在苏俄对亚洲，有两个最紧要的目标，一为消灭台湾，一为赤化日本。此二目标如能达到，则其统治亚洲即无问题。所以中、日两国，断无一个灭亡而另一个尚能存在的道理。故此两个国家必须衷心合作，日本得到安全，中国又能反攻大陆。两国合作，方有真正力量。

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共同认定：

- 第一、苏俄是日本与中国共同的敌人。
- 第二、日本与中国一定要共同反共。

以上是“说项”。只差一点没有说出“沙陀帮兵”了。20年前，蒋也曾“联共抗日”；“20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变成“联日反共”了。但这

个“遣将不如激将”，不大讲究逻辑：何以见得苏俄只定了这两大“目标”？何以见得这两个“目标”能代表亚洲？何以见得台、日必须“共存共荣”？

事物发展有它自己的轨迹。日本朝野没有被“赤化日本”的话吓住。1957年7月16日，日政府宣布放宽对大陆禁运；16日，台“外交部”认定此决定“非仅助匪侵略，且冒政治风险”。1958年2月，日本钢铁代表团到北京签订了贸易合同；继之，日中又签订了《第四次中日民间协定》。

面对黄海海域出现的这股“暖流”，蒋又是“抗议”，又是“正告”，又经过多次“会谈”，虽争得了一点虚荣，但实质无改变。

1959年3月4日，浅沼稻次郎率日本社会党访华，周恩来、毛泽东接见了他们；这已经是“纯政治”了。

1960年，池田勇人又继岸信介绍阁，表示将“以前进态度并保持弹性和对方（大陆——引者）打交道”。翌年1月，池田向国会演说，宣布调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是今年日本重大问题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是一个善于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杰出外交家。丰富的政治阅历，使得他善于同各方面人物打交道。他及时地向日本提出了“政府协定、民间契约、个别照顾”的“贸易三原则”，和“不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妨碍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关系正常化”的“政治三原则”。这些，都先后为池田内閣接受了。

老实说，这时候大陆正是人祸天灾、经济困难之时，中日间的贸易还不可能大发展。1961年后，大陆情况开始好转。

1962年11月，廖承志与高崎达之助的贸易备忘录签订了。

太平洋西部的柔风，轻轻地在中日上空吹拂！

池田内閣为什么“向左转”？首相9月18日对美联社记者的谈话或可看出端倪：

中共在三五年内不会有变化，（这位日本政治家，真是“不幸而言中”，“三五年”之后，大陆便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引者）；台湾反攻大陆政策，没有依据，近乎幻想。

池田捅了马蜂窝了！

政治家们常有一两点藏得极深的用心：或不动声色，始终秘不示人；或故设疑冢，引人误入歧途。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彼此“心照”是可以的；但千万不可“宣”、不可“揭”。池田勇人，冒里冒失，“一语中的”，公开的指明“反攻大陆”根本不可能，这是蒋20多年来始终最为忌讳的心事。在台湾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碰到这带电的铁丝网上。

9月20日，陈诚在“立法院”报告，对池田言论深感“意外与遗憾”。

蒋介石最恼火，9月21日，他反唇相讥：

在“九·一八”的时候，池田只是中国东北的一名低级官员，当时池田的上司——日本军阀曾经预言：只需2个师的军队，用3个星期的时间，便可使中国屈服。结果如何！今天池田的预言能比他当年的上司高明吗？不要忘记，我蒋某是曾领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使你们预言不能实现的蒋介石。

“好汉不谈当年勇”。典型的摆老资格；世界上，哪有“武王一怒而安天下民”的本事！

如果说，蒋的反驳，意在指出那些实行侵略战争的战犯，理当对中国负疚，这种指责完全应该，这不是“报复主义”。但蒋的本意却是，“九·一八”时的低级官员，今天怎能看出我蒋某“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这就有些荒唐了。

1963年10月4日，北京成立了“中日友好协会”，廖承志任会长。

1964年底佐藤荣作内阁替代了池田勇人内阁，因佐藤的政治倾向，台日间的关系又变得亲昵一些：一时间，又是蒋亲笔致函佐藤，又是日本向台湾贷款，又是在高雄设日本领事馆，沈昌焕、严家淦、蒋经国先后访日，佐藤也回访了台湾。但是：

“渔舟唱晚”，红日却已西沉！

1966年10月12日，日本“日中友好协会”代表黑田寿男与“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发表共同声明，承认周恩来“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及“政经不可分”等主张。

1970年2月14日，日首相佐藤荣作称：日本今后一方面与台湾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一方面促进日本与大陆关系。同月17日，佐藤又表示赞成在日本与大陆间举行大使级会谈。

田中竟说添了“麻烦”

1972年7月7日，田中内阁成立。经过一系列外交活动后，终于实现了访华。

田中首相于9月25日启程前往北京。他乘坐的专机直飞北京，上午11时30分（日本时间下午零时30分）抵达北京机场。

田中和周恩来的第一轮首脑会谈，从9月25日下午1时半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厅开始。会谈结束时，周恩来对田中说：“总之，要求大同，存小异。”“那当然。这次谈判无论如何要谈出结果来。”田中回答。

由此可见，谈判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当天下午7时半，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主持欢迎宴会。出席宴会的共600多人，超过了尼克松访华时的人数。

宴会进行一半，在田中致答词时，他提到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他说：

“两国……有着长达两千多年丰富多采的交往的历史。”接着他说：“然而，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讲到这里，刚才还在鼓掌的中方人员听到了“添了麻烦”这句话，一下子静了下来。会场上热烈的欢迎气氛突然变了样。

周恩来口气突变

第二天，周恩来见了田中，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说：“在昨天的晚宴上，田中首相讲‘添了麻烦’这句话好像是弄湿了过路女人的裙子，向人家道歉似的。”中国方面觉得日本为了侵略大陆，发动了满洲事变、日华事变和太平洋战争，用这样一句话表示道歉太轻描淡写。不过田中致词结束的时候，中国方面还是报以热烈的掌声，给他圆了场。

下午2时。田中和周恩来举行第二轮会谈。周恩来与前一天判若两人，以严厉的口气谴责了日本的态度。他说：“听了今天上午外长会谈的汇报。高岛条约局长是破坏日中邦交正常化来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局长是搞讼棍那一套嘛！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意见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本意。”

看到周恩来如此气势逼人，田中也豁出去了：“不。这不是高岛个人的意见，是日本政府的意见。”周恩来未加理睬，话锋一转谈到头天晚宴上田中的致词，对“添了麻烦”的说法进行批评。田中不买帐，说：“日本可不是这样。你说没关系，我给你深深鞠个躬，说声‘实在给您添了麻烦，以后我注意’，就完了。”接着，双方展开舌战，你来我往足足谈了两个半小时。

对日方说来还有一件事很棘手。10月1日是中国的国庆节。田中首相一行无论如何要在这之前离开北京。就是说，谈判不能拖。从自民党党内的情况讲，田中访华，说什么也不能让谈判告吹，空着两只手回国；如果谈判破裂，很可能在党内受到追究，导致内阁总辞职。从中方态度严厉的情况看，要想完全按日方的主张办似乎很难。第一轮首脑会谈结束后，日本代表团回到迎宾馆，人人显得心情沉重。

这时，田中开了口：“怎么啦？总得吃饭嘛。”大平、二阶堂、桥本中国课长等人紧跟田中身后，走进与首相卧室只隔着一间房的食堂。由于谈判触了礁，所以谁也不说话。为了给大家打气，田中又开了腔：“你们用不着担心。成就成，不成就不成，到时候我负责。党内，你们不必担心，我有办法。这行了吧？”

不论是大平还是高岛，都没有心思拿筷子。只有田中一人往嘴里夹菜，哧巴哧巴吃得挺香。还不时呷上一口茅台。

田中为了活跃气氛，又开口了：“咳，这好吃。”但还是谁都不下筷。田中有点火了：“我就说你们这帮大学生不行嘛。用得着这样愁眉苦脸吗？”

“那，你说怎么办？”大平问。

“这些事让那帮大学毕业的家伙去考虑。”田中回答。坐在一旁听他们说话的外交官们，都不由得笑了起来。田中一会儿说“大学生不行”一会又说“让大学生去考虑”。田中这套安抚人心的办法真灵，笼罩在大家心头的愁云消失了。怎么办？等吃完了饭再考虑也不迟。

吃完饭，大家把田中送回卧室。随后又到大平卧室开会研究，逐条对联合声明的初稿进行仔细推敲。起草妥协方案的工作，直到当天深夜才完成。高岛把妥协方案的基本内容整理成若干条，于次日上午交给了大平。

9月27日。从清早起天空就布满了厚厚的云层，而且刮着阵阵狂风，似乎预示着谈判的前途严峻。但是田中首相一行还是按照中方安排的日程，于上午8时许离开宾馆，由姬鹏飞陪同前往万里长城游览。

下午4时10分，田中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始第三轮会谈。事先，日本的妥协方案已通过姬鹏飞送到周恩来手里。周恩来对妥协方案点不点头，将是田中访华成败的关键。田中也好，大平也好，都想从周恩来的表情猜测会谈的命运，但很难从他的脸上看出谈判的前途是凶是吉。田中又一次感到“周恩来实在高明”。

在田中到达中国当天的晚上，周恩来一再给田中的盘里夹菜，脸上总是笑嘻嘻的。第二天举行第二轮会谈时，却和前一天判若两人，以严厉的语气批驳了高岛条约局长的说明，浑身充满了中国寸步不让的气概。今天，周恩来笑容可掬，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的眼睛没有笑。从他的眼神可以看见他像在思考着什么，使人感到几分畏惧。周恩来一句不提日本的妥协方案。会谈结束后，日方参加会谈的人员终于恍然大悟：“周恩来是在等什么最后拍板。”周恩来请示的不是别人，肯定是毛泽东。毛泽东会作出什么反应，大家非常担心。

毛泽东大度表示：“不打不成交嘛！”

田中、周恩来第三轮会谈结束，日方代表在迎宾馆用餐，礼宾司长韩叙前来通知中国课长桥本：“下午8时或9时，毛泽东主席准备会见田中首相。”

田中等人正准备前往，周恩来未经预告突然来到迎宾馆，亲自陪同田中他们前往中南海毛泽东住处。

8点30分，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了日本客人，乍看起来，毛泽东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些，歇顶，后脑勺上白发很密。

见面时，毛泽东幽默地说：“上帝快要我去报到罗。”但是田中丝毫没有看出毛泽东身体不好。

接着毛泽东又说：“打架打完啦？不打不行啊。”

“不，我和周总理谈得很好。”田中解释。

“不打不成交嘛！”

“是的。”

（田中回国后，9月30日在自民党参众两院大会上介绍北京谈判的经过时说，“我在欢迎宴会上讲，‘添了麻烦深表反省’。这句话在第二轮会谈中成了话题。”）

毛泽东十分健谈，一会儿话题又转到书斋里的藏书。他从书架上取下一套《楚辞集注》六卷，作为礼物送给田中。他说：“我喜欢读书，知道对身体不好。不读，睡不着觉。”

会见用了一个小时，谈了不少题外话。田中回国后，10月1日在东京小平市的高尔夫球场（小金井国家俱乐部）打高尔夫球，中间吃午饭的时候对记者们披露了当时的一段插曲。

会见结束时，田中站起身来，田中一再谦让，毛泽东还是把田中等人送到门口。会见时毛泽东开头讲“不打不成交”，不时浮现在田中等人的脑海里。

毛泽东会见田中这件事本身，以及毛泽东对田中的友好态度，清楚说明毛泽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开了“绿灯”。3人回到迎宾馆后，日本代表团其他成员听说了与毛泽东会见的情况，一个个情不自禁地高兴起来。他们认为，此刻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肯定也因为把日本拉了过去而在举杯祝贺吧。9月29日，日中就邦交正常化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日两国关系不正常状态已经结束，自即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随即，大平正芳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1952年4月28日在台北签订的那个《日中和约》自动失效。台湾当局也连夜发表对日本断交的声明：

……田中政府的错误政策，并不影响日本国民对蒋总统深恩厚德的感谢与怀念；我政府对所有日本反共民主人士仍将继续保持友谊。

用不要赔款的“深恩厚德”，买来一个临时的反共伙伴；最后仍然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政治离不开权谋，但不要过于施展权谋。君不见，“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

礼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那些喜欢搞个人恩怨的政客，骨子里都是伪君子。

第二节 蒋介石南海之情

大陆军舰穿越海峡

1974年5月18日，台北。

88岁的蒋介石由一位年轻护士搀扶着，在草山别墅的花园里散步。他刚睡过午觉，但是仍然显得很疲倦。

两年前的3月，蒋介石做过前列腺手术，后转为慢性前列腺炎的宿疾，健康从此一蹶不振。也有说是国际关系上所出现的一系列颓势，如当头一棒，将这个86岁的老人一下子打倒了。这也不全是牵强附会，谁能说没有这个因素。

同年5月的第五届“国大”，蒋介石又“当选”为“总统”，随即给“立法院”送去一个咨文说：

行政院院长严家淦，恳请辞职，已勉循所请、予以照准。兹拟以蒋经国继任行政院院长。……提请贵院同意、以便任命。此咨，立法院。

总统蒋中正

蒋经国组阁，“总统”是自己的父亲，“副总统”严家淦可视为可有可无。一个蒋经国统治台湾的时代开始了。蒋经国当政后，台湾的经济出现了高速发展的良好势头，蒋介石非常满意，他可以放心地在这里静心休养了。这种高速发展的经济快车是从1970年开始的，后来被誉为仅次于日本的“世界经济奇迹”。

蒋介石在花园里走了十几步，感到气力有些不足。他在护士的搀扶下坐到安乐椅上闭目养神。

秘书过来了，他掏出几份有关西沙海战的简报……蒋介石本来已不大关心政事，他很放心地把一切都交给蒋经国办。但是，西沙海战爆发后，他每天都要在这个时候，让秘书念几份关于南海战况的简报。

秘书今天念的不是平常的简报，而是国防部送来的一份急电：

中共海军导弹护卫舰4艘，今天清晨抵达东引岛一侧，企图穿越台湾海峡。

秘书望着蒋介石微睁的双眼，轻声道：

“国防部请您谕示，是否拦截。”

70年代前，因为有美军第七舰队撑腰，台湾海峡的制海权一直控制在国民党军队手中。大陆军舰从东海到南海的调防，或者从南海驶往东海，都要绕道台湾岛东南的公海上，穿越巴士底海峡，尽可能避免在台湾海峡内与国

民党海军发生冲突。或许是军情急迫，或许是美军已退出台湾海峡，这次大陆军舰要在台湾海峡通过。

“西沙战事紧哪。”

蒋介石闭上眼睛吐出这句话，然后轻晃着安乐椅养神去了。当天，我海军“昆明”、“成都”、“衡阳”、“贵阳”等4艘导弹护卫舰，顺利通过台湾海峡，加入南海舰队建制。不久，南海舰队又配备了051型导弹驱逐舰。这可能就是南越军方发言人所说的配有冥河式导向飞弹的驱逐舰。不过，此时西沙海战已过去半年了。

从此，西沙群岛，便牢牢控制在我军手里。虽然，南越和不久后统一的越南多次觊觎这片极为重要的海域，但是，他们的企图一次又一次落空了。

西沙，国人完全可以放心！

只剩南沙了！

中国发现南海诸岛史

蒋介石晚年在处理南沙和西沙的问题上，是非常明智的，基本上能以民族利益为重。

南沙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中国人民在岛上的捕鱼和采集鱼贝活动始于何时，无法确知。据三国时代万震所写《南州异物志》记载，汉代从马来半岛到中国大陆的航行路线为：“……东北行，极大崎头，出涨海，中浅而多磁石。”康泰在《扶南传》中也写道：“涨海中，倒珊瑚，洲底有盘石，珊瑚生其上也。”

宋朝《太平御览》也有“涨海”的记载：“又曰扶南之东，涨海中，有大火洲，洲上有树，得春雨时，皮正黑，得火燃，树皮正白，纺织以作手巾或作灯火注用，不知尽。”文中所说的“涨海”，即今南海。至于之所以有“磁石”之称，大概是指未露出水面的暗沙、暗礁，因船只碰到这些暗礁就搁浅遇难，无法脱身，犹如磁石之吸附一般。

从第三世纪到第八世纪末，史籍很少记载中国船只在南海活动的情形，主因是南洋诸国通中国者不多。

直至十一世纪中叶北宋时期，中国史籍才又陆续出现有关南海诸岛的记录。北宋仁宗皇帝在《武经总要》亲作御序说：北宋朝廷“命王师出戍，置巡海水师营垒于广南（即今广东），治鱼入海战舰，从屯门山用东风西南行，七日至九乳螺洲。”所提到的“九乳螺洲”，已把西沙群岛置于海军巡逻范围。

1178年，周去非撰《岭外代答》，书中提到传闻东大洋海有长砂石塘数万里，尾问答所泄沦入九幽。这里所说的“长砂石塘”，就是西沙群岛。其所描述的地理及海洋特性，跟康泰《扶南传》所说的“涨海”的地理特性相似。

提及西沙及中沙的古籍很多，如：宋人赵汝适于宝庆元年（1225年）撰《诸蕃志》，书中记载的“千里长沙”和“万里石塘”，其地点可能为西沙群岛和中沙群岛；1274年，南宋吴自牧撰的《梦粱录》中所提及的七洲洋，指的是海南岛以东的海域，特别是指西沙群岛和中沙群岛之海域。

1292年2月，元世祖因爪哇黥诏使孟琪，于是派兵征爪哇，远证军经七洲洋、万里石塘，至占城。以后元朝汪大渊于1349年所著的《岛夷志略》亦提及万里石塘。而1563年明朝黄衷撰《海语》，也曾对万里石塘和万里长沙加以注释。根据其注释，万里石塘的位置在今之西沙群岛，而千里长沙在今之中沙群岛。1618年，明朝张燮的《东西洋考》，则考证过七洋形成之源由。

我国渔民在西沙群岛的活动，除了捕鱼之外，也在岛上盖房舍，甚至有农业活动，明朝王佐撰的《琼台外纪》有清楚的记载：“万洲东常沙石塘，环海之地，每遇铁飓挟潮，漫屋淪田。”

以上史籍所提到的七洲洋、千里长沙或万里石塘，可能只限于西沙群岛和中沙群岛。因为古代中国的航海路线大抵是沿大陆沿海至越南外海，经西沙群岛和中南半岛之间的水域，前往越南中部的占城，再转往印尼的苏门答腊或前往泰国。在这一条航线上，船只都避开或绕经南沙群岛之外，以免遭到危险。因此，直至十六世纪为止，我国史籍都未有南沙群岛之记载。1730年，陈伦炯撰《海国闻见录》，首度提及南沙群岛。他在〈南洋记〉卷中说：“厦门至广南，由南澳见广之鲁万山、琼之大洲头，过七洲洋，取广南外之咕啞罗山，而至广南；计水程七十二更。交址洲洋七洲洋西绕北而进……七洲洋在琼岛万州之东南，凡往南洋者，必经之所。……独于七州大洋、大洲头而外，浩浩荡荡，无山形标识；风极顺利，对针亦必六、七日如能渡过而见广南咕啞罗外洋之外罗山，方有准绳。偏东，则犯万里长沙、千里石塘；偏西，恐溜入广南湾，无西风不能外出。”

在《南澳气》卷中并绘有地理位置图更明白地指出南沙的位置，书中说：“隔南澳水程七更，古为落。土浮沈皆沙垠，约长二百里，计水程三更余。尽北处有雨山，名曰东狮、象；与台湾沙马崎对峙。隔洋阔西更、洋名沙马崎头门。气悬海中，南续沙垠，至粤海，为万里长沙头。南隔断一洋，名曰长沙门。又从南首复生沙垠至海万州，曰万里。少之南又生喽咕石至七州洋，名曰知里石塘。”

这里所称的千里石塘，就是南沙群岛。在《海国闻见录》中所绘的图，显示出千里石塘的位置在南沙群岛。

1820年，杨炳南撰《海录》，明确指出千里石塘为南沙群岛，他说：“万里长沙者，海中浮沙也，长数千里，为安南外屏，沙头在陵水境，沙尾即草鞋石，船误入其中，必为沙所涌，不能复行……。七洲洋正南则为千里石塘，万石林立。洪涛怒激，船若误经，立见破碎。”

以后的著作中都清楚的分别出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如1838年严如煜的《洋防辑要》、1844年魏源的《海图志》、1866年徐继畲的《瀛环志略》，

他们都以万长沙指西沙群岛，以千里石塘指南沙群岛。

在杨炳南的著作中，亦首度提及东沙岛，他指出东沙岛上有一个小港口，可避暴风雨。他说：“船由吕宋……西北行五、六日，经东沙，又日余，见担干山，又数十里，即入万山到广州矣。东沙者，海中浮沙也，在万山东，故呼为东沙。往吕宋苏禄者所必经。其沙有二：一东一西，中有小港，可以通行，西沙稍高，然浮于水面者，亦仅有丈许，故海舶至此，遇风雨往往迷离至于破坏也。凡往潮闽江浙天津各船，亦往往被风至此，泊入港内，可以避风，掘井西沙亦可得水，沙之正南，是为石塘，避风于此者，慎不可妄动也。”

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绘制的《皇清各直省分图》中，首先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以及中南半岛缅甸以东的地区（包括马来半岛、新加坡、泰国、越南、寮国和柬埔寨）划入我国的疆域。

以后，嘉庆十五年（1810年）绘制的《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嘉二十二年（1817年）绘制的《大清一统天下全图》亦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划入我国版图。1838年严如 所撰的《洋防辑要》记载了清朝海军在海南岛的海口驻军，海军曾到西沙和昆仑洋巡逻，防番贼海寇。

1876年，清朝第一位驻其公使郭嵩焘赴任，所乘之船经过西沙群岛时，他表示这是中国属海也，这是根据上述清朝的领土主张而做的表示。

虽然清廷早在1755年将南沙划入中国疆界，但还是因为“外力”——德、日、法等国的介入，清廷这才注意南沙的重要性。

1883年，有一队德国探险队到南沙群岛进行探险，清廷向德国政府提出抗议，主张南沙群岛于中国领土。1899年，法国向清廷建议在西沙群岛建一灯塔，始引起清廷之注意。

1907年5月，日本商从西泽吉次占领东沙群岛，并将岛名改为“西泽岛”。清廷向日驻粤领事提出交涉，日本自知理屈，乃承认东沙群岛为中国领土，唯由中国政府偿还日本商西泽13万元。1907年，日本提倡“水产南进”，日人又乘机占据南沙群岛的若干岛礁，在南海进行捕鱼及采磷矿（鸟粪肥）。

1909年4月，两广水师提督李准和吴敬荣率三军舰至西沙群岛，进行一个月的勘查工作，归来后疑具开办计书八项。相对于清廷的慢动作，日本方面则十分积极。1917年，日人平由未治前往太平岛和双子礁调查矿产。1918年日人小仓卯之助至南沙的南子岛、北子岛、西月岛、太平岛活动。1919年，日人在太平岛修筑码头、轻便铁道及房舍设施。

1925年7月，设在安南芽庄的法国海洋研究所的科学家到西沙群岛的林岛，进行勘测。1926年7月，法军舰又到西沙群岛测量海域和岛屿。1928年5月，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决议派沈鹏飞率队至西沙群岛进行调查，共16天，归来后写成“调查西沙群岛报告书”。1930年4月，法军占领南威岛。1933年4月，法军又占领南沙几个小岛，而引起我国的抗议。双方的外交战一直未获解决，直至1939年3月才因日军入侵西沙群岛及南沙群岛而暂时终

止争议。

1933年6月，我国政府设立由内政部、外交部、参谋本部、海军部、教育部蒙藏委员会等机关官员组成全国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分别于1934年12月21日和1935年3月22日召开两次会议，审定南海诸岛的中英文名称。1935年4月，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完成绘制“中国南海各岛屿图”，成为日后我国绘制南海诸岛地图的范本。

1945年8月10日，日军战败投降，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日军向我国海南岛榆林港驻军投降。

1946年11月，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及国防部官员率四艘军舰至南海诸岛，重建国碑，测绘详图。1947年12月，国民党政府将南海诸岛划归广东省政府管辖，同时正式公布南海诸岛的历史名称和地图。

国民党军队重驻太平岛

1950年5月，解放军解放海南岛后，国民党驻南沙太平岛和西沙群岛守备队，在未遭到解放军进攻的情况下，也随海南岛退下来的军队一起撤回了台湾。这样，国民党在日本投降后于1946年12月派军队进驻的太平岛，就成了无人岛。

菲律宾乘中国内战之机，开始窥伺我南沙。1956年3月，菲律宾海军学校校长古洛马宣称“发现与占领”南沙群岛，提出无理主权要求。越南、法国、英属婆罗洲等相继用各种方式表示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为此，台湾“外交部”于5月22日发表声明，明确指出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抗议菲律宾无理提出对该群岛的主权要求。5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也发表了同样内容的声明。5月30日，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约见菲律宾驻台湾“大使”，再次声明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中国主权不容侵犯。

同时，国民党当局决定派出军队，对南沙群岛实施广泛侦察，武装进驻。国民党海军组建“立威”舰队，于6月2日上午从台湾出发，5日下午到达南沙太平岛锚泊。次日早晨，小分队分乘两只橡皮舟同时顺利登上太平岛。太平岛面积0.443平方公里，是南沙群岛中最大的岛屿。经过全面搜索，发现岛上并无人迹，也未发现牲畜家禽等。国民党军队原南沙群岛管理处、警卫排及电台钢筋水泥房屋尚在，屋顶一面用油漆涂画的青天白日旗仍清晰可见。7日中午，国民党军队在太平岛庄严举行升旗立碑典礼，表明对南沙群岛及本岛拥有主权。“立威”舰队于8日中午从太平岛泊地起航，对南威岛、西月岛进行了侦察，14日返达台湾。

国民党当局遂决定派南沙守备队重驻太平岛。于1956年6月29日组成“威远”特遣支队进行护送。该队配有4艘兵舰，两栖侦察班、水中爆破队、两栖战车队和陆战通信队，实力很强。

7月6日上午，“威远”特遣支队从台湾起航，11日抵达太平岛。全部

物资装备于 18 日卸完，南沙守备队人员驻下，兵舰返回台湾，完成了重驻任务。

以后，每当有外来势力企图染指南沙群岛，国民党当局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样，严正声明：南沙自古属中华。

第三节 一代袅雄灵柩浮厝

避暑途中发生车祸

1969年7月间,蒋介石夫妇与往年一样,从士林官邸搬到草山官邸避暑。

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当蒋介石的车队快速经过仰德大道岭头附近的弯道时,前导车司机发现前面有一部向下行驶的公路局班车,停靠前面的站牌边,并有乘客上下,因为是刚转弯,前导车没有看清楚这部公路班车的后方有没有来车,这时,突然有一部吉普车从公路班车的后面,猛然超车,快速直冲下来,前导车发现情况紧急,立即刹车,但后面的“总统”座车却来不及反应,猛力撞上来,与前面的前导车狠狠地接上了“吻”,紧跟在后面的“随一车”幸好没有跟着撞上来,否则后果更会不堪想象。

在两车撞击的一刹那,强大的冲击力,将手握拐杖的蒋介石的身体猛然向前带去,整个人撞到前面的玻璃隔板上,胸部当场受到重伤,连阴囊都撞肿了,假牙也在撞击时,从口中冒了出来……

宋美龄坐在蒋介石的左侧,受到同样程度的撞击,双腿撞到前面的玻璃隔板上,她当场厉声叫喊……

现场一片慌乱……

侍卫人员忙着把蒋介石夫妇护送医院。副侍卫长孔令晟一面紧张地向蒋经国报告所发生的一切,一面急忙派人找寻那辆闯祸后逃之夭夭的吉普车……

草山乃至整个台北笼罩在一片惊恐不安的情绪之中。蒋经国给情治当局的指示是,无论如何也要设法找到肇事车辆,查明真相。

联指部、宪兵司令部调查组和警方等单位,立刻成立了专案小组,上面的决心是务必要抓到导致车祸的军车司机,不然不会罢休。整整追查了好几个月,最后才发现肇祸的车辆,原来是一名陆军师长的专用吉普车。

据查证,这位肇事的师长当天刚巧出席了一次军事会议,散会后,急急忙忙叫司机开车下山,没想到阴错阳差,发生了这么一件不幸的车祸。在事情发生后,这位师长和吉普车司机因为畏惧追查,曾经刻意躲了一阵子,可是没有想到还是给查出来。后来,这位少将师长就因为知情不报,被当局以伤害“最高领袖”的罪名,撤职查办,就这样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当天开车的吉普车司机也按军法判刑。

不论这两个肇事者被当局判了多严重的刑罚,毕竟蒋介石夫妇的伤害已经造成。事后,蒋介石在接见一位老将领时承认:“自从这次阳明山车祸事件之后,我的身体受到很大的影响,不但腿不行了,身体也不行了。”宋美龄的腿部也受到相当的创伤,一直到她晚年,每逢冬天,双腿都会不适,就是草山车祸的后遗症。

原来,蒋介石的身体是十分硬朗的,一年四季,大概只有几次感冒,然

而，在这次车祸不幸之后，蒋介石的身体出现了恶化的警讯。其中，心脏扩大，是他尔后身体健康的致命伤害。而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车祸事件还只是一个开端。

副官失误肛门受伤

1971年11月间，蒋介石来到高雄澄清湖，有天中午，他突然想要入厕出恭，于是，他依照惯例，叫当天值班的正班贴身副官，随侍一旁，那天的随侍副官是钱如标。

那时，蒋介石的身体机能已经不像往常那样健朗，大解时经常有便秘情形，有时必须藉助甘油球来软化大便，蒋介石解手解了半天，大概觉得肛门不适，就命令钱如标拿甘油球为他润一润肛门，这天钱不知是没睡好觉，还是做事心不在焉，一连挤了两个甘油球进入蒋介石的肛门，蒋介石还是解不出大便，心里直犯嘀咕，立即通知侍卫叫另一随侍副官翁元上楼。翁跑到蒋介石的洗手间，趋前一看，被吓了一跳，整个马桶全是鲜血，蒋介石也不知所措，他有点焦急地对翁说：“你快点帮我看看，怎么回事？钱副官给我塞了二个甘油球到肛门里面，可是大便依旧没有解出来，你快看看！”翁低下身去，仔细打量他的肛门，发现钱副官刚刚为蒋介石塞的那两个甘油球，根本没有塞到肛门，而是塞到肛门旁边肌肉里去了，把肛门的肌肉都插破了。

他当机立断，立刻通知医官，赶快来作急救，医官发现蒋介石肛门的肌肉已经被甘油侵蚀，有开始溃烂的现象。翌日，“荣总”直肠外科主任杜圣楷为蒋介石诊治，总算止住流血，可是接下来的治疗工作，可以说是旷日持久，整整治疗了一个多月，肛门伤口才算慢慢痊愈。

钱如标因此坐了5年牢狱。宋美龄一再当面责骂他：“就是你这个钱如标，老先生的身体就是给你拖垮的！你是罪魁祸首！”

宋美龄安排露脸辟谣

蒋介石卧病期间，外间关于他病情的传闻风风雨雨，为了辟谣，宋美龄和官邸人士真是想尽了各种办法，运用家族的重要活动，向外界“证明”蒋介石尚健在。于是，病中的蒋介石一共对外露了四次面，而这四次公开露面，都是由宋美龄一手决策设计。

第一次在新闻媒体曝光，是在1973年间，他最小的孙子蒋孝勇结婚的时候。

蒋孝勇的婚礼在士林官邸的礼拜堂凯歌堂举行，那时，蒋介石还在“荣总”调养，由于不适合长途走动，所以这次的婚礼并没有惊动他，蒋孝勇夫妇是在行礼之后，按照奉化家乡的习俗，给蒋介石奉茶。当天上午，给蒋介石穿上长袍马褂，坐在六病房的客厅椅子上，由宋美龄代表接受新婚夫妇的

奉茶仪式。那次的奉茶仪式，宋美龄特别决定选这个主题，对外发布新闻，说明蒋介石为最小的孙子主持了婚礼的奉茶仪式，并且说蒋介石的病情正在康复中。

然而，蒋介石毕竟是有病在身的老人，从他的神色可以看出他的确经历过一番和疾病搏斗的艰辛历程。这个艰辛历程，使得他的双眼眼眶严重下陷，而且脸庞消瘦，有经验的人很容易猜出他的病情。

第二次是 1973 年 11 月间，国民党的 11 届 3 中全会结束后，参加全会的 10 位主席团主席，到“荣总”会客室晋见总裁。

那次晋见，是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张宝树带领 10 位主席团主席，到“荣总”见蒋介石，然而，当时蒋介石的右手肌肉萎缩的情形已经十分严重，右手即使坐着的时候也会因无法控制而不自觉地垂下来，到底该怎么掩饰右手的缺点，工作人员都没有想到一个比较妥善的方法，后来，翁元突然灵机一动：何不用透明胶布将蒋介石萎缩的右手手腕索性“绑”在椅子的把手上，然后再穿上长袍马褂，这样外表就看不出来他的右手有什么问题了。

于是，他们把蒋介石用轮椅推到“荣总”会客室，等蒋介石在沙发上坐定，便立刻用透明胶布在蒋介石右手手腕上方粘上一圈，直接粘在沙发的右边把手上，把他的右手问题处理完毕，才通知主席团要晋见的人员一一进场。

第三次的曝光，是在蒋孝武夫妇带着年方周岁的蒋友松，去士林官邸探望蒋介石夫妇，那次的家族活动，在宋美龄应允下，决定发布一张蒋家的全家家族照，再一次“证实”蒋介石还好好地活在人间，一扫当时有关蒋介石已不在人世的不实传言。

那张照片画面上显示，蒋介石手上抱着他最小的曾孙友松，一家和乐融融的样子，实际上，友松只有在拍照的时候，才象征性的放在蒋介石手腕上，真正在他手上的时间大概只有几分钟不到的时间。

第四次曝光，是时势所迫的曝光，但也是别无选择的一次纯政治性曝光。

时间是 1975 年初，那时美国驻台“大使”马康卫即将离职回美国，他其实早在一二年前，就已经几次向台“外交部”提出晋见蒋“总统”的请求，但是，以前几次不是蒋介石正在昏迷状态，就是病情尚未明朗，不便接见。而美国方面已经根据种种迹象，猜测台湾的政治强人蒋介石应该已罹染重病，因为他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到“总统府”上班，而且，在许多蒋介石一向不轻易缺席的场合却看不见蒋介石的踪影，可见，蒋介石有病是个事实，不是空穴来风。面对马康卫离职返美前的最后一次晋见请求，宋美龄左思右想，权衡见与不见的利弊得失，最后和她的心腹商量的结果，还是决定接见。

除了这四次主要的对外曝光，蒋介石的病情新闻便从来不曾在任何正式媒体上面出现，当时，有不少人总认为蒋介石的病情要是轻易外泄，好像会对台湾命脉造成什么致命影响似的，其实，那时，蒋经国基本上已经掌控了整个政务大局，就算蒋介石去世，已经不会有任何实质上的影响，只会在心

理面上，形成对国民党权力中心的短暂压力，这是不争事实。

康复大夫握苗助长

“赶快回到总统府上班”可以说是宋美龄对蒋介石苏醒后最急切的一种渴望，蒋介石又何尝不是作如此想。蒋介石在苏醒来不久，曾经一度想叫侍卫为他准备纸笔砚墨，要想练练毛笔字，可是，他自己试了几次，知道自己的右手根本萎缩得相当严重，已经没力气握笔。

为要蒋介石赶快痊愈，然后可以立即销假上班，宋美龄和她四周的亲信，莫不伤透脑筋，他们在照顾蒋介石的工作上，也费了很大的功夫。

蒋介石自己也对病情十分着急，他时常很焦急地想起床试着走动一下，长期躺在床上，他内心有说不出的苦闷和焦躁。他巴不得马上回“总统府”上班复职，但是，他的体力和医官的要求，不允许他做这样的事情。有一次，他听蒋经国报告，说高速公路已经通车到桃园的杨梅，他很兴奋地说想去高速公路上兜风转一转，侍卫们只好为他备车，在车队当中，少不了要一辆救护车随护其中，以防特殊情况。谁知车队不过行了一段路程，他觉得非常疲倦，身体受不了，又要求车队立刻折返台北。

这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窘境，使蒋介石的情绪处于一种极度低潮的状态下，宋美龄非常了解蒋介石的心境。她其实更希望蒋介石赶快——最好是明天就能和从前一样，回到“总统府”办公，重新掌握国家实际权力，因而，宋美龄用尽脑筋，要让蒋介石很快就能恢复活动力。

1974年间，蒋介石的心脏仍然没有显著改善的迹象，但是，宋美龄却听从孔老二小姐的建议，从振兴复健医院请了一位外国复健医生，每天专门为蒋介石作各种复健运动，并行按摩全身肌肉，但是成效却十分有限。

1974年11月23日，心急和烦躁的宋美龄不顾医疗小组阻拦，硬是要搬回士林官邸。她对着医疗小组的警官吼叫：“我不管！他（指蒋介石）如果不搬，我还是要回士林官邸过圣诞节！我搬回去！”

可见她对蒋介石病程的漫长，和医院病房生活孤寂的不耐。在宋美龄的坚持下，蒋介石也没有反对的意思，医疗小组只好从命，连同蒋介石一起搬回士林官邸，为了蒋介石回士林官邸休养，差点没把整座六病房的所有医疗设备都拆回士林官邸，所以，当时人人就戏称士林官邸几乎成了一座小型“荣民总医院”。各种医疗器材应有尽有，连可以搬动的X光摄影机虽然体积过于庞大，还是整部一起搬至士林。

在宋美龄的执意坚持下，蒋介石夫妇回到士林官邸过圣诞节，可是，这也是两人一起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这一点大概是宋美龄所始料未及的。

洋医误诊泌尿出血

1975年3月间，宋美龄听从友人建议，请了一位美国医师来为蒋介石诊治，这位美国医生看了蒋介石的病历和检验报告以后，建议最好能够立即进行“肺脏穿刺手术”。但“总统”医疗小组的医官却坚决反对这样激烈的诊治方式。医疗小组的理由十分简单，他们认为，蒋介石已经年高89岁，照临床经验，是根本不适合作任何大型手术的，因为有太多的变数很难掌握，而且，一旦发生手术并发症，任谁也无从负责。

可是，宋美龄是“总统”的配偶，她不但在法律上有充分的权力作这样的决定，而且她还贵为第一夫人，官邸的大小事情她大权在握，有谁能违背她的意思，所以，只好任由宋美龄同意美国医生的建议，马上准备作背部穿刺肺脏的手术。

美国医生为蒋介石施行的背穿刺手术可以说十分成功，医生从蒋介石的肺脏抽出大约一碗的脓水，可是，手术虽然圆满成功，而手术的后遗症却接踵而至，当天晚上，蒋介石的体温立刻由原来的摄氏37度多，上升到摄氏41度，把医疗小组的成员一时之间搞得手忙脚乱，官邸立刻又回复到3年前蒋介石刚昏迷那一阵子的混乱场面。

手术完成后的第2天，一个更令人震惧的现象发生了，原本蒋介石在每年春天都会复发一次的小便带血，这年的出血现象不但提早到来，而且这次的小便带血，来得既急又猛，简直有些像是大出血。这种泌尿出血的情形，十分可怕，医疗小组的医官整整为蒋介石输了250CC血浆，才使情况稳定下来。

高烧不退，加上小便大出血，另外让医疗小组更加紧张的，就是蒋介石心脏停止跳动的频率不但愈来愈高，而且其间隔也愈来愈近。作完背穿刺手术以后，蒋介石的心脏警讯频频，一日数惊。坐在他的床榻前，守望着连接他心脏的心电图画面看着那曲线忽强忽弱、上下飘动，真是令人冷汗直冒。

3月29日，蒋介石在台北市郊的草山别墅官邸口授了遗嘱。遗嘱的开头一句是：“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接下的三百余字，仍是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的一套陈词滥调。

回光返照梦断草山

1975年4月5日上午，蒋经国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到士林官邸来看望蒋介石。通常，他早上会和蒋介石就一些政务，作短时间的交谈。

下午，轮到翁元当班随侍蒋介石，他感到蒋介石似乎比以前情绪还要烦躁，他不停地起床又躺下，躺下又想再起来，这样反反复复好几十次，医护人员在一旁见他情绪那样不稳定，就在旁边劝慰他，要他多休息，他脸上露出不悦的表情，对医官的劝说根本置之不理，医护人员也对他无可奈何，那时，蒋介石原先的小便带血和高烧都已经缓和下来，然而他的心脏扩大和时

常间歇性停止跳动的情形，则还是此起彼落。

晚上，蒋经国又回到士林官邸，他照往例先向蒋介石请安，然后在他房内二人谈了几分钟。蒋经国见蒋介石似乎有些倦容，便告退说：“阿爹！你累了就休息吧！”走出房门之前，还吩咐医官给蒋介石吃几颗镇定剂，事实上，所谓的镇定剂其实是假的，因为自从蒋介石心脏不好以后，医官就不主张再给他吃安眠药或是镇定剂之类的药，以免影响他的心脏，因而都是以一些维他命的药丸来哄骗蒋介石，叫他吃了还是可以在心理上产生“催眠”效果。

晚上8点55分左右，蒋介石已沉睡多时，可是，孰料心电图上的心搏曲线，忽然变成一条白色直线。当班的护士立刻召唤所有的医护人员到蒋介石身边进行急救。那天值班的医官是俞瑞璋，他身穿睡衣，狼狈不堪地冲到蒋介石病榻前，二话不说，就给蒋介石施行急救，包括实施电击，可是连续作了几次电击，蒋介石的心脏一点反应都没有，这时，医疗小组知道事态非常严重，于是立刻向宋美龄和蒋经国报告这个最新的不幸消息。

蒋经国从士林官邸刚回到七海官邸，正要上床就寝，没想到电话铃声大作，要他立刻再回士林官邸，对这次紧急情况，他心知不祥，等他赶到士林官邸，蒋介石早已归西，没有交代任何的遗言。

翁元日后回忆说：

由于我已交班，当我被叫醒之后，立即奔至老先生的病榻旁帮忙，我进房门的时候，见到屋内人声鼎沸，蒋经国在房间角落的壁炉边低声辍泣，老夫人则在病榻边面色冷峻而忧戚，显得非常难过，现场一片忧伤悲戚的气氛，医生放弃了急救之后，已经开始在为老先生戴上假牙，然后通知副总统严家淦，请他速来士林官邸见老先生最后遗容。

台湾党政军要员听到蒋介石死了，当夜皆赶到草山别墅，并在别墅举行了在蒋介石遗嘱上签字的仪式。在遗嘱上签字的有宋美龄、严家淦、蒋经国、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

蒋介石死后两小时，台湾当局“新闻局”发布的死亡公报，称蒋介石的死亡为“崩殂”，这是不折不扣地把蒋介石当作了封建帝王。又明令从4月6日起历时1月为“中华民国”的“国丧”期。蒋介石的遗体停在台北市的“国父（孙中山）纪念馆”5天，供人们瞻吊。

移灵时雷雨大作

要员们瞻仰了遗容后，就准备为蒋介石移灵，移灵用的是“荣总”为蒋介石新买的进口救护车，工作人员刚要把蒋介石的遗体移上救护车，天空突然响起隆隆雷声，接着就是一阵倾盆大雨，如排山倒海而来，移灵车队不能

受天候影响而延误时间，所以，车队就在滂沱大雨之中，从士林官邸缓缓前进。

瞻吊完毕，蒋介石的灵柩被暂厝于慈湖，“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以达成死者的“心愿”。

慈湖是蒋介石于 1961 年间，在距离台北市 60 公里处的大溪镇福安里村，为自己选择的一处坟茔地。蒋介石之所以选中这块“风水宝地”，原因是这里的风景很象故乡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母亲的坟庐他起名为慈庵。蒋介石在这里建筑了一座中国四合院式的“行宫”，起名“慈湖”。他生前常来此小住，并嘱在他死后灵柩暂厝此地。

美国总统福特对蒋介石的去世反应冷淡，只拟派个农业部长去台北吊丧。经台湾要求，始改派副总统洛克非勒。在参加葬礼的外国来宾中，较为显赫者要首推南朝鲜的总理金钟泌了。日本的两任前任首相佐藤荣作和岸信介去台北吊丧，为避免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抗议，连自民党代表的名义都不用，仅称友人代表。葬礼场面十分冷落。

1975 年 4 月 28 日，台湾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举行会议，修改党章，规定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呼改用主席。党总裁的名义，永远保留给蒋介石，他人不得再用。如同“总理”的名义永远保留给孙中山一样。至此，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呼三易其名。会议还推举蒋经国担任了国民党主席。

蒋介石去世后，宋美龄到了美国，隐居在纽约市郊长岛拉丁敦区的孔令侃的别墅里。

停放蒋介石灵柩的“慈湖行馆”，不断有人去参观。蒋介石的尸体经防腐处理，身着长袍马褂，胸前佩戴勋章，装在一个黑色大理石棺廓里，停放在正厅。接连正厅的厢房，保持着蒋介石生前卧室的原样，供人参观。卧室的茶几上放着一张便条信纸，上面是蒋介石生前用红铅笔写的四个行书体的字：

“能屈能伸”。

设计这个情节，想要告诉参观者什么呢？

蒋介石死在台湾，灵柩浮厝，可谓“屈尊”。但中共有言在先，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蒋介石先生的棺柩可移葬大陆，安葬在蒋介石生前希望的紫金山麓亦可。

蒋介石还能“伸”吗？还有反攻大陆的未来吗？没有了。蒋介石死了，盖棺定论了。

第四节 解开蒋介石身世之谜

谜样人物走下神坛

蒋介石死后，随着海峡两岸政治气候的大转变，学者们对他的研究和知情者对相关史料的披露也日趋实事求是。

在改革开放的鼓舞下，大陆有关蒋介石的史料和回忆大量涌现，其数量远多于台湾，对进一步了解蒋介石和一些民国史事，大有裨益，诸如：《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居亦侨的《跟随蒋介石十二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以及其他关于中统、军统、励志社、侍从室、抗战、国共内战和孔宋家族史料的问世，形成出版界的一大奇观。从电影《西安事变》到《开国大典》，蒋介石在大陆银幕上“出现”的次数亦有增无减。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出版了《蒋介石史料》专辑（列为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 23 辑），“就人们所不甚了解的或有某些误解的问题提供比较可信的资料。”浙江政协和浙江人民出版社于 1988 年又将《蒋介石史料》加以重编增订出版，易名为《蒋介石家世》。而何国涛发表的《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即纠正《金陵春梦》中所称蒋介石原籍河南、原名为“郑三发子”之说。

周恩来重视核实工作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著名小说家唐人所著的多卷本长篇小说《金陵春梦》传入大陆。在以后不长的时间里，这部小说很快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这不仅因为作者用娴熟的笔法、生动的情节详尽描述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从建立到崩溃的全过程，更由于作者以“惊人之笔”在第一集《郑三发子》中揭开了蒋介石的身世：蒋介石是其母王采玉从河南许州（今许昌市）繁城镇后郑庄改嫁带到浙江奉化溪口的，原名为“郑三发子”。唐人宣称这部小说不是一般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撷取于起初的历史素材，或者说，是真实历史的通俗演义，这就由不得读者置疑了。关于蒋介石的“身世”，唐人另著《关于金陵春梦及其他》一文详述其得到线索、查证线索的过程，令人对蒋介石是“郑三发子”一说确信不疑。

且不说唐人所言是真是假，单就《金陵春梦》一书在当时所激起的反响确是十分巨大。蒋介石是“郑三发子”的说法不胫而走，风靡大江南北，也成为有待史界进一步证实或证伪的“历史公案”。

蒋介石究竟是哪里人？是浙江人抑或是河南人？仅凭小说家言而盖棺论定，未免失之武断。倡导和匡定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要以“去伪存真、实事求是”为原则的已故周恩来总理当时兼全国政协主席，得悉这一传闻后十

分重视，全国政协就将这件事情交由宁波市政协核实。

宁波市政协接此任务后，作了认真的研究，决定由当时担任市政协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的毛翼虎先生进行调查。毛老是奉化岩头人，是蒋经国先生的亲娘舅毛 的族侄，对乡情相当谙熟，又对蒋氏家史多有所闻，所以由毛老负责调查，确是十分合适的人选。毛老回忆当年接过任务的情形时非常激动，他说：“在这之前曾读过《金陵春梦》，作为奉化人，对小说所叙述的蒋氏身世觉得破绽百出，不值得一驳。但也有为难的地方，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连纠正他的历史事实，也怕有为蒋介石翻案成为反革命的危险，但这是一项任务，我首先找我 伯商量”。

伯就是毛 卿，他是蒋介石的妻舅，蒋经国的亲娘舅。他的妹妹毛馥梅（后都误写为毛福梅，而把毛 卿误写为毛懋卿）是蒋介石的妻子，比蒋介石大两岁。他是真正知道蒋介石身世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左”的思潮影响，他也很害怕被扣上“为蒋介石翻案”的帽子。二人研究结果，决定交张明镐去搞调查研究，组织这篇稿子。张明镐是市民革成员、市政协委员，其老家就在溪口附近东山地方，又与蒋家有些亲戚关系，张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毕业回国后，蒋介石就叫他筹建武岭学校，武岭学校第一任校长就是张明镐，后来才由蒋介石自己担任校长，一直到解放。于是，张明镐在毛老的直接支持下，开始了第一次调查活动。

《蒋介石在溪口》一稿的组成

蒋介石身世之谜，在毛 卿、张明镐的心中，实际上是一清二楚，不成问题的。但知情人士不敢凭空来翻此案，因文史工作的要求是去伪存真，要有根据、有事实。书面的资料蒋氏宗谱是重要的依据，但解放以后蒋氏宗谱已无存。张明镐便以专访和座谈会来了解、证明蒋介石的身世。在大量接触的有关人士中，有毛 卿，孙表卿（奉化唯一的老举人，蒋介石在奉化风麓学堂读书时的老师），蒋周澜（蒋介石的族兄），蒋介石发妻毛馥梅和蒋介石胞妹蒋瑞莲的结义姊妹，蒋介石的家庭教师陈志坚，丰稿房老帐房唐瑞福，以及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与宋美龄有同事关系、国民党时期宁波市第一任市长罗惠侨等。另外，还走访了袁静之、杨孝维等人，袁静之是市民革成员、政协联系人士，蒋孝先之遗孀。蒋孝先是蒋介石最为看重的侄孙，毕业于黄埔一期，后任宪兵团团长，西安事变时，蒋孝先在蒋介石身旁被击毙。杨孝维，市政协委员，其母是毛馥梅、蒋瑞莲结拜姐妹，其父与蒋介石同年、同村、同学、少年好友，又同时留学日本。

第一次调查自1962年始，至1965年止，前后持续4年，分两个阶段进行。重点是调查核实奉化溪口蒋氏世系的变迁以及蒋介石一生与溪口的关联。调查方式为邀请熟谙蒋氏世系并与蒋家包括蒋介石本人过从甚密的宁波、奉化两地耆旧举行座谈笔录和实地走访相结合，在这个基础上与后来得

之不易的蒋氏宗谱参核，力求史料丰富、真实，以澄清有关蒋介石身世含糊不清的说法，消除唐人所著《金陵春梦》一书中关于蒋介石是“郑三发子”的讹传。

经过张明镐一年多的反复调查，积累了大量资料，有些材料鲜为人知，十分珍贵。为了使这些资料尽快组成文章上报，张明镐不顾年老体弱，立即执笔整理，写成《蒋介石在溪口》一文，共 6000 余字。按照惯例，毛老将此稿寄送省政协文史委。省政协文史委收到稿子后，即发来笔墨费，但不见刊用，其实也不敢刊用。蒋介石的身世之谜，在这篇文章里解决了。后来善写文史资料的何国涛看到了此底稿，认为这样重要的题材还可以深入细写。毛老才叫何国涛帮张明镐重组此文。

何国涛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解放前当过编辑、报社社长，著作甚多，汪伪时期任上海《中华日报》的某版主编。解放后，因其历史问题，闲居在家，生活无着，常常为宁波市政协撰写文史资料，挣些稿费。

何国涛参与此事，标志着本次调查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与前一阶段相比，无论是调查的广度还是调查的深度均有所加强。一方面，何国涛配合张明镐在溪口举办多次座谈会，邀请蒋介石故居——丰镐房的原帐房总管唐瑞福和其他了解蒋家内情的孙义朵、徐汲清等老人参加并提供情况；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宁波邀请名律师朱赞卿、老教育家杨菊庭、藏书家冯孟颀等老人举行座谈，请他们详细提供在 1947 年受蒋介石委托纂修蒋氏宗谱的情况。在查证、纂修过程中，杨菊庭先生于 1947 年曾作《莲桂坊蒋氏考》一文，考证宁波白水巷蒋氏祖先宗祠和牌位。由于他们早在 15 年前，还是蒋介石权倾朝野的时候，已经系统接触和查核了蒋氏世系的变迁、传承问题，所以，在座谈中，他们的谈话自信合乎逻辑，对唐人《金陵春梦》所提出的蒋介石是“郑三发子”一说均不屑一顾。此外，他们又访问了郁辅祥、张葆灵、罗惠侨等几位老人，他们根据自己的亲见亲闻，也认为唐人《金陵春梦》关于蒋介石身世的叙述纯属无稽之谈。何国涛还利用座谈访问的间隙查阅了蒋氏家世的较为系统的史料。在此基础上，张明镐、何国涛对《蒋介石在溪口》一文原稿作了大幅度的调整、扩充和修改。

至 1965 年 4 月，由张明镐口述、何国涛整理，全文长达 4 万余字的《蒋介石在溪口》第二稿完成了。修改后的稿子较原稿更翔实、更富有说服力。全稿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蒋氏先系及其家族”，依次分析了“蒋氏先系之谜”、“蒋介石父兄的身世”、“关于蒋母王采玉”、“毛福梅、姚怡诚、陈洁如”、“协议离婚的一幕趣剧”、“‘太子’蒋经国、蒋纬国”、“一群‘皇亲国戚’”等问题；第二部分为“蒋介石的早期生活”，着重阐述了“童年时代的蒋介石”、“从师考略”、“早期跟蒋介石交往的一些人物”等情况；第三部分为“蒋介石在溪口的所作所为”，列举了“溪口镇上的新老家宅及坟庄”、“第一次下野见闻”、“武岭学校及其附属机构”、“西安事变后回籍活动种种”、“一手扶植起来的所谓溪口四小家庭”、“逃

亡前夕的狼狈处境”等事实。文章从蒋氏世系起笔，上至蒋家先祖，下迄蒋介石父子，娓娓述来，谱牒资料与口碑资料俱备，可证蒋介石身世之谜。文章又以蒋介石在溪口的种种活动收尾，特别是记述蒋介石三次下野回故里的情况尤实，可供民国史的深入研究。此稿分送全国政协和省政协文史办，1965年9月22日全国政协文史委收到稿件后，十分重视，经研究，于同年12月25日给宁波市政协汇来200元稿费（这在当时是按质量高的稿件付的稿酬，稿费分配由毛老作主，张明镐、何国涛两人各取一半），并附言“在适当时候刊用”。后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迟至1981年才在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选辑》总第73辑上正式发表。但当年全国文史委的及时汇款与准备刊用的简短附言，对毛老及其他调查人员、执笔整理人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鼓舞、支持和肯定。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激发了毛老抢救民国史料，教育后人的工作热情，他动员原任蒋介石侍从室机要秘书、奉化人汪日章根据亲身经历写下了《西安事变亲历记》，后经1979年出版的《浙江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2辑刊出后，受到民国史学界的普遍关注。他还动员辛亥老人、民国老人和其他各界人士撰写富有史料价值和借鉴作用的“三亲”资料，绝大部分已在近年来先后出版的全国、省、市各级文史资料上发表，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然而，当第一次调查刚刚有了初步结果并准备进入系统研究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国各项工作受到极大的冲击，文史资料征集和研究工作也不能幸免，对蒋氏世系的调查、研究工作也被迫停止。

真实身世轰动海内外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被迫停止工作12年之久的全国各级政协随之相继恢复工作，毛老亦在此时被重新安排到宁波市政协任职，继续主管文史资料征集和研究工作。当时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要求各级政协文史委遵循“要存真，要实事求是”（周恩来语）的方针，要求文史资料工作者包括撰稿积极分子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号召各级政协文史委要树立“抢救史料”的紧迫感。毛老深知文史资料工作是一项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十分有意义的事业，自觉响应全国政协文史委的号召，埋头耕耘，加倍工作，以挽回“文革”十年给文史资料工作所造成的巨大损失。短短几年，经过毛老耐心细致的工作，又积累了一批数量可观、价值较高的“三亲”史料，连同“文革”前征集到的一大批史料，陆续送往全国和省级《文史资料选辑》发表，共计有百余篇。同时考虑到“文革”前关于蒋氏世系的调查客观上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由于“左”的思想干扰，调查过程往往言有所隐；二是调查面过于宽泛，没有直指“蒋介石本人身世”这一主题，而影响了调查的深入和调查材料的力度，说明在这个问题上还有许多工

作要做。而这时张明镐已老成凋谢，于是毛老只得和何国涛商量进行第二次调查。如果说第一次调查主要以谱牒、宁波奉化两地有名望的耆旧为主要对象，以搞清蒋氏家世全貌为重点的话，那么，此次调查则侧重于以蒋介石身世为主线，以蒋介石父母来历为依托。因为搞清楚蒋介石本人身世，归结为一点首先必须搞清楚蒋介石父母的身世、行踪，惟其如此，才可从根本上否决唐人《金陵春梦》所张扬的说法。

有了课题的主攻点，调查的目标与对象也就十分明确。自1979年始至1981年止，历时一年多的调查中，何国涛正是循着已确定的课题主攻点，在溪口重点调查了蒋介石父亲蒋肇聪的职业与行踪，在葛竹调查了蒋介石母亲王采玉的来历与行踪，收集到了较“文革”前更为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这些材料证据确凿，可信度极高，足以澄清关于蒋介石身世“另有隐情”的种种传闻，这些材料后来都完整地反映在何国涛撰写的《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一文中。

本次调查的最初想法只是弥补前次调查的某些不足，抢救和保存日趋枯竭的“三亲”史料，至于整理成文则是放在第二位，待适当时候再做。但是，随后发生的情况说明“蒋介石身世”仍是文史资料领域乃至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且舛误甚多，有必要立即将最新材料公诸于世，告晓天下。所以毛老和何国涛商量，要他继续撰文，系统地揭开蒋介石的身世之谜。当访者问及这一年发生了哪些情况，毛老回忆道：“首先，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选辑总第73辑》发表了我们1965年寄去的由张明镐口述、何国涛整理的《蒋介石在溪口》一文，我们感到很高兴。但文章发表后，并没有引起应有的反响，可能跟我们在这之前估计的该文涉及面过杂，反而冲淡了‘蒋介石本人身世’这个主题有关，因而起不到澄清史实的作用。接着，当年（指1981年）4月出版的《河南文史资料总第五辑》刊发了一组力主‘蒋介石是河南人’的文章，进一步说明蒋介石身世‘另有隐情’，澄清非易。这组文章由三篇组成：一篇是《关于蒋介石家世的一些传闻》，张仲鲁作于1962年5月；一篇是《关于蒋介石家世的点滴见闻》，李延朗作，从他文末所记分析，大概亦作于60年代初，证实唐人的《金陵春梦》一书中关于蒋介石是‘郑三发子’的真实性；再一篇是《关于蒋介石家世的补充》，系《河南文史资料》编者综合郭海长、谢梅村、李静之等回忆材料而成，这些回忆材料与前面两篇一样，并没有新的‘补充’。这三篇文章都是以抗战期间有一河南人郑发千里寻弟至重庆，蒋介石如何‘礼’待郑发为依据，断定蒋介石便是郑发的胞弟，证明他是河南人，从而证实唐人说法的正确性。本来唐人所述为小说家言，文学书籍，事有妄载，言有阙书，对一些史实，经不起推敲，有我们的《蒋介石在溪口》一文，就可证其讹误。但现在以实事求是为原则的文史资料连篇累牍，一再引证，且言之凿凿，可见问题已超出了一般的‘传闻’范畴，虽然这些文章的依据大都是传闻而已。问题既然再次提出，我们的态度是按照历史学的观点，不妄断，不途闻，用事实来说话。而关于蒋介石身世涉及到了

浙江、河南两个地方，就应开展周密的调查，提供确凿的证据，切莫以传闻作信史，以讹传讹，不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好在我们有备而作，所以，很快就请何国涛写成了一篇《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

经毛老一说，访者恍然大悟：后来轰动学术界、波及海内外的《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原来是在如此情况下写出来的。具体完成时间是1982年初。文章写作动机是严肃、认真的，笔法也是公正朴质的。与《蒋介石在溪口》一文相比，它更能抓住要害、说明问题。奉化县政协文史委亦多次组织班子，利用当地优势，遍访乡间耆宿，终于查出了蒋介石出生时的接生婆婆昭仁与蒋介石婴幼儿时的奶妈胜坤娘（即后来任丰镐房帐房总管唐瑞福的祖母），有力地证明蒋介石系蒋肇聪与王采玉的嫡子。蒋介石父母的来历清楚，并无启人疑窦之处，蒋介石自身来历亦已了然，因此可以断定传说中“郑三发子”必另有其人，但绝不会是奉化溪口出生、长大的蒋介石。

文章杀青后，何国涛交给毛老审阅。毛老阅后，认为资料翔实，一气呵成，已达到了调查的目标，即送交中共市委统战部，宣传部审核，拟在《宁波日报》发表，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不能如愿。毛老将文稿送省政协文史委。当时负责省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曹湘渠阅后，认为史料珍贵，结构严密，证据充分，但能否立即予以发表，尚不敢定夺。后经时任省政协副主席、原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员何克希审阅，认为是一篇极为难得的珍贵史料，作到了“去伪存真”和实事求是，有利于海峡两岸的统战工作。并赞扬了宁波市政协的文史工作与何国涛。

1982年12月，《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一文，连同宓熙（原蒋介石侍卫队大队长）写的《我在蒋介石身边的时候》、唐瑞福与汪日章合写的《蒋介石的故乡》等文，一并刊载在《浙江文史资料选辑》（总第23辑）上。该辑的“前言”评论说：“《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就是一篇释误解的文章。所谓‘谜’，即长期以来《金陵春梦》等书所流传的‘蒋介石是蒋母从河南带来的拖油瓶郑三发子’的种种传说。这篇文章的作者何国涛通过在溪口和蒋母家乡葛竹的详细调查，查《宗谱》，访族人，以所得的大量材料，解了此谜，证明这些传说纯属子虚乌有的海外奇谈。这一澄清，大大有利于辨真伪，正视听，也是史料工作的一种拨乱反正。”至此，宁波市政协两度组织的关于蒋介石身世的调查活动，告了一个段落，取得了圆满的结果，用毛者的话说，这样持续经年的调查活动所以能开展，圆满的结果所以能取得，首先应归功于已故的周恩来总理，归功于中共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可喜的是，文章一经发表，立即轰动了海内外和学术界。首先，香港《大公报》等四家报纸，在同一天刊登了中新社发的《浙江文史资料选辑》（总第23辑）出版消息，香港《大公报》连续15天转载了《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第三篇有关蒋介石身世的文章。《百姓》杂志也要求转载。有的报纸专门写了题为《蒋介石并非郑三发子》的评论文章。信息很快传到台湾，台湾的《传记文学》等报刊争相转载，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经《传记文学》

(第52卷第4期)全文转载后,又与《我在蒋介石身边的时候》等文,一同被收入《陈洁如回忆录》(全译本)的“附录”中。著名旅美作家江南(刘宜良)写作《蒋经国传》时,就采用了该文提供的大量史料。其次,在大陆,《浙江文史资料选辑》(总第23辑)1982年12月第一版发行后,立即告罄,翌年4月第二次印刷。1985年6月第二版出版,仍供不应求。1986年10月第四次印刷,4年间共计印数18.5万册。连同1989年10月发行的(浙江省政协文史编辑部在原有稿件的基础上,扩大征集范围,编辑、出版)《蒋介石家世》专辑《浙江文史资料选辑》(总第38辑)第一版,6年共计印刷5次,发行28.88万册。1994年5月,沿袭原书名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将《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一文放在首篇醒目的位置,出版了《蒋介石家世》第二版。12年来,以《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为主要文章的蒋介石家世史料一版再版,数次印刷,销售共计47.4万余册,堪称文史资料出版物之最。再次,这篇文章的影响远远超越了问题本身,超越了学术研究的范围,而成为扩大统一战线、改善海峡两岸关系的契机之一。读者纷纷来信,赞誉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蒋介石家世》,“是做了最大的统战工作”。原台湾高雄“警察局长”、“中央警官学校教务长”,看到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孙中山、蒋介石两辑史料后,来信说,这两本书“很吸引读者,引起了浓厚的兴趣,史料贵在真实,你们的史料,能反映历史真实面目,信实可靠,很珍贵。”大陆解放时,在香港通电起义的原国民党立法委员某人士,看到蒋介石的史料后,来信说:“读之令人折服,长期以来,《金陵春梦》等书,谬种流传,硬说蒋介石是‘拖油瓶’,流传极广,这篇史料,有力地予以澄清,读之爽口,十分得体。”又据毛老介绍,台湾当局特别是蒋氏后裔看到这篇文章,反响甚为强烈,他们认为共产党也是能讲真话的。从此蒋纬国先生等改变了对共产党原有的看法,响应并积极宣传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主张。

第五节 “黑匣子”曝光

偶然发现学界传开

三四十年来，关心民国史的人都知道与蒋介石同居生活过的陈洁如曾留下一部回忆录；亦曾风闻蒋家花了一笔巨款以阻止这部书的问世，因此，《陈洁如回忆录》一直成为大家想看而又看不到的“秘笈”。

《陈洁如回忆录》英文打字原稿静静地躺在加州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30多年，约在1990年台湾一位青年史学工作者到了美国，他在加州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进行研究时，在民国人物张歆海的档案里，偶然发现了蒋介石的弃妇陈洁如回忆录稿本。

发现此书的年轻史学家，兴奋之余，立即告诉了伊利诺大学的中国近代史教授易劳逸。易劳逸是当今美国的“国民党学”权威学者，听到这个消息后，迫不及待地奔赴胡佛研究所阅看新材料。据易劳逸说，《陈洁如回忆录》颇具价值，但对史事的回忆与叙述，谬误不少，所以他又专程跑到台北搜集资料，然而在旅台期间，易教授却突患脑病不得不中途停止工作而返美就医。

学界并无“秘密”可言，胡佛研究所准许学者复印“陈传”（一次以复印一百页为限），于是，《陈洁如回忆录》珍藏于胡佛研究所的消息在学界传开。

《陈洁如回忆录》的“出土”，当然是史学界的“爆炸新闻”。台北《新新闻》周刊和《传记文学》杂志分别以快速行动翻译连载和出书。

出版前后离奇诡谲

陈洁如的《回忆录》怎么会存放在张歆海的档案里的呢？学界的看法是：美国出版社当年准备出版该书时，可能曾请张氏过目审阅。另一种说法是：胡佛研究所工作人员误放在张氏的档案里。张歆海为哈佛大学博士历任国民党政府驻波兰捷克公使和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亦曾执教于美国学府，抗战期间在好莱坞工作，1972年12月去世。

亦有人怀疑张歆海是陈洁如回忆录的撰稿人。但在张氏的档案中并无任何材料证明此说。而以张氏的史学造诣，亦不可能写出这样文字平平、史事错谬不少的陈洁如回忆录。

总之，自写作、交涉出版到封杀出局，《陈洁如回忆录》的命运充满了神秘、离奇与诡谲，其中又包含了金钱、威胁和血腥。这一段曲折的经过，几经探求，才在美国东部一所著名大学图书馆特藏室的一份档案中找到了完整的答案。

30多年前，所有参与《陈洁如回忆录》出版与封杀工作的人，如今几乎都已作古，只有陈立夫仍然健在，而陈立夫又是一个关键人物。

三人合力写回忆录

陈洁如的外孙陈忠人在 1983 年 6 月 1 日出版的香港《百姓》半月刊上，写了一篇《纪念外婆——陈洁如》，他说：“我承应有些长辈的嘱咐，在我外婆的日记、书信和自传手稿整理出版前夕，先从中抽出二、三件事来，写成这篇短文，算做对外婆的纪念，藉以一抒 12 年来的哀思。”陈忠人所提到的“在我外婆的日记、书信和自传手稿整理出版前夕”，事实上，并未出版，也许又遭到了封杀。但陈洁如确实留下了日记、书信和自传手稿。

陈洁如在 1927 年 8 月 19 日搭“杰克逊总统”号轮船到美国。许多记载说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博士学位，又说她在美国住了 40 多年，葬在旧金山，这些都属讹传。陈洁如在美国只住了 5 年，先读哥大，后肄业宾州州立大学，1932 年回上海，1961 年自沪抵港，1971 年 2 月 21 日去世。

据美国东部某大学特藏室的档案资料证明，《陈洁如回忆录》是由 3 个人合作完成的，这 3 个人就是传主陈洁如和李氏兄弟李荫生、李明敏。他们 3 个人合作撰写的时间，是 1961 年陈洁如移居香港以后，约在 1963 年。陈洁如提供口述、日记和中文自传手稿，主要的撰定人则是李荫生；李明敏负责编制人名与地名的注释表。

但从整部回忆录的内容、写作方式、结构、行文、叙事来看，“真正的作者”应是李荫生。此传虽采取以第一人称（陈洁如），其实却是李荫生为陈洁如作传。

关于李荫生是回忆录的真正作者的另一证据是，本书许多人名之英文拼法系以广东话拼成（李是广东人）。

最令人遗憾的是，李荫生不是专业史家，亦非训练有素的业余史家，所以整部回忆录出现颇多史实上的错误。

李氏兄弟全程参与回忆录的写作、出版交涉与谈判，且是“怂恿”（陈立夫语）陈洁如发表的主要人物。李氏兄弟为什么要鼓励陈洁如写回忆录？他们的身世与背景又如何？

原来李氏兄弟是蒋介石的老朋友，20 年代初期，蒋介石偕陈洁如到香港游玩时，即由李氏兄弟作招待。李氏兄弟世居香港，其父为一爱国华侨，曾大力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颇受孙、蒋敬重。李荫生是个医生，曾在上海经商，喜从事慈善事业，晚年移民纽约；李明敏曾在香港一家银行任职，据称曾教过蒋介石和陈洁如的英文。

李氏兄弟虽与蒋介石颇友好，但后来却逐渐疏远。李氏兄弟沦落香江，纽约后境遇颇差，今非昔比，满腔怨气，都怪蒋介石治国无方。1965 年 1 月 3 日，李荫生在写给李明敏的信上就说，如非蒋介石的无能，我们今天仍可在上海过好日子。

因此，陈洁如到香港之后，李氏兄弟就想到一个既有意义、又能发财的

点子，那就是促请他们心目中的蒋夫人陈洁如发表回忆录，他们可以和她合作。

从李荫生出面交涉出版到国民党花钱收买，历经了 17 个月密集而又激烈的争执，涉及到人物，除了一些美国人之外，当包括蒋经国、陈立夫、驻纽约“总领事”俞国斌（俞国华之弟）、律师江一平及一些来路不明的打手与小偷。

1963 年 11 月，李荫生走进纽约市一家名叫 PROOF IN-CORPORATED 的公司，找该公司老板希尔做经纪人，寻求出版公司出版《陈洁如回忆录》，希尔一口答应。

美国书商兴趣浓厚

陈洁如与希尔签订的 5 年合约上，言明回忆录出版后如被改编为电影、舞台剧，希尔可获得 10% 佣金。

1964 年 1 月 10 日，希尔取得了《陈洁如回忆录》稿件和陈洁如的委托书，获授权负责交涉回忆录的出版。陈洁如希望回忆录出版时，在书中附印 50 张珍贵照片，并言明在 4 个月内出版，否则将在欧洲另找出版公司。希尔一面向美国新闻媒体宣传回忆录的价值，一面竟不忘为自己提高知名度。

关于回忆录的书名，曾拟了两个方案：（一）“我做了七年的蒋介石夫人”（二）“蒋介石的秘密岁月”。后来决定采用《我做了七年的蒋介石夫人》。

希尔受到陈洁如的委托之后，开始进行“推荐”工作。他采取了几项策略，一方面向美国媒体发布新闻，宣称蒋介石的另一位夫人已撰写回忆录，并物色出版商，一方面向台湾当局放出试探气球，他写信给当时在纽约的宋蔼龄、在新泽西州的陈立夫，声称要“核对”一些史实。

美国的一些报章杂志有了反应，1964 年 4 月 11 日出版的《北美新闻联盟》杂志即报道了《陈洁如回忆录》的消息，并刊出了部分内容。纽约的大出版公司戴布迭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并由该公司的马考密克与希尔联络。此外，亦有杂志希望连载回忆录，足见回忆录确受重视。

那时，李荫生在纽约配合希尔推动“促销”工作，李明敏则在香港为陈洁如策划。陈洁如要出版回忆录的事情，终于传遍全球，惊动了蒋家和宋家在美国的亲友，也震动了台北的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于是，由蒋经国做“总提调”，展开全面阻止和封杀回忆录的出版作业。

一生住在纽约，从未被打、被偷的希尔，突然在一个深夜，在纽约市曼哈顿四十五街遭一群恶汉一顿毒打，公寓亦遭小偷光顾，翻箱倒柜。这些意外事件为什么会发生？是不是蒋家手下出此下策，雇佣纽约流氓施毒手以吓阻希尔？当年“上海滩”上白相人的做法又在 60 年代的纽约重现了吗？

不知是否被打、被偷的缘故，或是受到蒋家的压力，希尔后来变得很“讨

厌”、很厌烦，亦未再大力推销回忆录。李荫生甚至建议陈洁如控告希尔，指他未做好经纪人，李明敏亦准备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广告，终止希尔的代理权。

1964年初，台湾当局驻纽约“总领事”俞国斌打电话给希尔，请希尔到新泽西州湖林城陈立夫公馆谈一谈，希尔拒绝，要陈、俞到曼哈顿见面。同年2月13日陈立夫、俞国斌及当时在联合国做事的赖景瑚（ ）一起拜访希尔，希望他停止出版《陈洁如回忆录》及所有宣传活动。希尔虽然婉拒，但谈判大门已经敞开。

陈立夫奉命去劝导

随着事态的发展，遭到最大压力的当然是主角陈洁如本人。陈洁如所受的压力是多方面的；第一，蒋家准备中断对她的接济。陈洁如到香港后，景况不佳。完全靠蒋家透过戴安国（陈洁如称安国与蒋纬国同为戴传贤之子）之手，所提供的每3个月500美元生活费过活，陈洁如颇忧虑这笔接济中断；第二，蒋仆石当年与陈洁如关系不错时，常要陈洁如听从陈果夫的话，果夫已逝，其弟立夫即应蒋经国之请，负起“劝导”陈洁如的任务，而立夫与洁如亦颇为熟稔。陈立夫虽遭蒋家放逐在美养鸡、包湖州粽子、做辣椒酱卖给唐人街商铺，但逢此机会，正可“戴罪”立功，再度好好为蒋家主子效命。

陈立夫写了几封信给陈洁如，第一封信称赞她在女儿陈瑶光（1924年自广州平民医院）于大陆生病时，未向何香凝、宋庆龄哭诉请求帮助，是对的；但也警告她勿向蒋介石要钱，称“如你伤害蒋公，则你女儿的病亦不会好转”，并反对她在香港购屋置产。

1964年11月4日，陈立夫又写了一封信给陈洁如，信函全文如下：

洁如女士：

知闻君复受人怂恿，拟出版某种书物，立夫为君着想，实为不智。不但外人将认为此乃共党之恶意宣传，而绝不会发生真影响，对君本身而言，则有百害而无一利，前面已详陈之。

希望君一如往昔，保持个人伟大人格，重友谊而轻物资，不为歹人所利用，此乃立夫所期望于君者也。

今后计划如何？望示知一二为盼。

敬请

福安

陈立夫敬启

两方人马竞相鼓励

陈洁如在香港无依无靠，又病又穷，只有李时敏为她想办法，而她在巨大的压力下，出版回忆录的意志似乎有点动摇，她陷入两难的困境：既想出书以出名获利，又想顾及蒋介石的颜面。李荫生获悉陈洁如“意志不坚定”之后，曾去信鼓励她要坚定、要挺住。其时陈洁如住在香港北角。

蒋介石曾在1960年经由戴安国转交给陈洁如一封信，信上称她“为人一向温良敦厚”，又说：“曩昔风雨同舟的日子里，所受照拂，未尝须臾去怀。”然而，蒋与陈离异后，从未承认她曾经是蒋夫人，亦否认他们曾正式结过婚，1927年12月1日，蒋与宋美龄在上海大华饭店结婚时，当天即在《申报》刊登启事称：“毛氏发妻，早经仳离；姚陈二妾，本无契约。”对蒋的“赖帐”，陈洁如颇为光火，每念及此，她就会兴起出书的冲动。倒是陈立夫在书信上向陈洁如表示，承认她过去是名副其实的蒋夫人。

李荫生、李时敏兄弟的情况亦欠佳，都没什么钱，又皆为六、七十岁的老人，尤其是李荫生，显然是最热衷出版回忆录的人，他不但鼓励陈洁如，亦为李时敏打气，叫他千万不要气馁，他说：“我们两兄弟，年纪已大，又非多金，不应轻易放弃此机会。”陈洁如早已答应事成后给他们酬劳。他们不满意希尔的表现，一度想告他，以便引起媒体注意。

证婚律师竟来谈判

蒋家的阻止作业愈来愈紧迫了，陈洁如亦越来越拿不定主意，戴布迭出版公司准备和她签约，并预付10万元的头期款，却遭她拒绝了，陈立夫亦曾跑到戴布迭公司谈判，但遭逐出，快快而退。

蒋家为了“擒贼先擒王”，乃就地在香港请名律师江一平，直接找陈洁如谈判。江一平不是别人，而是20年代初期为蒋介石和陈洁如办结婚手续的上海律师，江一平拿一份文件给陈洁如和李时敏看，这份1937年的文件载明：蒋介石曾拨出一大笔钱（一说10万美元）给陈洁如，“规定”陈今后不得讲述或撰写任何有关她和蒋的私事。

蒋家的谈判代表，在香港和纽约两地进行。俞国斌和陈立夫分别与李荫生夫妇、希尔在纽约谈判。希尔后来虽不再担任陈洁如的经纪人，但他在1964年1月10日所获得的回忆录稿件，仍在他手上，俞国斌和陈立夫还得同他交锋。

颇为无奈的李荫生写信告诉在香港的陈洁如，表示不论谈判是否成功，她必须要保持三种文件，绝不可交出；（一）她和蒋的结婚证书；（二）宋美龄以前寄给蒋的信（信中宋称陈洁如为蒋夫人）；（三）陈立夫的信。

谈判终于出现转机

1965年1月15日，李荫生告诉李时敏说，蒋家已自称在谈判中占了上风，而李氏兄弟对陈洁如未向他们透露每3个月拿蒋家500美元津贴一事，犹余恨未消（陈是在1964年4月1日始告诉他们）。

在纽约，俞国斌向李荫生开价10万美元收购回忆录，在一旁的李妻MURIEL插嘴说，那批50张原版照片都不止10万美元。纽约和香港两地的谈判都不大顺利。陈立夫拍电报给蒋经国，报告最新“军情”，过去曾一直喊陈洁如为“上海姆妈”的经国，对“姆妈”颇不谅解，并认为她没有诚意，500美元的生活费准备停掉。

但在1965年1月30日左右，两地谈判突现转机，蒋家决定尽快结束僵持局面。

据李荫生说，他相信陈立夫付了6万5千美元给希尔把回忆录搞件和有关资料交出，并保证不再插手此事。

2月中旬，李荫生致函李时敏，声称停止参与此事。此时，陈洁如写一封信给李荫生，答应留一份回忆录的影印本给他。

1965年3月底，江一平律师和陈洁如、李时敏达成了最后协议：蒋家付25万美元给陈洁如，陈则交出3份回忆录的原稿和影印本，以及50张珍贵照片，并以文字保证今后绝对“噤若寒蝉”。陈洁如从25万元里抽了1万7千元给李荫生。

从此，《陈洁如回忆录》即“云深不知处”，直到1991年始重现人间，也是直到蒋家花巨款收买后的27年，才有中译本出现，31万5千美元和庞大的律师费、交涉费都白花了，历史总不会永远隐藏的；金钱与威胁只能得逞于一时，而无法扬威于久远。陈洁如、希尔交出了稿件，他们难道不会私下保存一些“样本”吗？蒋介石、蒋经国、俞国斌、陈立夫等人都在白费心机了，他们唯一的“收获”是：世人晚了27年才看到回忆录。

陈洁如于1971年2月临终前，写了最后一封信给当年的“老伴”蒋介石，她说：

30多年来，我的委屈君难知之。然而，为保持君等家国名誉，我一直忍受着最大的自我牺牲，至死不肯为人利用。

陈洁如死后4年，蒋介石也死了。蒋介石生前在“总统府”，死后在慈湖享受着生荣死哀，而“弃妇”陈洁如除了“独留青冢向黄昏”之外，只留下生前未及出版的回忆录，聊供后人展卷沉思！

第六节 陈洁如披露“秘笈”

听从母命决定嫁蒋

蒋介石的第三夫人陈洁如，多少年来一直是一位神秘莫测的人。对于她的身世，有的说她是上海长三堂子的姐妹，是个“高级艺妓”。对于她和蒋介石缔婚的经过，也是各有说法：有的说是张静江玩长三堂子所识，介绍给蒋的；有的说是蒋涉足青楼亲自看中的。所有这些众多说法，与陈洁如自传所云，均有程度不同的出入。现将陈洁如自传有关内容介绍出来，以飨读者。

据陈洁如自己说，她是江苏苏州人，1906年出生于上海，原名陈阿凤。还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她有个邻居好友朱逸民，年轻貌美，被张静江续弦为妻，陈洁如也因此常去张家了。她就是在张静江家认识蒋介石的。

那时候，蒋介石滞居上海，与张静江、戴季陶等人合伙从事投机买卖，充当证券交易所经纪人，因而常来张家。他在张家见了陈洁如后，就被她婷婷玉立的高挑身材的风韵绰约的稚嫩姿色所倾倒，常常寻找机会与她搭话。蒋介石还向张静江夫妇表示了要娶陈洁如的心意，要求他们从中说合，但陈洁如始终不允。

1921年9月，陈洁如的父亲死了，蒋介石十分殷勤地帮助料理陈父的丧事，博得陈母的好感。陈母向张静江夫妇了解蒋的身世与为人，听到的都是夸赞之词，乃同意了蒋的娶陈要求。

虽然陈洁如嫌蒋的年岁比自己大一倍多（时蒋已34岁，陈还不到16周岁），一再抗婚，但母命高于一切，她的好友朱逸民又一再劝慰，并说蒋介石如何聪明能干。陈洁如在连哄带骗之下，终于听从了母亲的决定。

介绍毛、姚两夫人

获悉陈洁如同意婚事后，蒋介石非常高兴。他立即将陈洁如约带到法租界的法国公园去，在公园的长凳上，蒋一个劲儿地谈自己。

突然，他停顿了。接着，用较为低调的语气说：“我不知道你听说过关于我前妻和前妾的什么事，但我很希望你向我解释，我和我的第一任妻子毛氏是配婚的——完全由我母亲作主。在不愉快的婚姻里，她只为我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就虔诚信佛了。1916年，我的挚友和良师陈其美遇刺身亡，刺客继续追杀我，我在好友冯介文的协助下，匿居在他苏州的老巢——‘苏州乐园’里，他在那儿介绍我认识了一位歌女姚氏。姚氏是个娇小的美人，十分可爱，我们很快便成为密友。我把姚氏接出‘苏州乐园’，作我的姨太太。现在毛氏和姚氏都同意接受赡养费，跟我脱离夫妻关系，彼此同意以兄妹相待。令堂对这些都调查过了，知道我说的都是实情。现在我要告诉你我心里的话，请你仔细听着：如果你答应嫁给我，依照民国的法律，你就是我唯一的合法

妻子。”陈虽然很想答应她，但怎么也说不出口。这时，蒋介石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弹簧刀，亮出闪闪的刀刃，说道：“如果你不相信我真心爱你，让我用这把刀切下我的一根手指，让你知道我是认真的。怎么样，你说！”

他把手掌张开伸向陈，继续说：“我用血来发誓，此情不渝！”陈被这个举动吓呆了，连忙抓住他的手。“求求你、求求你把刀收起来——我相信你——把刀收起来吧！”她结结巴巴地说，既害怕又感动。

订婚以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和陈洁如依照西方习惯，整天逛街购物和拜访亲友。到了下午，他们坐在南京路的巧克力店里喝冷饮，蒋说：

“‘阿凤’是乳名，只有你母亲才能叫。我替你取了一个新名字，我想它和你的个性很相配；这个名字是‘洁如’，意思是‘纯洁脱俗’，在我眼中你正是纯洁脱俗。你喜欢吗？这个给你！”他取出一张自己的相片，左边写着“陈洁如”三个字，也签了自己的名字。

婚后吐露三个愿望

蒋、陈的婚礼于1921年12月5日，在上海永安大楼“大东饭店”的大厅里悄悄举行。蒋介石送陈洁如的结婚礼物是一架小型的“柯达”相机，陈则送他一块配有金链的金挂表。3点正，婚礼开始，证婚人张静江坐在礼桌的中央，他的左边是男方主婚人戴季陶，右边是女方主婚人陈的母亲陈吴氏。大约有50位亲友分坐在大厅两侧，兴奋地参观这场愉快的婚礼。

婚后第二天，蒋介石向新婚夫人吐露心事：“我母亲过世的时候我非常难过，因为我自己那时一事无成，不能报答慈恩。在悲痛中我检讨平生，自问到底志向何在，有好几天我不断地思索这个问题，最后终于定下了三项绝对希望达到的目标。从那以后我每天都祈求这三项目标能实现。”

“哪三项目标？”陈问。

蒋说：“第一，娶你作我的妻子；第二，赢得我们领袖孙中山的信任，使我最终能作他的继承人；第三，成为一个最伟大的军事领袖，把中国统一在一个中央政府之下。”

就在新婚之后的第五天，蒋介石携新夫人抵达他那风光如画的家乡——溪口。高大的屋门前，站着一位矮小的妇人。蒋介石为陈介绍，这是他的第一任妻子毛福梅。陈恭敬地向她鞠躬，她也回礼，一面和气地说：“欢迎你！今天你回家来，真是我们的福气，希望你为这个家带来兴旺。”说着她拉住陈的左手，引她进屋。

有一天，毛福梅和陈洁如坐在客厅里叠银纸，她着急地问陈：“你在上海看见我的儿子经国没有？他才11岁，和他的父亲一样有冒险精神。他讨厌待在家里，一心想出门。他是个好孩子，”她若有所思地说：“而且很懂事，但就是怕他父亲。我实在担心他一个人在外面，又离家这么远。”

“你不必担心他。”陈安慰道：“我保证回上海以后会尽我之力帮他的

忙。”

新婚一月冒出两个儿子

从溪口回上海后的第四天早上，旅馆的侍应生敲开房门，送进来一个小男孩，看起来像是个土里土气的学生。

“爸爸！”他对着蒋介石叫道，然后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蒋介石望了他一眼，指着陈洁如粗暴地说：“这是你的新母亲！去向她行礼！”小男孩走过来，紧张地看着陈说，“姆妈！”一边叫一边作45度鞠躬。

“他是我的儿子经国。”蒋介石说。

“原来你就是经国。”陈洁如用友善的口气招呼他，心里马上想起毛福梅，和自己对她承诺：“坐下来和我谈谈。”她指着附近一张椅子，可是令她吃惊的是，他不肯坐。蒋介石很不耐烦，只随便地瞄了他一眼。幸好旅馆的侍应生进来说有人打电话找蒋介石，这才结束了尴尬的场面。蒋介石走出房间后，陈走到蒋经国身边，牵他的手去坐椅子。

“你千万不要这么客气，”她和蔼地说：“坐下来随便一些。我希望你无论什么时候来见我，都感到自在。来，谈谈你自己，我对你的一切都有兴趣知道，我向你的母亲保证会照顾你的。”可是这孩子更颤抖得厉害，一句话也不说。

“我见到了你母亲，她对你很牵挂。你最近有没有写信给她？”

他摇摇头。

“你一定得给你母亲写信，至少一周一次，告诉她你很好。要养成习惯经常写家信，你晓得你母亲有多不放心，她叫我照顾你，我也向她保证会这么做。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不管是什么事，请务必告诉我，好不好？”

他终于点点头，面上仍无表情。

为了缓和气氛，陈到她的梳妆台上拿了40块钱，把其中20块用红纸包好。另外20块放在桌上。

“这是给你的红包。”她把红纸包的递给他。

“谢谢。”他一边说着，一边又鞠躬，然后坐下。

“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她问，“法租界陈果夫叔叔的家里。”

“别忘了我的话，”陈提醒他道：“如果有任何我帮得上忙的事，就告诉我。好不好？”

“好，我会的。”

“你的衣服鞋子够穿吗？”

“够穿，谢谢。”

这孩子终于不再害怕了，陈洁如觉得很欣慰。又把桌上20块钱拿给他。他们开始正常地谈话，他甚至活泼地形容着他的学校和朋友。可是，蒋介石

回房间了，蒋经国马上从椅子上站起来，恭敬地立正。陈洁如看出他又恢复了紧张，闭口不言。

那天晚上蒋经国告辞以前，陈洁如叫他跟他父亲握手，父子俩总算友善一些了。等陈和蒋介石单独在一起时，她对他说：“经国是个好孩子，也很懂事。他心里很喜欢你，你以后对他说话不要太严厉，你也许不知道，你的大嗓门让他很害怕。”

“我不想惯他！”蒋介石马上回答说：“男孩子一定知道自己的地位和进退分寸”“一个小孩子一定得学会孝顺、负责和恭敬，一定得守规矩。最糟的就是被父母溺爱。”

“我求求你，别对他太凶了。说话的时候语气和缓一些，要不尖声大叫。”他沉默了一会儿，“好吧，我试试看。”

如果有人告诉陈洁如，结婚以后一个月不到，就会有两个儿子，她作梦也不会相信。这天，他们结婚的“正式”介绍人冯介文突然从苏州来看他们，还带来一个6岁的小男孩，陈洁如真是大吃一惊。这个小男孩长得很可爱，脸型瘦长、身材纤弱，有一双细黑的眼睛和漂亮的面孔，可是太瘦弱、太瘦弱了。

蒋介石抱起这个小男孩，充满怜爱地逗着他，然后对他说：“这是你的新妈妈，对她说：‘好妈妈！’”

“好妈妈！”这孩子害羞而听话地小声叫。

“真是可爱的孩子！他是谁？叫什么名字？”陈惊奇地问。“他是你的第二个儿子，叫纬国。我以后会把他的事情告诉你。”

蒋介石悄悄地向陈诉说蒋纬国的身世：

几个月前，我正在我们环龙路44号的总机关里，门铃响了好几回，我开门一看，老天爷——一位日本妇人抱着一个小男孩站在那儿。我们立刻认出了彼此，因为她是我在东京时的老朋友。我立刻请她走进客厅。

“美智女士，你好吧？”我问她：“什么时候到上海来的？快请进来，我去叫戴季陶下来见你，他住在二楼。你等着。”这位妇人对我行日本式的深鞠躬，然后说：“这个小男孩是戴季陶的骨肉，你觉得他像不像他父亲？”她兴奋地坐下来。我三步并作两步地冲上楼，大声叫着：“季陶！季陶！你猜谁来了，是美智子来找你，她还带来了你的儿子！哈哈！儿子找爸爸呢！”我高兴的喊声传遍了整栋房子。

但我一看到戴季陶惨白的脸，不禁吓了一跳。他悄悄地把我拉进他的房间，关上门，然后压低了嗓门说：“我在日本的那段荒唐日子已经过去了。我曾经一度风流，但现在不愿再想起过去，如今我有自己的妻子和小孩，不能和美智子恢复以往的关系；我既不想见她，也不想见那个男孩，请你替我找个藉口，赶快把她弄走，就说我不在——怎么说都行——只要弄走她就成。”

我垂头丧气地走下楼，不知如何编出一个理由来应付美智子。我知道她是个善良的人，因为当年她总是温柔优雅而和善。我试着不想伤她的心，所以走进客厅后就对她说：“美智子女士，真是抱歉！季陶不在，我不清楚他什么时候回来，你要不要留个话给他？”我看出美智子沮丧得几乎要哭了。

“我来上海是错了。我相信了那个男人的甜言蜜语，以为他真的爱我，所以才不辞辛苦、千里迢迢地把他的儿子带来给他看。我以为我们可以恢复当年的关系——这是他离开日本时向我作的保证。现在我才知道这个团圆的美梦只是痴想，我只怪自己是个痴心的傻子。”她终于哭了起来。

她抬头望着窗外，然后拿定主意说：“蒋先生，请你告诉他，如果他不要自己的亲骨肉，我也不要！”说着她匆匆地吻了一下小男孩，便夺门而出。

这就是这个小男孩的来历，无父无母的，我只好把他收作自己的儿子，替他取名纬国。我安排福梅和姚氏轮流照顾他，每人照顾三个月，所以他明天一早就要到溪口去。

陈洁如望着蒋介石说：“可是这孩子这么瘦弱，你一定叫福梅让他多吃点牛奶鸡蛋。”

“我会的。现在你有两个儿子了”，蒋介石开玩笑地说：“感觉如何？”

“新婚才一个月就冒出两个儿子来，的确有点奇怪。”依照风俗，陈洁如也包了一个20元钱的红包给蒋纬国作“见面礼”。这孩子十分高兴，渐渐地不再害羞了。他很有好感地望着陈，开始问她各式各样的问题。陈给他一些糖果饼干吃，他也会微笑着说：“谢谢！”后来他在房里跑出跑进，对这个房间感到既新鲜又有趣。

当蒋介石叫他做一些事，譬如关门、按铃、拿报纸等等，蒋纬国都听话地照办。他绝顶聪明，也非常好奇。看到桌上的东西，他会问那是什么，有什么用，不问个清楚不会罢休。陈洁如觉得这样很好，所以尽量回答他所有的问题，但蒋介石开玩笑地对她说：“你快要惯坏他了！”

陈炯明叛变

1922年春夏之交时期，陈洁如经常想到一句话，“不满他人往往是由于不满自己”。这句话对蒋介石很适用，因为她知道他心中对自己的前途十分不满，认为自己好比龙困浅滩，无法施展身手。这种不满使他怀疑陈炯明和他在孙中山面前争宠。

蒋介石自视甚高，因为他是当时孙中山左右唯一的留日军事专家。他又是曾追随孙中山的重要助手陈其美为缔造民国出过力；如今他决心协助孙中山献身革命，很希望受到重视。

另一方面，陈炯明觉得他自己很了不起。他从很早就参加缔造民国的革

命，后来作到粤军总司令，驱逐陆荣廷，把孙中山迎回广州。毫无疑问，他是当时华南最重要的军事领袖。他很聪明地提出“粤人治粤”的口号，赢得广州民众的支持。广西军阀陆荣廷就因为不是广东人，才被赶走。陈炯明的想法只用广东人作自己的部下，所以当孙中山推荐蒋介石——一个浙江人——到他军中去时，陈炯明接受得很勉强。

蒋介石很清楚这一点，两个人之间开始发生争风吃醋、彼此敌视的暗潮。为了保护孙中山不受陈炯明的暗算，蒋介石屡次向孙中山先生指出陈炯明的阴险，力劝孙中山以大总统的名义下令削弱陈炯明的权力，甚至将他免职，以防变乱。

消息——尤其是坏消息，传得很快，陈炯明自然有耳闻。他深怕孙中山迟早会采纳蒋介石的建议，心中极为不安。

1922年6月18日，孙中山给在上海的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

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我已安抵港外‘永丰’舰上，准备反攻。

孙文

“你看这封电报”，蒋介石说，陈被这个消息吓呆了。“我早就料到了！我早就料到了！”他高声大叫，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气得发抖。陈从来没有见他这么生气过。突然间他转头对她下令道：“收拾行李，我们搭第一班船到广州去！”

6月20日，蒋介石和陈从上海出发，经香港赴广州。29日抵达珠江，但没有上岸。在船上买办的好心协助下，他们租了一艘汽艇。直驶珠江另一端的黄埔，在那里他们看到七艘蓝灰色的兵舰，烟囱里都冒着烟。他们登上“永丰”舰去见孙中山，他几天前才从“楚囚”舰迁移到这儿来。

当蒋介石和陈洁如登上“永丰”舰时，孙中山见到他们，眼眶中满是泪水，有好一会儿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等他恢复平静能出声以后，又有太多的事要告诉他们，一直讲个不停。

不久接到报告，留在岸上效忠孙中山的军队，不是被歼灭就是作了陈炯明的俘虏。苦守长洲要塞的士兵也只有投降了。

蒋介石立刻开始指挥孙所掌握的七艘兵舰。他认为沿江再往上游行驶一段，比较安全。他们先驶过在两座主要塞火力之内的危险区，然后再经过第三座要塞：车尾。为了谨慎起见，蒋介石坚持请孙中山和陈躲在底舱，他自己则和舰长留在舰桥上发号施令。

兵舰沿着珠江蛇行，一面猛烈地向岸上要塞开炮；要塞的炮也没有闲着，一炮对一炮地还击，其主要的目标正是“永丰”舰。那天下午非常闷热，陈看孙中山坐在桌前写演讲稿，汗珠从他宽阔的前额溢出，顺着眉毛流下来，她把湿毛巾递给他擦脸，然后站在他身后用荷叶扇左右扇着，让他凉快些。就在这时候，一颗炮弹击中了舰首，整艘兵舰剧烈地震动着，使陈跌倒在地。

孙中山站起来扶住桌子，但他的椅子翻了，压在陈身上。等陈站起来时，发现自己的衬裤粘在大腿上，才知道不自觉地吓出尿来。

这真是一次恐怖的经验，尤其是炮击还继续不停，共有六发之多。幸亏兵舰没有受到严重损失，不过花了半个多小时才驶过危险区。

股票经纪人

回到上海，冷清的日子并未使蒋介石的心情平静。他这一生从来没有觉得这样泄气过。一想到陈炯明正在遥远的广州享受着胜利的荣耀，就像一把利刃插在他滴血的心上。在绝望消沉中，他写信给国民党的诸位领袖，以大骂陈炯明为排遣，只有这样才能发泄他的心头之恨。他也给胡汉民和汪精卫写信，向他们下最后通牒，要他们在 10 天内反攻广州，赶走他的仇人，否则他就和他们绝交。

每天都极为暴躁，这是自与陈洁如结婚后，他第一次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陈想，非得想个方法纾解他心中的强烈仇恨不可，否则他很可能精神失常。她知道仇恨决不能用仇恨来抑止，只有用关爱来化消。因此她开始让他轻松一些，尽量和他开开玩笑，但实在不易做到。

她向好友朱逸民问计。朱说：“让他跟我先生炒股票吧！我先生正在组织一家股票交易所，介石可以加入。”

“需要很多钱吗？”陈问。

“不需要太多”，她答道：“去问问我先生，他会详细地告诉你。”张静江仍像往常一样地非常和气，他告诉陈说：

“我们计划中的交易所名叫‘盛泰号’，专门买卖股票，赚佣金，有时候利润很大，目前已经有 16 个合伙人，如果蒋介石加入，他就是第 17 个。我们的资金是 5 万元，每个合伙人至少出一股，每股 1000 元。交易所在上海股市会占 4 个位子，我只是顾问，张秉三先生是我们的大股东兼经理。但我会叫他让蒋介石入伙，我相信他会同意的。”

于是经由张静江的介绍，蒋介石以“蒋纬”的名字买了“盛泰号”的四个股。他细读有关金融的书籍，学习如何买卖股票和投资。这对他来说十分新鲜，不仅各种股票涨跌的兴奋——尤其是他可能得到的利润——就占住了他整个心思，他整日研究哪些股票好，哪些股票坏，逐渐忘记了心中原有的仇恨。

在上海股票大楼中占有一个席位相当难得，因此蒋介石工作得既努力又积极。股票交易是上海金融不可或缺的一环，数以千计赖此维生的投机者，每天都把大楼挤得水泄不通。蒋介石就像一头老鹰似地盯住市场的走势，买卖高低，如同者手。最热闹的股票是纺织、谷类、土地和公用事业等。但情况也不稳定，发生波动的时候，买卖极近疯狂，人们为了自保还会大打出手。每周五天，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 10 点和下午 4 点之间，股票大楼人潮汹

涌。而从 1922 年 9 月到 1923 年 2 月，蒋介石正是干着这一行。

蒋介石的性格

作为一个军事领袖人，蒋介石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指挥官。例如，不知有多少次，当他和陈洁如走过阅兵场到码头乘坐他们的机动游艇到广州去时，他会突然停步，叫住一名士兵，问他为何不扣风纪扣，为何不系好皮鞋的鞋带。如果得不到满意的回答，他会叫班长来训斥一顿，命令他惩戒这名士兵，或将他关禁闭。他常向部下大叫：“和长官谈话时要立正！”

蒋介石的性格中最强烈的一点是自大。他对批评很敏感，并容易发怒，他很少称赞军中的同胞和他们的意见，即使是公认的天才他也不看在眼里。因凡事都想争第一，他常做视济辈，并只交对他有用或可助其达成目的朋友。但在一旦已无利用价值时，不管是多亲近的朋友，他都会弃如敝履。由于此种脾气，他常在一夜之间树敌。他的好友屈指可数，除孙逸仙外，他的四个好友是他的亲信顾问和财务支援者张静江、他的长官许崇智、财政部长廖仲愷和学者戴季陶。

蒋介石的地位一天比一天重要，但在实施新计划或进行任何新的改变之前，仍必须先获得国民党中的大者们同意。当时有三个部，广东军总司令兼作战部长是由蒋介石的上司许崇智担任，财政部长是廖仲愷，外交部长是元老伍廷芳之子伍朝枢。

但在上述三部之外，还有许多由共产党担任主管的部或局，在革命议会中代表共产党的谭平山担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是毛泽东，劳工、农民、青年和妇女等其他四部的部长也都是共产党员。整体说来，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势力是一比六。

为了亲近各部长及急于改革政府，蒋介石每周至少要见这些人三次。议会的议员们耐心地听他的意见，而且总是批准他的大部分请求。另一方面，他鼓励黄埔军校的学员，亲自为他们中的许多人佩带臂章，并向他们作精神训话。此外，他也在许多公开场合出现，并告诉他的军官们：“我们是个大家庭，必须服从三民主义！”

当时的国民党上层，自孙中山以下，依次为：江精卫、胡汉民、许崇智、廖仲愷、刘震寰、吴稚晖和蒋介石。

所有这些都各有不同的特色。孙中山依据他们的年资和重要性在政府中任职。蒋介石以军校校长的身份位居第七，也就是最末的一位。

蒋介石认为对党务工作了如指掌是他的职责，不久他就树立了决策方面的权威性。当然，以其只是一个新进小老弟的身份，因此招致了不少妒嫉，蒋介石也深知这一点，但他自认为是超越党派或阶级之上的孙中山唯一真正的继承人。他也朝此一目标努力。

蒋介石的个性固执、敏感、刚愎、急躁而富于企图心，每受一点小小的

挫折就大发雷霆而且不管有谁在场。陈洁如常劝他改掉此一弱点。

因为他一直剃光头，因此得了个“蒋光头”的绰号。在北方军队中，剃光头是常事，但在广东军队中却不常见。

经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女士）的介绍，蒋介石在高官群居的东山何香凝住宅的隔壁租了一间现代化的两房小宅，由于蒋介石在广州身兼数职，必须常驻广州，故所赁住宅对他们十分方便。

中山舰事件

1926年的3月18日，宅中的电话铃声大作，打电话的是汪精卫夫人。她问“蒋介石在吗？”

“不在，”陈洁如说，“他开会去了。”

“你知道他今夜何时去黄埔？我们有要事见他。”

“很难说，”陈回答说，“但我知道他今晚在军校有一个会要开，很可能在6时前离开广州。”

“从哪一个码头走？”陈璧君问。

“你为什么要问？”“因为精卫与你丈夫有约，希望和他同去黄埔。因为码头有两个，所以我知道蒋介石用哪个码头。”

“因为蒋介石不在，所以我不能告诉你。可否等他回来时我立刻打电话给你？”

陈璧君说：“好！”挂断了电话。

在以后的两小时中，陈璧君不断地打电话来，一共打了5次，都急着问我同一个问题。

“这就怪了，”陈自忖说，“她为何如此着急？她在捣什么鬼？”

大家都知道，高傲的陈璧君从来做事都有目的，所以陈就愈想愈觉得可疑。

那天下午蒋介石回来时，我就问他：“汪精卫和你约好今晚同去黄埔吗？”

“没有呀。”他随口回答说。

“但陈璧君说，精卫和你约好了的。”

“我不知道。”蒋介石回答说。

“这就有点可疑，”陈说，“你今夜最好在家，明天再去黄埔，我有预感，觉得事有蹊跷。”

“但我在晚上7点有一个重要的会议，”他大声说。“那就延期吧！”陈坚持说，并拿起话筒打电话给军校。接通后，蒋介石接过听筒。军校的教育长告诉他，“中山”舰已从广州南下黄埔加煤，他吃了一惊。

“是谁下命令开航的？”他激动地问。

“汪精卫下的命令！”

“那他就要负责！”蒋介石愤怒地大叫：“他无权不通知我就下命令！”

翌日，蒋介石到处打听，终于知道有人正在阴谋绑架他，要把他送往莫斯科。

居然策划此种绑架行动，似乎十分可恶。蒋介石所打听到的整个情况是：共产党籍的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在1926年3月18日接到一道神秘的命令，要“中山”舰从广州驶往黄埔。他通知军校的教育长，说他有司令官（蒋介石）的命令，差该舰至黄埔加足燃煤作长途航行，加煤后返回广州。蒋介石在广州对此毫不知情。该舰的引擎从黄昏到夜晚一直没有停火，灯火也一直通明，舰上实施最严格的警戒，但当时以为阴谋者拟发动政变，对共产党的计划毫无所悉。直到事情过后，才知道此项阴谋是准备在蒋介石当晚乘坐该舰自广州往黄埔军校时将其扣押，经海参威送往俄国，藉以除去共党阴谋利用广州和国民革命作中介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障碍。

当晚，蒋介石作了决定，并在翌晨实行。以其广州防卫司令的地位，他宣布戒严，并逮捕汪精卫，将他羁押在观音山。李之龙和其他参与此一阴谋者，则全部下狱。由共产党控制的省（广东）港（香港）罢工委员会全体成员全部解除武装，所有攻击行动完全取消。同时蒋介石派军登船，重新控制该舰。

这是一次令人吃惊的行动。

1926年3月22日，广州苏联领馆的一名代表到东山来见蒋介石，他问：“此一突击行动是为了对付汪精卫？还是对付苏联？”

蒋介石告诉他是对付汪精卫。

“但我们不赞成你的独裁方式，”他反击说：“第一，你完全不把鲍罗廷放在眼里。他是苏联驻你们政府的代表，应先与他商议。第二，汪精卫是你的长官，你怎可未获党的准许擅自将他逮捕？我要求你立刻召开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

当天蒋介石就召开会议，汪精卫也被带到会场。他在8位国民党的委员面前否认他曾发布移动“中山”舰的命令。他对着蒋介石咆哮说：“你以为你是谁？你只是一个暴发户，你既不是名列25位国民党的创始人，亦非5位特别委员之一，你只是一个新人，一个初级委员，你却以厚颜无耻的军阀伎俩恫吓你的前辈。如果你想篡夺我的位置，你就夺好了，让我们亲爱的领袖在天之灵看着你！让整个国家都看着你——让历史记下你的罪行！但勿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我！”

他然后转向党主席，要求准许他转往医院治病。他同时请求中央常务委员之一张静江他的保证人。汪精卫藉此至医院休养，整个4月他都留在医院。在1926年5月11日，他秘密离开广东前往法国，表面上是为了健康关系。汪精卫走后，蒋介石就接替了他的位置，成为广州最重要的领导人，他已登上广州政治的顶峰。

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华北的情势时好时坏，互相残杀战争在一个省蔓

延开来，在迅速结束后接着又爆发另一个战争。但无论北方的战事如何激烈，广东广西两省却仍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救中国的理想。

蒋介石渐渐成为政坛要人后，便开始怀疑身边的任何一个人都要谋杀他。

但在另一方面，陈洁如的母亲从上海寄给她一份 1926 年 5 月 20 日《申报》的一段新闻摘要，内容是：“目前广州最热门的一种游戏，似乎是把政府高级要员逐出政府，他们差不多都是广东人，例如许崇智将军、刘震宇和胡汉民等，最后一位被赶走的是汪精卫。一般认为这些人都是被迫离开广州的，因为他们阻碍了新领导人蒋介石的野心阴谋，他希望控制军政大权，无论如何，他是今日国民党最重要的领导人！”

宋家姊妹

这是一个周六晚上，蒋介石下班突然告诉陈洁如说：“孔夫人（孔祥熙之妻宋蔼龄）明晚请我们吃饭。她告诉我说，她将为你我特别准备一顿鸽子餐，她希望我们在 3 点钟到她那儿，但你可从这里先去，因为我要在下午 5 点下班后才能从军校脱身。”

他一边说，一边十分兴奋地在室内走来走去。他的喉咙似乎因紧张而收缩。“邀请！”他反复地自言自语：“我从来也没有想过，现在你和我终于有机会接近这位大人物，这真是太好了。”

他像一只孔雀似地在室内昂首阔步，不愿坐下。他很少如此坐立不安。

“怎么那么兴奋？”陈故意问，“只不过吃顿饭而已。天气那么热，我真的哪里也不愿去，你为什么不去独自去呢？你可以为我找个推辞的藉口。”

陈从热水瓶中倒了一杯开水递给他，他把它放在桌上不喝。

“你还是不明白，”他立刻大声斥责我，“你必须知道，接近宋家对我是多么重要的事。你自己知道，这些年我一直不能如愿以偿地接近我们的领袖，因此这是一个可以接近他的亲戚的好机会，你懂吗？”

当然，陈无法否认他的这段话。

“你和我一样地清楚，”他继续耐心地说，“广州有的是军事专家，我纯粹是碰运气才当上军校的校长，我有地位，但无特权。因此我的策略是培养与他最亲近的亲戚的友情，我要把孙、宋、蒋三个姓氏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陈看着他，知道他所谓运气是什么意思。因为当初孙中山先生选择黄埔军校校长时是以湖南的谭延为中心，但极力反共的谭氏拒绝了此一职位。

蒋介石伸手紧紧拉住陈洁如的手，柔声哄着她说：“我们就将有很大的成就，你一定要和我并肩争取革命和培养友情的胜利。你知道这对我有多重要。你一定不能拒赴这次晚宴。”

“我答应，”陈洁如告诉他说，“我将尽力帮助你达成愿望，我将到任何你要我去的地方，你现在满意了吧？”

蒋介石高兴地大笑，把陈拥入他的怀抱。

“你太好了，”他高兴地称赞，“我知道你对每件事都会和我意见一致，这正是我那么喜欢你的地方，但是你喜欢我吗？”不等陈回答，他又继续说：“我要你每一分钟都爱我，永远不要停止爱我，你愿答应我吗？”

“我答应。”陈含情脉脉地说。

第二天下午，陈穿上最好的广东绉纱丝衫，白色的小羊皮鞋，拿一个白色穿珠皮包，一把檀香扇，并尽量显得清新整洁，使蒋介石觉得以她为荣。因为他要到5点钟才能去，陈就在下午3点独自前往宋霭龄所住的标准石油公司经理的家里。

这是一栋不太高的、白色的两层楼房，四周有许多杉树，广东人称此种住宅为“洋楼”。

到达时，陈洁如发现其他贵宾都已到齐。满身法国香水味的孔夫人热情欢迎她，并焦急地问：

“介石呢？他答应我一定要来的！”

“他将晚一点来。”陈回答说。

然后宋带陈到客厅。陈认识那些客人，他们是孔夫人的妹妹宋美龄、知名的外交官陈友仁和廖仲恺夫人。陈和他们一一握手聚谈甚欢。

客厅与餐厅是相连的，仅以一座漂亮的乌木嵌花大屏风相隔。整个装饰和这栋住宅本身一样的典雅，有优美的家俱、波斯地毯、古老的瓷器和半截式的厚纱窗帘。

女主人和她的妹妹穿着颜色鲜艳的上海最新式样丝质旗袍。他们的一头乌发梳成潇洒的贵族发式，在后颈处挽了一个髻，看起来真像是上海时装画册中的人物。

“那么大热天跑来，真难为你了，蒋夫人。宋霭龄大声他说：“今天又是个大热天，热得难受。但是你却看来若无其事，你是怎么学会这种功夫的？”她用她的绢帕轻拭额头的汗珠，她和她的妹妹站在放在侧几上的三台电风扇前面，像两位戏中的女主角似地注视着陈洁如。宋美龄一直在摇着一把雕花象牙骨的大型绢面扇，显然她是在惺惺作态。

“广州的八月就是这样。”穿着一套白色麻质西装的尤金·陈咧嘴笑着说：“上海也一样的热，每年夏天都是如此，不再更热就算是运气了。”

“今年夏天已比去年凉快了。”廖仲恺夫人说。

“但上海不像这里的湿热难受。”宋美龄用清脆的音调说。

“那是因为这里的湿度太高，”陈洁如轻松地应和说，“我也觉得闷热难受。”

不久两名女佣用托盘端来加有冰块、用高玻璃杯装的冷饮和几盘小点心，分别送到客人的面前。冷饮给她们带来一点清凉。

“别管这炎热的天气，蔼龄，”宋美龄想奉承一下她的姊姊，“反正我们在下星期就要乘日本皇后号回上海。”

“很好！我喜欢那艘船，那是最好的客轮。你觉得呢？”宋霭龄问陈洁如。

“我通常都坐‘罗勒尔’客轮，但有一天我会坐一次‘日本皇后’试一试。”

“一定要，”她叮嘱说，“那船的客舱很大，食物和服务都是上乘。你一定会觉得很值得。”

显然因为陈洁如在场，陈友仁开始谈政治，但陈只是一个好听众。话题不久就转到金元的汇率、股票、投机、最近的银行市价、利润、房地产和几千几万美元的股息等等。由于陈洁如对金融市场一窍不通，并且毫不关心，所以对他们所讲的，她一点也不懂。他们见她对金钱和投机毫无兴趣，觉得她很可怜。

“带蒋夫人看看这座房子，”宋霭龄对陈友仁说。他彬彬有礼地站起来，与陈洁如离开客厅。陈以赞美的眼光看着陈友仁，并称赞他的讲演才能。他虽有点过激，但是一个知名的外交家。盛传他和宋美龄可能相好，但揆诸他们在客厅中的相互应对，这项谣言似乎并无根据。陈觉得原因之一是他们两个都太自豪，但陈也认为，她喜欢陈友仁的睿智和爱国心，至于宋美龄，很明显的可从她那虚饰的外表，看出她是一个势利而自大的人。

“这栋房子是标准石油公司经理的，他现在纽约休假。”在参观房子时陈友仁说。从三房卧室，他们走向一间小巧的厨房。厨房中整齐地排着数行发亮的铝锅，厨架上的是发光的陶器和玻璃器皿。

“当然，这是一栋实用的房子，不像中国房子之宽大有气派。”他解释说。

“我从未见过如此小巧的东西，”在四处观赏时，陈表示了自己的意见。“我在东山的那栋小房子没有那么好的设备，我现在知道该怎样布置了。”

“你喜欢住在东山吗？”他问。

“是的，那里很好，很安静。”

“你常招待朋友吗？”

“我在广州的朋友很少，”陈说，“同时我们太忙，无法交际。而且，我往返在东山和黄埔之间。我在黄埔的时候比较多，因此军校才是我真正的家。”

“黄埔离城太远了，来回旅行太浪费时间。”

“那是真的，”陈完全同意他的说法，“但介石和我已经习惯。蒋介石是在何香凝的劝说下才向她租下东山的房子，自从她的丈夫去世后，她很寂寞。房租很低，地区很好。我们现在总是在东山度周末。”

陈友仁和陈洁如接下到花园漫步。等他们回到屋内时，陈洁如的注意力立刻被客厅里愉快的笑声所吸引。她听到宋霭龄的高嗓门在说：“她只是一个中等阶级的家庭主妇，她怎么配做一个少壮领导的妻子，我们必须得想点办法。”

“对，”宋美龄应和说，“她象征我国生活中的一道巨大的社会鸿沟。”然后她用讽刺的口吻说，“但我必须说，她有她的优点。她可以做一个农家的好妻子。”

陈感觉到这些话是在对她进行的侮辱。

“你想叫她怎么样？”廖仲恺夫人解释说。“她只是一个尚未开窍的孩子，给她一个自我发现的机会吧，她会学习的。不过我必须说，她是一真正的好女人，她那个坏脾气的丈夫不配有这么一个好女人。”

“开窍？”这话让陈想起她曾经听到过这种说法。对了，逸民（朱逸民，张静江之妻）在数年前曾对她说过同样的话。发现他们回到客厅时，三个女人就立刻闭上了嘴。

因为蒋介石还没有来，陈洁如就微笑着坐下，陈友仁则走去和何香凝聊天。宋蔼龄和宋美龄显得坐立不安，她们不知道陈是否已听到她们的谈话。她们像在品评一名女学生似的从头到脚地打量陈。最后宋霭龄问：“你买过很多首饰吗，蒋夫人？你知道，你是买得起的。”

“人家一直问我，国家统一后我将买什么样的首饰和什么样的衣服，”陈回答说，“这很难说，这将等到有此需要时再说，事未成熟时，不能过早乐观。”

“孩子，你很聪明。”何香凝对她说。

“只有钻石和白金才能配一个伟大领袖的妻子，”宋霭龄以一种公爵夫人的口气说，“我不会要其他的東西！”

宋美龄睁大了眼睛，故作陶醉之状说：“我喜欢白金和单粒的大钻石，它们太迷人了！”然后她转向陈洁如问道：“你喜欢白金吗，蒋夫人？我觉得黄金太俗气，看起来太没有价值。”

“我根本不在乎首饰，”陈冷冷地回答。“黄金、白金、钻石对我都没有特别的吸引力。”

接着她们向陈探听有关她丈夫的事情。当然，这两姊妹当她是傻子，陈也乐得装傻，以静观她们究竟要怎样对付自己。

“你的婚姻生活如何，蒋夫人？你曾和你的丈夫吵架吗？”宋霭龄问。

“没有，”陈严肃地回答。“迄今并无可让我们吵架的事，介石尊重我的愿望，我也尊重他的，我们过互相尊重的日子。”

“但介石的坏脾气是出名的，他从来不骂你吗？”宋霭龄带着一丝狡笑问。“没有？那你一定是忍耐的化身，才会不曾和他吵过架。”

“据孙先生说，介石稍不称心就暴跳如雷，是真的吗？”宋美龄问。她看着陈继续说：“当然我并不相信。但一个坏脾气的男人总比一个没有脾气的男人好，你觉得对吗？”

陈点点头假装同意她的说法。她又问：“告诉我，他的太太毛夫人反对你吗？她为难你吗？她对你很坏吗？”

“毛夫人是我所知道的最贤淑的妻子，”陈照实回答，“她是虔诚的佛

教徒，不理俗事。当然，介石在和我结婚前曾经得到她的同意和她分居。”

“那么，他的二太太姚夫人呢？你曾经见过她吗？”宋美龄又问。“她是个怎么样的人？”

“姚夫人住在苏州，我不曾见过她。她是个比较保守的人，喜欢打麻将。在我们结婚之前，她同意接受 5000 元以放弃蒋介石以及对她的赡养。不过，蒋介石每个月仍给她少数的津贴，现在我们把她当作一个亲戚，蒋介石谈到她时称她为阿姨。”

当陈把眼光转向宋霭龄时，看到她和美龄不断互使眼色。她们继续向陈探听诸如此类的消息。

蒋介石在 5 时到达，不停的为迟到道歉。宋霭龄假装很生气地瞪他一眼，但他仍走向她，喃喃地说了些讨好她的话。

然后他们都走向餐厅，入座时的位置是：蒋介石被安排在宋霭龄和宋美龄之间，陈洁如则坐在尤金、陈和何香凝的中间。

这是一顿西式的晚餐。第一道是浓汤，然后是炸鱼，接着是一道鸽子，每只鸽子都以钻石形的烤面包垫底。周围饰以西洋菜和炸薯片，分别装盘，每人一只，这些金黄色的鸽子看来十分美味而令人馋涎欲滴。

开始进食之前，宋美龄发表了一篇谈话，大家都注视着她们。

“吃鸽子就像吃芒果，适合在浴室中单独用手撕着吃，”她告诉大家说，“但因本宅的浴室太小，只好请各位在餐桌上默默地吃。不过，我要敬告你们，在吃完鸽子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说话或看别人！有没有意见？让我们开始享用吧！别忘记只能看你们的盘子，不可四顾张望，不然情况会很窘。”

大家遵照她的敬告，默默地埋头吃鸽子。鸽子很嫩，甚至连骨头也是酥的。

饭后他们闲谈甚久，而从蒋介石的举止中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事实：成为宋霭龄的座上客，使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宋霭龄则把她的妹妹捧上天，说无人能比得上宋美龄的聪慧。

临别时客人们向女主人握手道谢。宋霭龄对陈洁如说：“别回去，蒋夫人，今晚留下来和我们作伴好吗？我们有许多话可谈。”

“对呀，为什么不在这里过夜？我们好象总是在开始说得兴起时就要说再见。”宋美龄感叹地说。

陈想，这对姊妹问话都是有用意的，目的在套取更多有关蒋介石的消息。她自然不愿被一下盘问，于是谢绝说：“天那么热，我既没有替换衣服，也未带睡衣。不过，我还是十分感激你们的盛情。今晚我过得很开心。”

“你们那么相爱吗，蒋夫人？和丈夫分开一个晚上都不行？”宋霭龄微嗔地说。

“留下来嘛，”宋美龄在一旁加油。“我真的希望和你长谈一次。我们准备留你过夜的，你却让我们失望。”

她们越是怂恿，陈就愈坚定。她不喜欢人家打听丈夫的事，女人不应该

在丈夫的背后谈论她的丈夫。于是她摇摇头坚决他说：“改天好吗？下次你们愿意留我多久就留多久，但今晚不行。”

可以感觉得到她们多么失望，一副快快不乐的样子。但陈洁如意已决，以最温雅的态度和她们说了再见。

这一次小小的宴会只是一次普通的聚会，陈洁如永远想不到，也无法相信，这居然是一项长期阴谋的开端，她们想抢走自己的丈夫蒋介石。

翌日下午，陈洁如和何香凝约好共进午餐。何的父亲是在革命初期曾资助孙中山先生的富翁何炳桓；所以她和她已故的丈夫都被认为是国民党核心的老革命党人。自从陈洁如来到广州后，她们便成为好友，陈对她的丈夫不幸遇刺殒命深感悲痛。但她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勇敢地承受这不幸的伤痛。

她一见到陈就谈起前一晚在宋霭龄家赴鸽宴的事，她十分生气。

“我非常担心你的安全。”她十分气恼地说。陈大吃一惊。

“为什么？”陈问，“有什么大麻烦吗？”

“孩子，你是那么天真，你对潜伏在你四周的危险太迟钝了！你必须小心。生活是一场到处都埋伏着敌人的可怕梦。你必须十分谨慎，不可轻信他人。”

陈知道，她说这些完全是为她好。

“最好远离那个女人，”她认真地警告，“同时别让蒋介石落入她的圈套。我说这些，是因为我喜欢你，因为我不希望你遭遇到悲惨的命运，所以一定要小心。”

“但她能伤害我什么呢？”陈不解地问。“我们不是陌生人，我们认识她至少已有4年，但我知道她曾经把蒋介石当作一名普通军人，不把他放在眼里。她从不尊敬他，事实上我记得很清楚，当孙先生介绍我们与她认识时，她曾不礼貌地把头转开，这使孙先生困窘万分。”

“她会这样做的。”何不屑地说。“今日的情况，已经不同，蒋介石已是广州最重要的人物，是一条值得钓的大鱼，你必须记得，她还有一个未婚的妹妹。我看得清清楚楚，这就是危险之所在。”

“但介石已和我结婚，她一定不会拆散人家的夫妻。而且，她是一个基督徒。”

“孩子，你多天真！”何香凝摇着头回答。“那女人能抓到手的，她就敢当着你的面抓！她和她的丈夫狼狈为奸——我不是信口雌黄。基督徒和这没有关系。”

见何那么认真，陈洁如不得不认真起来。但她心中却暗自笑她多疑和杞人忧天。当然，她完全明白她的意思，但她对蒋介石十分放心，他曾誓言矢志不二，他曾欲以断指来证明他对婚约的忠诚。当然，她没有把这些告诉廖夫人。

“我十分感谢你对我的关怀，”她十分感激地说：“我会听从你的忠告。我不会再接受那个女人的邀请。”

“那才聪明，”她说。然后拥抱她，亲吻她，并拍拍她的手背。“毕竟你是那么年轻，那么容易相信别人，因此很容易受骗。”

陈紧紧地拥抱她，表示感谢。真的，她对她就好像是一个母亲，而在她们的拥抱之中，有一股她能认知的怜惜之情。”

“当然，事情真的十分奇妙”，她终于用疲倦而感伤的双眼看着陈说：“蒋介石虽为军校校长，但在惠州大捷之前，实际上在广州以外的人都还不认识他。可是，今日的他已不可同日而语。他已是华南炙手可热的人物，而你，我的孩子，你可以做许多社会福利工作来帮助广州的穷人，你愿意做这一类的事吗？”

“我当然愿意，”陈说，“告诉我，哪些是我能做和应该尽力去做的事？”

“你有这种精神就好。”何香凝拍拍陈洁如的脸颊说。

午餐已经齐备，她们就坐下来享用一顿丰盛的餐食。

接济蒋经国

回到黄埔军校的寓所后，陈洁如开始处理一大堆蒋介石的信件。她一封一封地拆，忽然看到一个贴有苏联邮票的信封。那是蒋经国的来信。有一段内容是：

去年我的衣箱失窃，失却了我的大部分衣服。今年冬天我急需一些厚衣御寒，莫斯科刺骨的寒冷非我所能忍受。现在我只身上所穿的一套衣服。请尽速汇一点钱给我买衣服。我迫切需要……

那天下午陈洁如把信拿给蒋介石看，但他看了一眼之后，就一言不发地把信交还给陈。

那晚陈问他：“是不是要寄点钱给经国买衣服？那边很冷，他急需衣服。”

他回说：“年轻人必须受点教训，让他知道该小心保管自己的东西，他怎可如此粗心大意，让别人偷了他的衣服？他必须为自己的损失负责。我不能寄钱给他。”

三天过去了，蒋介石不再提这件事。因此陈洁如又问：“你可曾决定寄多少钱给经国买冬衣？他在等你的回音。”

“不，”他冷冷地回答说：“我不会寄一个钱给他。”

大家都称呼为蒋介石之“侄”的陈果夫当时应蒋介石之邀来军校任职，他暂时担任蒋介石的私人秘书，每天上午到会议室帮陈处理蒋介石的大堆信件。

因为很担心蒋经国在莫斯科的困境，陈就问陈果夫该怎么办。他说：“由于蒋介石拒绝帮助经国，再提这个问题也没有用。你知道他的脾气很坏，再提只会激怒他而有伤和气。可否先借一笔钱应急，然后我们再设法请蒋介石

偿还？”

“但我到哪里去借这笔钱？”陈问。“以前我们曾向国民革命军筹备委员会拿过钱，但这个单位现已结束。你能否再想点别的办法？”

“我试试看。”他说。整整一个星期陈都在操心这件事。到第八天，当他们一起在会议室处理信件时，陈洁如焦急地问陈果夫：“你借到钱了吗？”

“没有，”他回答说：“到处钱都很紧，每个地方都借不到钱。”

陈洁如到卧室里的那个小首饰箱中，取出一叠广州银行的银票。那是她在过去两年中唯一的一点积蓄。为了存这笔钱，她必须为自己少买许多东西。为了福梅（毛福梅，经国生母），她把这笔钱交给陈果夫说：“这是我仅有的现钱，一共二千元。这孩子老远在外国，又没冬衣过冬，你最好立刻把钱汇给他，并且写信告诉他，钱是他爸爸给他的。请你赶快寄出。我曾经答应福梅照顾她的儿子，所以我不能失信于她。”

“是，”陈果夫回答说，“我将立刻电汇给他。不出三天，经国应可接到这笔钱。”

蒋介石遇刺

为了抗议蒋介石的独裁作风，有些人出于义愤而成为蒋介石在政治上的敌对人物。但蒋介石兵权在握，一切由他作主，因此他们只好顺从他的意愿。当他需要他们做什么的时候，均可毫无疑问地做到。但在暗地里，蒋介石的作风引起无限的不满，而凝结成各种各样的怨恨。

为了提高效率，蒋介石坚持作更进一步的激烈改革，为了讨论此一问题，他定在那天下午召开一次立法会议，他并且坚持要陈洁如陪他出席。

午饭后，议员们已都齐集在财政部大楼的国民党总部，等候蒋介石提出最新要求的详情。当陈洁如和蒋介石并肩抵达议会的二楼，在一群官员、议员和卫兵的伴随下走过大厅时，忽然碰到一名穿制服的青年，两手在胸前握着一叠报纸。他走向蒋介石说：“你窃占了我堂哥的军队，枪杀了他最好的二位将领，所以看枪！”

然后他从报纸下面伸出握着一柄左轮手枪的右手。

蒋介石的卫兵看到后立刻扑过去夺枪，但在他尚未夺到前，枪已发射，但打偏了目标。蒋介石和陈洁如大吃一惊，急忙冲过走廊。蒋的卫士则在和刺客缠斗。另一名卫士缴下他的枪，制服了他，还有一名卫士就用他的左轮手枪向这名行刺未遂的刺客连发六枪，将其击毙。这位刺客不是别人，正是许崇智的堂弟许济。

当报章登载了此一消息时，广州的情势就变得混乱而不稳，因为任何一个领导人的死亡就表示一次政府的变动。但幸亏蒋介石虽饱受虚惊，总算安然无恙。

自从发生“中山”炮舰事件以来，再加上这次的行刺，蒋介石变得十分

紧张，对他所做的一切已不再自鸣得意。他无法忘记那些反对他的人，而他人几乎可以轻取他生命的这两次事件，更说明了他的四周充满了危险。

以后他不仅怀疑生人，而且几乎怀疑每一个人，甚至来访的朋友。

为了有效地保护自己，他几经深思之后，对陈洁如说：“我要组织一个‘蓝衣社’！”

“为什么必须是蓝衣？”陈不解地问。

“蓝衣社将完全是一个秘密的私人调查组织。我知道日本的青龙会和黑龙会，以及上海的三合会，但我比较欣赏意大利墨索里尼的黑衫队。组织一个我自己的团体并称其为蓝衣社是个很好的主意。”

“你是说，他们将都穿蓝衣？”

“啊，不。他们将是一些便衣侦探，但蓝衣社是个比较好听的名称。你喜欢吗？”

“因为中国常被称为蓝袍之国，这很恰当，”陈回答说。“就像你所说的一样，什么事都会在你面前发生，蓝衣队是我们的卫士。他们将让我们知道正在策划中的阴谋或罪行。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部署，但他们必须受高度的专业训练。”

“是的，我会这样做的。”蒋介石回答说。

“他们的工作将包括搜集重要的敌情，防止阴谋，秘密逮捕和镇压所有的反政府行动。”他于是在一大张纸上写下他的计划。“看，”他说，“此一组织将包括两个部门，一个是调查部，一个是统计部。我将以此一组织消灭所有反对势力，加强我们的政府和克服所有的阴谋。”

他设法以最少的钱来完成此一保护他自身的大计，主要得助他的两个亲信世侄——陈其美的两个儿子。其中之一即为陈果夫，另一个是他的弟弟陈立夫。他们两个奉命筹组蓝衣社的两个部门。陈洁如认为陈果夫比较聪明。他是一个智慧很高的人。

蒋介石急于想把此事办妥，他花了很多时间帮助陈氏兄弟。当然，此事是在极端秘密中进行的，从未向外界公开透露。陈氏兄弟被称为C·C集团。陈洁如当时负责记录，并做许多文书工作。该计划是要组织一个秘密的探员，不仅侦查老百姓，也侦察政府官员，由于这是蒋介石总部的一个私人组织，其重要性在警察之上。

陈氏兄弟负责招募人员，他们证明是一对忠诚可靠的助手。随着工作的进展，他们被委派为此一组织的全权负责人，由他们的得力助手相辅。

蓝衣队是与间谍相同的探员，暗中负责搜集重要情报。他们建立起一个严密的窃听侦查网，使阴谋分子无所遁形。有了蓝衣社，蒋介石每天都获得有关敌人之计划和作为的报告。这些都是可靠的情报，使他因此可以高枕无忧。为了使这些人尽忠，他们必须受效忠的教诲，只把领袖的命令当作最高法律。他们除效忠他们的主子，必须忘记其他的一切责任，并随时准备逮捕、杀害、刑具或凌迟任何落入他们手中的嫌犯或主谋。

一切都极端保密，因此外交对他们只有一个精神的概念。听他们的名称，一般以为他们一定穿着蓝色制服作为标志，但实际上他们根本不穿制服，人们因此被蒙在鼓里，也因此无法得知谁是蓝衣队员。

陈氏兄弟深知他们的机构在蒋介石的政府中成为权倾一时的实体。此一组织将随着蒋介石权力的增长而愈益强大。他们孜孜不倦地工作，而大部分的蓝衣队员均为中下阶级的广东人。一部分则来自宁波。从宁波招募蓝衣队只有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因为人们相信，同族的人不易背叛，以情感上来说比较可靠。但不管是广东人也好，宁波人也好，他们都必须发誓以生命保护他们的领袖。为了鼓励他们，他们每年都有奖金，服务十年后即可有养老金。

多年来，蓝衣队员在保护他们的主人方面，“克尽职责”。

元老政治家唐绍仪在上海兰滇路、北四川路自宅（译按：唐宅位于法租界福开森路）被人用斧头砍死的惨案，震惊了整个上海。

这位 75 岁的政坛老人在袁世凯手下显赫一时之后，在上海过退休生活。其遭杀身之祸的原因，据说是因为公开批评国民政府。

此一谋杀案经过周密的计划。刺客知道唐绍仪是中国艺术品的鉴赏家和瓷器收藏家，便假装是一名古董商人，以电话与唐氏相约，说要给他看一个有人愿以极低价出售的宋代青瓷花瓶。唐氏与他约定在翌晨 10 时见面。刺客准时携花瓶抵达，在唐宅客厅出示花瓶。

当该男子将花瓶递给唐氏时，偷偷地从瓶中抽出一把用纸包裹的斧头，高高举起后迅速砍下，砍中唐氏头部，唐氏当即毙命，刺客事后逃逸，将花瓶与斧头留在现场。

二小时后，此一惨案即被一名仆人发现。这名女佣用托盘端了两杯茶给主人和宾客时，惊见主人已死。

警方的调查人员发现了花瓶和那把染着血块并沾有几缕头发的斧头。

上海市警察局后来抓到一名男子，经数日严刑拷打之后，这男子签了一份自白书，说他是国民党蓝衣队的队员。（按：刺杀唐氏之凶手为军统特务李阿大、赵理君、谢志磐、王兴同。）

宋家开条件

常言道“乐极生悲”，此时对蒋介石来说绝非虚言。他们从牯岭回来时，第一件交到他手中的东西，是一封来自汉口的急电。电文大意是：“国务委员和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等八十三位国民党员已自行投票决定为汉口政府的最高当局。请等候命令。”

这消息的确是晴天霹雳。蒋介石有意在攻克南京后成立南京政府，但现在他人率先采取行动了。蒋介石生性有仇必报，但他是个杰出的战略家，他可以静候时机。

为保万无一失，蒋介石想到另一个计谋。即：如欲动摇敌人的根基，必先夺其力量，而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是财力。目前他尚无财力，因此决定以拉拢汉口政府的财政部长宋子文来达成此一目的。而最妙的方法就是利用宋氏的姐姐孔夫人（宋霭龄），她也有此想法而急于见蒋介石。谋定之后，他就写信给她，请其来九江密商此事。

宋霭龄接信后火急前来九江，抵达时她并不下船，派人请蒋介石至船上议事；蒋介石在船上逗留了24小时，与宋讨论政治情势，并向她表明心中的打算。孔夫人不下船的原因是因为她有避免与陈见面的理由。

在船上举行了会谈之后，蒋介石回家把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陈。他说：“我不曾对你有半点秘密，也不想从现在起开始对你保密，尤其是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孔夫人对我说：‘你是一颗正在上升的新星，你愿意让你这颗新星下沉得和上升一样的快吗？我愿意老实告诉你，你拥有为国民党的目标奋斗的精神，但无独力完成此一大业的魄力。单凭精神无济于事，要完成解救中国，重建中华和制订宪法的大业，需要巨大的势力、金钱、魄力和特权。对于这些，你现在一无所有。你的周围尽是一些自私的懦夫和女子。他们只求一己的目标而并不为你着想，你知道我说的都是实话。不过，情势并非无望，我愿与你谈一笔交易，那就是我不但将影响我的弟弟子文，令其如你所愿的脱离汉口政府，并将更进一步尽量联合上海的大银行家以金钱作你北伐的后盾，供应你必需的经费和购买军火，我们有一切关系。你自己明白，汉口政府再不会以金钱支援你，至于你这方面要做的是，你须同意和我的妹妹美龄结婚，并答应在南京政府成立时任我的丈夫孔祥熙力行政院长，我的弟弟子文作财政部长。’”

蒋介石看着陈洁如说：“我现在已无路可走，她这笔交易的价码很高，但她说的都是实情。我不能再指望汉口政府会给我金钱、军火和军需供应，因此，如果我要实行我统一中国的计划，她的条件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现在我想请你帮助我，求你务必答应。而且，真正的爱情是要以一个人愿意牺牲的程度来衡量的！”

“你要我怎么做？”陈问。

“退让5年，让我和宋美龄结婚。俾能获得必须的协助以继续北伐，脱离汉口而独立！这只是一场政治婚姻！”

陈洁如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自从他们结婚以来，她一切以他为重，现在他却要求她退让，好像她们的婚姻只是一场儿戏。

陈洁如的第一个反应是像所有有自尊心的妻子一样想臭骂他一顿，但因沉浸在国家的政治中太久，对她来说，统一中国已成为高于其他一切的目标，因此她能清楚地了解他的困境，这是他唯一可以反抗汉口独立行事的机会。如无她的同意，他无法与宋美龄结婚，而下与宋美龄结婚，蒋介石将得不到上海银行家半分钱的支持，她知道宋霭龄的个性，任何事情在她看来都是商业行为。

蒋介石以探索的眼光看着陈洁如，等待着她的回答，但她无话可说。实际上她是不声不响地转过身去，但蒋介石拉着她的手臂柔声地说：“我不曾对宋蔼龄作任何承诺，我要先和你商量。”

女人的本能让陈洁如忽然觉得，他说的不是真话，她知道事情早已决定。他勉强对她做出一个笑容。

陈洁如面无表情地听他说，不出一声。“他于是继续说：“我知道美国的大学有最好的管理和国际关系的政治学之类的课程，这些都将非常有用。但要学习这些，必须出国留学。”陈仍然不言不语地听他滔滔不绝地在说。

“你愿意去美国留学5年吗？我将请张家的两个女儿陪伴你，你不会感到寂寞的，那将只是短短的5年。你回来时南京政府将已成立，我们可以再开始共同生活，我们的情爱将始终不渝。我们将可实现我们一直想往的，并肩工作的生活。你同意这样的约定吗？”

“5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陈洁如轻笑着说，“不要再许诺言，或再发誓，我已听够了！我仍然记得你在上海法国公园对我所发的此情不渝的誓言，当时你甚至愿砍下一只手指以表示诚意；我也曾记得你在溪口龙脉上向我起的誓！到现在为止，你所有说过的誓言和承诺都是空话，所以不要再作你无法遵守的诺言。”

蒋介石闪着他乌黑的双眼改变战术，他不再堆笑容，变得十分严肃地断断续续地说：

“你是知道的，我的处境很危险，我必须在你的帮助下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北伐是解求中国的重大使命，如果我能贯彻此一任务，中国就有救，我本人也可活下去；不然我将因失败或失望而死，你不愿看到我的此种下场吧？”

“这是我的一个转机，”他解释说，“我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我有雄心，我希望攀登最高峰而永远巍巍在上。”

陈洁如看着他，记住他的每一句话，她忽然十分痛恨那个抢丈夫的人，默默地摇头。他继续说：“务请帮助我，你只须在外国逗留5年，我将答应你的任何要求，只是务请你在紧要关头助我一臂之力。”

“如果我同意退让，那将只是为了中华民国的统一。那不是为了你，或为了宋蔼龄。”陈愤怒地说。

1927年3月19日，蒋介石对陈洁如说：“我要到安庆去视察前线，那边我们有很大的进展，这里是我写的两封信，阅后交给阿香投邮。信中所言全为工作务实，未涉爱情，我不希望瞒着你行事，希望你了解所有的新发展，务请不要生气。”

这两封信的内容是：（致孔祥熙夫人函）

亲爱的姊姊：

请伴令堂宋夫人、三妹（美龄）、令郎大卫（孔令侃）和令媛（孔令仪）

等来牯岭小住，切勿留在汉口，我今晚离开九江，明日将抵安庆。我知道以前美龄为何不来牯岭的原因（因避见我妻）。

返汉口后请探听三妹（美龄）之意。若有信件，希望以专差送来安庆。为防遗失，每周可由专差送信，不知尊意如何？

（签名）中正

（致美龄女士函）

亲爱的美龄：

令姊谅已转达我的专函。今晚我将离九江出发，将在安庆小留数日等候你的复信，俟接信后便赴前线。

你意如何？请详细告我。能否寄我近照一张？俾能日夜看到你。我意以为令堂宋夫人、孔夫人暨孩子及你，均应立即离汉口迁居牯岭为佳，我在江西时，你觉得不便（因我妻在）前来看我。现我已离赣，不必再顾虑受窘。

1927年3月19日

这两封信促成陈洁如决心离开南昌，事情对她来说已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数日来，她曾一直在思量应采取何种步骤，现在已完全无望，于是收拾行装，坐火车至九江，然后乘船回上海。在离开前，她把蒋介石的一些箱子的一串钥匙交给佣人，并留了一封短信给他的主人。

回到上海，陈洁如一直无法恢复平静，并无颜进娘家的门，天下的母亲都爱她们的女儿，并希望她们幸福。一旦女儿的遭遇不佳时，她们就会担心。而回娘家久住，就等于招认一切都不顺利。

当陈洁如告诉母亲已离开蒋介石时，她吃惊得说不出话来，她竭力劝说：“啊，我的好女儿，回去，回到你所爱的丈夫的身边去，留在他的身边是你应尽的天职。”

可怜的母亲完全不知道事情的发展，陈洁如也无心告诉她详细的经过，她也不愿谈介入他们夫妇之间的那个坏女人，更不愿谈那个布下这项大阴谋夺自己丈夫的那个坏女人的姐姐。这些披着宗教外衣以遂其目的并从宗教获益的“好人”，真是对基督精神的讽刺。

蒋介石的诺言

1927年8月1日是个炎热的晴天，蒋介石一早来到上海陈洁如母亲家，他独自进屋，将卫士和蓝衣社便衣留在庭中。有贵宾到访，本应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但在当时的情况下，陈洁如甚至不愿向这位不速之客说声请坐，她看着他语带讽刺他说：“大驾光临，愧不敢当。俗语说‘无事不登三宝殿’，你今日来此，想心有事求我！”

“你说得对，洁如，”他以一副施恩的样子说，“我来告诉你有关你去美国的事！我已安排张家姐妹与你作伴，照顾你。你只需去美国5年！这是你的船票！”

陈未伸手接票。回答说：“我已退让以成全你的野心！你还要再要求什么？你常常说我可任人摆布，你是否要逼我出国？”

“别这样说！”他走近陈的身边说。“出国是为你好，我要你留学增加你的知识，来日你返国后可替政府工作，你曾答应过我要和我并肩工作，记得吗？”

“过去的已经过去，”陈洁如无精打彩地说，“我在此与母亲同住已经很满意。”她望着他心中暗笑。伟大的蒋介石，居然来此求我出国！我知道原因何在，因为我在政治圈中颇为知名，我以蒋介石夫人的名义留在上海，宋美龄心里不舒服，她希望在与蒋介石结婚前打发我走。但我的自尊不让我轻易答应此事。她冷冷他说：“我不想听你那一套一切为我好的说法。因为你说爱情是要用一个人愿意牺牲的程度来衡量的，所以我已默默地让开，我这样做是为了中国的统一，不为别的，换成别的女人，将会把宋蔼龄的眼睛挖出来。”

“你，你并不了解，”蒋介石紧张兮兮地解释，“你去美国是宋蔼龄的要求之一，我知道这对你要求得太多了，洁如，但这完全是为了中国的统一，我才敢要求你用你的爱国心来帮助国家。你如留在上海，这事就吹了，你了解我的问题吗？”这时陈母和陈弟从外面购物回来，惊见蒋介石在家。陈母请他坐下，陈弟递给他一杯茶，并拿了一壶茶和几个茶杯到庭中请他的卫士和蓝衣社的便衣喝茶。

蒋介石礼貌地和陈母谈了几分钟，并谈到复杂的国情，然后他鼓足勇气，向母亲解释，说他希望陈洁如出国5年学习政治学和公共管理，俾使回国后为南京政府效劳。

陈母看着女儿问道：“你想去外国吗？我的女儿。”

“我不想去，”陈洁如不耐烦地说，“我为什么要远离？这好像把我充军！”

“只有5年！”蒋介石急躁地解释说。

“你的所有诺言都毫无价值！”陈洁如大声说。“你还记得你要砍下一个指头表明你对我的爱吗？而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怎能指望我再相信你的话呢！”

此时，陈母直率地向蒋介石问：“你说5年，说的是真话呢，抑或只是骗我的女儿入？”

“当然是真话！”他诚恳地说。

“不要言不由衷，”陈洁如郑重地说，“我们不习惯你那种模棱两可的政治谎言。”

“我发誓！”他急切地争辩说。“我说5年，是真的5年！”

“你知道发誓是请神明作证，保证你所说的话？你要小心，说谎是会得到报应的！”陈母引用民间的老话说。

“当然，我说的句句是真话！我可以发誓，你不信吗？”他不平地问。

“那很好，让我们听你在神前发誓！”陈母边说边走向神龛。她点起三支香和一对蜡烛。然后将香插在香炉中，烛光闪耀着。蒋介石毫不迟疑地走向神龛，在神像前立正起誓说：

“我答应自今年起的5年之后，与洁如恢复夫妻关系。如我违背誓言，任凭佛祖罚我和我的南京政府，如我在10年或20年内不履行我对她的义务，任凭佛祖毁灭我的政府，并将我永远放逐国外。”他望着陈母问：“现在该相信我了吧？”

“是，”陈母叹了一口气说，“我相信你。”

蒋介石拿起桌上的三张船票交给陈母说：

“洁如不会孤单，所有她的费用都由我的政府负担，她有两个照顾她的同伴，你必须记得，她是去国外受教育，去补充自己，而非像她所说的是充军，所以不要为此难过。”

蒋介石离去后，陈洁如心里一直很难平静，觉得心中一阵绞痛，终于哭了出来：“啊，妈妈，我不会再相信他。我知道我的婚姻已经完了！”她紧紧依偎在母亲身旁。陈母用双臂拥抱女儿，安慰说：“他已发了重誓，如果他违背誓言，一生都会受到报应！”

陈紧紧地抱住母亲，两人静坐凝视香支燃尽的灰烬和在佛像面前跳动的烛光。

张静江幼女话当年

1927年8月19日，张静江的两个女儿——大女儿张蕊英、五女儿张倩英，陪伴着陈洁如一起乘坐杰克逊总统号豪华客轮来到美国的纽约。张蕊英比张倩英大10岁，因此当时张蕊英是27岁，比陈洁如大了6岁。张蕊英自始待陈洁如像妹。张倩英回忆说，陈洁如和大姊比较亲密，有什么话都和大姊说，和大姊商量，所了解的陈洁如情况也是从大姊那里陆陆续续获知的。

到纽约后，她们就开始念书。张倩英是念服装设计系，张蕊英则进了哥伦比亚大学。陈洁如在纽约时，没有正式上学，因心情很坏，又怕碰到熟人，所以都是请私人老师在家中为她补习英文。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的消息传到美国时，陈洁如深受打击，过去的海誓山盟、恩爱岁月全变成了泡影，张倩英说，相信只要是“人”，心情一定都会坏到谷底的，何况陈洁如的身分更有所不同，由众星拱月的蒋介石夫人，忽然变为乏人理睬的异乡弃妇。

陈洁如每日都在家中，很少出门，张家姊妹出门时邀约她散散心，她也常常拒绝。张倩英说，陈很少和姊姊出门，心情恶劣到极点，但却无可奈何，

对一位仅有 21 岁的中国少妇而言，相信对她的感情刺激是终生难以弥补的。有关回忆录中说到，陈洁如曾一度想到纽约市郊的赫德逊河自杀，张倩英因非亲眼目睹，并不愿意证实。

与张家两姊妹在纽约住了 3 年，心情一直不愉快的陈洁如，却感激张蕊英及张倩英对她生活上种种的照顾，及英文上的指导，1930 年，决定独自到宾州念书。张倩英说，陈洁如是到宾州的学校念园艺学，她走后，大家就不太联络了，陈洁如学得如何，以及有没有毕业，张倩英都不记得了。因为她本人于 1931 年就回上海了。

张倩英回到上海后，大约一年多就听说陈洁如也回上海了。当时是 1932 年，她回国后很少与张家往来。张倩英说，1932 年以后，陈洁如和外界很少联络，她开始不愿意见人了，但与张倩英的继母，也就是张静江夫人朱逸民倒还保持联络，张倩英偶尔从继母那儿听到一点陈洁如的消息。

张倩英是在法国出生，1917 年随父亲与全家自法国迁往纽约，在纽约时母亲因车祸意外去世，张静江于 1918 年认识在上海的朱逸民女士，朱逸民当时 17 岁，而张静江则 42 岁，两人乃于 1919 年结婚。由于陈洁如和朱逸民是好朋友，因此当朱逸民嫁给张静江后，自然就常常到张家作客说起张倩英的父亲张静江，是一位值得一提的人物。张静江是 1901 年随清廷驻法公使赴法，任商务随员，1902 年在巴黎独资经营通运公司，专销古玩、古瓷。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捐助巨款给孙中山先生。1906 年，又与吴敬恒（稚晖）等成立世界社，发行新世纪周刊宣传革命。1911 年广州黄花岗之役，张静江也是捐款最多的几位之一。说起张静江对孙中山革命的捐献，是非常富有传奇性的。孙中山与张静江在赴欧船上邂逅，两人谈得很投契，张对孙的革命表示愿意无条件予以经济支持，如需款随时电示即汇，并以暗号 A 代表 1 万元，B 代表 2 万元……E 代表 5 万元。后孙中山在河内需款很急，命胡汉民电 A 字并附孙长信，不数日 1 万元汇款即至，并叮嘱为了避免泄露军机，不必附信，不必报销，不必偿还。后孙又电 E 字，五万元汇款即至。令孙及国民党人无不感佩。1911 年 10 月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当时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即提名他为财政总长，但被张静江谢绝。1914 年，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于东京，又邀张静江任财政部长，毅然应允，但因不良于行，不克前往，即由次长廖仲凯代行其职权。一直到 1928 年张静江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之后改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达 9 年之久，1937 年赴瑞士养病。

从张静江的背景，不难想像朱逸民的飞上枝头，而在张静江家中往来的人物，均是具有军政或财政影响力的人士，陈洁如经常在张家作客，难免会认识些达官显要。而遇见蒋介石先生也并不足奇。

张倩英表示，因父亲在政界与商界的关系，家中往来的客人均是可叫出名字的人物，不过在当时她只有十几岁，又不懂中文的情况下，对父亲的朋友只是点头，没有什么特殊的印象。像后来宋子文一直追求三姊张兰英，三姊因有自己的朋友就拒绝了宋子文，陈洁如在张家认识蒋介石又经由张静江

及朱逸民作媒，所以陈洁如与张家就较亲近。

1923年，张家5个女儿全回到了上海，大女儿张蕊英是23岁，二女儿张芷英是21岁，三女儿张兰英是19岁，四女儿张荔英是17岁，五女儿张倩英是13岁。这5个女儿都是陈洁如在张家串门子时认识的。陈洁如虽然跟她们姊妹及继母都年龄相若，但还是跟继母朱逸民来往较多。只有1927年到1930年的3年在纽约共同的生活，才使张倩英对陈洁如的个性稍有了解。

她回忆当时，觉得陈洁如人很好，性格又温顺，话很少。每天总是独自一人在家中，期待着上海的家书，盼望着整个事件有个转机，能够立刻回到中国大陆。每日等着、等着，得到的均是不利于她的坏消息。可以想象那个时期陈洁如翻腾的心情，激动的情绪，都是一般人无法忍受的，但她忍了，忍受了一辈子，直到盖棺论定。

目前陈洁如的历史见证人多已作古。张家五姊妹中，张倩英的三姊张兰英尚活在北京，今年已90岁，但与陈洁如没有多少接触。现能够说出一些陈洁如当时情况者，除84岁的张倩英外，就是95岁在台北的陈立夫先生。张倩英已着手准备出版自己的回忆录，所以谈论陈洁如部分不多，但她说：“立夫比较熟悉情况。”

因张倩英的成长背景及所学的服装专业，使80多岁的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20岁。她身上穿戴的服装全部由她自己设计。如果给张倩英一块布料及一个胶带，她可以变成各式各样的服装；再给她一卷缎带及一个胶带，服装上的配饰就产生了。照片中她脖子上所戴的白色环形首饰就是由她自己设计的。环形首饰中，她用美国去年发行的鸡年邮票贴在中间，立即凸显出“中国味”来。张倩英的奇想，因她自己属鸡，挂在身上，可以常常告诉朋友她的喜好与年龄。

张倩英设计的服装曾给大家许多的惊奇，经过多年在纽约及上海的设计生涯，使她建立了自己的服装设计风格。

虽然张倩英已80多岁，但记忆力相当惊人，且至今尚无须戴老花眼镜。她述诉往事，历历如昨。她说，当1933年回到上海后，就开始自己设计服装。1936年抗战前她到了瑞士，又于1937年赴美，再度进入纽约的服装设计专业学校攻读，于1938年结业，之后就在纽约自己经营了一家服装设计店。另外，在上海也经营了一家服装店，店名Tsingi就是“织锦缎的彩虹”意思，这是她的商标，也是她名字的缩写。

张倩英的服装设计观念是来自中国生活时的感觉。她说，在中国什么衣服都是定做的，因此自小就在一直寻找可能的东西来搭配衣服的想法。有了这种哲学的观念，使只有4尺多高的她，从不去想自己是那么矮，什么东西都太高，只是直觉地想，自己要如何去配合。而服装设计的工作，已使她习惯和高人打交道，甚至许多的纽约模特儿。

事实上，1938年，在纽约，张倩英的名气要比她人高，这个小女人完全显示不出自己实际年龄，只有在她诉说自己的故事时，才知道她经历过比许

多人都更丰富的岁月。

1939年10月，纽约《太阳》杂志发表有关张倩英服装设计的报道。报道上指出，她有时会设计一款服装配合一个中国古老的刺绣，有时她会用中国古老的箱锁作为大衣的扣子，处处表现出她的中国风格。

1943年报纸上又形容张倩英是“第一个中国专业服装设计师在纽约自己开业”。1945年3月8日在纽约时装发表会上，她又是第一位华裔的设计师设计结婚礼服，而且是使用中国古老服装的观念。

在开业期间，她有两位有名的好莱坞明星客户，之后也一直是她的好朋友，一位是演员 Annamay Wong，一位是有名的服装杂志 vogue 摄影师 Toni Frissell。

1944年她在纽约时，受了父亲张静江的影响，对抗战中的祖国非常关切，经常参加募款活动，就在一个募款晚会中认识了她的先生林可胜博士（Robert Lin），两人的爱国情绪让他们结为夫妇。林可胜曾于1942年至1944年在美国受训，担任军医总视察，两度获美国总统授勋。

说起林可胜先生，许多人应该知道，他曾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是军医界的前辈，国防医学院于1949年5月在台湾复校，也是林可胜全权负责，至今国防医学院尚挂有林可胜的纪念照片及史迹。

张倩英谈起林可胜就展开笑容，虽然林可胜已于25年前（1969年）去世，但她就像谈论一位刚离开家出去旅行的亲人，那么的关心、体贴，及真诚。

林可胜出生在新加坡，父亲林文庆，曾任私立厦门大学校长。1919年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内科、外科学士，1920年获该校哲学博士，旋入芝加哥大学研究1年，并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研究员，1924年又获爱丁堡科学博士学位。同年应北平协和医院之聘回到中国，1927年创立中国生理学会兼任生理学杂志主编，1928年任中国医学会会长。

1932年日军侵上海，林可胜组队南下救死扶伤，组织12支医疗队救治伤患，1937年又组红十字会总会救护委员会，旋成立救护总队，先后派遣百余分队于各战区。

1944年12月林可胜自纽约口到中国，即任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备主任，1945年夏天，又任联勤总部军医署署长。1946年时，与张倩英已交往两年，张毅然放弃了自己正处于颠峰的服装设计事业而回上海，和林可胜结婚。当时是林可胜的第二次婚姻，林有一个儿子现在牙买加，但张倩英与林可胜并没有子女。结婚时，张倩英36岁，林可胜50岁。

自张倩英结婚后，就信守中国传统嫁鸡随鸡的观念，不再东奔西跑，而跟随着林可胜。1948年当林可胜将国防医学院迁往台湾复校时，张倩英也到了台湾，这是她第一次到台湾，1949年，林可胜辞职赴美讲学，张倩英回忆说，当时住在台湾大约一年的时间。

1949年林可胜到伊利诺大学担任客座生理研究教授，1950年又到内布拉

斯加州的克雷顿大学医学院担任生理药理学教授兼主任。自 1952 年受聘于印第安那州艾尔卡特镇的迈尔斯药厂，此后，张倩英就定居在这个小镇。

1969 年夏天，林可胜因食道癌逝世，所有张倩英的亲朋好友都劝她搬回纽约，因那里还有她许多当年做设计师时所交的好友。但张倩英固执地说：“我喜欢用自己的步调、方法，去做我喜欢做的事。”她是不愿离开与林可胜共同建立的家。

婚姻生活几乎终止了张倩英的设计生涯，所居住的小镇也无法让她发挥设计才能，但至今张倩英仍然在自我设计，她的穿着，她的家仍然反映着她个人独特的设计风格，美术拼贴装饰着墙，描述着她的历史与哲学，塑胶的四个框子拼成了一个小方桌，客厅用木板订做的沙发，配上选用亮丽的色彩棉布做的椅垫，是那么的实用与简单，小方桌上摆满了她自己设计的首饰与皮包。

1984 年间，张倩英替 WTRC 电视台制作了设计服装、首饰的录影带，教观众如何自己动手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她携带的东西常很有趣，可以在短短的时间中做出一个迷你型的时装表演，让人不得不佩服她拥有的丰富设计知识与才能。

目前独居的张倩英，自己开车出门购物或访友，不过平时在家中时间较长，印第安那州有半年是寒冷的天气，已养成不轻易出门的习惯。她说，在家中很忙呀！每天都有做不完的设计及剪贴要做，况且作自己喜欢的事往往时间过的好快。

曾经在历史的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张倩英，在纽约及上海的设计生涯也出尽风头，经过半个世纪之久，她归于平淡，且忠于自己的喜好，实是一般人难以相信的事实。

女儿女婿之迷

陈洁如晚年，客居他乡。她思念大陆，更牵挂留在上海的女儿。也许读者会奇怪地问：“蒋介石从那里来的女儿？”

事情还要从蒋陈新婚说起。

陈洁如和蒋介石结婚不久，发现自己身上起了疹子。她试用了一种种皮肤油膏均不见效，只好去问医。诊断结果得的是一种性病。这种病是蒋介石与陈结婚前染于上海烟花巷。后虽经治疗得愈，但两人均留下终生不育症。为了表示自己的悔悟，蒋介石发誓放弃所有烈酒、普通酒，甚至茶和咖啡。从此后，他只喝白开水。

一次，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女士去参观广州平民医院，得知一位华侨家属接连生了多胎女儿后，想生个儿子，结果生下来的还是女孩，她要求医院将这个女孩送给人家抚养。何香凝看到婴孩的眼睛很有神，圆团团的脸蛋特别惹人喜爱，就答应抱回去。到了家里，正巧陈洁如来玩，她见到这个女婴

也挺喜爱，抱在怀里左亲右吻舍不得放下。何香凝知道陈洁如很想有个子女，就忍痛割爱将女孩送给她。蒋介石得讯后也很高兴，将女孩取名为“蓓蓓”，学名叫蒋瑶光。

1927年，蒋介石结识了宋美龄，用“调虎离山”之计，将恩爱了6年多的夫人陈洁如送往美国。待她乘上驶美的“杰克逊”号邮船后，就登报宣布与陈洁如脱离关系。1928年，蒋介石再派代表到美国同陈洁如商谈离婚条件。陈洁如看到蒋宋之间木已成舟，无奈只好与蒋介石分手。

1933年，陈洁如离美返国，寓居当时上海法租界的“巴黎新村”（今复兴公园附近的重庆南路169弄）。她把寄养在外婆家的女儿蒋瑶光领回身边，把她改为母姓。从此，母女相依为命，过着隐居似的生活，只有很少人知道当年“蒋总司令夫人”带着爱女住在上海“巴黎新村”。

长得亭亭玉立的蒋瑶光，于1946年经当时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主任秘书胡静如夫人周安滇介绍，与陆久之结识相恋。

陆久之出身于官僚大家庭，父亲陆翰曾是浙江军阀卢永祥的幕僚，后来又任孙传芳的5省联军军法处处长，是一个掌握生杀大权的显赫人物。陆久之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又受到《新青年》等书刊的激励，青少年时代就怀有开创人生新道路的理想。他不依仗豪门富第过纨绔子弟的生活，18岁那年考入上海宝成纱厂当学徒，后来又回到杭州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学习。这时，轰轰烈烈的北伐洪流鼓舞他回到上海，认识了周恩来、赵世炎、汪寿华、蔡叔厚等共产党人，从此，他背叛了自己的家庭，一直追随着共产党。

陆久之曾是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站驻日本的谍报人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日，陆久之从日本撤回武汉，进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被委派到上海搞情报。当时任中共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的叶剑英，对陆久之到上海工作进行了秘密布置，叫他与夏衍等地下党员取得联系。他到上海后，打入日本海军部，用日本人的经费，出任《华美晨报》社社长。他以此身分为掩护，秘密刺探日方和汪伪情报，及时发到重庆和传给中共地下组织。后来，他又同日本海军部几名高级官员合伙开办海安信托公司，利用日本海军给的“派司”，将抗日前线和后方急需的物质派船运出吴淞口封锁线，冒险送往苏北。此事被日本宪兵司令部察觉后，他被捕入狱，受尽折磨。

抗日战争胜利后，汤恩伯委任陆久之为国民党第三方面军的“少将参议”，请他做幕僚。陆久之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一方面继续经营海安信托公司，一方面开设“璇宫”、“云裳”舞厅，供共产党地下组织作联络之地。周恩来总理曾说过这样一句话：“陆久之不参加共产党，起的作用将更大。”他一直是党外的民主人士。

当时陈洁如只知道陆久之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又是上海商界一个有声望的人，特别是她与陆久之见面后，看到他举止大方，彬彬有礼，就答应将爱女瑶光许配给他。

陆久之与蒋瑶光的结合，并不因为她是蒋介石的女儿，而是她温柔而又

坚强的性格，秀丽且又端庄的形象，真挚并又重情的为人。1946年，他与蒋瑶光在上海结婚。不久，陈洁如又将自己与蒋介石这段姻缘向女婿详尽的诉述。陆久之深深同情岳母的这一幕悲剧。

蒋经国从苏联回国的那年，以及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上海时，曾多次到巴黎新村去看望他惦记的“上海姆妈”（蒋经国对陈洁如称“上海姆妈”对姚怡琴称“苏州姆妈”），因此国民党军政界的一些高层人士，也知道了“委员长的第三夫人”隐居在上海。于是，陆久之与蒋瑶光结婚的消息传出后，他们也就将陆久之视作为“蒋委员长的驸马爷”而恭而敬之。

照说，陆久之可以仗此姻缘去认一认当委员长、大总统的“老丈人”，靠显赫权势来为自己谋取高官厚禄，然而他没有这样做。在国民党尚统治着中华大半河山之时，他也没有夸耀自己是“蒋介石的女婿”。1949年5月，汤恩伯撤出上海前夕，出于个人私交，多次叫陆久之离开大陆，与他同飞台湾，也被陆久之婉言谢绝了。

1955年，原任上海市副市长兼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潘汉年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被打成“反革命集团”被捕了，陆久之在“潘、杨事件”中遭受株连，以反革命罪也锒铛入狱。

陈洁如认为女婿是无罪的，不应该因为他是“蒋介石的女婿”就借故把他抓起来坐牢。为了营救陆久之，她亲自到北京找周恩来总理。在周恩来的干预下，陆久之在1960年获释出狱，但“反革命”的帽子一直没有摘掉。

1966年文革动乱开始后，淮海路某号门口曾贴出铺天盖地般的大字报，有一张上面还画了一条狗，大标题是“打倒蒋介石的狗驸马陆久之！”

从此，一位中等身材，头发略显花白的老人，被挂上“牛鬼蛇神”、“狗特务”的牌子在街坊里一次次批斗。随后，他被“扫地出门”，全家被迫搬到淡水路一所房子里。每天，造反派勒令他到街道开办的窑场里去扫拉权、搬砖头、做苦工。居民们指指点点地说：“喏，他就是蒋介石的女婿陆久之。”有的人不解地问：“他怎么不到台湾当大官，而甘心留在大陆呢？”有的人则惊讶地说：“我们从未听说过他是蒋介石的女婿，他这特务工作倒做得真到家呀！”有的人附和道：“此人隐蔽很深，值得怀疑。”

陈洁如1971年在香港病逝，蒋瑶光到香港料理母亲丧事后就留港定居，子女也都先后去港。蒋介石和蒋经国送给陈洁如那套坐落在九龙窝打老道的房子是宽敞的。1983年陆久之来港探亲时，妻子儿女们都劝他定居香港共享天伦之乐，但陆久之不想在香港当“寓公”，又回到了上海。

陆久之很少谈及自己的身世。1989年初，上海有位新闻记者得到了线索登门采访，请他谈谈与蒋介石女儿蒋瑶光联姻一事，他还是认为自己不是蒋介石的“驸马”，而是陈洁如的女婿，他说：“如果叫我谈蒋介石女婿，我无可奉告。”然而记者还是把这一传奇故事采访清楚了。

他在初任上海市第6届政协特邀委员时，还是一位戴帽“反革命”，直到1985年初，有关部门才正式宣布为陆久之彻底平反。

陆久之的显赫头衔，一直鲜为人知。随着台湾当局实施赴大陆探亲的政策后，有人对他说：“你现在可以亮亮蒋介石女婿的身份了。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客观上就是蒋介石女婿！”陆久之闻言后依然淡淡一笑说：“我过去不想沾蒋介石的光，今天也无需趁海峡两岸始见祥和气氛而重新去攀龙附凤。”

晚年，陆久之孤身独居在淡水路一座清静住宅里，上海文史馆按期发给他的退休金，上海市杨浦区三浦实业公司聘他为首席顾问，蓝天商务公司请他出任名誉董事长。他说：“夕阳无限好，明朝看晓霞！”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海峡两岸进一步架起“金桥”的美景。

第七节 官邸人士的回忆

走进蒋中正世界

家居生活中的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如何相处？他们的日常生活及言谈举止又是如何？当年曾与蒋介石在同一屋檐下生活的官邸人士，日后如是回忆了他们的“先生”。1953年春天，“总统府”三局局长施觉民打电话到官邸给侍卫长，表示“总统府”缺一内勤工作人员，希望官邸能够甄派适当人选递补。在没有人愿意前去的情形下，几位长官商量以后，翁元被通知立刻到“总统府”办理到职手续。就这样，他开始真正到蒋介石身边服务，正式走入领袖的世界。

翁日后回忆说：

从我正式成为贴身副官的一分子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已经可以感受到，在官邸这样一个重视派系和关系的大内深宫，以一个这样被总统府“空降”而来的人而言，要能够生存下去，的确是十分不容易的。早在我担任便衣卫士和总统府内勤工作时，我就多多少少听过一些关于官邸内务科人员派系的传说，但是，那时毕竟没有实际的接触，只知道在官邸内部，内务科他们那群人，分为夫人派和先生派，两个人有各自的贴身副官和服侍的人马，分得清清楚楚，如果不是这二个系统里面的人，要想在官邸内务科占有一席之地，实在是谈何容易。

对我做的陌生工作，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什么事该怎么做。我开始认真地私下观察老副官们的一举一动，那怕是任何一个细微的小动作，我都毫不遗漏地看个仔细。譬如说，蒋介石吃饭时，哪些东西是必备的？碗、筷、杯、盘和各式餐具是怎么摆的？他最喜欢吃哪些东西？他的生活习惯有哪些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我都一个动作接一个动作地看在眼里，然后以当时还年轻的记忆力，强迫自己一项一项地记下来，一点也不马虎。我心想，只要我这样好好学上一阵子，看还会有谁来排挤我。可是，我万万没想到，一个更大的考验，很快降临到我的面前。

在翁去官邸报到大约一个星期左右，蒋介石要去花莲度假。“总统”和所有的侍卫人员，一起搭乘“总统”专用座机飞到花莲，住进他最喜欢去的“文山招待所”。到了花莲的第二天，和翁元一起的正班副官钱如标突然患感冒，医生听他说伤风了，怕他把感冒传染给蒋介石，所以就叫钱如标远离蒋介石，等感冒好了再上班。

突然有人生病，侍卫人手马上就明显不足，可是，服侍蒋介石的事不是说没有人就可以停顿片刻的，于是，尚在“见习”阶段的翁元在到任不满一个星期的情况下，被派去接替工作空缺。从此，他慢慢开始融入蒋介石的日

常生活当中，逐渐从他的日常生活习惯慢慢摸索，并且成为最熟练的一位贴身副官。

为蒋介石洗澡

德国纳粹头子希特勒有一句话：“在佣人的眼里，即使是伟人也是没有秘密的。”在翁元成为蒋介石贴身副官之后，开始了解这句话的道理。他说：“一个伟人的妻子，恐怕也不可能像丈夫的佣人那样了解她丈夫的身体吧？”

在花莲文山招待所，翁提前结束见习，直接为蒋介石服务，为了服侍所有蒋介石的日常生活细节，他必须在那段时间内，学会如何服侍的窍门，当然包括为蒋介石洗澡在内。过去从来没有帮人洗过澡，更遑论替“一国”领袖做洗澡的服务，开始时，真教他精神紧张、如临深渊。

蒋介石习惯洗泡澡，他洗澡从来不用肥皂，但是基本上每天都要洗一次澡，自己洗完之后，由正班副官为他擦拭后背，然后再由正班副官为他披上大毛巾，擦净身上的水渍。接下来的工作就交给副班副官，把蒋介石从浴室扶到他的书房，让他坐在卧榻旁的沙发上，副官则搬张矮凳子坐在蒋介石面前，用干毛巾为他擦拭双脚和脚趾间的水渍。

擦脚时，如果他觉得脚趾甲长了，就要叫专门为他修剪趾甲的吴先生来，为他作修剪服务。

手指甲，蒋介石则一向是自己修剪，后来他身体愈来愈差了，才由翁元替他修剪，至于脚指甲因为需要特殊的工具，所以一直是吴先生负责。

蒋介石稀疏的短发，也是定期就要修剪一次的，最早是从大陆上带出来的老师傅理，后来老师傅退休了就由副官钱如标接替，蒋介石觉得他理得很好，之后就一直由他剪发，官邸里头的同仁就戏称他是“天下第一把刀”。接手的钱如标，和后来替蒋介石剪指甲的翁元一样，都有了副官以外的“兼职”。

翁说：“这项‘副业’肯定没有什么好处。有一次我休假在家，电话来了，这一听是官邸打来的，心知又有事情找上我了，果然，就是蒋介石的指甲又长了，他指定要我下午回去帮他剪指甲，于是，我便匆匆吃了中饭，连忙赶赴官邸应召，一个假日就这样牺牲了。”

贴身副官扮演的是佣人角色

虽然在名义上叫贴身副官，实质上却扮演着佣人的角色，做的工作有时也像古时皇帝内侍作的事。但是，正因为如此，他们对蒋介石更有直接而深入的认识。

东方大地还是一片昏暗，蒋介石已经起床，黑暗中，蒋介石拿着一支钢

笔手电筒，蹑手蹑足，摸索走进盥洗室洗脸。他所以如此，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不想吵醒还在睡梦中的宋美龄，宋美龄是个当年台北官场知名的夜猫子，当蒋介石起床的时刻，宋美龄其实才入睡不到二三个钟头。常年以来，他们在形式上是夫妻，可是实质上，他们之间的生活作息是有着天渊之别的，然而，他们彼此间从来不相互影响干预，在保持彼此的生活形态上，他们的确是相敬如宾的。

当蒋介石轻轻带动门把，轻声走出房门的一刹那，警觉的侍卫人员已经掀下一声电铃，告诉当班的贴身副官，该到先生的身边服侍他了。在官邸，一般的情况下，掀一声电铃代表是蒋介石那里找人服务，如果是掀二声电铃，那是夫人传唤随从人员的讯号。假如，蒋介石自己召唤副官，通常是叫一声“喂！”据说，这已经是十分“礼貌”性的一种叫法，在大陆时期，他是以“卫兵！”召来随从的。其实，这也无所谓礼貌不礼貌的，即使是侍卫长在蒋介石以往的意识里，也不过是“卫兵头”而已，叫“喂”，已经是相当客气了。

为了配合蒋介石的作息以及任务的需要，副官基本上分为正班、副班、空班等三个班次。副官人员必须在每天清晨5点以前就起床，起床后的第一件差事就是烧开水，烧好开水就倒好二杯，一杯是温的，大概五六十度，另外一杯是滚烫的，将近100度，以备蒋介石早上起床饮用。

结束盥洗，喝完开水，蒋介石就开始在阳台上作柔软体操、唱圣诗。蒋介石唱圣诗时，特别有意思，只要唱到“天父”或是“圣哉、圣哉”的时候，就会朝东方脱帽行礼。作体操、唱圣诗约莫20分钟，他再回书房静坐祈祷。

每日静坐三回

“其实，先生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这么沉重。”追随蒋介石40载的蒋尧祥侍卫官笑着对访者说：

“我常睡在先生夫人的房门外，你知道先生夫人是怎么就寝的吗？——两张床，同一个帐子。”

问：“在大陆上吧。”

“对的，到了台湾不久就分房了，不过两间房还是相通的。”吕德彰侍卫官补充：“先生早睡早起，夫人晚睡晚起，他们夫妻恩爱，调适得很好。”

“先生都是5时起床。”蒋尧祥说：“晚上9时就睡了，从来不用闹钟，也不用人叫，衣服都是自己穿，每天静坐三次。”

问：“静坐？”

“先生静坐养身，早、中、晚，各坐30分钟。”曾任蒋介石座车侍卫的钱漱石说明：“先生有恒心，更有毅力，有次在重庆黄山官邸，先生晚上在卧室静坐，突然风雨交加，我从他身旁走过去，替他关好窗子，他都不知道。先生静坐完毕，还问我谁关的？”

“1958年”，先后担任两位蒋“总统”侍卫工作逾30年的应舜仁另举一例：“中共在8月23日以炮火猛烈轰炸金门，两小时内落弹4万余发，侍卫长报告先生，先生是8月22日才从金门回台北的……‘八二三’清晨，先生听到值班武官报告金门炮战的消息，仍然静坐40分钟早课。”

问：“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环境如此恶劣，蒋公吃不吃安眠药？”

“不吃，先生从不服药。”蒋尧祥说话：“除了牙齿之外没有病过，西安事变摔伤了腰，由一位范医生做气功按摩，也不吃药的。”

问：“蒋公喝咖啡什么的吗？”

“只喝开水，到台湾后喝点可口可乐。”服务官邸内务达48载的朱霞庭副官说：“我是32年到先生身边的。先生的开水都是我亲手递送的。早晨开水里加点盐，不喝酒。”

日记圣经不离身

“先生生活很有规律。”蒋介石身旁年资最长，现年80岁的副官李大伟证实：“抗战时也一样，早上5点起床，喝开水、做运动、念圣经，后来吃早餐的时候，有于振宇先生念报纸给先生听。”

问：“先生每天写日记？”

“先生早上除了看公事之外，也写日记。”李大伟说：“用毛笔写，从民国六年就写了，日记真多，现在放在角板山上存着。”“所以先生出门，常像搬家一样！”李大伟说：“日记呀，圣经呀！是随时都在先生身边的。”

“先生有个大柜子，里面全是日记手稿，珍贵得不得了，比什么金银珠宝都重要。”吕德彰侍卫官说：“先生也很喜欢读书的。”

规定侍卫读书

“先生规定侍卫要读书。”蒋尧祥说，曾国藩家书、大学、中庸、党员守则……这几本不但念过、还要背得，还有一本是军人读训。

“我见先生时在重庆上清寺，问我平时看不看书，就教我背了段曾国藩家训，书到了他面前，内容呀，词句呀，引申含义呀，就都不一样了，我们也许只是会背，在先生的理解就不一样！”张毓中侍卫官虽年已85，记性奇佳。

“先生最推崇的是王阳明哲学。”张毓中又说。

“召见我的时间，叫我多看‘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钱漱石侍卫官也说。

问：“传闻有云，蒋公看的报纸是特别印的，意思是报喜不报忧——”

“哪一年的事？”被访者齐声反驳：“从来没有的事！先生早年都是自己看报，后来因为年纪大了，眼力较差，才有人读报给他老人家听，怎么会

有这种事？”

读报官全年无休

“从1959年到1961年，我作先生的读报侍卫。”前后追随两位蒋“总统”的于振宇将话题拉回阅报之事：

“我负责读报，并不轻松，跟先生这段时间，一天假也没有，年初一、结婚都没请假，先生天天要读报！而且读全文，我5点钟就到士林官邸，先把报纸看一遍，社论是一定要读，国内消息、国际消息……”

问：“读哪份报呀？”

“中央日报和香港工商时报。”于振宇说：“8点等在侍卫室，先生吃早饭时，我读报——”

“先生有时把大标题看了，”于振宇说：“会提醒我读，先生常说：‘最机密的事就是最公开的事，最公开也是最机密的事！’有天报上有段小新闻，苏联想租印尼一个小岛被拒，教我去查，原来小岛是海空军基地，是第二次大战日本南侵进攻澳洲的跳板，战略价值非常高，如被租去，西南太平洋会被截断！这一查引起军方大家的注意，先生战略之精、地理之熟！我读报也战战兢兢……”

“我多半等在武官侍卫室。”于振宇继续说：“有天晚上读美国顾问的一篇报告，估计我国空军攻打大陆的战力只能维持3天！先生心情不佳，不言不语的下了楼，我就跟着，楼下大客厅里在放电影，夫人和女副官、一些侍卫们在看，先生从银幕前走过去，一眼也没看，给我的感觉，先生孤独而寂寞。”

重视吃食

在蒋家家族当中，蒋介石是最重视吃食的一位，他吃的食品非常精致但简单。拿早餐来说，通常是吃一些点心类的食品，诸如汤包、包子、馒头，有上海式的餐点及西式餐点，也有北方式的口味。为了让蒋介石吃得舒服称心，大师傅几乎天天得变换花样，可是菜色再怎么改变，蒋介石有几样家乡菜是每天都要吃的，那就是腌盐笋和芝麻酱，他的吃法是拿盐笋沾着芝麻酱吃，就因为腌笋是蒋介石每天都要吃的家乡味，官邸内务科几乎每年都要腌制个几十斤，供蒋介石每天食用。

蒋介石遍尝南北餐饮，仍情有独钟家乡味。官邸的菜色几乎每样都会用点鸡汤作调味。蒋介石一口假牙，所以习惯吃烧得比较烂的菜，不管是中餐、晚餐，桌上大概是五道菜左右，菜色是二荤三素或三荤二素，每道菜虽然称不上是宫廷美食，但是也兼顾了风味和营养。

蒋介石虽然和宋美龄一起吃中饭和晚饭，可是两个吃的东西简直是南辕

北辙，一点都没有餐食上的共同嗜好，大体上，蒋介石吃的方面完全是中国传统式的，而宋美龄则是全盘西式口味。

官邸还有一样传统的美味，就是所谓的“黄埔蛋”，黄埔蛋其实是用大火炒出来的蛋，里头还摆些葱花，起锅时间特别快，所以吃起来很嫩，蒋介石吃黄埔蛋可说百吃不厌，通常他牙疼的时候，这道菜是他必备的菜肴。

蒋介石习惯上在饭后吃点水果，他比较喜爱吃木瓜、香蕉、西瓜、美国大梨等新鲜水果，不喜欢吃苹果。

中国人很喜欢说，为人臣子的人，要深体上位苦心，这句话讲起来容易，可是等到要自己做的时候，就知道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尤其是服侍上位的人吃饭用餐，更不是单单一句什么空泛的“深体领袖苦心”就可以游刃有余的。这是翁元追随蒋介石和蒋经国二位“总统”生活，最简单的一点心得。毕竟，他们不是他们的肚里蛔虫，不可能每件事做得尽善尽美，用膳的时候冒着被指责的风险，在士林官邸，有诉说不完的餐桌故事。鸡汤事件，是副官之间最引以为戒的一个案例。

蒋介石吃完早餐后依例会喝碗鸡汤，鸡汤的温度要适中。有一次副官张欣超当班，可能是张欣超端汤上桌的时候，厨房没有留意汤的温度，汤面漂的油层让人忽略了高温，蒋介石没有注意，端起来呼噜噜就是一大口，接着，他马上脸色大变，随之“卡噗！”一声，嘴里的汤液全部吐了出来，搞得一桌子汤渍。

他勃然大怒，朝张欣超吼道：“你这个混帐！你想害死我啊！”张欣超被热汤事件吓破了胆，隔不了多久，他就托病请假，后来还是提前退休，离开官邸。

洪门秘密卫队

猜疑之心奇重的蒋介石，到台湾后愈加不安，他甚至不完全信任那些视他为至高无上领袖的“蒋家军”、“蒋家特务”，于是在1954年间，成立了一支完全由洪门人士组成，不隶属于任何军、政编制的秘密护卫队。

洪门是中国近代社会中，规模最庞大、组织最健全的一个秘密会社组织。从成立之初一直到民国初年，它一直都是一个“革命组织”，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继承者。但是，随之国民党政府1949年来到台湾的所谓“洪门主流”，却变成了国民党统治台湾人民的助手，并逐步蜕变为“反共爱国阵线”等极右团体。

据一名了解内情的官邸人士指出，蒋介石这支秘密护卫队成立得相当隐秘，不但一般的军政首长不晓得，就连情治单位高层人员，乃至以正式编制负责蒋介石个人安全的“梅庄警卫室”，对此都不太了解。一般只知道在士林官邸后面的山头上，竟然不可思议地住了50名没有军阶但孔武有力的中年男子。

透露消息的权威人士说，“在蒋总统去世之前，我们什么都不能说，也不能出名，现在时代不同了，可以说了。”他表示，常年驻守在士林官邸后山头的这支秘密护卫队，乃由蒋介石亲命前国防部长黄杰之弟、在洪门具有双龙头身份的黄震负责，从洪门各山头一共挑取了 200 名没有家庭包袱、忠于“领袖”、敢于牺牲的壮年汉子组成。负责训练的，则是一名退役的傅姓将军。

据了解，这支秘密护卫队除了一般的体能训练外，另一特色乃是：每人均具有一项过人的江湖异术，包括气功、诈赌、下毒等等。这群人平日分散民间，就以这些秘术在特权保护下招摇撞骗。据悉，迄今在台北一带仍有由 30 名洪门师父组成的麻将老千集团，其中有部分人即为当时秘密卫队的成员。这些秘密护卫的训练，虽因个别异术而有所不同，但是据说都经过一番长期的辛苦锻炼，以诈赌的人而言，为了锻炼牌桌上偷牌的高明指法，每天都得花上一小时将手指头浸在调醋的米酒中，以便指头松软灵活。

除了这些特别技能的训练外，这些秘密护卫唯一的政治学习，就只是法西斯式的个人效忠，对蒋介石彻彻底底毫不保留的效忠。

在经过了一年多的训练之后，这支 200 人的洪门秘密卫队被分为四组，分别驻守在蒋介石的草山、华夏、士林及蒋经国的七海官邸。他们平日分散民间，各授一把六发左轮手枪，在任务区域内负责巡逻。这群人虽然没有任何正式的编制，平日亦闲散的自由自在，但在实际上，每一组 50 人内，亦建立了相当建制，即在文武护卫长下，其余 48 人每 3 人分为一小组执行任务。

以士林官邸部分而言，负责文事的护卫长叫黄正时，此人精于五行风水密术，尤精阴阳采补之道，深受老蒋宠爱；负责武功的则为一姓谢人士，据见过他的人说，他的手指头迄今仍因关节肿大不能伸直，就是因年轻时练北派鹰爪功练得过火的“历史残余”，在他年轻之时，他的指力据说可以拗断一棵手臂粗的小树。

按照正式编制，蒋介石的安全保镖系统成员已为数不少，甚至可以说是到了“密不透风”的地步。一位官邸人士指出，在蒋介石时代，设在士林官邸附近铭传商专旁的梅庄警卫室，一共有两个营的兵力，由宪兵、海、陆、空各军种组成，统一由当时情报局长郑介民调度，因此蒋氏安危早可说是万无一失。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蒋仍暗中设置了这支洪门秘密护卫队，原因究竟何在呢？

根据一位对官邸颇有研究的人士说，从 40 年代国民党将领纷纷投诚，乃至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戴笠坠机死亡以来，蒋氏对三军乃至“国特”，一直都不怎么放心，尤其在他刚到台湾不久，台湾民间的反蒋，反国民党运动又相当激烈。

1953 年 1 月，国民党军方在台北县汐止鹿窟山区，发现了一个“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武装基地——“台湾人民解放军武装保卫队”。当时仓惶逃来台湾的蒋介石获悉后，大为震怒，时任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的周至

柔挨了一顿痛叱：“你们难道要台湾也搞出一个延安吗？”

稍后国民党动员了四个师的兵力，始镇压了这支为数 110 人的“游击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却也因而几乎全面调动。就在次年（1954 年）6 月，蒋介石连任“总统”，陈诚大幅改组内阁后，除了空军“总司令”王叔铭连任外，其余的“参谋总长”，陆、海军“总司令”及其他各部主管，全部撤换，由蒋介石黄埔一期的子弟兵桂永清出任“参谋总长”，旋佳因心脏病死亡，蒋介石破格提升特务头子彭孟缉执掌“总长”兵符。

据一名曾在蒋介石身边当侍卫的段姓人士表示，在这一段军权转移的过程中，加上 40 年代“国军”将领的纷纷投共，“心有余悸”的蒋介石对台湾的局势，乃至“国军”军心，都相当的不放心，甚至对随侍在侧的“子弟兵”也颇有怀疑。另一名侍卫官举例说：蒋介石经常是独自在一个房间里睡，房门口有个侍卫官横着打地铺，可是侍卫人员和蒋氏之间又有一条大狼狗，这条狗只认识蒋和专司管理狗的另一人，蒋介石在自己枕下放了一枝手枪，只要侍卫人员在睡梦中一个翻身，蒋介石就会抓着手枪厉声喊道：“什么事？”

晚年的蒋介石，就是生活在“自己吓自己”的“惶惶终日”之中的，人们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支特殊的洪门秘密护卫队了。

自早年在上海炒股票，搞期货开始，蒋介石的一生，就和黑道脱不了干系，甚至有不少可靠资料显示，他与上海著名青帮头子杜月笙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另一方面，就中国大陆的近代秘密会社传统而言，确如洪门人士所说：“洪门是国父革命的一分子”，因此洪门与国民党的渊源一向相当深厚。在蒋介石与黑道互相需要状况下，建立这样一支秘密护卫，对蒋而言固然可以达到保护他自己，又牵制其他部门的目的，再加上洪门“为兄弟两肋插刀”的帮派伦理，蒋介石的安全自然万无一失，而就洪门人士而言，却也可以收到“上达天庭”，“狗仗人势”的目的。蒋介石搭上洪门成立秘密卫队，说穿了只不过是蒋介石利用“非法暴力”制衡“合法暴力”，与黑道挂钩的另一例子罢了！

据了解，在蒋介石死后不久，这支由他本人直接指挥的秘密护卫队，于是“树倒猢猻散”，有部分人老死，部分人不知所终。但另一说法则截然不同，它指出，其实在蒋介石死后，这群洪门秘卫并未云消烟散，以士林官邸后山的 50 人而言，迄今仍有约二三十人住在该处安家落户，甚至娶妻生子。

一名调到士林官邸当差不久的宪兵队长，对此就曾大惑不解，而报告上级要求“拆除违建”。而当时住在士林官邸的宋美龄对此并未接纳，反而一笑置之，或许这支洪门秘密护卫队的存在，显然已因成员大多年逾七十而没有什么作用，但对“近年心绪欠佳”的蒋夫人而言，这也许可以作为她怀念往昔蒋家王朝的凭藉。

第十四章

宋楚瑜寒夜报信，蒋经国苦撑孤舟。真诚钦佩邓小平，“二太子”赞成祖国统一。再度出洋，宋美龄晚景凄凉

第一节 严家淦戏演加官

继任“总统”

1975年4月5日11时50分，影响中国命运达半个世纪的蒋介石终于“崩殒”。4月6日起，台湾当局进行了历时一月的哀悼。在此期间，国民党中常会召开临时会议，作成两项“重大决议”：

其一，严家淦副总统，根据宪法第49条的规定，继任蒋遗缺。

其二，蒋经国以从政主官同志身份，向“中常会”提出辞呈：“经国不孝，侍奉无状，遂致总裁主疾猝发，遽尔崩殒，五内摧裂，已不复能治理政事，伏恳中央委员会衿念此孤臣薛子之微衷，准予解除行政院一切职务，是所至祷”。“中常会”责以“效死勿去”，“衔哀受命，墨 从事。”

国民党中常委这两项“决议”，十分荒唐。严家淦宣誓就任，“法”有明文，无需中常会多此一举。蒋经国因父丧辞职应向新任“总统”提出，因“行政院长”非党内职务，如辞国民党中常委，那又当别论，香港《明报月刊》事后刊登署名阮大仁的文章《台湾内部的几件大事及台局动向》，作者就法理观点，提出疑问：

况且即使党决定予以慰留，其仍须向新总统提出辞职。党的慰留只是表示党支持其留任，并不表示新任总统亦予慰留。虽然严家淦总统身为中常委，在常委会中亦表示希望蒋经国留任，但是严家淦总统与严家淦中常委的身份不同，虽然同是一人，两种身份的法定地位不同，严家淦中常委的在党内的意见不能取代严家淦总统在宪法上应有的权力。

阮进一步指出：

国民党籍的其他阁员没有与蒋经国行动一致，一起向党内提出辞职，此示内阁无总辞之意。况且院长留任，并不表示内阁不可能局部改组。因此全体阁员都应该向严家淦总统（不是严家淦中常委）辞职。

蒋经国提出辞呈，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慰留时，蒋中正已死，严家淦尚未就任，国府并无总统，无人可以慰留行政院长，而行政院长也无从提出辞职。

虽然在宪法上并无明文规定行政院长在原任总统死亡时，应向新任总统辞职，蒋经国未向严家淦辞职不算违宪。但由以上几点去看，蒋经国在严家淦未就任前，一人因父丧而向党辞职，充分显示其不欲向新总统提出辞呈，内阁亦不欲辞职。我不愿去猜测其动机，在国丧期间能快刀斩乱麻地安定政局可能是必须的，但我要指出来，若是强有力者如蒋中正任新总统，则断无这种和稀泥式的内阁留任办法。

丧葬事毕，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于4月28日召开会议，修改党章，推举蒋经国担任主席。

总裁名义，为了借申哀敬，予以保留。因此，国民党党史上，自孙中山以后，党魁的称呼，三易其名。

修改党章，只开“中全会”而不开“全国代表大会”，固省却不少麻烦。却为国民党的组织法所不容，阮大仁批评说：

“为什么国民党不能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来修改党章，而要以中央委员会全会越权修改？固然召开全代会比较费时，但是党权名义上定于一尊并不是燃眉之急。我不认为其他的中常委们会利用这空档夺蒋经国的党权。名义上的集体领导，不但合于党章，而且对历史也好交代。我更不认为蒋经国急于要名至实归，或以此来平衡严家淦总统的权力，严蒋的合作是愉快而且成功的。”据阮的推测，是“有人要拥立建功”，至于“众多党的元老与评议员们”何以“闭口不言”，他就没有答案了。总而言之，这些小插曲，在当权派的眼里，无非书生之见。他们急于要“巩固领导中心”，法律或规则，属技术小节。严家淦继任“总统”，刚好和越南统一巧合，台湾当局分外悲恸。他们认为，美国可以放弃阮文绍和他的越南土地，同样地会放弃台湾。此外，“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的菲律宾、泰国，也在此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这更使国民党当局面临一个新的艰难局面。

一个没有蒋介石的台湾，前途将会如何？新“总统”能否支撑得起这个残破的局面？

官运亨通

严家淦，字静波，江苏苏州人，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1905年生，比蒋经国大5岁。1963年11月13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作为内阁改组的序曲。接着“行政院”改组，提名“财政部长”严家淦继陈诚组阁。

下面是台湾《联合报》在其即将出任“行政院长”时写的经历简介：

民国27年（1938年），也就是中国对日抗战的第二年，他担任福建省建设厅长，从事地方建设，在艰困中举办小型水力发电，兴建道路。民国28

年（1939年），调任福建省财政厅长，首创田赋征实制度，曾经中央嘉勉，并推行全国各省，对于支持战时军粮民食，有很大贡献。

他在福建省担任财政厅长职务5年之久，至民国34年（1945年）初，当中枢新设战时生产局成立后，就调他到重庆担任该局采办处长，办理美国租借法案及中英、中加两借款案物资事宜，曾两度赴印度洽运重要物资。

民国34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奉派代表经济部及战时生产局，首先飞往南京，在何应钦将军下，协助办理受降接收事宜，历时月余。在台湾省光复前夕，即民国34年（1945年）12月24日到达台北，接任台湾省长官公署交通处长，兼交通部特派员。民国35年（1946年）调往台湾省长官公署财政处长，兼台湾银行董事长，策划建立台湾省财政金融制度。至民国36年（1947年）台湾省政府成立，任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主持台币改革，对于稳定物价，获得特殊绩效。

民国39年（1950年）初任经济部长，兼美援运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年3月改任财政部长，开始推行现代预算制度，厘定财政金融政策，整理各项财税法规，收效甚宏。

民国44年（1955年），他继俞鸿钧先生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并兼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及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严先生平素对人谦和，治事严谨，生活朴素。他常勉励下属，当某一件事发生争执时，心里要记得八个字‘退一步想，易地而处’。

他认为不能希望每个人的性情、思想、意见完全相同，每个人都有个性，我们毋宁要发展这种个性，以达成多面特殊的成就。但因各个人意见不同，相处在一起时，难免发生争执，如果人人能‘退一步想，易地而处’，那末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化戾气为祥和了。

他并要求部属最好能‘公而忘私’或是‘先公后私’。他认为凡是能遵守‘先公后私’、‘易地而处’，这两句话的人，一定是愉快的人，也一定能做愉快的事，对个人，对国家，一定有所贡献。

台湾《征信报》也发表本报记者孟庄含文章《严静波先生二、三事》，对严家淦做了下述补充报道：

即将就任的行政院长严家淦先生，具有许多迷人的特点与嗜好，这不仅反映在他做人处事的態度上，而且也反映在他日常生活之中。记者因为采访财政部新闻多年，与他接触的机会较多，愿在举国目光都集中在这位新阁揆的大政方针之际，凭记忆所及，报道一下他在治事上与生活上的若干“琐事”；从这些“琐事”中，也许就可以发现他之所以能成为行政院长的原因。

严先生富有深厚的民主思想，因其富有民主思想，故能重视舆论。因为他重视舆论，故能重视新闻记者。但是他重视新闻记者，并不是从“请吃饭”

着手，而是在采访上，尽量给予方便与合作。

他非常了解作为新闻记者的职责，只要他有时间，从来没有拒绝哪一位新闻同业的访问；只要他能提供的资料，从来没有保留过。要问他什么问题，他总是不厌其详给予答复；为了要使记者对问题的认识能够深入，他会自动地替你找资料，找参考书，而且还要详加解说。

严先生很少对记者说过“无可奉告”的话，有时遇到不可以发表的东西，只要他说一声，大家都能遵守“君子协定”。由于彼此尊重，日子久了，互信的观念建立了，双方界限打破，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严先生自己对新闻写作是很内行的，偶而也客串一两次记者的工作。记得有一次他出席国际货币基金年会返国。因为飞机抵达较晚，他知道记者在机场已经等候太久，在飞机上将稿子先亲自写好。下来向大家读一遍。文体很合新闻稿格式，而且轻重分明。当时大家都佩服严部长这一手。

严揆律己甚严，生平无大嗜好，惟以摄影读书自娱。他对摄影技术之研究已够到家。而所拍的佳作与纪录短片极多。他常说他的薪给，花在这方面的为数不少。因为对这方面的爱好，有关这方面的书报杂志看得也多，比谁都内行。

有一次大概是中央银行副总裁李翰新由国外买回一架照相机向他请教。严氏马上告诉他这架照相机的构造、性能、缺点等，历历如数家珍。李副总裁以为他有同样的一架。一问之下，才知道严氏完全是书本上得来的知识。

除了摄影以外，在休假日总是陪家人看看电影，或者短途旅行。严氏公私分得很清。工作时认真工作，在休息时，也不希望别人侵占他的时间。这是他与家人欢聚的时间，有时候全家人周末外出，严揆一时兴起，也会哼唱一曲绍兴戏或家乡小调，轻松一下自己的身心。

他对西洋的音乐也非常爱好，尤其是古典音乐，贝多芬的几首著名的交响曲，他已经听得烂熟了，遇到比较高级一点的音乐会，他一定要陪同严夫人一起去欣赏一下，而且每次都是从头听到尾，很少中途退场。

严氏对于头发油很有研究，他很喜欢收集，据说世界上凡是出产一种比较好一点的头油，他都要设法去买一瓶来，研究一下。这一点或者与他的秃头有关。

这位新阁揆记忆力特强，不论什么人，只要见过一面，他就能叫出他的名字。一件很细小的事，经过一段时间后如果提起来，他还能说得很清楚。记得一次报社为了双十节增刊请他写一篇文章，他答应了，但是因为出席货币基金行期在即，实在无法动笔。走之前，记者机场送行，见了面他想起这件事，特别告诉记者说已请谢次长代笔。准时交卷。由此可想见他记事之清晰。

严氏精力的充沛是过于常人的，我们会看到他有时整天在办公室里处理繁琐的公务，也见过他在许多的场合中滔滔不绝发表宏论，常在讲坛一讲就是一个多小时，而毫无倦容。他的这种充沛的精力，也许就得力于他在生活

上适当的调剂呢？

严先生有一个美满的家，这个家，在严夫人主持下，给他安排了温暖，也给他事业上增添了燃料。

现年 56 岁的严夫人刘期绳女士，与严先生结婚已经 30 多年，他（她）们是远房表兄妹，但少年时并不认识，直到严氏进大学，严夫人进中学的时候，才在亲友的安排下见了面，这一面，也就播下了爱情的种子。

严夫人虽然一向是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但她却反对奢侈享乐的生活，她常常对人说：“我没有什么嗜好，就是喜欢给孩子们做做衣服，或者打打毛线衣，这个工作虽然做了几十年，但至今乐此不倦。”

严夫人的个性带有中国旧式女子的色彩，她不喜欢交际应酬，一年 360 天都是呆在家里，虽然她家里有佣人，但她仍是喜欢东摸摸西摸摸，找出一些事来做。闲，对这位院长夫人来说，好像是一件苦事。

严先生是财经专家，掌管国家财政大权多年，可是在家中，他却没有财政权，因为还有一位严夫人，据她说：“严先生脑中只有公事，家中什么都不管，每月薪水领到以后分文不少全部交给我支配。”

严先生伉俪一向是紧守着中国式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原则。他从不把公事带回家去做，她也从不拿家庭琐事去烦扰他。也许就是这样，他（她）们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从来没有吵过一句嘴。

细读上述报道：静波先生“功在党国”，做人方面，则“治事严谨，生活朴素，爱好广泛，道德优良”，达到完人的标准。当时岛内几乎听不到反对的声音。我们体谅台湾新闻人员的苦衷，为环境所逼。

陈去严来，新任“行政院长”被新闻界喻为“黑马”。可惜，很多人忽略了蒋介石的心思。

台湾土地面积虽小，但“出将入相”的人才，说得上济济一堂，蒋介石慧眼独钟一个唯唯诺诺的严家淦，不可否认，有私心在作怪。

进入 60 年代，台湾承继前 10 年的安定，虽进取不足，但在安定中求发展，却绰有余裕。

政治上，发生几件大事。艾森豪威尔临去秋波，趁旅日之便，顺道访台。蒋介石与艾森豪威尔在南京时代有过一面之缘。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美国总统屈驾，无疑使蒋介石及国民党当局脸上添光。

但也有挫折，法国总统戴高乐，不顾华盛顿的反对，断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使国民党当局在西欧的外交防线，出现严重的缺口。处此尴尬境遇，为了巩固“王朝”，蒋介石加紧了传子计划。

登门作揖

和官方宣传正相反，严的才华、建树，连勉强及格都很困难。江南先生

在《蒋经国传》中这样提到“充其量他只是个循规蹈矩的政客，无条件服从的唯唯诺诺的人，张群、魏道明型的大官僚。”

香港《新晚报》曾这样报道：

台湾“美援运用委员会主任委员”严家淦本月（1958年1月），从欧洲取道曼谷到了香港，仅仅停留了十几个小时，第二天就匆匆飞回台北去了。

他这趟上美国还是去年9月间的事。当时他以台湾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会议“首席代表”的身份，带着满腹密圈的“争取美援计划”，跑到了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会议闭幕后，他又以私人名义去旧金山参加美国《时代》、《生活》杂志和史丹福大学合同举办的国际工业发展会议，然后再折回华盛顿，向美国政府“申请”更多的美援。

在华盛顿的期间，他的活动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他果然曾经和美国国会支持台湾派的评论员诺兰、周以德这几个人打打交道，和美国主持援外计划的官员们却并没有谈出所以然来。

他所受到的最大打击是：当他还在华盛顿穷打主意的时候，美国国会决定把援助台湾的款项减少了2000万美元。他虽然就这件事情，向美国记者们发了一顿牢骚，但于事无补，也只是说说而已。

看到在美国找不到油水，他便发了一封密电到台北，向俞鸿钧“请示”，并且建议让他去西德试探一下贷款的可能性。俞鸿钧本人当然不敢作主，就把他的建议报告蒋介石。

对于美援的削减，蒋介石已经急得手忙足乱，他不管严家淦向西德贷款的办法是否会有结果，还是批准了。为了不要太露痕迹，严家淦用的是“考察欧洲工业”的名义。

他到了西德后，曾经几度要求和阿登纳见面，但后者总是用“工作太忙”的理由拒绝了。他在波恩耗了一些时候，最终见到了西德的财政部长和经济部长，还有副总理欧赫德。

在和这几个人的谈话中，严家淦拐弯抹角地探询了贷款的可能。他们来得更妙，说明西德对于发展贸易是有很大兴趣的，至于贷款，似乎不是一个“战败国”应该考虑的事情。接着，他们又向严家淦打听台湾到底有什么可资出口的货品。这么一来，这位以“运用美援”为专荣的“主任委员”可就被难住了。他心里完全明白，台湾除掉伸手张口向美国要钱外，什么办法也没有，又哪里谈得上“对外贸易”？

钱借不到，还是得回去报账，于是他只能装出一副笑脸跑回了台北。他在向“中兴社”记者发表谈话时，故意强调“美援”的削减是普遍性的，并不是对台湾的特别处理。关于他的西德之行，他也只说到曾和西德负责官员交换发展“中德贸易”的意见；更重要的贷款试探，不须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

靠“运用美援”起家的严家淦，在台湾“国民党政权”中，算是个深得

美国人“赏识和支持”的角色，他是苏州人，出身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台湾“行政院长”俞鸿钧有同学之谊。他刚刚爬上国民党的政治舞台时是靠着陈仪的援引。当初陈仪在福建担任省府主席时，他在陈的手下当财政厅长，抗战胜利后，陈仪到了台湾，他先后干了一个时期交通处长后来又调任财政厅长。

陈仪从台湾调到浙江省当政府主席，他则内调南京，担任美援运用委员会主任委员。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和美国人的关系拉得非常好。司徒雷登和“美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的负责人赖晋翰对他都有极好的印象。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他是和吴国祯、俞大维、孙立人列在一起的。

“国民党政权”搬到了台湾，由于美国人的支持，他当上了“财政部长”。等到美国人的“台湾省政府主席”下台时，又让他顶上吴国祯的空缺。又过些时候，美国人对于台湾使用“美援”的方式表示不满，于是，一向深得美国人信任的他又调任了“美援运用委员会主任委员”一直干到现在。

和一般国民党官员比较起来，他确实稍微像样些。据他一个老部下说：他的最大癖好是读书和旅行，当他主持“台湾省政府”时，台湾的每一个角落他都走遍了。而在家闲坐着的时候，他一定要看书。

不过他既然喜欢读书和旅行，照理应该有点见识才是。在目前的情势下，他如果想继续靠着“运用美援”，失望的日子很快地就要来临了。

严家淦在台湾省“主席”任内，一般耳熟能详的批评说他是“好人，不是好官；是好国民，不是好公仆。”有段关于他拘谨不负责任的故事，经杂志揭载，曾传诵一时：

去年（1955年）西班牙戈耶画展举行前，“中央”暨省级有关机关均拨助少许经费，“外交部”更竭力襄助，因戈耶画展系“中西文化协会”主办，正当中（台）西二国“邦交”积极开展之际，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襄助玉成，自属义不容辞，中西文化负责筹备戈耶画展之范君，曾书就呈文，透过私人关系往谒严主席，请拨款（只是三两千元之事）襄助。

主席满口“好的，好的”，然后在呈文上批示：“交教育、财政两厅核议”。公文旅行多日，经教育，财政两厅核议的结果：“拟可照准，惟因经费短绌，如何之处，呈请钧裁”。上行下效的推回主席办公室，范君再谒主席，又是满口“好的，好的”，并再批交该两厅二度议核。这么一件芝麻绿豆大的事，尚且迟迟不决，其施政大端可想而知。有人认为这是严氏过去多年来所养成的拘谨习惯，虽荣膺主席，但此一习惯，却无法改变。

这个故事的含义，在于说明严家淦遇事推事的本领，和张岳军的名言“原则同意，技术研究”，半斤八两，蒋介石口口声声要革除官僚政治，他偏偏喜欢这类官僚，原因无它，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严家淦在国民党内资历，除是“忠诚的国民党员”，“七大”始当选为中央评议委员。“九大”，临时抱佛脚，升为中央常委。其难服众，显而易见。

“选法”规定，“行政院长人选”，由“总统”提名，咨请“立法院”同意，如果“立法院”诸公，稍露不满，则正式组阁难于顺利进行。1949年，居正组阁时就开过这样受阻的先例。幸严挨家逐户，登门作揖，兼国民党中央又发动组织机器，强迫支持，“立法院”这一关才轻舟强渡，顺利抵岸。

蒋介石为什么看中这位“新人”呢？说穿了，见怪不怪。严的缺点，也许正是严的优点，严没有野心，没有班底，庸庸碌碌，是“汉献帝型”，也是“林森型”，天时、地利、人和，使严因缘际会，扶摇直上。

严静波“新阁”一登场，次一步便是“内阁”局部改组。各部会人事，依例提请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所谓“通过”，并非靠投票决定，如国民党党章所规定的“少数服从多数”。蒋总裁交议的事，人人赞成，中常会的功能，有民主之名，而无民主之实。

绕了这么大圈子，目的为蒋经国的上升，找陪衬而已。严家淦接到指示，提名太子为“国防部”副部长，做数学家俞大维的副手。

新闻界报道，说蒋经国事先一无所知，那天他在合欢山休息。但和他一道的，却又是他的前往，“国防部副部长”梁序昭上将，益见假戏真做之天衣无缝。

俞大维九年前出长“国防部”，这位弹道专家最大的长处：（1）不过问内部人事，因此和任何一位“参谋总长”和睦相处。（2）他是真正的文人，符合“宪法”精神，除了跑美国争取军援，即是去金门，慰问驻军将士。

派蒋经国去“国防部”担任俞的副手，我们可以看出蒋介石爱护儿子的苦心孤诣，以小蒋的能力、经历，他无须屈居他这位亲家的名分之下。

其次蒋经国本身是“政务委员”，“政务委员”为不管“部长”，和俞在“内阁”中的分量，完全等同，派甲“委员”担任“乙委员”的副手，体制不合，除非先免蒋经国“政务委员”的兼职。

蒋介石是不肯尊重法制精神的。唯我独尊，为所欲为。

蒋经国呢？一踏进台湾“五角大楼”的门槛，先把政见诉说一番，似乎，也没有把他的上司放在眼里。

走完过场，蒋经同扶正，那是第二年1月的事。1月13日“总统”明令：

行政院政务委员、国防部部长俞大维；政务委员、教育部部长黄季陆；政务委员、经济部长杨继曾请辞职，均应予照准。此令。

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国防部副部长蒋经国，另有任用，应予免职。此令。

特任俞大维为行政院长政务委员。此令。

特任蒋经国为国防部部长，阎振兴为教育部部长，李国鼎为经济部部长，均并为行政院政务委员。此令。

内阁改组的曲折，参阅《联合报》的一篇特写，字里行间，趣味横生：

国防部长俞大维的计划，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位做了十年国防部长的弹道专家，最近决心挂冠的原因，是由于他所患的糖尿病，影响了他的健康，同时右耳也聋聩比过去厉害，因此他决定向严院长保荐他的副手蒋经国先生。严院长虽然恳切的予以慰留，但他的去意甚坚，他向严院长表示，他在国防部已经整整十年，也该换一位比他年轻一些的人，来接替一下，他告诉严静波说：他的亲家蒋经国将军（按：俞大维的公子为蒋经国的女婿）比他能干得多，他并且说：他推荐蒋经国将军，并不是由于他们是儿女亲家，而是因为国防部需要蒋经国这样能干的人。最后严家淦乃接受了俞大维的辞呈，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请俞继续留在内阁中，担任政务委员。

俞大维这次请辞，并推荐他的副手继任他的职务的消息，经晚报发表后，外间的反应，至为良好，人们相信，能干而且负责的蒋经国将军，由于十几年来他与三军的历史渊源及其卓越贡献，包括他先后在国防部总政治部、退除役官兵辅导会，以及国防部副部长任内的辉煌成就，现在主持国防部，实是最理想的人选。

俞大维告诉记者的一段话，有真有假，似真似假，如果纯为了健康，他挂冠的“决心”，早该下了，这位知名的弹道专家，放在“国防部长”的位置上，且一放“十年”。糟蹋人才，莫过于斯，除非，蒋介石早有打算，作为蒋经国上升的过渡。

俞大维是个聪明人，蒋介石的心意，怎瞒得了他，乐得顺水推舟，严家淦虚伪地“恳切慰留”，慰留功败，以“政务委员”作附带条件。只能说，是戏！戏！西方人永远也弄不懂的东方政治哲学。

事实上，内举不避亲。美国的约翰·肯尼迪，任命乃弟为司法部长，他就没有什么顾忌。阿根廷的庇隆，任命庇隆夫人为副总统，菲律宾的马科斯，派太太做大马尼拉市长，从未躲躲藏藏。蒋介石奉行渐进主义，兼受封建传统的束缚，才这样瞻前顾后，进退失据。

刘协再生

1966年3月，台北进入每六年一次的政治季节，第四任“总统”选举，因陈诚去世，需要产生新的形式的继承人。

这一幕戏，比严家淦“组阁”热闹得多。

向例，国民党中常会先行开锣，确定人事政策。下一步“国大”启幕，选举正副“总统”。

为了确保领导中心，“总统：’候选人是谁，不问可知。至于谁是副手，

稍具头脑的人，押严家淦的注，十拿九稳。但既是演戏，必须演得情节逼真。

3月6日，蒋介石告诉出席三中全会的党员：党尽一切可能提拔新进，中兴以人才为第一，然后又恳切期望党中央另行考虑“总统”候选人的人选，让他专心负责党务和军事。

投票前夕，蒋又在招待全体“国代”的餐会中称：

我本来希望国民党同志不要提名我为候选人，因为才德兼备、对国家人民有贡献的老同志很多。但是，最后大家仍然推我，我感到很惶恐。我今年已经80岁，再连一任，还不能反攻，怎对得起国家？此次国民大会，乃是反攻前的最后一次会议，我们必须把握时局发展的枢钮，俾完成历史的使命。此外，我本来希望民、青两党亦能提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可是他们很客气。一党提名，未免不是一种缺憾。

提拔“新进”，自然要排除元老级的张群、孙科、何应钦等人，专心“党务和军事”，根本是违心之论。

蒋私下曾向张群表示：希望张做“副总统”候选人，张群赶快推说年事已高，建议选70岁以下的人为宜。

台湾“中央社”扮演道具的角色，发张、孙、何、严等四张照片备用，煞有介事。

蒋介石的锦囊，其实早被人识透了。只是报纸的报道，故弄玄虚，抄在下面，供读者共赏此今世奇观。

由蒋总裁提名在三中全会投票通过的国民党籍第四任副总统候选人严家淦，昨天下午6时在复兴岗举行记者招待会上，答复记者询问：他什么时候才知道他将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时说：在蒋总裁正式宣布提名之前，他本人毫无所悉。以崇法务实，处事周详著称的严家淦所说的话，是可信的。因为在昨天下午3时以前，三中全会连选票都还没有准备。当大会开会前，蒋总裁临时邀约张秘书长岳军及中央常务委员，征询提名意见后才决定提名严家淦先生。

严家淦提名以后，蒋主席曾说了两句意义深长的话，他说：“严家淦同志的长处，正是我的短处。我的长处，也正是严家淦同志的短处。”这是颇富有哲学意义的话。

投票开始后，严家淦自己投了一张空白票，因为他自己未进入圈选处，即直接向票箱中投入。另外有一张是废票，因此他的得票率应是七十三分之七十二。

中央委员以72票多数票选出严家淦为副总统候选人，显示了党的真正团结，和党的力量，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另外党内的元老所显示的风度，也是令人欣慰的，特别是张岳军先生，

在开票后他很尊重副总统候选人严家淦，在晚间聚餐时，他已经把第二个位子让给严家淦。这种尊重制度和职位的风度，固然是岳军先生的泱泱大度，也是中国政坛上最需要的风度。

严家淦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国人颇有清新之感。人们更敬佩蒋总统之“大公无私，用人唯才”和“提拔新人”。因为人们知道严家淦在政治上，不属于任何派系。他初到台湾时，仅是省府的交通处长，十多年来，由于他的卓越表现，乃由处长、厅长、部长、主席、而行政院长，这种情形，在过去政坛上，是很少见的。

《联合报》的社论，把提名结果说成“反攻复国最后胜利的奠基”，下面是段更有趣的妙文：

由上述舆论，这次蒋总统提名严家淦先生为副总统候选人，我们更可以深深体会到其用心的深长，谋国的忠荇。因为这充分显示了唯才唯德、不次擢拔的廓然大公精神，打破传统，栽培下一代的为国择人态度。我们深信，由于这次蒋总统之俯顺舆情，候选连任总统，睿智抉择，提名严家淦先生候选副总统，以及国民党三中全会一致拥戴总统连任，热烈通过副总统候选人提名，则本月国民大会正式选出蒋为总统、严家淦先生为副总统之日，也将是未来历史家写下此乃中华民国获致反攻复国最后胜利奠基之时。

提名枯燥乏味，“国大”投票选举，小有高潮。

“国大代表”来势汹汹，一派主张积极争取“四大”民权中的创制、复决两权，与“立法院”分庭抗礼；一派希望改设“常设机构”，供“代表”们经常活动，变无给职为“有给职”。总而言之，是为了争权和争钱。

选举“主席团”，已闹得不可开交，趣闻处处。一位民社党的代表，暗发起签署，要代表们推举蒋经国竞选“副总统”，被“有关方面劝止”。

严家淦列席“国民大会”，作施政报告，却又缺席质询与建议，“立委”魏惜言在“立院”提出质询，问他根据“宪法”何章何条？列席“国大”备询。

不少代表，狮子大开口，要严答应福利条件，否则传出空气，将出现“难产”。

投票日，共发出选票 1417 张，收回 1416 张。过半数当选。严得 782 票，可疑票占 634 票，引起废票标准的争辩。致“国代”翟宗涛和“政治和尚”于斌，大吵一场。

于斌：废票认定标准第四项规定，不圈在候选人姓氏上端，致不能确定被选举人者，及第五项记入其他文字或符号者，才算是废票。因此，画两个圈或三个圈的，不算“其他符号”，而且候选人只有一个，并不致于无法确

定被选举人。所以，多打圈的，应该算有效票。

翟宗涛：怎么可以这样解释？依常规就是画一个圈，其他的都是废票，你这种认定法算哪一国的？

于斌：怎么不能说？这好象打作文成绩，画一个圈可以，画两个圈三个圈更好嘛？多画圈表示更支持。而且我参加过各种会议，有的国家投票赞成就是打×，为什么不行？

翟宗涛：讲话要于法有据，一定要让严家淦光荣的当选，该投第二次票就投第二次票！

于斌反驳：什么于法无据？要依法的话，只有监察委员可以决定，我不过和别人私下研究，你有你的意见，我有我的看法，我不跟你吵！

严得票数，不如“国大”连署的人数，且一党提名，别无对手，出现险胜镜头，无以名之，国民党内有反对派。名义上，反对严家淦，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箭头其实是对着蒋介石的。

严家淦“副总统”兼“行政院长”，换汤不换药，蒋介石当年 80 岁，蒋经国继承的布局，全部就绪。

蒋经国虽然是“内阁阁员”之一，他的时代，悄悄来临，“院长先生”，不过庙堂里的神像，历史的齿轮，向后转到二世纪，严家淦原来是刘协（汉献帝本名）再生。

“政治，有时很严肃很残酷，有时也很滑稽很幽默，好象一场精彩的卡通，使人忍俊不住。”你说不是吗？

戏演加官

60 年代末，一股来自美洲大陆寒流，在台湾上空凝聚不散。

“中华民国”最忠诚的朋友——美国，在外交动向上，有了异动的趋势。尼克松总统于就职演说（1969 年 1 月 20 日）中暗示，美国将与北京修好。同月 27 日的记者招待会中，尼克松说美国希望恢复华沙会谈。

另一个使台北感到不安的事实是，第 135 次与 136 次会谈时间，相隔仅一个月，国务卿罗杰斯说，将来会谈的地点，可能改在美国境内或北京举行。

跟着，尼克松政府采取一连串的行动，向中国示好。计有：

国务院于 1969 年 7 月 21 日宣布，六类美国人可以观光身份访问中国大陆；从海外归来的美国公民可以带回价值 100 美元的中国大陆制品。

国务院于 1969 年 12 月 19 日宣布，美国公司可以与中国大陆进行非战略性商品的交易，原先所规定的限制美国公民携回中国大陆商品的规定加以废止。

国务院于 1969 年 12 月 25 日承认，美国第七舰队舰艇在台湾海峡的巡逻已由定期改为不定期。

白宫于同一天宣布，美国反对提供一中队 F—4D 型飞机给“中华民国”。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于 1970 年 1 月 26 日与 28 日投票通过，在军事援外法案中，将原供台湾购买前述一中队 F4D 飞机用的 5450 万美元经费，予以删除。

这些不平凡的迹象，台北当局愈来愈感到疑惑和不安，甚至忧虑。

1970 年 10 月，加拿大承认北京，和台北断交。跟着联大席位，发生动摇。

1971 年 9 月，美国以“双重代表权”的新战略，既保持台湾在联大的代表权，又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11 月，僵持了 23 年之久的中国代表权问题，顺利解决。台北的困窘、惶恐、彷徨、以及愤怒，可想而知。国民党高层从梦幻中醒过来。

就在被逐出联大的几星期内，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籍以外，台湾实际上已从联合国所有有关或附属机构退出。数月间，二十几个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华民国”的驻外大使，纷纷下旗归国，“外交部”被讽刺为“绝交部”。

再一步使台北更难堪，更寝食难安的大事，是尼克松翌年 2 月的中国之行，那个“改变世界”的一周。美国再三保证，华盛顿政府与台北间的关系，没有任何情况会因尼克松访问北京而改变，美国也不寻求台北与北京“和平解决”的方案。但尼克松、周恩来发表的《上海公报》，台北却认为“是一件极不寻常的文件”。特别是提及四次的“关系正常化”这个名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外交文书用语。

9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台湾在远东地区最重要的据点，再度失落。

“外文”上的颓势和 1948 至 1949 年大陆解放前的军事形势，几乎完全相类似。唯一的区别，非战之罪。

好在，“外交”是内政的延长，外腐并不足以致命，只要没有内溃，仍可“巍然不动”。

转眼，第四届“总统”任期届满，台北势必把六年前的旧剧本，搬出来重演一次。老演员，旧剧情，自然没有什么新奇的感官上的刺激，勉强算得上新场景的，一是大会通过“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修订案”；一是提名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院长”。送“立法院”的咨文说：

行政院院长严家淦，恳请辞职，已勉循所请，予以照准。兹拟以蒋经国继任行政院长。蒋员坚忍刚毅、有守有为，历任军政要职，于政治、军事、财政各项设施，多所建树，其于行政副院长任内，襄助院长处理院务，贡献良多，以之任为行政院院长，必能胜任愉快。依宪法第 55 条第 1 项之规定，提请贵院同意，以便任命。此咨立法院。

总统蒋中正

6天后，“立法院”以381票的最高票，行使同意权。平常出席院会的委员，维持半数（200人左右），这天到了408，“几位身体不太好以及年事太高的委员”，都“一早到了‘立法院’”。旅港4位“委员”，特地从香港飞到台北。

国民党当局对蒋经国期望之殷由，可从“立法委员”陶百川的一段话中略窥端倪：

蒋经国先生在此时此地出任行政院长，可说是受命于“危急存亡之秋（仍引《出师表》），不仅要安内攘外，简直须旋乾转坤。任务的艰巨，恐非一般人所能想象。但如果真能加强廉能之治，恢弘志士之气，则国基永固，四海归心，他日以仁击暴，得道多助，国事固大可为也。”

说得具体一点，是经过突来的“大地震”后，台湾当局普遍的觉醒，寄望于蒋经国，新人新政，救亡图存。

新“阁”平均年龄61.8岁。人事调整，亦非过去那种打麻将扳庄的作法，彼此轮流，而是彻底换班。非但改“中央”，亦改基层。

5月3日《联合报》的一篇社论，作了详尽的说明：

第一是如我们所期望的，这次人事调整，幅度较大，而同时及于台湾省政府及台北市政府，有力的象征了我们所说的‘新阶段的行政院’的意义。

第二是进一步起用与征召了本省籍俊彦，担任国家重要政务。如副院长、内政部长、交通部长、台湾省主席、台北市政府，都是当前国家行政的重要据点。现概由本省籍人士出任，固是恢复地方志士之气，共赴“国难”之道；亦有力的显示了复兴基地的时代意义。正所谓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畛域的号召。而台湾省政府的由省籍人士首任主席，尤可激发本省同胞为桑梓服务，提供贡献。

第三是新阁人事的安排，或则见其新人的延揽，或则表示人才的新掘发，或则是人与事的新配合，又或则是对专家学者的重视，一开始便有一新观感，一新气象的功效。

第四是新阁人事不少为由地方出任中央要职者，如高玉树、林金生、李登辉、张丰绪氏，都是政府拔擢人才的行动。尤其张丰绪氏由一县之长而跃任特别市市长，更见政府破格起用人才的至意，也反映了蒋院长的求新求行决心与魄力。

蒋经国做“副院长”的时候，和戴笠做军统局副局长一样，实际上当家做主的就是他。严家淦虽是个供奉的神像，毕竟要供着，不宜过分喧宾夺主。

何况，蒋介石只是半退休状态。现就任“行政院长”，便可名正言顺地放手大干了。

鞠躬下台

1978年，台湾又迎来了第六届“总统”选举，严家淦鞠躬下台，早成定局，蒋经国出任“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为大势所必然。剩下的是，如何把这出戏演得更紧凑，更有戏剧效果。

前面五届，锣鼓打得再热闹，剧情单调，观众未进场，早知情节发展，即使南京那一次，除了孙科、李宗仁那场副总统肉搏战，打得真枪真刀，热闹非凡，台上死拼，台下鼓掌外，总统一职，选而不竟，走个过场罢了。

严家淦，过渡人物，他当“总统”，没有人意外，下台也没有人意外，反正，“中华民国”的“宪法”，不伦不类，既是“总统制”，也是责任“内阁制”，好象扑克牌上的老K那样上下一体，蒋经国做了“行政院长”，自然是“内阁制”，“总统”是苏州的红漆马桶。等蒋经国扶正，“内阁”无权，恢复“总统制”。

海内外通电拥护，自不在话下。党内提名那天，蒋经国故意回避，避到金门。妙的是，向全体中央委员竭力推荐蒋经国出任“总统”候选人的，正是严家淦“总统”。

蒋经国接受提名后，提名谢东闵为“副总统”候选人，谢当时出任台湾省“主席”，过去做过省议会副议长，议长，虽然是台籍，在大陆的时间甚久，且是位好好先生。由谢任“副总统”，对外改变观瞻，杜绝海外台独分子攻击国民党专政的口实；对内，国民党政权正走革新之路，逐渐将统治权移交台籍人士，削弱新生代夺权的号召。

“国民大会”代表，过去一直担心，蒋经国接棒，可能会顺从“民意”，废除这些已老化的“中央民意”代表，作戏剧性的政治革新。但蒋经国声称遵从“四项坚持”（“中华民国宪法所制定的国体绝不改变”为其一），一切如前，他们自乐意投挑报李，在毫无留难的情况下，投蒋经国一票，使他获高票当选。

环顾现状，蒋经国接班，为大势所趋，全岛上下，几乎无人具备和他较量权力的条件，这是人治社会的通病，非台湾一地为然。

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终成为“中华民国宪法”上的第三位“总统”。距离1938年，他初次从政，整整40年。

卸去“总统”头衔的严家淦，虽先后挂名国民党中常委、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会长，但他终是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自然要从台湾政坛上逐渐隐退。

1990年11月12日，台湾“中央社”这样报道了这位久违了的旧“总统”：

昨天农历 9 月 25 日，是严总统家淦 86 岁华诞，上午 9 时起，多位党国大老及各界人士分别前往台北荣民总医院及他的寓所祝寿，李总统登辉及夫人也于上午到荣总病房拜寿，并祝他是日康复。

严前总统目前仍在荣总疗养，进行复健。李总统及夫人上午到荣总，向严前总统拜寿，他们在病房停留约 20 分钟后离去。

昨天到荣总祝寿的有：总统府资政谢东闵、孙运璇、俞国华及夫人，执政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宋楚瑜，《中央日报》董事长楚崧秋，前美援会秘书长王蓬以及前中央银行总裁张继正等多人。

此外，李副总统元簇等政府有关首长以及陈雪屏、王叔铭、瞿韶华、杨继曾等各界人士则到严前总统寓所签名祝寿。

严前总统是于民国 75（1986）年 9 月 16 日因中风而住院，迄今每天仍作复健治疗。

1992 年 9 月，严家淦再度中风，病情持续恶化。1993 年 12 月 24 日因心脏衰竭死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年 89 岁。

第二节 蒋经国登峰造极

继位大典盛况不再

1978年5月，蒋经国经过一番精心策划，乔装打扮，在一片鼓噪声中，登上了“总统”宝座。

然而，大器晚成，未免盛况不再。几乎从他当“副部长”那天起，过去隆中高卧的日子，一去不复还矣。就职“总统”那天，各国道贺的使节，少到不足20人，且都是无足轻重的中南美小国，场面凄凉，由此可见一斑。

台北希望卡特政府能派位特使，为这位“总统”打打气，因为美国毕竟是国民党政府最重要的支柱。但白宫装糊涂，使台湾感到很难堪。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竟于台北盛典当天，飞往北京。

在北京，布热津斯基保证，“卡特总统决心和你们一起克服达成关系正常化路上的残余障碍。”看来台北和华盛顿的外交关系，已经日暮途穷，就算诸葛亮再世，都无法挽回了。蒋经国接获来自华盛顿的报告，仿佛若无其事，总觉得是危言耸听。

靠做翻译起家的国民党政权驻美大使沈剑虹，也乐观得很。根据一位记者的报道，他完全错误估计了形势：

美国方面并未认真的以这三个条件，作为中共所提与美国建交的三条件的“反建议”。中共的三个条件是——美国和中华民国断交、废除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走所有的美军人员及设施。相反的，美国所提出的条件只是卡特通知中共的一种方式，后者不必真正作任何让步。

另外一个，他持以乐观的理由，是美国国会将“出面制衡”。特别是7月25日参院以94对0票，通过的“杜尔——史东修正案”。该案表明，“在任何拟议政策改变将影响到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效力的持续时”，国会有事先获得咨商之权。

该案规定：

- (1) 鉴于东南亚持续安全稳定关系到美国的重大战略利益。
- (2) 鉴于美国及中华民国在1954年订定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下已有24年的联盟关系。
- (3) 鉴于中华民国在这24年中，忠实及持续的履行该条约的职责及义务。
- (4) 鉴于国会有责任在美国签署条约时，给予劝告及同意。

这位大使先生，显然对美国国会的作用，法律程序，一知半解。殊不知，这个两院（众院后来也通过了）的修正案，对总统并不没有拘束力。

正当华盛顿与中共领导人频频接触之际，沈剑虹非但没有听到半点风声，且应高华德参议员之约，带着太太到美国西南部的“太阳带”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去享受阳光的温煦和高尔夫球去了。

沈剑虹这样逍遥，据他承认，是根据下列理由：

（1）当时美国国会去期中选举才过不久，卡特政府需要时间来处理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一般认为，这毕竟是一项较为优先的问题。

（2）由于国际安全援助法的修正案已生效，卡特在废除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之前，似乎不可能不与国会领袖磋商，而如果这种磋商一开始，我们即会听到风声。

（3）当时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戴维营和谈陷于僵局，美国国务卿万斯正忙着在国外奔波，至少在1979年年初之前，他没有多少时间参加讨论中国问题。

（4）当时美国国会国为将届圣诞及新年假期而体会，大多数参众议员都已离开华府，除非发生“全国性紧急情况”，卡特不致破坏少数主要国会议员的假期，把他们召回华府磋商——而和中共“关系正常化”问题的研究不能视为“全国性紧急情况”。

（5）卡特不是说过他是二度诞生的基督徒吗？他对这段接近圣诞的“人世和平及万民亲善”期间，毕竟应该给予若干尊重吧！

如同1971年台湾“退”出联大，沈剑虹在康涅狄格州一家旅馆高枕无忧。这次的大局突转，作为驻在国的大使，照样耳目昏花。

最感到难堪的，自推蒋经国，事先一无消息，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晴天霹雳。

一声晴天霹雳

12月15日，台北时间已近午夜，美国驻台大使，奉命有紧急事宜，会见蒋经国。时钟指向2时30分，蒋正在梦乡，但事非得已，秘书宋楚瑜，焉敢怠慢，前往官邸，把蒋经国请起来，蒋穿着睡衣，两眼惺忪，听完安克志的报告，当场表示强烈抗议

蒋闻讯后的表情，我们可用常识推断，迟早要发生的事，终于来临，他感到惊措，愤怒不已，可能再未就寝。5个小时后，召开“中常会”的紧急会议，下令三军戒备，准备人心的安抚。10点正，发表声明一纸，兹摘其部分。抄录如下：

数年来美国政府曾一再重申其对中华民国维持外交关系，并信守条约承诺之保证。而今竟背信毁约，此后自将难以取信于任何自由国家。

现美国对借恐怖镇压以维持其存在之共匪伪政权异以外交承认，实有悖于其宣称维护人权加强民主力量以抵抗极权专制之宗旨。此举无异剥夺中国大陆上亿了被共匪奴役之民众早日重获自由之希望。无论自任何角度而言。美国此一行动不啻为人类自由及民主制度之一大挫折，且必深为世界各地爱好自由民主的人民所谴责。

无论国际情势如何发展，中华民国以一主权国家，当秉承光荣之传统。团结海内外军民同胞，继续致力于社会、经济及政治等各方面之改进，忠于国家目标，及所负之国际责任，吾人对国家前途具有充分之信心。

先总统蒋公子遗训中谆谆召示我全国同胞庄敬自强，以完成复国建国之大业。中华民国政府及人民有决心亦有信心，尽其在我，与其它各民主国家之人民共同努力，以对抗共党暴政及其侵略政策，今后自当更加沉着镇定，积极努力，并呼吁全国同胞与政府通力合作，一心一德，团结奋斗，共渡此一难关。中华民国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绝不与共匪伪政权谈判，绝不与共产主义妥协，亦绝不放弃光复大陆拯救同胞之神圣使命，此项立场绝不变更。

“官方”此一声明，一石二鸟。一面指责美国背信，一面重申过去的“三不”立场。台北把美国此举，形容为“最沉重的打击”。1949至1950年，杜鲁门政府曾设想把台湾当局一笔勾销，如果没有朝鲜战争发生，“中华民国”早成为历史上的名词。将近30年，台湾一直在华盛顿的扶植下，保住联大代表团，和世界一些国家维持外交关系，现在美国抽腿，50年代的彷徨迷惘，再度降临。

台湾当局一直认为美国是忠实的盟友，如今一百八十度的突变，观念上、情绪上，一时自无法适应。仇美反美的气氛，因而达到顶点。

绝交使台北产生危险意识。尽管协防条约还有一年的效力，但国民党当局忧虑未来的地位。美国断交，其它小国跟进，台北将陷于孤立地位。

缠绵病榻的强人

从大陆时期到台湾时期，蒋经国的职务随着蒋介石的交棒而更替。但，无论如何，他是台湾近40年来实际的支配者，这个事实是不容置疑的。蒋介石在世的时候，他是幕后强人，蒋介石过世以后，他成了台面上真正的强人。这个凡事必要躬亲的强人，在透支了本身40年的精力后，终于缠绵于病榻。

自1973年后，蒋经国的身体已经出现了明显退化的现象。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糖尿病让他的体力大量虚耗。有糖尿病的人通常身体非常容易疲劳，动不动就想睡觉。所以蒋经国没有像他父亲那样的日常休闲活动，他的家居生活，相当单调。因而，到外地去视察，就成了他日常生活中，惟

一称得上“不是运动的运动”。

在七海官邸，最常看到他的地方就是床上，他几乎是下班回来就是换上睡衣，然后躺在床上休息，顶多看看电视新闻，算是娱乐节目。

但是，不管公务再繁忙，他从不把公事带回官邸。在七海官邸照顾蒋经国的日常生活的侍卫们，从来没见过他在官邸动笔处理过什么公事，或谈公务。在礼拜天，他偶尔会找三位秘书长，也就是总统府秘书长、国家安全秘书长、中央党部秘书长三个人，到官邸向他报告一些比较特殊的事情，前“总统”严家淦，在自己病倒前曾于礼拜天来过一次官邸。

像宋时选，宋楚瑜、郝柏村、汪道渊、蒋彥士、李焕及沈昌焕等人都是经常来官邸向他报告公务的人，但是，他们来官邸无非是因有很重要的事情，否则，蒋经国是不会让他们来。

糖尿病病史

蒋经国大概早在 60 年代前后，就发现自己有糖尿病这种疾病，主要是遗传自他的生母毛夫人。

蒋介石卧病后期，蒋经国照例每天早晨都要到士林官邸探望父亲的病情。他到士林官邸时，总是由士林官邸的护士小姐，先为他在耳垂上抽血检验血糖含量，再为他按血中的血糖比例施打胰岛素，打完胰岛素，蒋经国才在士林官邸吃早餐，然后再去上班。

那时，他是每天打一剂胰岛素，从不间断。而且基于孝文血糖过低而昏迷，导致卧病的悲剧，蒋家对蒋经国的糖尿病非常重视，为了监控蒋经国的血糖，荣民总医院特别派了 2 位医生，24 小时轮流，随时为蒋经国检查血糖，只要发现他的血糖含量超过正常值，就立刻给他打胰岛素，希望把他的体内血糖控制在正常的 120 个血糖单位之间。

80 年代，蒋经国的糖尿病有严重恶化的倾向，主要的原因仍是出在他不知节制饮食，完全无视于医生开出来的饮食禁忌，毫无忌惮的吃各种他喜爱的点心、餐点，尤其在外视察的时候要肚子饿了，看到路边摊有什么东西好吃，他就去吃，根本不管它什么血糖不血糖。

80 年代中期，医生为了压制蒋经国日渐攀升的血糖指数，只有将原来每天施打一次的胰岛素，改为一天施打 2 次，也就是每日早晚餐前打一针胰岛素。

蒋经国这时还是不能适当地节制饮食，然而医生们已经开始为他病况前景感到忧虑，因为这显然是一个关键时刻，如果蒋经国在这个时期能够全力和医生配合的话，还是有可能把血糖控制在相当的指数以下，不致过于恶化，然而蒋经国仍旧是依然故我，医生除了摇头叹息，就只有坐视情况的发展。

好几次，他因自己吃的点心是用代糖制作而无法入口，要侍卫们拿冰淇淋给他吃，侍卫们当然清楚冰淇淋是高糖分食品，不敢随便给他吃，便去向

医生请示，谁知道医生也是耸耸肩，说：“他要吃就给他吃吧！那有什么办法呢？等吃了血糖升高了，再来打胰岛素吧！”医生明知道吃冰淇淋肯定是会提高他的体内血糖单位的，可是因为已经有过几次挨骂的经验，又有谁敢去阻拦他呢？只有任其吃个够了。

蒋经国有一句给医生的名言是：“我的病由你们负责控制，我吃东西则由我自己负责！”他讲得那么强硬，又有谁敢樱其锋？

不改其口腹之欲，所以也只有拚命施打胰岛素，尽量控制他的血糖，当时，他打针的部位，已经由手臂转移到腹部，原因就是他的手臂已经到处是针孔，可说是已经没有地方可打针了，所以只有把注射的部位，移到全身面积最大的腹部，而时常要验血的耳垂，也有一段时间因为不断抽血，到末了都已经出现干瘪的现象，连血都没处可抽了。

血糖的骤然上升，让蒋经国的眼睛产生了极为微妙的变化，最严重的一次，就是他的左眼水晶体突然因为旁边的新生血管大量破裂，流出的血流使得水晶体不能发挥透视光线的功能，他左眼的视力也因而完全丧失，后来，医生为了控制眼睛内部不再发炎，只有给他吃最有效的类固醇，也就是俗称的美国仙丹，尽管消炎的功效发挥了，可是，他的内脏却因为大量服用类固醇，健康状况开始极度恶化，并且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糖尿病毕竟是一种急不得的慢性病，必须善加调养，并且和医生的意见配合，方有控制的希望：因为糖尿病影响到神经系统，晚期蒋经国的双脚有麻痹的现象，医生特别建议他，除了内服药物之外，还应作一些物理治疗的按摩，所以，“荣总”最早曾经派了一位护士小姐，每天按时来七海官邸为他作按摩治疗，蒋经国对那位护士作的病理按摩十分满意，可是不久后，那位护士出国去了，“荣总”派了另外一位护士来给他作按摩，他大概觉得那一位不如原先的小姐作的好，过了一段时间，他就主动喊停，不想再作按摩。

以“元首”之奠，他不愿意老是坐轮椅，这有损他的形象。他一直希望脚部麻痹能够早日复元，可是，西医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功效，他听从汪道渊介绍，说台北市南昌街有一位中医师很权威，立即将他请到“总统府”，大夫开了不少中药。可是吃后糖尿病还是一点起色都没有。

未几，又有人向蒋经国献策，说脚不好的话，吃鹿筋有效，于是，一些人就去各处张罗许多鹿筋，他们的理论是中国传统的那一套，就是吃什么补什么，等各种的鹿筋买回官邸，再根据偏方，把鹿筋炖得烂烂的，里面什么调味料也没放，只加代糖。就这样把一碗碗那种粘呼呼的鹿筋，吃进肚里，蒋经国吃的时候，眉头紧锁，显然鹿筋的味道不是太好。

也不知道吃了多少鹿筋，不但毫无功效，反而情况更糟糕。后来再也不敢服用中药。蒋经国只好还是继续相信正统医生的处方，每天大把大把地吃药。

截肢之说

蒋经国晚年，由于台湾的各种地下地上刊物，已经有如雨后春笋，这样发达的媒体传播，关于蒋经国生病的一些小道消息也特别多，可是，这里面有一大半是外界以讹传讹、扩大渲染的不实报导。

说蒋经国的某只脚已经“锯掉”的消息，便是一个典型的错误讯息。

当然，这个传闻。主要和他坐轮椅出入各种公开场合有关，而且，一直到他死后，因为他的遗体躺在棺木内，还有一床棉被覆盖在他的下半身，所以更引人疑惑，到底蒋经国晚年有没有因为脚部组织坏死，而被迫锯断一只或是二只脚？或者另有文章？

究竟蒋经国晚年有没有锯脚，始终跟在他身边的侍卫，自然是最清楚了。侍卫翁元日后说：“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就是没有。”

既然如此，蒋经国晚年为什么要乘坐轮椅呢？

这也和他的身体神经病变有关，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造成了他的脚部神经组织麻痹，所以，蒋经国晚年始终抱怨为什么觉得脚一点力气都没有。尽管医生曾经规劝他作各种复健工作，例如按摩，可是，蒋经国并没有恒心做下去，加上他自己天生就是一个不喜欢运动的人，一回家就往床上躺，没有机会让腿部多活动，所以，晚年他的下半身肌肉，萎缩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他的上身相当肥胖，大约有 70 公斤的体重，走起路来他总是喊累，医生也没有更好的良策，只有让他坐轮椅。

最严重的问题，是他的皮肤，尤其是脚部皮肤，可说是到了几乎没有感觉的程度。

最明显的一次，是在一年冬天，侍卫副官怕他着凉，在他晚上睡觉时，不但注意他的棉被有没有盖好，还特别为他准备了一只热水暖袋，放在他最怕冷的脚下。

没想到，有一次，大概是某位副官加的热的水比较热，就一直这样“烫”到天亮？第二天一看，不得了！蒋经国的左脚脚后跟硬是烫出了一个大大水泡，面积相当大，医生接到这个消息相当紧张，因为有糖尿病的人，身上即使是一点小伤口，复元都要经过好长的一段时间，更遑论是这么一大块水泡，而且最糟糕的是那块已经快被烫熟的皮肤，正是他的脚跟部位，不但对他穿鞋走路是有绝对的影响，要复元可能更需一段长时间。

为了让他可以穿鞋走路，蒋孝勇想出一个绝妙办法，特地把他的皮鞋的后跟剪破了一个口子，缝上一条宽松紧带，让皮鞋和脚后跟不会直接碰触到他受烫伤的部位。

那次的烫伤事件，整整作了一二个月的治疗，终于痊愈，这大概是蒋经国卧病期间，一次最明显的“意外”事件。

洗澡不再用肥皂

蒋经国从 1982 年以后，因为开刀的关系，自己洗澡很不方便，便由贴身副官协助他洗澡，通常是由两个人把他抱进浴室，再由一个副官进去浴室服侍，另一个人为他擦背，最早他还不接受这样的服务，后来因为自己体力实在不行，只有假手他们完成洗澡动作，随着他的体力日渐衰弱，他的洗澡动作也全部委由副官全程处理。

由于晚年蒋经国的皮肤相当脆弱，比一般人来得干燥，而且经常会像蛇蜕变一样，皮一片一片脱落，所以，医生特别交代，要他尽量少洗澡，以免刺激皮肤，医生给他的洗澡间隔是每三四天洗一次澡，而且还怕他皮肤的油脂消失，会对身体不利，所以，医生再三告诫，洗澡和洗脸的时候，都不要再用肥皂。

然而，因为不用肥皂洗澡，怕没有消毒功能，医生建议洗澡水里，不妨放些“沙威隆”，可以取代肥皂，又有人从外面打听到一个秘方，在洗澡水里加些 JOHNSON 牌子的婴儿油，搅和在一起，稀释于一满浴缸的温水，再以泡浴的方式洗澡。

这一天，副官们先把浴缸的温水放满，再按指示，把沙威隆和婴儿油徐徐加在浴缸里，然后把蒋经国从床上抱到浴缸。在帮蒋洗澡的时候副官们还不觉得有什么危险，直到洗完要将蒋从浴缸里抱起来的时候，才晓得这是一件多么危险的工作。依惯常的洗澡过程，在浴缸里洗了一会儿后，副官帮他抹擦全身，要等他说“好”，也就是他感到舒服时候，副官再帮他抹擦背部，他很喜欢副官为他擦背，所以要等到他说满意了，才可以停止。

在这个抹背、擦背过程中，正是副官最感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紧张万分的时刻，因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身体完全靠他们两人一前一后的撑持，婴儿油是一种油腻的东西，而他身上又是沾满了婴儿油，如果他们稍一失手，蒋经国很有可能就滑倒在浴缸内造成无可弥补的伤害。

中常会并发症

所谓中常会并发症，其实就是蒋经国内脏和心理因素综合发生的一种全身敏感症状。它和蒋经国长年服用类固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类固醇最初服用的目的，是针对他的眼睛的问题，后来，他经常发生食道过敏的情况，经常会有想呕吐的感觉，就是吃类固醇的原因。

说也奇怪，蒋经国每次食道发生过敏病症，几乎都是在礼拜三。原来，蒋经国对国民党中常会原本就非常介意，认为这是他掌握党的权力的一个重要媒介。每逢中常会，他总要藉机在会上发表一些重要的政策性宣示，所以，对会前准备工作，十分重视，把它当作一件最重要的工作看待。

大概是他太重视礼拜三的这个会议，身体反应也相应强烈，所以每逢礼拜三，他的食道敏感的老毛病，一定会准时发作，这个毛病发作的时候，蒋经国一面流鼻涕，一面恶心呕吐，这时，他只有再服用类固醇药丸来缓和肠

胃的极度不适。有时，他实在难过极了，以为肠胃有什么问题，请肠胃科的医生来检视，看看到底有没有毛病，可是等医生来作听诊，又一切正常。身体恶劣到实在不允许出门时，他只好请轮值的中常委，代理他主持会议；有时候，他觉得已经有几次没去主持会议的纪录，再不去的话，外面又是如何看待他的连续缺席，这会不会导致外界有政局不稳的忧虑呢？他真是考虑再三，最后咬着牙，硬是撑着病体，坐轮椅到中央党部开会，可是，会议开着开着，他的体力有时会撑不下去。

有位在中央党部工作的人员，有一次问蒋经国身边的侍卫：“你看主席是怎么回事？头歪一边，而且眼睛都闭起来了，他到底有没有在听开会的发言？”

然而，蒋经国还是忍着锥心之痛，继续出席中常会，一直到他死的那一天，他还是念念不忘要去开中常会。

病床上背演讲稿

如果听过蒋经国演讲的人，一定对他长江大河似的口才大加赞许。可是，他们那里晓得，他是完全靠背诵讲稿才会如此滔滔不绝的。

蒋经国演讲向来是不看稿子的，多半是他在要演讲的一个礼拜前，就开始在家里先把要讲演的稿子，背得滚瓜烂熟，然后等到临场时，再很灵活地使用背诵在脑海里的稿子，好像是和一个老朋友说话似的，行云流水，很流利他讲出来，再配合他演讲时的丰富表情和演讲时的抑扬顿挫，就成为一篇十分生动的演讲稿。

口若悬河的讲演、略带沙哑的语音，曾经风靡多少男女老少，这便是蒋经国独特的演讲风格。

晚年，他躺在床上，没事的时候，就在背演讲稿，一次不熟再背诵第二次，第二次不行，再第三次，这样反复背诵，到真正称得上滚瓜烂熟为止。

1987年“行宪”纪念日前夕，他为了准备到中山堂向所有“国民大会”代表演讲，在十分沉重的病痛中，背诵翌日要去分开发表的演讲内文。当时，他的视力已经十分衰弱，为此，他的秘书王家骅特地要人写一份特制的演讲稿，专供蒋经国阅读之用，这个特制的讲稿，上面的每一个字体都极大，因为，只有如此，蒋经国极度退化的视力才可以勉强看得见。

那次，副官翁元和王家骅各自拉住那张讲稿的一端，蒋经国就躺在床上，看着那份由他们举着的讲稿，吃力地背诵着。毕竟，当时他的记忆力已明显衰退，不过短短的一份讲稿，那次花去他好久的时间，他才背诵完毕，然后疲惫地躺下去，闭目沉思。

蒋孝勇担心他没办法和过去那伴，把讲稿很流利地在大会现场琅琅上口，所以，特地在那年的“行宪”纪念日大会会场，作了一些特殊的布置，例如，把蒋经国要上去讲话那张讲台上面，制作了一个呈弧形的板子，这块

板子主要是为了可以放置蒋经国的那份大字讲稿用的。“蒋孝勇”是为了防止蒋经国一旦忘了稿子内文时，还可以看看稿子内文，一边提醒他。

蒋孝勇的巧思的确发挥了功用，那次的“行宪”纪念日发生民进党籍国大代表举抗议布条闹场事件，民进党人在台下高声呼喊口号，可是，在会场上方的主席会上，蒋经国根本不知道台下在吵嚷些什么，至于台下民进党人举的布条，因为蒋经国极为衰退的视力，他也看不见台下的详情，加上他是忍着身体的巨痛去的，在他发表完简短的致词，侍卫人员担心他体力无法负荷，便匆匆推着他的轮椅扬长而去。随从人员都认为，蒋经国那次并没有发觉台下有任何异样。

有人说，二个星期后，蒋经国突然过世，他可说被民进党气死的，这个说法是有些牵强附会的。

死于七海官邸

1987年八九月间，医官程寿山为蒋经国量血压，量完不禁吓了一跳，乖乖，蒋经国的血压居然只有正常人指数的一半，这还了得，得马上处理，他立刻向召集人报告，然后连忙把他送往“荣总”急救。

蒋经国进入“荣总”五号总统病房，医生作了初步检查，决定立刻为他作紧急输血处理，紧急输血输了500cc，才把情况稳住。

这次的住院，经过院方的详细检查，发现蒋经国大部份的内脏功能都已经明显衰退，而且有严重坏死的倾向，这对一个糖尿病的病患来说，无异是一个最不好的警讯，等于宣布离死期不远，当时，这个讯息除了蒋孝勇及医生以外，没有任何人知道。

然而，蒋经国的车队还是“早出晚归”，就是早上开出官邸，晚上再开回官邸，其实车里根本是空的，蒋经国人还在医院里面。

1988年的元旦前后，“荣总”检验人员大概每隔二三天就来为蒋经国抽一次血检验，而且更严重的是，检验师居然找不到蒋经国的血管。

服侍蒋经国多年，侍卫们对他的心理起伏周期，可说了若指掌。通常他在每个礼拜二晚上开始，就有心情烦躁，举止不安的情况。照往例，他的秘书王家骅每个礼拜三早上，会比平日稍稍早一点抵达官邸，向他请示一些事情，这时，蒋经国也会告诉他，今天到底会不会去主持中常会，除非是身体实在支撑不过，否则，蒋经国即使是硬撑也要去党部主持中常会的。

所以，从礼拜二晚上开始，蒋经国就开始显得十分焦躁不安，没有人知道他在烦躁些什么事情，也没有人帮得上忙。照料他吃饭，也是没有什么胃口，喂他吃的东西，他总是兴趣缺缺，有时候火气上来了，或者身上的病痛难忍，他就用力拍床，但是，大概他怕惊扰到蒋方良，闹了一会儿，就平静下来了。

元月12日那晚，和平常任何一个礼拜二的晚上一样，蒋经国仍旧是烦躁

不安，从他的表情可以断定，这个夜晚对蒋经国来说，又是一个漫漫长夜，可是，工作人员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蒋经国最后的一夜，七海官邸的窗外一片凄寒，在他黝暗的房间里，工作人员看着这位“元首”，在和他的生命作最后的挣扎，除了隔壁房间和他一样是有病之躯的老伴，他的四周没有任何一个亲人，儿女除了一个蒋孝勇在台湾经常来官邸，其他的不是生病就是外放国外，或是远嫁异域，在他这样年纪的国人当中，大部份都已经在享受天伦之乐，为什么他却过得那样孤独？

王家骅一大早就来了，蒋经国这天的精神很不好但并无异常状况，但从神情来看便知道没睡好的样子，他和王家骅讲了几句话，就叫王家骅先走，去中央党部叫今天的轮值中常委再代表他主持中常会，王家骅走了以后，蒋经国说他感觉胃不舒服，通常，如果不是他的身体不适到极点，是会尽量参加中常会的。

这天早上他粒米未进，不停地上下床，在轮椅和床铺之间徘徊，他的情绪比往常更为浮躁，侍卫副官只有不停地抱他上床下床，整个上午似乎都在忙着同样的动作。

他说过感觉胃不舒服之后，侍卫很快就向医官反映，那天，官哪里面恰巧只有姜必宁医师，姜必宁是来官邸看蒋方良的心脏病，蒋方良心脏病还在休养当中，听完反映，姜必宁问蒋经国哪里不舒服，蒋经国就说肠胃，可是，医生就是讲求专业，不是自己专业的科别，只能作初步的诊治，所以他在做完初步诊查之后，就去联络负责蒋经国肠胃科的罗光瑞医师，谁知道偏偏不凑巧，那天一大早罗光瑞去外地洽公去了，要下午才能赶回来，姜必宁听了十分紧张，后来好不容易联络上了，罗光瑞表示立刻赶回台北。

这时，蒋经国已经忍不住身体的痛苦，告诉一旁当班的翁元：“你们找人想想办法，我实在痛苦得不得了啊！我全身都不舒服啊！”这时已经是9点多钟的事情，他的表情有些扭曲，翁知道，如果不是很难过的话，他是不会这样说的。

翁无奈地一旁安慰：“报告教育长，姜医官已经去联络罗光瑞罗大夫，他马上就会回来为你治疗，你请保重，一定要好好保重。”

除了这样安慰他以外，翁元根本没有别的办法。

他还是不安地在床铺上翻来覆去，十分痛苦的样子。

到了11点多的样子，蒋孝勇到父亲房间探望他。之后，他告诉侍卫们说，要到士林官邸和老夫人吃饭，便离开蒋经国的房间，出门去了。

蒋孝勇走了不久，蒋经国身体还是不舒服。但是还算平静，他突然问翁元：“咦？孝文呢？”翁答道：“报告教育长，他在外面餐厅进餐”他又问：“那孝武呢？”翁说：“孝武先生现在在新加坡工作。”

蒋经国只轻轻哦了一声，就又半躺卧在床铺上。翁直觉到，他好像有什么事情想讲，可是又像是欲言又止，他的头半垂着，好像陷入一种深思之中，久久不能自拔。翁元突然觉得这位曾经在台湾叱咤风云一世的人物，此刻是

多么的寂寞苍凉。

大约 11 点 40 余分，蒋经国原本作势欲呕的动作，这次竟然真的吐了，他大口大口吐了一床，翁元定睛一看，他居然吐的全是血，只见一口接一口的血——一种完全是暗红色、甚至等于是猪肝色的那种血，汨汨地从他口鼻中不断喷发出来。他立即向医官报告，医生也见事态严重，立即去联络医院麻醉科李主任来七海官邸紧急支援，所有的医生、原先服侍蒋方良的护士……都开始过来帮忙处理，可是只有一个人还被蒙在鼓里，那就是蒋方良，大家刻意不让她知道，怕她经不起刺激，可是，就算大部份的人都动员了，那又能奈何？毕竟，没有一个人可以和天命抗衡。他已经虚弱到没有一点力气讲一句话，有人和蒋孝勇联络上，请他立即赶回七海，蒋经国虽然是一息尚存，但可以感受到，死神正在他的身旁仁立，而且是近在咫尺的距离，甚至是可以听见心跳的距离。

翁元刚刚将他脸上和棉被的血渍处理干净，医生忙着急救用药，护士小姐也过来帮忙，大家都以为情况大概已经稍稍稳定下来，可是准晓得，大概 12 点 05 分左右，蒋经国又开始第二次吐血，这次的血和刚刚吐的血一样，也是暗红色的。又是一阵惊骇和忙乱，可是，他吐完之后，头一歪，眼一闭，就倒在床上，再也没有一丝动静，大家安静地望着他安详的面容，病床边那只心电图还在显示他的心搏，医生说道，“那是他心律调整器的声音。”当然，他们还是要尽人事听天命地做一些抢救工作，可是，医生们心里有数，要从上帝手上截下蒋经国这条人命，机率是近乎零。

蒋经国便这样没留下一句遗言，憾然离开人间。

蒋孝勇回到七海官邸，他的父亲已经气绝多时，他立刻通知其他的亲属，而侍卫人员则透过行政系统，向上面报告，并且报告李登辉“副总统”及其他官员。直到下午 3 点多，其他政要陆续赶到七海，待李登辉来到官邸，医生才放弃抢救。

这时，蒋方良的房间传来阵阵的辍泣声。

内舆论莫衷一是

1988 年 1 月 13 日晚，台湾“行政院长”俞国华宣布蒋经国于当日下午 3 时 50 分病逝。终年 77 岁。

主治医师台湾荣民总医院副院长姜必宁，这样报告了蒋经国病逝的经过：

总统于今日上午 7 时 30 分起床时突感身体不适，并有轻度恶心呕吐现象。经医师检查，血压为 110 / 70 毫米汞柱，脉搏每分钟 70 次，体温 36 摄氏度。由于未进早餐，随即以静脉点滴注射补充营养。不幸于下午 1 时 55 分，突发大量吐血，迅即引发休克及心脏呼吸衰竭，随经立即召集医疗小组

以人工心肺复苏术挽救无效，延至3时50分心跳停止，瞳孔散大，而告崩逝。

当天晚上，国民党中常委召开紧急会议。俞国华在会上说，蒋经国在1月5日已写好了遗嘱，表示要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继续实行民主宪政，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在会上全体委员一致通过根据“宪法”程序由李登辉接任“代总统”。“中常委”紧急会议在晚上8:45分散会之后，“中常委”到“总统府”，李登辉宣誓就任“代理总统”。接着是“行政院”宣布从14日起，“举国哀悼”30天，军方同时命令：“全军从1月13日晚上8点开始取消假日和休假以加强戒备”。

1月30日，台北举行蒋经国丧礼，“总统”李登辉主持仪式，国民党中央考核纪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马鹤凌，在大殓时宣读祭文，全文如下：

维

中华民国77年1月30日，总统李登辉敬率治丧大员，谨以至诚，恭祭于蒋故总统经国先生之灵前曰：

呜呼！自古名士之诞生也，以大任之将降其身，天必厄之以横逆，增益其所不能。然后历百艰而不惧，处极因而终亨。维公之少也，夙受教于严父；旋远学于俄京。羁栖北国越十有二载，吞旃啮雪，曾不鼻乎子卿。壮岁遄归，牧民南赣，犹复布衣践屐，粝食而藜羹。清慎勤能，郡以大治，而民仰之若神明，泊夫大盗移国，枢府播越台澎。随侍领袖，再造成平。建立中兴基地，以振复国先声。于时生民困瘁，实惨淡以经营。初裕农以足食；并饬旅以精兵。战则躬冒矢石，鼓舞先登；暇则教之树艺，娴习工程。俾进可以战，而宁可以生。旋复号召青年，树之以信仰、结之以精诚。揭救国之大纛、招才俊以弓旌。集思殫力，道与魔争。且复以其暇豫，穷峻岭、济沧溟、宿僻壤、履危坑、访渔牧，劝衣耕、恤孤寒、友编氓。其求民之隐，急民之急，每旦发而宵征。及其总庶政，秉国钧，乃力克万难，从事10项建设，毕大功于一举，使百堵而皆兴。于是家饶户给，府充库盈。崇楼蔽野，肩车接衡。稽之前史，我国家之富强康乐如今日者，实千古所未曾。此非可以幸致，盖出于毕生之淬砺，及所得于过庭。其任劳怨也，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其赴事功也，敢行人之所不敢行。呕心沥血者垂40载，其所树立，实来哲之典型。今国基丕固，民智日升。遂乃去闲弛禁，顺应輿情。朝野日隆其讴诵；国际亦誉其开明。其公忠体国之苦心，终已大信于天下，然有若日星。方将奋其智虑，涤瑕荡秽，揽辔澄清。詎复国之在望，竟弃众而遐升。呜呼！公之一生，忧患备更。泽流斯土，明德惟馨；崇功伟烈，永垂丹青；而前瞻远略，则后死者所宜服膺。敢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精诚团结，推进民主宪政，以促统一大业之完成。用副全民之望，报慰在天之灵。哀哉！尚飨！

当局评价，恭维有余，岛内舆论莫衷一是。台湾《民众日报》2月2日

刊登署名邱垂亮评价文章，摘要如下：

无疑地，蒋经国先生一定是一位有褒有贬极端争议性的政治人物。现在要为他盖棺论定，当然言之过早。不过，若要勉为其难，先下一个大而化之的评断，很多人大概去同意，他最大的历史贡献主要有二：一是70年代，他领导台湾的科技普英，推展十大经济建设，迅速创造经济发展奇迹。台湾经济增长率近20年来，每年平均都在10%左右；国民平均所得，每年由60年代的五六百美金，到80年代的五六千元美金。

第二，更重要是70年代初，他主掌台湾政局之后，开始一步一步进行政治改革，推展民主政治，在权力分配本土化、领导阶层年轻化、现代科技官僚化、政党政治民主正常化、人民政治参与多元普及化等各方面，都有基础性的建树和弥足珍贵的发展。

可惜，1977年爆发了暴力的“中坜事件”，蒋经国先生的民主政治革新运动开始受到保守势力的压抑和抵制。蒋先生的身体也开始每况愈下。1979年爆发了更为血腥暴乱的“高雄事件”。1980年的“美丽岛”大审，判决了大批党外菁英长期的牢狱之罪，其间又发生了个人发指痛绝的“林义雄母女暴杀事件”。1981年陈文成教授惨死台湾大学校园。两个惨杀案件至今未破。更不幸地，1984年国府情报局长派竹联邦黑社会人物去美国加州谋害美籍华人作家江南，此案震惊海内外。次年，台湾爆发了30年来最大的经济犯罪案件，“十信弊案”的经济大地震，差一点严重摧毁了蒋经国先生苦心创建的台湾经济奇迹。

毋须讳言，上列不幸事件，是蒋先生统治台湾近20年的最大政治缺憾。它们沉痛损伤挫害了蒋先生政治革新民主现代化的雄心大志和宏伟大计。这些失误，蒋先生要负相当的政治责任的。

简言之，虽然仍有甚多的不足之处，蒋经国先生近20年来，是在台湾相当困难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建立了一个甚为稳健厚实的民主政治发展基础。

另外，必须一提的是，虽然大陆探亲已经开放，但在和中共政权斗争的历史性中国统一问题上，蒋先生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基本上并没有做出任何真正突破性的发展。

第三节 蒋经国与苏联妻子

斯大林同意蒋经国归国

蒋经国溘然长逝后，蒋家儿孙走的走死的死，不少人担心，蒋经国的苏联妻子蒋方良在连失依爱的情况下，将无法自处。

有人劝她出国散心，也有人建议她返乡探亲。不过，她的家属认为，让蒋方良回苏的提议毫无意义，甚至是一种刺伤，因为，“她已经是一个完全中国化的妇女了”。

蒋方良自从 20 岁离开前苏联西伯利亚乌拉山麓故乡，历经时代巨变，与多灾多难的中国共渡了半个世纪的岁月。

1933 年，芬娜（蒋方良的俄文名字）刚从工人技术学校毕业，婷婷玉立，具有俄罗斯妇女独特的典雅气质，她是一位孤儿，举目无亲，毕业后，即由当地政府分配到工厂工作。

这时，芬娜结识了一位东方青年，他是一个中国人，俄国名字叫尼可拉（蒋经国），身材不高，但他眼神中独特的光芒，深深吸引着芬娜。

相识后，芬娜才知道尼可拉，这位中国青年本名是蒋经国，而且是蒋介石的长子。

芬娜怎么也看不出尼可拉有丝毫名门公子习气，而且她对尼可拉的境遇非常同情，这种情惊更逐渐衍化为相互倾慕。

那时，中国留苏学生一度多达千人，但大部分都集中在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

蒋经国在当时留苏华籍学生圈中相当活跃，交游广阔。有一次，几位莫斯科中山大学浙江籍同学写了一封信给他，开玩笑地说，他们预备成立一个浙江同乡会，想选蒋经国当会长，希望“会长”经常接济一些钱。

前苏联是一个秘密警察处处皆是国家，克格勃秘密警察尤其不会放过军政学院这种敏感地点，那封浙江同学给蒋经国的信，不久就落入克格勃手中，并且辗转传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又名陈绍禹）那里。

这封信也成为蒋经国流放西伯利亚做苦工的口实，因为，前苏联严格禁止共产党以外的团体组织存在，连同乡会也在禁止之列，任何人如企图成立小团体就要背上“搞小组织”的罪名。

蒋经国于 1933 年被派遣至乌拉山西斯夫鲁克的乌拉重型机械厂担任技师，不久，他又擢升为工人航空学校学生募集委员会的主席和厂长。

芬娜就在这年和蒋经国相逢，并且在 1935 年 3 月于斯伐拉斯地方结婚，并生下蒋孝文（艾伦）。

新婚生活原本是甘美的，但艰难的流放岁月，却象漫漫长夜一样难熬。

1936 年，蒋经国当上“工厂新闻报”总编辑不久，苏联开始新一轮的整肃异己运动，许多人遭杀戮和监禁，受这一运动波及，蒋经国也在这年 12

月被工厂解雇。

家庭经济重担从此落到芬娜的肩头，生活顿时拮据起来。

1936年秋，蒋介石突然把军委顾问处处长、负责接待联络苏联的军事顾问张冲叫来，要到苏联做一件事，但要他先同俄罗斯太太娜达分手，把她送回去。蒋给了他5万块钱，张冲把这笔钱给了娜达，把她送走。蒋介石给他的任务是把蒋经国从苏联弄回来。张冲到了苏联，找机会向斯大林提出这个要求，斯大林说：“好，答应你。但是，你们把牛兰夫妻放了。”（这等于是变相的人质交换。牛兰夫妇是第三国际秘密派到中国的。）张冲提出要先见蒋经国。斯大林同意。张冲立即密电请示重庆，蒋介石同意放牛兰夫妇。过了两天，苏联方面把蒋经国带来，张冲告诉他，他爸爸要他回去。张冲再次找到斯大林，他知道斯大林是个权谋善变的人，请他马上下命令放人。斯大林这时表现出大度，用俗话说就是人情做到底，同意蒋经国把他的苏联太太和他们在苏联所生的儿子孝文一起带走。张冲顺利地完成了这个任务。所以，蒋介石对张冲信任有加。

获悉自己一家马上就要回国，蒋经国兴奋不已。12年，整整12年酸甜苦辣的异国生涯，总算要结束了。

他欢天喜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妻子芬娜，并将深埋心中的整个憧憬都想向她倾吐。但是，芬娜听到返回中国的消息后，情绪立即复杂起来。尽管她无父无母，毕竟冰天雪地的苏联是她的根。她爱尼可拉和两个孩子，但也舍不得远离家乡。

命运是不容违拗的。1937年3月25日，蒋氏夫妇搭火车离开莫斯科。西伯利亚大铁路沿途，对蒋经国来说，并不陌生。但是，一旁的芬娜则是相当惶恐的，火车一里一里的往东方移动，针叶树林伴着冰封大地迅速倒退，对她而言，未来是一片茫然的不可知。

从“芬娜”到“方良”

1937年4月，一艘来自海参威的苏联远洋轮船，将蒋经国夫妇载送到上海港口，夫妇俩尚未登岸，就搭上一艘有关方面安排的汽艇，直驶杭州。

从登上中国的土地后不久，芬娜就不再叫做芬娜，而改用方良。

由芬娜变方良，是公公蒋中正的意思。这当中，也有一则传诵多年的轶事。

溪口的说法，是蒋中正听儿子蒋经国介绍媳妇的洋名唤做Faina，听和讲起来都拗口，就作主替她取了个与洋名字发音接近的中文名字“方娘”，并且也将只有洋名爱伦的长孙命名为孝文。

方娘叫起来，中国味道十足，再加上蒋字，就是蒋家人了。蒋经国夫妇及婆婆和乡里人士，显然都非常满意这个决定。

不过，一个意外的小插曲，却使得芬娜二度更名。这一段经过有两种说

法。大陆上，蒋经国的旧识部属传闻，蒋经国快快乐乐叫着太太“方娘”之名好一阵之后，被他留学苏俄的同学徐君虎取笑，说称呼太太“娘”不伦不类，就接受徐君虎的建言，把娘字左边的女拿掉，芬娜再变成了“方良”。

台湾的蒋家亲近友人则怀疑这样的说法，其中一人表示，记忆中听蒋经国生前说起，是蒋经国父执辈的党内大老戴季陶先生，让蒋家把“娘”字换成“良”字的。

蒋方良接纳了这磨灭她与俄罗斯关系的名姓上的安排后，还未能成就她为公公眼中理想的媳妇。公公严格要求方良谨守中国礼教，只是方良全盘吸纳中国文化的开始。后来，她将一切与婆家民间礼俗相关的事务，奉为自己坚守的信念，碰上所有中国农历传统节日，都要依例祭拜。中年以后，蒋方良遵从礼俗的习惯，到了与中国守旧女性相一致的地步。在台湾与她相处过的蒋经国生前部属中，有人目睹蒋方良听了人讲不吉利话，立刻敲桌三下去霉气的做法。

蒋方良中国传统习惯深厚的言行，多少也受到她婆婆毛夫人的影响。毛夫人大半生吃斋念佛，也相信所有人命中注定的说法。据赣南时期为蒋经国开车做司机的毛宁邵回忆说，有一回，蒋经国夫妇计划过河到外地游玩，毛夫人不表赞成，说是过一道河对儿子不利，他命里那时过河将有凶事。

蒋经国听从母亲的话，就放弃外出的计划，由蒋方良一人散心了。

初到溪口适应中国生活日子中，蒋经国闭门读书，蒋方良朝夕陪伴婆婆，照顾儿子爱伦，学讲宁波话之外，也恢复了往日处理家务，洗衣、购物的生活。

蒋方良生性勤劳，在溪口经常有人看到她跟佣人一起做家事，以及每隔一段时日就骑着自行车到镇外县城添购日用品的身影。但，蒋方良骑单车的日子并未维持太久。1937年冬天，溪口人看到的蒋方良，已经是一位大腹便便的孕妇了。次年春天产下了长女蒋孝章。

西子湖畔的冷暖

湖水宁静无波，湖边杨柳垂岸，半山上一栋融合中西建筑风格的典雅屋宇，映照在高耸的樟脑树影下，散发着平和不与世争的安详气息。从这里看杭州，看西湖，人们都说，是百年不移的清幽与逸美。

1937年4月中旬乘船抵达上海后，怀抱儿子的芬娜，就与先生蒋经国，在公公蒋中正派遣的人员陪同下，来到距离上海只有200公里远的浙江省省会杭州市，置身在如画如诗般的人间天堂。这个时节，美名满天下的西湖，正是春色盎然。

1993年5月，当地人说，那个古早的1930年代，与现在时隔将近60年，人情世事虽已沧海变幻，但是西湖，与西湖西北方向山坡上那曾经叫西伶饭店的建宅，始终是绿意青葱，雅致怡人。

西泠饭店，是 1937 年 4 月 18 日，芬娜首次会见公公蒋中正的地方。

这座建筑，目前是国际性香格里拉旅馆集团的连锁饭店，中文名字叫“杭州饭店”。饭店的年轻工作人员大都听闻过，早在三、四十年代，国民党的首脑领导蒋中正与宋美龄，经常住宿在这里，观赏西湖的绝妙美景。

西泠饭店以西子湖畔著名的西泠印社得名。西泠印社的金石刻印字画，是杭州人文荟萃的骄傲。饭店正门口就是西泠桥，通过西泠桥，映入眼帘的，是西湖十景中最具诗情画意的“平湖秋月”，观赏“平湖秋月”极景的西泠印社，十分难得的至今仍保持着百年老店的历史建筑。

曾是西泠饭店的现今香格里拉杭州饭店所在之处，具有蒋中正一向喜爱的依山傍水、明媚幽静的自然风光。今日的饭店建筑，有一部分维持着早期的风貌。中国南方建筑的传统房顶，宽敞的阳台，加上绛红与暗灰色系搭配的外墙，在绿树参天 and 西湖湖面曼妙银波的相互辉映下，很能表现杭州夺人之美。

芬娜第一次到达杭州时，怀中一岁零四个月的长子孝文才刚牙牙学语，哪能料到 20 多年后，蒋孝文的美丽妻子徐乃锦的祖父，就是出身于浙江、殉难后埋骨在杭州的革命先烈徐锡麟。

徐锡麟的墓园位于出产龙井茶的狮峰山龙井路上。他的墓地，与另一位女性革命先烈秋瑾、以及遭秦桧害命的岳飞等人的安息之地，都是杭州人耳熟能详、具有历史意义的古迹。

蒋经国并未公开记载说明他 1937 年春天，去国离乡 12 年后，来到距家乡溪口只有 200 公里的杭州时的心情。那时，跟在他父亲身边的国民党要员中，不少人却以见证人的身份，用文字描述了当时蒋氏父子相见的景象。

综合多方面较可靠的说法，滞留俄国 10 多年的蒋经国返乡，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的党政要员，大都得到消息。不过，谁都难以预料，蒋委员长如何对待亲骨肉的归乡之旅。

蒋经国前去莫斯科时，父亲领导的国民党正进行联共、容共政策。2 年后的 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中正发动清党行动。那时人在莫斯科、且是共青团团员的蒋经国，大力响应孙逸仙大学学生声讨蒋中正的行动，并因而声名大噪。

目前仍留存在历史资料中的记录，详细记载着蒋经国公开发表的致父亲蒋中正的公开声明。声明中，这位“孙大”的尼古拉同学，愤怒之下，斩断与蒋介石的父子之情，深切表达他不能认同父亲与共党为敌的坚定立场。

蒋经国说：“过去，他是我的父亲，革命的好朋友；现在，他是我的敌人。”

当年与尼古拉同学、并分发在同一个小组的徐君虎，在湖南他目前的宅邸，曾经指出，在完成文情并茂，讨伐谴责父亲的声明后，尼古拉还情绪激动的写了几封信给他父亲。信函中，蒋经国直呼父亲为蒋介石先生，还让徐君虎阅读函件内容。

那一刻，蒋经国显然对自己为党国民族大义而消除亲情的羁绊，感到十分自豪。

研究蒋经国留苏生涯的俄国学者中，有人认为，蒋经国气愤父亲“反革命”的行动之余，在发表了声明后，还舍去蒋姓，以使用俄国人的姓氏“耶利札若夫”进一步表明他与父亲绝非同路人的坚定心志。以后在苏联填写表格或公文，蒋经国的亲笔署名都是与“蒋”无关的“尼古拉·耶利札若夫”。

17岁的蒋经国发表不恋私情的公开声明后，苏联共产党掌控的塔斯社，大肆向国际报导。蒋经国本人在孙逸仙大学校园里，配合发表慷慨激昂、反对国民党清党的演讲，一夜之间使得他名满莫斯科。“孙大”的同学记得，那一阵子，每到一地方，就有人问及凛然大义灭亲的尼古拉。

蒋经国公然和父亲作对，在中国的蒋中正一度极为难堪。这一公开声明信事件，与后来1935年1月，陈绍禹所炮制的蒋经国致母亲家信，严辞批判父亲不仁不义一事大不相同。

那封信，是陈绍禹的杰作，蒋经国曾表明不能接受，并且在信件公诸外界后，得到平反，证明自己的清白。1927年批判父亲的公开声明，则是蒋经国自民自主的行动，除了所谓年幼无知、被甜言蜜语蛊惑的说词外，蒋经国不能否认声明的存在。这种情况下，就在西子湖畔，父子即将重逢，做父亲的蒋中正，是否忘怀了儿子公然反目的无情？

这一段经过，各方说法纷纭。据留在中国大陆的前国民政府官员回忆，那时候（1937年），蒋经国从上海到达杭州后，虽然儿子近在咫尺，心绪复杂的蒋中正，并未急于与他重叙天伦。最后还是心腹之一陈布雷婉言相劝，他才在蒋经国守候西湖之滨14天后，在西泠饭店与儿子以及从未谋面的媳妇、孙儿会面。

但是依照蒋经国夫妇3月25日自莫斯科上火车，一路奔波到海参崴，又登船开往上海的时间计算，蒋经国和太太抵达杭州时，应该就是4月中旬了。他们既然在4月18日就和蒋中正见面，14天等待之说，与事实显然有着不小的差距。

长年与蒋经国夫妇交往的国民党前组工部主任宋时选则表示，父子情深，千古人伦，蒋中正先生不愿和儿子见面的说法，据他了解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留在中国大陆的资料指出，蒋中正与蒋经国父子团聚，重叙天伦后，父亲为了替喝了12年共党奶水的儿子“洗净思想毒素”，当即指示蒋经国即日打道回溪口，拜见母亲毛夫人后，就留在溪口好好修习荒废多年的国学，特别是小时候念过的曾文正公家书与王阳明全集，最要加倍学习。

蒋中正还敦请了颇具名声的徐道邻，做儿子的家庭教师。

巧合的是，发动西安事变、间接促成蒋经国返乡的张学良，那段时间也居住在溪口。张学良是被迫遭幽禁在溪口雪窦寺旁的中国旅行社的。大陆的记载中指出，蒋经国与被父亲蒋中正软禁的张学良，曾在溪口晤面谈话；但

张学良在 1993 年追忆往事时，并没有当年与蒋经国会面的鲜明记忆。

曾有自称与蒋家熟悉的人士透露，蒋中正与蒋经国父子感人相见后，父亲蒋中正立即要求儿子与当时的蒋夫人宋美龄会面，并且希望儿子以“母亲”称呼宋美龄。

蒋中正与宋美龄 1927 年结婚时，蒋经国在俄国。由于父亲以“休妻”的方式，主动在报端刊登与母亲离异启事，完成和宋美龄结为夫妻的心愿，蒋经国曾长期不以为然。他当时如何面对父亲的请求，外界不得而知，不过亲近部属们相信，蒋经国那时的心情，难免极端苦恼。

年少时留学日本的蒋中正，一向对女性持较开明的态度。他和元配毛夫人化离，与在美国成长受教育的宋美龄结为夫妻前，曾和姚怡琴、陈洁如两位女性谱下恋曲，也是那时候中国政坛公开的秘密。不过，对于儿子比自己更为前卫的娶进异国、尤其是俄国女子为妻，依常理推断，做父亲的他，仍然需要相当程度的心理调适。

对于俄国人，蒋中正并不陌生。1923 年 9 月，他曾奉国民党孙中山总理之命，前去苏联考察居住 3 个月，如今长媳正是俄籍女子，做公公的蒋中正先前对俄国的成见不说，语言又不能沟通，两人间的生疏隔阂不难想象。他们的简短的谈话，由蒋经国从中翻译；公媳之谊的建立，也完全依赖蒋经国做桥梁。

初抵中国的蒋方良，投身在丈夫的国度里，就这样从西湖这个地方，接纳了一切新的挑战。之后有一段时间，她听不懂人们的谈话，看不明白眼前的事物，离开家乡斯弗朵夫斯基前那 6 个月，她一手操持家计的日子，已如云烟般飞逝。在这里，柴米油盐不再困扰着芬娜，她这时所面对的，是一场毫无把握、崭新世界的考验。

溪口婆家

1937 年 7 月，芬娜亲眼目睹了中国全民对日抗战的热诚。这时开始，整个中国与日本作战，芬娜也进行着她转化而为中国女性的战役。

风光明媚的西湖开始，芬娜跨出她适应新生活的每一个脚步，她改名换姓叫做蒋方良；她举行了一次凤冠霞帔的传统中国式婚礼；她学讲丈夫的家乡话；她吃中国菜、穿中国人的服装；她还在夫家所在的溪口，生下了一心喜爱盼望的女儿孝章。

杭州到溪口，不过三、四个小时的车程，俄国籍的芬娜却就这样渐渐消失了。

来到这个小镇之后，芬娜·伊巴提瓦·瓦哈瑞娃不再存在。从此，她的过去一笔勾销；她只是中国名人家庭的长媳：是蒋委员长长子蒋经国的太太；是蒋经国生母毛福梅陌生、但又不能不接受的儿媳妇。

蒋经国回家，是溪口近代史上的大事。至今，溪口镇上老代的镇民中，

还有人记忆着大约是 1937 年 4 月 19 日这一天的往事。

关于毛福梅和蒋经国母子相见的情景，溪口传说着一个浪漫又充满戏剧色彩的故事。

蒋经国返乡，在溪口掀起人人欢喜的风潮后，据说，有老乡亲建议乡里人士仍尊视为蒋中正元配的毛夫人，尝试一个较特殊的母子相认场景。他们安排毛夫人与其他数位同年纪的近亲及闺中好友，坐在溪口蒋家祖屋，叫做丰镐房的厅堂中央，等待那位已从青涩少年，成长为风霜男子的儿子。

乡亲们这样做，主要在测试蒋经国的母子情。依照他们的逻辑，12 载相隔，多年未能见到，要看蒋经国能否在一眼之间，认出自己的母亲。

毛福梅一开始也接受了这个考验儿子的建议。只不过，当儿子真真切切的来到眼前时。思子心切的毛夫人按捺不住，激动又泪流满面地抢先呼唤乳名“建丰”的宝贝儿子。

蒋经国更是涕泪交加。他在众人前与母亲相见的感人镜头，真让溪口乡人为 10 年前就遭蒋中正离弃的毛夫人高兴；他们一传十、十传百，开心地将这幅母子会的画面传颂宣扬着。

重新举行婚礼

这一切虽然意外又惊喜，笃信传统的毛夫人要求已成亲两年一个月的儿子和媳妇——蒋经国和方良在自己的眼前，重新举行一场隆重体面的婚礼。

一向孝顺的蒋经国，遵从母命，他太太蒋方良重新披上了新婚的服饰。这一次婚礼的准备与张罗，都不需要尼古拉及芬娜劳心费神。他们的任务，就是让母亲享受一场喜庆的欢乐和满足。

婚礼是依照中国传统礼节进行的：蒋方良穿上了特别订制的大红色织锦缎、长及脚背的旗袍，头上还戴上凤冠，完全是中国新娘的装扮。

蒋方良与新郎蒋经国在溪口第二度举行婚礼的留影，也是海峡两岸地关心蒋家变迁者所熟悉的一幅资料照片。相片中的新娘从头到脚，都是中国女子于归为人新妇时的服饰；身边的蒋经国则穿着西服。溪口人提供的回忆却说，当时蒋经国身上穿的是长袍马褂。

溪口还有老人记得，蒋经国与生母哭泣声中喜相逢的时刻，第一次拜见婆婆毛夫人的蒋方良，也感动得真情流露，掉下串串泪水。

这些动人的故事，实情如何，蒋经国并未评论，太太蒋方良那时一片真心接纳夫家亲人的真情，蒋经国在时隔 38 年、1975 年 4 月 5 日父亲病故后，守丧期间的日记中，曾有所描述。

在这篇题为《守父灵一月记》的文字中，蒋经国眼看太太因父亲过世而伤痛心碎，感念万分。他回忆 1937 年 3 月，带着太太一起从苏联启程返乡，与家人团圆时，那时还叫芬娜的妻子，就曾诚恳地向他表示，自己幼年即丧失父母，由姐姐一手带大，如今随丈夫来到婆家，“丈夫的家人，就是自己

的家人”。

蒋经国未曾在日记中多加颂扬妻子的一切，但很显然，日后的芬娜，果然以行动表明了她作为蒋家妇、中国人的决心。她与丈夫定居在溪口镇离母亲住屋不远处的一栋两屋楼洋房里，一天接一天，耳濡目染的，转化成为中国这一大家族的媳妇。

刚到溪口，芬娜就发现婆婆毛夫人在小镇如神似佛、备受乡亲尊崇的地位。这固然与公公蒋中正的政治权威地位有关；但另一方面仁心慈面的毛夫人，长期念佛茹素、济助贫苦乡民、关怀修整庙宇道路的善行，更为她自己博得了大好人的称号。就算是今天回顾半世纪前的这位蒋家毛夫人，溪口人也都不否认老太太生前所享的清誉。

毛夫人 19 岁时，凭媒妁之言成为蒋中正的结发夫人时，丈夫还只是一位留学日本、向往革命的热血青年。他一生与丈夫聚少离多，可以说；根本未能体会夫妻闺房齐眉之乐，就死守着婆家养婆婆、照养独子。毛夫人生蒋经国时，蒋中正还在日本，父子首度见面，小婴儿已 1 岁多了。

母亲的遭遇，是蒋经国少年时期与父亲关系不睦的原因之一，也使他一心一意要让母亲晚年享受天伦聚首的快乐生活。1939 年底毛夫人不幸在躲避日军空袭警报时丧生，蒋经国痛心疾首、恨不欲生的悲痛不难理解。

由于天不假年，毛夫人与蒋方良的婆媳的情缘也不长久。除了 1937 年春天到 1938 年初，将近 8 个月，蒋经国奉父亲之命留在家乡，温习苦读国学的这段期间，曾与毛夫人连续朝暮生活在一起外，之后到 1939 年 12 月毛夫人去世以前，做媳妇的蒋方良跟着丈夫的工作，穿梭来往于江西的赣州、四川重庆及家乡溪口之间，未能像刚来到中国大陆初期那般，与婆婆晨夕相守。

生活娱乐

蒋方良是一个非常质朴而和善的女人，她具有东方女性特有的温婉性格，所以，蒋介石曾经在她生日的时候，送给他一则贺词，上书：“贤良慈孝”四字，可见对她的疼爱。

但是，蒋方良毕竟是一个外国人，她也有一般外国人在中国遭逢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她嫁到中国这样特殊的一个政治家庭，自然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事情和各种各样的苦衷。

和蒋介石夫妇相比，蒋经国夫妇间的感情，是另一种典型。在外界的传说中，有人认为因为蒋方良生活太过苦闷，所以染上了酗酒的习惯。其实，俄国人原本就欢喜喝酒，外人对蒋方良嗜酒如命，甚至借酒浇愁的说法，恐怕有相当一部分是渲染过头了。

刚到台湾，台湾还不准进口俄国酒，有人知道蒋方良喜欢喝伏特加，特地想办法从香港弄来一些伏特加，送到蒋经国的家里，所以，当时蒋经国的家里有不少伏特加烈酒，只要有兴致，夫妻俩总不忘在自家饭桌上斟酒对酌。

论酒量，蒋方良绝对不会输给她的夫君，当然，蒋经国因为公务的关系，必须经常和同僚或是部属喝酒应酬，久而久之，也练就了一身好酒量。50年代，国民党部队大力推动所谓的“克难运动”，每年都要选出“克难英雄”作公开表扬。当年只要是选出了“克难连队”，蒋经国都要到那个部队去和全体官兵吃顿饭。所谓“克难部队”，大概都是以连为单位，一个连队总有百来人，蒋经国会逐桌敬酒，他要喝酒干杯，绝不拖泥带水，几桌敬酒下来，脸不红气不喘，由此可见他的酒量确实十分惊人。

这一时期，台湾和美国的关系十分友好，蒋经国和美国一些官员的接触也日渐频繁，但是蒋经国的英文并不是很好，为了和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的军方和情报单位的官员搞好关系蒋经国在英文方面下了一番功夫。

不但自己在语言方面痛下苦功，也为蒋方良请了一位美国驻华大使馆某参事的太太，到家里来辅导她英文。后来，又请了一位英国人教他们夫妇英文，二人可以说在英文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蒋经国夫妇后来的英文程度都不错，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

蒋方良喜欢喝酒的传闻此起彼落，但是，她这个俄国女子竟会喜爱上中国的京戏，恐怕更是让人不可思议。

去台之初，台北不像当年上海那样的十里洋场，有各式各样的娱乐消遣，何况在官宦家庭，蒋经国经常不在家，蒋方良当然必须有懂得自我排遣的方法，否则难免生活单调难耐。

蒋方良年轻时代对运动是很热中的，对球类活动亦不例外。

深宫怨

在名义上，蒋方良是三军托儿所的挂名董事长，可是她从来不曾参与过这个军方幼儿机构的任何活动，她甚至连这个托儿所的大门都没进去过几次。

最早，一些官太太不知道蒋经国的个性以及蒋方良在实际决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还寄望蒋方良能够为她们的老公或是亲朋讲些情面，拉些关系。蒋方良最早也没有摸清楚丈夫的习性，还答应为人说项，可是等她向蒋经国提起，蒋经国的反应相当直率，劈头就说，“以后公家的事情，你最好别管！”蒋方良从此再也不代人说项，对丈夫经手的政务也再不作任何的干预和插嘴。

蒋经国对夫人干政的情况是深恶痛绝的，在他主控的七海官邸，他当然绝对不允许有夫人插手政务的事情发生。蒋经国的心目中，还是很执着传统的观念，就是坚持男主外、女主内，大大对先生在外面的情况知道得愈少愈好。

由于蒋经国并不支持太太经常外出，或者到别的官家去串门子，而蒋方良基本上是一个以丈夫为重的传统妇女，而且又是一个外国人（尽管她一向

自认是一个十足的中国人），缺乏外来的援助，久而久之，她难免走上自我禁锢的道路。

早年住在长安东路的时候，有时她还会到西门町去买布、逛街甚至看电影，后来搬到七海，一方面是距离市区比较远，一方面蒋经国也平步青云，一路做到了“总统”，她便不可能像一般平民百姓一样在街上闲逛。有段时间，她固定时间去台北统一饭店的美容部洗头发，后来甚至头发都是请人在官邸简单洗洗，不再出门洗头。慢慢的，她可说真正和外面的世界隔离，在身心上难免造成了一些后遗症。

长期的足不出户、自我封闭，蒋方良的精神终于出现了警讯。

最早，她是不和任何人说话，和蒋经国一天讲的话大概不会超过10句，总是一个人沉默地静坐一旁，当时，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是，等到有一阵子，发现她出现了怪异的举止，才开始发现情况有异。

原来在长久自我封闭之下，蒋方良不自觉得了一种忧郁症，这种精神上的反常现象发生时，蒋方良就开始在官邸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翻箱倒柜，把她自己所有的东西，包括金银首饰、衣服用品，搬得官邸上下楼到处都是。

后来，大家才知道她的精神有些不太稳定。大家都认为是因为长期闷在家里造成的，可是在这个时候劝她多去外面走走，她又毫无兴致，就这样子，精神状况时好时坏。

蒋方良基本上是一个不适合参加政治活动的女性，只要有要她出席公众场合的情况，前一个晚上她肯定是彻夜睡不着，第二天一大早，通常是她最早起床，穿着要去赴约会的正式服装，坐在客厅沙发上等待。她就是这样一位很容易紧张的家庭主妇，一点也不像是第一夫人。

夫妻至情

蒋经国和蒋方良之间，原本就是患难与共的夫妻。

但是，在一个政治家庭里面，难免有许多人认为这样的夫妻生活，其实有什么情分可言？然而，在七海一次偶然之间的亲眼目睹，却让侍卫们对这对患难夫妻，有了新的评价。

那是在一个傍晚，夜色渐渐低垂，贴身副官翁元照例在蒋经国房间旁边值班。在偶然的情况下，他见到蒋经国走进他的妻子的房间，到蒋方良身旁，双手握住妻子的手，两个人对视良久，然后，蒋经国一语不发地走出房间。

这样的情况，翁元日后又陆续见过几次，后来才知道是夫妻互给对方打气，鼓舞对方、安慰对方。

1984年，是蒋经国夫妇结婚50周年纪念。往年，结婚周年纪念大概都没有什么具体的庆祝活动，这次50周年，蒋经国夫妇非常重视，邀请了至亲好友。到官邸吃饭。当天的客人包括王叔铭夫妇、毛瀛初夫妇、孙义宣夫妇等人，一共请了二桌，类似这样的隆重宴会，在蒋经国官邸还是真的很少见，

可见蒋经国对结婚周年的重视程度，藉着这样的庆祝方式，蒋经国也算是表达对蒋方良一生劳瘁的感激之意。

还有一次，翁元亲眼目睹蒋经国对蒋方良柔情令人感动的一幕。那是1988年的元月6日，蒋方良因为气喘病发作，医生劝她应该立刻住院，惟恐可能会有意外发生，可是任凭医生怎么说，蒋方良说不去就是不去，后来蒋经国知道了这个情况，便亲自去劝蒋方良，他说：“方！你一定要去住院，如果你不想去，我可以陪你去，我可以住在你的隔壁房间，好不好？”经过蒋经国的苦劝，蒋方良才总算去住院接受治疗。

后来蒋经国真的还陪她去荣总住了几晚，那时距离蒋经国去世，大概只有几天时间。

享受简单与平静

“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1993年的春天，蒋方良在大直家中，同一位蒋家老友闲谈时，这样形容她已迈入的72岁日子。

蒋方良还说，多年来她享受着简单与平静，从来不觉得自己高高在上，更不认为“第一夫人”的地位有任何特殊的尊荣。

蒋经国、蒋孝文和蒋孝武相继去世后，蒋方良的际遇甚受注目。亲生女儿蒋孝章长期旅居美国，唯一的儿子蒋孝勇一家，也以加拿大和美国为家。蒋方良独守在大直官邸，有许多近亲、朋友或不相识的民众，经常对她表示关怀。

一位蒋方良的老友说，她对现实生活的满足是这位老夫人发自内心真情的流露。事实上，满足于现状，无所欲求，这正是蒋方良谨守坚持的人生哲学。丈夫在世时，她信奉着这一准则；丈夫过世后，她仍一如既往，默默地接受着命运的考验，以坦然的心境面对着不幸和哀伤。

蒋方良平素的行为，很注意替他人着想，不太固执己见，必要时却极有定见，不受外间杂音吵闹的影响。其中，她视台北为第三故乡、台北就是家的执著，最能表现蒋方良的真我。

蒋方良有一次向一位甚为亲近的友人表示，要写下遗嘱，将手上的存款分为10份，分给儿子媳妇与孙儿女。

蒋方良亲情趋势单纯，她计算中，孝文的妻子徐乃锦、女儿友梅；孝武的太太蔡惠媚、子女友松、友兰；以及三子孝勇、孝勇的妻子与3个儿子，蒋家直系两代共10人，是承袭她积蓄的亲人。令这位亲友感慨万千。他说，在蒋方良节俭不奢华的生活中，每一笔金钱的支出，都斤斤计较，她好不容易积存的一笔不算庞大的存款，还惦记着要留给子孙，听来真是让人于心难忍。

蒋方良习惯于不为自己着想。目前在大直，大部分的时间，她都一人独处，毫不怨尤，每天上午，蒋方良在房间里绕着圈子漫步；下午傍晚时分，

天气晴朗，就到院子里走动散心，以不打扰外人为主。

过去一、两年内，蒋方良俄罗斯籍的背景，在岛内引起不少议论，社会上许多人士并公开建议当局，必要时，应当允许这位蒋经国夫人返回娘家安度余年；还有朋友善意地认为，台湾有着过多不愉快的往事，如果可能，蒋方良不妨选择移居美国等地，以便与正在海外的儿女共享天伦。

蒋方良从新闻报道中得知这些毫无恶意的说法后，未曾多加解释，只在与近亲友人谈话时，轻描淡写地表示，俄国虽是自己出生的地方，毕竟已是人事全非，不能算是家园了。她在台湾连续居住 40 多年，如今台北已是她的故乡，她要住在台北，台北才是她的家。

蒋方良另一个充满感情的地点，是丈夫的老家——浙江奉化溪口。蒋方良那次表明，她以台北为家的心志不变，还意味深长地说，如果将来回归大陆有望，她愿意返回溪口长住。

蒋方良将自己的一切，与台湾、台北和大直连结在一起的情怀，充分展现在她 1992 年 9 月的美国之行中。

那次前去美国，是蒋方良自 1960 年只身赴美国，为儿子主持婚礼后，首次离开台北到外国。她搭机启程时，若干与蒋家相熟的人士，私下曾慨叹唏嘘的推测，这趟美国之旅，蒋方良很可能选择留居海外，避免在台北眼看社会政治上的各项变异，触景生情，难以接受。

一个月后，蒋方良象她临走时那样，踏着健朗开怀的脚步，又踏上了台北的土地。

蒋方良回来了；她回到的，是一个美好回忆多于悲哀伤怀的地方。

悲剧一生蒋孝文

男人对长子总是有着一种特殊的期许和眷顾，蒋经国自不例外。

蒋孝文，1935 年生于苏联，他是蒋经国和蒋方良在苏联患难与共的岁月中生下的第一个孩子，所以，他们对蒋孝文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看到他，就等于重现在少年时代在西伯利亚大平原上那段最艰辛的日子。

蒋氏夫妇投下了大量的心力，可是，他们的收获却很有限。

蒋经国对孝文的管教可说非常的严格，只要蒋孝文犯了什么错误，总是难逃蒋经国的一顿训斥，所以，蒋孝文最怕他的父亲。在长安东路时，侍卫时常在晚上被蒋孝文叫去为他“推”吉普车，吉普车所以要推，倒不是说吉普车出了什么毛病、而是蒋孝文总是喜欢趁着晚上和三五好友一起聚会，那时大概他的玩伴当中只有他家里有车，但蒋经国对他管束甚严，只要蒋经国在，蒋孝文根本不敢乱跑，可是到了深夜，他还是会趁他父亲熟睡以后，偷偷摸摸地溜出官邸，然后要守在门口的侍卫为他开门，而且，为了怕吉普车在院子里发动会吵醒蒋经国，就叫几个侍卫一起，为他把吉普车推到官邸外面的长安东路上，大概推到距离官邸大门有好几十米远，才敢发动引擎，然

后加速而去。

蒋介石对长孙蒋孝文是非常疼爱的，他毕竟是军人出身，孙儿们若是喜欢抡刀弄枪的，那是他高兴的事。而蒋孝文从小就对枪支很有兴趣，从高中时代，只要回到长安东路官邸即枪不离手，经常见他把玩左轮手枪之类的武器，因为蒋孝文这项“嗜好”是老蒋鼓励的，自然没有人敢去制止他。蒋介石不但鼓励他多认识武器性能，还鼓励他去打靶、练枪法，因而蒋孝文更是把手枪当作他随身的宝贝，除了去学校之外，常常见他腰间揣把左轮枪。

某日下午，便衣卫士李之楚刚好下班回到宿舍，一进门，就见到蒋孝文一个人躺在床上耍弄他的左轮枪，蒋孝文看见李之楚进门，就喊了一声：“不准动！”然后把枪口对着李之楚瞄准，李之楚平时也和孝文玩得很熟，以为蒋孝文又是在开玩笑，就随口一句：“唉！别随便拿枪对人乱指，会闹人命的！”蒋孝文大概一时失手，或者是神情有些恍惚，手指突然不听使唤，只听轰然一声，他竟然扣动了扳机，一枪刚好打中了李之楚的胸口，当场李之楚就倒在血泊中，后来送医救治痊愈。还有一次，副官们随侍蒋介石去高雄西子湾，蒋孝文喜欢打猎，也一同去高雄。这一天，他在侍卫的陪同下，来到寿山要塞的山林里打猎。他是一个很爱面子的男孩，去打猎没有什么猎物回家，似乎很不甘心，于是侍卫特地到山里捉了一只山羊绑在地上，让孝文在数步之遥的地方，用猎枪瞄准射击，然后，他就带着那只被他打死的“猎物”状似得意的回到住处，向蒋介石炫耀一番。

读中学的时候，因为蒋孝文不爱念书，成绩考得一塌糊涂，有好几门红字。那时成功中学的成绩单都是用邮寄直接寄给家长，蒋经国在蒋孝文上成功中学之前，曾经亲自交代那时的成功中学校长潘振球，要好好管教蒋孝文。潘振球是蒋经国在赣南时期的部属，自然不敢违拗蒋经国的亲自交代，即使蒋孝文有不好的地方，也不能说打就打、说骂就骂。

每次蒋孝文知道学校什么时候寄发成绩单回家，就通知副官，要他们先收下来，但是，潘振球的确对蒋孝文的在校成绩十分注意，在他连续注意了几个月后，发现孝文成绩每下愈况，这样迟早会出问题，于是，他就写了一封措词和缓的信给蒋经国，向他报告最近蒋孝文在校的情况，以及最近几次月考的成绩，并且，顺便问蒋经国有没有收到学校寄发的成绩通知革，可是，这封信寄出去了好几个月，蒋经国还是一点回音也没有，这时，潘振球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就直接去找蒋经国，亲自向他报告这一连串的事情。

蒋经国听到此事之后，非常生气，回到家里就找蒋孝文追问。蒋孝文知道纸包不住火，只好实话实说，蒋经国真是痛心极了，拿起棍子就朝蒋孝文身上猛打，打得蒋孝文满屋子跑。蒋方良听到丈夫在打儿子，心疼不已，立刻出来制止，蒋经国还是拼命打，急得蒋方良眼泪汪汪，一旁拚命拉住蒋经国。蒋经国无奈，只好放下棍子，可是他余气未消，命令蒋孝文跪在地上不准起来，跪了一阵子，蒋方良心疼，又是一阵哭哭啼啼，硬是要蒋经国饶了孝文，让他站起来。

后来，蒋孝文从美国返台而且已经结婚，可是他的个性并没有因此稳定下来，反而染上酗酒的恶习，而且只要他喝了酒就会出些事情。有次，他出去喝酒解闷，喝醉以后心中一时情绪不能发泄，就开着官邸的一部美制汽车，沿着中山北路一路急速奔驰。最后，因为他那晚实在已经烂醉如泥，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出了一场车祸，把那辆车撞得面目全非，连方向盘都给撞歪了，蒋孝文自己也受了轻伤，门牙全部撞断，满口鲜血，后来只好装假牙。

蒋孝文以盛年就因为酗酒导致血糖过低昏迷不醒，后来虽然急救苏醒过来，可是脑部因而受损。他的一生就这样毁在酒上。在蒋家的嫡子当中，蒋孝文可说相貌堂堂。如果在一个平实的环境中成长，应该可以独当一面，成就不凡，无奈造化弄人。

蒋孝文昏迷后有一天，蒋经国到医院去看望。看着昏迷的儿子，蒋经国不禁悲从中来，不断轻声重复：“ALLEN！爸爸对不起你！”蒋经国的愧疚主要是因为蒋孝文继承了蒋经国从毛夫人遗传来的糖尿病，此岂天命哉？

掌上明珠蒋孝章

蒋氏夫妇的几个小孩当中，最得蒋经国喜爱的首推蒋孝章。

蒋孝章这个生来就眉清目秀的女孩，侍卫人员对她的平民作风非常敬重，这一点，她的特质和蒋经国很像。记得是在她就读北一女中的时候，蒋经国曾经要侍卫和司机接送她上下课，可是，孝章硬是不愿意有人接送，她喜欢一个人骑着脚踏车，从长安东路骑到重庆南路的一女中上学。

蒋经国不放心让蒋孝章吃外面的餐食，叫司机老邹开着小型座车，中午为她送饭盒去，蒋孝章站在校门口，对他怒目相视，待他走过去把饭盒交给她，她说：“你们走远一点好不好？”，司机可以理解她的用意，是不希望被同学视为特权阶级，所以，以后给她送饭盒只将饭盒放在学校门房的地方，然后就在一个角落等看她拿到饭盒，就算完成任务，打道回府。

对待侍卫，蒋孝章从来不会有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在蒋孝章念中学的时代，卫士翁元曾经有一次陪她去西门町的大世界电影院看电影，从那几次的接触，翁觉得她是一个相当平民化的人，和侍卫相处十分有礼貌。她一向坚持不要让自己有太特殊的感觉，更不愿被人视为利用权势。如果她愿意的话，蒋经国当然会给她先生安插职务，可是她从来没有提过这类的要求，可见，她的确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官邸奇女子。

蒋孝章的个性和脾气是相当倔强的，所以，蒋经国在家谁都不怕，就怕他的女儿发脾气，只要是蒋孝章什么事情不愉快，官邸就像笼罩在一片低气压当中，蒋经国真是食不甘味，非要把女儿逗到笑了才算完事。通常，只要蒋孝章发起脾气来，蒋经国偶尔会约好友王叔铭上将到家里来，一起把她哄到台北的空军新生社，一块儿吃顿饭，在轻松的气氛中，让蒋孝章心情缓和下来。

就因为王叔铭将军经常扮演为蒋经国父女解围的角色，所以，曾经一度有人传蒋经国有意接受王叔铭的儿子作为蒋孝章的乘龙快婿，可是奈何两人没有缘分，尽管是父母有意，却无法为这两个青年撮合。后来，蒋孝章去美国进修深造，爱上俞大维将军的长公子俞扬和。

蒋孝章和俞扬和谈恋爱的消息传到台湾之后，在蒋经国官邸引起极大的震撼，等蒋经国亲自向她查证，确实有此事之后，而且蒋孝章还提出坚持要嫁给俞扬和的时候，蒋经国气得眼泪直流，半天说不出话来，而孝文三兄弟更是气愤填膺，直说要去美国找俞扬和“算帐”。后来，为了息事宁人，宋美龄亲自出面为此事打圆场，最后总算在两家各自节制的情况下，让这件事慢慢平息下来。蒋经国后来也接受了这个事实，对俞扬和也不再心存痛恨，接纳了这位女婿。

和俞扬和结婚后，蒋孝章马上改变了自己的角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家庭主妇，在结婚之初，蒋孝章忍受各种来自家庭成员的反对声浪，也始终没有任何的反弹和溢于言表的不满。

蒋介石去世的第二年，有一次，蒋孝章抽空回了一次台湾，记得那次蒋经国曾经在慈湖摆了一桌酒席，请蒋孝章夫妇一起吃了顿饭，后来，她就很少再回来；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就职“总统”，曾经寄了机票给蒋孝章夫妇，可是他们并没有回台湾。

争议不断蒋孝武

1987年12月13日，也就是蒋经国死前一个月，蒋孝武结束台湾假期向蒋经国拜别，当时的种种迹象显示蒋经国病情越来越恶化，可是，现实的环境却必须逼迫蒋经国作出决定，让二儿子蒋孝武远离台湾，而蒋孝武似乎也从医生那儿隐约知道蒋经国的病情，所以，那天中午，他在七海官邸吃过中饭之后，到蒋经国房间拜别，然后红着眼眶走出房间，遇到了卫士翁元，蒋孝武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他有些哽咽他说：“以后父亲要你们多费心照顾了！”说完，就容情憔悴地步出官邸。果然一个月后，蒋经国就病逝。

在蒋孝武很小的时候，蒋介石就讲过，这个孝武啊！眼睛经常动不动就眨呀眨的，可见他是一个“计谋多多”、“鬼灵精”的一个小孩。蒋孝勇小时候手上的零用钱动不动就给蒋孝武给拿去用了。

蒋介石习惯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给一个红包给孝字辈的晚辈作鼓励，有一次，他又发红包了，蒋孝武就跑去蒋孝勇那儿，说：“阿弟啊！你钱要多用。”他劝蒋孝勇尽量用钱，而自己却非常吝惜手上自己的金钱，有一次，蒋孝武中了一次爱国奖券，有人起哄要他请客，可是他就是不愿拿出一部分钱与大家同乐。

蒋孝武的婚姻也是蒋家公子当中，非常不顺利的一个。他的太太汪长诗，父亲曾是国民党驻欧外交人员，和蒋孝武是在留学德国期间认识的，后来二

人相爱就步入结婚礼堂，可是，却因为蒋孝武的个性，而和汪长诗走上化离道路。除了二人的倔强以外，他们年纪太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人的情缘，就是这样奇妙，蒋孝武和汪长诗离婚之后，二人反而成了好朋友，汪小姐每年都会固定的在寒暑假回到台湾，看看她的儿女友松、友兰。

江南案，给蒋孝武政治生命一个相当沉重的打击，这也导致他出国避风头的主因；但也有人认为，蒋孝武出国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在国外比较能够避免外来的一些干扰。让他过一个比较平静的新的婚姻生活。自从和汪长诗离异以后，他展开了他新生活的一页，他认识了一位台湾籍的小姐蔡惠媚，而这位台籍小姐竟然改变了他的后半生。

蔡惠媚本是蒋孝武尚未离婚时女儿友兰的英文老师，她生长在台中的旺族，在经济上，她根本没有必要外出赚钱，可是，上天有意让她和蒋孝武藉着当家庭老师的机会结合。

蒋孝武为了追求蔡惠媚，据说花了 10 年的时间，才感动了蔡惠媚本人和蔡家。当蒋经国明白儿子这次是真心要和蔡小姐在一起后，他才要蒋孝武以蒋经国本人的名义，把蔡惠媚的父母请到七海官邸来，由蒋经国出面在官邸客厅准备茶点招待了蔡家二老，并且藉着茶叙的时间，由蒋经国、蒋方良二夫妇，亲口和蔡家二老把亲事定下来，但是为了尽量减少外界干扰，婚礼决定在蒋孝武驻节的新加坡举行。蒋孝武在新加坡举行的婚礼，蒋经国不可能出国，其他的蒋家亲人也不可能前往，所以，蒋经国特地命令蒋孝勇代表全家，到新加坡去参加蒋孝武的婚礼。

从整个人生经历来看，如果说蒋孝武的性格不是那么倔强，而且不发生江南命案，他是不可能就此从政坛上消声匿迹的，他的个性让他在政治上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局限，更不幸的，在他结束“出使”国外生涯的时候，却突然在一次健康检查中无故暴卒。

蒋孝武死后，蒋家变成一门四寡，这个家族真是多灾多难。

权威代言蒋孝勇

长安东路时代，上面给侍卫们的任务分配是一个人负责带蒋孝武，一个人负责带蒋孝勇，通常，带蒋孝勇的那个同仁是比较辛苦的，除了他的年龄比较小，不好带之外，蒋孝勇的调皮捣蛋是一个重要原因。

蒋孝勇小时候，像是一只猴子，不但玩刀玩枪天不怕地不怕，而且特别喜欢爬树，早上给他穿的是一套新衣裳，下午已经玩得全身是泥，没有一个地方是干净的，更绝的是，蒋孝勇只要出去玩，身上总是到处是伤。

在读军校时，蒋孝勇最怕的人是教育班长，如果蒋孝勇在学校偷抽烟，被教育班长当场抓到的话，教育班长是不会理会他是老“总统”的孙子，照样给他严厉的处罚，硬是叫他连烟带灰一起吞到肚里去，可是，他对军校的校长和高层首长却较不理睬，毕竟，这些人都是他父祖辈的部下，比较不可

能对他有什么太严苛的举动。后来，蒋孝勇在一次训练中跌伤了脚踝，只好办理退学手续，从军校退学后，蒋孝勇又插班进入台湾大学就读。

在表面上，他也是蒋经国最听话、最乖的儿子，他不像蒋孝武那样倔强好胜，也不像蒋孝文那样冲动，所以也比较得蒋经国的信任。

1975年，也就是蒋介石过世以后不久，因为蒋经国的“国政”实在愈来愈繁忙，他自己的身体日渐虚耗，而且蒋经国慢慢发现自己染有遗传性的糖尿病，所以，他开始打算把一部份权力，尤其是私人的工作，放一部份给儿子去分忧解劳。病中，蒋经国指定蒋孝勇当他的代言人。

很多侍卫人员和官邸工作人员，都清楚蒋孝勇的脾气和个性，他是一个十足的两面人，甚至有人说他是个笑面虎，人前人后的表现完全不同。在蒋经国身体状况急剧转危的最后几年时光，蒋孝勇可说是蒋经国最直接的“代表”，所以有人戏称他是“地下总统”，就是在蒋经国卧病那段时候，大伙给他取的绰号。

那时，蒋孝勇每星期二和五，是他向蒋经国报告各种公私杂务的简报时间，因为他可以“上达天听”，所以，很多官场上的人，便不得不藉着各种机会接近蒋孝勇。

目前蒋孝勇在旧金山附近的红木市负责中兴公司在美业务，主要销售电脑，公司不大，约20多人，营业情况不错。询问他会不会到中国大陆发展？蒋孝勇说，就企业的眼光看，中国大陆是很有潜力的市场，但目前他无此考虑。他明白指出，由于身份特殊，“一些事发生在我身上，原来单纯的事，会被视为不单纯。”因此他要特别顾虑原则性问题。

身为蒋家的后代，在近年家族经历重大变更后，他觉得担子更重。他说，“我不是政治人物，但被人视为政治人物；有时我也觉得自己不像生意人，你问我20年后想成为什么？我可保证，那时我一定退休了。”

“我是基督徒，虽不重形式，但心里很虔诚，”蒋孝勇说，“回顾过去，我现在满足的，上苍对我很好。”

在孙儿辈，惟一最让蒋经国疼爱的就是孙女蒋友梅。

早年，蒋友梅还在童年阶段时，那时蒋经国和蒋孝文夫妇尚住在长安东路18号，蒋经国每天回到家来，第一句话必定是说：“友梅！GRANDPA回来罗！”然后进屋抱起友梅又亲又吻，大家也都晓得，友梅是蒋经国除了蒋孝章之外，家中最受疼爱的小孩。后来，蒋友梅长大了，蒋家把她送到美国求学，蒋经国最初当然很不舍得，最后想到儿孙大了本来就是说要一个一个离开的，才满心不愿意的让蒋友梅负笈国外。在国外念书时期，蒋友梅经常抽空写信给最疼爱她的GRANDPA蒋经国，每次来信，蒋方良总是高兴得不得了，拿着信就跑去给蒋经国看。记得有一次，蒋友梅寒假抽空回台湾来看她的“阿爷”，蒋经国真是精神为之一振，病情好像好了一半。有一次，蒋友梅腻在蒋经国的怀里，爷孙俩真是情深无限，这时，蒋经国忽然开口说：“友梅阿！你不要去念书了好不好？在台湾陪GRANDPA好吗？”蒋经国说完，蒋友梅在

他的怀里撒娇说：“不行啦！我还要去英国念研究生哩！”

蒋经国和蒋友梅一聊天总是聊个没完没了，可是年轻人毕竟海阔天空，她终究还是有自己的想法，不会了解祖父的真正心意，也不会明白蒋经国的内心世界是如此寂聊难耐，需要有晚辈在身边作陪。

第四节 章亚若的哀艳情史

美人江山一段情

1987年秋，台北市近郊北安路的大直七海邸里。病痛缠身的蒋经国因高烧而陷入昏迷沉睡中，床边陪侍着的家人与亲信都紧蹙双眉、满面忧愁。尽管这位“中华民国”元首一连串开放措施所表现出来的魄力与睿智广受岛内外的肯定，病魔却毫不留情地侵蚀着他。

昏睡中的蒋经国突然发出一连串模糊的语音，身旁陪侍的人屏气仔细聆听，他似乎在呼唤着一个人的名字——亚若。亚若？是的，是章亚若！时隔将近50年，外表刚强理智的蒋经国，掩不住心中深刻的怀念，在病中昏睡、不自知的情况下，泄露了心中的秘密。

评剧有“游龙戏凤”，电影有“江山美人”，表演的都是同一剧情，是明朝正德皇帝与李凤姐的一段风流韵事，李凤姐虽然只是“一夜皇后”，却是非常凑巧，有了“龙种”在身。后来在产子之后，携着“皇儿”前往北京，可惜红颜薄命，李凤姐在路上染有疾病，竟死于居庸关，小皇儿为正德皇帝收养。

蒋经国与章亚若的一段情，有似“江山美人”，所不同的，正德皇帝是先有江山，后有平民开酒店的女子，而蒋经国则是先有章亚若的婚外情。因身为蒋委员长的长公子，统领江山在望，为不影响锦绣前程，只有牺牲了薄命红颜，留下一对双胞胎。

章亚若原籍浙江，太平天国起义时，她尚在襁褓之中的祖父章伯昌，随着黄姓父母加入太平军，后转战至江西南昌时，因父母病故，被吴城镇章家村当地一户人家收养，取名章伯昌。

章伯昌成年后娶陶氏为妻，生子章贡涛，就是章亚若的父亲。章伯昌以渡船往来于城镇之间，做小买卖为生。50多岁时，因债务纠纷，讨债时遭人杀害，尸体被丢入湖中，始终无法寻获。

章伯昌膝下除章贡涛外，还有两个儿女。老么贡涛自幼好学，长大后步上科举功名之途，连连高中，赶在清末废止科举之前，三元及第，当上地方父母官后，携妻子儿女迁出吴城镇，定居南昌市内，因此，章家自章亚著这一代起，已是地道的南昌市人，吴城镇只是章氏祠堂与祖坟所在地。

章贡涛本名章甫，后以“贡涛”为号。江西简称“赣”，正是“章”加上“贡”；而著名的赣江，也是章江与贡江汇流而成，“章贡涛”意即“赣江之水涛涛”。

章贡涛和妻子周锦华一共生了11个儿女，其中有5名早夭，只有两儿五女长大成人，章亚若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三。章亚若生于1913年，当时中国社会的一般家庭，仍然存着“重男轻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尤其在她之前，章家已连生两位女儿，在奶奶不悦，母亲失望中，章亚若呱

呱落地。原来，那时周锦华已连生了三位女儿。最大的意外夭折；正式排行老大的懋兰是长孙女，奶奶尚能接受，老二懋桃又是女儿，老人家十分失望，小婴儿就被送往外婆家，在舅舅家成长。

第四胎怀孕，周锦华战战兢兢，指望是个男孩。等着，等着，接生婆出了房门，一句“恭喜得了个千金”，粉碎了奶奶满心的希望，怒火中烧之余，禁不住在门外大声责骂生不出孙子的周锦华。

父亲为她取名懋李；“懋”是排行，“李”是比喻桃李争艳的春天，纪念她春季出世的意思。

懋李3岁时，后改名“浩若”的大弟懋萱来到人世；盼孙心切的奶奶宿愿得尝，周锦华也松了一口气，不必再为章家香烟无人接续而忧心忡忡。

尽管不受欢迎，小懋李倒很争气；她有一张秀气的圆脸，皮肤白嫩，伶俐乖巧，活泼可爱，赢得了父母的疼爱。从三四岁起，就跟在爸爸身边学习诗词、练书法。奶妈段会香回忆说，7个姊妹兄弟里，就属懋李与大弟懋萱特别受父母喜爱，姊妹两人排行相近，感情也最深厚。

懋李下面，共有大弟懋萱、四妹懋梅、二弟懋宿、五妹幽兰。抗战前后，懋李决定改名亚若，弟弟妹妹跟着学，引用了她名字中的“若”字。懋萱改为“浩若”；懋宿换成“瀚若”；懋梅原想叫威若，父亲说她出生时，正巧大雪纷飞，第二天梅花开得又挺又漂亮，希望她留住“梅”字，于是懋梅沿用三姊亚若名字中的亚字，改名亚梅。

章亚若懂事后成为家中子女的灵魂人物，似乎是很自然的事；两位姊姊出嫁后纷纷远离南昌，她最年长，又一直留在南昌，大弟浩若负笈山东读大学。家中大小事都由章亚若照料，父亲也极为器重她。1939年左右，已改行当律师的父亲停业，家中收入中断，章亚若与母亲、弟妹的开销，都靠她在赣州专员公署的薪水补贴。

在中学里，章亚若国文程度比同班同学高出很多，她的字迹娟秀、诗词文章都拿手，又能歌善舞，是那时南昌女中的风云人物。

此外，章亚若自学而成的京剧，唱做俱佳。同侪莫不赞叹惊奇。她还爱教人唱戏，亲朋闺蜜只要喜欢京剧，大都被她说服，做了她的短期京剧学生。

章亚若的两位姑妈视亚若这一代章家儿女如己出，疼爱有加，二姑妈章金秀更是与弟弟贡涛一家情谊深厚。她和先生陶百川所生的5位子女，自幼与亚若姊妹兄弟们一同嘻戏玩乐，情感十分融洽。尤其在章亚若的二姊懋桃与二姑妈家的二表哥陶端柏结成连理，亲上加亲后，章、陶两家更是走动频繁。

章亚若结识了不少陶家的远亲近戚。其中，一位名叫唐英刚的年轻人，是二姑妈排行老四的独生女陶端庆夫家的堂兄，章亚若跟着表姐唤他“大表哥”。

“大表哥”身材颀长、体型瘦削，又不多言语，外表看来温文儒雅，颇有彬彬书生的气质。他家中兄弟两人，父亲早逝，一向与母亲和弟弟唐英

武相依为命。但据章家亲属推论，以当年章家的名望与地位，若非唐家家道不错，唐英刚又一表人材，章贡涛不会将家中最宝贝的三小姐亚若许配给他做妻子的。

唐英刚平日好读古书，服饰装扮，与言行举止都保持着传统儒士的风范。1926年间，正值新旧社会交替变换之时，唐英刚算是一位保守的年轻男子，他18岁那年，三表妹章亚若15岁，刚念完初中。她明丽活泼的外表与善解人意的性情，吸引了不少身边经常接触的异性。在母亲与姊姊都早婚的影响下，天真年少的章亚若与唐英刚从表兄妹结为夫妻，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发展。

嫁做唐家长媳后，章亚若所面临的重大考验，是在接受了教会中学新思想教育的启迪后，如何仍能遵照旧礼教的约束，无怨无悔、逆来顺受地扮演三从四德、相夫教子的传统中国女性角色。

外在大局面的变化，也随时冲击世道人心，1926年起，北伐国民革命军讨伐军阀的战事进展顺利，江西省也幸运地挣脱了孙传芳数十年的统治。

在这新旧时代的交替下，赣江流域两旁的江西民众，逐渐自我觉醒，唤起普遍反权威的意识。北京、上海等大都会中，知识分子要求扬弃老旧价值观念的呼声，慢慢传入了江西省城南昌市。

就这样，一股庞大的社会变迁力量，如排山倒海般地涌向章亚若的内心世界。这时的她已由无邪的纯情少女，脱胎换骨成为韵致成熟的少妇与母亲。她先后生了小名“大衍”与“细衍”的远波、远辉兄弟，20岁前后，章亚若外表的妆扮与内在智虑思绪，都随着两位儿子的成长，不时在自我追寻的迷惘与希望中来回摆荡。

经历几番挣扎，章亚若决定迎向新时代的挑战。她足登高跟鞋、烫卷短发，换上剪裁合身的新款流行服装，勇敢地尝试着新社会的各种新事物。

章亚若也试图为她的角色重新定位。她出外做事，在南昌高等法院上班；交游广阔，拓展社交圈；闲暇时携带年幼的儿子看电影、逛街、上馆子，开辟出一个与上一代妇女完全不同的生活空间。

然而，丈夫唐英刚依旧固守着诗书砚墨，满足于长袍马褂、道貌岸然的自持之中。

个性上的歧异，加深了章亚若与丈夫间的情感鸿沟。这段表兄妹亲上加亲的婚姻，终于不幸在丈夫自尽的悲剧中收场。

这年章亚若23岁，表哥丈夫选择自己结束生命，对她无疑是最大的惩罚。

现实生活中，她上有年迈的婆婆，下有7岁、4岁的幼子。一家4口的生活是一大重担；精神上，亲戚朋友间的流言与内心的自责，对章亚若而言更是无尽的折磨。直到今天，关于唐英刚自尽的前因后果，章亚若娘家的亲属，还有很多不甚友善的议论。

唐英刚自尽之后，办完丧事，章亚若便正式迁回娘家长期居住，两个儿子交给婆婆代为照管，但是唐家的生活费用，则由章亚若负责筹措。后来抗

战开始，婆婆也带着孙子跟章亚若同赴赣州。唐、章两家始终维持着亲密深厚的关系。

1939年初，日军攻至南昌城外，章亚若偕同母亲周锦华、二弟章瀚若和侄儿们，拜别父亲，随逃亡潮南下避难。

这时，大弟章浩若已投笔从戎，随军队南征北走。大姊章懋兰与二姊章懋桃都跟着夫家远赴异乡。妹妹章亚梅与二姊一起，也不在身边，小妹章幽兰则是从小就送给昌邑农村一户人家做童养媳了，留在南昌家中的兄弟姊妹，章亚若最年长，因此章家大小事务都落在她一个人身上，父母年事渐高，重要决定也得倚赖她，章亚若成了实际上的一家之主。

章亚若和母亲、弟弟、侄儿们逃难到赣州，初期生活尚可由家中携出的银钱细软支持，但章亚若担心日久坐吃山空，决定出外找工作。而且唐家婆婆与儿子在南昌安危可虑。章亚若计算着，一旦有固定收入，便将他们三人接来赣州团圆。

正在她苦苦思索该如何迈出脚步、突破困境时，新任的赣南行政专员蒋经国入主专员公署，准备大刀阔斧整饬吏治、民风，消息传遍了赣州市，本地和因逃难而来的外地青年，纷纷拥向位于米汁巷的专员公署，表达投效门下的意愿。章亚若便是在这种情形下，进入公署工作。

她脱下合身的碎花旗袍，换上男性化的工作服，过着朴素但充实的战时生活。

另一方面，她的过去也更隐密地保留起来。赣州结识的新朋友中，没有人知道她曾经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两个儿子接来赣州后，特地把他们叫到一旁，嘱咐儿子今后改口叫她“三姨”，莫要再喊以前依南昌习俗而称的“好妈妈”。

儿子年纪小，似懂非懂的答应了。长大后，大衍唐远波推想，母亲可能是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一位守寡的年轻女性，在外工作难免有许多不便。以未婚姿态出现，应该较能减少社会上的是非议论。

唐远波还说，母亲外型出色，二十六七岁的年纪，看起来欲与二十上下的年轻女孩不相上下。说她未婚，没有人会怀疑，若指她已育有上小学的孩子，或许反而让人不能置信。

因此，许多在专员公署与章亚若共事，或一起在赤珠岭三民主义青年团受过训的朋友，都不知道她早婚的过去。后来有人传说，章亚若在南昌嫁过军长、或早年曾与什么人闹恋爱等等，据推测，可能就是从有关她与唐英刚那段不为外人详知的婚姻中，捕风捉影编造而成的。

章亚若在专员公署的工作，分为两个阶段：1939年初春至年尾，主掌文书；1940年前6个月，她加入三青团受训，结训后返回公署，正式担任专员秘书。

蒋经国最有名的每周一次听取民怨，公开接见民众的细节安排，就是由章亚若负责。每星期有一天，她都陪在会客室，指导民众向他们心目中的“蒋

青天”诉苦，并且在一旁做纪录整理、解释说明的工作，是专员工作上的得力助手。蒋、章两人间的恋情；有人推断是在这段期间攀至颠峰的。不过，两人相互吸引，很可能在1939年章亚若进公署上班不久，就慢慢开始了。

章亚若的初中同学、后来又在三青团受训期间与她邻床的桂辉表示，那一年看章亚若插班入干训班，并由大队长及专员公署办公室人员陪同前来报到，就隐约感觉到“不一样”。

后来，在赤珠岭受训期间某天黄昏，章亚若失魂落魄、泪汪汪地向桂辉诉说，她担心她记载自己爱慕蒋经国这件秘密的日记与信件遭同学偷阅，可能传扬开来，惹上麻烦。桂辉至此方才确定章亚若与蒋经国之间的感情。

不论蒋经国与章亚若私下如何相处，在公事上，从章亚若自赤珠岭于训班结训后，至第二年秋，两人之间关系密切，几乎形影不离却是公认的。这一年多，章亚若平素除了在米汁巷专员公署蒋经国身边，做秘书之外，偶尔在蒋方良赴重庆探望公婆时，也奉派至花园塘专员官邸帮忙照顾蒋孝文与蒋孝章。她在那里过夜留宿，一般认为是极有可能的事。

那一阵子，蒋经国经常在赣南地带出差探求民隐，章亚若以秘书身份跟在身旁，日夜相处，也是名正言顺。据说，蒋经国的苏联妻子蒋方良还时常向章亚若请教唱戏之道。喜好教戏的章亚若，一度还认真地做过专员夫人的京剧家教。

章亚若唱戏与评戏的才艺，也深深吸引蒋经国。如今坐落、在赣州公园正门对面的章贡剧院，当时就是蒋经国夫妇听戏度周末的地方。章亚若是公署里少数几个戏唱得好的女同事，有余兴节目时她登台唱戏，有模有样，蒋经国在台下看得如醉如痴，欣赏之情充分流露，旁观的有心人都看得一清二楚。章亚若为什么令蒋经国动心，由于缺乏出自蒋经国的第一手资料，旁人无法确切得知。不过，可以确定蒋经国对章亚若是动了真情。她的温柔体贴、善解人意，撤除了蒋经国的心防，他将留苏日记手稿交付章亚若，又在毛福梅去世后，将她生前最喜爱的一床绣有鸳鸯图案的灰色丝质被面送给章亚若。这种种都代表了他的一片真心。

那床被面，以灰色为底，边上一长条苹果绿底的鸳鸯戏水图面，章亚若视之为珍品，一直带在身边。后来在桂林家中遭窃，章亚若着急得不得了，直到警方帮忙寻回才安心。章亚若去世后，据好友桂辉说，还是她亲手捧着被面交还给神色黯然的蒋经国的。

除了这件被面，蒋经国还曾将一双苏联制手表、奥国制真皮皮夹等战时不易见的珍贵物品，一件件地转送给章亚若。

或许也是出于对章亚若“身份”无法公开的一种补偿，蒋经国虽然未曾公开承认他与章亚若的恋情，但当两人情感发展至高峰时，他已不忌讳在亲近好友面前，公然以行动表明他与章亚若的关系。

喜得双胞胎乐坏小蒋

1941年，一个初秋的夜晚，在赣州市区中正公园右侧文清路九曲巷内，专卖江西风味小吃的张万顺饭馆里，一张八九人座的圆桌前，蒋经国以他一贯略带沙哑的低沉嗓音，招呼眼前的宾客用菜，一旁的章亚若也笑意盎然，殷勤地以女主人的姿态款待身边的朋友。他们是章亚若干训班的结拜弟兄王升、倪豪，专员公署的周姓同事和桂昌宗，当然还有昌宗的妹妹、章亚若的结拜姐姐桂辉。

来宾们知道，章亚若怀了蒋经国的孩子已三四个月了。为避免招人议论，她与蒋经国商量妥当，在身材变形前，启程赴广西桂林，在那儿找一处安静的住所待产。

那天的晚宴，由蒋经国特地出面为章亚若饯行。从当时他所处的环境看，这个举动，是对章亚若极大的礼遇，也意味着他在知道章亚若有孕后，对她地位的某种肯定。

然而，正开始在政界初试啼声的蒋经国，毕竟禁不起流言的破坏与打击，对于他与章亚若之间这段情结的处置，必须分外谨慎小心。

作过蒋经国主任秘书的漆高儒就说，蒋经国在章亚若离开赣州数月后，曾拿出一张章亚若与一女扮男装人士的合影照片，装做若无其事地指着那位“男士”说：“章亚若结婚了，这就是她的丈夫。”

在桂林，章亚若一改她在赣州陪专员四下出巡、探访民情的活跃风格，变得隐名埋姓、深居简出起来。平日交往的人士，除了受蒋经国之托，帮忙照料章亚若生活的广西省政府民政厅长邱昌渭夫妇，和邱的同道知交外，就只有丽狮路住宅的房东、一对陈姓的教授夫妇了。

1942年初春（正月27日），章亚若在省立桂林医院妇产科病房产下一对双胞胎。

由于早产，不足月的小婴儿一出世，就被送进保温箱中，章亚若的妹妹章亚梅日后回忆说，第一眼看到小兄弟俩时，曾吃惊于他们两人体型的瘦小。章亚若顺利产下双生子，立即以电报告知蒋经国。7天后，她出院时，蒋经国特地赶来桂林，在丽狮路欢喜地等待着母子三人回家。

章亚梅还记得，她陪着姊姊乘坐一辆黑色轿车，自医院返回家门，正要抱侄儿下车时，个性活泼的三姊拉住她说，要跟“阿哥”开个玩笑，先不要告诉他婴儿哪个大、哪个小，“要他猜！”

“阿哥”蒋经国也不负众望，他笑着仔细端详了两个儿子后，当即毫无错误地指出谁大、谁小。

目睹这般的父子天伦，章亚若开心极了。她觉得蒋经国是真心珍惜这一对双生子。

章亚梅也感染到这愉快的气氛，跟着顽皮起来，她撇撇嘴，指着婴儿巴掌大的小脑袋说：“看你的这两个儿子，又瘦又小，像小猫咪一样。”

“猫咪？”蒋经国呵呵笑了起来，他低下头对一左一右、拥在怀中的两

个双胞胎儿子喊道：“大猫！小猫！”

就这样，双胞胎得了大毛、小毛的乳名，此后，不但父母、亲友这样唤他们，自懂事起，兄弟俩也一直以大毛、小毛自称。双胞胎兄弟俩满月时，他们的父亲蒋经国来探望章亚若与两个孩子，这次，他还带来了两兄弟的学名：大毛叫蒋孝严，小毛叫蒋孝慈。

蒋经国不仅依蒋家第三代的“孝”字辈分为双生子命名，而且告诉章亚若虽然没有正式婚姻，儿子仍应该姓蒋。章亚若死后，孝严、孝慈交由外婆周锦华照管，为了安全起见，才在他们3岁多，进托儿所前，由章亚若大弟章浩若以父亲的名义为他们报户口，从蒋姓改为章姓。报章姓户口前，周锦华曾设法知会蒋经国，获得蒋经国的同意后，才采行这一无奈的权宜之计。

双胞胎出生后蒋经国频频来访桂林，表现出他对章亚若母子的一片真心。每次“阿哥”来，总是把车子停在老远，再步府走入丽狮路，还没进家门，面庞上就堆满了笑容，直嚷着要抱儿子。章亚若十分珍惜与蒋经国相会的时光。通常在蒋经国神情愉快地逗弄完大、小毛后，讲究情调的她设法安排一段与蒋经国独处的时光，两人在房间里谈笑，话题无所不包，天南地北，似乎永远也说不完。兴致高的时候，两人还会交换字条，以文字交谈。日后，章亚若幽默地说：“大概是写一些怕我听到的情话吧！”

随着儿子的成长与蒋经国的定期探望，章亚若过着幸福的家居生活。她在蒋家的身分虽然仍就阴晴未定，但大部分时间，章亚若都把心思放在双胞胎身上，指望儿子能为自己带来应有的名分和幸福。

章亚若坚持争取名分，主要也是为了儿子着想。她不只一次地告诉妹妹，说她不能让大小毛的身世不明不白。

事实上，这个时候蒋经国的从政之路分外坎坷，正面临着许多障碍。

有不满意蒋经国在赣南强悍作风者，向他的父亲告状，指称这位“太子”在奉行苏联学来的社会主义领导方式。为了平息各方非议，并进一步锻炼儿子的能力，蒋介石打算把蒋经国调离赣南，蒋经国也开始将工作重心放在战时的陪都重庆。这一切，再加上对章亚若母子的牵挂，蒋经国所承受的，无疑是极大的压力。他未尝没有在为章亚若母子合法的身分努力，但是时机显然并不恰当，就在这种复杂的情形下，1942年8月的一天下午，正在赣州为公务繁忙的蒋经国，如晴天霹雳般接到桂林打来章亚若突然病故的电报。

是病死还是被谋害？

章亚若的亲朋一致认为，章亚若并非自然死亡，是遭人谋害死的。他们记得，她去世的前一天，还生气盎然、充满了活力。傍晚，她应邀赴一场晚宴，午夜返家后，感觉腹痛不适，第二天早上进医院治疗，却就此一去不返，死在医院里。关于章亚若的死因，章家亲友自然不免各有猜测，他们惊疑是蒋专员身边的情治人员自作聪明、盲目护主的愚忠行为。

曾在公署任主任秘书，后来赴桂林市府任职的徐君虎就表示，章亚若去世前数周，有两位在赣州专员公署做事的秘书级人员前来桂林，询问徐君虎何处可以借到车子，他们计划载章亚若出游，路经山崖时将她推下去“害死”。徐君虎听后大吃一惊，斥责他们不该有如此自作聪明的害人想法。

两人激动地答辩，指称蒋经国在赣州实行新政，不准人民“乱搞男女关系”，如今却与章亚若有了非婚生的双胞胎儿子，对外如何自圆其说？他们还担心，此事若张扬出去，被人当作把柄，可能会误了蒋专员灿烂的政治前程。

尽管这两位部属“爱主”心切，自以为是地设计着。但徐君虎认为他们不能太嚣张，于是把他们骂了回去，不准他们在桂林做伤天害理之事，没想到章亚若后来还是遇害了。

另一位曾在专员公署做事的漆高儒也有过类似的经验。他同意徐君虎的推测，可能是蒋经国的手下私自行动，谋害了章亚若。

此外，还有人说章亚若之死，是蒋介石派人秘密处置。和所有独裁统治者一样，蒋经国的私生活长期被罩着神秘的面纱，保持着高深莫测的官筛形象，日后自然无法弄个水落石出。

章亚若去世后，据说是蒋经国透过亲信，与“伯母”周锦华商量，请她由赣州迁居至万安，在那里和章亚梅一起照顾孝严、孝慈两兄弟。

万安是江西中南部较贫穷的县份之一，全县中央地带就只有两条交叉的十字街，街上的建筑以两层高的木板屋为主，街头尽处便是赣江码头。这里远离尘嚣、物质条件贫乏，是隐居遁世的好地方。蒋经国选择此地安顿周锦华和章亚梅，以便抚养孝严、孝慈兄弟，一方面是此地较能避人耳目，距赣州又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此地不致遭日机轰炸之故。

周锦华在茫然伤痛之余，要负起抚育两个双胞胎外孙的重担，在这种情形之下，蒋专员有任何安排，她都言听计从了。

双胞胎兄弟虽然不幸丧母，父亲近在眼前又不能相认，两个小娃娃却日益健康茁壮，在万安一年多的时间里，从长牙、学坐、学爬，到迈开小脚走路，成长过程极为顺利，没有任何病痛，使得外婆与姨妈在忙碌中颇感安慰。

1943年冬，周锦华接到儿子章浩若转来的家信，他要母亲准备行李，到贵州的铜仁团聚，因为章浩若即将登上铜仁县长的宝座。

在贵州铜仁的县长官那里，周锦华的生活也获得改善。一向孝顺的长子章浩若不仅请来当地一位苗族少女做丫鬟，专门侍奉母亲的起居，还拨出一位名叫王连玉的传令兵到家中工作，命他协助照顾大毛和小毛。

事实上，孝严、孝慈兄弟随外婆远赴铜仁投奔浩若，蒋经国十分清楚。那段时间，周锦华与蒋经国之间保持着固定的联系，只要是牵涉到大毛小毛的一切事情，都由蒋经国做决定。当然，兄弟俩入学时暂时改姓章，也经过蒋经国的首肯。

1945年抗战胜利，章家返回南昌。这段时期，原任铜仁县长的章浩若奉

调转任辽宁省法库县县长。母亲周锦华不愿与父亲章贡涛自庐山带回的二太太曹上玉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于是由章浩若自东北汇款回家，在距章家住宅两条街外的井头巷，购置了一幢宽敞、设有阁楼的平房给母亲居住。

井头巷因巷口有大井而得名，孝严、孝慈兄弟至今仍记得房子入口处的高门坎和巷口深不见底的大水井。周锦华带着儿孙迁人时，自铜仁时便在章家帮忙的风妹和传令兵王连玉也跟了过去，依旧分别负责伺候周锦华及看顾双胞胎小兄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蒋经国出使苏联回国后，周锦华曾带大毛小毛赴南京与蒋经国会面。曾在赣州专员公署做事的漆高儒表示，他记得有这么回事，但是不清楚蒋经国以什么方式安排与双胞胎儿子见面。

孝严、孝慈名义上的“母亲”纪琛和她的姊姊纪珍，对蒋经国父子会面，却另有一番描述。当时与夫婿住在南京的纪珍说，妹妹纪琛曾奉婆婆周锦华之命，带双胞胎兄弟来南京与蒋经国见面。自1945年底至1949年初，大约平均每隔半年，蒋经国就会通知周锦华，安排两兄弟前去相聚。

每次纪琛带双胞胎赴南京，都借住在纪琛家中，再由纪琛陪同前往蒋经国下榻的励志社附近等候蒋经国的来临。纪珍记得，每当蒋经国的黑色轿车驶近时，纪琛就会催促两兄弟赶快迎上前去，并告诉他们，“那位下车的，就是爸爸。”

双胞胎兄弟获悉身世

1947年6月，国民党政府展开撤退台湾的行动。早在5月上旬，周锦华就接获来自蒋经国方面的讯息，意识到再一次离开故乡南昌，已是不可避免的事了。章家抵台后，选择在新竹安顿下来，据纪琛和章修纯表示，是因为纪琛的姊姊纪珍的关系。当时纪珍和夫婿跟随服务的空军单位来台定居新竹附近。为了亲人能够就近照应，便说服了周锦华前往居住。

周锦华取出自家随随身带出来的钱财，在如今已成为新竹闹区的城隍庙附近中央路上，购置一幢两层楼的简单砖房，供全家居住，展开迁台后的新生活。孝严、孝慈很快就适应了这个又名风城的新环境，与当地的居民打成一片。一直到今天，据说任国民党海工会主任的章孝严，无论因为公务或私人赴新竹，都会到旧居探访，寻觅童年足迹。章孝慈也常前往新竹名胜表草湖，在外婆骨灰安放之处静思默想，藉以排除心中的烦忧。

迁台时，身为一家之主的章浩若，在报户口时，苦心刻意地安排了一番。他向户政机关申报时，将双胞胎报为章浩若和纪琛的儿子，并且将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双生子故意报为相差一岁的兄弟。为了更进一步混淆外间的传言，章浩若将自己两个孩子报为双胞胎。

年幼时，孝严孝慈不明白这里面隐藏着的曲折故事，也没有想到要探其究竟。不过，他俩都还记得，外婆告诉过他们，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并不确实，他们俩真正的生日是农历的正月17日。

章家这种设计安排，除了为双胞胎安全着想外，有人猜想，也是在维护蒋经国的名誉。不过，由于章浩若始终不肯与外甥谈论此事，孝严与孝慈至今仍不明白舅舅的用意与心思。

直到 1960 年底的某一天，外婆突然告诉孝慈，她有重要的事，必须告诉两兄弟。章孝慈至今仍清楚记得，那一天，就读新竹中学的哥哥章孝严因为参加学校活动，外宿不在家。

身体孱弱，饱受肾脏病折磨的外婆，将章孝慈喊到身旁，叫着他的小名“小毛”说，过几天，哥哥大毛回家，她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两兄弟。

敏感的章孝慈立即感受到外婆话语中的不寻常，他没有追问，点点头表示遵从。

过了几天，哥哥回家了，章孝慈转告哥哥，两人私下等着等着，却久久不见外婆提及那桩重要的事情。他们按捺着内心的好奇，以为向来思虑谨慎的外婆必有盘算，所谓“要事”，内情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谁知道，病魔却失去了耐心，不到两个月后，也就是 1961 年 2 月，外婆因病重逝世家中。她阖上双眼远离人世的前一天夜里，两位外孙还向外婆道晚安，第二天清晨醒来，却发现他们相依为命的至亲已安然走完这辛苦的人生之途。

这年年初，他们失去了外婆；年中，两人同时考上私立东吴大学；年底，从王升的口中，确认了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蒋经国。

对于身世，两兄弟都能以坦然的态度面对现实。不过，个性比哥哥内向的章孝慈提及父母和身世时，经常表现得颇为感伤。一位接近他的友人就表示，外界以蒋家第三代称呼孝严、孝慈，孝慈却认为身为庶出之子，实在说不上是蒋家后代。

1989 年夏天接受访问时，章孝慈极为坦白地描述在 18 岁时约略明白母亲章亚著与父亲蒋经国的一段情，以及母亲悲惨的遭遇后，“满心无奈与痛苦”。

那时候，家境仍然清苦，双胞胎注册就读东吴大学，还要靠学校宽容的分期付款政策，才能缴足学费。

双生子推断，他们当年的艰苦，很可能是在政治道途上奋力迈进的父亲所不知情的。章孝严记得 18 岁以前，曾见过王升伯伯至新竹家中仿晤。他每次来访，都将乘的吉普车远远停在巷口，很可能是避免惹人注意。

曾有传言说王升与宋时选受蒋经国之托，代为养育照顾孝严、孝慈。但事实与此差距极大。双胞胎表示，他们直到 18 岁读大学一年级，从王升口中证实父亲的身份后，才结识宋时选。而王升担任双胞胎与蒋经国间的沟通桥梁，也是两兄弟成年后才开始的事。

为了减轻舅舅的负担，自新竹迁来台北住宿念大学的孝严、孝慈，各自以工读与家教等兼差方式，自谋生计。他们也逐渐自王升伯伯的叙述中，了解母亲活泼、外向的性情与出色的工作能力。对外，两兄弟依然不对自己的

身世露出任何口风。章孝严的妻子黄美伦就表示，婚前她根本不知道孝严——蒋经国的父子关系。

章孝严在“外交部”的同事，也都是与他认识好几年后，才间接探知他身为蒋经国亲生子的的事实。

东吴大学外文系毕业的章孝严，是通过外交特考进入“外交部”服务的。学法律的孝慈，则在历经一番曲折后，取得了东吴法学士的学位。

当哥哥孝严立志在外交界寻求发展时，孝慈发下35岁以前全心念书的宏愿。他在美国取得两个硕士与一个博士学位后，返回母校东吴大学教书，那一年，孝慈正好是35岁。

从完成大学学业到就业、成家，双胞胎兄弟的各项经历和发展，据推测，都一一由王升转告他们的父亲蒋经国。但是这期间，政坛仍视双生子与蒋经国的关系为绝对不可公开谈论的禁忌。

蒋经国对孝严、孝慈兄弟的奋力上进感到十分欣慰。孝慈赴美深造的旅费，据说就是父亲补助的。章孝慈的儿子章劲松，与女儿章友菊，均由祖父蒋经国命名。劲松，是与孝武的儿子友松相呼应；友菊，则与孝文的独生女友梅、孝武的女儿友兰，构成一幅“梅兰菊”和谐融洽的美丽图画。

章孝严的三位子女中，长女蕙兰与次女蕙筠也是依蒋家的习惯，以花朵名称为女孩子取名。至于独子、也是老么的章万安，则是祖父蒋经国特别交代，为纪念双胞胎成长之地而取的。

透过这般微妙的命名哲学，蒋经国用心深刻但又含蓄技巧地表达了他对孙儿的祖父爱；也等于非正式的将孝严、孝慈纳入了蒋家第三代的行列中。

章孝严进入“外交部”服务，首度正式外放时，还与父亲有过一段以笔墨沟通的经验。

那时已结婚的章孝严，结束在比利时的法语语文训练，返回“外交部”秘书处服务，完全不明白他特殊身世背景的“外交部”主管，决意派遣他赴旧金山领事馆，正式展开外交官的生涯。

王升传达了做父亲的蒋经国为儿子优异的表现感到的骄傲与安慰，但是蒋经国担心孝严进入华人众多的旧金山服务，可能会引起侨界对他身世的深入探究。

根据王升的描述，蒋经国希望孝严暂时不要外放，继续留在“外交部”，等待日后其他的机会。

一心一意要接受外交官实务工作磨练的章孝严却不这样想。他谅解父亲的顾虑，但也不愿放弃自己的职志。

左思右想后，章孝严写了一封字句恳切的信给近在“行政院”的父亲，央求父亲协助他完成外放美国，迎接外交官生涯挑战的心愿。

蒋经国读信后又惊又喜地满足儿子的愿望。几天之后，“外交部”发布新的外放命令，转派章孝严至华人较少的华盛顿“大使馆”服务。

从旧金山改为华府，很可能是蒋经国的折衷之计。有人判断，章孝严的

书面抗争，非但未曾激恼蒋经国，甚至可能因而赢得了一向具主见、坚持信念到底的父亲更多的疼爱。

在这段插曲之前，“外交部”的官员仍然无人知晓章孝严的身世，外放命令的转变，据说出自当时的“部长”沈昌焕首度确定章孝严与蒋家的渊源。

十分巧合，数年后，弟弟章孝慈也与父亲有过一段书面沟通。

这次，儿子谈的是“高雄事件”受刑人林义雄提前假释的法理问题。据了解内情的人士指出，学法律的章孝慈有勇气就如此敏感之事向蒋经国建言，很可能多少也使得父亲刮目相看。事实上，蒋经国对双胞胎成年后各自在事业上的坚持与努力，感到极为欣慰。接近他的人士透露，蒋经国在世时，曾经表示两位双生子中，哥哥章孝严适合做外交官，日后宜朝政途发展；弟弟章孝慈则以继续留在学术圈闯天下为适当。

前往华盛顿赴任的章孝严确实未负父亲期望，他不仅利用工作之余，夜间进修取得了华盛顿乔治城大学硕士学位，更练就一口流利的英语，成为他在“外交部”逐步上升、平步青云所凭仗的资产之一。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章孝严向长官驻美“大使”沈剑虹请假回国，由王升安排，在祖父灵前行礼致词。他的匆匆返台，引起驻美“使馆”同僚注意，大家这才惊奇地发觉，他就是蒋经国与章亚若所生的双胞胎中的哥哥。

之后没多久，弟弟章孝慈就返台回母校东吴大学任教，逐渐在教育界崭露头角；哥哥章孝严也从“外交部”北美司科长、副司长一路做到司长。

80年代初期，他俩事业上的成就已被大众肯定，但他们与蒋经国的关系仍是禁忌。甚至章孝慈以法律学者身份应邀在电视公司发表短评，也被无故中止。台湾一家具规模的广播电台主管表示，他们曾奉命不可在节目中播出章孝严与章孝慈的声音。那时有名的党外杂志，经常因为刊登孝严、孝慈的母亲，以及他们与蒋经国关系的文章而遭查禁。

一位资深的报社政治记者进一步透露，他曾被“有关单位”叮嘱，千万不能在报端刊载有蒋经国与孝严、孝慈关系的报道。

外界的传言与好奇探问继续不断地围绕这对双生子。父亲与他们也随着时光的逝去，更为父子情深。“中间人”王升奉派“出使”巴拉圭后，孝严、孝慈儿女的成长和家庭都由另一位父亲信赖的亲信代为传达。每年过年、中秋与端午节，双胞胎也都会得到蒋经国的红包赏赐，温情与父爱补偿了他们不能随侍父亲身侧的遗憾。

蒋经国去世前几年，对双生子的思念与关心日益浓厚。

蒋家一位亲信则指出，孝严、孝慈与孝武、孝勇的祖母宋美龄为了融合蒋家第三代的手足亲情，曾刻意扮演协调人的角色。

然而，不论传言如何，蒋经国生前如何处理均已成年的孝严、孝慈与孝武、孝勇间的关系，恐怕也都是外人难以猜测揣摩的。

事实上，自从1942年章亚若去世后，蒋经国似乎就下定决心将这段感情

深埋心底。

徐君虎表示，章亚若病逝桂林年余后，蒋经国有一次前来公办。他陪同蒋经国四处走动，抵达漓江，曾提醒蒋经国章亚若的墓地就在附近，并且问蒋经国是否有意前往祭拜。

“莫要再提此事了！”徐君虎记忆中蒋经国略带慨叹地说完这句话后，即不再言语。徐君虎明白，蒋经国创痛仍在，于是识趣地未再提起章亚若。

另一位曾任蒋经国赣州专员公署干部的人士透露，为了淡化与章亚若育有一对双生子的事实，蒋经国自章亚若逝世后，养成了认养孤儿的习惯。他的众多义子中，有人如今仍在政府单位服务，也有人因行为不检，而被蒋经国断绝了养父、义子的关系。

蒋经国认养这些外人并不知情的义子，据推想，也有转移外界对他章姓双生子注意力的用意。

对于孝严与孝慈，蒋经国始终保持着谨慎的父爱与关系，他从未在公开场合与他俩同时露面，也不轻易与亲友谈起两位儿子。

据章孝严回忆，他预官受训那年，父亲蒋经国首次破例未曾在结训时前去致词并探视受训青年。后来他出任“外交部”北美司司长，也刻意回避了陪同外宾晋见蒋经国的尴尬场面。

有趣的是，在外交职务上表现优异的章孝严，不止一次获颁由蒋经国署名的褒扬奖状。这些珍贵的文件，如今都悬挂在他的书房中。

眼看这一对双生子成家立业、各自有了不错的成就，上了年纪的蒋经国在敏感的政治考虑下，忍受着近在咫尺，却无法与他们共叙天伦的痛苦。这种父子不能公开相认相亲的精神折磨，恐怕也是一般人无法理解和思议的。

尽管如此，双胞胎与父亲确曾私下相会。据亲近人士透露，蒋经国生前，孝严、孝慈曾有经人安排，赴“总统府”探视父亲的经过。不过，关于这一段，当事人孝严、孝慈兄弟坚持列为个人隐私，他们除了公开表示深爱父亲之外，对于如何与父亲相见、相见时的情形，以及曾否以“爸爸”称呼蒋经国等问题，都不容外人探究。

父子相认失去机会

1988年1月13日下午，章孝严与章孝慈则永远丧失了有生之年与父亲相认的希望。

那天傍晚，章孝严正以“外交部”常务次长身份，在“外交部”主持晚宴，接待访台的美国国会议员助理。大约6点半左右，他接到妻子黄美伦的电话，说有朋友告知，蒋经国已在当天下午过世。

章孝严强忍心中哀伤，匆匆结束宴会后，立即设法与弟弟孝慈联系，但始终不能如愿。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当晚将近9点时，台湾的三家电视台先后以新闻

插播方式报道了这则消息。事先毫不知情的章孝慈，突然从电视上获知父亲已经与世长辞后，一度木然。接下来很久一段时间，他与孝严都沉浸在极度的悲伤中无法平静。尽管如此，蒋经国的丧礼以及后来当局举办的逝世周年纪念会等公开场合，都未出现孝严、孝慈兄弟的身影。面对现实的无奈，孝严、孝慈不禁感到哀痛。孝慈偕家人返家途中，就忍不住悲从中来而黯然落泪；蒋经国去世周年，政府要员齐集“总统府”举行纪念大会那天，章孝严取消了公务上的邀宴，闭门家中静思，心情十分沉重。

在1988年7月的国民党十三全大会中，孝严、孝慈与孝勇均以高票获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一般认为是国民党党员将他们对俞党主席蒋经国的敬爱，转移到他的子嗣身上。至此，蒋经国与孝严、孝慈的父子关系也等于首度得到了公开的认可。十三全大会期间，包括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在内的各大报纸，都刊登了以蒋家第三代形容孝严、孝慈两人的新闻报道。

数十年来，双胞胎兄弟敏感、神秘而不能公开的身世，终于拨云见日，不再被悬为禁忌了。

孝严与孝慈悲剧性的家世背景正式公开，兄弟俩固然获得了普遍的同情与肯定，紧接着也面临了社会上近乎苛刻的批评与要求。其中，更有人将他们归类于“权贵”世家，认为这对双胞胎今日各自在事业上的成就多少得利于父亲的余荫。

1988年底自“外交部”常务次长任内转调国民党海工会主任的章孝严，自从1967年进入外交界后，就平步青云，节节上升，有人认为是得力于蒋经国与他的父子关系，章孝严却认为他本身的努力才是关键。

随着海峡两岸交流日益频繁，不但章家亲友获悉了双胞胎兄弟在台湾的名声，浙江奉化溪口镇的蒋氏家族也注意到这对兄弟。根据蒋经国远房侄儿蒋中伟，以及蒋经国母亲毛福梅的一位远亲表示，溪口蒋家认为双胞胎的蒋姓宗嗣地位不容置疑，只要孝严、孝慈愿意，他们愿意协助兄弟俩恢复蒋姓。蒋中伟表示，近两年来，他曾在溪口接待十几位自台湾返回溪口探亲的蒋姓宗亲，他们曾多次提及台湾蒋家后代的现况。而台湾宗亲里，有人认为蒋经国生前未能让孝严、孝慈归宗，是他一生里唯一的遗憾。

蒋中伟并且表示，1949年前后所修订的蒋氏家谱中并未列入孝严、孝慈的名字，将来再修订时，必定建议宗亲将他俩纳入家谱当中。蒋中伟相信，这个做法不仅完成蒋经国的遗愿，“毛夫人的在天之灵，想必也是非常赞成的”。

对于溪口蒋家的接纳和认同，孝严兄弟十分感动，经过多番考虑，为了纪念母亲，两兄弟决定不恢复蒋姓。

蒋家重返大陆第一人

1993年8月23日至25日，第二届“海峡两岸法学学术研讨会”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举行，本届会议由中国政法大学主办，台湾东吴大学法研所协办，台湾访问团成员约 80 人，根据暂订的协议，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及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陈光中担任该次会议主席。

早在 1989 年 4 月间，章孝严、章孝慈兄弟，就曾委托大陆亲友修缮母亲坟墓，墓地型式还是章孝慈亲自挑选的，对此次“寻根之旅”，章孝慈充满盼望。

为了与大陆进行学术交流及了却祭奠母墓的心愿，在台湾当局僵化的大陆政策下，不得已辞去了“国代”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之职，并于 1992 年 2 月接任台湾东吴大学校长。

返回大陆前，章孝慈在台湾接受记者专访时，谈到了自己沉重的身世与感受。

记者问：你将是蒋家第一位重返大陆者，又曾是国民党中央委员，这趟大陆行，有否向李登辉“报告”过？

章孝慈回答说，我已于今年 3 月 30 日向李登辉报告这件事，同时请示 8 月底将赴大陆参加两岸法学会议以及到广西扫墓的预定行程。李登辉同意其参加这个活动，包括到桂林去扫墓。李登辉还说：“孝严担任公务员有官员身份，没有办法去大陆，你到桂林去，要代孝严烧一枝香。”

记者问：外界对章女士的死因传说很多，你是否探询真正的原因？

章孝慈答：没有，我所了解就是当时她得了急病，可能是痢疾，当时的环境有很多条件都不是很好，很可能就是如此。

章孝慈充满感情地接着说：虽然我母亲去世时，我们才几个月大，对母亲已完全没有印象，但是在我的感觉里，我的母亲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一直觉得她好像在我的身旁。记者又问：据了解，蒋“故总统”在逝世前不久，有一次病中曾喊出“亚若”，后来在场的蒋家亲人曾转告你们兄弟，是否有此事？你是由谁告知此事？

章孝慈答：有，我只能说是蒋家“很亲的亲人”告诉我这件事，我听了很感慨，但是我知道我父亲和母亲之间感情是“很真的感情”，我记得第一次见到父亲的时候，心中感觉非常温暖，那就是天生的父子之情。

记者问：你们兄弟是在何时才确知自己的身世？是否如外传在 18 岁时由王升告知？

章孝慈答：那是在念大学的时候，当时王升先生也不是讲得那么清楚，应该说是“暗示性”的；其实我和孝严已陆陆续续从长辈、亲友、甚至是同学的家长已多少得知一些。

接着章孝慈讲述了自己小时候在“没有母亲、没有父亲”的环境成长的过程，他说：外婆实在是很爱护我们两个人，照顾得无微不至，舅舅也取代了“父亲”的角色；但是长大后，总是感觉为什么我没有父亲、母亲，从来就没有叫过“爸爸”、“妈妈”？这是很大的遗憾！

所以，懂事的时候，我就问外婆、舅舅，为什么我没有父亲、母亲？他

们就用各种方法掩饰，或是要我们别问这件事。

如果我在外听说人家讲我的父亲是谁，回去告诉外婆，她就会说：“没这回事，不要听别人胡说八道。”当然我现在可以理解外婆是“用心良苦”。

章孝慈透露，在外婆去世之前，有一次章孝严去参加暑期活动还没有回家，外婆告诉他等孝严回来她要告诉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事”，但是等孝严回来，她又不说了，而在高三暑假，外婆就去世了。章孝慈说：后来我才明白在外婆生前，她曾经很慎重地考虑过，要将我们兄弟的身世说出来，长大我们才懂，她不愿我们在内心产生“不满或不平”的情绪，甚至产生虚矫二气，不好好念书。她的用心就是让我们认定“自己是平凡的人。”章孝慈还透露他们这一对双胞胎兄弟，实际出生年月日是1942年农历正月17日，但章孝严身份证是报的1941年5月21日生，章孝慈则是报1942年1月24日，而“父母栏”的名字则填的大舅章浩若和舅母纪琛的名字。为了怕别人知道双胞胎在这一家，还特地把舅舅的一对女儿报成“双胞胎”，来引开别人的注意力。

章孝慈认为，这是当时外婆和舅舅商量过的做法，所以章孝严曾对他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们两个人的身份证除了性别是对的，其它全部是错的。

记者最后提问：你是否好奇去想了解自己的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

章孝慈激动的回答：对！对！我问过外婆，她说我母亲非常聪明、非常漂亮、很会演讲，很有人缘，而且文章写得很好，字也写得很好。

章孝慈桂林祭妇母墓

9月5日，桂林下着大雨，台湾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在大雨滂沱中，涕泪纵横地完成他为亡母一尽孝思的心愿，而章亚若50年的荒家也终于由其子亲自敬上一柱香。

连续干旱近两个月的桂林，在章孝慈抵达时开始下了大雨，上午10点20分，章孝慈抵达七星区凤凰岭他母亲章亚若的墓地。

章孝慈的亲友们，包括曾在桂林照顾章亚若的大姊章懋兰的子女刘守元、刘守升、刘守邦、刘守桂、刘守昆等人，章亚若二姊章懋桃的儿子陶天锡（由四妹章亚梅抚养成长），以及章亚若的兄长章浩若的么女李忠洁（毛毛，此一小名是为纪念大毛、小毛即孝严、孝慈两位表哥而取），都齐聚墓前。

刘守元表示，这次他们齐聚桂林主要有三个目的；第一、他母亲章懋兰生前一直记挂着三姨（章亚若）的墓和早已失散的一对双生子，这次终于能够晤面，现在章家人就只有小舅子章浣若（现居台北）始终没能联络上，因此这次也要向章孝慈问问舅舅的情况，并带点东西给他；第二、为三姨扫墓，这次“小毛”（章孝慈）能前来，意义特别不同；第三、利用这次机会尽可

能让章家亲友再聚一聚，海峡相隔，此后再相聚不知何时。

刘守桂也说，章懋兰生前一直记挂章亚若的墓地，早在1966年“大串连”时，母亲就要守元、守昆、守桂三个人藉串连到桂林的机会找寻墓地，当时已找到了凤凰岭一带，却没寻获墓地，碍于当时的政治情势也没敢问当地人。1985年确定章亚若墓地后，守桂等兄弟年年都来墓地祭拜。

10时30分，墓前一切祭拜的牲果都已布置妥当，孝严、孝慈两家的全家福照片也被安置墓前。10时40分，章孝慈步出座车，还没走到墓前，即难遏止激动的情绪，以白手绢掩面悲泣，步履艰难。由于雨势相当大，虽有当地政府派人为他撑伞，但不多时，章孝慈仍浑身湿透，脸上尽是雨水泪水。

10时45分，家祭仪式开始，章孝慈在墓前跪立，上香、献果、晋爵，随后自西装口袋拿出亲笔书写的祭母文诵读，数度泣不成声，围拢在旁的亲友们也个个痛哭失声。11时25分，整个仪式结束，章孝慈在墓前焚烧自台湾带来的金元宝、金箔、银箔，但因雨势太大，两个香炉中章孝慈烧的那盆虽勉强可以燃火，但也一再被雨浇熄。

家祭仪式过后，章孝慈已基本稳定情绪，在大雨中环视一周，观察地形，也看看修墓工程的情况，他特别向桂林市文物工作队队长赵平致谢，对章亚若墓地能在急迫情况下修缮完成，深感安慰。赵平说明，当地农民都知道过去这里曾葬有“蒋委员长的媳妇”，所以找寻起来不算困难。

陶天锡也在大家情绪平复后，带着妻子及8岁的孙子和章孝慈正式面对面致意，他慨然表示：“40多年了，终于能见到你。”而章孝慈也与他孙子合影留念。

11时40分，章孝慈与章家亲友在大雨中驱车离去。

章孝严这次没有来。9月5日上午，在章孝慈桂林祭母的同时，远在台北的章孝严同其太太和子女也坐在章亚若的照片前，一直静坐了一个多小时，焚香祭拜。这是他们兄弟有一份来自心中的自然亲情，这次不能和弟弟结伴到桂林祭扫母墓，感到很遗憾。

当日晚间，章孝严在台北从电视上看到了弟弟泪洒母亲墓前时的情景，他心里很激动。期望自己有一天也到桂林祭扫母墓。据台湾《中国时报》说，这次章孝慈是以一位学者的单纯身份到大陆扫墓，也有人建议章孝严可以考虑向当局申请到桂林扫墓，但是章孝严认为目前因有政务官身份在身，不能突破当局的现行政策的规定，以免落人口实。

章孝慈此次大陆行，将可能再度使章氏兄弟的身世乃至母亲章亚若的死因成为热门话题。章孝严说，他们是抱平常心境来看待的。

章孝严说，母亲的死因至今仍有很多的传说，在他和弟弟年轻时，曾听外婆提起，但是也不是很清楚。外婆在他们问起母亲时，曾说过母亲是病故，然而他们感到母亲的死因好像不是那么简单，尤其外婆也有过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表现令他们印象深刻。他说，不过当然也不能排除是病故。

章孝慈这趟“寻根之旅”，从酝酿到成行，费了将近10年。

1942年，章亚若在桂林谜一般地猝逝，章孝严、章孝慈兄弟年仅半岁。半个世纪之后，才在1984年由章家亲友寻获当年仓猝安葬之处，并间接透过管道，将资料、图片转送给章孝严、章孝慈兄弟，探询修墓的可能。1988年蒋经国过世。两岸情势变缓，章孝严、章孝慈遂在1989年透过朋友为母亲修墓，并带回墓地前一撮土，安置在章孝慈的书房。

此次行前，章孝慈在台北每与媒体记者谈及此事，都难掩其刻意压抑但仍不时流露的神伤。对其亲生父母蒋经国与章亚若这段半世纪以来神秘的，甚至混杂着政治敏感的恋情，虽然谅解，却也饱含辛酸。

台湾媒体曾作报道，有一次，章孝慈曾与友人私下感慨：“庶出之子，算什么‘蒋家第三代’！”然而世事灰飞烟灭，当“蒋家”已走入历史，“章家”也才有可能逐渐“淡入”，章孝严以超乎想像地健康态度面对个人身世，他总是说：“这个时代，还讲究什么家族，只需个人努力，姓氏并不重要。”而章孝慈也说：“中国人说，父是天、母是地。没有人会怨恨天地的。”

这份释怀，也只能在他们年过半百之后才能表白。对章孝严兄弟而言，生父经国先生诚如天般，虽日日可见却是无法触及；生母章亚若却是根本的一片空白。他们对生母的印象，只能从祖母含混暧昧的叙说、外界的报道来建筑轮廓。

为了章孝慈扫墓，“章家”人在四散分离半个世纪之后首度有代表性地团聚。章家亲友陆续抵达桂林的有30余人。遗憾的是对章亚若及章孝严、章孝慈照顾出力最多的章亚若之妹章亚梅已于两年前过世，未能一偿她生前再见孝严、孝慈两兄弟的心愿。只有由章亚梅的继子陶天锡（其生母为章亚梅的二姊章懋桃）前来团聚，而陶天锡也出席了桂林各界招待章孝慈的晚宴。

至于其他亲友方面，章亚若大姊章懋兰一家，包括其长子刘守元、刘守升、刘守桂等人均来到了桂林；章亚若长兄章浩著一家则由么女（毛毛）李忠洁代表前来。

在众多亲友中，与章孝慈兄弟关系密切的莫过于同母异父的哥哥唐远波。而唐远波已过世的弟弟唐远辉，则有子女前来。

为了准备这次扫墓，章孝慈行前在台北还特地走访了葬仪社，询问祭拜的相关事宜。在台北章孝慈亲手书写了一篇祭母文，追溯过去50年的生活，自陈“人等视我，身份殊奇；我俩自视，常人无疑”，然而“人逢佳季，团圆可期；唯我兄弟，益感伤悲。我有手足，犹堪扶支；黄泉我母，存问凭谁”，此中悲怀不言可喻。

就在章孝慈祭拜过生母章亚若墓地后，章亚若生前的婚生子唐远波带着自己以及弟弟的子女，也在下午3时抵达章亚若墓地。唐远波情绪相当激动地卧倒墓前，手抚墓碑叫喊：“阿姆，好阿姆！”

这个“阿姆”的称谓，在唐远波十几岁即章亚若生前在赣州工作时，曾被要求改称为“三姨”，抚碑痛哭高喊的唐远波，却再也唤不回自己的母亲。唐远波一再跪倒墓前，顿足叩首，头撞墓碑，几个章家后辈相当紧张，担心

身体不太健康的唐远波承受不了这样沉重的心绪起伏，劝慰他：“能看到坟墓修好，这是一件好事哦！”唐远波悲泣地说：“好什么，活着才好。”

作为章亚若亲生子女，不能为自己的母亲立碑，诚是悲痛；而章亚若追求独立女性生活的选择，仍不能为自己争得世俗中一个适当的名份，也是一种悲哀。

据了解，本来章孝慈的行程想安排与这位同母异父的哥哥唐远波见面的，但因章孝慈的犹豫、唐远波的激动、记者的包围，使得会面的机会渐微，已与到达桂林的亲友见面的章孝慈不讳言对与这位“兄长”见面的事“仍在考虑”，他说：“避免尴尬吧。”

章孝慈在上午扫墓后，下午即前往丽狮路当年章亚若的住所，由于这一带已改为军营，章孝慈仅下车约略观望一会，即转往他与兄长章孝严的出生地，现今第二人民医院。他一路走一路告诉身旁的人员，这是他的出生地，也是母亲过世的地方。稍后，又前往桂林橡胶工技院培训中心招待所与桂昌宗见面。桂是当年章亚若死时唯一守候在她身旁的友人。谈到丽狮路旧居，桂昌宗表示，当年他为章亚若立碑，下款即是用“儿丽狮立”；孝慈兄弟俩出生时，他拍电报到赣州给蒋经国，亦以简单的暗语“丽狮到”来表达。

9月5日晚间，章孝慈在桂山酒店设宴热情招待“章家”诸亲友。从大陆各地赶来相会的章家人除了带来各种礼品，也将他们收藏多年的章亚若的用品：一只奥国制皮夹（蒋经国赠送给章亚若的），一面粉盒小圆镜及一帧章亚若旧照片转交给章孝慈。

章孝慈表示，这一天完成了多年潜藏在心底的心愿，实在深具意义，而且也有一种非常落实的感受，过去对母亲的怀念是抽象的，现在则是具体的，特别是上午走到墓前，真像是走回到母亲的身边。他感慨地说：他回台湾见到哥哥章孝严要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希望尽早有一天我能陪你再回桂林扫墓。”章家人也回忆过去长辈口中的“大毛”、“小毛”，异口同声说：“小毛从小就比大毛更顽皮。”大家对章亚若之墓在荒废多年后能修缮完成，均表安慰。

章孝慈同其母亲的友人桂昌宗相谈时，问到母亲的死因。桂昌宗对于这个谜直截了当地说：“确定章亚若是被谋害的”。

桂昌宗当年跟在蒋经国身边，因为其妹桂辉与章亚若是好友的关系，他也与章亚若建立相当深厚的友谊。并一直受蒋经国之托照顾章亚若母子。由于章亚若死时只有他在身边，因此他一度被传为是杀害章亚若的凶手。章亚若大姊章懋兰就作过如是想，而章懋兰的子女因此也对桂昌宗有些意见，章亚梅后来也一直不与桂昌宗联系。桂昌宗说：“我杀害亚若干嘛？”

对过去这一段往事，桂昌宗并不讳言：“亚若的死一直是我心中沉重的负担与束缚，真是一个谜，到底怎么回事？”他说，最近几年陆续公开的资料与文章有正确的，也有谬误和歪曲的，确定章亚若是被谋害的，把谜解开，让他多年心灵的束缚为之解脱。至于涉案人的层次，他则讲了一段话：“章

亚若死时情况都报告给蒋先生（经国），他既未有过问，也没有追究。当时了解情形，或在周围的人都被调开，由蒋先生介绍到别的地方。也是蒋先生的安排，由王制刚接手，尽速安排章亚若的母亲与两个双生子到万安。”他叹口气说：“唉！故事长得很，讲也讲不完。”

桂昌宗过去曾经写信给章孝严、孝慈兄弟，叙述章亚若死时的经过，由于外界曾有以“桂辉”（桂昌宗妹妹）名义发表的文章，说章亚若还留有遗嘱，章孝严曾以电话和桂辉联系，希望知道章亚若的遗言，而桂辉电话都不敢接；章要约她到香港面谈也被拒绝。章孝慈当面询及此事，桂昌宗表示：“那文章根本是假的，亚若死前连话都来不及说，哪可能有遗嘱。”

章孝慈单刀直入问他：“我母亲过世时你在吗？”桂昌宗表示：“我在，就是我一个。”他并叙述当时情况是，他在接到电话说章亚若不太舒服，即赶往医院，当时他坐在病床边的沙发上，和章亚若谈了半小时之久，章亚若神色很正常，看不出生病的样子。一会儿，护士推着药车进来，医生也要为章亚若注射针剂，当时章亚若伸出右手找血管，还因为血管太细，连戳了好几次都没成，痛得章亚若直叫，改打左手，大费周章地把床拉出墙边，以便注射，这一次注射成功，未料10分钟不到，章亚若就只叫了两句：“不好了，我眼睛发黑！”就不再讲话。

坐在一旁的章孝慈听到此处整个脸色涨红。桂昌宗又说，医生叫去买冰块急救。20分钟不到，他买完冰块回来，病房已挤满了人，他连挤都挤不进去，只能搬张凳子在门口探头张望。没多久，医生拿着病危通知单给他，病危原因是“血中毒”，桂昌宗问他怎么回事，医生只说了一句话：“不知道，还没化验”，就走了。

以后，桂昌宗就受命为章亚若安排后事，他说在挖墓地时非常奇怪地一路挖到大石板，他心急如焚，不多时，竟挖出一个洞穴，而且恰好四方方地可以安置棺木，洞穴中还发现一个鹅蛋般大小的“土蛋”，他当时也默祷好友有幸能躺在这个天然的石窟之中。虽然亲手埋了章亚若，他也不讳言，现在他也找不到墓地了，甚至新修好的墓也还没去过。章孝慈问他：“你也找不到地点？”桂昌宗摇摇头。章孝慈又说，在凤凰岭那儿。桂昌宗凝神后表示，那是对了，当时他们是叫“凤凰山”。

桂昌宗并以“女男人”、“女强人”来形容章亚若。他说章亚若是旧式婚姻的受害者，但非常坚毅地追求新的生活，她和蒋经国的感情也经过相当考验，很不简单。对一手抚养孝严、孝慈长大的外婆周锦华，他也表示：“你外婆是最善良的女性。”抗战时期，流亡学生进出章家，都被周锦华视为自己孩子般的招呼。

他也谈了两桩有趣的小事。他说章孝严、孝慈兄弟出生后，家里为他们请了无数个保姆，每个奶妈都很好，可是兄弟俩一吃，不到两天就没奶了，不得已只有遍寻美援的“克宁奶粉”来喂。听了桂昌宗回忆这段往事时，章孝慈略显尴尬表示：“那表示咱们食量大。”桂昌宗又说：“桂林的奶粉都

被你们吃完了，我买奶粉买到赣州啦！”

桂昌宗又说两兄弟脚掌上有特殊的“龟纹”。这时章孝慈又是一阵脸红说：“我们的脚纹是密了一点。”

桂昌宗与章孝慈的会面，是第一次让章孝慈从长辈口中亲耳听到有关母亲的一切。

章亚若墓地的寻获及重建，也有一段故事。受托整建墓园的桂林市文物工作队队长赵平说，寻墓行动，是偶然听到农民谈起凤凰岭下有一个“蒋委员长媳妇”的墓而起。他听说，章亚若墓原是有墓碑的，只不过1950年被附近几个工作队搬去盖水沟了。

赵平说，章亚若墓原来的碑文，说词不一。曾于1942年协助理葬章亚若的前广西省会警察训练所教育长苏乐民的记忆是，原立的青石碑文为“章亚若女士之墓”；但章亚若生前密友桂辉则说，原立碑文应系“先母章太夫人亚若之墓”，并署名“儿丽狮立”。（按丽儿、狮儿也是孝严、孝慈的乳名）。

关于寻墓的过程，赵平回忆说，1984年，文物工作队奉命将寻访章亚若墓作为文物普查的重点，他们找到当年参与安葬章亚若的李克工老先生。李克工是墓地附近的前广西省会警察训练所第二期学员，在每周例行“搞卫生”时，常被派去打扫“蒋太太”的墓，所以对地形印象深刻。后来还是桂辉依地形认出荒草中的坟墓，地点与李克工所指相同。

9月7日一早，章孝慈再度到凤凰岭下，祭拜母墓，徘徊良久，依依难舍。他表示将再斥资整修墓园；而为了纪念母亲，他和孝严都不会恢复蒋姓。他们兄弟对父母的追恩和怀念，是永远下会改变的。当晚章孝慈一行转道香港返回台北。

章孝慈在北京病倒之后

1994年11月14日10时30分，平平静静的北京友谊宾馆院内骤然响起一阵警笛声，一辆标有“中日友好医院”字样的救护车急速冲出宾馆大门，向东驶去。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立即传到了国台办、海协会和卫生部等单位，台湾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突发脑干出血，生命危急！

章孝慈是应北京大学之邀来大陆作学术访问的，按预定行程，他将在北大作一次学术报告并出席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成立大会。这是他第二次来北京。

与上次相比，由于不受记者围追堵截之苦，蒋孝慈显得轻松愉快。13日凌晨，章孝慈和东吴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家瑞夫妇抵达北京；13日下午，章孝慈前往香山碧云寺拜谒孙中山先生衣冠冢；晚上，北京大学吴树青校长、罗豪才副校长在五洲大酒店宴请章孝慈和程教授夫妇。章孝慈一派儒雅的学者气质，平素烟酒不沾，晚宴上虽然以饮料代酒，但宾主交谈甚欢，气氛十分融洽。

晚上 8 时 30 分左右，章、程回到下榻的友谊宾馆。去年他们二人来京时就住在这家宾馆。据程家瑞后来推测，章孝慈回房间不久就上床安歇，时间大约在晚上 9 时。

14 日 7 时 30 分，程家瑞按事先约定打电话给章孝慈，电话无人应接；到门外按电铃，仍然没人回答。程深感蹊跷，叫来宾馆人员撬开反锁着的房门，房间里的情形令他们大吃一惊：章孝慈仰卧床上，已经完全昏迷，全身抽搐，嘴角还有呕吐物。

北京市急救中心和海淀医院的医护人员立即应召赶往宾馆。经检查，章血压高达 100 到 150 毫米汞柱，意识不清，观测瞳孔不等大，对光反应消失，救护人员为章孝慈注射甘露醇降压。

9 时 20 分，得悉章孝慈病讯的北大校长办公室打电话要求中日友好医院抢救章孝慈。有着多次抢救特殊患者经验的中日友好医院立即启动紧急抢救程序，成立了治疗抢救小组和指挥中心。中日友好医院院长陈绍武教授正在韩国访问，两位副院长分别担任这两个临时机构的负责人。

由于脑出血患者不宜移动，在就地治疗近两小时后，章孝慈 11 时左右才被护送到中日友好医院。以 CT 检查，章脑干部位出血约 10 毫升，生命非常危急！11 时 30 分，章孝慈住进医院重症监护室，这里有先进的医护设备，病人很快就插上了呼吸机帮助呼吸。

12 时左右，北京、天坛、协和等医院的知名脑外科、神经内科和心血管科大夫齐聚中日友好医院为章孝慈会诊。会诊的结论是明确的：患者因高血压引起脑干出血，由于脑干是生命中枢所在部位，病人生存的希望微乎其微。经专家的会商确定，当前的治疗方向应当是：1、防止继续出血；2、尽可能减少脑水肿；3、保护重要脏器功能。

章孝慈的病情引起大陆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台办主任王兆国、海协会副会长唐树备、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分别在 14 日下午和 15 日早上来医院探视。他们作出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章孝慈，必要时可以通过卫生部召集全国一流医生协助治疗。

台湾多家报纸第二天均在显著位置报道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在北京因脑溢血病危的消息。报道说，北京群医正在极力抢救之中，关爱他的人咸祝盼他能早日康复。

章孝慈的妻子赵申德及儿子章劲松已于 14 日当晚搭机赴港并于第二天早上转机赴北京探望章孝慈。

惊悉章孝慈在北京病危，正在美国的台湾“侨委会委员长”章孝严悲痛万分，在接受记者电话访问时，章孝严几度泣不成声，哽咽着说，“今晚仍将依原定计划参加在凤凰城举行的侨胞餐会，然后尽快赶回台北”。但是他担心，自己的身分“很麻烦”，希望能够以“特殊情况”赶赴北京。

对于章孝慈的突然病倒，章孝严说，他知道孝慈的血压比较高，但从来没听说孝慈平日有服用高血压药的习惯。章孝严慨叹地说：“他是太劳累了！”

因哭泣而数度难以继续的谈话中，章孝严表示，章孝慈希望与大陆多方面交流，并办好这次两岸的法学研讨会，为避免身份上的困扰，特别辞卸了“国代”及国民党中央委员职务；去年孝慈到桂林去扫墓时，便这么做了。希望台湾有关部门能在这“特殊情况”下，准他去北京看孝慈。而现在，他最大的期盼就是孝慈的情况能够好转，虽然大家都说情况已经非常危急。

针对章孝严的请求，台湾“陆委会”主委黄昆辉表示，章孝慈是章孝严的孪生兄弟，是至亲中的至亲，尤其现在是生命交关的时候，情况相当特殊，“陆委会”愿意主动表示，如果章孝严提出前往大陆探病的要求，将同意他的申请。

台湾海基会高层则表示，不论是送章孝慈返台就医或其他需要，海基会方面可以随时派人予以协助，但要尊重家属的意思。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说，台湾多位朝野“立委”呼吁当局应本着情理及人道精神，尽速准许章孝慈的兄长章孝严前往北京探视其弟。台湾“教育部政务次长”杨朝祥表示，“教育部”对此事严重关切，正透过管道了解中。

东吴大学教务长蔡仲平表示，校长是昨天接到该校法学院副院长程家瑞由北京打来的电话，才知道章校长住院的消息。蔡仲平说，东吴大学校方定于今天召开紧急校务会议，全校师生都希望校长病情能够好转。

与章孝慈交情深厚的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焦仁和，心情异常复杂。他表示，听到这件事，既震惊又难过。焦仁和表示，1971年，他和章孝慈留学美国，同在南美以美大学读书，住宿就在隔壁。他不但和章孝慈熟，和章的太太赵申德也很熟，两家感情很好。他说，章孝慈的身体很好，经常运动，前一段时间还因运动过度而太瘦，最近稍微胖了一点。

中日友好医院院长陈绍武教授 15 日中午由韩国返回医院主持救治工作。

医院的救护人员 14 日晚彻夜不眠，全力救治，采用先进设备 24 小时监控章孝慈的血压、心电图、呼吸、体温等情况。据介绍，章孝慈的血压 14 日须用药物控制，15 日已趋平稳，不用药物已能自控。

在中日友好医院经过北京多位高级专家的多次会诊抢救，病情趋于稳定，但仍处于危重状态。专家称，章孝慈能否脱离危险，需视今后两天的病情发展，方可作出预测。

据悉，章孝慈住进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后，医院立即成立了以脑神经外科专家、副院长左焕琮为组长的抢救小组，全力救治章孝慈。

章孝慈的夫人赵申德与其子章劲松，在香港搭乘 15 日早上 8 点多飞往北京的飞机，约在中午 12 点多抵达医院。当章劲松出现时，立即受到等待在医院门口的大批记者包围，年轻的章劲松面对记者们各式各样的问题，未发一言，显得不太适应这种记者包围的场面。陪同人士只对记者们表示，“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他说什么。”

就在大批记者包围章劲松的同时，赵申德却从另外一个门进入医院内，

避开新闻界的打扰。

在赵申德和章劲松进入医院探视期间，医院严格看守门户，不准记者们入内采访。期间，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台办主任王兆国、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常务副会长唐树备，同时派人送来了慰问花篮。

15日下午2点10分左右，医院举行章孝慈病情的新闻发布会之时，赵申德和章劲松悄悄地离开了医院。赵申德由东吴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家瑞夫人陪同坐上了同一部车，面对当时在场的少数记者，赵申德同样一言未发。赵申德当日身着米黄色的大衣，头上包着头巾，盖住面部表情。

来自台北“荣民总医院”的医师吴进安15日与北京中日医院章孝慈抢救小组经过一下午会商，决定目前不做开刀手术，但将尽一切努力挽救章孝慈的生命。

章孝慈抢救小组负责人、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左焕琮说，目前章孝慈病情还处于危重状态，但和前日相比，暂时趋于稳定。他沉重地表示，“像这样脑干部位的出血，生存的机会不大”，但进一步发展，要看40到50小时的发展，才能预测有否生存的机会。

左焕琮说，由于是脑干部位出血，不适宜动手术，目前的医疗重点有三，一是防止病人继续出血，二是防止出血引起的脑水肿，三是监护并保护其他重要脏器功能。

刚自韩国匆忙赶回来的中日医院院长陈绍武表示，医院和国家卫生部都十分重视章孝慈的病情，院方将尝试各种有利于患者的措施，包括请老中医会诊。

吴进安是“荣总”神经医学中心副主委，15日专程携带章孝慈的病史赶到北京，与北京的抢救专家会商案情，他对大陆医师的救治过程持肯定态度。

第一位发现章孝慈脑溢血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家瑞表示，章孝慈求生意志极强，在抢救过程中，展现出很强的生命力；同样状况的大出血，一般患者可能很快死亡，像章孝慈这样的严重患者，目前他的血压却不必依赖药物维持。

章孝严的悲情之旅

11月16日，刚从美国赶回台北的章孝严终于赶到了北京。赶到中日友好医院，见到昏迷中的弟弟章孝慈。“孝慈，我来了，希望你能听得见！”

章孝严是在11月16日下午3点20分抵达北京机场的，前往接机的有海协会副秘书长刘刚奇、北京大学副校长罗豪才以及与章孝慈一同来北京的程家瑞；与章孝严同行的则有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庆平、秘书处副处长徐建等人。

章孝慈的夫人赵申德与儿子章劲松在机场通道外迎接，章劲松见到伯父后，当场扑向章孝严身上痛哭流涕，赵申德也与刚下机的女儿章友菊在旁悲泣。

下机后，章孝严即被记者包围，刚开始每逢一问他就回答“谢谢”，连续低声说了三次“谢谢”：“谢谢每一位关心孝慈的人！谢谢帮助他的人！谢谢各方面的协助！”此次来北京前，章孝严在美国波士顿接获消息后，立即飞往台北，只在机场过境室稍事停留，又搭机去香港转飞北京，他一天一夜没合眼，也不吃不喝。章孝严说，此次到北京探视弟弟，不管孝慈能否知道，他只想对他说：“孝慈我来了，希望你能听见！”章氏兄弟自离别大陆家乡，40多年没回来，没想到第一次回来，初履斯土，竟是这种状况下的这种心情。——他哀戚，心情激动、复杂。

近半世纪前，章氏兄弟匆匆远离大陆故居，被送往一个无法公开身世的岛屿。11月16日，这对曾经历过悲苦童年的孪生兄弟，虽然首度在北京会合，但两人却是默默无语，只有孝严望着生命现象渐趋微弱的孝慈。

章孝严曾对友人说起多年前的一段有趣往事。在两人读大学时，有一晚孝慈到他宿舍聊天，两人彻夜畅谈。由于他们孪生兄弟声音极像，第二天上午，隔壁同学一副莫明所以，不可置信地问道：“孝严，你昨晚怎么搞的？一个人自言自语了一个晚上！而且还有说有笑的！”现在章孝严是多么希望这段彻夜长谈的画面，将不会成为“往事”。

下午4时35分，章孝严抵达中日友好医院，在12名保安人员和医院人员的护送下，避开新闻媒体的采访，直接到四楼的加护病房探视孝慈。当看到罩着呼吸器、插着肺气管的弟弟时，多日的思念和忧心，使章孝严泪水夺眶而出。章孝慈的夫人赵申德、女儿章友菊、儿子章劲松更相拥而泣。

章孝严向院方表示已充分了解弟弟病情，十分感谢有关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医疗。

当天下午1点30分，中日友好医院举行了第二次新闻发布会，院长陈绍武指出，章孝慈目前已度过48个小时昏迷阶段，目前出现双侧瞳孔不等大，对光的反射消失，但“生命体征”暂保稳定，未来48小时脑水肿发展将达高潮期，届时可能直接威胁生命，即使存活也是植物人。

说明会由院长陈绍武主持并负责解说，副院长左焕琮、东吴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家瑞、北大副校长罗豪才、台湾“荣总”神经科主任吴进安也出席说明会。

陈绍武说，目前章孝慈仍处“危重状态”，惟脑出血已控制住：章的病发过程会有3个关卡，一是过去48小时的脑部出血，接着是目前的脑水肿阶段，未来第三关卡就是感染阶段，即使度过4到5天的危险期，仍得看水肿的影响。

院方公布的章孝慈病例，体温37.5摄氏度，血压162与93，心跳每分钟67次，呼吸由呼吸机辅助，处危重状态，生命体征暂保稳定，入院时间为11月14日上午10点45分。

接着由副院长左焕琮说明，瞳孔不等大是脑干受损的表现，出血部位有部分脑细胞已坏死，难关仍未度过，如果有可能生存下来，也可能是残疾或

植物人，但目前预测结果还为时过早。

另外，他说，出血后不可避免的脑水肿，会对周围的组织发生严重影响，直接威胁到生命，脑水肿在发病后3到4小时会达到高潮，亦即未来48小时内，届时譬如影响到循环、呼吸系统，就威胁到生命。台湾“荣总”吴进安医师接着说，他这次来北京的目的就是要把章孝慈在“荣总”8年的病史带来，给北京参考，他本人也参加了救治小组。抢救与诊断过程可说完美无缺。10年前章发现高血压，当时章个人认为不太重要，8年前在“荣总”治疗白内障时，血压纪录高压为178、低压为100，在“荣总”治疗一周，此后未回院治疗。他说，高血压病有家族性趋势，但不见得有遗传，不知章孝严是否也有这种病。

台湾东吴大学程家瑞副院长说，中日友好医院院方及时并不断向家属通报病情发展，章夫人对院方目前处置满意，并希望院方采取一切努力治疗。

程家瑞还说，章夫人赵申德刚来时心情比较激动，医院给她做了心电图，结果显示良好，由于一时激动悲伤，眼睛出现于涩，院方已采取措施，另外就是给她保持安静环境，尽量少接触外界干扰。

16日上午国务院司法部长萧扬已探望过赵申德，对章孝慈的病情表示关切，并表示如有需要，司法部将尽量提供援助。

章孝慈流出泪水

在亲人的呼唤下，一直陷于昏迷状态的章孝慈，16日右眼流出了眼泪。

一直陪伴在章孝慈夫人赵申德身旁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家瑞的夫人表示，中日友好医院的医师从医学角度观察，章孝慈昏迷后虽然对外界的刺激没有任何反应，但是太太赵申德在身边呼唤：“你一定要努力，孩子还这么小”，儿子章劲松也在一旁声声唤着：“爸爸！爸爸！”章孝慈16日缓缓地流下眼泪。

11月16日，北京异常寒冷，经过一个晚上雪雨，迷雾中白霏霏的北京城，增添了几分凄冷和沉重。章孝慈的家人及“荣民总医院”医师吴进安等，上午9点多就抵达医院探视。

程家瑞的夫人探视过章孝慈后语重心长地表示，章孝慈已安然度过危险的48小时。

在章孝慈的病情暂告稳定后，其夫人赵申德女士坦率地谈了她之所以这么坚强，完全是章孝慈经常告诉家人，不论将来遇到什么变故，大家一定要坚强面对。

谈到连日来的感受赵申德难抑悲痛之情而数度落泪，她表示，她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在家庭遭受此种重大意外打击时，她陪着重病的夫婿，领着子女们准备度过横逆困境。

赵申德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陪伴章孝慈的这几天时间中，一开始是她整

日和两名子女以泪洗面，尤其是每次进入加护病房看视躺在病床上毫无知觉的先生时，更是泪如雨下，伫立在病床久久不愿离去，夫妻间深情流露，实令在旁照料的医护人员为之感动。

多日来在病房焦虑守候的赵申德说，章孝慈以前在家中常常向他们表示，以后可能会遇到一些难以预料的变故，大家一定要坚强。不要惊慌。

她表示，令人感到安慰的是，遇到这次的突发事情，两个孩子章劲松和章友菊都表现得非常懂事。她说，这是因为孝慈非常爱孩子，所以孩子也懂得应为父亲撑下去。

赵申德表示，章孝慈是一位至情至性的人，深爱妻子和子女，由于自幼生活在困苦的环境中，他对子女的教育也特别注重于能够独立自主，因应各种挑战及磨练。此次家中面临此种意想不到的重大变故，才发觉幸有平日的观念灌输，家人才能以更坚强的态度来面对困境。

赵申德说，她在台湾刚接到章孝慈脑中风消息时，完全无法接受，甚至在搭机赶抵北京时还希望情形不是像医护人员说的那般严重。但一走进加护病房，才发觉情形比想象的还要严重，喊他千遍万遍，仍无法叫醒他，想走近病床轻轻摇醒他，但想起医生的再三叮嘱而忍住了，摸着他的脸颊、他的手掌、看着他在呼吸机辅助下呼吸不停，内心知道他也因挂念着家人，正和病魔缠斗着，他是一位意志坚强的人，他一定会醒过来，再和亲爱的家人说话。

赵申德说着说着，语音哽塞，泪水不断从眼眶流出；一旁的儿子劲松和女儿友菊两人，立即搂抱着亲爱的妈妈低声安慰着。

随着时间的推移赵申德减少和子女相拥痛哭的次数了，她希望她和子女们能像孝慈一样坚强，在未来漫长岁月中，他们将陪伴身旁照料，他们再没有哭的时间了。

目前还在念高中的章友菊，在妈妈的告示下，也将和哥哥劲松一样以选读法律系为目标，日后兄妹两人将循着父亲的步伐，试图完成父亲未尽全功的志业。

在访问过程中，赵申德女士的神情是悲痛、焦虑、难过的，医生说章孝慈要有奇迹才能醒来，这个奇迹，赵申德和两位子女要期盼多久才会到来呢？没有人知道，但大家都希望奇迹能早日出现。

桂林祭母佑弟弟

也许“冥冥中的心灵感应”，章孝严有一个强烈的意愿，要见母亲一面，祈求妈妈保佑弟弟度过危险时期，希望母亲能给弟弟力量和支持。11月17日上午，章孝严和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在北京友谊宾馆一见面，便表达了希望到桂林扫墓的强烈意愿，以便让弟弟得到母亲的庇佑。

章孝严此一愿望，立即得到大陆有关方面的大力协助，当天晚7时便从

北京搭机飞往广州，第二天一早转机飞往桂林，于上午8时30分到达，抵达后，在广西有关方面的接待下，看了他幼时的故居、出生所在的现桂林的第二工人医院。行程中，他多次感慨的表示，这些风景，都是当年他母亲见过并亲身生活的所在，虽然他这次的桂林之行心情十分沉重，但能见到桂林的山山水水，觉得有一分特殊的感情。

11月18日下午3时，身着深色西装的章孝严在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庆平的陪同下来到桂林市郊马鞍山麓凤凰山脚下母亲章亚若的坟地，心情复杂的章孝严步上坟前，在深深的三鞠躬后，即跪地声音哽咽地细语着：“母亲，孩子孝严来看你了。”

他流着泪低喊着母亲说：“母亲大人，我回来看您，我来迟了，求您保佑孝慈弟弟平安度过难关；您的养育之恩，50年来我们无时不思念！”章孝严在墓前连连磕头，长跪不起，几度痛哭失声。

伴着章孝严沉痛的哀伤，墓地默默地起风了，焚化的纸钱被风吹得旋向山间，群山静默，仿佛冥冥中的亡灵已经知道孝子的心意。

祭拜仪式后，章孝严在离去前表示，此次祭拜母亲墓除了却了心中一项夙愿外，最希望的是，祈求母亲保佑弟弟早日脱离危险。他并向在场记者表示，待孝慈病好之后，两兄弟一定一起前来桂林为母亲扫墓。

由于章孝慈近几年来积极地致力于推动两岸交流，他的病危也惊动了两岸，台湾报刊每天均以显著位置报道他的病情，台湾的一些亲朋好友甚至准备发起募捐活动，以便应付日后庞大的医疗费用。蒋孝武的遗孀蔡惠媚也不断打电话给孝严的夫人黄美伦探询病况。她说，大家是一家人，如果需要帮忙，一定义不容辞，在章孝严准备飞往桂林的同时，在台湾东吴大学的校园里，出现了感人的一幕——近千名师生为他们的校长祈福。

11月17日中午时分，台湾东吴大学校园里一群学生和老师面色凝重地步入校区的安素堂。偌大的安素堂里，挤满了近千名关注章校长病情的教职员和学生，会场外的桌上摆着数十对纸鹤，他们吟诵圣诗，默读圣经，盼望校长能够度过难关，平安地回到学校，他们希望校长能够勇敢地对抗病魔。在安素堂摆着一架录音机，台湾东吴大学校方要把全校师生对校长的关心，用录音带传送到北京的中日友好医院。校区的公布栏和部分大楼的墙上也都贴满祈求校长早日康复的海报：“亲爱的校长，祝您快快康复，我们大家等您回家。”也许是章孝严哭泣感动上天，让章亚若的魂灵来保佑章孝慈，11月19日下午当章孝严一飞回北京，就得到了孝慈度过三天危险期，完全可以自主呼吸的消息。虽然章孝慈还未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却足让亲友们那紧张的心松弛一下，原本只愿守在弟弟身边、无心与外界接触的章孝严现在终于可以见见从昆明、广州来探视孝慈病情的4位表姐妹们。章氏兄弟的表姐刘守桂表示，去年章孝慈返乡扫墓时曾与亲友们恳谈，席间章孝慈一直很开心，并说那天是他笑的最多的一天，没想到现在竟会发生中风意外。

经过与医院协商，章孝严和赵申德决定将孝慈接回台北继续治疗。

11月21日章孝严打道回台北，在中日友好医院他哭着对弟弟辞行：“孝慈，我们会在台北等你，要把你带回去，请你放心。”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上午到医院为章孝严送行，表示会继续尽一切力量协助。章孝严对此行的观感，认为大陆给予相当大的照料协助，非常感谢，这趟首度大陆之行，各方面感觉也非常正面。

临行前，章孝严在百忙中抽空到北京市郊香山碧云寺孙中山先生纪念馆拜谒，海协会受海基会委托制作了一座花圈放在孙中山先生石像馆内。章孝严向国父石像行礼致敬后，并前往孙中山衣冠冢鞠躬，随即返回医院探视弟弟。

他在孙中山先生石像馆内很少说话，只问国父手上拿的是什么稿纸吗？海协会副秘书长刘刚齐在一旁不断解释，接着章孝严在石像旁国父孙中山先生“致苏联遗书”石墙前伫立良久，细细端详国父逝世前一天口述的遗书内容，之后再鞠躬。

章孝严回医院时，海协会唐树备副会长稍早已抵达医院会晤家属，再度探询章孝慈的病情，两人又联袂前往四楼加护病房探视孝慈。

据台湾东吴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家瑞转述，当时章孝严见到弟弟就泪流满面，显得非常伤心，他对弟弟说，“孝慈，我们会在台北等待你，请你放心，我们会把你带回去。”在病房待了将近半小时。

唐树备先行告辞离去，他是来看孝慈的，刚巧孝严也在，聊了一下。他说，孝慈卧病是不幸的事，目前病情稳定了，希望他会朝好的方向发展。孝严先生对大陆抢救孝慈的努力表示感谢，也感到这次事件对双方的合作、理解有正面帮助。

章孝严约在12点离开中日友好医院踏上回台归途，临行前他说，这次我弟弟发生此事，大陆给予相当大的照料协助，我们家属都感到很满意，对各位的关心我表示感谢。至于这趟首度大陆之行，我的观感包括环境，都是非常正面的。

同行返回的有章孝慈子女章劲松、章友菊、程家瑞及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庆平。

章孝慈平安飞离北京

由于北京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关注，中日友好医院和国际SOS援助公司11月23日整夜都在医院和机场做准备工作，连最微小的细节都不放过。医院甚至准备了一张“行程表”，完全“按表操作”。

24日早上7时10分，50多名保安人员先在医院大楼门口分配任务，并划好警戒线，严密保护运送行程。

7时30分，“六人医疗小组”进入四楼加护病房，开始做准备工作，8时02分病人抬上担架，准备运送仪器，8时16分上电梯，8时20分下病患

专用电梯，抬病人上救护车，共费时 28 分钟。

8 时 26 分，10 名医护人员推着章孝慈的担架床出现在门口，立刻引起现场记者骚动，由于室外气温约在摄氏 0 度左右，院方将章孝慈全身用白布紧裹着，只留呼吸和抽痰的管子。8 时 28 分，气垫式担架床固定在车上后，加护病房的李刚医师为章孝慈打开盖脸的白布，开始更换车上用呼吸器和管线。可清楚地看到章孝慈的脸色红润，双目紧闭，切开的气管中插着几支管线，护士们正忙着在点滴管中注射新的药水。

8 时 30 分，救护车准时离开医院大门，往机场的高速公路驶去。一路上警察在各个路口做了疏导工作。

9 时整，救护车到达北京机场旧机场停机坪，一架国泰三星式客机早已停在南楼附近。2 位国际救援组织人员导引车队停在飞机旁。9 时 17 分，国泰机组人员，同机回去的家属赵申德、张丽等人开始将行李搬上飞机，家属们并向到机场前去送行的有关人士握手道别，赵申德再三向中日友好医院院长陈绍武和北大副校长罗豪才道谢，感谢他们多日来的照顾。

9 时 30 分，随行家属和台湾东吴大学的 3 位教授、“荣总”吴进安医师等 8 位台湾护随人员登上飞机，不断向送行的人挥手。9 时 40 分，章孝慈被推下救护车，以升降机上了飞机。经过近 1 小时的准备，这架专机于 10 时 20 分开始在跑道上滑动，10 时 30 分起飞离开北京。

据悉，24 日上午负责治安的有北京市交通局、国家安全局、公安局人员。到机场送行的则有国台办、国家教育委员会、卫生部等官员及北大等人士，海协会也派人自医院一直送到机场。

下午 1 时 25 分，专机抵达香港启德机场停留 24 分钟，飞向桃园机场，于 2 时 41 分安全降落 5 号跑道后，随即滑往航空货运站 1 号机坪，全程飞行 4 小时又 11 分钟。

专机停妥后，章孝严夫妇、“陆委会副主委”高孔廉、海基会秘书长焦仁和及章孝慈的儿女章劲松、章友菊均至机坪接机。

3 时 10 分机门启开后，章孝严首先代表家属登上飞机向全程照顾的 6 位大陆医护人员致谢，并口头正式邀请下机休息。

接着大陆医护人员开始为孝慈检量血压、脉搏，一切正常。值勤餐车随即升高至机门，将孝慈活动担架移往车内，缓缓下降至地面转移到“荣总”救护车上，并在大陆及“荣总”两位主治医师及护理人员陪护下，由一辆警车开道护送台北“荣总”医院。其余大陆医护人员及家属则由另一辆救护车和小型巴士送至台北。一位随机医护人员表示，国泰专机由北京经香港至桃园机场虽经两次起降震动，但机身都十分平稳，对病人未造成任何不良影响。

随机陪护照顾的大陆 6 位医护人员，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左焕琮、主治医师赵晓光、李刚、吴丽娟，护理长王兰茹、护士王岚及病人章孝慈与陪护返台的家属等乘车奔往驻地。

下午 3 时 58 分，载送章孝慈的加护型救护车急速驶进台北“荣民总医院”

急诊部前，从车上下来的医护人员快速而小心地搬运下章孝慈。

24日下午，警笛声由远而近，在“荣民总医院”静静等待最敬爱的“东吴爸爸”章孝慈的东吴大学师生，这时候忍不住高声大喊：“校长，您一定要醒过来，听我们和您说话！”有些师生轻声吟唱圣歌，传达对校长的祝福。更多的师生手中拿着红布条、海报，都写着“东吴爸爸，您一定要赶快好起来！”

在23日下午2点钟“荣总”的急诊室路口两旁，就有东吴大学的师生手持“感谢上苍，章校长平安返台”、“感谢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及北京大学之协助”的红布条，以及对校长寄以无限祝福的海报，等待章孝慈回来。

24日早上“东吴”学生又在校园发动捐款，短短一小时，募得3.9万元台币，这项校园募款会持续到12月3日。陈瀚权说，希望学生的这份心意对校长有帮助。

3时，游览车载来东吴大学120名教职员，他们也加入等待行列。当知道章校长已经在往“荣总院”的路上时，这才放下心来，他们说，章校长是一个全心全意为学生的好校长，他们希望上苍保佑章校长赶快起来。

从新竹赶来的章氏兄弟的老邻居戴先生说，他帮章孝慈卜了个卦，卦上说章孝慈一定会好起来，在10天内就会醒过来的，他衷心希望上天能保佑他的邻居。

3时55分，载着章孝慈的救护车终于驶进了“荣总”。

在章孝慈被送进加护病房后，学生们表示，他们会每天派人来看一看校长的病况。学生会也准备将师生的祝祷、问候录制成录音带，请人送给在病榻上的校长听。

随后，焦仁和、高孔廉、李庆平都到医院向章孝慈的家属表达慰问之意。4点15分曾将章氏兄弟自大陆带往台湾的“国策顾问”王升将军赶到医院探视章孝慈的病情。

5时35分，蒋孝武的太太蔡惠媚来到加护中心，和赵申德、章孝严等相互轻拥表示慰问之意后，在章孝严夫人黄美伦陪同下，进入加护病房探视病人。

到病房探视过章孝慈的东吴大学董事长王绍育表示，有关章校长的医药费问题，学校会全力配合到康复为止。

与章孝慈受到热烈欢迎的气氛成对照的是，章孝慈的夫人赵申德女士心情仍较沉重，她下午4点进入加护中心，直到6点30分才在章孝严及其夫人，一双儿女陪同下，缓缓的步出加护中心大门。她强忍着内心的悲痛说，回到熟悉的环境，心里虽踏实了点，但对章孝慈的病况，她的心情只有用“焦虑”两个字形容。现在的心思都放在先生身上，下一步要怎么走，还没有想到。

赵申德说，从大陆到台北，这10多天的日子，她的身心已快受不了。回来后要好好的静下来想一想，谢谢外界对章孝慈的关心，是否需要外界的帮忙，她要想一想再说。

赵申德也代仍在昏迷中的章孝慈向迎接他的“东吴”师生说谢谢。当 24 日下午运送章孝慈的救护车抵达“荣总”时，现场众人焦点都集中在章孝慈，赵申德静悄悄的走下车，向排列在走道两旁的教职员表达谢意。

到了台北“荣总”，赵申德与家人一路紧随进入中心，等待大夫会诊病情。下午 5 点钟赵申德和儿子章劲松、女儿章友菊，章孝严夫妇，以及当年将两兄弟由大陆带到新竹的王升将军进入加护病房探望章孝慈，5 点 10 分走出病房。

11 月 24 日下午 4 点，在各种医疗器械围绕和医护人员的小心呵护下，章孝慈历经了大陆、香港到台湾的震荡旅程，来到设在二楼的加护病房。

下午 4 时 15 分，监视器上的血压值显示收缩压掉到只剩 70 毫升汞柱，距离刚下机时的 170 整整差了 100 单位，显示章孝慈此时的血压极低，他的脑部有缺氧危机，生命征象将受到影响：而鼻胃管又抽出咖啡色液体，显示可能有胃出血情形。医护人员不敢丝毫懈怠，开始全力急救。

以章孝慈这样生命随时系于一线间的极度危急状态，竟能够平稳地撑过漫长的旅途，这是相当难得的；事实上，从章孝慈 11 月 14 日在北京发生严重脑干中风开始，这趟回家的旅程究竟能否成行就处处充满变数，只要回家途中有任何突发情形无法处理，都可能是致命的危机。

现在章孝慈竟能一路尽量维持着生命迹象回到台湾，实是个奇迹。有许多医护人员私下表示，这除了医护人员全力的抢救、章孝慈的身体情形不错外，也许有些事不是科学能完全解释的吧。

此次章孝慈脑子出血，而出血点又有 10CC 大，单就中风的位置和出血点大小看来，存活机率已是极小。

“大约 100 人中只有 7 个人可以在这样严重中风后的一星期内存活下来。”台北“荣总”神经医学中心副主任吴进安表示，“能存活下来相当不容易”。

与章孝慈经常接触的朋友和学生都认为他毅力惊人，这样的毅力，除了表现在行事上，也与生理状况相应合，这也使得此次照顾章孝慈病情的医护人员印象极深。

8 年前，他在“荣总”进行左眼白内障摘除手术时，收缩压就已高达 230 毫米汞柱，舒张压也达 130，对一般人来说是相当危险的。但这些年来，由于并没有症状。他可能也已习惯高血压的情形，每天还固定跑 5000 米，做各项运动。医师评估若非毅力惊人，危险的情形可能早已发生。

在章孝慈进入台北“荣总”加护病房发生危急状况后，现场气氛一片紧绷，医护人员赶紧给予补充水分和紧急使用升压药物多巴胺。负责照顾的一位医师表示，“总不能给外界印象一回到台湾病情就变坏了，一定要尽一切可能抢救。”

一路照顾章孝慈的吴进安表示，章孝慈的血压调节中枢功能早已受到严重影响，在大陆时也曾发生过 3 次急速降压、生命危急的情形，在从大陆出

发前，也随时有应付各种状况的心理准备。

之所以到台湾后会发生血压急降的情形，吴进安评估是因为长途飞行中一直给予升压药物，药物的利尿效果使得缺水情形严重，再加上本身营养状况不好，水分维持更不理想，才使得血压急速下降。幸好这样的危急状况并未发生在已到加护病房一切都定位后，否则危及生命的程度将更加剧。

在医护人员的全力抢救下，章孝慈的血压回升，虽然还是有波动，但情形已较稳定。收缩压维待在 140 到 160 毫米汞柱间。医护人员表示总算度过难关。

12 月 5 日，章孝慈撑过了医师预测中风后 3 周的危险期，确定可以较稳定地存活下来。但其意识仍然维持在最初被送到中日友好医院的重度昏迷状态，医师希望藉由营养补充，帮助他恢复较好的生理状况。

医生预测，感染问题是这样的病人迟早会碰到的情形。由于章孝慈最近的痰较浓稠，口腔气管内管的抽痰效果不佳，医师将为他再做一次颈部的气管切开术，安装颈部气管插管，等情形稳定，再转往一般病房。据“荣总”吴进安指出，章孝慈已度过一周的危险期，但“植物人状态”并未改善，甚至较一般植物人的情况还差。

不论章孝慈是否知道外在的一切纷扰震荡，但关心他的学生、朋友和亲人，抱持着对他的了解，对他以往一贯坚毅的强烈信心，一心期待着奇迹会出现。

第五节 蒋纬国难撑家门

身世之谜流传政圈

蒋经国去世之后，国民党上层进入了一场隐密而细致的权力角逐。在这场争夺战中，身份微妙且尴尬的莫过于“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蒋纬国了。

蒋家近60年来，都是国民党政权的一股主导力量，在蒋经国这位“政治强人”过世后，如果蒋家立即一蹶不振，无异是对蒋经国父子两人近60年统治的一次劣评。所以，蒋氏家族及拥蒋人士，不管是从面子上还是从自身的利益考虑，都势必推出一个自己的代表人物。

在蒋氏家族的成员中，宋美龄虽然还是所谓的“大家长”，但她已年过九旬，连走路都有困难，更不堪身膺重任。况且，当时岛内外不少传播媒体大做文章，将箭头指向宋美龄，使她的形象大跌；即使身体健康还能承受繁重的工作，恐怕也不能被朝野所接受。

蒋经国的长子蒋孝文，卧病已久，形同废人，在政治上早已宣告“死刑”；次子蒋孝武，一向神秘兮兮，外界有许多传闻，不堪入耳，江南命案后又外放台湾驻新加坡商务副代表，职位不高，纵使国民党“十三大”后能奉调返台，也不可能挤入权力核心；三子蒋孝勇，当时被民进党“立法委员”吴淑珍抨击得体无完肤，不但在政治上毫无资本可言，恐怕在经济上都不易有立足之地。

至于章孝严、章孝慈两人，在“法律”上还不能算是蒋家的人。况且，以章孝严的才华，在仕途上几乎已登峰造极，难有更上一层楼的可能；章孝慈虽然很想从政，但尚未踏出第一步，或许将终老于学术界。

所以，在蒋家成员中，蒋纬国是唯一可以“栽培”与“拥戴”的人物了。如果蒋纬国在国民党十三全大会后能够成为新的权力重镇之一，则蒋家第三代尚有可为，否则蒋家在台湾政坛上将谱上一个永久的“休止符”。

由于“任重道远”，蒋纬国的动向倍受注目，就连他往昔仅流传于政论圈的身世之谜，也一夕间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料。

有关蒋纬国并非蒋介石亲生骨肉的传说，早在海内外流传，但有的是以讹传讹，有的是穿凿附会。

蒋纬国自解身世谜

打从蒋纬国少年时代，就有不少关于他身世之谜的传言。多年来，这些传言不断困扰着蒋纬国本人，也同时困惑着对蒋家家族内幕有兴趣的人们。在蒋介石前妻陈洁如的《我做了七年的蒋介石夫人》中，就影射蒋纬国是日本女子美智子带来的小男孩，并且认为蒋纬国的身世，和戴季陶脱不了关系，而不是蒋介石的亲生子，蒋介石只是代为抚养。

台《时报周刊》记者就此向蒋纬国求证，他答复时举出该书内文一处明显错误说：“当时（6岁时）我住在溪口老家；我在苏州念东吴大学附中与理学院时，已是1927年以后的事！此证明这本书纯属他人刻意虚构，陈（洁如）决不会弄错的！”

其次，谈及陈洁如回忆录中有关的称呼问题，蒋纬国说：“在那个时代，一个年轻女子绝对不会对一位年长许多的男子直呼其名，陈称我父亲为‘介兄’，作为一个受过中国早年时代教育的女子，她怎会如此不礼貌。我很熟识她，她决不会如此粗鲁。”

许多流言指出，蒋纬国真正的生父是戴季陶，由于流言甚嚣尘上，当年蒋纬国自己都怀疑，蒋介石到底是不是他的生父，可是，慑于蒋介石的威严，蒋纬国又不敢问，只好向待他一向亲切的戴季陶求证。于是，发生了一幕有趣但是极为严肃的画面：

“那是1940年底，我刚自德、美留学回重庆，在偶然间见到《亚洲内幕》一篇文章提到我的生父是‘中国一位姓戴的部长’，于是，我就去问我的义父戴伯伯。”

“戴伯伯就拿了一张挂在墙上的父亲的照片，又拿了一面镜子，他把镜子摆在中间，一边是父亲的照片，一边是戴伯伯的头像，‘你看看自己是像那边还是像这边？’他当时就用这样的方式答复我。”

记者就此继续追问：“你觉得你是像谁呢？外界始终认为你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哲嗣，你的了解是如何？”

蒋纬国又不急不徐地说：“要说像的话，我像父亲（指蒋介石）……不过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我始终认为没有澄清必要，因为这两位都是我最尊敬的。哪一位是我父亲都是我的光荣，所以我并没有什么认祖归宗的问题。”

社会上还有一些“内幕”消息，指当年戴季陶和蒋介石两人因情同手足，所以曾经有过约定，彼此易子而教。也就是说，戴安国是蒋介石的亲骨肉，而蒋纬国则是戴季陶的儿子。

谈及这个传言，蒋纬国笑说：“这简直是荒谬的说法！我是戴季陶先生的义子，他是我义父。安国哥并没有拜我父亲为义父。他在我家就像我们自己家里的弟兄一般，他比我哥哥（指蒋经国）小三岁，比我大三岁。戴安国这个人从小就是我的偶像。”

“我有生以来一直是在蒋家长大，我要继承蒋家的香火，戴伯伯是我的义父，他唯一的儿子安国哥已经过世了，我当然要替戴安国哥完成作后代的责任。”蒋纬国有这种尽“义子”孝道的孝心，可以从另外一篇文章中看出一些端倪，这篇名为“戴传贤先生——我的亲伯”（按戴传贤即戴季陶）的文章中写道：

浙江湖州称呼“义父”为“亲伯”。戴传贤先生与先君（指蒋介石）有金兰之宜，且属通家之好。因此，我从小就秉先君之命，拜传贤先生为“义

父”，并常常依偎在传贤先生的膝下，翘首昵亲尊称他老人家“亲伯”。

在名义上，戴季陶是蒋纬国的“义父”，可是，戴对他的情分却是有异于其他义子女，这可以从蒋纬国的一份自述中看出一些真情：

“戴老先生曾经收了 100 多个义子女，包括欧美、亚非、日本和中国，但我知道我是他老人家最疼爱的一个，因为我有最多的时间和机会接近他，所以，他传教给我的学技最多。”

至于有关戴季陶和日本的因缘，也可以从蒋纬国的这篇文章中看出一些梗概。

戴季陶在日本读书三年，经常靠同学接济度日，故不得不提前回国。戴回国之后，多亏上海闻人张静江的接济，才得以生活无虞，而张静江亦是蒋介石的恩人，为此，蒋戴两人便得以结识，并且成为莫逆之交。

不论外间的传言怎样，也不论蒋纬国到底是不是戴季陶的亲骨肉，蒋纬国和戴季陶之间的情感深厚是不争的事实。

当年，戴季陶不知是不愿和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还是另有隐情，竟然在广州等候蒋纬国为他安排的船只到达之前，被发现死在某一旅馆里，死因扑朔迷离。

据蒋纬国的描述，“亲伯的死因，引起许多猜测和议论，有人说他老人家是自杀身亡的，因为桌上和床上都发现了安眠药。当时我并不在现场，不过事后听别人描述现场情况，我肯定地认为亲伯不是一般传说的自杀，而是心脏病突发过世的。”

在行事和为人性格方面，蒋纬国受到戴季陶相当程度的影响。例如，戴季陶在佛学方面的研究、在战略以及为人方面，或多或少给蒋纬国正面的影响，而蒋纬国这十几年来的种种作为，都和当年的戴季陶有若干相近之处。他向笔者表示：“我很多的佛教理论，都是戴家亲伯教我的，这些就是中国的人生哲学！”

前几年，蒋纬国托了朋友，到大陆找寻戴传贤的遗骸。戴传贤死了几十年，要找寻遗骸，这是谈何容易啊！

皇天不负苦心人，戴季陶的遗骸居然被找到了，“我在去年就找到了亲伯的遗骸，已经被人家抛弃在荒郊野外了，能够找到这是天意。”

找到戴季陶遗骨之后，蒋纬国将他安葬于成都昭觉寺。

适巧，昭觉寺的住持老法师，是黄埔第四期毕业的老大哥，他说：“戴居士是我们最钦佩的老居士，我们将他的骨灰留在庙里。”为此，昭觉寺特地在庙后建了一座灵骨塔，以供奉戴的骨骸，这样总算了却了蒋纬国长年以来的一桩心愿。

继 1993 年找到戴季陶的遗骨之后，蒋纬国还在 1994 年年初，请一位友人到大陆去扫墓祭祖。

他说：“这次有一位友人去成都和奉化，我就请他代为扫墓。扫墓不过

是一件形式上的事情，但主要是去感谢我的祖先。”

尽管蒋纬国身世成谜，但目前的大部分研究资料还是认为蒋纬国是戴季陶之子。

深受蒋介石关爱

8岁那年，蒋纬国随蒋经国入上海万竹小学，跟蒋氏的妻妾陈洁如生活一起。因此，陈洁如成了蒋纬国的“庶母”。9岁，他又随陈洁如远赴广州黄埔军校，住在蒋介石的官邸。据前黄埔一期出身的宋希濂、孙元良等人说：“每到傍晚，军校课务告一段落后，蒋校长常与陈洁如携手在校园中散步，有时也会牵着天真活泼的纬国一道出游。”10岁，蒋介石誓师北伐，将陈洁如与蒋纬国留在身边，可知蒋介石对蒋纬国的钟爱非比寻常。

11岁，国民革命军底定江南后，蒋介石与陈洁如宣告仳离，将蒋纬国托养给吴忠信，拜吴忠信夫妇为“干爹”与“干娘”。此后，蒋纬国进入苏州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就读，并由吴忠信夫人王唯仁女士带养到蒋纬国束装赴德国留学为止。

在这段期间，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使蒋纬国在生活上，又多了个“继母”。

蒋纬国于苏州求学期间，结束了他幼年时不停的迁居颠沛，也不时与戴传贤相互往来，使他体验了另一种生活的情趣。此后，他中学毕业，进入东吴大学理学院物理系选修学分，及至文学院政治、社会、经济学系旁听有关课程，生活都十分安定。

1936年西安事变后，他接受蒋介石的建议，携带朱家骅介绍函，远赴德国研习军事。欧战前夕，奉命赴美，入美陆军航空战术学校受训，并至美装甲兵训练中心研习装甲战术。1940年底，他回国入西北军胡宗南麾下担任步2营少尉排长，开始往返重庆与潼关之间，此时，与西北豪富石凤翔之女石静宜小姐，结为连理。由蒋介石与宋美龄主婚。抗战结束前夕，调任青年军616团步2营营长。抗战胜利后，他在蒋介石、何应钦、邱清泉等将领提携下，以33岁不到的年龄，出任少将装甲兵副司令兼参谋长，直到大陆解放。

由于蒋经国曾和其父失和，赴俄留学，蒋介石对少年纬国的关爱，远超过蒋经国，蒋介石对纬国的“视如己出”，赢得了纬国非常浓郁的“崇敬感受”，历久不衰。日后据蒋纬国提起这段相处时光说：“我最记得，每当‘父亲’在前方打仗打得最危急、最激烈时，或当‘父亲’遭受国内外各方大压力时，他总喜欢把我叫到身边，以纾解他所承受的压力。”可见，蒋介石对他钟爱的程度，后来蒋介石虽冷落了蒋纬国，并囿限了他在军系的发展。但在父子亲情上，蒋介石仍然给了蒋纬国许多关爱。

在蒋纬国的成长过程中，有两件牵涉到“宫廷政治”的事值得稍作说明：

一、宋美龄很不喜欢蒋经国，但钟爱蒋纬国，蒋介石为什么不让宋美龄

抚养蒋纬国呢？

二、1975年蒋介石过世时，蒋纬国还是一个“万年中将”呢，蒋纬国的上将还是在蒋经国手上升起来的。蒋介石在世时，为何一直压抑蒋纬国呢？

根据蒋纬国的说法，将他交给姚氏抚养并限制他的发展，是避免造成兄弟阋墙。蒋纬国表示，宋美龄财多势众，如果将他交给宋美龄抚养，可能将来会造成很严重的阋墙之争。如果宋美龄要拥立蒋纬国接班，大势就不容易收拾。姚夫人无财无势，比较适合抚养他顺利长大。

毕竟，蒋介石是一位中国传统的武将，蒋经国好歹是元配所生，是他自己的亲生儿子。蒋纬国毕竟只是挚友之子。

“湖口兵变”影响宦途

蒋介石生前一直压抑蒋纬国升迁、掌兵权，除了是害怕蒋经国和蒋纬国争权内哄外，也是因为“湖口兵变”的缘故。

所谓“湖口兵变”实际是一场“兵谏”，发生于1961年。当时“装甲兵司令部”设在台北以南的湖口地区。曾经追随蒋纬国并受到信任的装甲兵副司令赵志华，因为看到官场中一些腐败的情形，加之不满人事安排而发难。据说蒋纬国对其兄蒋经国的所作所为不尽赞同，在有关装甲兵的人事和训练方面，常持不同意见。蒋经国为了控制装甲兵，向老蒋谏言，将蒋纬国调任一个有职无权的参谋学校校长。并委派一名与该兵团素无关系而资历远不及副司令赵志华的人接任。不久，此人调走。照例自应由赵代理司令，但蒋介石却又委派蒋经国保荐的另一人前来代理，以致引起该兵团许多干部愤愤不平，尤以赵志华的态度最为激烈。于是召集部下训话，借向参谋总长彭孟辑“算帐”，发泄不满。可是，蒋经国早有戒备，暗中对赵志华等人已进行严密监视。所以当赵志华举事时，突遭逮捕，并株连军官三十多人。赵志华何以敢于公开号召该兵团官兵向台北进军，是否与蒋纬国有关，局外人自是不得而知。事件发生后，由于蒋纬国“自请处分”才使蒋介石的处置没有扩大。从此，也注定了蒋纬国命运的安排。不过，在与蒋介石的父子感情上，老蒋也给予蒋纬国以谅解和许多的关爱。宋美龄也一直把蒋纬国“视如己出”，如果没有宋美龄对蒋纬国的庇护，“湖口兵变”的主事者赵志华也不会从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被株连的三十多名军官，也因宋美龄力保，个个都在“原职待退”，作了从轻处理。对于这点，蒋纬国始终感激宋美龄。

1975年4月7日，蒋介石过世后，蒋经国下的第一道人事命令：“陆军副总司令”郑为元调升“警备总司令”、“空军副总司令”司徒福调升“空军总司令”、“总政战部”主任罗友伦调“联勤总司令”、“总政战部副主任兼执行官”王升调“总政战部主任”。这些例行性的调任，虽无政治意义可言，可是，蒋经国的弟弟蒋纬国却备受冷落，依旧是“三军大学”副校长兼战争学院院长，毫无升迁的希望。后来，很多元老看不过去，迭向宋美龄

进言，并向蒋经国暗示蒋纬国的“出处”，应有合理的安排。詎料，却遭蒋经国婉拒。当时，政坛即有传言，最后还是宋美龄在临去美国前，当面向蒋经国提了这件事，蒋纬国才得以解冻晋升。但是，据悉，前“三军大学”校长余伯泉亦出了不少力。当时余伯泉除了直接向蒋经国进言外并主动提前办理“退役”，力荐蒋纬国接替他出任“三军大学”校长；由于余伯泉的坚持，并让位给蒋纬国，蒋纬国方得晋升上将，否则，蒋纬国的宦途也将至此而终，从蒋纬国晋升上将的曲折过程来看，简直是一桩令人费解之事。难怪蒋纬国一生对余伯泉将军感怀不已。毕竟，没有余伯泉的让位、力保，蒋纬国也无法位列上将之尊。

蒋纬国担任“三军大学”校长之后，经常发表一些使蒋经国不满的言论，例如：蒋纬国在校上课或讲话，不是推崇蒋介石，就宣扬自己的作战阅历和战略思想，极少称赞他的兄长，也不常引伸蒋经国关于军事或国防的言论，大有“目无兄长”之嫌，此外，蒋纬国又喜欢到校外参加一些活动，发表关于战略和军事学术的讲演或谈话，他的言论有时涉及到全局问题。有一次他答复一个外来记者的访问，强调：“我们从来没有要反攻大陆，至少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见香港《明报月刊》161期《蒋纬国报到》）蒋经国知道后很生气，指示一个亲信转告蒋纬国，说蒋纬国作为“三军大学”校长，竟然散播“反攻无望论”，会涣散军心士气。

还有一点是，台湾几乎人所周知，就是蒋纬国不满蒋经国把王升提升得太快太高。王升升到上将，蒋纬国还屈居中将，所以，蒋纬国曾经讽刺说：“台湾又出了没有打过仗的上将。”之后，过了两年蒋纬国才勉强被晋升上将。

蒋纬国抨击王升的近因，是由于高雄事件。王升自1979年冬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之后，成了高层决策的特殊中心人物之一，党、政、军、特，几乎一把抓。台湾“警总”和“调查局”联手镇压“美丽岛”一案，就是由王升决策指挥的。当然，蒋纬国不得干预这种工作，实际情况他也是隔膜的。等到高雄事件爆发之后，蒋纬国听到，立即表示非常震怒。他一方面谴责“美丽岛”一批人；另一方面则批评官方处置失当。蒋纬国特别指责“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他认为正确的做法，是严格执行“戒严令”，不容“聚众”滋事，防范事故于未然。

蒋纬国在一次对“三军大学”学员的讲话中说：现在台湾出现了一种口号和策略，叫做“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我们作为一个军人，绝对不能听从这一套歪论。这是违反军人立身、用兵、作战之道的。骂则受辱，打则受伤，宁愿受辱受伤，这能算是一个有骨气的军人吗？这样，结果必然是挫折士气损伤兵力，而且还不反击，这岂不是束手待毙。这是违反兵法起码的通则的，用兵或进攻，或退守，决没有等着挨打的。据说蒋纬国由此发挥，讲了一大套兵法战略和战术，批评“两不”。他说要是“贯彻两不到底”，“我们岂不要被推翻了吗？”这是不足为范的。蒋纬国又批评“警总”下令宪警

“挨打”，这是失职，应受处分。

蒋纬国私下和人谈论，批评这种做法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或“苦肉计”，也是很拙劣的，所以闹到不可收拾，使台湾多年来树立起来的声誉，受到极大的损失。可谓“得不偿失”。蒋纬国讽刺说：“只有老百姓出身的上将，才指挥军警去挨打，要是在战场上，岂不要垮得一干二净……”蒋纬国的这派言论，很得台湾军政界一部分人的同情。传到蒋经国耳里，加上王升又在“经师”面前撒娇抱屈，加油加醋。蒋经国一怒之下，就写了一张“手谕”：免去蒋纬国“三军大学”校长。后来找到宋长志交代此事，并考虑派人接掌“三军大学”。经宋长志婉转进言，才给蒋纬国一个转旋的余地，和王多年对调，任“联勤总司令”。蒋经国并指示宋长志转告蒋纬国，今后要安守本份干三军后勤，不关他的业务，决不容许他随便议论，尤其不准“狂妄”指责中枢的决策。1980年5月3日，香港一份报纸在一版头条刊登《台湾国军将领上书蒋总统祝寿》（蒋经国70岁生日）末尾，开列了将领的名单：

- 国防部长高魁元上将（笔者注：第一）
- 参谋总长宋长志上将（第二）
- 国防部副部长郑为元上将（第三）
- 副参谋总长马安澜上将（第四）
- 副参谋总长姚兆元上将（第五）
- 联训部主任张国英上将（第六）
- 总政战部主任王升上将（第七）
- 三军大学校长王多年上将（第八）
- 陆军总司令郝柏村上将（第九）
- 海军总司令邹坚上将（第十）
- 空军总司令乌铎上将（第十一）
- 联勤总司令蒋纬国上将（第十二）
- 台湾警务总司令汪敬熙上将（第十三）
- 宪兵司令刘罄敌中将（第十四）

从职位序列看出：蒋纬国从原来的第八降到第十二，而且是“国军”中任职上将的最后一名。香港《动向》杂志5月期刊登一篇署名文章，评论说：

这不是给蒋纬国好看吗？这样降职，蒋纬国会愿意吗？况且，联勤总司令，不过是三军的副官长；蒋纬国在台湾号称是精通战略的将才，现在却落得给三军办后勤打杂，听人使唤。蒋经国对他这位‘问题老弟’未免太……

可见蒋纬国和他的老兄之间存在着芥蒂。而5月3日的职位序列，使蒋纬国的“军职”降了一大截。

1986年6月，已调任“国防部联训部”主任的蒋纬国，悄然地向“国防部”提出“退役”申请。该申请经“国防部”人事主管单位完成审核手续后，很快签呈送交当局“裁示”。一般预料，由于蒋纬国军职任期于当年5月即将届满，且“除役年限”已至，若无特殊的变化，“退役”已成定局，他的军旅生涯可望在军队军事会议结束后告一段落。

如果蒋纬国退役，他未来的出路如何？依常理推断有以下四种可能：

（一）改聘“总统府”的战略顾问；（二）担任公营事业董事或顾问等职务；（三）出任中华战略协会理事长，取代年迈体衰的陶希圣；（四）出任“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正当岛内蒋纬国去处猜测纷坛之时，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于6月18日通过了蒋纬国出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要职的决议。

“国家安全会议”是蒋介石于1967年设立的“由总统、副总统、军队首领、特务、公安及警察首脑和政府部长组成，在国家非常时期，掌管全权。在和平时期，国家重要决策也通过该会议决定。”1986年5月，台湾中华航空公司飞机飞到大陆后，台湾方面为交涉归还飞机和机组人员，在香港首次与大陆方面接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而作出进行接触决定的就是“国家安全会议”。

在“国家安全会议”里，秘书长是仅次于主席（由蒋经国兼任）的重要职位，在非常时期，可以行使全权。因此，这个职务非有相当实权的人物或深得“总统”信任的人物莫属。

关于蒋纬国的这一人事安排，在岛内人们感到出乎意料，其理由有二：

第一、蒋经国1985年秋天接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时提到了接班人问题。他说：“我国是民主立宪的国家。总统和副总统是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选举产生，今后当然也要这样做。因此关于总统职务交接一事不存在任何问题。迄今为止，我从未考虑过将来让蒋家的人继承国家元首的职务。”好象是为了证实这一点，1986年2月，蒋经国把据认为将来最有可能成为接班人的蒋孝武（41岁）派出国，担任了台湾驻新加坡贸易办事处副代表。因此，人们曾认为，今后由蒋家人接班的可能性很小。

第二、因为蒋纬国迄今为止一直远离政治和权力中心，而且和蒋经国的性格大不相同，还风传二人“不和”。因此被排出了接班人名单。日本《选择》月刊1986年8月号刊登一篇题为《蒋经国的胞弟蒋纬国突然上升的背景》，摘要如下：

蒋经国总统的长期计划是：

- （一）慢慢缓和国民党一党统治体制；
- （二）逐渐让国民党元老退位，让技术人员和科学家出身的官员执掌国政；
- （三）把军队首脑对权力的影响限制在最小限度；

(四) 逐渐让台湾省人走上第一线；

(五) 总统职务的继承问题根据宪法规定处理。

但是如果急于推进上述计划，就会遭到国民党元老和军队首脑的强烈反对。因此要花时间慢慢来。同时蒋经国总统打算通过让蒋纬国登场，缓和他们的不满。蒋纬国就是为了起到控制军队首脑，缓和他们的不满情绪，同时圆满地向知识分子官僚及台湾省人移交权力的重要作用而登场的。

蒋纬国将在李登辉总统体制下掌握实权。或有可能在蒋经国之后实现蒋纬国总统体制。虽然形式上是蒋介石、蒋经国、蒋纬国，蒋家连续三代执政，但实质大不相同。这一切都是为对付国民党元老和军队首脑的策略，蒋经国总统的长期计划没有改变。

7月1日上午，蒋纬国宣誓就职之后，立即赶到位于“总统府”后面的“国家安全会议”办公室中处理公务，并约见该会的有关主管，以便了解该会的全盘业务。可是，蒋纬国在办公室坐定未久，对面“总统府”机要科来了电话，说蒋经国要召见他。因此，不到一个小时后才离开“总统府”的蒋纬国，便又穿好上衣，服装整齐地赶到“总统府”。

蒋经国跟蒋纬国虽系手足，私下里也常有晤面的机会，但是专门召见到他到办公室中公私兼及地作一番恳谈的前例，确实很少见，如果屈指一算的话，过去只有把蒋纬国由“三军大学”调任“联勤总司令”之前，曾经召见过蒋纬国，告诉他自己所作的决定，而且勉励他好好的做。以后蒋纬国卸除“联勤总司令”职务，改任“参谋本部联训部主任”时，只间接传达了他的旨意，蒋经国并没有因调动自己兄弟的职务，而向他作任何说明。蒋经国以最高统帅调动军方系统下的人事，身为军人的蒋纬国自然别无选择的余地。

这次，蒋纬国调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让蒋纬国在国家安全的大政方针上，负起了更重的责任，由于其所处地位与所具有的身份，已跟过去迥不相同，而且处身在这么一个重要的职位上，自然不能再象过去那种悠游世间的情况，因此，不论是在“公义”或“私谊”的立场上，兄弟两人都有加以恳谈的必要，于是，乃有了1日上午就职宣誓之后的召见举措。

据蒋纬国事后跟极亲近人员在说明他对“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必须全力以赴的原因时透露：阿哥召见我，要我尽力做好“国安会议”秘书长的这个职务，语意恳挚，极为感人，可以说这是我们兄弟近年来极少见的坦率谈话，如果我不全力以赴，这将愧对“总统”，也愧对自己。因为阿哥告诉我：他托付我这个职务，要我一步也不能走错。他的话是百分之百正确的！

蒋经国那天召见蒋纬国时，谈了不少的话，兄弟两个人坐在总统私人会客室内，无拘无束地聊。蒋经国语意诚挚，一再提到“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职务的重要，务必要全力以赴，要蒋纬国以其余年，作竭诚的奉献，这样才能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他们父亲的在天之灵。他说在私人生活及行为中固然可以轻松一点，但在公的范围内，一定要郑重、庄重，君子不重则不威，

身为“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必须在工作上戒慎戒惧。蒋经国好象也了解蒋纬国只做了一任“联勤总司令”便被拉下来的委曲，因此特别告诉他，当时这样做，目的在于便于安置温哈熊。蒋经国很委婉地说：温哈熊在军事采购上对“国家”有功，由于外交事权的关系调温回台，出任“联勤总司令”是最理想的安置，既然如此不把你拉下来又能拉谁下来？！几句出自“最高当局”的肺腑之言，据说曾使得蒋纬国深受感动，难怪蒋纬国回来跟最亲近的人聊起来时说：阿哥这次恐怕是多少年来对我说话最诚挚的一次了！

蒋纬国就任新职以后，据说除了去过“荣民”总医院以外，任何公私场合已见不到他的踪迹，应该说跟蒋经国的训示有关！

女佣猝死被告藏枪

进入 90 年代，台湾政坛愈加动荡不安。国民党内部斗争激烈，岛内政潮迭起，社会治安恶化，资金外移。新确立的执政当局调整了大陆政策的策略，但仍顽固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立场。台湾的政治革新与前途出路仍陷在重重困境之中。

90 伊始，国民党高层围绕“第八任正、副总统”选举、“行政院”改组，激化了自蒋经国死后就开始了的权力之争，公开进行了一场“迁台四十年来最严重的内斗”。从 2 月份国民党临时中全会始至 5 月底，国民党内部的所谓“主流派”、“非主流派”，推出两组代表不同势力的“正、副总统”候选人，针锋相对，公开唇枪舌剑，私下合纵连横，甚至动用特务监控对手。危机引起了社会的混乱，学生大规模抗议，反对党派在“国民大会”大打出于，民意惊恐不安。李登辉不得不请国民党元老出面“整合”，劝退对手。李登辉、李元簇当选“正、副总统”，前“国防部长”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长”，“内阁”重要部门官员“局部调整”，从而结束了蒋经国死后的权力过渡期，确立了新的权力集团。但危机虽暂化解，党内派系仍存，各派政治势力加速分化组合，互相猜忌依深，明争暗斗不止。

1991 年 7 月，在内争中失势的蒋纬国，再次成为新闻焦点。7 月 6 日，台中市调查站公开声称，“蒋纬国将军遭人检举持有 60 支靶枪，已于 6 月 30 日托人自动向我站报缴，由于前后说词不一，且对全案来龙去脉无法作合理圆满的解释，致引起社会大众的猜疑。”

11 日下午，台中市调查站悄悄将该案资料送至台中地检署，不过函送卷宗资料上未列有罪名及犯罪嫌疑人姓名，地检署将它列为他案，由原承办的刘家芳检察官负责侦办。

主任检察官王添盛于 12 日召开一个简单的记者会，称各界关心的蒋纬国持有枪支案，已由调查站函送该署侦办，全案已进入司法程序。调查站所函送的证物，包括枪支及相关人士的笔录。王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以侦查不公开为由，对很多问题都加以回避。当被问到私藏 60 支枪是否涉及叛乱时，他

表示，这是个不能回答的问题。

面对舆论界的喧腾，蒋纬国并没有沉默。7月7日下午，他在“中华战略学会”接受了台湾“中央社”记者的访问，他表示，在台中宜宁中学宿舍的一批枪械，在他记忆中，是0.22英寸，次口径、室内休闲、练习用的长型靶枪，有效距离是25米。目前台湾并没有生产制造这种枪的子弹。

他指出，这批枪械，20多年前，是他委托美军购买，后来美军搜集了军中用过的60把旧靶枪给他。本来他想用这些枪，在“三军大学”或“联勤总部”，附设休闲靶场，提供军官娱乐之用。由于当时没有地方存放，也就暂放在台中宿舍里，而且这些枪是旧枪，他还特别请“联勤”单位查验、鉴定，并上了凡士林，贴有“联勤总部”检验的封条。在职务的忙碌下，事隔多年后，他也就真的忘了此事。

蒋纬国强调，外传他拥有“轻、重武器、大批军火”，这完全是捕风捉影，扰乱社会视听，是不应该的。何况，他本来就是军火的收藏家，过去他收集的各类枪支，早已捐献给“联勤总部”，并且设置了特别陈列室，作为样品参考。第二天，台湾《中国时报》刊登记者尹乃青的文章，题为《蒋纬国怀疑：女佣死因与被告发藏枪有关》，摘要如下：

“国安会”秘书长蒋纬国昨日表示，他怀疑他的女佣李洪美死因和向调查局告发他拥有枪支的这位“告发者”有关。他说他猜想：“李嫂”是在受到此人威胁后自杀的。他说，这个人的手段太卑鄙、太狠，“当局应该知道这个人是谁”。

蒋纬国说，60支0.22英寸口径的枪放在他位于台中宜宁中学宿舍的小阁楼里20多年，他早就忘记了，而是“有人”去告发。蒋纬国说，有人向有关单位告发他有60支枪这件事他并不知道，而是他的女佣李嫂知道了，在6月29日向宜宁中学董事长蒋信丞报告，蒋信丞就找了魏校长和总务主任处理。蒋纬国说，蒋信丞打电话给他，问他到底是什么枪，他这时才想起有60支枪放在阁楼里，他对蒋信丞说：“糟糕，我根本忘记这件事了。”于是向蒋信丞解释这批枪的由来，并要蒋信丞尽速去报缴，一切依正规程序处理。

蒋纬国强调，这批枪不是李嫂在清理时发现，但是“告发者”自称是李嫂告诉他的。

蒋纬国提高声调，语气激动地说，他到台中去那么久，李嫂从没有和他提过枪支的事，“告发者”却说是李嫂告诉他的，这合乎情理吗？蒋纬国说：“绝对不会有这种事，女佣去告诉外人，让外人去向调查站告发，但事前却没有先跟我讲！”

至于这位“告发者”怎么会知道蒋纬国有这批枪支，蒋纬国说：“这个事件的谜就在这个地方，这个人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蒋纬国说，他怀疑有人知道他有这批枪支，就去威胁李嫂，李嫂受了威胁没办法，最后才向蒋信丞报告。蒋纬国说，李嫂是一个非常老实、没什么

知识、对他很忠心的人，自从她的先生在 5 年前过世后，李嫂就神经衰弱、感情也很脆弱，但是一直很护着他。

蒋纬国扬起眉毛，又提高声调说，他猜想这个“告发者”就是利用李嫂身体心理的弱点，威胁她，把她套进去，吓她，李嫂没办法了，最后才自杀！

蒋纬国说：“使用这种卑鄙手段的人太狠了，但是我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如果知道就好办了，但是当局应该知道。”他认为，“告发者”一定是个“阴谋分子”。

蒋纬国表示，他在 6 月 30 日晚上知道李嫂死亡的消息后，不到 10 分钟，就立刻告知调查局这件事，当时他就怀疑李嫂的死因和他被告发拥有枪支这件事有关联。

蒋纬国说，李嫂究竟是怎么死的，他一定要追究。

身为“国安会”秘书长，权当统管台湾的情治机构，但蒋纬国一不知“私藏军火”案的告发者；二不明女佣之死因。可见此时他的势力已江河日下，只能做更深的隐退了。

政坛要人仓皇下台

1993 年 2 月，曾被喻为“后蒋经国时代”三脚凳之一的蒋纬国在台湾高层人士变动中被免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职务，出任“总统府”资政，其遗缺由原“行政院”副院长施启扬补替。台湾传媒认为，李登辉这一安排，暗示着蒋家的正统已正式自政坛退下。

在 1988 年蒋经国死后的一段时期，由于身份特殊和身居要职，蒋纬国对台湾政局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蒋家及官邸旧臣有赖他保存既得利益，李登辉也仰仗他安抚蒋朝遗老及军方势力。

据一位接近蒋家的人士指出，宋美龄早有离台赴美的打算，曾计划在 4 月初成行，但后来改变了这项计划，准备在国民党十三全大会后再成行，其主要原因在于协助蒋纬国成为台湾一个新权力重心。宋美龄自认对元老派尚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希望以其残余的威望，为蒋家希望之所寄的蒋纬国，尽一点心力。据了解内情的人士表示宋美龄如此厚爱蒋纬国，除基于将希望寄托于蒋纬国的身上外，她多年来特别疼爱蒋纬国，也是主要的原因。

1988 年 1 月 13 日下午，蒋纬国被通知赶往大直官邸，其后几天，蒋纬国甚少公开露面。据报道，“在那两个星期关键性的权力互动过程中，蒋纬国的政治态度始终超然而坚定，支持李登辉总统出任‘党政一元化’的主导角色。他在与关系亲近的人士谈话中，极为强调团结的重要性，对于权力重新分配过程中所浮现的若干‘逆流’感到忧心忡忡，并尝试采取防杜措施。”

蒋纬国的政治意向虽然坚定，但由于身份特殊，也备感尴尬。1 月 17 日，国民党中常会全体中常委一致起立推举李登辉为代理主席，显然与士林官邸

的态度有所抵触。会后，李焕、俞国华、沈昌焕 3 人会商，决意商请蒋纬国前往士林官邸面报“常会”结果并致意。由宋美龄事后对“常会”决议指为“不合法”的态度观察，蒋纬国此行必不好受。同一天，蒋纬国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指出：“目前民众最需要的就是团结安定，谁要破坏团结，就是我们的敌人。”翌日上午，他与蒋孝勇陪同李登辉前往慈湖、头寮等地巡视奉厝工程进度。在维护党内团结和谐的形象上，他又因身为蒋总统家族的一员，扮演特定的角色。

接着蒋纬国又接下一个“烫手山芋”——协调“中央民意代表”退职及如何进行增额选举的问题。这原本应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或“行政院”进行作业的事情，竟然公开由“国安会”出面为之，可以说是“国安会”成立 20 多年来破天荒的创举，很多人都想不透其缘由何在，因而议论纷纷。其实，蒋纬国之所以乐意为之，也有其政治目的。

据一位权威人士分析如下：

（一）蒋纬国明知这是一个“烫手山芋”，但他却认为接下之后“利多于弊”。即使未能尽如人意，由于大家都知道此事极不易为，应该对他寄予同情与谅解；

如果稍有成效，适足以显示其卓越的才华与不同凡响的政治智慧。

（二）蒋纬国体认到这是时代潮流的必然趋势，只要拿捏得准，仍可创造出相当可观的成绩。由于蒋纬国自信他有能力解决这个难题，因而毅然决然地接下了此一“烫手山芋”。

其实，这还只是表面上的原因，真正的关键，则在于蒋纬国“胸怀大志”，期能藉此机会扬名，进而使其在岛内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

在十三全大会之前，蒋纬国一马当先，声势凌驾各路人马，甚至在十三全大会开幕后，他还公开对新闻界大谈“国安会”的功能应该是什么。蒋纬国这一连串动作当然引起某些当道人士的忌讳，唯恐蒋纬国异军突起，直上青云，而削弱了本身的地位，更令这些人士感到威胁的是，由资深“国大代表”滕杰发动的拥立蒋纬国为副主席一事，当时蒋纬国始终未曾明确表示过“不要”，而促使不同的政治势力暂时结合在一起，先联手起来抵制蒋纬国，在这种妙不可言的情况下，蒋纬国再表态反对设立副主席一事，却是大势已去，他真正想“要”的中常委当然只有泡汤了。

十三全大会后，拥蒋风波仍然是余波荡漾。滕杰并不死心，依然锲而不舍地在资深“国大代表”中鼓动拥立蒋纬国的声势，甚至已经摆明了准备支持蒋纬国出马竞选下任“副总统”，姑不论这到底会不会成为气候，不过已埋下日后“总统”大选呈现出山雨欲来之势的伏笔。

“总统”大选后，李登辉刻意疏远蒋纬国，最终把他正式从“国安会”秘书长的位置上换下。难怪台湾舆论指出，蒋纬国只能是在这“世代交替”

的夹缝中，上下不逢源的一个蒋家人而已！

大声呼吁祖国统一

蒋纬国常说：“我不想将来被子女们‘提’回大陆，乘身体尚好，我要自己走回去……”当在台湾被禁演几十年的大陆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台北市演奏，蒋纬国特意去聆听。听后他对传媒界大发赞叹之词，认为《梁祝》实在太妙了，太动听了！

1992年立春时节，台湾岛内梅花盛开。岛内早就有爱梅之人组成“梅花总会”，蒋纬国任副会长。他是逢梅友聚会必到，广结梅缘。他对梅花独钟，可能与早年生活在江南姑苏有关。苏城光福邓尉赏梅，自汉唐以来已负盛名。“香雪梅”十里花海，有绿梅、墨梅等名种。赏梅胜境，也是他熟悉的地方。

蒋纬国不是苏州人，但他视姑苏为第二故乡，因为少年时代他就与义母姚怡琴生活在那里，后来就读东吴大学。近几年，他常对友人表露怀念姑苏之情。1992年1月，他致函苏州昔日东吴同窗程金冠：“一峡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岁月悠悠，而吾侪于母校同窗之旧时往事与校园情景，仍然依稀记得，恍如在目。……但愿苍天佑我中华，早日统一，来年将能与诸友齐集母校同庆往后之校庆，并倾积愫……”怀旧思乡之情跃于纸上。

他迫切希望中国统一，大声呼唤中国统一……

值得一提的是，1991年2月22日，蒋纬国派人专程到安徽省合肥市拜望他异性弟弟金定国，并为其兄弟二人的会晤做了充分的准备。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88年11月11日，在台北举行的孙中山诞辰122周年纪念会上，蒋纬国颇带怀旧感地披露了一则鲜为人知的往事。他说，孙中山当年在黄埔军校时，身边有3个重要助手，除蒋介石、戴季陶外，还有一位叫金诵盘。这3名助手的4个儿子，中山先生分别取名为蒋经国、蒋纬国、戴安国和金定国，取其“经纬安定”之意。如今，4人之中，经国和安国都已去世，而定国却杳无音讯。童年时的伙伴，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现在只剩下我一人……说到这里，蒋纬国禁不住潸然泪下。这则消息在大陆报纸上发表后，经过大陆记者的多方查询，才知道原来金定国并未去世，他正在安徽省合肥市一家工厂退休养老。蒋纬国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激动，很快给金定国寄来书信和彩照，盼望兄弟早日会晤。他在彩照背面写道：“定国如握：初次得获通讯，纪念万里寻亲。”他还表示，希望3年之内能够回大陆，以不负海内外中国人的期望。

应该说，蒋纬国回大陆探亲是指日可待的事。因为几年来已有不少蒋家成员相继赴大陆探亲扫墓了。

第一位从台湾返乡探亲扫墓的蒋氏后裔，是蒋介石的侄孙女蒋品雨。1989年清明节前夕，她回到浙江奉化祭扫了蒋介石的母亲以及她外婆和阿姨的墓地。她还在表兄弟陪同下，游览了蒋介石的故居和她祖父昔日开设的“玉泰

盐铺”旧址。据了解，蒋女士的祖父蒋介卿就是蒋介石的哥哥。一年之后，蒋经国的堂妹蒋华秀也回到浙江奉化扫墓，她是经过4年多反复考虑之后才踏上归程的。蒋华秀是蒋介卿之女，也是蒋家第二代唯一的女性。

大陆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与台湾“国安会”秘书长蒋纬国，阔别半个世纪后，1992年6月11日在台北喜重逢，师生二人紧握双手，用宁波话叙旧话新，感慨良多。

1993年2月，76岁的蒋纬国在美国探访他的继母宋美龄时，接受了美国一家报纸的采访。蒋纬国在谈话中赞扬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及他倡导的经济改革。

蒋纬国说：“我对（邓）的各种做法极为钦佩。”他还说，“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很好的事……他举双手赞成。”蒋纬国敦促台湾“政府”放弃它的“三不”政策并为两岸统一而努力。

对两岸关系乐观

1995年7月28日台湾“总统府”资政蒋纬国在接受香港《文汇报》赴台记者的采访时，以“乐观”两个字来形容自己对台峡两岸关系未来的发展。他说，“我们中华民族已经屹立了5000年，怎么可能由于极少数人逆潮流而动，而致令国土分裂。”

谈及李登辉近期的言行，蒋纬国说，“我不愿意指名道姓，但目前的情况就像某个人已掉在大海里，欲以2100万台湾人作自己的人质或救生圈，而台湾同胞中又的确有不少受其苦难。”“不过，由于大陆方面已将抨击的重点由笼统的‘台湾’，集中到‘台独’，如今又再进一步集中锁定某一个人，这就必然会令广大台湾人民逐渐与其划清界限。”

这位年近八旬高龄的老人向记者指出，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多少次改朝换代，但中国却是一脉相承。如果有人要搞独立，不做中国人，那就不应再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到其他地方另立新国好了。

离开大陆已46载的蒋纬国先生表示，自己的确很想回故乡看看，尤其想念曾在那里度过9年读书生涯的苏州，“但目前台湾的情势不允许我回去，只好再待将来了。”

第六节 宋美龄晚景凄凉

九十高龄再度出洋

1991年9月21日上午，台北松山军用机场戒备森严。9时54分，台湾“永远的第一夫人”宋美龄之座车在前导车的开道下抵达机场。行动不便的她在蒋纬国夫妇的扶持下缓步登上“华航”为她改装的“专机”。在关闭机门前，孔二小姐又扶着宋步至舱门，向送行者挥手告别。此时，及目机场廖廖数人，43年前离开大陆的情景再次在脑海中浮现，一股难言的苦楚再度涌向她的心头……

1948年初，四年一度的政治季风又在太平洋彼岸刮起。蒋介石及其幕僚们估计，曾任纽约州州长的共和党候选人托马斯·杜威肯定会在这次总统选举中取胜，那样，美国国会将会放弃杜鲁门的吝啬和敌对的态度，再给蒋以数十亿美元的援助，而不附带任何条件。于是，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代理人四下活动，不惜破费巨资帮助共和党赢得选举的胜利。

与此同时，华盛顿的“亲蒋分子”传来了令蒋鼓舞的消息：在“院外援华集团”和许多共和党人全力支持下，美国国会于4月间强行通过了一个款额为10亿美元的援蒋计划。

然而，事态的发展出乎蒋介石的意料。杜鲁门在选举中以微弱多数票获胜。白宫再也不会会有什么施舍了。蒋开始感到焦灼不安，他多年服用的药力很强的安眠药片再也不灵了。每天晚上只有喝上一玻璃杯的威士忌，才能昏昏沉沉。

不管怎么样，蒋还是匆匆忙忙派宋美龄去华盛顿，企图再次让她在美国掀起一阵“宋美龄旋风”，她的座机于1948年11月底起飞，那是她足踩中国大陆乡土的最后一次了。

但蒋的算盘又打错了。宋美龄1942年11月访美所以能引起的轰动，是因为当时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将近一年，美国朝野因日本空袭珍珠港遭受的创痛还未完全恢复，故对中国对日抗战艰苦而英勇的表现，有了由衷的尊敬。而把这种尊敬的感情集中表达于对宋的欢迎上。加之宋有年轻时在美国受教育的背景，以及她高贵的风仪，从容的言谈，在美国人想来这是美国培养的人才，是美国的骄傲，因此，赞誉交加，口碑载道。传播媒介大量地报道她的行踪，新闻性的杂志以她作封面，她所到之地，处处是鼓掌与欢呼。罗斯福总统先后邀请她在白宫和海德公园私邸小住，并陪她出席国会演说，出席记者会，这在美国接待外宾史上是破例的事。特别是宋正式应邀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并出席两院外交委员会盛宴，以及在洛杉矶圆形广场对美国公众发表演说，是绝大多数外国元首所不曾享受过的殊荣。

可是，随着形势的演变，宋美龄此次访美，正值国民党军队在大陆节节败退。宋的身份虽与六年前相同，但华盛顿的红地毯却没有有了。她乞求美国

加紧援蒋，杜鲁门不为所动。美国舆论还以“秦廷之哭”加以讽刺，而美国各界人士也似乎把美国培养的这颗“政治明星”忘却了。

她没有接到请她去白宫停一晚或去国会演讲的请柬。因为国会刚刚给了蒋 10 亿美元，杜鲁门总统刚刚赢得一次竞争激烈的大选，他没有心思迎合卢斯（美国出版界大亨，蒋宋家族的吹鼓手）派的外交政策，也不想迎合“院外援华集团”的意图。

“她来美国想多讨些施舍”。杜鲁门回首往事时刻薄地说：“我不会象罗斯福那样让她住在白宫。我想她不会很高兴的。但她高兴不高兴，我并不在乎。”杜鲁门还对报界发表了一项不无失礼的声明，披露了美国给蒋的援助总额已超过 38 亿美元。只有共和党人，“院外援华集团”和卢斯对她乞求“在目前的斗争中”给予援助的要求，表示出少许同情。

“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当时的情景，不要说宋美龄本人，就是旁观者，如果想起她当年在美国掀起的阵阵“宋美龄旋风”，也难免有一些世态和人情的感慨。但如果想通了，国际上只有利害、没有道义可言，也就会一笑置之。

宋美龄无力再施展故技，为此深感烦恼。于是离开华盛顿，来到里弗达尔的孔家宅邸，隐居起来。

几次离台大权旁落

1950 年 1 月，宋美龄返回台湾，立即卷入权力继承和保全自己政治生命的最后斗争。她间歇外出期间，蒋经国已担任蒋介石的私人助手，后又升为台湾“国防部”政治局局长，成为主管治安工作的人。此后 20 年间，每当宋美龄离台访美一次，蒋经国似乎就在政治阶梯上又上一级，在取代宋作为他父亲的继承人方面又向前迈出一步。

宋美龄的心情太紧张了，她不甘闲坐日月潭边描绘简单花草图画，她将画赠送给每个人，包括蒋经国。（送给蒋经国的画是竹子，宋美龄亲笔提了“赠吾子”字样）为树立个人形象，她参加当局的社会工作，特别是孤儿院工作——这些孤儿几乎毫无例外均为她丈夫的下属军官过早去世后遗下的特殊孤儿。（就连戴笠也办孤儿院。在中国，要想使特务为你效力，你就必须保证他的子女的福利。所以，在国民党统治下，孤儿院不断增加。）

台湾的气氛终使宋美龄感到受压抑。她又匆匆离台赴美，以便争取“院外援华集团”亲临声援。此次访美，从 1952 年 8 月一直呆到 1953 年 3 月。返台时她获悉，蒋经国已经接到去五角大楼和国务院作客的邀请。华盛顿对这位太子日益瞩目，蒋经国应邀去与艾森豪威尔会晤。自 1943 年以来，宋美龄从未得到过这种待遇。

虽然宋美龄在台湾不担任任何职务，但她仍然与蒋介石保持着尽可能密切的接触。在他变得老迈昏聩的时候，这种接触就更加紧密。蒋会晤美国官

员时，她替他讲话。他总是含混不清地咕嘟几句，然后她就讲上 5 分钟；他再含混不清地咕嘟几句，她又侃侃而谈一大通。使人感到，他好象一具橱窗里的模型，装束得象蒋介石的样子，坐在他的宝座上，由宋美龄操持大权。

蒋的将领和官吏中很少有人敢得罪她，就连她的前房儿子对她也要小心几分，毕恭毕敬。她的火气上得快，而且肯定要加报复。下面是卢斯的朋友讲的关于卢斯夫人和宋美龄在台北乘车外出购物的故事。当她们各自买到了要买的物品后，回到了轿车旁，彼此推让，都请对方先上车。在说过三次“您先请”之后，卢斯夫人没有再让，先钻进车里。然后蒋夫人上车在卢斯夫人身旁坐下。在回台北北郊的官邸途中，她一路上都不高兴，一言未发。宋美龄高视阔步地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后，卢斯夫人问一位秘书，她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她说：“我让她三次啊。”

“你应该让她四次。”秘书答道。

1954 年 4 月，宋美龄又去华盛顿住了六个月，鼓动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的提案。而后她返台参加蒋介石的 67 岁寿辰庆祝活动。当抵达松山机场时，她看到了大权旁落的迹象，使她此次归台大煞风景。老迈的、白发苍苍的蒋介石在候机室里没出来。到机旁迎接她的是蒋经国和他的小儿子。这种对她不尊敬的态度是空前的。蒋经国陪她去见一些重要人物和“中国妇女反侵略联合会”的一群女士，宋美龄的态度冷若冰霜。她匆匆地从这些人面前走过，大踏步跨入了候机室，对着蒋介石低声说了一句什么，然后径自走向等候在那里的轿车，嘴抿得紧紧的，一声没吭。也许她骂他王八蛋。

1958 年，蒋经国再次晋升。宋美龄显然不胜厌烦又跑到美国去了。一下呆了 14 个月。她已经六十有一，却声称 58 岁。出于礼貌，蒋经国进入“总统内阁”被任命为“政务委员”是在她离开台湾两个月后宣布的。宋美龄终于下定决心回到台北，硬是一气住了 6 年。

1965 年，在一阵紧锣密鼓的外交活动中，宋美龄回到华盛顿时，红地毯终于再次为她铺开。“中华民国”大使馆为 1500 名重要的政客和“院外援华集团”说客们举行了招待会，宋美龄是主宾。她乘专列从纽约来到华盛顿受到国务卿腊斯克夫人的欢迎。她乘高级轿车来到时髦的克洛拉玛路为她租用的漂亮大厦。这座大楼离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住宅仅咫尺之遥。她与 J·埃德加·胡佛、最高法院法官拜伦·怀特、参议员托马斯·多德接触频繁，在白宫与伯德夫人一起喝茶，与林顿·B·约翰逊促膝交谈。一切与昔日无异。

报界很少注意到一个细节：即宋美龄这次是由蒋经国陪同访美的。他现任台湾“国防部长”，是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客人。他与宋美龄的随行人员一起来美，悄悄地办理他的公务，然后悄悄地离开。

这些不寻常的渲染，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多年来，蒋介石一直力图使华盛顿支持国民党反攻大陆，但是，华盛顿早已断定，在交战中蒋没有战胜

中共的希望。他仅希望把美国拖入对中国的一场战争，以便他借此东山再起。蒋不止一次要求美国给他提供核武器，以“保卫台湾”，“院外援华集团”则倾巢出动，全力为他争取核武器。现在，美国卷入了越南战争，无暇及此。约翰逊政府迫切需要蒋派国民党部队去印度支那作战。蒋经国此次华盛顿之行的使命，就是谈判这个问题，谈判以僵局告终。美国不会讨好他那老迈的父亲，支持国民党反攻大陆，国民党也不愿派遣部队帮助美国打越南。对宋美龄的款待，只不过是林顿·B·约翰逊政府为了争取她，利用她对蒋介石施加影响。但她对蒋经国无能为力。

结果，约翰逊政府对台湾这个盟友大感失望。这种失望没有立刻产生明显变化。但是到了尼克松政府上台时，对台湾的失望情绪已经遍及美国。亨利·基辛格才有可能着手推行实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政策。

不管美国款待她是否做给人家看，对宋美龄来说，这次访美是她政治生涯的回光返照。在访美期间，她应邀到威尔斯利，向学生们发表关于纪念珍珠港事件的演说。听她讲话，你会感到她和当年一样侃侃而谈。她说：“……一年四季，时节交替，大自然万紫千红，浓淡各异……在花丛深院里……阿吉艾尔阴谋的追随者们……口是心非，作茧自缚，自作自受，永久沉沦于毁灭之中……”

还是那个宋美龄，吸引从好莱坞圆形剧场到美国国会的听众的还是那套辞令和情调。然而，现在时代变了。这次，《时代》的记者大卫·格林威听腻了，走出了大厅，草草地写了一个概述。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东方幻想已经成为一场梦魇。

如昙花一现，宋美龄最后一次出风头的的时间稍瞬即逝。于是她放弃了卡洛拉马大街的房子，1966年4月，在曼哈顿格拉西广场的一套豪华公寓里定居下来，这套公寓是她的外甥孔令杰给她买的。她患胆结石多年，动过取石手术。现在她已69岁，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从那以后，她的所有美国之行，不是参加葬礼，就是治疗疾病。几十年来，她一直被西方新闻界列为在妇女界世界十大名人之一。但1967年，亨利·卢斯在浴室里死于冠心病后，她的名流地位也就告终。翌年，宋美龄确知她患了癌症。1970年，她飞往纽约，做乳腺切除手术。其后不久，她再次匆匆赶到纽约，做了第二次乳腺切除手术。

美国报纸上，关于她的报道已从头版转到社会新闻版。后来又转到食物版。1975年4月5日，蒋介石死了。美国报纸最后又渲染一番。三周后，已经当了“行政院长”的蒋经国，成了国民党主席。宋美龄已无事可干，只好开始她永久性的流亡生活。

老蒋咽气赴美就医

宋美龄除了本身无子息之外，一生享尽荣华富贵，也算是“好命人”了。她称自己一生最伤痛的事，是蒋介石的死。然而，在此前数年内，她的母家“家人丧故”迭乘，也使他相当伤感。从她 1975 年 9 月 17 日赴美就医行前发表书面谈话的开头一段，可以窥见一斑，她说：“近数年来，余迭遭家人丧故，先是姐丈庸之兄（孔祥熙）去世，子安弟、子文兄相继溘逝，前年蔼龄大姐在美病笃，其时总统方感不适，致迟迟未行，迨赶往则姐已弥留，无从诀别，手足之情，无可补赎，遗憾良深，国难家忧，接踵而至。二年前，余亦积渐染疾，但不遑自顾，盖因总统身体违和，医护唯恐稍有怠忽，衷心时刻不宁。”

宋美龄是在 1975 年 9 月 18 日由台北飞抵纽约的，据合众社和路透社消息报道，她来美是为了医治乳癌。飞抵纽约机场那一天，欢迎场面十分冷落，除了几个警察维持秩序之外，没有一个“中央级”和“地方级”的官员及侨领在场，可见一个腐败政权在外国政客心目中，简直一钱不值了。

宋美龄在台湾国民党政权中没有地位，更无发言权。蒋经国当老子一死，即演出“迫宫丑剧”，派兵包围“总统府”，由国民党中常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拥护他当国民党主席。宋美龄失去一切职权，郁郁不得志，平时只用“蒋夫人”身份接见外宾。但国际形势突变，世界各国纷纷断交，既无宾可接，又不受人尊敬，其内心痛苦可想而知。即使没病，也想远走高飞。

宋美龄在美国一住就是 11 年。此段时间，她一面迈向暮年，一面故旧日稀，其日常生活无法不日趋平静，深居简出，平常除了读报、看电视外，空闲的时间多半选择自己喜爱的书籍看。据了解：美国经常有畅销书出现，宋对一般的畅销书根本看不上眼，她喜欢读历史、传记之类的作品，而阅读的速度很快，几天就可以读毕一厚册。此外，多半是练习书法或绘画，她擅长的是兰花和山水。

岛内与宋美龄保持通信的人，计有中文及外文两要员。中文是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英文则是沈昌焕这位被称为外交上的大档头人士。秦孝仪跟宋美龄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他自 1953 年间因在阳明山受训时的一篇古朴简练的自传（当时秦孝仪只是国民党中央四组的专门委员，四组即今之“文化工作会”）获蒋介石赏识，于阳明山结业后奉令调官邸服务，迄蒋去世，他一直随侍在蒋身边前后逾 20 余年。由于常年随侍的关系，获得宋的赏识，宋的一些对外中文文稿，均出自秦孝仪的手笔。由于宋美龄信任秦孝仪，所以宋离台 11 年，中文方面的文件仍由美国电告秦孝仪代笔。1983 年，宋美龄先后发表的《致廖承志贤侄》、《致邓颖超女士》的公开信，据悉也系经由宋揭示要点后，由秦孝仪执笔。

由于有了秦孝仪、沈昌焕这两位重要人士作耳目，所以她人虽在美，但跟台湾的通讯渠道，一直保持畅通。台湾当局在处理外交及某些涉及宋的人事上问题而必须征求她意见以示尊重时，台湾当局均会很迅速的经由上述渠道获知，并立即经由上述渠道表达其意见，宋本人对岛内政情的发展，以及

有关政经方面事情，一点也不陌生。她有时也过问台湾的人事。前台湾“空军总司令”、现任台湾“华航”董事长的乌钺，在王锡爵投奔大陆的事件中，单独获得留任（总经理刘德敏等都被罢官），据悉即出自宋美龄的插手。因乌钺曾经为她驾驶飞机获赏识，宋美龄干预说：如果没有绝对的过失，不必要他去职。还问了句：乌钺犯了什么事？为什么责任要由他承担！凛于宋的锋芒，乌钺得以照坐“华航”的“宝座”。

1986年6月，蒋纬国出任台湾“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的讯息，从台湾传到纽约宋美龄的耳朵中，宋对这位一向在嘴巴上最甜的二公子，曾特电致贺，勉励他坚守岗位，做好政府及国家所交付给的一切任务。台湾，官府长官变动获得宋美龄致电祝贺的，蒋纬国似乎还是第一个。

同年10月，蒋纬国因病住进“荣民总医院”时，据说宋美龄还曾打电报询问他的病况。电报由台北转到“‘荣民总医院’蒋纬国手中时，据闻蒋纬国至为感动，立即电复其病情。

台湾岛内政界与妇女界人士赴美访问时，也多半抽空到纽约郊区宋寓邸一晤。但就这方面而言，岛内妇女界能够会晤宋的已经不多，唯有钱剑秋、王亚权及西湖商职校长赵筱梅等数人而已。但这位由宋直接提拔起来的台湾“妇工会”主任钱剑秋年岁较高，很少访美。访美必获接见。王亚权因为近年来执掌“妇联会”业务，而“妇联会”系宋当年的手创，所以也是宋愿意接见的人士之一。而赵筱梅则是昔日为宋主持过育幼院的人。其他一般的及近年来崛起的政要已经无法获得青睐了！

在蒋氏家族中，最得宋宠爱的是老三蒋孝勇。这位昔年深为蒋介石宠爱的孙儿，目前在宋心目中仍然和过去一样的得宠。蒋氏家族中如果有什么讯息需要转达时，蒋孝勇是唯一的最佳传讯使者。而蒋孝勇几乎每年都要前往纽约，拜见宋一次。四十多岁的蒋孝勇，据说在宋心目中仍然被视为当年可以坐在蒋介石总统办公桌上撒尿的小孙子。由于宋对蒋孝勇的宠爱，致使外界传言震惊中外的江南案，可能是她用来斗垮蒋经国、蒋孝武父子的一招狠棋。江南案的杀机之一是有关《蒋经国传》的续篇将揭露蒋经国传子计划，宋美龄设计让蒋孝武指令暗杀江南，一则除掉江南，二则以江南案使蒋经国、蒋孝武父子陷入泥淖，以便她和蒋孝勇坐收渔利。

宋虽然在美国长大，并在美国受教育，可是，一待11年，而周围又尽皆是陌生之人，二次大战中依然健在跟她有过多面之缘的美国友人，目前几乎已寥若晨星，他们即使尚在人间也多半风烛残年，行动不便，所以跟她之间几乎没有来往。目前在美国政坛上的要角，对宋美龄来说，多半已经是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了，跟他们之间自然不可能有所来往。因此，宋深居简出在国外待久了，自难免有思乡之念。不过，促使宋美龄结束客居生活的，恐怕还是《宋家王朝》引起的风波。

秘密大曝光

《宋家王朝》是美国传记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所著。此书从宋家之父宋嘉树写起，笔锋触及他的夫人倪桂春，他的三位小姐和他的三个公子，并且引伸到他的令媛们所嫁的夫婿，一门皆簪缨，全书形成了宋氏家族姻亲大结合。

宋家是基督教家庭，但是宋家在海外之成名，则不是由于宋嘉树之“传扬福音”，而是受惠于他的两位千金所嫁的夫君，在中国政坛上整整闻名了65年，因此，宋氏家族成员的历史，在美国成了脍炙人口的“谈天”好材料。

《宋家王朝》出版时，正是台湾为了江南命案，在美国弄得焦头烂额之时。因此该书一上市，台湾当局立即发动七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联名提出反驳，并且在《纽约时报》及《华盛顿邮报》（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文艺报纸）上登载全版英文广告，对作者西格雷夫提出指控，如此一来，该书在美国书籍市场上立时身价十倍，抢销一空。台湾一看苗头不对，马上又动员闻名世界的历史学专家黎东，单独写了一本小册子，中、英文并排由纽约《世界日报》刊印，免费赠送读者传阅，内容则批评西格雷夫是“一位喝醉酒的水手”，全册8000余字，但均属空泛式议论，未曾抓住西格雷夫之事实证据进行反驳，导致黎东本人也被人讽为“忘记了自己是被官方利用的表态小丑”，而《宋家王朝》的销售量则更上一层楼，成为1985年度美国畅销的出版品之一。

居住在纽约长岛，做为《宋家王朝》唯一活在人世的主人公宋美龄，处境十分尴尬。这本书的出版，不但揭了宋家的短，而且使这位曾风云世界的宋氏三小姐的许多秘密公开于世。

在蒋介石死前，宋美龄的年龄，一直被列为“最高机密”。到台以后，“妇联总会”虽然每年都有为“会长华诞”而举行祝寿的活动，但都没有触及她的禁忌——公开她的年龄。简单的说，她本身不提自己的年纪，也不愿意别人知道她年龄的秘密。因此，包括蒋家在内的人，多相信“她比老先生小一轮年（12岁）之说，《宋家王朝》的出版，使人们知道她的正确出生年月日：1897年3月5日（阴历2月12日）。那么，她只比蒋介石小10岁，不是12岁。

因为这一资料的出现，就引伸出另一颇饶有趣味的问题，就是她在1927年，成为“蒋夫人”时是30岁又10个月的新娘了！这在60多年前的时代，“二八佳人”（16岁）仍被视为一个女人一生中的“黄金时代”之时，30岁的新娘，是绝对的被视为“超龄”的标准。毕竟，“女人四十一枝花”的新观念，不过是最近10年，才透过一部外国影片而舶来的。60年前，中国人普遍的观念是：“女人三十老人家”。

虽然，他们结婚时，新郎蒋介石也已40岁了，可是，那时是全世界瞩目“雄姿英发”的名人。因此，有人以理推想宋美龄的讳言年龄，刻意修饰和化妆，似乎与此不无关系。

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只蒋夫人的年龄被列为“最高机密”，甚至连她的一切活动资料，也是除了官方发布的以外，其余都被视为“不得公开”者。

人们对她的认识，仅限于：她是宋氏三姐妹的“三小姐”，她的大姐名霭龄，是孔祥熙的夫人；二姐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哥哥宋子文，和姐夫孔祥熙，是1928年以后，1948年以前，权倾一时的“外戚”；此外，还有两弟弟，宋子安和宋子良，……如此而已。其他的，甚至连他们的父亲宋嘉树的名字，在以往也很少有人能说得出来的，他们的妈妈倪桂春，名字的不传，就更不用说了。

1922年宋美龄25岁时，与蒋介石初遇于上海“国父宅中”，那时宋美龄美丽如盛开的玫瑰，使蒋介石“一见倾心”。董显光著的《蒋总统传》说：

蒋总统及与宋女士相稔，知其为理想之终身良伴，而向求之不得者，故不稍犹豫，露求婚之意。”“其后5年间，蒋总统致全力于革命事业，北伐军兴，蒋总统即率师北上，此期间与宋女士函牒往还”，只有一则（情书）见于1927年10月19日天津《益世报》，这是他们结婚前一个月又十一天，被该报发掘来（或故意发布于该报）的稀少资料，文曰：“余今无意政治活动（按：这一年8月12日，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宣布辞去本兼各职。即时离开南京，经上海、宁波，回到溪口故乡，住入雪窦寺‘隐居’，以后即偕张群出国而去日本‘有意出国作五年考察与研究’。所谓‘余今无意政治活动’应系指此时‘下野’一事而言），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姊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灰绝，曩日之百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1927年9月29日，蒋介石乘日轮“上海丸”抵达日本长崎，再转云仙，探视宋母，登堂求婚。有关求婚的经过，根据上海《晨报》的报道，是这样的：

“蒋介石于10月3日来晤太夫人，事前蒋系先致电，得太夫人的许可者，相晤时，太夫人正在室中研究新约圣经，盖太夫人系一极诚笃之基督教徒也。既见蒋，勉蒋为使徒保罗；蒋告太夫人，谓对基督之道，近日亦有信仰，并乞婚焉。时太夫人以蒋对于联姻之手续，既一一办妥，毫无其他问题杂处其间，遂允其请，许以女美龄妻之。”

其实，这一段“赴日登堂拜母”的过程只是求婚的最后手续而已。10月19日在天津《益世报》发表情书，也等于电影上映前的一则“预告”。

1927年10月14日《交通日报》对宋美龄的一则专访，有四句问答，可

为参考：

问：“蒋先生谓初见女士时，已认女士为真理想的伴侣，但不知当时女士，作何感想？”

答：（女士微笑）“此乃5年前事，当时余未注意及之。”

问：“结婚问题，起于何时？”

答：“半年前，然最近始有成议。”

这里所说的，“半年前”，正是蒋介石控制东南，京、沪、苏、浙、赣、闽，尽入其势力范围，成为世界瞩目的人物之时。美国《时代》周刊也以他为封面人物，全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建立“蒋介石档案”。蒋“百对战疆，叱咤自喜”的威名，自必使三小姐也为之如雷贯耳，倾动芳心了。

1927年的四月底、五月初之间，蒋介石和“三小姐”在上海西摩路宋宅再次相遇了。蒋向宋“再申前请”，似是就在此时。

当时上海《时报》的采访主任金雄白对蒋、宋婚礼有如下追记：

蒋宋结婚的日子我是记不起了，礼堂在戈登路的大华饭店，那是上海最豪华的一家西式大饭店。当米价还是每担3元的时候，大华饭店一碟牛排，就取价4元了。

因为蒋夫人是虔信的基督教徒，因此先在西摩路宋宅，由西藏路慕尔堂的牧师余日章为他们先主持了宗教式的婚礼，观礼者限于近亲寥寥数人，连新闻记者也被拒绝参加。宗教婚礼完成后，才同车至大华饭店再补行另一次的公开仪式。

那天冠盖云集，济济一堂。这次婚礼的另一特点，是证婚人却有五位之多……记得那天蒋氏穿的是一套长礼服，蒋夫人则为白缎旗袍，他们沿袭西方的礼俗，交换婚戒，在那时是还不很多见的。

蒋宋结婚之后，宋美龄对中国政治所发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样，凡奔走夫人门下的人，也能获得夫人逾恒的庇荫，而青云有路，长保禄位。如曾任台湾情报局局长的汪希苓，原出身于海军军官，与军统可说毫无渊源，虽然曾担任过驻意大利、驻美等大使馆海军武官之职，但那仅属于静态情报工作，与情报局的“特务”工作有着很大的差距。按常规，不论从什么角度去考量，都不应该由他出任斯职的。然而，却因为汪希苓曾为官邸的海军侍从武官，又是宋美龄“赴美就医”的侍从官，把宋侍候得非常满意。宋为免他的军职年资中断，仍将他挂名在驻美“使馆”沈剑虹大使之下武官处为海军武官；台美断交之后，仍安置在北美事务协调会代表处担任一年多顾问。汪回台后，宋笃念他侍候一场的心意，多次电话回台，终将他安排为情报局副局长，继而晋升为局长。

宋美龄的随身女佣蔡妈，是来自娘家带到蒋家的梳头娘，由 1927 年侍侯到 1971 年，在官邸中，除了“先生”夫人之外，蔡妈的权威几乎超过了侍卫长；因为只有她一人敢于和“先生”夫人顶嘴，一旦她发了脾气，宋美龄是什么辙也没有，甚至还要向蔡妈说好话哄她回心转意。同时，宋美龄出外，不论是随蒋介石出巡，还是赴埃及参加开罗会议……蔡妈也都是列为第一随行人。西安事变时，蔡妈也随宋美龄入陕，黄仁霖在回忆中有如下的描写：

到上午 10 时左右（按：指 1936 年 12 月 25 日）……隔了片刘蒋夫人自己走出来，并且告诉我，委员长和她当天下午离去。她要我随后收拾一下，最后命令说：“不要忘记把蔡妈带出来，这是我忠诚的女佣。有一架飞机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你们明天可以出来。”那天蒋自西安飞往洛阳，由于飞机上座位已满，宋为了蔡妈和黄仁霖，还特别准备另一架专机，于第二天起飞。

当时，国民党留在西安的军政大员，尚有：蒋百里、朱绍良、陈诚、蒋作宾、卫立煌、陈继承、万耀煌、陈调元等一、二十人，他们不仅都未及与蒋宋同时离陕，甚至也未能与蔡妈同行。经过这一比较之后，若干有“政治眼光”的人，走夫人路线也兼走“蔡妈路线”，甚至专走蔡妈路线，也没有什么好奇怪了。国民党逃台以后，陈诚到官邸请谒之时，总是先打电话给侍卫长，问明了蒋介石召见的的时间，又请侍卫长安排向宋美龄请安的节目，待见过蒋之后，侍卫长将他导入宋美龄的会客室，当宋尚未出见，蔡妈出现时，这位省主席都会向蔡妈起身肃立说：“向蔡大姑请安！蔡大姑好！”演出现代《官场现形记》的活剧。甚至“孔二小姐”经营“圆山大饭店”也与蔡妈相结纳，奉蔡妈为常务董事，经常报效，以求内宫之中布一棋子，获取更大效益。“孔二小姐”为椒房懿亲，尚且如此，况乎他人？宋美龄出门，除了蔡妈为必携从者之外，她所带的行李也是非常可观的。现在的波音 747 宽体专机对于载运她的随员及行李，自是绰绰有余；但是在二次大战期间，她赴美之行，“美龄号”专机（四引擎的 DC3 型，当时称“空中霸王”机）尚不够她和她的随员、行李使用；美国陆军还另派一架 DC4 型运输机，运送她的衣物箱笼、化妆品以及部分随行下级人员。据白宫所留下来的纪录，宋美龄在白宫做罗斯福总统的贵宾时，连使用的丝质被单，都由中国带去。她的被单至少每天要更换一次，有时一天更换四、五次之多。

在美国白宫作客时的宋美龄，也展现了“她鞋子上带的珍珠”。这鞋子上的大珍珠，是从清朝皇太后的凤冠上取下来的。据说，1928 年原军阀张宗昌的部属孙殿英，在河北遵化县马兰峪清朝的“东陵”发掘了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的陵墓，盗取殉葬的宝物，而后，孙殿英“给蒋介石新婚夫人宋美龄送去了一批宝物。慈禧凤冠上的珠子成了宋美龄鞋子上的饰物。”

重返台湾牵动政坛

1986年秋，尘封11年的“士林官邸”再现新貌。由于十多年未曾使用，许多用品已腐朽损坏。整修后既要符合宋美龄的生活原则，又要保持过去的情调，台湾有关部门颇费匠心。1986年10月25日，85岁的宋美龄，乘坐“中华航空公司”的珍宝专机，从她美国纽约长岛别墅的隐居地，返抵台北。10月31日，台北举行了历时40分钟的蒋介石百年诞辰纪念大会，宋美龄成为纪念会瞩目的主角。她大部时间坐在轮椅上。

台湾“中央社”报道说，已属高龄的宋美龄，健康看来还算不错，虽然经过长途旅程，但她还是“容光焕发，很高兴见到亲人及老朋友。”

据台湾分析家观察，宋美龄返台，是蒋经国要表现台湾各方面的团结，及调和与元老派、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商讨晚年接班大计，以应付1987年国民党“十三大”的新局面。

宋美龄虽然长久不在台湾，但她仍保留着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天主教辅仁大学信托基金会主席和多个妇女及慈善团体的头衔，更重要的是，她是蒋介石的夫人，她在台湾依然有一个根基雄厚的班底。

1986年11月30日《纽约时报》将已经移到社交版的宋美龄报道复原，在头版登出了宋美龄的照片。照片的小标题和说明文字是：“仍具影响力：蒋介石夫人在美国待了11年后，已返回台湾。”在第28版上，时报刊出了一则美联社发自台北的长篇电讯，标题说，蒋介石的遗孀在台湾仍是“一股力量”。

《纽约时报》说对了。宋美龄在岛内政坛可能发生的作用确实不能忽视，回台后，她曾多次接见台湾党政军要员，蒋经国去世后，李登辉也几次前去“官邸”向宋请示汇报。由于她对蒋家和岛内党政军人物的深远影响力，在台湾的政治的运行中，自然难免流露出她影响力的轨迹。最明显的例证莫如国民党中央妇工会主任钱剑秋，虽已80多岁，但仍然不为潮流所动的屹立在“妇工会”，“除非有蒋夫人一句话”否则准也不能动她。1987年，“太平洋文化基金会”执行长李钟桂（国民党中常委、原“法务部长”施启扬的夫人）出任台湾“救国团”主任，就是钱剑秋屹立不摇的证明，李钟桂原本想当“妇工会”主任多年了，而终于出任台湾“救国团”主任。如果不是出于宋的认可，钱剑秋的情形根本不可能存在。

有的报道认为，与官邸具有深厚渊源的“励志社”系统，和宋美龄关系极为密切。甚至官邸的侍卫人员均出自此一系统。蒋经国死后，这些人又活跃了。这种说法，只有一半正确。“励志社”确系宋早年创设，从事“服务性”工作，致官邸某些事业性工作，也由“励志社”负责，唯侍卫一则由军警系统甄选可靠人员充任。当时“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确为宋手下大将，她对外的联系，常由黄仁霖负责。张学良西安事变前要见蒋介石，则先通过张群安排，而他要见宋美龄时，则不通过张而必须请黄仁霖先行联系，由此

可见黄仁霖在宋面前份量之重。不过，后来黄仁霖出“使”外国，而“励志社”副总干事黎离尘又于60年代中期死去，“励志社”如今几乎已告名存实亡了。

在当今台湾不易化解的权力内斗中，宋虽已难于一一干预，但对某一极重大的人事安排却想积极影响。

蒋经国死后，国民党在1988年1月27日的“中常会”中，依原定剧本，推出李登辉担任代理党主席，但是本戏上场的前一天，“夫人派”仍然展开最后反扑，于26日晚在士林“官邸”集会研商对策。出席的“夫人派”及“官邸派”要角，包括俞国华、沈昌焕、秦孝仪、曹圣芬、宋楚瑜等人，李焕也在座。宋美龄力主由李焕取代李登辉，担任代理党主席，以免出现台湾人总统兼台湾人党主席，但遭到李焕婉拒。会议一直迟延未决，直至深夜，还未能获得结论。其间，与会人士也曾以电话向部分中常委征询意见。

在此项会议彻夜未决之际，李登辉也获得风声，知道剧本可能有变，急得一夜未睡。眼看连日来的运作，即将水到渠成，却在最后关头面临全盘皆输的局面，难怪他焦灼不安。

而参与此项高层会议的中常委，也彼此互通讯息，每个人的立场不同，观点不同，有人希望维持原议，支持李登辉，有人则盼望推翻原议，从中牟利。于是在27日“中常会”前夕，台北政坛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谁也不敢确定第二天的“中常会”上，谁会是最后的胜利者。

在李焕的力拒之下，原定的推举李登辉计划，仍然按剧本进行，但为了作最后的确定，怕“夫人派”及“官邸派”在最后一秒钟又有动作，李焕事前即已完成30位中常委连署支持李登辉的文件，在“中常会”举行前几分钟，李焕、俞国华及当天主持余纪忠，开了一个临时三角会议，确定照原计划进行。于是由俞国华在“中常会”上正式提议由李登辉出任国民党代理主席，余纪忠为了更进一步确定全体中常委的意向，请所有中常委一致以起立鼓掌的方式表态，于是出席的27位中常委一致起立鼓掌，主席之争乃告落幕。

在“中常会”举行的同时，李登辉在“圆山忠烈祠”向蒋经国遗体行礼致哀。由于临时状况不明，李登辉神情凝重，心情不佳，拒绝摄影记者进入灵堂摄影。侍卫人员表示，李登辉今天心情不好，希望记者不要接近，制造困扰。此一状况，与26日上午李登辉兴高采烈，让记者进入灵堂拍照，不可同日而语。

李登辉的心情不佳，除了对情势变化失去绝对的掌握，不知能否顺利接任主席的因素外，另一个原因，是感到有失面子，因为即使“中常会”全体通过由李担任代理主席，但前一天党内高层彻夜讨论是否由李焕取而代之，对李登辉而言，颜面全失，而且预告了未来的领导权威将无法充分发挥。

李登辉在获知“中常会”通过他的职位之后，并没有欣喜若狂，而是心境复杂，立刻与心腹亲信研究今后的情势，以及应有的动作。在“十三大会”之前，李登辉的假想敌除了俞国华之外，又多了一个重量级的李焕，加上“官

邸派”及部分台籍政客的掣肘，李登辉感到今后的日子并不好过，必须步步为营，厚植实力，才能将既有的局面稳稳抓住。

残梦难圆寻求解脱

宋美龄返回台湾后，士林官邸的编制，从秘书到侍卫班，一切照旧。蒋经国死后，官邸有关运作自然格外忙碌。她说过“我将再起”但毕竟年事已高，行动已不能与昔日同言。据说，这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一星期中在官邸小型教堂祈祷或阅读圣经占了2小时，牧师每天不间断地主持教堂圣事，分别以中、英文讲解教义，每周三和周日，蒋纬国以及“孝”字辈的家人们，都会齐集在官邸教堂做礼拜并聆听讲道，而每周两次与家人聚会，也是宋最开心的时刻。

除了在教堂外，透过电讯传真机立即传送的几份美国当天报纸，亦属宋每天必读课程。英国维氏新闻社通过人造卫星传送给台湾三家电视台播出的国外重大新闻，她也每日必看，此外，精简过的台湾电视新闻则利用晚餐过后的时间观看，至于岛内报纸，她则看剪报而已。另外，还有英文《新闻周刊》和《时代论坛周刊》，皆为她心爱读物。

自1988年在国民党十三大上以微弱的声音问“各位同志，你们好吗？”并且由李焕代读一篇“老干新枝”的讲话稿之后，宋美龄就一直没有公开露面。一位接近蒋家的人士指出，宋美龄虽然外表看似坚强，但内心却无比落寞。其实她的这种感觉，也不怎么令人感到意外。

台湾岛内的政治环境近年来大幅度地波动，对她越来越加不利，批评性的翻旧帐的指责与攻击，陆陆续续的向她身上发射。“官邸派”人士认为这种情况对她身心方面的影响，相当巨大。1989年4月间为了蒋介石的去世14周年忌辰而专程回台一行的孔家兄妹，以其对宋最具影响力的地位，曾向她进言，回到纽约去住，以避掉身心上可能受到的困扰。可是，据了解，孔令侃、孔令伟兄妹的建言，并未发生他们应有的效力，宋及其扈从仍然留在士林官邸，丝毫不为所动，而且并没有在适当时间内离台的计划。

宋美龄不愿意再兴师动众离台远行，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她身体上的原因，实在不便于远行，坐在轮椅上远走异国，总是一件极其麻烦的事；另一个是事务上的原因。所谓事务上的原因是指飞往美国去的专机及待从人员的跟进，以及其在官邸内费用的拨付等等。蒋家人已不当权，李登辉恐怕无法为她拨专机，拨专款，以支付其费用等等。如果有一天要回来的话，松山机场（宋前此回时系在松山机场降落的）更不可能冠盖云集，甚至可能会发生“归不得”的情况，因此，“官邸派”的智囊考虑的结果，仍以不走为宜，而据了解，宋也确实不想走，“这是我的国家，我为什么不能长住。”这两句话据说仍常挂在她的口边，所以宋一时是不可能远赴美国了。

1989年6月举行国民党十三届二中全会时，有人预测她可能再以中央评

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的身份露个面，给李登辉一点面子，可是，结果并未如报纸上的所料露面，反而二中全会在5日闭幕当天下午，还通过了一封向宋致敬电文，让始终未出席二中全会的她，来个风风光光的下场，政治措施的玄妙，往往令人有意想不到之处。

可是宋虽然未曾出席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但是却在这之后的半个月的时间内，先后两次公开露面。虽然因不便于行而必须坐在轮椅上出现，但是就其外表上及其讲话的声音等方面看来，她除了步行稍稍困难以外，健康情况够得上“尚称良好”四个字的评语，因此，她为什么对国民党二中全会这么重要的集会不参加，而坚持要参加两个完全属于私人事项的集会呢？也许这是为了报复。据可靠消息透露，2月22日是宋美龄的生日，1989年2月中旬才从“荣总”出院的她，曾指示侍从电邀党政大员到士林官邸祝寿，宋美龄还曾乐观的估计说：“士林官邸很久没有热闹过了，这也好，人多一点总是有面子。”据说，宋的侍从为了不浇“老夫人”的冷水，亲自打电话给党政大员，请务必参加，否则“蒋夫人”会不高兴。

侍从的电话也打了，据悉上至李登辉以及军方将领都是他们函邀的对象。可是宋美龄的估计乐观了，22日前来官邸祝寿的人士，除了沈昌焕、黄少谷等极少数“夫人派”之外，现任党政军的要员几乎不见踪影，顶多只送来了花篮或喜幛。这种情形一度使得她震怒不已，把侍从人员教训得体无完肤。一位官邸人士曾经将此情形告诉某报记者，并感叹地表示：“老夫人现在是寂寞的老人，3年前她甫回国定居时，谁不把她捧得高高在上，如今蒋经国一死，当年对她马首是瞻的人却一个个退避三舍，这真是政治的现实与无情。”

宋不出席国民党十三大二中全会多半是有意让国民党当局难堪。据说“夫人派”的国民党元老最近常在一起，对现况有了不满之情。他们针对目前岛内掀起的“批蒋”风潮及污蔑“蒋公”铜象的作法最为气愤填膺，一个个的慷慨陈词。这些“国之大老”认为，要是几年前，这些“中共的同路人”早应该一网打尽，以免败坏社会风气。提及此时，有人就顺势喋喋不休地批评李登辉没有魄力，让异议人事予取予求，置当局的威信不顾，实有“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之嫌。甚至也有人以为，李登辉一上台后，不只是外交违反基本“国策”，许多政治走向也都在打蒋家的耳光，教人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有人拍胸脯保证，凭其在“国民大会”的影响力，必定要使90年3月的“总统”大选，让李登辉栽个大筋斗不可，即使拉不下李登辉，也要叫李登辉在得票数上极为难堪。于是一项“反李拥蒋”的运动在国民党内部悄悄连署运作。

以军系“国代”滕杰为首的“国代”及“立委”于1989年10月15日成立了“中华民国各界支援贤能人士竞选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贤会”），正式揭开了1990年台湾第八届“总统”选战的序幕。据台湾《民进周刊》透露，“中贤会”的幕后策动者不是别人，正是一直想重建“蒋家王朝”的宋

美龄。她为了取信于办事者及显示“复辟”决心，还特地从美国汇回 20 亿美金，作为“中贤会”的活动经费和“总统”选举时贿选之用。

虽然滕杰在接受访问时，一再否定这个组织是为“总统”选举而设，它只是一个助选运动，目的是要集合“国会”中资深“国代”的力量用行动来援助具有同样理想的外省籍第二代、第三代参与选举。但明眼人一看即知，“中贤会”成立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完全是针对 90 年“总统”大选而设的，目的有二：

一，展现实力，逼李登辉接纳他们的主张。

二，如果李登辉不顺他们的意，他们也不惜推出人选，和李登辉决一死战。

“中贤会”的盘算一共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仍然支持李登辉当“总统”，而“副总统”则由外省籍出任，理想人选就是蒋纬国；第二个层次则是根本推翻李登辉，而另行推出“总统”与“副总统”。后者又分两个方案，或由外省人（蒋纬国）搭配本省人（林洋港）；或顺应本土化潮流，由林洋港搭配蒋纬国，与李登辉针锋相对。

就第一个层次的构想而言，李登辉如果屈服于资深“国代”势力，表明提名蒋纬国为“副总统”之意，一场政治风暴可以化解，但以李登辉的个性而言，不太可能接受，而且李、蒋之间也有心结存在。

再就第二个层次的构想而言，林洋港搭配蒋纬国，确实有一定的号召力。因为林洋港的资历、地方基础、民间声望及政治手腕，都不下于李登辉，而且同为台湾人，正好可与李登辉抗衡。而蒋纬国有蒋家背景，对保守派而言，蒋家标记仍然颇有魅力，而且蒋纬国在台湾的军政界及民间也有一定的声望，用于搭配林洋港，正可平衡省籍与年龄上的差异。

面对这种情势，李登辉的回应方法，除了透过国民党的系统极力疏通“国民大会”之外，并拉拢“行政院长”李焕，有意以李焕作为“副总统”人选，借重李焕在“国民大会”中的力量，而李焕对此也有正面回应，在“立法院”公开表示服从李登辉领导。“二李结盟”对抗“林蒋阵线”，双方的过招对垒十分精采。

然而，时不我与，随着蒋纬国竞选“总统”的失势，蒋介石的铜像到处被涂黑、砸毁，甚至竟有人要以“台湾共和国”或“台湾”来取代“中华民国”，而李登辉在明里、暗里支持“台独”或“独台”，使宋的心境极其难受，于是决定改变以往的主意，到美国“长期休养”。

宋美龄这次飞往美国，并非象以前那样由“总统府”安排，而是由孔二小姐孔令伟负责一切事宜。尽管“华航”为送宋，将头等舱改装卧铺，并精选 7 名优秀空服人员随时提供服务。并由董事长乌钺亲自护送到纽约肯尼迪机场，但终究缺少官方味道，气氛不足也。台湾报刊比喻说，宋美龄带走的将是蒋家王朝的最后一片云！

回台探望孔二小姐

1994年11月18日晚上，躺在振兴医院八楼VIP病房半年、已经昏迷多日的孔令伟（孔二小姐），终于走完她神秘的一生。

19日，振兴医院为孔二小姐设置一个简单的灵堂，但一天几乎没有党政要员来祭拜。孔令伟之死，早在振兴医院医师的预料之中；虽然在9月中旬，因为宋美龄返台探望她，病情一度略有起色，但因其病情已是癌症末期，癌细胞也已转移到许多地方，各种器官的功能逐渐丧失，最后终因心肺功能衰竭而病逝。

在孔令伟过世的前一天，病情已经很糟，不仅呼吸、血压都靠药物在维护，而且人已完全昏迷，随时都可能去世，医院甚至已经把太平间都准备好了。振兴医院向宋美龄报告，孔令伟的病情相当危急，并询问她是否准备回台看孔令伟的最后一面？

由于宋美龄到美国还不到两个月，而且她95的高龄并不适合这么密集的长途飞行，因此，她不打算再回国，而是请孔令伟的姊姊孔令仪回台料理后事，孔令仪回台时除了携带一具铜棺之外，并有一位替孔令伟遗体化妆的化妆师同行。孔令仪在接到振兴医院的越洋电话后没多久，就立刻搭华航的飞机返台；可惜个性强悍的孔令伟尽管一生对许多人颐指气使，却等不及再见姊姊的最后一面了。

振兴医院的内部人士指出，在宋美龄回台的那段时间，孔令伟曾奇迹似的清醒，当时原本抱着送终心情返台的宋美龄相当高兴，才会在振兴医院8楼、孔令伟的病房隔壁住了好几天，同时口头批准振兴医院员工的加薪案，使得振兴医院员工的薪水水准得以和“荣总”并驾齐驱。

据透露，在宋美龄回台之前，孔令伟已经昏迷两个礼拜，振兴医院的医师几乎已经要宣告放弃；所以，宋美龄回台前是计划住在官邸，同时把这趟台湾之行，当成是为她视如己出的孔令伟送终。因此，9月10日回台当天的行程本来是先到慈湖谒陵，再到医院探视孔令伟，随后就回官邸。没想到当宋美龄踏进孔令伟的病房、一讲话之后，不醒人事许久的孔令伟居然睁开了眼睛，这个奇迹似的现象，不仅令医护人员傻了眼，宋美龄更是惊喜万分，稍后她便决定暂时不回官邸，先留在振兴医院陪孔令伟。

往后的几天，孔令伟的状况持续好转，为方便抽痰，医疗人员也为她施行气管切开术，据指出，在那几天，只要宋美龄跟孔令伟说话，孔令伟似乎都能听到，而且也有一些反应。这点让医疗人员十分诧异，因为在此之前，孔令伟的状况相当不稳定，意识时而清楚、时而模糊，高烧不退，癌细胞已转移到肺部、泌尿系统……。这件事也让医疗人员对孔令伟与蒋夫人之间的情感，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

宋美龄在台湾的10天里，并没有接见什么特别的人，她的耳朵有些重听，不过身体状况仍然相当好，她除了关心孔令伟的病情之外，也相当关心

振兴医院员工的待遇和福利。

本来，宋美龄没有回台的打算，最后决定回台是在相当突然的状况下决定的。据指出，在宋美龄回台前的两三个礼拜，振兴医院的副院长宋怀锷曾到美国向她报告孔令伟的病情；宋告诉宋美龄，孔令伟的情况很不好，她听完心情相当不好，不过当时并未表示要回来探视，也没有准备。一直到宋怀锷回国一星期之后，美国方面才突然来电话说，宋美龄要回台探视孔二小姐。

听说宋美龄要返台。“总统府”秘书长蒋彦士立刻到振兴医院探望孔令伟，在此之前，蒋彦士几乎从未去看过孔令伟，因此，医院内部的人认为，蒋彦士到振兴医院的主要目的，应是了解宋美龄要返国的状况，孔令伟的病情他倒不是很关心。据指出，孔令伟对李登辉“总统”本来就没什么好感，前一阵子更把李从振兴医院的董事名单中除名；同样，李登辉对孔令伟也很“感冒”。不过，在孔令伟卧病的这段时间，前“行政院长”郝柏村、蒋纬国倒是曾多次前往探视。

振兴医院一般的员工对孔令伟都没什么好感，她身边的护士对她更是又怕又恨。不过，孔令伟生前把三总的换心权威魏铮医师，延揽到振兴医院，并且花了两亿元采购和心脏手术有关的器材，这一点倒是得到医院内部许多人的肯定。

一位振兴医院的医师回忆孔令伟从生病到病故的过程时感叹地说，孔令伟个性孤僻、自以为是，又喜欢自己当医生，是她自己把自己医死了。这位医师说，前年孔令伟因为肚子痛在美国就医，结果美国的医师告诉她她是肠阻塞，必须开刀，自认对自己健康很有把握的孔令伟很不以为然，没多久就搭乘华航的飞机返台。

回台后，孔令伟随即住进振兴医院，振兴医院的医师认为造成肠阻塞的因素很多，因此，先替她验血，结果发现直肠癌的指数很高，医师们便推测可能是直肠癌造成了肠阻塞。但孔令伟却坚称她的肠阻塞是以前动盲肠手术的后遗症，因此自己找来中兴诊所心脏科的俞瑞璋帮她开刀——要医师当成因盲肠手术造成的肠阻塞来开。

结果，刀一开就发现直肠附近有一堆东西，医师们判断可能是直肠癌就立即缝合，拖了几天才由三总的周良骥医师二度开刀，把癌细胞切除。由于孔令伟当时的癌症还属早期，再加上手术相当成功，因此，医师们判断大约有80%的5年存活率。

手术后，医师建议孔令伟接受化学治疗，但孔令伟认为没必要，随后又飞往美国替宋美龄过寿，没多久，癌细胞转移到肺部，孔令伟的身体捱不住，再度飞回振兴医院。回台后，医师建议使用化学治疗，但孔令伟坚持要照钴60，奇怪的是，她的癌细胞已蔓延到左右两边的肺，孔令伟却只愿意一边的肺照钴60，最后，一边肺的状况好转，另一边的肺则日渐恶化，癌细胞从肺再转移到肾脏、泌尿系统、淋巴腺……，终于导致不治。

比较令人好奇的一个问题是，在孔令伟过世、蒋孔宋家族正式从台湾淡

出之后，振兴医院、华兴中学、圆山饭店这些蒋家过去的产业，会产生何种变化？谁又会是蒋家在台湾的下一个代理人？半年前，宋美龄曾正式下过条子，要孔令仪接棒管理这些产业；而李登辉表示圆山饭店的经营，尊重蒋夫人的意见，但是这一切会如何演变，还有不少变数。可以确定的是，蒋孔宋家在台湾，已经划上了句点。

为孔二小姐送葬

在纽约市曼哈顿上东城著名的堪贝尔殡仪馆，“孔二小姐”孔令伟安详地躺在沉重硕大的铜棺里。

银白色的铜棺，下半部缀满了花朵，上半部棺门打开，躺着一位中年贵妇，深蓝色的长袍，头发松松地向后梳，面部表情平静而安详，方形的脸显得很有福气，脸上完全没有皱纹，一点也不像 70 多岁。这和传说中达官贵人都怕三分、喜作男子打扮的“孔二小姐”，不像是同一个人，倒像是中国古时的女豪杰花木兰，在尘世征战之时作男子打扮，回老家之后便“还我女儿身”了。

孔令伟的灵堂设于这家曾为很多著名人士办理后事的殡仪馆四楼，这一层楼有三间灵堂，孔二小姐所占的是梅迪森北厢房。乘电梯到四楼之后，经过宽敞的走廊，走到尽头便是灵堂，这一中型大小的灵堂四周摆满了花牌，而这些花牌上 90% 的下款都是英文，中文的花牌只有熊丸、王晶、警卫室等少数几面，而这些中文花牌上款都尊称孔令伟为“总经理”。

据说，这位在蒋公官邸中最有权势的人物，官邸上上下下都尊称她为“总经理”。而这位女总经理，经常都是西装革履，作男士打扮；而且不只是在官邸，她在外也是着男装，即使是在美国白宫作客，当时的罗斯福总统即直呼她为：“BOY”。

据资深记者陆铿表示，1943 年当他在“中央电台”任传音科总干事时，曾在孔祥熙公馆“范庄”录音，在客厅中便见到了孔令伟。那时她穿蓝色绸子长袍，长袍袖子翻起来露出里面的中国式对襟白衫，完全是一副翩翩佳公子的打扮。

在 20 世纪末的今天，个人的隐私权较获尊重，男女界线也变得较为模糊，女扮男装不是一件很特别的事，但是在三四十年前，这种行为使本来身分已很特殊的孔二小姐显得更特立独行；也因此产生不少的传言。陈诚出任湖北省主席时，就曾传言其属下的一位建设厅长，竟然被孔令伟绑架失踪，后来经过陈诚报告蒋介石后，人才被放出来。像这类的传言，当时流传很广。

由于孔令伟平日住在“深宫”之中，很少外出，所以难得有人见到她的真面目，但资深记者龚选舞却曾有同时见到孔家大小姐与二小姐的经验。这位曾任《中央日报》驻巴黎特派员的记者，与故船王董浩云私交颇深，1970 年龚在纽约《美洲日报》任总编辑时，有一天突然接到董浩云的电话，约他

去“广州楼”餐馆。龚用餐到了一半时，董浩云突然对他说：“选舞，你今天真的很荣幸，坐在孔家大小姐和二小姐中间。”

龚到那时才注意到左右两位中年妇人。但他对她俩的印象却是：“斯斯文文，和蔼可亲，一点也不像外传的那种飞扬跋扈的样子；孔二小姐穿的也是女装，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孔令伟的丧礼为1994年11月14日和15日两天，在这座内部陈设古色古香的殡仪馆里，接受亲友吊祭；而殡仪馆职员们表示这是一次“私人性质的丧事”，严禁记者们进入殡仪馆。但因为记者们风闻宋美龄要前来吊唁，所以苦苦守候，由上午一直等候到下午6时，却没有看到这位90多岁的前第一夫人。

到了16日上午9时许，孔令伟的灵柩移灵到附近的方砖教堂，安置在讲坛上，四周满布香烛花牌。10时10分左右，30多位亲友先后抵达教堂，包括孔令杰、蒋纬国夫人、蒋孝勇及协调处驻纽约办事处处长吴子丹等。宋美龄则于11时前，在随侍挽扶之下，步入教堂。

根据教堂的说法，这一次追思礼拜也是“私人性质”，所有的记者都不准进入，只有少数的一两位记者获准进入，参加了这次历时20多分钟的追思礼拜。据转述追思礼拜开始时，宋美龄尚能自持；但到了牧师祈祷时，对孔令伟“视同己出”的宋美龄，曾一度失去控制，掩面哭泣。

宋美龄对孔令伟的宠爱，官邸人人皆知。而宠爱之深，更使外界有很多传言，指孔二根本就是宋美龄所生，甚至连男主角的名字都说出，即曾任南京市长、广州市长的刘纪文。陆铿也听过此一传言。1949年10月，陆铿住在中国驻日代表团宾馆时，曾和刘纪文住在一起。陆铿身为记者，当然不会放过这一机会，在和刘闲谈时，问起了他和宋美龄之间的关系。当时刘纪文只承认他的太太是宋美龄所介绍的，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时，刘纪文则是男傧相。他只说：“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另外，也有人计算时间，指刘纪文赴美留学是1920年，而孔令伟出生于1919年，所以这一传说并不成立。

孔二小姐的追思礼拜结束之后发引灵柩，送葬车队在寒风飒飒的初冬，向北方的上州疾驶。大约50分钟之后，抵达了威斯彻斯特县哈斯岱市附近的芬崖公墓。孔家墓园是一个室内墓园，位于一座专门安置灵柩及骨灰的大厦三楼。

记者们先行抵达，在大厦门口守候，宋美龄乘轮椅进门时，大家纷纷抢起镜头。但这时哀痛非常的宋美龄表示她不想拍照，记者们也很尊重地停止动作。

在三楼的孔氏家族室内墓园，典葬牧师行礼祈祷之后，银白色的铜棺嵌入第四层，下面依次是其兄孔令侃、父亲孔祥熙、母亲宋霭龄。

葬礼后，宋美龄要求众人暂离，让她单独在墓前哀悼。众人离去时，看见这一位90多岁的老夫人，单独站在墓前，大家都感到她那白发人送黑发人

的悲哀。

一次历史性的华盛顿之旅

盛夏的华盛顿，燥热不逊台北，19世纪许多欧洲国家驻美国外交人员还因此可获“艰苦地区”加给。然而，19世纪末出生的宋美龄，却于1995年7月26日下午，不畏骄阳，进行了她人生旅程上的另一次“历史性华府之旅”。她是应美国国会之邀，前往华盛顿国会山庄，出席为庆祝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而为她举行的敬酒会。

52年前，1943年2月，也就是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14个月，宋美龄曾到华府拜会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及国会，呼吁美国朝野支持对日苦战了5年多的中国，一尽盟友之义。

当时，她于2月18日分别应邀对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演说，是继荷兰女王之后第二位到美国演说的女性，更是第一位获此特殊待遇的“平民”。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当时为示支持国民党政府，特斥资出版了图册，记录她那段期间在全美奔走争取奥援的经过，这本图册的书名，正是：“中国第一夫人历史性战时之旅”。

宋美龄后来也曾数度访问过华盛顿，但除了1965年3月18日应邀到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演说，公开的活动并不多。那个时候，新中国已经成立，美国虽然在外交政策只承认“中华民国”，但美国朝野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称呼中国。

96岁的宋美龄，重临旧地，风光程度虽不比1943年2月18日应邀分别向美国国会两院演说的“中国第一夫人”，但人们从布置在国会参院罗素大楼致敬会场及双橡园的历史镜头里，仍可一睹她当年的丰采。

她从步出专机的那一刻起，就展现了过人的体力，在平地上她不坐轮椅，坐着接受中外人士致意时，也频频起身答谢。步出户外，她在孙子蒋孝勇及姨侄孔令杰之子的搀扶下，高声向美国各地侨界及台湾起来的群众问安，并不时含笑挥舞手帕并以飞吻致意。

下午两点左右宋美龄进入双橡园休憩，并进午餐。刚接受700多侨界人士夹道欢迎的她心情好，胃口亦佳，吃完一份牛排。据驻美代表人鲁魏照华表示，蒋夫人喜爱西式及江浙口味餐食，口味清淡。

下午5点，宋美龄在扶持下步入会场，她身穿枣红黑底条纹旗袍，外罩黑白相间披肩，胸前别着蝴蝶形翠玉，搭配翡翠耳环与手镯，神情愉快。美国参、众议员及来宾们列队向其致意，她坐定后，先由被看好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尔趋前向她致敬。

致敬会主人赛门在致欢迎词时表示，很荣幸能在二次大战结束50周年时，有机会向二次大战硕果仅存的重要人物致敬。他说，宋美龄的光临让大家得以重温历史旧梦。距离上次在美国国会的演说，已经52年，漫长的岁月

过去，宋美龄在国会致敬会上的致词“返璞归真”，没再使用当年令美国新闻记者都得去翻字典的艰深用语。她说：

杜尔参议员、赛门参议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首先我要表达我的欣喜心情，因为诸位还能记得战时盟友中国的一位老朋友。

1943年2月18日，我应美国国会之邀，向参众两院发表演说。当时我曾说，我年少即负笈美国，在美国成长，并在美国完成了大学学业，因此，我一直把美国视为我的第二故乡，今天能够回家，自是非常欣喜。

容我提请诸位回想1937年至1945年那段岁月，1937年7月7日，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而在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前4年半里，中国孤立无援的独立抗战。一直到日本于1941年12月7日发动珍珠港事变，美国第77届国会对日本宣战后，中美两国才结为盟邦，两国的同心协力，奠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在1945年获得最后胜利的坚实基础。

在我与诸位共同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的此一伟大历史性时刻，我无法不想到那次战争的悲剧以及那些血泪交织的岁月，更无法忘怀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道德勇气。我也要藉此机会，对美国人民以精神及物质援助我的国家——中华民国，表达衷心感谢。

最后，我祝福各位健康、快乐及成功。愿上帝保佑诸位。

致敬会现场的一位美联社的资深记者说：“我觉得她的腔调及咬字比撒切尔夫人的演说还要吸引人、有力。”前美国总统尼克松之女翠西亚在夫婿陪同下，也参加了致敬会。

翠西亚回忆大约40年前，尼克松出任美国副总统时，宋美龄曾至他们家中拜访，当时她大概只有9岁，她请宋美龄在宾客签名簿上签字，宋特别在上面写“给我的小朋友翠西亚”。翠西亚一直都觉得很荣耀，也非常珍惜这个经验。7名热爱中国的飞虎队成员，26日也出席了国会向宋美龄的致敬会。他们个个精神饱满、兴致勃勃，而且看到华人就喜欢用中文说“你好”、“我会说中国话”等等，在会场相当引人注目。

曾任14航空队协会会长的当年美国空军上尉副官黎满伦，在会场拿着他当年的中文名片献宝。他还带来飞虎队成员给宋美龄的纪念牌。

她代表的那个时代以及她的家族在中国政坛的风风雨雨，一直是台湾内部政治反对运动的攻击题材，此间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甚至还发表过声明，指责美国国会参议员赛门、杜尔不该发起此一致敬活动。但或许是那个时代已然过去，宋美龄在华盛顿的这一天，并没有遇到任何不愉快的场面。不论在国会大楼外或是双橡园内，围绕在她身边的都是敬爱她的黄埔、妇联会、官邸旧属及支持台北执政当局侨社人士及他们的下一代，台新党也发动了上百位群众加入欢迎阵营。

傍晚，宋美龄出席国会山庄的致敬会后，再回双橡园，一向被认为很神秘、老是避开群众的宋美龄有一段“走入群众”的表现。

台北驻美代表处在双橡园楼邸入口处铺设了一长条红地毯，以便宋美龄能在前往欢迎的侨胞及新闻界视线所及处，由礼车右后门下车，接受献花。但宋美龄人却选择从礼车左后门下车，在孙子蒋孝勇及内侄孔令杰之子的搀扶下，走向妇联会华府分会的代表。

来自美国的侨界代表和台湾来的故旧们来到了双橡园。妇联会秘书长辜严倬云、中国国民党妇工会主任林澄枝和黄埔同心会代表，分赠礼物、纪念品给宋美龄，她接过这些礼物，非常开心，直说不敢当。

国会山庄和双橡园的热烈气氛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大使馆似乎也相当节制，没有对历史上明确记载并扬名于国际的“二次大战中华民国第一夫人”作任何负面评论。中国大使馆重申其外交部发言人日前的谈话，只着重于提醒美国国会议员，不要借此活动制造“两个中国”。

美国国务院曾表示，行政部门将不会有任何官员参加这项致敬活动，实际上，若干在战前出生的华裔美国政府人士，曾以个人身分出现在国会致敬现场。克林顿政府也已决定，不反对来自台湾的民间人士，以战时盟友的身分应邀参加9月在檀香山举行的二次大战结束50周年纪念活动。

宋美龄返回纽约寓所后，特别交代孙子蒋孝勇代她向国人及旅居美国的侨胞诚恳致谢，感谢大家这次在美国国会、双橡园两处致敬会中对她表现的爱戴与关怀。蒋孝勇说，宋美龄很感动，内心非常欣慰，并由衷祝福大家。

蒋孝勇说，这次在华府的活动，有许多人想在致敬会中与宋美龄见面、拍照留念等等，但因为他们这些身边的人怕宋美龄太累，没能全部答应。对于不周延的地方，宋美龄心中很过意不去，因此也特别要他向大家致歉。

至于宋美龄可不可能在有生之年回大陆看看？蒋孝勇沉思一下说，“大概不可能”。倒是他的岳父母和妻子方智怡前不久到过北京观光旅游，这是方智怡首次赴大陆，蒋孝勇并未同行。

对于台湾近年政局发展、近日两岸关系紧绷，蒋孝勇很关切。“我一直坚信民主、统一的必然性”，他说，台独是绝不可行的，而当局政策的最大依归，就是如何谋求台湾2100万人民的福祉，但如今很多现象，似乎并不符合这个前提。

第十五章

老夫爱奏“黄昏曲”，“寄我相思千点泪”。越老越浪漫，少帅潇洒夏威夷

第一节 陈立夫“提案”风波

省探父病首次返台

1961年春节前后，台北每天阴雨。2月24日的下午也未例外，细雨蒙蒙。由市区通往松山机场的道上汽车不断。自下午二时起，新式轿车、吉普车、旅行车陆续不断地驶向松山的机场汽车道上，不到三时，从松山机场通往大道的沿路上，已经停满了各式不等的汽车。

各式各样的男女从汽车上下来，挤往机场会客室。三时正，天色灰暗，雨下得较为猛烈。一位身体矮胖穿藏青色中山服的人从通道机场转弯处下车，他的两手插裤袋，沉思地穿入行道，冒雨踱步踏入机场接待室。有人认识他，他是蒋经国，他也是欢迎人群中的一个。大家都知道他是来接谁的。

机场内黑漆的只见一片人头，男的女的都有，但只有一个例外：欢迎的人群中，除了较为年轻的新闻记者外，大都是五十岁以上的人，至少也是四十五岁以上的人，可是他们的脸容也都象活跃在机场上的新闻记者一样。他们之间大多数都彼此相识。这些人，如果要明显地指出一个共同点，可以说多数是在台湾党政界工作，而且都是顶而尖的人物。其中“立法委员”、“监察委员”较多。

互相招呼过后，才知道有些人是特意从外县市而来的。欢迎的人中十有九成是从大陆来台的外省人。本省的闻人只有数得着的几个。

一位有经验的记者说“这是正宗的政治新闻。”

原来，这群人迎接的是十年前离台赴美的陈立夫。陈这次返台，据说目的在于省视他的父亲陈其业的病况，别无政治意义。但一般揣测，都认为并不简单。原因是美蒋矛盾渐呈尖锐，蒋为了巩固小朝廷，不惜打击亲美派，瓦解台湾“反对党”，以暂渡难关。然而美国会罢手吗？“反对派”会消沉下去吗？蒋隐忧颇大。于是大事整顿特务组织，企图进一步控制台湾残局。但是，自郑介民、毛人凤相继身死以后，台湾特工的老一辈头子凋谢殆尽；美钞的魔力大，新人靠不住，蒋早为此所费脑。台特组织改组刚三个月，即有陈立夫归台的消息，其中蛛丝马迹实是耐人寻味。以“积三十年特工经验”的陈立夫，老蒋对他有所侍界，也是不无可能的。更何况陈蒋两家交往颇深。

陈立夫跑到美国后，表面上与“政治生活”绝缘了。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新泽西州的莱克坞镇的家中度过。这所房子相当大，附近有一个很阔的空园子。为了“怡情养性”和“贴补开销”，他利用这个环境养了6500多只

来克亨鸡。素来研究“唯生哲学”的他，每天早上都有吃个新鲜鸡蛋的机会。陈的太太孙禄卿，本来会画几笔国画，这些来克亨鸡成了她的写生对象。对于太太画国画，陈立夫十分赞成，原因是：他看到好些美国人很喜欢中国艺术，于是抓住有利时机，举办一些画展，捞它一笔美金。

陈立夫的居美生活，1959年《香港时报》曾做如下报道：

“这个鸡场从老板到伙计只有陈氏夫妇二人。陈夫人负责拣鸡蛋；陈先生的工作是加饲料，清粪和其它。

‘现在总算不错了，已经买了部新车子’。陈立夫描述当年的苦况说：‘以前到镇上去买鸡饲料，都是自己扛来扛去的。’

倒是陈夫人的一句话颇使人动心：‘别看我们现在这样忙累，我倒觉得这是人的生活，过去在南京呀！那哪里是人应有的生活呢？’”

同以前在国民党内攻击孔祥熙和宋子文豪富一样，陈立夫在美国的清苦生活，意在掩盖陈家作为旧中国四大豪门之一的事实。旧中国的财权本来只操握在孔宋两家之手，孔宋自己发财，同时也作了蒋介石掠夺老百姓财富的代理人。二陈原是上海投机商人出身，对投机取巧一套，当是老马识途。当他俩发迹后，便开始向官僚资本渗透。当时中国有中、中、交、农四大银行，陈家占了一个农业银行，陈果夫生前便是农业银行的董事长。除了四大银行外四大家族也各有自己的私营银行。陈家的便是陈立夫所主持的“中国工矿银行”，经过数十年不断掠夺积累，陈家的钱也就越来越多了。在美期间，陈立夫也不失时机地往华盛顿跑跑，和那些“台湾参议员”和众议员碰碰头。在这些人中，和他最有交情的，当然还是诺兰和周以德。另外，在纽约负责主持“中国委员会”的《生活》杂志和《时代》周刊的老板鲁斯和他也有相当密切的来往。至于和孔祥熙，宋子文这些老对头，他虽然不如从前在大陆那样排挤倾轧，可也不相过从。

1959年4月28日，香港《天文台》杂志社刊载署名怡园所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陈立夫暂不返国之秘闻，”透露蒋介石集团曾先后三次写信邀陈立夫返台，其文如下：

甚嚣尘上之陈立夫自美返台消息，因返自新大陆之中国人士，谈及陈氏返国消息，皆持怀疑与保留态度，其原因有二：

1 陈氏已接受哥伦比亚大学之聘书，前往讲学半年；

2 陈氏养鸡事业，经历数年之艰苦经营，已经脱离险境入于康庄道上。且因能自造皮蛋与咸蛋，获利颇不鲜，故不必急求脱手。

有此二因，消息灵通者，认为陈氏回国可能性并不大。尤其在最近半年中，因已接受哥伦比亚讲学聘书，更难食言而赋归来去兮矣。

关于台湾方面对陈氏回国所持之态度，言人人殊。据接近陈氏留美人士

称：陈氏出国，殆将十年，对于政治，或已忘情，惟对于蒋总统个人忠爱眷恋之忱，因追随积三十年之久，固未尝旦夕去怀。而蒋公复任总统以还，主持中华民国复兴事业，闻鼓鼙而思股肱，更忽然忙忙陈氏昆仲对国民党与国家及自己之忠诚。十年以来，俞济时、张厉生，蒋经国表述此笃念忠荇者先后凡三次，写来颇饶兴趣，兹分述于次：

距今数十年以前，陈立夫之封翁勤士先生，一度病甚沉重，老人思子情殷，深望陈氏能回台一见。而立夫持远适异国昔人所悲之感，亦渴求回国亲侍汤药。封翁未几即脱险境，总统府军务局局长俞济时，便致函侨居美国之陈氏，告以尊翁康复有期，君堪告慰。朝野人士深冀阁下能借此回国一行，以叙契阔，并慰老人间望，未审你愿意这样做否？陈氏是次回信，颇有弦外之音。大意谓：你看我应该怎样做？才适合我的回国的环境。目前有无必要回来？还祈筹等语。措词十分委婉。因其尊翁之疾逐渐康复，而陈氏回国与否，便无形搁起，此为第一次也。

张厉生受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时，以北方同志，骤膺重任，颇有临事不惧、好谋而成之慨。致函立夫，谦称任重材轻，非一本所独支。同时推崇立夫为组织与办党惟一能手，朝野企望甚殷，仲尼去鲁，犹望龟山，况与党国共存之如我立夫者乎！措词恳切，一如北方之强。而立夫复函婉谢，措词极坦白直率，对蒋公益致忠爱眷恋之忱，函内有出国动机与回国障碍，似仍未消除，诚非毅然归国之适当时机，谨谢故人厚意，并勋为国为党多努力之语。此为第二次也。

当去年（1958年）八、九月间，中共向金门、马祖及外岛炮轰，旨在消灭美国第七舰队，及夺取台湾澎湖本岛，事态严重，蔑以复加。为求集中人才，共赴国是。今之不管部阁员蒋经国，继俞济时、张厉生之后，致函立夫，坚邀回国，共筹国是。借重之殷，措词之挚，闻者感动！事在去年九、十月间，直至张厉生出任中华民国驻日大使之明令发表，而所遗之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迄今虚悬以待，因而有人揣测为立夫预留一席之地者，于是立夫任中央党部秘书长之消息，不胫而走，中央既不否认，亦未证实，立夫对经国此函回信，备极慎重。或云以回国机会尚未成熟为辞者，或云已有接受之意者，未知孰是？迄今立夫回台与否？似有五十对五十之程度。惟因立夫已慨然接受哥伦比亚大学讲学之聘书，纵使应召回国，亦当在哥伦比亚大学讲学事毕之后也。世之关心陈氏回国消息者，遍于海内外，用志其十年经过如右（上）以为左（下）卷。

陈立夫这次突然归台，他的父亲病重固然是一个原因，最主要的还是老蒋认为当时的国民党，再度需要他回来策划。十年来国民党的改造，改出什么来呢？内部愈改愈不见得进步，也愈不见得比以前团结。一个“行政院”和一个“立法院”，遇事便争吵起来；“监察院”和“司法行政部”之间，“国大代表”和“监察院”为了职权也不断闹意见；立法院被三青团人物把

持了，使国民党元老派到处挨闷气；一个小小的反对党酝酿成立，成千上万的国民党老干部，却不能在政治上比过雷震、高玉树等非党人士，被他们弄到手的却是台北市的市长宝座。这一连串的党内笑话，使国民党的人感慨，更使蒋介石忧虑。陈立夫在国民党的历史甚久，当时除了元老人物不计外，在“立法院”、“行政院”、“监察院”、“国大代表”中，不少还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因此，当他们聆悉陈立夫返台之日没有一个不涌到松山机场去欢迎他，造成了机场上一个空前热烈的场面。

泰国航空公司的班机快要驶上跑道了，能够获得机场入场证的人都进了机场。十分之八左右的人仍然在机场会客室迎候。3时15分，机门打开，第一个下机的人是陈立夫夫人，随着便是白发银丝的陈立夫，在欢迎人群面前他挥着帽子向大家招呼。下机后五分钟，陈立夫夫妇便离开检查室，可是他们夫妇两位寸步难行。从检查室到门口贵宾室，平日最多只要一分钟便可到达，这天陈立夫被人挤了十分钟才到达。

陈立夫一进贵宾室，门就被关上了。“副总统”陈诚正在贵宾室候陈立夫夫妇。多少记者在门外焦急，力图进到贵宾室去，但门口却给警察挡住。二分钟后，陈诚陪着陈立夫夫妇走出贵宾室，人潮又涌了上来。3时35分陈立夫夫妇踏进“副总统”的专车，在陈诚的伴陪下离开了机场。

陈立夫回到台北寓所后，曾向记者发表如下书面谈话：

立夫出国已逾十载，退思补过，蛰居美国乡间，绝不耳闻政治。在此期间，对于留在国内之家父，未克稍尽侍奉之责，愧作殊深，幸承总统暨诸亲友同志多方照拂，各位主治医师悉心诊疗，深情厚谊，永铭肺腑。家父身体素健，兴趣甚佳，年逾九十，尚能经常出席各种会议，此番病起仓卒，曾一度十分危险，消息传来，为之寝馈难安，正拟设法赶归侍疾，乃蒙总统先赐电召，当即遵命兼程返国，下机后欣悉家父病况尚未恶化，但仍在危险时期。惟望此番归来，能有助于家父病体之康复，则余愿已是。内子禄卿除偕归侍疾外，以其继母今年已七十七岁，亦思归省，故亦同返。如家父病体幸得告痊，仍拟与内即行返美，因离美时匆遽成行，各事均暂托友人代为照料，日久则困难殊多。今日下机时，承陈副总统与诸亲友远道冒雨来接，不胜感激。因急于探视老父病况，未及一一面致谢悃，尤深歉疚，惟祈特予原宥！

陈的书面谈话，确是他抵达台北后所写成，虽然谈话稿并非他本人手笔，但其内容却为陈氏所亲自口述。此一书面谈话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段为陈对自己去留问题的答复。

曾有人认为这段话虽为陈本人口述，但未必就表示陈氏果真决意返美，因为，陈纵使有意在台居留，仍有待台湾最高当局及有关方面的挽留及安排，自己总不能不表示其返美之意。

然而，据接近陈的一位人士透露：陈氏在书面谈话中特别提出“即行返

美”的意思，的确是因为陈氏并不打算在台久居。因为，如果陈氏并无返美的决意，他尽可在谈话中不提及此一问题，目前的客观环境并未迫使陈氏对此点有所明确表示，除非陈氏本人的确是有意返美。

陈立夫返台后，使台湾党政间浮起了一个新漩涡：各方人士由于蒋的不断召见他，认为他快要再上政治舞台，今后国民党的党派斗争上，又有着 CC 派的支持，国民党内部的再改组和 CC 派的复活，短期内便会出现。

陈立夫抵台后三度和蒋介石密谈的结果，他只应允了一个暂且留台观察的原则，对出处还是按下不提。“立法院院长”张道藩辞职，蒋有意把“立法院院长”让给陈立夫，但当陈返台表达了这个意见后，“院长”新职便另选了黄国书继位了。

陈立夫不马上复出，是他一生的聪明处，他明白蒋对他是侍界正殷，对他也不错，但幕后还有一股势力在反对他，如果冒然出山，将会铸成第二次的大错。

樱花丛下说感慨

陈立夫的去留之争终于有了定论。1961年4月19日台《联合报》刊登了一篇题为“陈立夫悄然赴美”的文章，全文如下：

总统府资政陈立夫夫妇于昨（18）日下午四时悄然离台，乘招商局“海欧”轮赴日，再由东京换乘飞机赴美。

这位六旬高龄的政治人物和他的画家夫人孙禄卿女士，系于今年二月下旬奉总统电召返国，侍奉当时处于弥留状态中的他们的父亲陈其业者先生的病，其后陈其业老先生于3月15日逝世，陈氏克尽人子孝道，遵礼成服，守过三七之期。

陈立夫夫妇离台时，因知者甚少，前往基隆送行的仅蒋经国、黄仁霖、程天放夫妇，黄朝琴、胡健中夫妇等。海欧轮预定本月12日抵日，陈立夫夫妇预定本月15日以前返抵纽约居所。

陈立夫夫妇乘坐海欧轮官舱第一号特等套房，费用300美元。船上的官舱布置雅洁，全部中西合璧式。海欧轮排水量8000多吨，系一客货轮，招商局使用才不久。

陈立夫夫妇于昨日下午1时50分由蒋经国陪同乘车抵达基隆后，即于2时10分上船，在套房起居间中与程天放夫妇、黄朝琴等话别。

陈立夫夫妇未对记者发表任何谈话。他说他没有话要说。有记者问夫人孙禄卿女士何以匆匆返美？陈立夫夫人答称：“呵！那边的事情多的很。”据悉，陈立夫夫妇原定在过了陈其业者先生“七七”之期再走的，临时决定提前，是因为他们在美国经营的农场有一批货快要到交货期了，同时陈氏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假期也快届满，均须返美处理。

据一位接近陈立夫的人士说，陈氏不可能在短期内再回来。但他相信陈氏终将再回来一次，惟时间无法预料。

陈立夫返国期间，除以大部分时间侍候父疾及料理父亲丧葬之事外，曾数度晋谒总统，昨日行前中午曾赴副总统陈诚官邸辞行。

陈立夫于二月间由美国回到台湾时，人们都以为台湾当局将不许他离台了！但他竟能飘然远行，这几类乎奇迹，其实陈氏是用计脱身的。请看香港《正午》报 1961 年 6 月报道：

当陈立夫为其先父治丧后，台湾当局重申前议，盼其于考试院长及驻日大使两职，择一担任。后来当局又告以“九全大会”即将于双十节前后召开，届时中枢人事，将有新的安排，甚欲有所倚重。然陈立夫返台以后，发现台湾虽不断以“团结”号召海外，其实国民党自身并未做到真正的团结，如党政之间，中央机构与地方机构之间，立法部及行政部之间，处处均存有互相敌视的对峙态度。以陈氏在立监两院和文化教育界的深远影响，将不免左右为难，所以仍决心置身事外。

有一次，陈立夫终于向蒋先生表明他的心事了，他说：他近年替福特基金会写一部关于“我所知道的中国国民党”的回忆录，定于今年年底完成。如果中途搁笔，势必违约背信；并且，现在已送出去的部分资料，其中对党对总裁诸多批评，深恐将来引起不良的政治影响，似应拿回来重新改写，此亦效忠总裁之一法也。蒋先生只说容考虑后再议。不久，CC 一位大将，立法委员吴某在台北某晚报发表一文，大意喻两陈（即指陈立夫和陈诚）均为国勤劳到了白发之年。今日局势危殆，尤望同心协力，团结奋斗，以期达致“白头偕老”的愿望。此虽游戏文章，但在政治上却激起了微妙的反应。

如所周知，台湾一些“反对党”的人们，十年来曾对陈诚寄以厚望。及去年（1960）国大召集期间，陈辞修（陈诚）召集“政策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到国防研究院谈话，一力矢志贞到底，才使他们觉得“孺子不可教也！”国大闭幕，立法院即爆起倒阁之声，先有徐源泉等 130 人指责案的提出，继后又有追加 4 亿 6000 万元以提高军公人员待遇案的通过。陈氏在此沉重压力下曾赴金门劳军以示消极。今事过境迁又有人鼓吹两陈合作，岂为情势所许，于是陈立夫行矣。

关于陈立夫离台后的情形，台湾报纸这样报道：

悄然离开台湾的陈立夫，16 日到达东京之后，显然的，他的心绪大为轻松下来。四月中旬以后的江户风光，虽然那些性急的早樱和垂樱，大都已经谢了春红，但是晚开的八重樱，配合着暖阳如醉的仲春天气，却仍然保留着几许旖旎。

陈立夫心绪转为轻松，当然，不单纯因为他走进了一个春光似锦的轻松世界，实际上，他从严肃的居丧期间以及 42 天台北那股紧张的政治气氛中摆脱出来，一种自然的生理反应，也应该舒畅地深吐一口气的。

他和他的夫人，先下榻横滨，第二天这才搬进东京帝国饭店。看来，在开始的时候，他似乎有意避免一些无聊的应酬，但是，一搬进东京城内，他们夫妇的应酬便忙了起来。名画家张大千在横滨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个人画展，陈立夫夫妇应邀做了这位四川才子的座上嘉宾。接着，陈立夫夫妇便吃遍了东京几位国民党闻人的佳肴。前后台两位驻日代表团长朱世明、商震都宴请了他。不用说，现在（1961）驻日大使张厉生和大使馆几位公使参事都尽了应尽的东道之谊。就在如此这般的应酬中，陈立夫的心情愉快了，他的话匣子打开了，他打破了在台北守口如瓶的状况，开始有所议论了。尽管这位在美闲居十余年的职业政治家的议论，免不了多是那些老生常谈，但是，毕竟他肯开口了，新闻记者就不愁找不到可取的材料。

台湾《联合报》东京特派员司马桑敦，4 月 28 日在该报进而说：

我 21 日中午在东京近郊一个花园野餐会访问了陈立夫先生。这天，他们夫妇已经整好行装准备当夜飞赴美国了。不过，也许因为和这个花园野餐会上主人的交情关系，陈立夫兴致冲冲的谈风，竟完全看不出他该是一个行色匆匆的旅人。在这一段谈话的途中，陈夫人曾插进来催促他赶紧收场好去赶路，他却先打发夫人走了，而把他的谈兴一直维持到餐会最后。

这中间，当我为他们夫妇和主人夫妇在一丛晚开的樱花前摄影时，陈先生特别给我一个警告说：“我们今天谈的，可不能上报！”但是，事后我觉得他所谈的，纵然上报，无一有害于他自己，更无一有害于任何他人，而且，当我向他提出问题时，我会声明我就该写的写不该写的不写，同时，我是以新闻记者与近代史研究工作者的双重身份向他求教的，而陈先生本人也正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于这种研究工作，所以，把他的片言只语对于我们这个前进中的国家和民族有交待意义的，透露出一二，似乎也无伤于大雅，更重要的，也许更有利于他的新工作——“历史”。

我记得，一开首我便冒失的从阳明山会谈把话题提起，我引用一般新闻界的看法向他表示正当这个关系海内反共势力的重大行动就要开始的时候，他以一个过去对党对政府有过如此重要贡献的人物，竟悄然离开了这个行动的圈子，似乎不免令人有几分诧异，甚至也有几分失误的。

他起先把两臂交叉在胸前，悠然而镇定的注视着我，微笑着不发一言。他似乎只在品味着春风吹拂他的华发的那股爽舒的味道，而把我的话充耳无闻。

但是，过了片刻，中间有些别的话语滑过去了。他重新拾起刚才的话题说：“谈话会要听听别人的，听听别人的意见，总是好的！”

于是，我接着又问下去，“若以陈先生在美十多年来的所见所闻，再以若干年来积存的政治经验，这个意见，岂不是更值得听听？”我的话尚未了，他又是微笑不发一言。他抱着臂走在花丛中绕了一个圈子，走回来很深沉地表示说，过去的党是他一手搞的，“但是过去的党打败了，打败了就是打败了，败军之将还有什么可谈的？”

不过，话是如此，这位败军之将至少还有些失败的经验是值得谈的。

“一个政权如果和人民生活利益脱了节，到头来人民一定会抛弃它的，没有比这个事实考验结果再残酷，再不客气的了！”

他是先从大陆上的失败谈起的。

“坦白地讲，在大陆时代，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和以后的一段时期，我们的财政政策过分漠视了人民的利益。人民的生活利益在政策上得不到保障，人民自然要抛弃这个政权的。财政政策在政治上占的位置比军事、比党都要重要，它是直接关系人民利益的。在当时，我们的敌人日本，犹比较我们政府懂得在政策上去照顾和维持一般人的生活的。因为他们毕竟懂得这是维持他们军政统治政权的一个必要手法。日本军在中国大陆发行军票，以一比一的等值套换法币，这在政治上虽然打击了我们政府，但使中国人民仍可持有与原值相等的购买能力，而人民资本在市场上的作用，也照旧产生等值的结果。所以人民生活尚是安定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汪伪时期，曾经贬低了这个币值，但是人民大致仍可维持原值一半的购买能力。可是不幸的是，在胜利复员时，我们居然利用一时变态的市场心理，一下子把法币换伪市的比率折为一比二百，这说明沦陷区人民购买力是因抗战胜利而一夜之间变低为二百分之一了，100块钱的存款变成5角钱了。这事关系太大了，试想小康人家赤贫化了，尚有何社会安定可言？犹有甚者，诸如我们战时美金储蓄券的大打折扣，黄金换实的不守信用；处处表现的都是违背人民利益，处处与人民脱节，这种情况，又焉得人民不抛弃这个政府？”

陈先生犹且追述说：“最可笑的是，我们的经济建设，也尽是一些漠视生产循环的浪费投资，这也自然是与人民利益脱节的。”

他严肃地说：“说来惭愧，一切由于我们当时的无知！我们无知！”

这句话，强烈地刺激了我们的听觉。这是一句出自一个曾是党的组织部长的良知的言语。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真正自省的声音，这句话，深深的描写了过去，但，也深深的点画出将来。

暮年寄情笔墨

1969年4月，台北天母山坡一栋西式平房里，搬进一对白发老人。他们是离台长达20年之久的陈立夫夫妇。这次返台定居，他们一反往常养鸡孵蛋之道，高谈绘画、写作与讲演艺术。台湾《中央日报》9月1日刊登一篇“陈立夫先生的生活情趣”披露如下：

陈先生刚从美国归来时，身体不太好，经过这几个月的休养，已经完全康复了。现在他已开始有限度的社交活动和继续他的写作生活。

立夫先生告诉记者说：一、两个月以前，他曾经着手在写一本小册子，书名叫《一而十》。最近，由于天气太热，应酬也多，而暂时搁笔，估计到年底才能完成。

他说：最近这一段时间，他正主持一项翻译工作，计划将英国学者丹尼约瑟（李约瑟）的巨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翻译成中文，全书有八百多万字，原书分为七卷，目前已经出版一、二、三卷，第四卷共分为四册，第一册已印刷好了，其它部分尚在排印中。

立夫先生说：《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包罗颇广，凡是中国祖先对于天文、地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贡献的史料，几乎都融汇其中，因此，翻译这部巨著，必须约集有关科学专家分工合作，共同完成。所幸这些准备工作，大体上都已经安排好了。

陈先生说：他最近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已经脱稿，标题是“我为什么做这样一件事”，约好了在某杂志上发表，其内容就是介绍《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的纲目，以及他主持翻译这部书的动机。陈先生写的另外一篇文章，尚未完成，稿子尚在他的书桌上。

书房里的陈设，简单清雅，一具书厨，里边摆满了中外文参考书。书厨旁边有一架立地电扇。书桌上放着文房四宝。陈先生写稿喜欢用毛笔。在书桌上的玻璃板下面，有一张彩色照片，摄的是一幅水彩画，是立夫先生在民国37年画的，那一年是已故张道藩先生的50大寿，这幅水彩画，就是陈立夫送的寿礼；画中有一位老寿翁，对面坐着一位美丽少妇，题词是：“原兄与嫂如画中人，一则长命百岁，一则美丽到老。”道藩先生非常珍视这幅画，一直珍藏着。当立夫先生民国48年第一次回台湾时，道藩先生特地找出这幅画来，拍成彩色照片，送给立夫先生留念。陈立夫先生为怀念故友，把它放在书桌上的玻璃底下。

陈先生引导记者参观他的书房时，还看到他的另外一幅水彩画，那是一株鸡冠花，作于民国24年陈先生在南京的故居。当时陈夫人正在从师习画，有一天陈先生兴致来了，就用彩笔写了一株庭院里的鸡冠花。

据陈先生说：他一生只画三幅水彩画，另外一幅是一朵喇叭花，现留存在美国女儿家里。

立夫先生很健谈，他谈任何问题时，都很能吸引人。他说：今后要多在室内做工作，少在外边活动；对那些邀请他剪彩和证婚的事，都一概谢绝了。他表示这个例子不能开，希望亲友们都能原谅。

立夫先生虽然表示，今后要多做著述工作，但他仍然不能忘怀讲演的乐趣。他认为讲演是一种艺术，而且可以给人一种满足。

他说：一场成功的讲演，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你要讲的，也正是

听众们所要讲的，你只是把大家的意思表达出来了而已。第二，一篇讲演稿里要有特点，是别人所没有想到的，这样，听众才会觉得有味道。

立夫先生说：他的讲演，曾经历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他每逢讲演之前，先准备了很多材料，到了台上时，却讲了很少；第二个阶段，准备了多少资料，上了讲台，全部都用上了；第三个阶段，任何讲演，从来没有底稿。不上讲台，没有材料；登台讲演，材料也随之而来了。立夫先生认为讲演远比发表文章的效果大，尤其一场成功的讲演，会吸引千万个听众，全神一意的听讲，越是这种情形，讲的人越兴奋，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劳累，这时候讲的人与听的人感情合而为一，令人有一种升华的感觉。他自己就常常有这种感受。

1979年9月18日，陈立夫与夫人孙禄卿共同迎接了80岁寿辰。他们送给亲朋的礼物是一本由陈立夫题款、孙禄卿绘画的百幅山水画集。

“我的太太的画实在不错，而我的字只是陪陪她。”陈立夫对来客谦称自己是配角，太太是主角。另外，他还赞美孙说：“我最最得意的事，是我有位贤能的妻子孙禄卿女士。”

在父母的作主下，陈立夫与孙禄卿于1926年结为夫妇。陈说：“到现在，已经53年了，我们有个幸福的家，而且从来没有吵过架。”

说到陈夫人的好，立夫先生是赞不绝口，他说：“他的父亲孙蓉江先生是地方公正士绅，家教甚严，她过门后，对长上有礼，教子女有方，治家勤俭，幸得有她内助，使我可以终日忙于公务。”

他们的三子一女，在陈夫人的教育下，都卓然有成。立夫先生说：“孩子们都怕妈妈，管理子女和家务上，她都很成功。”

53年间，他们共同信守的原则是：爱其所同，敬其所异。立夫先生说：“就这样，我们从来没有口角过。”

为了纪念丰盈、美满的过去，不喜欢言寿的立夫先生，告诉他们的四位孝顺子女，不必铺张地为父母做寿，不如印行一本书画集致赠亲友。

上海美专毕业的陈夫人，在绘画上颇有造诣，立夫先生说：“她的画，的确不错，画风中有着她的豪爽、开朗的性格。”为了陪同夫人，立夫先生也拿出了自己的字和两幅画，一幅鸡冠花，一幅喇叭花，全是他30年前的作品。

这本珍贵的伉俪书画集，将致赠亲友。此外，他们夫妇还携手在国家画廊举办书画及著作展。立夫先生说，到了寿展时，他与夫人将出外避寿，“绝不收礼，也不要拜寿。”

最最令他高兴的是，在寿辰前夕，他要接受中央颁赠的中山奖章，对这难得而珍贵的荣誉，立夫先生是很珍视的。

这些年来，立夫先生在努力地开掘“文化矿”，在他的努力下，可真做了不少的事，也著作和出版了很多书，他说：“我不是一个偷懒的人，”他很傲然地说：“我是一个奋斗的人。”

过了 80 岁的寿辰，立夫先生又将展开另一番人生。他说：“过一年、两年，我要辞掉所有的事。”那时，他要全力整理五经。

他说：“我要将五经做系统的整理，使人看了这本书，就可以理解中华文化的伟大。”

对开“文化矿”，他的兴趣更炽，一直在奋斗中的陈立夫说：“我觉得，这些年做的还不够，如果天假我数年，我可以做得更好。”

度过了年实的大半生，立夫先生更坚定地期望：他要坚强而努力地缔造一个更扎实的晚年。

再次成为新闻人物

1988 年，已是垂暮之年的陈立夫再次成为新闻人物。台湾《中国时报》8 月 22 日刊登该报记者的一则报道，题为《陈立夫谈构想，希望看到统一》，副题为《“三不”或“四坚持”莫如中国文化有力》，全文如下：

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表示，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案是个人的一个天真构想。他认为，现在海峡两岸，若透过合作而达到中国统一，中国必将在世界壮大起来，发挥无比的影响力。

陈立夫是在前天下午三时，会见“中国统一联盟”代表时作上述表示。“统联”派代表往访陈立夫先生，希望他就“中国文化统一案”举行演讲说明会，陈立夫以他所提此案政府不赞同为由，婉拒了“统联”的邀请。

陈立夫及多位国民党中评委，月前曾于国民党十三全会时，提出如果中国大陆当局能郑重宣言复兴中国文化，重振四维八德，以替代“四个坚持”，放弃武力犯台，则政府可以考虑，以外汇资金 50 至 100 亿美元贷款支援大陆经济建议。

今年 89 岁的陈立夫先生最近接受《联合报道》杂志的访问，访谈中还曾坦率地表示，假如中共大陆的邓小平请他去谈一谈“如何以中国文化来统一中国”的话，他一定去。他相信他有一套方法去说服邓小平。此举据悉曾引起陈立夫的秘书和家人的郑重否认。

陈立夫在接见“统联”代表时，特别致送来访者一本《联合报道》，对他曾表示可以与邓小平谈谈的话，由他特别仔细校对文中一两个错别字，以及赠予别人参考的动作看，似乎他不仅不否认愿和邓小平见面，也承认里面所有已表达的他的观点。

不过，在问到陈先生如何愿意为中国统一问题，到大陆与邓小平会谈时，他客气地说：“三不”政策使他出不去。

陈立夫曾经在上一届国民党全会中提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方案，此案被国民党中央采纳，但中共却不同意，认为“不合时宜”；此即构成他思考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的新方案，因为他认为三民主义是中国文化的“结

晶”。不料，新案变成海峡两岸都认为“不够实际”。

陈立夫最后特别向“统联”的代表感慨指出，他的一生从来都是为着中国的统一、中国的命运而奋斗，他真希望有生之年，看到中国的统一。

陈的“提案”，在海内外引起相当的反响，不少杂志刊出专文或者读者投书表明对这一方案的看法。其中，台湾的《新新闻》周刊8月28日刊登署名陈杰夫，题为《反共老人要做联共先锋？》一文，具有一定的概括性。现摘录如下：

最近真是陈立夫风光的时候，自从他在国民党十二全大会提出经援大陆的和平统一方案之后，国内报纸纷加反映，甚至国民大会，监察院里也有人以“立夫案”为指标而大谈统一新策；这位公众形象是长年满口孔孟，“道贯高中”中国文化教材的89岁反共守旧老人，一下又跃居为“和平统一”的急先锋，激进的程度直让国民党开明自居的当权晚辈们瞠目结舌。

从民国56年返台讲演，著述以致于定居台北天母，这位在中国大陆显赫政坛20多年的权要，处处表露他自民国41年被贬离台，赴美养鸡孵蛋，“忘其显要，忘其贵盛”的平淡操持。过去报章偶在高层人事变动之时提及他将再度出任公职，他则始坚称“不再过问现实政治”，因此，除了在中医、中药，一贯道，中国文化的范围内可以听见他演讲，看见他的著作之外，几乎难以侧闻这位隐居天母半山腰上的老人有何动静。

直到民国75年底中央公职人员选举，国民党倍受民进党竞争压力后，他才在主持国民党76年新年团拜与联合总理纪念周中打破政治沉默公开指出国民党应当检讨知识分子为何对国民党的作法颇多误解，“不管人家说的对或不对，党员同志都应当想一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没想到他这新春开讲之后，现实政治的是是非非也就如影随形地紧附在他身上：首先是今年1月，经国先生过世之后，一些以官邸为核心的昔日重臣里，竟然传出准备拥护蒋宋氏美龄继位主席，由他这隐居状态的老人，重掌他58年前出任过的中央党部秘书长职位，后来复辟之风虽是因势作罢，他那天母家中却是突然夜夜高朋满座，黑色公务轿车频频进出他家大门。最近，国会的资深中央民意代表对于国民党制定中央民代退职条例的政策纷纷采取杯葛、反扑的行动，也有人绘声绘色地传述，这些老代表，老立委准备抬出陈立夫来维护‘法统’的延续；而他在十三全会提出的经援大陆方案更被认为老法统、老政要们作势反扑的象征。

到底陈立夫在他这垂暮之年还想做什么呢？接近他的一些CC派立委都说他年纪太大，脑筋也不灵光了，怎么可能再度出马？大搞国民大会召开临时会的滕杰等人，从早年的“力行社”以来，似乎也是和他不对头的，怎么可能拥戴他；但是，陈立夫再度风光的意愿又是那般狂热：他的儿侄辈赵耀东只是有个构想，准备拿台湾钱去借给大陆，他就兴致勃勃地自撰3000字左

右的经援大陆的方案，从四维八德讲到海峡两岸共同成立“国家实业计划推行委员会”，而且在开会前亲自一一找人联署，开会期间手边还不时拿着案文，逢人散发，直到这两天，赵耀东已经觉得这件经援大陆提案，必须静下来检讨检讨的时候，陈立夫似乎仍然兴致勃勃。

从他早年撰写的反共文章似乎很难理解这位和共产党缠斗数十年的老人，怎么如今竟会百般“容共”。他对记者说，他的“经援”提案是完全基于“爱和同情”而提出的，巨额贷款不是收买大陆民心，而是希望以台湾的有余济大陆不足，发挥同胞爱，协助大陆人民脱离贫穷困窘。他认为现在的大陆政策不能再采守势。

以前的陈立夫强调“中华文化是共匪的第一号敌人”，现在的陈立夫虽然也强调，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为国共建立共信的最佳条件。但是，过去的陈立夫说中共是暴政，暴政必亡，中华文化复兴一定成功，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他是第一个提出这口号的）一定胜利。现在的陈立夫也说这些口号，但是胸怀是爱和同情的，尤其，手段不是反共抗俄，而是拿着台湾纳税人的钱去贷款给他过去所控诉的敌人。过去他真是反共反得铿锵有力，现在他似更“联共”联得理直气壮！

这位以捍卫中华文化自居的老人，正以他特殊的影响力及特殊的方式来完成一些夙愿。因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不惜推翻以前的反共文章，为要维持大中国的法统，他连包容大陆代表的陶百川案都反对，因为他担心中央民意构成地方议会。

对于陈立夫而言，过去他在报端披露的言论可真是乏人能懂，现在一记“经援大陆”，总算海峡两岸都有反应了，他也一下子风光起来了，这种转变几乎使他从二三十年的长梦里重新拉回到现实世界来，对于他应该是会较不寂寞的，但愿如此的长梦一觉，不只是为了寂寞而已。

第二节 张学良的“还巢梦”

少帅亲属谈少帅

张学良，这位中国现代史的一位活证人，自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就已从历史舞台的幕前消失了。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依然是受人爱戴的民族英雄。“张学良将军身体怎么样？”“张将军何时回大陆看看？”诸如此类的问题依然在街谈巷议中流传。由于张将军半个多世纪一直被迫过着软禁式幽闭生活，所以，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眼里，他依然是个谜。

1994年3月10日晚，在北京贵宾楼饭店，记者采访了前来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张将军的侄女、香港吴仓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张闾蘅女士。

刚刚落座，性情爽直的张女士就说：“我大爷现在不在台湾，他在夏威夷。”

张闾蘅也已年过半百。稍加留意，便不难看出与张学良将军的血缘关系。她是张学良的五弟张学森的大女儿，此刻，她的父母也在夏威夷陪伴张将军。张闾蘅从小跟张学良夫妇一起生活，深得张学良喜爱。在张家诸多亲属中，张学良宠信她们姊妹。在漫长的软禁生涯中，是五弟一家陪伴在张学良的左右，相濡以沫，以亲情的温暖驱散他索居的落寞。张闾蘅虽然定居香港，但常往来于香港、台湾、美国之间，不时前往探望张学良；实在难以分身时，每个星期至少要通一两次电话问候问候。

“我大爷、大妈是去年12月14日离开台北的，先到旧金山看了看儿孙，24日离开旧金山，往夏威夷度圣诞，一住3个来月，直到今天。今年1月，我专程到夏威夷看他，帮他租了间公寓，安顿安顿生活，在那儿陪他玩了十来天，快过春节才回香港。”

张学良这次夏威夷之行，是他解禁以来的第二次出岛。1991年3月，他经台湾当局批准，到美国探望子女，散散心、换换空气，在那儿住了3个多月。平日与30年代的一些老友一起打打麻将，下下小馆，偶尔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星期天则去教堂做礼拜。其间赶上他91岁大寿，在美国的东北同乡还为他举办了隆重的祝寿宴会。大陆的亲朋好友也派人前往拜望，气氛极为欢洽。

“这次出岛，纯为散心。大妈身体状况很差，患有肺气肿，我大爷听说夏威夷的气候对大妈恢复健康很有好处，便想陪她去疗养疗养。夏威夷确实是个好地方，住了3个来月，我大妈感到舒服多了。他们几次跟我说，现在还不打算走，还想在那儿多住些日子。”

“我大爷是本世纪的同龄人，今年93岁”。张闾蘅介绍，就90高龄的老人而言，他身体还算康健，反应依然敏捷，依然那么健谈。只是视力、听力不十分好，看书看报要借助特大放大镜，所以很少看东西、写东西，连电视也很少看，怕强光刺激。张学良最不愿见记者，怕照相太多，闪光灯刺激

眼睛不舒服。

张闾蘅说，非常奇怪，平常跟他说话，非得大声嚷嚷不行，他不爱听的话，你嚷也没用，而他想听的话，你声音小些，他也能听得见；看东西也是如此，平常凑到眼底，还模糊不清，有时变换一个角度，不用放大镜也能看得清。不过，和他 90 生日那时候相比，身体明显不如从前。

1993 年夏天有一天，张学良忽然站不起来了。家人以为他腰间骨刺又压迫到神经了，送到台北荣总一检查，脑子里有瘀血，有根小血管漏了，医生在脑两边各打一个洞，把瘀血冲洗出来。这么大的手术，这样的高龄，他居然在两周内完全康复了，医生说是个奇迹，没见过这么大年纪的人好得这么快。他腿上长有骨刺，有时疼得伸不直腿。出院后，他就迷上了轮椅，不愿走路散步了，在家人的劝说下不得已下地走走，走不多远，便说累了，又坐上轮椅。张闾蘅笑了笑说：“我大爷是个老顽童，他坐轮椅也不全是走不了道。像婴儿一样，坐着小车，让人推着到处走，他觉得好玩。”

张学良如此长寿，也许跟他能吃能睡有关。他曾对人自夸：“如果明天早上要枪毙我，今天晚上我照样能无牵无挂地睡个好觉。”在夏威夷，他每天睡十多个钟头，早上 10 点钟起来，若是没事还睡会儿午觉，晚上要是不打麻将，八九点又上床了。

“我大爷的食欲很好，足可以和小伙子媲美，他满嘴的牙齿，一颗假的也没有，从来不说什么东西不好吃，再不好吃的东西他也要吃完，只是说明天换点别的吃”。张闾蘅说，张学良特别喜欢喝汤，最喜欢喝乌鱼蛋汤，可惜夏威夷没有。那么，蔬菜汤也行，反正顿顿要有汤。他菜吃得很多，什么风味都行，只要好吃，主食则吃得较少，西餐也很感兴趣，饭后用水果的量更是惊人。”

“喜欢吃咱东北的酸菜馅饺子吗？”访者问。“喜欢吃饺子，但在台湾不吃酸菜馅的，说不如东北的味正。这几年我常来大陆，带了些道地的东北酸菜给他，又爱吃了，就是不爱吃酸菜火锅。”

半个多世纪与世隔绝，更增添了张学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青春的渴望。他害怕孤独，喜欢热闹，爱小孩子，爱小动物，特别爱看小鸟，这大概也是他能在夏威夷长住的原因之一。夏威夷没有工业污染，生态环境保护得很好。四季鸥鸟翔集，游人如织，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儿童在沙滩上尽情嬉戏，透过公寓临海的窗口，或是漫步海滩，看到追打嬉闹的孩子，他感到一股生命的热流从心底涌起，极其开心。

“他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那次我们姊妹几个要上卡拉 OK 厅去玩，他也要去，让我们用轮椅推着他去看看，被大妈拦住了。人越老，好奇心越强。在荣总住院的时候，他让护士推着他满医院乱窜，最后没地方可去了，让人推他上厕所转转。我说：‘你干嘛不行，非得上那个地方去？’他说：‘我看厕所干净不干净，看他们管理得怎么样。’他对什么都有兴趣，可惜，我们都有工作，没人能常给他讲讲，陪他玩玩。”童心未泯，这是耄耋老人生

命之火熊熊燃烧、恒久不熄的可贵的心态。张闾蘅向记者透露：他不仅牙齿一颗未掉，最近头上还长出了黑发。

张学良住在一幢临海的公寓里，公寓大概有 20 来层，他们夫妇住在 15 层。刚到夏威夷时，当地的华文报纸曾作过报道，华人团体也曾邀他作过一次讲演。还有一次做礼拜，牧师透露了张学良夫妇即将出席作见证（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讲上帝的存在、上帝的恩惠等）的消息，一下子，教堂被挤得满满的，前来祈祷（莫过于说来看张学良）的教友大都是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大家争先恐后地挤过来，看看这位传奇英雄到底是什么样子。现在，张学良的生活已恢复平静，当地没几个人认识他，新闻界也不再追踪打扰他了。他会说点英文，赵四小姐的英文极为流利；他们可以像普通人一样自由自在地看海、看鸟、看日出日落，潮来汐去。

谈起张学良晚年的消遣，张闾蘅介绍：“我大爷说，他这一生有三爱，一爱打麻将，二爱说笑话，三爱唱老歌，就是京戏。只要有得玩，他就不累。”

张学良眼睛不好，牌上的字，他凑上去能看得见，稍远一点，别人面前则完全看不见，全靠手感摸牌。跟他打牌，每打一张，一定要报牌给他听。他的记忆力很好，打过的牌他看不见，只能靠脑子记，他不仅要记自己的，还要记别人的，实际上他一个人要记四家的牌，很难。于是，他发明了一种新打法，每人去掉一套，打 11 张，其它规则不变，这样记起来容易些。张学良的牌艺很高，张闾蘅说，每次打牌，十有八九是他赢，也不是大家要让他老人家高兴而故意输给他。大爷说，“现在站不住，走不动，打麻将既是娱乐，也能锻炼身体，锻炼脑子。”

张学良年轻时就是北京城有名的票友，近些年大陆的京剧名角应邀访台，他几乎场场必看。1 月 5 日，夏威夷名票 玉洁及汪文娟两位在他们座落在半山的华宅欢宴正在度假的张学良将军，还特别邀集了来自南京、北京的几位名演员及当地的若干爱好者助兴。当天傍晚，“少帅”张学良由他的五弟张学森伉俪陪同，乘车驾到，主人全玉洁恭迎于庭院中。93 岁高龄的张学良跨出车门，不要他人搀扶，走入客厅，大家拍手欢迎。张学良与大家略事寒暄，便静静地坐在沙发一端，一面喝茶，一面听大家唱戏。江苏省京剧院演员陆根章自告奋勇地唱了开锣戏，唱的是“杨延辉坐宫院”那一段，科班出身，自然不同。接着，由旧金山名旦宋祖莲、女主人汪文娟及郑杰西，江苏京剧院的沈班梅伉俪、北京京剧院的齐啸云，张学良的五弟张学森等以及当地若干位京剧爱好者先后演唱，均极精采。另由沈福庆、郭石斋拉京胡，张天心拉二胡，山下理美弹月琴，倒也“珠联璧合”满好听的。

就在大家大拉大唱之时，张学良突然起身离座，大家以为他要上厕所方便方便，谁知他却走到琴师沈福庆面前，说他也要唱两段过过瘾。来宾大乐，纷纷围拢在张学良周围，听他老人家唱戏。他一口气连唱好几段——“战太平”、“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谲”……声音虽然较小，但是韵味甚佳，尤其是戏词记得十分清楚，对一位 93 岁的老先生来说，能够记清这样

长的戏词与这样繁杂的腔调，真是太难了。这表明张学良对京剧曾下过不少功夫。

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张学良越唱越起劲，兴趣越浓厚，大有“不罢不休”之意。他唱完全部“失空斩”之后，还要沈福庆为他拉一段《斩黄袍》。沈福庆年纪较轻，自出生以来，从未听过这出数百年前的老戏，自然无从拉起，张未免有点扫兴，恰好在座有位张天心十分熟悉，他接过京胡照拉不误，张学良大乐，过足了戏瘾。

张学良唱毕，主人宣布开饭，菜由一家著名餐馆送来，十分丰盛；外加烹饪名家谭莺伟及万雯所包的“鸡肉韭菜”水饺，正合少帅口味，吃了不少。

张学良性格开朗，说话风趣，常令四座捧腹大笑，过足了戏瘾的张学良兴头不减，饭桌上仍然大讲笑话。他先给讲“一个字”的笑话——说有人请求一个笑话专家讲一个“一个字”的笑话，笑话专家就找来了一位盲人，让他站立游泳池边沿，发一口令——“跪”，那盲人应声跪下，便“噗通”一声跌入池中，那狼狈的样子令人笑破肚皮。张学良还讲了故事，猜谜语、写字作诗，慈祥亲切，极有风趣。

张学良兴致勃勃，谈了他与“大帅”张作霖之间的一些往事。他说，他22岁当旅长，还兼任了“航空处”等机关什么重要差事；他每天早晨必到“大帅”处请安，张作霖便与他谈论公务。由于“少帅”对人对事都有深刻的了解，所以对答如流，意见也特别高明，受到“大帅”及同僚的赞赏。

张学良写的字是一幅对联：惟大英雄种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字迹古朴苍劲，另成一体，具见功力。

“少帅”的诗也很有趣，诗云：

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
我虽并非英雄汉，惟有好色似英雄。

张学良的坦坦心怀，隐约在字里行间。

张学良还说了不少有趣而富于哲理的话：

*人的生活要简单，简单的生活能使人长寿。

*小时，我身体较弱，被送到和尚庙中做“跳墙和尚”以求康健，跳出墙后，恰巧听到有人呼叫“小六子”，所以，家人也叫我“小六子”，其实我排行不是第六，而是第一。

*我已93岁了！我从来没想到我能活到93岁！

那天晚上，张学良唱了几大段京剧，与大家有说有笑，非常开心。

张学森看天色不早，向张学良建议回家。

张学良却说：“我不回家！”

弟说：“你不回家，我要报告大嫂！”

张学良说：“那我就告诉大嫂，你不带我回家！”

哥儿俩逗来逗去，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张学森似乎逗不过张学良，沉寂了一会，又说：“我带您在这里玩得这么开心，又为您唱了两段戏，您应当发一点奖金给我！”

张学良闻言，果然从内衣里掏出钱包，慢慢吞吞地翻弄着，大家以为张学良真会发奖金，不料他却取出一根牙签，一面微笑，一面对其弟说：“发你一根牙签如何？”张学森啼笑皆非，又引来一阵哈哈大笑。

张学森说：“大哥！咱们回家吧！”

张学良想了一想，语重心长地说：“你的家在哪呀？”张学良的这一句话使与会者突然想起一句歌词——“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不禁感慨万千。

然而，物换星移，几度春秋，张学良的“还巢梦”依然尚未变成现实。有人估计，张学良毕竟年事已高，可能身体欠佳，行动不便，不堪旅途劳累；有人猜测，张学良有过不参与政治的表示，海峡两岸的敌对情绪不消除不便回大陆，一再推迟赴大陆的行程，许是避政治之嫌；最近有消息称，最主要的原因是，伴他60多年的夫人赵一荻女士有病在身，不可能在夫人患病的时候抛下她不管，自己回大陆。对此，张闾蘅不便擅言，或者都不是，或者兼而有之。“想回大陆是肯定的，究竟何日才能成行，只有我大爷自己知道。”

一次没有记载的秘密飞行

1946年11月的一天上午，国民党空军上尉飞行员王赐九驾驶美制C47型运输机，将蒋经国送到南京后又返回重庆，飞机还在九龙坡机场（现在的重庆火车站）上空盘旋时，无线电传来了上司的命令：“飞机着陆后，立即到大队部。有任务。”

飞机刚刚停稳，一辆美式吉普车早已等候在跑道头，王赐九来不及脱掉飞行帽，就被车接到了场站站部。体态偏胖、身材矮小的九龙坡机场场站站长，王赐九还从未见过。他将王赐九从上到下打量许久，从这异乎寻常的眼神中王赐九揣摸出此次任务非同一般。

“王机长，你们的飞行任务上司有改变。由你任正驾驶，明天早上八时半从本场起飞直达台湾。”站长接着又说，“给你重新配备的机组其他成员，我已经安排妥当，你不必操心。”站长非常严肃地给他规定了“三不”：“从现在起不准走漏消息；不准与任何人见面；不准打电话。”

第二天，王赐九登上机时已是早上8时10分，这架飞机远离机群，停靠在机场的东北角。远眺机场外，四周隐隐约约可见一排排荷枪实弹的士兵；在机场入口处，几名军官和便衣盘查着过往的人们。寂静的机场藏着一股杀

气。

8时20分，一辆美式吉普车驶入停机坪。下车的是一位魁梧的中年男子，他直接登上飞机前舱，从公文包中取出一份放飞通知单。王赐九接过放飞通知单，不由产生疑问：为什么机场不按常规签发专机运送主要人物的姓名、乘机人数、载物重量？为什么外面警戒森严却又无人前来送行？为什么机组人员非要临时配备？为什么机场工作人员一反常规，寥寥无几。为什么动用专机只是为了送一对年轻的夫妇？

猛地，一个念头在王赐九眼前闪过：这不是少帅张学良吗？西安事变后，他在多家报纸上看过少帅的照片，难怪有似曾相识之感。显然那位女士就是和他患难与共的赵四小姐了。

这天，张学良穿一身藏青色中山装，可以明显看出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修边幅了。

赵四小姐一手紧紧地挽着张学良。她着一身浅蓝色阴丹士林旗袍，左手提一只藤条箱，看上去朴素无华却掩不住大家闺秀的端庄凝重。她气色尚好，只是较十年前略显胖一些。

由于是货机，机舱内没有座椅，赵四小姐只好坐在衣箱上。张学良在机舱内踱来踱去，他两眼炯炯有神，打量着身着飞行皮夹克的机长王赐九，欲言又止。

8时30分，机场调度室传来了起飞的命令，飞机呼啸着拔地而起，直插长空。飞机在起飞时，雾很浓，又夹着细雨，能见度极差。王赐九将飞机上升到2200米的高空云中，以每小时230公里的速度朝南飞去。飞到江西遂川，云雾才逐渐散去。进入福建上空时，已是碧空无云，过了福州就可遥见台湾，阿里山已尽收眼底。

张学良拥着赵四小姐扶靠在机窗前。飞机终于飞临桃园机场上空了。透过防弹玻璃鸟瞰大地，机场上未显示降落标志，只见一条测风袋在空中拼命摇摆。王赐九迅速打开测风仪，仪表显示左侧风超过每秒12米，在这种无地面指挥、没有无线电联络的情况下降落，很容易造成机毁人亡的后果。怎么办？想到九龙坡机场站长的“记住是桃园机场”的命令，王赐九为难了……但他转念又想，专机上的客人是爱国将领张学良，他为促成国共合作，敢冒杀头之险，现在我做一名正直的飞行员该做的工作，又算得了什么呢！随即，王赐九与副驾驶商定调转机头向台北飞去，很快，无线电与台北机场取得了联系。

13时35分，飞机徐徐降落在台北机场。一辆黑色小轿车急驶而来，嘎然停在飞机舱门下，一位身着黑色礼服的中年男子跳下汽车，打开车门。张学良一行走下飞机，上车前，少帅和赵四小姐回首向机组人员招手致意。

“这是我与张将军的最后一面，因临行前上司有令，不许与乘机者交谈，我们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将军恐怕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望着他离去的身影，我内心充满了惆怅。”75岁的王老如今谈起这段经历时，还在后悔不已。

次日，王赐九机组返回南京覆命，刚下飞机，他就被车接到了航空委员会作战处处长的办公室。一见面，处长就劈头盖脸地责问：“为什么不听命令改变降落地点？”不容分辩，接着说：“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民族的罪人，这件事只当没发生过，不许走漏半点消息，否则杀头。”说完，他很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你走吧。”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王老一直将这次秘密飞行藏在心底。当最近有记者问起王老，“四十多年你都守口如瓶，如今为何能和盘托出？”

王老说：“解放前，我当然不敢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解放后，我参加了解放军，但鉴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实不敢因此断送前途。如今，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日子越来越近。将这一不寻常的飞行经历公之于众，我责无旁贷。”

向蒋介石提出二点要求

1947年10月间，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在为新疆问题极度紧张工作之后，去台湾作休假旅行。张学良那时关在台湾新竹井上温泉。当时台湾警备司令彭孟緝是张治中的学生，张到台湾后即向彭提出要去看张学良。彭很犹豫，不敢答应。张当时对彭说：“一切责任我负，不会连累你。”彭才勉强答应。

温泉距新竹有两小时的汽车路程，入山后有一宪兵分驻所，张治中一行经盘问后放行，不久到了井上温泉大木牌下，石级上便是张学良的住宅，孤零零的一座平房，屋旁有一温泉，林木幽静。张学良已得到通知，早在院内迎候。张治中见他瘦了许多，也苍老些，眼睛小了，据他说眼睛有病，看书吃力。当时张学良已做了祖父，他高兴地要赵四小姐拿出孙子照片给他们看。

赵四小姐与看守副队长陪张夫人和女儿们去浏览风景。那里有一座铁索吊桥，长150米，距水面有四、五十丈高，十分壮观。赵四小姐瘦弱，有心脏病，由人扶着走了一截，头晕眼花，缩了回去。张夫人虽是小脚老太太，却走过去了。赵四小姐一见，便鼓起勇气，叫人扶着也走了过去，并对她们说，来温泉都一年了，还没有看过这吊桥，今天竟走过去了，很兴奋，足以自慰。

张学良和张治中留在屋内畅谈。张学良问张治中：“我何时能恢复自由？”张治中安慰他，说：“国内总要和平的，国共终于要恢复和谈的，国共和谈成功之日，即你恢复自由之时。”张学良听了很高兴，张治中这话合乎情理。西安事变的发动是要求联共抗日，如国共和解，他当然能获得自由。张治中是力主和谈的，他这番话使张学良感到还可以从另一个途径获得自由。

张学良托张治中向蒋介石和宋美龄提两点请求，第一点是他希望能恢复自由，并说，恢复自由以后，哪里也不去，蒋住在哪里，他就住哪里。他除了恢复自由以外，没有任何别的请求，也不一定做事情，可以考察他一个时

期以后再说。

第二点请求是那个副官带着家眷，还有几个孩子，同他住在一个房子里，副官对他名为照料生活，实际上干涉他的地方很多，孩子又吵闹，使他感到既不方便，又不安静。他希望能让刘副官搬出他的房子，他的生活由他自己管理，以保持一定的自由和清静。

临别之际，张学良以七绝一首赠予张治中，诗曰：

总府远来义气深，山居何敢动佳宾。
不堪酒溅酬知己，惟有清茗对此心。

张学良一直将张治中送到汽车旁，紧紧握着张治中的手不放，深情地说：“我在这里，除你以外，没有人来看过我，我对你万分感激！我们这一分别，不知何年何日再能见面。”两人相对黯然，泪眼凝噎。

张治中回到南京，向蒋介石报告见张学良的情况并转达了张学良的请求。蒋很不高兴，啊啊了几声，即把话岔开。随后即下令非经他的批准，任何人不准去看张学良。这是张治中始料所不及的。

张治中只好再去找宋美龄。宋美龄听后第一句话就叹息着说：“文白兄，我们对不起张汉卿！”然后接着说：“第一点不容易做到，恐怕现在不可能得到许可。第二点我一定想办法做到。”

宋美龄把张学良要求的第二点，确实给做到了。那位把张学良“管束”了10多年、官升少将的刘乙光，不久就被调走。张学良最感痛苦的一件事，总算解除。

与蒋经国同看溜冰表演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因戴笠已经去世，当时蒋经国担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管束”张学良的工作由蒋经国接替。

蒋经国接下“管束”工作后，不仅使张在物质生活上有所改善，而且在精神生活方面也有突出的做法。

也许是他们都有一位做元首的父亲，经历和背景也很相似。也许蒋经国对张学良的为人很欣赏，而且西安事变的结果是促成蒋经国从苏联回国的主要因素，因此，在他主管看管张学良的工作后，便和张学良交上了朋友。

蒋经国任“行政院长”以前，不论工作多么忙，总是经常抽空去看望张学良或是约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到他的官邸小聚，并且要求他们的共同朋友作陪，尤其是陪伴张学良多年的“立法委员”王新衡。

1961年，张学良搬到了台北郊区北投路70号，蒋经国还特意送了一套客房用的家具。

1962年，美国白雪溜冰团第二次来台公演。有一天，蒋经国派人去买票，

在座位表上选了连号四张，又在这四个座号的前后左右买了“插花式”不相连的门票七、八张。晚上，蒋经国同三位贵宾同来观看表演，当时，在场的人都不认识和蒋经国一起来的是什么人。但泄露秘密的，竟是负责保密的安全人员。其中一个头目把场内负责人找去说，今天是蒋经国陪张学良夫妇看表演，要求场地负责人要留意一些，第一不能随意告诉人；第二更不可让新闻记者知道；第三如果背闪光灯照相的记者走进这一区域，应立即告知安全人员。因此，在场的场务主任、票务主任才知道和蒋经国一起来的，就是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而且同时也因此知道今天所买四张连号票以外，又买了“插花式”不相连号门票的，是供安全人员坐的。

过了两三天后，原来的安全人员又来买票，并和前一次一样。由于他们已和场地人员相熟，便坦率地说张学良还想再看一次，蒋经国只好再陪一次。

蒋经国当时的“公务”十分繁忙，在短短两天内，能够抽空连续陪张学良两次去观赏白雪溜冰团表演，可看出蒋经国对张学良的感情非同一般。

当代冰霜爱情

到台湾后，张学良生活中最大的一件事是与于凤至办了离婚手续，而与赵四小姐正式结婚。

1964年7月21日，台湾《联合报》在第三版的头题位置，以《三十载冷暖岁月，当代冰霜爱情。少帅赵四正式结婚，红粉知己白首缔盟》的警醒标题，报道了张学良与赵四正式结婚的消息。

张学良13岁由其父张作霖做主与于凤至订亲。于凤至个儿高，人也俊俏。张学良结婚那年虚岁15，于凤至18。婚后，夫妻、婆媳关系相处甚好。第二年张学良喜得千金，做了父亲。女儿取名小铁，学名吕英。以后于凤至又生了3个儿子，大的叫小福，二的叫小禄，小三早亡。

于凤至聪慧、贤淑、雍容大度且知书达礼，张学良尊她为大姐。夫妻相处甚睦。

1927年，张学良在天津认识了赵四小姐。

赵四，浙江兰溪人，1912年生，原名笙香，是津宁铁路局长赵庆华的第四个女儿，因排行第四，故称赵四小姐。

赵四幼年在天津法租界浙江小学读书，后入天津中西女子中学就读，经姐夫冯启縻的牵引，与张学良认识。那时，冯启縻担任张学良的法文秘书，张委派冯在天津出版一本《北洋画报》，在张学良巡视画报社的时候，冯介绍赵四与张认识，那时，赵四小姐不过15岁，张学良已26岁了，但赵四对张学良的翩翩风度、英俊有为，极为爱慕，张学良每到天津，赵四必找他游玩，过从甚密。

此后的一个暑假，两人在北戴河海滨，偶然相遇，从此感情日益亲密起来。一日，张学良找赵四，直入卧室，赵四不在。张翻阅她的日记，其中有

一页写到很爱慕张少帅，可惜他已结了婚，还怨自己命苦。张学良看之，心中有点飘飘然。

在一次宴会上，赵与张并坐一起，赵四胸前垂着一颗鸡心饰物，张学良想仔细看一看，赵四不同意，张却抢了过来，不看犹可，一看之下，张学良几乎坐不稳，原来鸡心里面嵌着的却是张的小照，而且还写着“真爱我者是他”的字样。这使张少帅对赵四小姐的爱更深入肺腑，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1923年秋，张学良同赵四小姐相约，秘密去沈阳北陵同居，并让她就地入大学深造。赵四求学心切，更由于对张学良的爱慕，便答应了他的要求。

张、赵虽已同居，但还有许多问题未能解决，因为张学良早已与于凤至结婚，身为东北军将领，当然不应该带头纳妾，而且元配夫人于凤至也不会同意，所以在张偕赵回东北时，不得已在帅府邻居借一所房屋，开一道边门出入。

为家庭的和睦，张学良向赵四提出：没有夫人名义。对外国人称她为自己的秘书，对中国人可谓侍从小姐。于是，赵四便有了秘书、赵四小姐的称谓。

赵庆华得知女儿与张学良去沈阳同居的消息，震怒异常，随即在报端发表声明，与赵四断绝父女关系，并从此不再作官。他辞官后隐居于北京西山八大处，自号紫庐老人，在那里开一饭店度日。

在父亲的强烈反对和舆论压力下，赵四毫不动摇。她精心侍候张学良，并且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在沈阳度过了一段美好的岁月。1929年，赵四生下一个男孩。

1930年，赵四随张学良到北京，住进顺承王府（即现在的全国政协机关所在地）。偶而来探望的，只有她的生母和哥哥赵燕生等。她一直没有机会回到赵家或见到她的父亲赵庆华，直至赵庆华年老故去。

赵四自住进了顺承王府，便和于凤至朝夕相处，她识大体、顾大局，以贤慧品德维系着整个家庭的融洽和睦。她对于凤至非常尊重和亲热，生活上亦殷勤照料。张学良外出买回衣物，即送给于凤至。于凤至对赵四的贤良很是赞赏，故深相接纳，如亲姊妹相待。她们亲密合作，精心照料张学良，这对张学良专心处理军务、政务是很大的支持。在家里，他们三人一起愉快地生活。接待朋友和客人时，张学良总是带上于凤至、赵四一起出见。当时凡是和张学良有交往的人都羡慕他有个和美的家庭，称赞他有两位贤内助。

1933年张学良被迫下野出国。在他失意的时候，赵四给了他很大安慰。张学良由于凤至和赵四陪同，去了英国、意大利。这期间，赵四为使张学良保持愉快的心情，每当他想从事某种西方娱乐活动（如打高尔夫球）时，她便很快学会，陪伴他一起娱乐。

张学良对赵四不但喜爱，且十分信任，按张学良的个性，不许眷属参与自己的军政大事，决定事情不受妻室的影响。但是，在“双十二”这个关系中国现代历史转折的非常时刻，张学良与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等人之间的来往

电报均由赵四起草和掌管。有些张学良认为重要的客人，赵四也参与接待。赵四成了张学良的得力助手。1937年1月11日，赵四随王化一、吴瀚涛去南京照应已被囚禁的张学良，杨虎城及于学忠、王以哲等人均有信给张学良，为了避免戴笠的检查，她把信看了二、三遍即背熟了，然后毁了信件。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软禁起来。赵四在万般忧虑、又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携着儿子去香港居住。1937年初，于凤至从英国回到北京，遂赴溪口照顾张学良，直至1940年。住在贵州息烽时，于凤至因患癌症在宋子文与刘瑞恒的建议下，到美国洛杉矶医院医疗割治。20年后，她又患了风湿。世事真难预料，想不到于凤至与少帅一别却再未相见！张学良于1940年向戴笠提出，让赵四接替于凤至照顾他的生活。

赵四获悉张学良需要她去照顾的消息，毅然决定前往张的囚地。以赵四当时的情况：在香港拥有相当数量的钱财，有自己的住所，生活是很安定舒适的，加上儿子年幼也需照顾，她不去张学良的囚地是可以的。但是，她考虑到危难中的张学良，此时此刻更需要她去陪伴，她毅然抛却一切优裕条件，同张学良一起过囚禁生活，其中包括舍离自己最心爱的儿子。她决定将儿子委托一个张学良的忠实朋友，张学良曾将一笔财产交给他保管。于是，赵四带着闾琳来到美国，将孩子交给这位朋友照看，请他照顾好孩子的生活，设法让他念书，但不许孩子接触外界任何人，也不能向他人谈及孩子的有关情况，以防止有人加害于孩子，或因环境复杂发生其他意外。临别时，不满10岁的闾琳哭闹得十分厉害，他哭喊着要跟妈妈回去，紧紧地抱着她的腿。妈妈泪满双腮，说不出一句话来……最后，孩子被拉开了，赵四呜咽着，步履蹒跚地朝着既定的方向走去——那里是湖南沉陵凤凰山张学良的囚所，从此与张学良一起，开始了漫长的幽禁生活。

在与世隔绝的寂寞中，张学良和赵四的凄苦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两人相依为命。张学良把一切希望和欢乐寄托在赵四身上，赵四则尽全力给张学良以安慰和照料。张学良是个精力充沛、兴趣广泛并且好动的人。凡是张学良需要作的，赵四就陪着做，跟着学，做到样样都会，都能跟着来。张学良在囚禁中不时用英语会话，赵四就学习英语，随时和张对话；张学良要打网球、排球等，赵四就陪他对打；张学良研究明史，写文章，赵四就给他购买书籍，查找材料，帮助做一些文字工作；到了张学良厌倦读书，喜欢文物古玩的时候，又是赵四去帮他采买、鉴定和收藏。许多生活琐事都得赵自己动手，而赵四在这种情况下，显得什么都会干，并且做得很好。比如仿照新的式样缝制衣服，烹调可口的菜肴等等。张学良使用假牙，保养假牙要用一种细线绳，这些线绳都是赵四一根一根地用手捻成，然后打上蜡料备用。

赵四陪伴张学良以后，内心自然时时挂念寄养在外的爱子。后来，他们的“监护”情况稍有松动，赵四就每隔两三年去美国一次，看看闾琳、儿媳和孙子。然而，她深知单独留在囚地的张学良，一定会在她离开时倍感孤独和不便，为着不扰乱张学良的心绪，她每次到美国都只停留三天左右。单从

这点，也可看出她对张学良的一往深情。

张学良在研读《圣经》之后，对基督教发生了极大兴趣，并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正当他准备受洗的时候，宋美龄对他说：

“依你现在的情形，是不够格受洗的，因为你和于凤至还有正式的婚姻关系，又和赵四小姐同居了几十年，等于同时有两个太太，是不可以的。”

张学良听了宋美龄的话之后，立即派人赴美和于凤至商量办理离婚手续的事情。据说，于凤至对于过去30年来，一直陪伴在“少帅”身边与之共患难的赵四小姐，颇为敬佩，且为其坚贞的爱情所感动。她曾表示：“只要能帮助他精神快乐，只要能使他高兴，任何事情我都肯为他代做。”因此，当张学良提出上述要求时，她慨然应允。

张学良与赵四按照宗教仪式在台北杭州南路一位美籍人士家中举行了婚礼。仪式简单而隆重，除了证婚的美籍牧师外，还有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张群等12位友人观礼。当牧师为这对老年夫妇祝福时，他和她的嘴角都露出了自然的笑容……台湾新闻媒介对婚礼作了大肆渲染，报道中所描绘的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处境与心绪，读来令人心酸。且看文章的小标题：

卅载冷暖岁月，当代冰霜爱情……夜雨秋灯，梨花海棠相伴老；小楼东风，往事不堪回首了！

信奉基督教以后，张学良似乎对许多事情减少了兴趣。他每个礼拜天到教堂作礼拜，每星期五在家中听牧师说教，偶尔也出外看场电影，但俱是俩人携手出入。一个老太婆伴着一个自发老翁，像一对平常百姓的老夫老妻一样，谁也认不出他们的庐山真面目。人俱老矣，面目已非，但他们始终相爱相随。在有生之年，他们还企盼什么呢？香港《新晚报》在一篇报道里曾有这样的内容：

张学良问赵四小姐：“你是不是也想趁有生之年，能回次大陆，看看奉天，看看那西安？”

赵四小姐眼里盈满泪花，叹了口气说：“汉卿，咱们还会有那么一天吗？”

“三张一王转转会”

到70年代末期，张学良的生活又增加了一项新内容，即被后人传为美谈的“三张一王转转会”。“三张”依年龄为张群、张大千和张学良，“一王”即王新衡。他们四人采用“轮流作庄制”，定期聚会。这曾为张学良的囚禁生活带来不少慰藉。“三张一王”情投意笃，相聚甚融，其中张学良与张大千的关系说来颇具传奇色彩。

“将军爱好书画，收藏甚富，尤精鉴赏，贗品极少。”这是他的盟弟周

大文所记。

但是，被画坛宗师徐悲鸿先生誉为“五百年来第一人”的张大千，无意之中却骗过了张学良，二人由此相交，并成为终生不渝的挚友。

中原大战结束之后，张学良入主北平，成为江北半壁河山的最高主宰者。一天，他逛琉璃厂时，购得几幅大画家“石涛山水”，兴意极浓地返回官邸，并请好友前来欣赏。其中一友告之：近来出了一位张大千，临摹石涛山水可以乱真，连大画家黄宾虹都曾上当受骗，惊呼张大千是当今画坛奇才，这几幅“石涛山水”，会不会是出自张大千之手的赝品呢？对此，张学良十分扫兴。后经名人鉴定：果真是张大千临摹的赝品。

张学良久知张大千的为人，他历经深思，决定利用一次大型宴会之机，给张大千发去一张特制的请柬：务请莅临赏光。

张大千从不惧怕登临权贵之门，但他今天却捧着这张特制的请柬犯了难。几经权衡，才决定硬着头皮赴宴，会一会这位大上自己赝品之当的少帅！

宴会开始了，令张大千惊诧的是，这位少帅并无怒色。相反，宴会进行到中间的时候，他指着张大千向宾朋友好介绍道：“这位就是仿石涛画的专家，鼎鼎大名的张大千先生。”从此，张学良和张大千始有交往。这次宴会不久，张大千怀着“探宝”的心情又一次光顾琉璃厂。一位古玩商取出一幅藏画，请张大千鉴赏。他仔细研究了这幅古画的风格、用笔、着色之后，暗自惊喜地说：“这是新罗山人华岩精品！”

华岩为清朝初叶著名画家，深受石涛大师绘画作品的影响，并对清朝中期的画派曾产生过影响。而张大千尤喜华岩的画风。张大千双手紧紧捧住这幅华岩的精品，生怕被其他行家里手抢去似的。问道：“请问开价多少？”

“银洋5百元。”

“我看，3百银洋即可成交。”

“好！货卖行家，3百银洋就卖给你张大千先生。”张大千喜不自禁，放下这幅华岩的精品，一掏口袋，方知未带这样多的钱，他急忙又说：“请把这幅画收好，我三日以后必带钱来取画。”

张大千唯恐有变，再三叮嘱之后，方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琉璃厂。

三天过后，张大千兴致勃勃地来到琉璃厂，将凑足的3百银洋往案几上一放，大声说：“掌柜的！一手交钱，一手交画。”掌柜的闻听面带难色，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对不起！那幅华岩的古画已经出手了。”

张大千视名画为国宝，不惜倾万贯家财而购之。因此，他听后勃然大怒，高声责道：“诚招回头客，信取八方人，这两句经商的至理名言你懂不懂？”

“懂！懂……”

“那你为什么失信于我？”

“请大千先生息怒，我有难言之苦啊！”接着，这位古玩商道出了其中的原委：

就在张大千离去不久，张学良赶到了琉璃厂这家古玩字画门市部，问及

有何名贵的书画珍品。这位古玩商人又将华岩的那幅珍品取出，开价要了5百银元。没有想到张学良连价都没还，当即命随侍取出5百银元往案几上一放，干脆地说：“请数钱吧！”

到这时，古玩商人复又想起张大千来，但是当他看到白花花的5百银元的时候，又喜不自禁地暗自说：“多赚了2百银元！”

可是今天，这位古玩商又换做另一副模样，话中有音地对张大千说，“他是当今北平的皇上，把5百银元往我桌上一甩，我敢不卖给他？”

直到1935年，张学良到西安调任西北“剿总”副司令之职，才得以与张大千劫后重逢。这年重阳节，张大千西游华山，张学良闻讯急忙前去探望，他紧紧抓住张大千的双手玩笑着说：“大驾光临西安，不到我的公馆住住，休想离去。”

当夜张大千乘兴泼墨挥毫，为张学良画就了一幅《华山山水图》，使张学良大喜过望，旋即和赵四小姐盛宴款待张大千。回到北平后，张大千念念不忘张学良的深情厚意，又画了一幅《黄山九龙瀑图》寄给张学良。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画中精品，张学良视若珍宝。

之后多年，他们均未相见，至50年代末期，已移居巴西的张大千冒然向他的入室女弟子宋美龄提出要见张学良。在蒋介石“准予相见，但不得向外透露此事”的批语下，张大千来到了台湾。

相见那天，张学良在赵四小姐的陪同下，早早恭候北投复兴岗寓所的门口，老友相见，一时涕零难语。

不久，张大千离台他去，在他候机时，一位中年人匆匆走到他的面前，双手捧着一个硬壳长形的圆筒，恭敬地说道：“大千先生！这是张将军赠送给您的礼品，请收下。”

张大千双手接过礼品，紧紧抱在胸前。

“张将军再三让我转告，”来者格外郑重地说道：“请大千先生回到巴西再打开看此礼品。”在日本东京机场，可能是看此礼品的心切吧，他竟然违约开启圆形的长筒，取出一幅画轴，双手展开一看，原来是30年前在北平琉璃厂那幅华岩的精品。他的双手颤抖了，老泪纵横双眼也模糊了……

1978年，张大千举家返台定居，从此与张学良便经常见面，及至形成“三张一王的转转会”。

1983年1月2日，张大千溘然病逝。他长张学良二岁，终年85岁。张学良闻噩耗万分悲痛，又失去了一位挚友！真是“忆旧半为鬼”。这对张学良无疑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西安事变”后第一次接待记者

囚居中的张学良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一队“随行人员”对他形影不离地进行保护，不允许他随便与外界接触，更不许记者采访。几十年来，各新闻

单位都想尽办法，找尽关系，要访问这位传奇人物，但大都不得其门而入。

1981年8月18日，台湾《联合报》却抛出了一篇爆炸性的新闻——《和中国近代史相关联的——张学良访问记》，在台湾朝野上下掀起了一阵喧然大波。这是自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接待的第一位“职业新闻记者”，也是数十年来对张学良情况最详细的一篇报道。

该报记者于衡在文中说，张学良是“很不心甘情愿的接受了本报记者的访问，”因为当时张学良正因病住在“荣民总医院”，且有四名“随从人员”日夜轮流值班看守，而于衡也因病恰住在张学良的隔壁。以下是于衡介绍的住院期间八访张学良的经过。

张学良这次是因患重感冒高烧不退而住院，他住的是传染病科，用的名字是“张毅庵”。张学良入院的第一天曾拉大嗓门对护理员说：“今天上午我的体温是三十八度九……”。这特殊口音引起了隔壁于衡的注意。新闻记者的敏感使于衡忍不住想打听这位老人的来历，于是他溜进了老人的病房。当知道这位老人就是曾经叱咤风云的张少帅时，他又惊又喜，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怎么能放弃这机会呢？第一次采访，“随从人员”没有发现，使于衡得以同张学良攀谈了50多分钟。当于衡第二次去访问张学良时，“随从人员”就向于发出警告：“以后不要再来麻烦张先生”，要于“自我节制”。但是，以后于衡仍作了6次短时间的访问。访问记这样写了张学良的身体状况：

他已满头灰发，头顶中间的头发脱落，成了罗汉秃。有人说他“声若洪钟”，其实是由于他两耳重听，讲话时怕对方听不到，所以嗓门拉得特别高。除了患视网膜炎和老年性重听病以外，心脏、肾脏、肝脏、血压，都很正常。望着他那疏落而灰白的头发，面部的老斑，再加上医院病人所穿的宽大睡衣，还有他那一脸纯朴的表情，看去真似乡间的老农，那会想到他就是五十年前叱咤风云的张少帅。

张学良目前住在台北北投复兴岗附近半山上的一栋房子里，平时以读《圣经》、养兰花和听京戏打发日子。他和夫人赵一荻现在信奉基督教，熟读《圣经》，

可以背出《圣经》的某一章某一节。张学良现在还是美国一家研究《圣经》的学院的“函授生”，拜周联华牧师为老师。他常在星期日去士林的一家小教堂做礼拜。……

于衡的访问记引起了许多人士的质疑与气愤，因为早在60年代初，蒋介石曾亲自宣布给张学良以自由，为何至今仍公然处于“保护”之中？

蒋介石确实讲过使张学良“全复自由”，那是1960年6月的一天，莫德惠忽接蒋介石电话，叫他到某地去见一个人。莫德惠满腹疑云，及到了台北士林一住家内，才知张学良在此作60初度之庆，亦无旁人。张学良自谓居此

已久，并且常到士林礼拜堂做礼拜。从表面上看，已没有卫队在，但仍有特务暗中监视，所以张学良讲话也不多。

不久，台湾警备司令部亲称：“张学良经24年扣押后，已被释放。”据说蒋介石亲对他说：“老弟，到外边逛逛，找朋友玩玩呀！”

秘密探幽

蒋介石为什么不给张学良自由呢？

1988年8月，原国民党南京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的机要秘书徐世江在《纵横》杂志上撰文《张学良遭终身软禁之谜》，披露：

1931年8月中旬，在北平的张学良得到一个重要情报日本关东军将要在东北发动侵华战争。张当即密电蒋介石请示“应变”对策。而蒋却回电说：日寇正到处寻衅，找个借口好出兵侵占东北三省，希你顾全大局，忍让一时，并严饬东北军官兵，如遇日寇挑衅时，不要抵抗，以免事态扩大，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9月18日凌晨，日本关东军竟悍然出兵，侵犯沈阳，炮轰北大营。张学良在北平得到电报，马上再次急电请示蒋。张首先接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复电：

“令张学良严饬东北军驻沈阳的将军王以哲、荣臻等绝对不准抵抗，违者以军法从事；并令驻辽宁的陆空军继续后撤，以不与日军接触为原则。‘沈阳事件’听候中央处置。”

旋又收到由专机送到北平的蒋给张称兄道弟的亲笔信，其主要内容：

（一）现国际形势对我不利，英日有盟约在先，美法等强国又利用日本防范赤俄，均不愿援华抗日。（二）国内局势不稳，西南滇（龙云）桂（李、白）粤（陈济棠）等要联合反对中央，而“共匪”受赤俄援助，到处流窜，同时今年长江又发大水，天灾人祸，造成国困民贫，财政奇绌，武器不足，怎能抗击凶狠顽强的日寇侵略军！？我们要忍辱含垢，卧薪尝胆，内求稳定，外谋友国，积极筹购武器，充实战备力量，以待国际局势演变。当前只有退让，诉诸国际联盟，争取美法英苏等列强同情和援助，以“九国非战公约”来遏制日寇的侵略等，云云。

张学良误信蒋的欺骗宣传，且笃守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遂转令王以哲、荣臻等将整装待命反击的陆空两军继续后撤；致将东北大好河山，束手让给日本侵略军占领！王以哲日后告称：

“从这以后，每当日侵略军前进，张即电请示，蒋都复电令张不准抵抗，继续后撤。直到张学良被舆论扣上“不抵抗将军”的帽子，迫于舆论和民愤压迫，不得不辞职下野出洋考察为止，张共收到蒋及军事委员会这样不准抵抗的电令、函件共10余份之多。张学良的智囊团人士建议张将这些电令原件妥为保存起来，后来张夫人于凤至女士将这些函电让张去西欧考察时，特地

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不料这些文件竟救了张的性命。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中央亲日派头子何应钦及与张有宿怨的国民党党政大员，如陈果夫、陈立夫、唐生智、张继等人，均主张将张学良交军法审判，处以极刑！张夫人于凤至女士得悉此噩耗，立即分电蒋介石及西安谈判保证人宋子文，电文首先说明：“九·一八”东北军不抵抗，乃遵照委员长电令行事，汉卿并无罪责；“西安事变”系汉卿为维护“领袖”名垂青史，激于抗战之热诚，才进行谏诤的。进而说明，张唯恐蒋拟 12 月 12 日亲莅西安召集两军官兵及各界人士训话时，遭偏激分子暗算，才于 12 日凌晨发动名曰兵谏，实为保护委座安全之策；最后为维护“领袖”之威信，故又亲自护送钩座安返首都云云。电文最后着重说明：假如中央为某些当权者所操纵，致使汉卿有不测之时，凤至即将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的有关“九·一八”以来，中央及钩座给汉卿和东北军的指令、函电，全部公诸于世，诉诸国联，对日不抵抗之罪责，究应谁负？敬乞钩座明察而制之。

翌晨张夫人即收到宋美龄的复电：“……汉卿兄事，请仁姊放心，委员长绝对履行诺言，保证汉卿兄之安全”云云，事后推测：这两个电报起了先判刑后特赦的作用。张学良一直没有遭暗害，不能不说是与伦敦保存的函电有关。即在 1946 至 1948 年间，当我任参谋总长陈诚的机要科长时，我就亲眼看见过两次蒋介石给陈诚和毛人凤的手令，指示确保张学良人身安全之重要。蒋介石害怕他手下的一些妒贤嫉仇的军待人员将张暗杀，而导致他们见不得人的密电手令一旦公诸于世，使蒋失信于天下，动摇他在中国之统治地位。但蒋又不敢放张，一怕放虎归山，终成后患；二怕张投奔中共而竟成劲敌；三怕张获得自由后，其夫人于凤至公布其密电，让世人知晓蒋不抵抗日军之内幕。为此，蒋以“张”作“人质”，而迫使于不敢泄密：个中内情，至今尚为世人所不知。

徐世江亲闻亲见的史实证明：一封密电救了张将军的一条命！但它也造成张被终身软禁的悲剧。

打破半世纪沉默

1990 年 6 月，中国台北。

在幽禁了 54 个春秋之后，张学良首次在自己的生日宴会上抛头露面。来自诸多国家的新闻记者蜂涌而上，争先恐后地欲对其进行采访，但结果却出人意料。张学良将军从“我的一生被日本断送了，我不希望日本的年轻人再犯过去的错误”这一强烈的愿望出发，单独接受了 NHK（日本广播协会）的要求。

8 日，台北市凯悦饭店。日本 NHK 电视台记者在台湾作家高阳先生的协助下，于 3 天内对张学良进行了长达十个小时的采访。

张学良以惊人的记忆力和未改的口音激昂地谈到了“皇姑屯事件”、

“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重要转折点的真相，NHK电视台以《张学良现在开口讲话——通往中日战争的道路》为题，于12月9、10两日连续播放了采访实况。张学良的清晰描述，使人犹如目睹，真可谓往事历历又重现！播放时还穿插了许多历史镜头和旁白。

张学良此举在国际范围引起了极大震动。通过权威媒介的报道和述评，使中华大地再度掀起了“张学良热”。台湾《中国时报》和《联合报》分别刊登了自己东京特派员的专电，报道了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记者采访的谈话内容，《联合报》称之为“打破半世纪沉默，为历史证言。”

对此举反映最强烈的是张学良的老家——东北沈阳。

中新社记者报道说，在张学良的出生地张家窝堡，当年他出生的那处草房早被砖房所代替。县政府拨款，拆了红砖房，按当年草房原貌，重建了这处草房。建成后将作为“张学良出生地纪念馆”供人参观。

现在这里的主人是张学良60岁开外的堂表孙赵绪海。他告诉记者，他奶奶在世时说，张学良小时很淘气，那时家里有一个大算盘，张学良每天早晨起来，总要坐在算盘上，让人在炕上推几圈玩，不然就又哭又闹。现在，那个老算盘还保存着。

赵绪海还领着记者看了当年张学良睡觉用的小摇篮、吃饭用的小八仙桌，还有当时的一口破箱子和半扇门板。

据说，这些旧物都将放到“张学良出生地纪念馆”，可以让人稍稍看到那个岁月的一点痕迹。

在草房后面的菜园里，有一株合围粗的老枣树，依然枝繁叶茂。赵绪海说，这个老枣树已经有二百多年了，现在还能结果子。当年，这株枣树一定给年幼的张学良凭添了不少情趣……屯子里许多人都问：“听说张学良要回来了么？”眼里满是期望。

在此以前，张学良曾与大陆有关人员有过书函来往。1990年2月，《辽宁日报》在头版位置刊登了张学良给辽宁大学历史系两位素昧平生的学者的亲笔信，一时在当地传为佳话。信是这样写的：

德良、毅二乡弟鉴：来书和寄来的《东北军史》、《张学良将军诗词注释》已收到了，谢谢。余老矣，怒目力不佳，不能多写，写字相当困难。请原谅。愿上帝祝福！张学良顿二月七日。

这两位学者是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德良、副教授周毅，同时他们还分别是张学良及东北军史研究会和张学良研究基金会的会长、副会长。1989年末，他们把研究会的概况和46万字著作《东北军史》寄给台湾张学良将军，不久意外的收到了张将军的亲笔复信，更增添了他们对东北军研究的热忱。目前，随着张学良回来探亲的沸扬之声，该研究会和两位学者备受中外关注，不时有来自台湾、日本、香港等地的学者或记者前往探访。

其实，与张学良有了联系的不只这两位教授。4月，浙江省青田阜山中学接到了辗转捎来的张学良为该校的题词。题字笔力遒劲，内容为“青田阜山中学六十五周年纪念，培育英才，九一老人张学良书”。4月8日，根据少帅题词制作的校牌，挂在了阜山中学校门口。

阜山中学创办人陈瑛，65年前是张学良的德语教师。陈后因患肺病告别张学良回故里青田定居养病。张学良为感谢老师教育之恩，送四万块银元给陈瑛养病并颐养天年。陈瑛从中拿一万元，创办了阜山村师范学校，此后该校易其名。

马年腊月24，阜山中学通过张学良的友人寄信张，请他给学校题词。羊年正月初五，张学良为该校题了词，题词辗转友人之手捎到青田。

1990年4月2日新华社电：

在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主席台，记者见杨虎城将军的长子杨拯民常委喜形于色。一追问才知道日前他接到一帧台湾来的“飞鸿”——少帅张学良先生给他捎来的亲笔题词。

“能给我们看看吗？”

“当然可以。”说着，他打开了公文包，取出一张复印件。只见精美的信笺上凸印着一个圆形的篆书“张”字。杨拯民说，这是张府的专用标志。题词很短：

拯民世弟
爱人如己

张学良敬书

杨拯民告诉我们，这帧题词是1990年12月31日张学良先生在台北的寓所内亲笔写就的，最近才托人带到他手中。去年张学良先生九十大寿时，杨拯民曾去电视寿，后来又写信去台，再次表示祝福之意，并请少帅给题个字。张学良的题词就是对此的回复。

杨拯民解释说：“‘爱人如己’四字虽然是少帅皈依宗教后的心境流露，但也是他高风亮节、善良为人的真实写照，更是他企望泯灭仇怨、天下大同的古道热肠。”

西安事变前，杨拯民由陕西去到北平。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南京，当即被幽禁起来。从此杨拯民就失去了与这位世叔的联系。

杨拯民随身的笔记本上，曾工工整整地抄录了张学良新近的一首诗：“白发催年老，虚名误人深。主恩天高厚，世事如浮云。”他表示理解这位前辈曾经沧海之后淡泊人生、超然世外的心境。他说：“我是多么希望早日重逢与我父亲有过患难情谊的世叔啊！”

1991年初，张学良到美国进行私人访问，一时间，“张学良要取道美国回大陆”的议论充斥了整个大陆，这念头在人们心中急剧地膨胀起来。

3月24日，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姚广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如果张学良本人愿意回大陆看看，我们是非常欢迎的，我们将尊重他本人的意愿。

在美国逗留期间，张学良在纽约与吕正操见了面。吕正操曾作过张学良的部属。吕向少帅表示大陆人特别是东北家乡的人都热切地欢迎少帅早日回去看看。张学良豪迈地说：“要回去我自己会回去，不需要你们特别安排，也怕别人代我安排。”

“大陆当然会欢迎我，可正是这样的欢迎越发令我难以成行。”

难道张学良不想回老家看看吗？

早在1980年的10月10日，国民党当局曾安排张学良参加了庆祝活动。10月20日，张学良由当时的“副参谋总长”马安澜和“总统府副秘书长”张祖诒陪同，乘专机前往金门“参观”，张学良在金门古宁头以高倍望远镜眺望大陆。这一活动由官方的“中央社”和军方的“军闻社”作了报道。并配发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张学良眯起眼睛，把脸贴在高倍望远镜上，贪婪地观看海峡对岸的大陆家园。从那次回来后，他激动得连着几天睡不着觉，夜夜都在念叨大陆、家园和留在大陆的故旧亲朋们。

那么，张少帅到底何时才能回到他日夜思念的故乡以了夙愿？现摘录美国之音“新闻广角镜”节目记者对张学良的访谈，以飨读者：

问：少帅，自从发生西安事变以后，您的住所一直飘泊不定，这些年来您一直住在台湾，现在来到美国看家人，您觉得现在您的家究竟在哪啊？

答：我年轻时当然是家在东北，我飘荡不定，随遇而安，我还是想我自个的大陆故土，我还是怀念故土，自从“九·一八”后我就没回到东北老家去。

问：您既如此想家，这次您有没有打算就便的回东北去看看您的故土，看看老乡亲？

答：当然我是很愿意回到大陆，大陆方面也表示，我回去绝对给我一切的自由等等，但因政治时机尚未成熟，到了我是很愿去的，政府对我也没有限制，但对政治上仍有影响的事我不愿意，我是闲云野鹤，不愿再影响政治。

问：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什么政治变化下您会回去？目前时机成熟了吗？会在这月、下月、今年，或在您在美度假的期间？

答：假若两方敌对的问题完全没有了，我就可以回去。

问：也就是说这次度假完了您不会回中国大陆去了？

答：我想不会，我还是不去的好。

问：那您度完假就回台湾了？

答：到现在我仍要回台湾。

问：台湾经济进步，政治上也开明了许多，台湾称他们为自由中国；中国大陆行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您对海峡两岸的看法怎样？两岸都说要和平统一，你对此有何希望？

答：我个人衷心希望两岸双方能和平统一起来，我非常反对中国分裂，当年我有权势在手我就是赞成统一的，如中原大战种种事我都是如此，我很反对内战的，我非常希望和平统一，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第十六章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泽民提出八项主张，李登辉抛出六条。大势所趋，不信东风唤不回

第一节 第一次“汪辜会谈”圆满成功

良好的开端

1993年4月29日。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深受现场气氛感染的大陆记者李大宏、薛建华，曾用生动的文字，如实地记录下这感人的一幕。

上午10时40分，新加坡海皇大厦四楼签字厅里灯火通明。两岸授权民间团体的最高领导人汪道涵和辜振甫，郑重地在《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四份文件上签字，然后，缓缓地站起身，互换文本，握手致意。

两位古稀老人睿智而深邃的目光，相互凝视着。他们知道，两岸关系的历史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汪辜会谈”是因应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两岸关系发展的客观需要而实现的。

4月25日，汪道涵抵达新加坡樟宜机场，即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提出“两岸同胞应更具前瞻性地去面对未来，把握住国际发展的趋势所予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机遇，以宽阔的胸怀向前看，加强合作，携手努力，共同振兴中华。”

第二天下午，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抵达新加坡。从他在机场发表的谈话中，记者们发现，汪辜二人不仅赞美新加坡的话语不谋而合，而且讲话的主旨内容也何其相似乃尔。他说：“纵观世界潮流，‘对抗’已经为‘和解’所替代，而‘和解’也逐渐迈进‘互利互惠’的阶段。今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应该扬弃‘零和’的逻辑，秉持‘双赢’的理念，相互扶持。”

汪辜二人的看法，正是对当今国际形势和两岸关系发展必然趋势的反映。假如时间倒流回十年以前，有谁会料到紧张对峙的海峡两岸，会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平等协商呢？

在长达40多年的隔绝之后，海峡两岸能打破僵局，授权两个民间团体的最高领导人进行首次会谈，本身就是一大历史的进步，是两岸关系的一个良好的开端。

历史性的一步

两岸具有实际意义的直接接触、协商和谈判，或可说始于1985年5月的“两航（中国民航与台湾华航）谈判”。此后，随着两岸各种交流的日益扩大及由此衍生问题的不断增多，两岸间围绕具体、个别的事件或问题进行的接触、商谈也愈益频繁。特别是1991年台湾海基会和大陆海协相继成立以来，两机构之间为处理两岸的有关问题积极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这些就一时一地一事的随机性处理方式，很难适应两岸关系现实发展的需要。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有效的机制，两岸许多事务性问题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有鉴于此，海协倡议举行“汪辜会谈”，得到了海基会的积极响应。“汪辜会谈”的顺利实现，则为结束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会谈过程中，双方就两会会务、两岸经济交流和科技文化交流等三项议题，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在此基础上签署了四项协议。其中《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和《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两岸的文书使用和重要函件的寄达问题；而《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对于有效地保障两岸民间的各种往来与交流顺畅地发展，维护两岸人民的正当权益，则具有更加积极的意义。

《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建立两会制度化的联系与会谈方式。协议规定：“海协会会长与海基会董事长，视实际需要，经双方同意后，就两会会务进行会谈，地点及相关问题另行商定。海协常务副会长与海基会副董事长或两会秘书长，原则上每半年一次，在两岸轮流和商定之第三地，就两会会务进行会谈。两会副秘书长、处长、主任级人员，就主管之业务，每三个月在两岸择地会商。”双方并“指定副秘书长作为紧急事件之联络人，相互联系并采取适当措施”。此外，“双方同意因本协议所指定之事由，相互给予经商定之两会会务人员适当之人出境往来与查验通关之便利”。此间人士认为，两会不同层级人员这种定期的沟通、交流与合作，近期来说，有利于有效地解决两岸的现实问题；长远来说，则是两会与两岸之间的联系在未来走向制度化的里程碑。

正因为如此，汪、辜二人在签字仪式结束后分别举行的记者会上，不约而同地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汪道涵指出，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的确立，标志着两岸关系发展进入一个重要阶段；而辜振甫则认为，这是“历史性的一步”。

有益的启示

“谈则两利”。有人从“汪辜会谈”的成果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汪辜会谈”的成果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成果之外，从《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中可以看出，双方通过两个阶段预备性磋商和两天半的正式会谈，还解决了一系列两岸多年来都在设法寻求解决的问题。双方确定1993年年内

将就“违反有关规定进入对方地区人员的遣返及相关问题”等五项议题进行事务性协商；双方同意就加强能源、资源的开发与交流进行磋商；双方还同意积极促进青少年互访交流、两岸新闻界交流以及科技交流。引人注目的是，双方均认为应加强两岸经济交流，互补互利。这是40多年来两岸之间第一次写进双方协议之中的内容。汪道涵和辜振甫分别以“互利”和“双赢”来评介这次会谈所取得的这些成果。它向世人表明，两岸之间完全可以在政治原则、立场和目标取向差距甚大的情况下，通过坦诚、务实的接触与协商，找到双方利益的共同点。

不能否认，对于同一个问题，不同层次商谈所取得的效果有时是不一样的。譬如，在起草共同协议时，双方会就名称问题一度争执不下，但汪、辜二人一见面，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看来层次越高，解决问题就越顺利；授权越大，解决的问题就越多。此言一点也不过分。

同时还要看到，两岸隔绝了这么多年，双方的情况有许多差别。因此，对于一些问题的解决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不能期望一两次商谈就能解决两岸所有的问题。正是有了这样认知，当双方在海基会提出的台商在大陆投资的保护问题和海协提出的开放大陆工商界人士访台的问题上发生分歧时，双方本着实事求是、求同存异的精神，最终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把双方“应加强两岸经济交流，互补互利”的共识写入共同协议，而对分歧的部分，双方决定以后再“择时择地继续进行商谈”。可以相信，通过这次充分地交换意见，双方加深了了解，是有利于将来解决这一分歧的。这种做法，无疑为今后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以及各种形式的商谈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这次会谈的重大成果之一。

共同的心愿

“汪辜会谈”顺应了时代潮流，也反映了两岸同胞以及海外华人华侨的共同愿望。海内外媒体的200多位记者云集新加坡采访，“汪辜会谈”一时成为世界各地华人华侨的热门话题。美华协助社社长王 更指出，如果两岸继续会谈下去，不断消除歧见，中国的统一就很有希望，这是我们海外华人期望已久的结果。

与此相反，台湾民进党反对会谈的所谓“宣达团”在新加坡受到冷遇，他们所召开的记者招待会，台下的记者还没有台上的民进党人多，处于无人理会的尴尬境地。这从反面说明，分裂企图不得人心。唯有加强两岸交流与交往，才符合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才会得到两岸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的欢迎。“汪辜会谈”期间还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趣闻：

为祝贺会谈成功，汪道涵会长夫妇在新加坡董宫酒楼宴请辜振甫夫妇及台湾海基会一行。这家酒楼中餐部经理为宴会设计的菜单，每一道菜都有别具心裁的“菜名”：

情同手足、琵琶琴瑟、喜庆团圆、万寿无疆、三元齐集、兄弟之谊、夜语华常、龙族一派、前程似锦

这是真诚的期待。其所期待的，是两岸关系更上一层楼。这是美好的祝愿。其所祝愿的，是中华民族拥有一个辉煌灿烂的明天。

第二节 “江八条”受到广泛欢迎

实现国家统一大业的重要宣示

1995年，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进一步阐释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思想精髓，在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立场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关于发展两岸关系的新建议。讲话全文如下：

同志们，朋友们：

全国各族人民刚刚欢度了1995年元旦，又迎来了乙亥年春节。在这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来临之际，在京的台湾同胞和有关人士欢聚一堂，共话两岸关系前景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借此机会，我谨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2100万台湾同胞祝贺新年，祝愿台湾同胞新春快乐，万事如意！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百年前，1895年4月1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战争的手段逼迫腐败的清朝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强行攫取了台湾与澎湖列岛，使台湾人民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生活了半个世纪之久。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屈辱的一页。50年前，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一道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1945年10月25日，台湾与澎湖列岛重归中国版图，台湾同胞从此摆脱了殖民统治的枷锁。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49年以后，台湾又与祖国大陆处于分离状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促进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仍然是所有中国人的神圣使命和崇高目标。

1979年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以来，我们制定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一系列对台政策。邓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伟大构想的创造者。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实事求是，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论断和思想，确立了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指导方针。

邓小平同志指出，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凡是中华民族的子孙，都希望中国统一，分裂是违背民族意志的。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能允许有什么“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坚决反对“台湾独立”。解决台湾问题无非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的方式，一种是非和平的方式。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外国干涉。我们坚持用和平的方式，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同时我们不能承诺根本不使用武力，如果承诺了这一点，只能使和平统一成为不可能，只能导致最终用武力解决问题。统一以后实行“一国两制”，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台湾保持原有的制度。“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统一后，台湾的社会

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同外国的民间关系不变，包括外国在台湾的投资及民间交往不变。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有高度的自治权，拥有立法权和司法权（包括终审权），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党、政、军等系统都由自己管理。中央政府不派军队、行政人员驻台，而且在中央政府里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

十几年来，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指引下，经过海峡两岸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努力，两岸人员往来以及科技、文化、学术、体育等各领域的交流蓬勃发展。两岸经济相互促进、互补互利的局面正初步形成。早日实现两岸直接“三通”，不仅是广大台胞、特别是台湾工商业者的强烈呼声，而且成为台湾未来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两岸事务性商谈已取得进展，“汪辜会谈”标志着两岸关系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

但是，值得所有中国人警惕的是，近年来台湾岛内分离倾向有所发展，“台独”活动趋于猖獗。某些外国势力进一步插手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这些活动不仅阻碍着中国和平统一的进程，而且威胁着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

当前国际形势仍然复杂多变，但总的趋势是走向缓和。世界各国都在制定面向未来的经济战略，把增强综合国力作为首要任务，以求在下一世纪到来时能在世界上占有自己的位置。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海峡两岸的经济都在向前发展。1997年、1999年，我国将相继恢复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这将是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的一件大喜事。中华民族历尽沧桑，饱经磨难，现在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全国振兴的时候了。这对台湾是个机会，对整个中华民族也是个机会。在这里，我愿就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若干重要问题提出如下看法和主张。

（一）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决不容许分割。任何制造“台湾独立”的言论和行动，都应坚决反对；主张“分裂分治”、“阶段性两个中国”等等，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也应坚决反对。

（二）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不持异议。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并依据有关国际组织的章程，台湾已经以“中国台北”名义参加亚洲开发银行、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等经济性国际组织。但是，我们反对台湾以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为目的的所谓“扩大国际生存空间”的活动。一切爱国的台湾同胞和有识之士都会认识到，进行这类活动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台独”势力更加肆无忌惮地破坏和平统一的进程。只有实现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才能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真正充分地共享伟大祖国在国际上的尊严与荣誉。

（三）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是我们的一贯主张。在和平统一谈判的过程中，可以吸收两岸各党派、团体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我在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在一个中国的前提

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包括就两岸正式谈判的方式同台湾方面进行讨论，找到双方都认为合适的办法。”我们所说的“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当然也包括台湾当局关心的各种问题。我们曾经多次建议双方就“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逐步实现和平统一”进行谈判。在此，我再次郑重建议举行这项谈判，并且提议，作为第一步，双方可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在此基础上，共同承担义务，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对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进行规划。至于政治谈判的名义、地点、方式等问题，只要早日进行平等协商，总可找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

（四）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的图谋的。我们完全相信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理解我们的这一原则立场。

（五）面向二十一世纪经济的发展，要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以利于两岸经济共同繁荣，造福整个中华民族。我们主张不以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两岸经济合作。我们将继续长期执行鼓励台商投资的政策，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将切实维护台商的一切正当权益。要继续加强两岸同胞的相互往来和交流，增进了解和互信。两岸直接通邮、通航、通商，是两岸经济发展和各方面交往的客观需要，也是两岸同胞利益之所在，完全应当采取实际步骤加速实现直接“三通”。要促进两岸事务性商谈。我们赞成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商谈并且签订保护台商投资权益的民间性协议。

（六）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

（七）2100万台湾同胞，不论是台湾省籍还是其他省籍，都是中国人，都是骨肉同胞、手足兄弟。要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做主的愿望，保护台湾同胞一切正当权益。我们党和政府各有关部门，包括驻外机构，要加强与台湾同胞的联系，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关心、照顾他们的利益，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我们希望台湾岛内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富裕；也希望台湾各党派以理性、前瞻和建设性的态度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我们欢迎台湾各党派、各界人士，同我们交换有关两岸关系与和平统一的意见，也欢迎他们前来参观、访问。凡是为中国统一作出贡献的各方面人士，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的功绩。（八）我们欢迎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以适当身份前来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可以共商国是，也可以先就某些问题交换意见，就是相互走走看看，也是有益的，中国人的事我们自己办，不需要借助任何国际场合。海峡咫尺，殷殷相望，总要有来有往，不能“老死不相往来”。

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为促进两岸关系、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振兴，作出了许多努力，功不可没。我们希望广大港澳同胞、海外侨胞进一步为发展两岸关系、统一祖国和振兴中华作出新的贡献。

早日完成祖国统一，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无限期地拖延统一，是所有爱国同胞不愿意看到的。中华民族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我们呼吁所有中国人团结起来，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全力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中华民族现代发展进程中这光辉灿烂的一天，一定会到来。

香港各界反响热烈

香港社会各界 10 多位人士，元月 31 日接受记者采访就江泽民关于推动祖国统一大业重要讲话发表看法，认为“八项主张”切实可行，台湾当局应该把握时机，接受务实灵活的倡议，为祖国统一迈出积极的一步。

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宪梓表示，江泽民主席的讲话全面、具体地阐述了对台政策，其中许多建议对探讨统一问题都有实质帮助。祖国大陆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两岸民间交往日渐频繁，出现了许多有利统一的因素，加速发展两岸关系已到了适当时机。全国政协常委徐四民表示，江泽民主席在甲戌年除夕就促进祖国统一发表的重要讲话，对两岸人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消息。江泽民的讲话内容实在具体，其主张符合两岸实际，是可行的。

港事顾问蔡伟石、王绍尔，区事顾问萧炎坤、高继标等认为，江泽民主席的讲话以务实诚恳的态度提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主张，具有很大意义。蔡伟石还表示，希望台湾方面权衡利害，在加强与祖国大陆经济、文化合作上能更开放一些。

港岛东区议员王国兴说，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台湾当局宜把握时机，为祖国统一迈出积极一步。

另外，包括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陆达权、立法局议员倪少杰以及新界社团联合会理事长梁煜林等认为，江泽民提出的祖国统一八点主张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他们认为，尽管海峡两岸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上仍存在一定差异，但以“一国两制”的模式实现两岸和平统一是可行的，台湾当局应认真考虑江泽民所提务实、灵活的建议，并做出积极的回应。

另据中新社报道，香港舆论对江泽民日前发表的《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谈看法体会，认为江泽民这篇讲话是积极而务实的，体现了前瞻的观点和充分的诚意，并呼吁台湾当局应以同样前瞻和务实的态度，把握机会，就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做出积极的回应，共同开创两岸关系的新局面。

《文汇报》发表题为《江泽民提出促进两岸关系重要主张》的社论。社

论说，江泽民在农历新年到来之际，向 2100 万台湾同胞拜年，并提出八项看法与主张，再次阐述了对发展两岸关系，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原则与具体措施有助于台湾当局与民众了解中国大陆方面的政策，消除某些疑虑，是两岸关系发展中的大事，对两岸关系和祖国统一大业具有强大的推动力。

《大公报》发表社论指出，江泽民在讲话中谈到“现在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全面振兴的时候了。这对台湾是个机会，对整个中华民族也是个机会。”江泽民所提出纲领性的八点看法和主张，作为全国努力推动和平统一进程的政策性指针，也是对台湾当局和台湾各界同胞的恳切呼吁。社论强调，台湾面对着机会，江泽民的讲话就提供了机会，两岸领导人如能彼此接触，就国是问题谈一谈，不可能有什么坏处。台湾当局如果能够把握这个机会，将可以突破本身的种种困局，这不但有利于加强两岸的祥和气氛，而且将可以首先为台湾展开一个新的局面。

社论称赞这篇讲话的发表是十分及时的，而且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香港《快报》要闻版在报道江泽民重要讲话主要内容的同时，发表了评论。评论指出“八项主张”是祖国大陆继《告台湾同胞书》、叶剑英提出的《九点和平统一方案》、邓小平构想的“一国两制”之后的重要姿态。八项主张中，第三项有关就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谈判、第八项有关高层会晤的主张极具新意。

《天天日报》、《东方日报》也分别在重要新闻版或中华两岸版中详细报道了江泽民的重要讲话。

《香港联合报》刊登的署名文章说，江泽民的讲话体现出对两岸统一的急迫感，也清楚表明大陆对台政策的弹性。文章认为，江泽民讲话中提及“我们欢迎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以适当身份前来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这项主张有深意，有助于促成两岸领导人互访。文章批评台湾当局在两岸统一问题上立场僵硬，采取“拖”的办法，其做法不利两岸关系出现重大突破。

澳报称江泽民“八项主张”大有新意

春节假期后出版的首期《澳门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江泽民“八项主张”公忠为国》的署名文章。文章说，江泽民的八项主张，贯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精神，全篇充满一个“诚”字，可以说披肝沥胆，公忠为国，情见乎词，跃然纸上。

文章认为“八项主张”大有新意，主要有：

一、两岸能否和解，关键在于能否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中共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完全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插手台湾问题的部署。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承诺放弃武力同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政策不仅没有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的。

二、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江泽民表示欢迎台湾当局领导人前来，他愿意接受台湾当局的邀请赴台。希望彼此都向前看，捐弃前嫌，不算旧帐。失去的是国共之间的“意气”，得到的是共同振兴中华。

三、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同胞。中共欢迎台湾各党派、各界人士前来共商国是，一起交换有关两岸关系与和平统一的意见。文章最后说，台湾的前途在于统一，台湾同胞的福祉在于回归祖国，舍此别无选择。“三十六计，和为上计”，盼台湾国民党当局、李登辉先生三思。

《华侨报》4日也在一篇题为《北京等待台湾善意的回应》的文章中说，江泽民提出的八条，无论对台湾还是大陆都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这是北京在新形势下就两岸关系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提出的主张，希望台湾有一个善意和良性的回应。联手统一和复兴祖国大业，共同缔造中华民族兴旺富强的明天。

文章认为，对台湾来说，“江八条”，也是个历史的机遇。尽管一个中国的原则，双方想法不尽相同，但其它七点当中有不少是台湾方面喜闻乐见的。如重申两岸和平统一谈判、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作主的愿望等。至于明确表示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立场以及“欢迎台湾当局领导人以适当身份前来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的建议，也应说是建设性的。

东南亚报纸纷表称赞

东南亚报纸也纷纷发表社论或评论，称赞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北京发表的促进国家统一的讲话，为海峡两岸关系出现新的突破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基础。

新加坡《联合早报》在《北京对台政策出现重大突破》的社论中说，江泽民提出的两岸统一大业八项看法和主张，虽然是大陆对台政策的坚持和继续，但其新意和突破却极其明显。这八项看法和主张确实为化解海峡两岸关系僵局，使双方关系出现新的突破，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基础。社论认为，台湾当局若能予以高度重视，并做出正面的、积极的回应，则海峡两岸恢复良性互动关系，甚至正式开始和平统一谈判，是可以期待之事。

菲律宾《世界日报》评论称，江泽民在这篇题为《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中，不仅向台湾同胞拜年，而且讲话以台湾问题为核心，即谈到现阶段两岸关系的发展，也就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提出八项重要看法与主张。评论指出，综观江泽民的整篇讲话，有的放矢，合情合理，可以说是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建议书。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又一次具体建议，台湾当局如何对此作出反应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社论认为，江泽民提出推动中国和平统一的八点主张，建议两岸领导人互访而不需要借助任何国际场合，这将有助于两岸关

系朝积极方向发展。

《欧洲时报》高度评价

巴黎出版的华文报纸《欧洲时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高度评价江泽民主席在关于国家和平统一问题的讲话中提出的八点建议。文章指出，这些建议既表现了极大的诚意，又切合实际，“如能实现，当是中国人民之福。”

这篇题为《两岸高层互访是诚恳实际的建议》的文章说，江泽民主席表示愿意访问台湾，“共商国是，亲自推进两岸关系的发展，加强交流和合作，作为国家领导人，这是大胆的也是诚恳的作为。悠悠万事，统一为大，以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依归，此议高屋建瓴，又切合实际，果能实现，当是中国人民之福。”

《欧洲时报》的文章指出：“中国统一是中国人的事，与任何别的国家无涉，如果坚持要在国际场合才能见面，于情于理都过于牵强。”

文章说，江泽民主席的讲话，对打破目前两岸政治僵局，对促进两岸的交流合作，对开拓两岸的经济及各领域的关系将发挥积极而有力的作用。近年来台湾的台独势力日益猖獗，台湾当局的态度又十分暧昧，曾使两岸关系一度冷却。江泽民主席提出的八项主张给关心中国统一的人们燃起了新的希望。

文章最后强调，早日实现中国统一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愿望。文章希望台湾当局、各党派和各团体的热心人士作出回应，付诸行动，首先实现第一步，即摒弃两岸敌对意识，结束两岸敌对状态，为统一大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三节 李登辉抛出“六条”

在“国统会”发表讲话

1995年4月8日，李登辉以“总统”兼“国家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身份，主持“国统会”改组后的第一次会议，并在会议讨论议程后发表谈话。李登辉讲话摘要如下：

不容讳言，两岸分离对峙40余年，累积的敌意与误解自难立即消弭。然而，面对新的情势，两岸都必须以新的体认，采取务实的作为，促成真正的和谐，才能塑造中国再统一的有利气候与形势。因此，针对现阶段的情势，为建立两岸正常关系，我们提出以下的主张：

一、在两岸分治的现实上追求中国统一

民国38年以来，台湾与大陆分别由两个互不隶属的政治实体治理，形成了海峡两岸分裂分治的局面，也才有国家统一的问题。因此，要解决统一问题，就不能不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在两岸分治的现实上探寻国家统一的可行方式。只有客观对待这个现实，两岸才能对于“一个中国”的意涵，尽快获得较多共识。

二、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加强两岸交流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骄傲和精神支柱。我们历来以维护及发扬固有文化为职志，也主张以文化作为两岸交流的基础，提升共存共荣的民族情感，培养相互珍惜的兄弟情怀。在浩瀚的文化领域里，两岸应加强各项交流的广度与深度，并进一步推动资讯、学术、科技、体育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三、增进两岸经贸往来，发展互利互补关系

面对全球致力发展经济的潮流，中国人必须互补互利，分享经验。台湾的经济发展要把大陆列为腹地，而大陆的经济则应以台湾作为借鉴。我们愿意提供技术与经验，协助改善大陆农业，造福广大农民；同时也要以既有的投资与贸易为基础，继续协助大陆繁荣经济，提升生活水准。至于两岸商务与航运往来，由于涉及的问题相当复杂，有关部门必须多方探讨，预作规划。在时机与条件成熟时，两岸人士并可就此进行沟通，以便透彻了解问题和交换意见。

四、两岸平等参与国际组织，双方领导人借此自然见面

本人曾经多次表示，两岸领导人在国际场合自然见面，可以缓和两岸的政治对立，营造和谐的交往气氛。目前，两岸共同参与若干重要的国际经济及体育组织，双方领导人若能借出席会议之便自然见面，必然有助于化解两岸的敌意，培养彼此的互信，为未来的共商合作奠定基础。我们相信，两岸平等参与国际组织的情形愈多，愈有利于双方关系发展及和平统一进程，并

且可以向世人展现两岸中国人不受政治分歧影响，仍能携手共为国际社会奉献的气度，创造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新时代。

五、两岸均应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

炎黄子孙须先互示真诚，不再骨肉相残。我们不愿看到中国人再受内战之苦，希望化干戈为玉帛。因此，于民国 80 年宣布终止动员戡乱，确认两岸分治的事实，不再对大陆使用武力。遗憾的是，四年来，中共当局一直未能宣布放弃对台澎金马使用武力，致使敌对状态持续至今。我们认为，大陆当局应表现善意，声明放弃对台澎金马使用武力，不再做出任何引人疑虑的军事行动，从而为两岸正式谈判结束敌对状态奠定基础。本人必须强调，以所谓“台独势力”或“外国干预”作为拒不承诺放弃对台用武的理由，是对中华民国立国精神与政策的漠视和歪曲，只会加深两岸猜忌，阻挠互信。两岸正式谈判结束敌对状态的成熟度，需要双方共同用真心诚意来培养酝酿。目前，我们将由政府有关部门，针对结束敌对状态的相关议题进行研究规划，当中共正式宣布放弃对台澎金马使用武力后，即在最适当的时机，就双方如何举行结束敌对状态的谈判，进行预备性协商。

六、两岸共同维护港澳繁荣，促进港澳民主

香港和澳门是中国固有领土，港澳居民是我们的骨肉兄弟，1997 年后的香港和 1999 年后的澳门情势，是我们密切关心的问题。中华民国政府一再声明，将继续维持与港澳的正常连系，进一步参与港澳事务，积极服务港澳同胞。维持经济的繁荣与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是港澳居民的愿望，也受到海外华人和世界各国的关注，更是海峡两岸无可旁贷的责任。我们希望大陆当局积极响应港澳居民的要求，集合两岸之力，与港澳人士共同规划维护港澳繁荣与安定。

台湾舆论褒贬不一

李登辉发表有关两岸关系的六项“政策宣示”后，台湾舆论及各党各界迅速作出反应。4 月 9 日，台湾各主要报纸都全文刊登了李登辉的讲话并发表了社论。社会各界人士也都透过各种新闻媒体表达了看法、意见、解读和评论。总的来看，绝大多数台报对李登辉六项主张加以吹捧，认为是对江泽民主席八项主张的“善意回应”，对发展两岸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也有部分舆论指出，李登辉讲话“了无新意”、“未有突破性宣示”，有些提法和做法“不务实”或“不切实际”。

《中央日报》在社论《面对现实，才能促进两岸关系正常化》中说：“李总统这篇讲话是继政府公布国家统一纲领及台湾两岸关系说明书后，又一篇指导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文件，也是一篇促进台海两岸关系正常化的文件，自必受到台海两岸中国人适度的重视。”社论在逐条阐明李讲话的六个要点之后说：“总括地说，李总统的这项谈话，明白地表达了我们严正而坚定的

立场，也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兼顾了现实，而为两岸关系的促进，创造了比以往更明显而良好的气氛。”

《中国时报》在社论中说：“李总统就当前大陆政策发表重要讲话，重申基本立场并提出六点具体作法，一方面既在提供未来大陆工作的原则根据，一方面也在回应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就对台政策提出的八点看法和主张。李总统这篇讲话，对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应有重要意义。”“李总统在讲话中，为维护台湾 2100 万人的安全、福祉与权益，表达了明确的立场，并且在态度及作法上，也显示了务实的思考与善意的回应。”“李总统对中华民国国家主权的坚持，是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表现。今天中华民国在台湾决无以牺牲主权原则来换取妥协之理。”“李总统对大陆政策的宣示，反映了中华民国政府与人民的基本共识，也掌握了开展两岸关系的重要环节，对维护两岸和平共荣与开拓民族之光明前途用心深长。”社论在最后说：“我们在表示认同与支持的同时，也期待在政策决定之后能早日策定具体可行的方法与步骤，加以落实，使两岸关系由此迈向新境，达成预期的绩效。”

《台湾新生报》在解析李登辉讲话的社论中认为，李登辉讲话“是继江泽民除夕谈话之后，两岸领导人首度隔海对话”，“不但极受海内外重视，同时也将会对今后两岸的互动具有实质的影响”。社论说：“综观李总统讲话，在全文 3000 字之中，完全是以民族大义、国家统一、全体中国人的福祉为重，所提主张，充满了务实、期待、善意和诚意”。

与其他各报调子不同而又具有一定深度的评论，是《联合报》一篇题为《将两岸对话直接诉诸全体中国人的支持！》的社论，社论首先认为：“国统会已停开两年四个月，这次开会，也是形式胜于实质；国统纲领更已与现实脱节，形同其文，现在却决定‘文字和内容也无修改必要’，可见近几年推动的大陆政策已经搁浅触礁。”社论尖锐地提出：当前大陆政策面临的境况正是：形势逼人！何去何从？评论认为，李登辉讲话“措辞相当友善，却似未有突破性的宣示”，而其“关键仍在中共未能承认我方的‘主权与治权’的事实”。文章就“如何破解此一僵局”提出了两点意见：一是“降低议题层次”，认为台湾当局“一直以争取对等地位为主要目标”，但把“对等地位争议”提升到两岸“互相承认国号”和所谓的“元首外交”层次，“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必然制造僵局”。“我们怎能冀望中共能在这个层次有所退让？”应当“暂时从这类最高层次的尖锐问题上转移开来”，而不应把“国号及元首层次的对等问题视为一切大陆政策的‘前提’，这才是‘务实’的大陆政策！”二是“改变折冲战场”，认为“应当将两岸折冲的主战场回归于两岸之间，而不宜迷信在国际上公开交火的效用”。评论说：“大张旗鼓地参与联合国与元首外交，恐怕均是声势上的效果大于实质意义，甚至是利在一时，祸在未来。”文章批评台湾当局近几年“不惜在国际外交战线进行激烈的政治交火，而在两岸协商会面的场合，均亟力避免谈论所谓政治性议题，只顾在技术问题上打转”，“这是舍本逐末，舍近求远，舍易图难，

甚至是舍民族而求国际的作法”。社论最后说：“当然，以台湾形势的凶险，我们有必要寻求外国友人的援手，但更应勇敢地将两岸的对话直接拆诸全体中国人的公评与支持！具体作法即是两岸对话向政治议题发展。”综观《联合报》社论的主调，似与李登辉讲话主旨相悖。

朝野各党和社会各界人士对李登辉讲话评价不一。共同点是都强调了两个重点，一是承认“分裂分治的事实”，二是呼吁我承诺对台不使用武力。国民党人士多赞扬李讲话，而民进党则认为“并无新意”，质疑李讲话能否为两岸关系带来新出路。从“台独”立场出发，民进党秘书长苏贞昌还攻击李登辉“在全体人民对国家定位尚未形成一致共识前，一再以统一为前提提出两岸政策主张”。新党领导人王建煊则认为李登辉谈话与“江八点”是“各说各话”，而“李六点”又“了无新意”，“乍看之下似乎对解决两岸问题有关系，实质上并无助益”。

港报认为未能为两岸关系开创新局

香港《天天日报》4月9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李江论点，泾渭分明》，全文如下：

李登辉昨天在“国家统一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讲话，阐释台湾对两岸关系发展的期望，并作为对江泽民春节前的讲话作出正式回应。

江泽民在讲话中曾说：海峡咫尺，殷殷相望，总要有来有往，不能“老死不相往来”。李登辉回应曰：提升民族情感，珍惜兄弟情怀。两人对两岸的不可分割之骨肉情，充分肯定，这对于“一个中国”的认同，对于抗拒“台湾独立”，感情上是共通的。

李登辉的“李六点”，第一、三、五点涉及当前的政治情势和两岸的政治观点；第二、三点是文化、经贸问题；第六点则有点特别，是台湾首次正式期望介入港澳主权的回归，“集合两岸力量，与港澳人士共同规划如何维护港澳繁荣与安定。”

港澳问题，回归有期，过渡期内百般事情是否顺利，端赖英国、葡国是否有善意的合作，但无论如何，大陆的工作早已顺利展开，保持“繁荣稳定”是主权回归后的终极目标。台湾对港澳问题，作为一种期望，当然很好，但台湾能够承担什么“无可旁贷的责任”，就很难设想了！

衡量“李六点”和“江八条”，我们认为，可从两方面看：第一，关于第二、三、点的两岸交往，包括文化体育、学术科技、经济贸易方面，两岸的共识性高，具有共同意愿加强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但在交流的进程中如何推向最高境界的“三通”，李登辉仍然抱持谨慎的态度，谈之涉及问题相当复杂，主张宜缓勿急，这也就是台湾先前一再担心的“安全问题”。不过，由于共识存在，也由于两岸在客观上有加强文体科技交流和推动经贸的需

要，两岸直接“三通”也不是可以长此拖下去的！

第二，在政治领域内，“李六点”的态度相当鲜明，也可说是综合了前此表达过的论点，首先是要求大陆承认分裂分治，台湾是一个政治实体；其次是两岸平等参与国际组织，台湾要超越目前只参加国际经济和体育组织的范畴；再其次是要求大陆正式宣布放弃对台澎金马使用武力，方可筹划结束敌对状态的谈判。上述三方面的回应，是台湾寻求政治定位和对大陆关系的政策性取向，基本上与“江八条”是泾渭分明的。

总之，台湾认为直接“三通”时机未成熟；两岸负责人见面只宜在国际性场合；至于政治性谈判也被认为为时尚早，需有前提。准此以观，大门虽开着，条件未配合，“李六条”未能为两岸关系开创新局！

香港《联合报》4月9日刊登一篇特稿，题为《李六点江八点各弹其调》，全文如下：

两岸意图绕开事务性协商与民间交流，直攻高层政治谈判，搏取对方让步。经过双方领导人表态后，“李六点”与“江八点”虽然丰富了民间交流的变奏，但显然未能响起共舞的主旋律。

双方这番高来高去的对话，政治上各自坚持，无异互向对方就两岸关系的核心主张提出否决。台湾坚持的“分裂分治”、“中共先宣布放弃武力犯台”、“两岸领导人在国际场合自然见面”，大陆方面一概拒绝；台湾也不接受大陆方面所提高层领导人非对等政府的互访邀请，及缺乏放弃武力犯台前提的结束敌对谈判。仅余“一个中国”及“炎黄子孙不再骨肉相残”涵意不清、限制重重的模糊交集。

一轮的互相否决，发挥创造力解决两岸交往政治困局的空间，遭大面积锁死，以两岸最高领导人之尊表态后，再期待任何一方短期间改变立场妥协让步，冒朝令夕改，不见容于两岸政治现实的风险，自不可能。也导致两岸之间，除非出现极为戏剧性转机，两岸政治关系在相当长时间内不易有重要突破，仍将局限于事务性协商，及朝野政治人物游走两岸传话的层次。

大陆方面对这次交手的内部评估，如何透过两岸千丝万缕关系呈现下一步意向，和缓或强硬派主张之间的消长，值得注意。而双方幕僚的言论也有惹人玩味之处，包括大陆传话的所谓“一个中国意涵可暂时不提”；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正式直称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附加“ ”号，再度建议两岸以经济体领导人名义晤面，国统纲领可弹性解释等，勉强在层峰之下留存一点进退空间。

跳脱离开政治局面，两岸表态后，民间往来的交集则广阔得多。台面上现存的议题就有：双方共同肯定中华传统文化，李登辉总统明确主张加强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江泽民建议商谈并且签订保护台商投资权益的民间性协议，不以政治分歧干扰两岸经济合作；李登辉提议协助改善大陆农业，预作规划两岸商务与航运往来并在时机与条件成熟时和大陆商谈等。以目前两

岸事务往来之繁复，两会就劫机犯遣返等几项议题拉锯不休。要消化两岸领导人这次提出的民间事务性建议，恐怕要好一些日子。

两岸民间往来不断，政治寸步难行，有它现实的基础，两岸之间，任何缺乏基础的冒进，急于一时，未必有利于未来。

日通讯社说缺乏新意

时事社4月8日播发该社当天发自台北的一条消息，题为《李登辉讲话缺乏新意可能影响总统竞选》，摘要如下：

台湾的李登辉总统8日就中台两岸关系正常化问题发表的讲话，尽管事前大造舆论，内容上却缺乏新意。

李登辉谈话虽然就结束敌对状态问题同意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提出的建议，为形成信赖关系海峡两岸进行磋商的可能性已进一步增加，但是讲话却说这是以宣布“不使用一切武力”为前提条件的。然而，中国对台湾独立的动向想要保留军事选择权，因而李登辉讲话提出的前提条件是中国所难以接受的前提条件。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其建议中曾说，两岸领导人可以互访，但不同意在国际舞台上举行会谈。对此，李总统的讲话同台湾的一贯主张没有任何变化，仍坚持在国际会议场合举行自然而然的会谈。

据台湾人士说，台湾方面原本已经研究了更深入的建议，但是由于中国方面在不久前李总统的出访活动中阻挠其访问以色列，因此台湾方面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结果只停留在原来的立场上。

李总统讲话所以从整体上看缺乏新意，是因为台湾认为当前要认清中国领导机构权力的发展趋势。还有，李登辉总统本身在明年春暖花开时节也将面对总统竞选，所以他认为不要背上在大陆问题上被反对派安上钉子这样一个大包袱。

同日该社还播发了从台北发回的一篇报道，题为《台湾总统对中国主席的建议作出回答，要求中国宣布放弃一切军事行动》，摘要如下：

在1月底的春节前夕，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提出了呼吁两岸结束敌对状态，领导人进行互访的八项建议。台湾的李登辉总统8日举行咨询机关“国家统一委员会”会议，发表了相当于正式回答的具有六项内容的讲话。

李总统在讲话中指出中国方面还没有宣布结束战争状态，接着要求中国宣布放弃一切军事行动。李总统还重申，两岸领导人的会谈应在双方以平等地位参加的国际会议期间以“自然的形式”进行。

关于两岸领导人会谈的问题，李总统说：“应在国际会议场合自然会晤，

这也将会消除两岸的敌意。”这番话对中国方面出面阻挠李总统等台湾首脑参加国际会议表示了不快。然而另一方面，李总统的讲话强调要积极响应两岸的经济交流，从而对中国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作出贡献。

共同社于4月8日播发该社驻京记者 越当天发回的一篇报道，题为《中国就台湾总统演说表示放弃武力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很小》，摘要如下：

台湾总统李登辉的演说就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不久前提出的结束两岸敌对状态建议，附加了一个新的条件，即首先宣布对台湾不诉诸武力。中国过去始终没有放弃武力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因此轻而易举地接受李建议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就中国不放弃武力解放台湾的理由而言，在江泽民主席的建议中解释说：“是为了对付外国势力的干涉和台湾独立的阴谋。”中国方面的主张是说，只要这种危险性没有排除，中国方面就不能同意台湾方面的要求。

在中台领导人举行直接会谈问题上，李登辉演说强调要“利用国际会议的场合”，与江主席提出的中台领导人互访显而易见是大不相同的。

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7日意识到李登辉总统的演说刊登一篇评论，强调说“两岸应尽早开始举行政治谈判”。中国方面所期望的是要将台湾方面纳入中台政治会谈的轨道。

中国方面试图通过江主席的建议把台湾方面推上政治谈判的舞台，以便打开业已陷入僵局的祖国统一问题。但只要读一读李的演说便可以了解，事态似乎不可能迅速地发展。

第四节 第二次“汪辜会谈”被迫推迟

“海协会”致函“海基会”

1995年6月1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致函台湾海基会指出，“鉴于台湾方面近期采取的一系列破坏两岸关系的行动，使举行第二次汪辜会谈及其预备性磋商气氛受到严重影响，不得不予以推迟。”此事引起了海内外广泛的关注。

众所周知，海协与海基会在5月底举行了第二次汪辜会谈第一次预备性磋商，就会谈议题等有关事宜进行了讨论，并计划于6月27日至7月1日进行第二次预备性磋商，7月20日左右在北京举行汪辜正式会谈。现在，第二次汪辜会谈及其第二次预备性磋商被迫推迟，完全是由台湾方面一手造成的。

台湾方面没有诚意

1993年4月举行的第一次汪辜会谈，实现了海峡两岸40多年来高层人士以民间名义进行的首次公开接触，并建立了海协与海基会两个授权民间团体联系与协商的制度，标志着两岸关系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为加强两会联系与合作，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于1994年2月和6月两次致函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表达了愿再度会晤的真诚期望。一年多来，海协多次提出尽早举行第二次汪辜会谈，并主张这项会谈“可以设特定议题深入讨论，也可以不设议题，就双方关心的问题广泛交换意见”，以期达到“加深了解、培养互信”、“推动两岸经济等各项交流与合作”、“缓和、稳定并不断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的目的。应该说，海协从加强两岸沟通、扩大两岸沟通、扩大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出发，倡议和推动举行第二次汪辜会谈，其真诚愿望和善意是始终如一的。

然而，尽管大陆方面一再表示出诚意，两岸广大同胞也对举行第二次汪辜会谈以进一步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怀有热切期待，但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台湾方面对海协的倡议一直迟迟未予同意。究其原因，正如台湾舆论和各界有识之士指出的，台湾当局并不愿意举行汪辜会谈以促进两岸关系发展，于是玩弄所谓的“连环套”策略，即企图以逼迫大陆方面在“两岸海上渔事纠纷之处理”等三项事务性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作为举行第二次汪辜会谈的前提。为此，其总是以“时机不成熟”、“条件不具备”为由对举行第二次汪辜会谈加以推托。这一并不高明的“策略”，真实地反映了台湾当局阻碍两岸关系发展的用心，不仅为各界洞悉，而且一直遭到舆论的谴责。

在两岸同胞的强烈要求和推动下，台湾方面虽然在表面上不得不放弃“连环套策略”，同意举行第二次汪辜会谈，但实际上却仍然无此诚心。从情理

上说，举行两岸授权民间团体领导人会谈，是两岸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双方理应就此配合，并各自做好认真准备，包括为顺利举行正式会谈创造好的气氛与条件，以期达到推进两会联系与合作、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目的，这才是应有的合乎常理的态度，也是两岸同胞共同期待的。然而，就在大陆方面本着真挚诚意，积极着手为举行这次会谈进行各项准备的时候，台湾方面却异乎寻常地采取了一系列严重毒化会谈气氛、恶化两岸关系的行动。一方面，李登辉刻意挑起两岸政治冲突，以赴美进行所谓“私人访问”的形式，与美国反华势力相互利用，公然从事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活动，并在近期的讲话中恶毒攻击、谩骂大陆是“儿子”；另一方面，台湾当局并在5月底至6月初不到10天的时间里，连续举行了4次针对大陆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上述作为，显然并非偶然的巧合，而是经过精心策划安排的横逆，其目的，旨在蓄意制造两岸关系紧张，破坏第二次汪辜会谈顺利进行。正如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所指出，这次会谈不能按原计划举行，完全是由台湾方面一手造成的。说到底，台湾当局原本就没有举行这项会谈的诚意。

是谁干扰两会联系与合作？

台湾方面有一种说法，称第二次汪辜会谈被迫推迟，是大陆方面将两会联系与合作“政治化”的结果，云云。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为台湾当局的不光彩作为推御责任。

大陆方面一贯主张，政治分歧不应影响海协与海基会的联系与合作，不应影响两岸的各项交流。这一主张是在充分考虑到了两岸关系现状、两会动作的特殊背景与环境后提出的，其出发点，就是为了使两会作为授权民间团体的运作能够尽量地单纯化，避免使其受到两岸政治分歧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以利通过真正务实的协商合作，切实地解决涉及两岸同胞实际利益的具体问题，推动两岸交流顺畅进行，促进两岸关系不断发展。这一态度，是冷静务实、实事求是、合情合理的，在实践中取得了好的效果，得到了两岸广大同胞的赞同和支持。但是，在海协与海基会过去几年的协商过程中，台湾方面总是一再提出通过两会的事务性议题协议确立其“独立的管辖权”等不当要求，极欲达到其体现“两岸对等政治实体”的目的，致使两会协商复杂化，一再出现波折。海协方面多次指出，将政治性敏感问题引入两会联系与协商，使其复杂化、政治化，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有害的做法，不仅对商谈本身、对解决事务性问题、维护两岸同胞权益构成障碍，而且严重破坏两岸关系气氛，极大损害两会合作与双方互信，是两岸同胞坚决反对的。令人失望的是，台湾当局对这一忠告置若罔闻，仍然一意孤行，继续坚持其政治企图，为两会商谈制造新的障碍，直至发展到现在变本加厉地不惜以极端恶劣的政治手段毒化两岸关系气氛，达到破坏两会高层会谈、阻挠两岸关系发展的目的。究竟是谁在利用两岸政治分歧干扰两会联系与合作，结论显然是很清楚

的。

需要指出的是，大陆方面主张两岸的政治分歧不应影响作为民间团体的海协与海基会的联系与合作，与此同时，也积极主张通过其他适当方式与台湾方面就解决两岸的政治分歧进行接触和商谈。大陆方面早已提出并一再重申，两岸间的政治分歧问题，应当也完全可以通过两岸的政治谈判予以讨论以求得解决，两岸可以适当方式就此商谈。但是，台湾当局一方面奉行“鸵鸟政策”，拒绝大陆方面的多次诚恳呼吁，拒绝通过政治谈判解决两岸间的政治问题，另一方面，又不愿在两岸授权民间团体的联系与协商中放弃其政治意图，其结果，必然是将政治因素强加于两会的关系之中，直至以政治手段干扰和破坏两会联系与合作。台湾当局这种作为，正是导致两会联系与合作屡屡遭遇障碍、呈现复杂性和不稳定性的根本原因，第二次汪辜会谈被迫推迟举行，就是其蓄意采取政治敌对行动破坏两会协商与合作的典型恶例。

两会协商与合作正面临考验

海协与海基会的联系与合作，在两岸关系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第二次汪辜会谈被迫推迟举行，使两岸同胞清楚地看到了台湾当局挟外人以自重、破坏两岸关系发展造成的损害，也进一步看到了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插手中国内部事务带来的恶果。同时，这一事件也清楚地显示，两会的联系与合作正面临新的严峻考验。

过去几年里两会商谈及其他合作积累的经验与教训表明，只有真正秉持发展两岸关系的诚意，切实排除政治因素的干扰，两会的协商与合作才能取得有效成果，对扩大两岸各项交流交往、增进了解与沟通、解决两岸同胞交往中产生的具体问题、维护两岸同胞的正当权益、推动两岸关系良性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当前形势下，两会的协商与合作能否恢复其应有的单纯性并取得顺利进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湾方面是否能真正停止其政治手段的介入与干预，第二次汪辜会谈能否早日恢复进行，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湾方面是否真正具有诚意。两岸关系不断发展，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也是任何力量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与必然趋势。台湾当局是顺应民心还是逆流而动，两岸同胞将拭目以待。

第五节 人民日报、新华社四评李登辉

一评李登辉

1995年7月23日至26日,人民日报、新华社连续4天发表评论员文章,抨击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的演讲。“一评”题为《一篇鼓吹分裂的自白——一评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的演讲》,全文如下:

李登辉今年6月以“私人身份”访问美国,并在康奈尔大学发表了一篇演讲,鼓吹分裂祖国。对此,海内外有识之士多有评说,发表了义正辞严的言论。我们认为,对李登辉的这篇自供,有进一步加以剖析的必要。

近几年来,李登辉散布了许多分裂祖国的言论,其真实面目日益显现。而利用外国人提供的讲坛,如此露骨、如此公开地鼓吹分裂,还是第一次。其挟洋人以自重之气氛,也是前所未有的。李登辉返回台北时或许以为他已经满载而归了。但是,任何背叛民族利益、制造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大业的倒行逆施都不能不遭到全中国人民的反对,李登辉也不能例外!

李登辉在其题为《民之所欲,长在我心》的演讲中,一次不提一个中国,却多次使用“中华民国在台湾”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说法,众所周知,自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台湾当局的代表被逐出联合国以来,台湾当局在国际社会中十分孤立。为了重新挤入联合国,李登辉近年来撕去“主张一个中国”的伪装,露出分裂祖国的真面目。他始而提出“一国两府”、“一国两区”,随后又标榜“务实外交”,制造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一个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论调,这些实质上都是“台独”的变种,理所当然地遭到海内外中国人的强烈反对。李登辉曾私下对“台独”分子交底:“统一只是说说的,其实我心里想的跟你们一样”。近两年他又提出“两个对等政治实体”、“两岸分裂分治”。虽然有时他也说过“在两岸分治的现实上追求统一”,但那只不过是遮人耳目而已。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的演讲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中华民国在台湾”或“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就是为“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制造舆论。

李登辉在其演讲中,对于他这一套“台独”主张在国际社会遭到冷遇很不满意,急切要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他抱怨至今“中华民国未能获得国际社会应有的承认”,“不满意我们今天所处的国际地位”。他对国际法和联合国也表示不满。他说,“现今的国际关系不能只限于传统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正式运作”,希求国际组织也按他的意旨办事,这就把他急于实现“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意图表达得十分充分。

李登辉谋求他的“台独”主张能得到美国的支持,竭力想在中美关系中打入一个楔子,甘当美国手中的一张牌。他在演讲中回顾了台湾与美国之间“紧密的传统情谊”。他说,“中华民国迁台初期,美国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多方援助,极具贡献。我们不会忘记这一份‘雪中送炭’的温暖,也因此对

美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他还表示要“强化”同美国的所谓“两国关系”，并且“殷切期盼”他的访问为同美国的合作“开创新机”。在美国，也确有那么一些人，一贯奉行反华和分裂中国的政策，他们不顾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确定的原则，或公开或隐蔽地支持李登辉及形形色色“台独”分子的分裂活动，想把台湾当成对付中国的一条“不沉的航空母舰”。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早就指出：“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民之所欲，天地从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近十几年来，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特别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今年1月30日发表了关于台湾问题的重要讲话，提出了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受到海内外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和拥护。尽管李登辉多方阻挠海峡两岸实现三通，经过海峡两岸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努力，祖国统一大业出现了可喜的势头。在此种情势下，李登辉本应以民族大义为重，为推进祖国统一事业尽力，但是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加速推行分裂祖国的活动。他在台湾岛上大搞“台独”活动犹嫌不足，还到外国去搞“度假外交”、“典礼外交”、“过境外交”。这一次又在美国政府怂恿下，演了一出“校友外交”的闹剧，更加公开地鼓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使其“假统真独”的面目暴露无遗。

李登辉早年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后来背叛了。他曾多年追随主张不搞“台独”的蒋经国，如今他背叛了。李登辉现在已走上“台独”之路，背叛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的统一大业。而12亿中国人民也早已下定决心，绝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台独”图谋得逞。如果李登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沿着这条危险的路走下去，那么，他必将身败名裂，沦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二评李登辉

“二评”的标题是《国际社会绝无“台独”生存空间——二评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的演讲》，全文如下：

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演讲时，用不少篇幅谈了拓展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问题。他称，台湾因为“未获国际社会应有的外交承认”而要“尽全力向不可能的事物挑战”，即打破“传统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正式运作”。也就是说，他决心要在国际上为“台独”争空间。台湾究竟有没有国际生存空间，应当有怎样的国际生存空间，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不能不分析清楚。

如果说，台湾今天没有国际生存空间，这显然不符合事实。李登辉自己在一次讲话中就表示，台湾今天与许多国家维持着极为密切的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关系，并列举了一些数字。李登辉的话尽管有些夸大，但反过来也证明，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台湾并非没有“国际生存空间”。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江泽民今年春节前夕发表的讲话更明确地指出，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不持异议。江泽民主席在同一讲话中，还要求我驻外机构加强与台湾同胞的联系，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关心、照顾他们的利益，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这表明，台湾同胞不但有着充分的国际生存空间，而且在世界各地可以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得到自己祖国的关怀和照顾。

但是，李登辉要的并不是这种国际生存空间。他要的是到国际上去“凸显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存在”，即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为“台独”寻求国际承认。近几年台湾当局以“拓展国际生存空间”为名，加紧推行“务实外交”，花样翻新，不一而足。从1993年起，还把“参与联合国”作为它“外交工作”的最高目标，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李登辉为此亲自到一些国家宣扬“中华民国在台湾”，“两岸是分裂国家”，谋求台湾“独立的主权国家地位”。此次李登辉访美，就是企图把台湾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推向国际社会。日前台湾当局居然公开宣称，要以10亿美元购买“联合国会员资格”。总之，只要能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能为“台独”鸣锣开道，就不借代价，不择手段地去运作。李登辉的“拓展国际生存空间”，显然与一个中国的原则背道而驰，与海峡两岸走向和平统一的目标背道而驰，与人们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的愿望背道而驰。这样的“拓展国际生存空间”，当然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李登辉称，为“拓展国际生存空间”，他将“尽全力向不可能的事物挑战”。于是，他就向遏止他搞“两个中国”的国际法挑战，向全世界所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挑战，向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挑战。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也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代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世界上任何挑战都改变不了的事实。李登辉的挑战，到头来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必须明明白白地告诉李登辉，你所要的分裂祖国的“生存空间”，制造“两个中国”的“生存空间”，走向“台湾独立”的“生存空间”，都是绝对办不到的。这样的“国际生存空间”，是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即违反了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愿望，也违反了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不仅中国人民不允许，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也不会允许。

国家主席江泽民今年初在有关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讲话中指出：“只有实现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才能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真正充分地共享伟大祖国在国际上的尊严与荣誉”。今天，在国际上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和荣誉，是以往任何时候所没有的。祖国的繁荣和强大，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一切中国人的光荣和靠山。我们热烈盼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使台湾同胞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真正充分地享受到应有的尊严和荣誉。李登辉的“拓展国际生存空间”只会把台湾带入绝境。

三评李登辉

“三评”的标题是《推行“台独”的政治迷药——三评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的演讲》，内容如下：

李登辉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发表的自白，不乏染着悦目色彩的政治迷药，其中之一便是“主权在民”。

“主权在民”这四个字，过去也被李登辉当作口号讲过，但他在过去阐明这个口号的内涵时，总是前后颠倒，含混不清。这次，他避开过去声称的“主权是个危险的单词”一类话，把“主权在民”落实到岛内“走向民主体制的政治改革”上，并且还要“帮助”海峡这边“实现政治民主化”，使“中国统一在民主自由和均富制度下”。人所共知，李登辉在岛内施行的并不是什么民主制度，想把他那一套搬到海峡这边来，也只能是一场空想。他在岛内一步步“落实”的，不过是如何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以及为实现“台独”铺平道路。

与李登辉在美国为自己涂抹的“民主”色彩截然相反，他在岛内的个人色彩却是精于谋权、反复无常和独裁。他当上岛内头号人物六年，就为抓权而在国民党高层发动激烈内斗五年。他玩弄权术，调动特务，借助“台独”，挑起“省籍矛盾”，分裂岛内人民，迫使一部分新老国民党人不得不以那种那种方式“出走”，从而逐步建立、巩固他的独裁体制。今天，他似乎已控制了台湾的政、经、法、军、警、特和新闻舆论。这个过程，风云变幻，充满了阴谋暗算。他甚至逼迫国民党党员不得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而只能用当着他的面起立的方式，来推选他为“总统”候选人。五年多来台湾政坛的一连串事件，不但与什么“主权在民”、“民主政治”毫不相干，而且使岛内政治舞台成了谋权政治、金权政治和黑道政治的混合体，上演了一幕幕大打出手的政治丑剧，实为世上所罕见。

李登辉在“民主”的名义下，大肆纵容、扶植“台独”势力，放任海外的一些“台独”骨干分子回到台湾，让“台独”“土、洋”合流。他让“台独”分子在岛内的活动公开化、合法化。可以说，近年来他采取的各种政治措施，无一不有利于“台独”势力的发展，以至台湾舆论不止一次地指出，岛内的“台独”是李登辉“用奶水养大”的。不仅如此，他还任在内外政治上不断吸收“台独”主张。今天，国民党与主张“台独”的民进党正在合流，这在岛内已不是什么秘密。在李登辉的主导下，国民党和民进党正密切配合，共同进行着对内建造“2100万人的生命共同体”和“主权独立的国家”、对外争取获得国际社会“外交承认”的活动，双方的分歧仅仅在于这个“独立国”的国名是叫“中华民国在台湾”还是叫“台湾国”，这不能不使人们格外警惕。

李登辉的“主权在民”之所以是推行“台独”的政治迷药，还在于他故意混淆主权概念，曲解政治学中的“人民主权”学说，宣称要重新理解国际

法中被世界各国广为接受的国家主权概念，为“台独”制造理论根据，众所周知，在国际法上，国家的主权不能分割，不能转让，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政府对外行使主权，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并无主权可言；台湾同胞作为有十二亿人民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不能单独分割出去谈主权。李登辉讲的“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是要让台湾决定关系到十二亿中国人的大事。他在这里玩弄了一个把戏，即把他自己搞“台独”的愿望推给台湾民意，把台湾同胞绑在他的“台独”战车上，一同推向海峡两岸激烈对抗的战场。

看来李登辉很难从他的“台独”泥坑里解脱出来了。他搞“台独”，就是向要求祖国统一的全中国人民挑战，向要求维护和平、密切发展两岸关系的台湾民众挑战。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是明确的、一贯的，这就是坚持统一，反对分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今年1月30日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是我们的一贯主张”。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是海峡两岸人民共同的殷切期望。站在人民对立面的李登辉，处境将是十分危险的。

四评李登辉

“四评”题为《李登辉是破坏两岸关系的罪人——四评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的演讲》，文章说：

近年来，由于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努力，双方的经济、文化、体育交流日渐增多，势头良好。但是，不久前李登辉跑到美国从事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使日趋缓和的两岸关系出现了严重倒退，给祖国统一大业蒙上了一层阴影。大量事实表明，李登辉是阻挠、破坏两岸关系的罪人。

众所周知，实现祖国统一、发展两岸关系的基础是一个中国的原则。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今年1月30日讲话中指出：“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决不容许分割”，这是维护两岸关系稳定和发展的基石。任何偏离和背弃这一原则的言行，都将严重破坏两岸关系的发展，甚至导致两岸的冲突与对抗。

李登辉近年来的所作所为恰恰与一个中国的原则背道而驰。李登辉主政初期，人们对改善两岸关系，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曾经有所期待。曾几何时，随着岛内外形势的变化及他个人权力的膨胀，李登辉即步步后退，先后提出“一国两府”、“一国两区”、“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等等主张，进而鼓吹两岸“分裂分治”，在国际上公开打出“阶段性两个中国”的旗号，说什么“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其欲分裂国土和主权的面目暴露无遗，两岸关系的发展也因此而受到严重的损害。

李登辉破坏两岸关系并非自今日始，去年3月，他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

郎谈话时就说：“中国一词是含糊不清的”，“主权这二个字是危险的单词”，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是“奇怪的梦”，还说什么他要带领台湾人建立“台湾人的国家”。他不止一次地宣称：“现在的两岸，一个是水，一个是油，水和油是合不起来的”，“我们应尽量忘记一个中国、两个中国这种字眼”。这是在向国家主权挑战，是要与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 12 亿中国人民为敌。

近年来，李登辉置两岸人民要求尽快结束敌对状态、保持和平与稳定的强烈愿望于不顾，蓄意制造敌对意识，恶化两岸的和平气氛。在国家主席江泽民提出“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两岸可先就正式结束敌对状态进行谈判”的建议后，李登辉竟公开予以拒绝，台湾军方还屡屡制造打死、打伤沿海渔民的事件，使两岸敌对气氛不断升高，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受到严重损害。

在两岸关系上，李登辉还为双方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设置重重障碍。一方面，他要中央政府承认海峡两岸“分裂分治”、台湾是一个“对等的政治实体”、放弃使用武力、给予国际生存空间等，阻挠两岸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他对海协和海基会之间的事务性商谈也不抱诚意，总是设置这样那样的障碍。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缓和与发展两岸关系的态度一向是真诚的、积极的，讲原则的。对任何阻挠、破坏中国统一大业的分裂行径，我们决不会坐视不管。

两岸关系现已处于非常关键的时刻。事实表明，指望李登辉这样一个“不知道中国为何物”的人来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无异于缘木求鱼。全体中国人对李登辉切不可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